

地缘看世界

——春秋



第二册

温骏轩◎著

地 缘 看 世 界

春 秋 卷

第 二 册

温
骏
轩
著



整理说明

本书整理自天涯社区贴子——地缘看世界，作者为温骏轩（天涯 ID 为：鄙视抢沙发的）。整理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大家的阅读，仅适用于个人的收藏，禁止用于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途径，版权属于著作人所有。

说明一下书中配图的来源。为了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和进一步加深对印象，以及增加文章的趣味性，书中配了较多的插图。其中包括地图和实景图片，地图中基础部分都是来源于原贴子，这部分地图也是理解文章内容的关键部分。另外，由于了文章中的一些所写的地理方面的内容，在原贴图没有说明或者不够仔细，所以额外补充了一部分地图。补充的地图主要来源于网络和自制。因条件所限，只是作为参考用。对于来源于网络的地图和实景图片，如对原图作者的权益产生侵害，请联系删除。

书中文章内容基本上按在线贴子的写作顺序来进行排版，其中有小部分作了微调，包括“汝海的危害和治理”、“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地缘分析”，以及“巢湖市拆分的背景分析”这部分内容。“大禹治水”一章中，“汝海”部分的内容在原贴中安排在吴越章节中，但这部分内容和炎黄之后展开的大禹治理黄河水患更贴合，并且抽离出来不会对吴越部分的连贯性产生影响，所以和前面部分合并后安排至第三章中。至于后两者，属于与春秋历史无关了，倒不会影响相关章节的排序。在到吴越部分江东解读时，作为独立的章插入（原贴中也是写吴越春秋部分时的所作解读，“巢湖拆分”则是在写秦汉时的时事解读），在现实和历史中穿插，对这两部分的理解都有比较大的帮助。

由于精力有限，所以书中存在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提出批评指正。另外，也感谢作者（温骏轩）一直以来默默的分享。目前，天涯看世界贴子已经出了第一本书——《谁在世界中心》，如果想阅读纸质版的可以去购买。

清风

前言

大家可能认为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来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其实不是，我自幼喜欢读史，地缘方面的研究最初只是用来解读历史的一种方法。

小时候读史只是喜欢里面的人物和情节，长大以后也如一般人那样升华去体味史中人物的思想。不过看得越多，心中的迷惑就越多。中国历史的思路是“人本历史”，例如在历史中只能读到诸如孙刘联盟略施小计，便能以数万之众击溃数十万敌人的经典故事。但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长江那么长，曹操一定要从赤壁过江？从《三国演义》中我们看不到答案，从《三国志》当中我们也找不到结果。有的只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人定胜天的论调（不过三家归晋这一段收得甚急，避开了解释为什么人气最旺的蜀汉政权，却是第一个被北方政权灭掉的原因）。

中国从来不缺乏“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只是讲述历史的史家们多是祖传的职业，自太史公以列传的形式将史书的模本固定为人物传记后，记录名人的行为和观察人际关系，就成了史家们分析历史的不二法门（他们甚至不屑于分析，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只习惯于根据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简单的划分黑白）。当年明月曾经说他是从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历史人物的选择与放弃。这种角度已是一种突破，并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是这仍是站在历史重要人物角度来解析历史，仍不能够解开我心中的迷茫。

偶然间又看到了《窃明》的作者试图从军事的角度来解析历史（他用的是穿越小说的方式），亦是很有新意，但仍感觉这种方法偏战术性了。我需要一种能站在“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的方法。这种“人性”不是个别伟人的性格，而是人类或者说一个族群的性格，也可以说是“人民的性格”。直到我重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才找到“人民历史”的感觉。“大历史”观必须将视线从具体人物和事件上移开，才能够从更深层次上感受历史的规律和必然。

于是我试着从“人性”（人类的性格）的角度，沿着古人的思路去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个人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既然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么人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利害关系，就是周边的环境。这需要暂且抛开人定胜天的勇气，而直接去感受地缘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我曾经说过，现实的国

际关系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无论是对地缘还是对历史的研究，都不能只是为了显示学问的高深。它要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即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起到指导作用，这样研究才有意义。

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分析利害关系。为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展，找到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向（例如你可以从地缘的角度知道，中国目前将精力放在东南亚，会比放在墨西哥身上重要得多）。这就好像在图上找到可行的道路一样，至于路怎么修，修好以后用什么交通工具走，就要靠其他的专业人士配合了。

完全从客观环境角度，去解读人类历史是不够科学的；但这并不代表不要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有思想，也就是说能够总结出经验反过来改变环境。因此也需要从人文的角度解读历史，地缘和人文并不互相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文化产生是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的。前面说过有机会我会开个贴细说的，切入点应该是宗教。

很多初看帖子的朋友，会回帖表示这个帖子所表达的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普及地理知识的帖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理也好，环境也罢，都只是“地缘”这个概念中的一个要素罢了。“人”才是地缘这个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不光要去考虑物理环境，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能够作出事半功倍的决策。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于精英人物有所不同，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人类群体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相互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研究、解读这些地缘要素产生的环境背景。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要素会直接运用在地缘研究中去。

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标准，那就是看它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按照这个标准，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基于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感，就是研究中国地缘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而那些阶段性流行的所谓“日风韩流”，就不在考虑的范畴中了。

明确了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地缘视角运用于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了。由于这些要素都是相对恒量，所以解读出来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的偏向战略层面了。比如我们可以从地缘的视角来分析出，中国有哪些城市具备成为区域中心，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有可能直接辐射哪些区域，但具体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光是做地缘研究能够做到的了。

这个帖子能一直写下去，初始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拿出来分享（一个人一旦有了些新的想法，却不能找到同道之人分享是很难受的，也无法再做提升）。你不能指望周围的人跟你有一样的爱好，好在网络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还是那句话，认同的捧个人场，不认同的砸个砖场也无妨。

温骏轩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东夷和原始西羌初期分布的区域	1
第一节 古中国核心区和边缘地区分布的地理单元	1
第二节 夷和戎在华夷五方格局中特殊性的地缘背景	2
第三节 原始东夷分布的三个主要聚落区	4
第四节 黄河下游频繁改道影响的区域和造成的后果	6
第五节 黄河水患频繁的原因并对早期华北平原开发的影响	9
第六节 辽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其早期文明没落的原因	10
第七节 原始西羌在黄土高原上发展农业可选择的盆地区	13
第八节 炎黄二族的发源地及其之间的争斗	15
第九节 炎黄部族进行阪泉之战的具体地点	17
第二章 原始西羌和原始东夷的冲突与融合	19
第一节 渭河平原地区经崤函通道沟通华北平原	19
第二节 黄帝族通过崤函通道渗透至河洛地区	21
第三节 炎帝族经山西境内盆地区进入华北平原	22
第四节 炎帝族在涿鹿之战中败于蚩尤后求助黄帝族	25
第五节 黄帝族攻入原始东夷核心区并开启彼此间的融合	27
第六节 东西部两大族群进入部落联盟时代	28
第三章 大禹治水的地点和方式及治水成功后的影响	31
第一节 中原因处在黄河治水关键位置而确立地缘优势	31
第二节 大禹将黄河之水引导向北线而让黄淮地区受惠	33
第三节 大禹在龙门运用疏导河水的方式解决水患	34
第四节 禹门口的龙门没有成为大禹治水地点的原因	36
第五节 伊阙的龙门因伊水在此受阻而成为大禹治水之地	38
第六节 伊水因未能过龙门而漫流成汝海并为患淮河流域	40
第七节 大禹将伊河之水引入黄河解决了淮河的水患问题	42
第八节 大禹疏通伊阙而治水成功并由此扩大政治影响力	43

第四章 夏和商在中原统治权的确立并面临的地缘压力	46
第一节 夏的共主地位受到山东丘陵东部族群的挑战	46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与夏在中原面临的四方威胁	47
第三节 商族凭借地理位置和掌握青铜技术得以入主中原	49
第四节 商族入主中原后与东夷族群发生冲突	51
第五节 周挑战商的共主地位并在地缘文化上的贡献	52
第五章 周王朝的建立和分封诸侯国	54
第一节 周经牧野之战灭商取得中原统治权	54
第二节 商朝遗民迁移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	56
第三节 周人重子嗣和生育以服务于分封制度	57
第四节 周人在原东西部群区域和中原商人旧地封建的封国	58
第五节 周人在山东丘陵分封齐和鲁作为姜太公和周公封国	60
第六节 周公的历史身份问题和齐鲁位置对换的假设	61
第七节 周人在燕山以南分封燕国作为召公的封国	62
第八节 周人在朝歌故地分封卫国以监视商人旧部	63
第九节 周人在环太湖平原封建吴国以从南部包夹夷部	64
第六章 楚国在江汉平原发展并受到周人的压制	67
第一节 楚人的族源与江汉平原的地缘优势	67
第二节 楚人自认为蛮夷与周人分封汉阳诸姬	68
第三节 南阳盆地的地理结构	69
第四节 周人在南阳盆地封建诸国以压制江汉平原的楚国	71
第五节 南阳盆地通过方城夏道与中原沟通联系	73
第六节 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沟通联系的通道	74
第七节 江汉平原地区经信阳通道沟通淮河流域	76
第七章 秦国从陇西向关中发展的历程	79
第一节 秦非子因对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	79
第二节 秦人被周王室初封在陇右地区	80
第三节 陇右地区经泾河河谷和关陇古道沟通关中地区	81
第四节 秦人获周王室允许进入汧渭之会放牧	84
第五节 周人面临陇东高原上犬戎的地缘压力	86
第六节 犬戎将周人赶入渭河平原后占据陇东高原	87

第七节 镐京在西周封国勤王军队到来前被犬戎攻破·····	90
第八节 周王室决定东迁洛邑及由此带来的利弊·····	91
第九节 周王室东迁后秦人得到关中地区·····	93
第十节 陕北高原上的申戎与周王朝的关系·····	95
第八章 晋国在山西高原的兴起·····	97
第一节 周成王将其弟分封至唐此后以晋为封国名·····	97
第二节 周人在山西封建的诸侯国和周边分布的戎狄·····	98
第三节 晋国所处位置在地缘上的优势和劣势·····	100
第四节 周王室的衰弱助长了晋国的曲沃代翼之乱·····	101
第五节 晋国做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及古曲沃的位置·····	103
第六节 西周时期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腹地还存在的封国·····	105
第七节 晋国大小宗的位置及其之间的博弈结果·····	106
第九章 周王室在河洛地区的战略布局·····	109
第一节 周王室东迁失势后出现春秋五霸·····	109
第二节 春秋时边缘国家相较中原国家具有的地缘优势·····	110
第三节 周王室东迁洛邑后再也无法返回渭河平原·····	112
第四节 周召分陕与虢国被安排在陕地的战略作用·····	113
第五节 周人在洛阳盆地西侧建立洛邑作·····	114
第六节 洛阳盆地沟通外部的四条战略通道·····	117
第七节 勤王四国与东周王室的地缘关系·····	120
第十章 郑国东迁中原并在周边地区扩张·····	122
第一节 郑桓公在犬戎入侵前向中原转移人口和财物·····	122
第二节 太史伯对郑国东迁选址的建议·····	123
第三节 郑国东迁中原后灭掉东虢和郛两国·····	125
第四节 太史伯建议郑国向谢郟之间进行扩张·····	126
第五节 郑国灭掉胡国并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	128
第六节 武姜偏爱次子段为郑国君位之争埋下隐患·····	130
第七节 郑庄公将京城让给段作为封地·····	131
第八节 郑庄公先发制人击败段迫使其逃亡·····	133
第十一章 郑卫之间的矛盾与郑国衰落的原因·····	136
第一节 周郑交质让郑国失去了周王室的倚靠·····	136

第二节 卫国收留郑国政敌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	137
第三节 河济平原在春秋时的地缘地位相对不高·····	140
第四节 郑国缺乏战略纵的地缘位置使其走向衰落·····	141
第五节 郑国东迁地的假设及与王室关系恶化造成的影响·····	142
第六节 郑国与上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面临相似的地缘格局·····	144
第十二章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并调整和安排封国·····	146
第一节 周人在商王畿故地部署三监以监视商王室·····	146
第二节 周公平定三监和商朝王室的联合叛乱·····	147
第三节 周公将商王畿故地封给康叔并命名为卫国·····	149
第四节 周公对三监在商王畿故地以外的封国的处理·····	149
第五节 周公东移原有封国和向边缘地区分封新封国·····	152
第六节 周人对河北平原的商族遗民的处理方式·····	154
第七节 周人为黄河以南的商族遗民建立宋国·····	155
第十三章 戎狄渗透至河北平原并入侵邢卫两国·····	157
第一节 四渎在中国古代的神圣地位·····	157
第二节 周公七子的受封与邢国封建的初衷·····	159
第三节 山西高原上的戎狄渗透至河北平原滹沱河两侧·····	161
第四节 鲜虞在滹沱河两侧生存并在春秋后期建立中山国·····	163
第五节 邢卫两国在戎狄入侵下被迫迁移河济平原·····	164
第六节 邢卫两国退守河济平原后的不同命运·····	166
第十四章 齐鲁在泰沂山脉的封地与胶莱河的地缘分析·····	166
第一节 齐鲁两国在泰沂山脉地区融合东部族群·····	168
第二节 齐鲁两国的初封地与在沂沐河谷生存的莒国·····	170
第三节 齐国面临来自河济平原方向的地缘压力·····	172
第四节 胶莱河对山东的地缘分割作用和胶莱平原的特点·····	174
第五节 元朝时因海上漕运需要打通胶河南部入海通道·····	175
第六节 新胶莱运河对沿途和周边地区带来的利弊·····	178
第七节 新胶莱运河对中国沿海地区地缘格局造成的影响·····	179
第十五章 齐国征服莱夷与胶东半岛的独特气质·····	182
第一节 齐国攻占莱夷所占据的胶莱平原·····	182
第二节 莱夷退入胶东丘陵后主要活动的区域·····	183

第三节 齐国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之滋生孤立主义思想·····	185
第四节 方士以炼丹药和沟通仙人的技能活跃于历史舞台·····	186
第五节 方士将云雾飘渺的山峰设定为仙人居住地·····	188
第六节 胶东半岛特殊的地理结构体现出的地缘优势·····	190
第七节 胶东半岛由于仙气和海市蜃楼存在而受方士青睐·····	192
第十六章 鲁国的位置和境内分布的山河湖泊·····	195
第一节 鲁国初封地的地理位置·····	195
第二节 鲁国在三监之乱平定后由鲁阳东迁至曲阜·····	196
第三节 鲁国与古泗水的关系·····	198
第四节 鲁国故地存在的大泽湖泊·····	200
第五节 尼山和蒙山在鲁国的地位和对其的影响·····	201
第十七章 公子纠和小白的君位之争及引发的齐鲁战争·····	204
第一节 公子纠和小白各前往鲁国和莒国政治避难·····	204
第二节 公子纠和小白分别回国的路线·····	205
第三节 管仲前往穆陵关附近阻击公子小白归国·····	208
第四节 鲁国护送公子纠归齐争位失败后与齐国发生干时之战·····	209
第五节 齐桓公进攻鲁国引发长勺之战·····	211
第十八章 长江流域和江东平原的地理结构·····	213
第一节 春秋时长江流域存在的不同气质的国家·····	213
第二节 长江由于河道较稳定而需湖泊来调节水量·····	214
第三节 云梦泽和彭蠡泽的位置和消失原因·····	216
第四节 江东平原的概念和地理范围·····	218
第五节 太湖的独特性和其形成的原因·····	222
第六节 太湖与大海连通的河流通道·····	224
第七节 钱塘江入海口的特点与越人在宁绍平原的立国·····	226
第八节 吴国和越国在江东平原的地缘分割线·····	228
第十九章 伍子胥入吴并对吴国产生的影响·····	232
第一节 吴国称霸过程中面临的地缘压力·····	232
第二节 楚国封堵伍子胥入吴的地点·····	234
第三节 伍子胥过昭关后再经渔邱渡横渡长江进入吴国·····	237
第四节 吴国将楚国列为率先需要解决对象的原因·····	240

第五节 伍子胥帮助吴国营建都城以及开挖胥溪和胥浦·····	241
第二十章 吴国攻楚前所做的准备工作·····	245
第一节 吴国与楚国的对手晋国结成政治盟友·····	245
第二节 方城夏道和长江水道不适合作为吴国攻楚的路线·····	246
第三节 吴国从江淮地区经信阳通道攻楚比从长江水道更稳妥·····	249
第四节 吴国灭掉淮泗地区的徐国和钟吾国·····	251
第五节 吴国以疲楚和分化楚国盟友之策为战争作准备·····	253
第六节 蔡国成为楚国附庸国后又被卷入吴楚博弈中·····	254
第二十一章 长江中下游沿岸省份的地缘分析·····	256
第一节 江南省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的经济和人才优势·····	256
第二节 清帝国出于对江南省的忌惮将之纵向一分为二·····	257
第三节 合肥成为安徽省会的历史背景·····	260
第四节 合肥成为省会城市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影响·····	262
第五节 鄂湘赣三省的区位和彼此间的地缘关系·····	264
第六节 鄂湘赣三省的省会城市选择的地缘背景·····	267
第七节 袁渚走廊在沟通湘赣上的重要作用·····	269
第八节 湘赣地缘潜力对比与长株潭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270
第二十二章 安徽巢湖地级市被拆分的背景分析·····	274
第一节 上海力图以自己为核心打造长三角都市圈·····	274
第二节 南京规划自己的都市圈时所选定的范围·····	275
第三节 合肥在安徽省内构筑自己的都市圈·····	278
第四节 合肥拆分巢湖市的目的及对南京都市圈的影响·····	279
第五节 合肥计划开挖江淮运河所产生的的影响·····	282
第二十三章 吴国通过柏举之战中攻入楚国郢都·····	285
第一节 吴国军队沿淮河水陆并进并通过信阳通道·····	285
第二节 吴军没有攻击楚国的汉水防线而是退入柏举·····	287
第三节 吴军诱使楚军追击进入柏举后将其歼灭·····	287
第四节 楚国向秦国求援以帮助其击退吴军·····	290
第五节 吴国攻楚的战略目的并非消灭和占领楚国·····	291
第六节 秦国通过丹江通道出兵救楚·····	292
第七节 吴军撤出江汉平原后唐国和随国的命运·····	294

第八节 吴国和楚国在江淮地区形成的地缘平衡线·····	295
第二十四章 越国的势力范围与宁绍平原的海侵问题·····	297
第一节 越人以越国为历史源头并自认为大禹后人·····	297
第二节 汉朝为加强中央向心力认可越人对大禹的追认·····	298
第三节 越人因宁绍平原成陆不稳定而在闽浙丘陵徘徊·····	299
第四节 姚河河谷的率先成陆及后又反复遭海水入侵·····	301
第五节 杭州湾造成宁绍平原的海侵并使越人留在浙闽丘陵·····	302
第六节 杭州湾海潮破坏湾内泥沙成陆和侵蚀两岸平原·····	304
第七节 越人在吴人开发苏锡常平原后亦进入杭嘉湖平原·····	306
第八节 越国与楚国以黄山山脉一带为地缘分割线·····	308
第二十五章 吴越两国爆发携李之战和夫椒之战·····	311
第一节 吴国在柏举之战前对越国的携李发起进攻·····	311
第二节 越王勾践击败第二次进攻携李的吴军·····	313
第三节 越国未选择吴淞江而决定从太湖进攻吴国·····	314
第四节 越国水军意图先攻取太湖中的洞庭山·····	316
第五节 吴都通过胥江连接太湖并接入长江·····	318
第六节 越国在夫椒之战中落败并被吴国乘胜攻入核心区·····	320
第二十六章 吴国北上伐齐和进入中原争霸·····	323
第一节 吴国决定从海上沿海岸线北上攻击齐国·····	323
第二节 吴国水军在与齐军的海战中失败·····	324
第三节 吴国开通邗沟后沿河再次北上伐齐·····	326
第四节 吴军沿河北上时得到泗水两岸小国的支持·····	327
第五节 吴鲁联军在泰莱盆地击败齐军·····	328
第六节 吴鲁联军在艾陵之战中再次击败齐军·····	329
第七节 吴国开挖深沟以让其战舰进入中原河济两渚·····	331
第八节 吴国参与黄池之会并在会盟中的惊人表现·····	333
第二十七章 越国恢复国土和控制外越地区·····	336
第一节 吴王夫差对越国所犯的错误·····	336
第二节 越国所恢复的国土的范围·····	338
第三节 吴人开凿胥浦与越人开发宁绍平原·····	340
第四节 浙江境内的内越和外越的地缘分割线·····	341

第五节	钱塘江水系对于内越发展和交流的重要作用·····	343
第六节	外越地区分布的山脉和形成的地缘文化·····	345
第七节	越国利用控制的外越地区发展海上力量·····	346
第二十八章	越王勾践灭吴并沿海路北上布局·····	350
第一节	吴王夫差从中原回师救援江东的根基之地·····	350
第二节	吴国在笠泽之战中落败和吴都失守后亡于越人·····	351
第三节	夫差入列春秋五霸的问题与春秋战国断代的标准·····	353
第四节	越国接收吴国江淮之地后所作的调整·····	354
第五节	越国沿海路北上在今连云港一带和琅琊布设据点·····	356
第六节	越国在泗水河畔举行会盟和称霸·····	359
第二十九章	秦国和晋国对河西之地的争夺·····	361
第一节	秦晋争夺河西之地的历史背景·····	361
第二节	秦国意图趁晋国出现内乱之机夺回河西之地·····	363
第三节	秦国在夷吾许诺割让河西八城后扶持其归晋继承君位·····	364
第四节	秦晋以饥荒借粮问题为导火索而爆发战争·····	366
第五节	秦军攻入晋国河东之地所用的黄河渡口·····	367
第六节	秦国在韩原之战中打败晋国后取得河西之地·····	370
第三十章	晋国假途伐虢及与楚国发生城濮之战·····	372
第一节	晋国意图灭掉虢国以取得崤函通道东端控制权·····	372
第二节	晋国通过假途伐虢的战术吞并虢国和虞国·····	374
第三节	秦穆公扶持公子重耳返回晋国继承君位·····	376
第四节	宋国国土缺乏山地保护而只能依托河流防御外敌·····	377
第五节	宋襄公称霸失败后与楚国爆发泓水之战·····	379
第六节	楚国为称霸中原而进攻宋国和齐国·····	380
第七节	晋国为救宋而攻卫曹两国并在得手后退至城濮·····	381
第八节	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而成为新的霸主·····	383
第三十一章	秦国东征郑国引发与晋国的崤之战·····	385
第一节	秦穆公在晋文公去世后欲独自进入中原称霸·····	385
第二节	晋国获得在河北平原土地让郑国以此离间秦晋伐·····	386
第三节	秦穆公欲东征郑国以在中原获得立足之地·····	387
第四节	陕地经三门峡所在的黄河水路沟通下游时航道不佳·····	388

第五节 陕地经南崤道和北崤道沟通洛阳·····	390
第六节 秦军过崤山时在南北崤道两条路线的选择·····	392
第七节 秦军返程时在崤道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	394
第三十二章 秦霸西戎与晋国的魏绛和戎·····	399
第一节 秦国征服陇右高原的戎人·····	399
第二节 秦国征服陇东高原的义渠戎·····	401
第三节 秦国征服陇东高原的乌氏戎和河西之地的大荔戎·····	403
第四节 陕北高原上的临衍戎和白狄在秦国压力下的不同下场·····	405
第五节 晋国以魏绛提出的和戎之策来整合周边戎狄·····	407
第六节 晋国的国土结构对其最终走向分裂的影响·····	408
第七节 晋国和戎政策的实施方式和取得的效果·····	409
第三十三章 白狄从陕北高原迁移至华北平原·····	412
第一节 白狄在秦国压力下经孟门渡河进入山西高原·····	412
第二节 白狄从太原盆地进入忻定盆地·····	415
第三节 白狄没有选择滹沱河河谷进入华北平原·····	416
第四节 白狄经今平型关地区和灵丘盆地进入华北平原·····	418

第一章 原始东夷和原始西羌初期分布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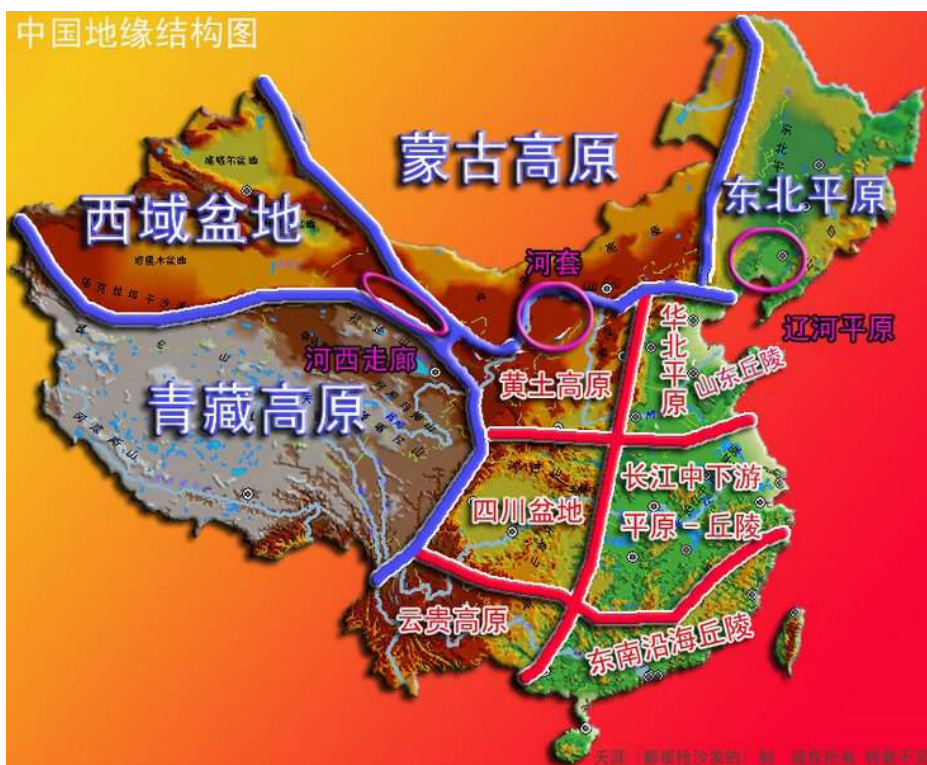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古中国核心区和边缘地区分布的地理单元

之所以这么久才开始中国部分，主要是在思考从哪里开始。如果按照我一开始划分的地缘结构图，可以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逐块分析。不过每一个地理单元固然有它的特点，但如果不能和周边的地理单元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并不能看清它在中国版图中的地位如何，因此以历史为脉络进行分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套用一句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放在中国身上也是一样。

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的版图，是经历过 5000 年的历史磨合，其间的地缘轨迹异常清晰。我们只需按照历史的脉络，随着中华民族扩张的路线解读下去就行了。当然，尽管每一个王朝的循环看似都有些类似，但其实都有各自的地缘重点。把握住这一点，才是解读中国部分的关键。既然准备按照历史的脉络来写，那么从什么时代开始亦是一个问题。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也许要从史前人类走出非洲开始了。这样的工程实在不是我能承受的，事实上现在也没有定论。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话，大家又会陷入到 DNA 的争论中去了。

如果仅从有明确记载的历史时期开始，那么西周的共和元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公元前 841 年）。从那时起，中国的历史就有了明确的纪年。不过对于华夏民族的最初起源，始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还是要从炎黄时代谈起。这一部分一直到商代，之前都被西方认为是神话时代。当然甲骨文的发现让这部分历史变得有了可信度，因此中国古代对于这一部分的记载也可以部分采信了。当然，于贴子本身的立意来说，并不想介入“专家”们对那些生僻的汉字及名词解读的争论当中。我更想做的仍然是用简单的逻辑关系，结合一部分可信度较高的史料，解读一下华夏文明形成的地缘因素。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曾经将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直至海洋的中国疆土称之为“古中国核心区”，换言之也就是汉人主要居住开发的区域。而其余的东北地区、蒙古高原、西域盆地区、青藏高原都被列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当然这种分类方法都只是相对的，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现在都已经明白无误的成为中国主权完整的一部分了。之所以要这样划分是想让大家清楚，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这几块边缘地区与核心区的反复博弈过程。而今天的中国能够拥有这些地区，是有无数先人流血牺牲而造就的。



中国地缘结构图

当然正如在历史上，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需要时间成为中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一样。所谓的“核心区”也不是一天造就的。在这张《中国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各自的地缘特点，古中国的核心区可以由北至南，由西至东大致被划为 6

个区域。即黄土高原区、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流平原——丘陵区、云贵高原区（包括横断山脉）、东南沿海丘陵区。这 6 个地理单元成为华夏核心区的顺序大致是由北向南的，起点就是在黄土高原。

不过现在的主角却不仅仅是黄土高原，最起码在它的东方，山东丘陵乃至辽河平原应当与之获得同样的地位。在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当中，黄河和黄土高原一直是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因此黄河也被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这一点曾经让年幼时的我很不理解，最起码对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长度更长、水更清的长江更应该享有这个资格。不过如果仔细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和地缘结构的话，黄河的确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将黄土高原当做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就不够准确了。

第二节 夷和戎在华夷五方格局中特殊性的地缘背景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名词或者说是“族群”的影子是挥之不去的，特别是对于西周以前的历史来说，那就是“东夷”。在周人所建立的华夷五方格局中，位于华夏族四个方位的边缘族群看似都属于受歧视的民族。但从字的原始结构来看，东“夷”和西“戎”明显属于中性，并带有武力色彩。前者的意思为持弓之人，后者则直接代指兵器。而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边缘族群，周人明显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华夷五方格局

“夷”族贴上一个更为恶劣的标签，却让后世很多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人所看不懂。当然，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看得懂字义本身所带有的属性。不过对于后世很多人来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西戎”还是“东夷”都已经彻底的沦为贬义词了。尽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这四个方位的族群结构并不相同（特别是所谓“东夷”）。

在周人还没有占据中原，并形成华夷五方格局之前，最初的“中国”（如果我们能将之称为“中国”的话）是由两大族群组成的。分别是居于西方黄土高坡的“原始西羌”族群和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群。之所以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这两大族群，是为了与“专家”们的文字游戏划清界线。否则仅仅是“夷”这个字所代表的属性就要被争辩上几个月。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所谓“史料”最多也就2000多年的记载时间，而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族群却生活在四、五千年以前。关于“原始西羌”的定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后世所称的“华夏族”划等号。

之所以在这里不直接用“华夏族”这个符号代表黄土高原上的先民，是因为后世所称的“华夏族”很大程度上是由东西两大族群融合而成的。如果单从文化上的贡献来看，东部的族群可能还要大些。当然，最后取得政治胜利的却是来自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因此后来在华夷五方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族群被当然的贴上“华夏族”的标签。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仅仅将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非常不严谨的。这就好像两家公司合并重组，新的公司可能会使用原先一方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另一家公司原有的影响就不存在了。只是时间久了，后人多会根据名称来单线寻找历史的轨迹罢了。

南蛮、北狄分别被贴上了“虫”族和“兽”族的属性。

对于周人高看西方的边缘民族，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于传统史观来看，也承认从黄土高原上走出的华夏民族，与这些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民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不过没有为东面的



陕北地区的放羊

关于“羌”字的使用是和“夷”字相对应的。前者之意可解读为“牧羊之人”，后者可理解为“持弓之人”。这分别代表了两者的主要生产方式。黄土高原上的族群所处之地多山

多草，以放牧山羊作为最初的生产方式是自然的选择。即使是在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黄土高原上的老汉扎着白羊肚手巾，赶着一群羊在山坡上行走。尽管那些山丘远望过去已经是光秃秃一片了。而东部沿海的地形地貌显然更适合“渔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对付林中的野兽，还是水里的鱼，弓箭都是不错的工具。这种生产方式的影响一直沿续到现在，尽管对付林中动物的工具已经变成了“枪”（由于政治原因，已经不让用了），而对付水产品的工具早已被效率更高的“渔网”所代替。

关于东西两大部族原始的聚落区域，我们需要有一个了解。概而言之就是“原始西羌”居于黄土高原之上；而“原始东夷”则散布于辽河平原南部直至“东南沿海丘陵”北沿的沿海地带。如果用一个汉字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那就是左转 90 度的“旦”字，或者是左右翻转 180 度的“旧”字。

第三节 原始东夷分布的三个主要聚落区

关于“原始东夷”的分布区域，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比之黄土高原上的族群要更具有“海洋属性”。这也就让他们能够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进行迁徙并传播文化，由此也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即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以辽河平原为主的“辽河文明”区；山东半岛上，地形特点为丘陵地带的“海岱文明”区（“海”为渤海，“岱”为泰山）；长江以南，位于太湖周边，南至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北沿，环太湖平原的“太湖文明区”。

关于这三个文明区之间的关系，目前已为考古方面所证实。最为显著的证明是生活在这几个地区的先民们都具有类似的制陶工艺（黑陶）和玉器文化。事实上



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在华夏族尚未完全融合这一地区的时候，也的确将之冠以不同的前缀命名为各类“夷”族（如“徐夷”、“鸟夷”一类的）。由于后世按照

考古发现的地点来命名他们所发现的遗址为所谓“XX 文化区”，因此即使是有着强烈亲缘关系的文化也会有不同的名称。这种习惯并非现在所有，古代的史官们也经常做这种“盲人摸象”的事，同一个民族由不同人记载会有 N 多不同的名称。这种混乱的情况使得一般的非专业人士无法洞查其中的联系。

当然，以原始先民的交通能力而言，在地理相隔较远的区域内，相同的文明来源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的确也会产生差异。将之命名为不同的文明也说得过去。就我们现在所在说的“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来说，按照现世考古学家的命名，我们可以分别找出三个有代表性的文明符号来。即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明”；以山东丘陵地带为中心的“龙山文明”；以及太湖以南的“良渚文明”。

古代的海岸线和现在的海岸线有所不同。由于上古时期的温度要比现在高，因此南北两极的冰也没现在那么厚，海水也相对的比现在高。换言之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温室效应”在 3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开始气候变冷是在商周之交，具体的情况到那一章节时会提到。就我们现在所要说的时空大概处于 4000 年前，也就是所谓的“夏朝”以前的事。或者说是大约 6000 年——4000 年之间的这段历史。

在这一时期可以确认的是，中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以至于先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象的出没。由于温度的原因，当时的海岸线要比现在更靠西。可以说渤海、黄海和东海，这三个海域的海岸线都要比现在后退几十公里。当然这意味着现在的天津、上海包括江苏的部分沿海城市当时都不存在。不过大家也别把这种变化想象得过于严重。相比于整个地质变迁的过程，几千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海岸线的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实际的改变。



华北平原岸线变迁示意图

我做了一张《华北平原岸线变迁示意图》，大致的标示出了黄河下流地区的这种变化。其大致的起始日期是在6150年前，在此之后海岸线开始向东推移，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要讲述的历史当中，这是海

洋所能推进的极限了。在图中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来说，海水的高低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而对于处在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族来说，却要直接面对海岸线变化的影响。

第四节 黄河下游频繁改道影响的区域和造成的后果

关于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我们已经认定有“辽河流域”、“山东丘陵”及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平原地区”了。将这三个文明区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在它们三者之间也就是广义上的黄河下流地区。而这一地区一直没有存在稳定的文明区，也就是说三者之间的联系是断续的。这固然与海水的侵入有一定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黄河下游的频繁决口与改道而造成的。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会发现我在《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中用蓝虚线勾勒出了一个扇形的区域。并将之标注为“黄河下流变道区域”，这一区域也大致位于现在



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我们所说的华北平原之上。

相信对于抗战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黄泛区”的概念。当年老蒋为了抵挡日军南下，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大坝炸开，以至于黄河以南的，位于黄淮流域的豫皖苏3



黄泛区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

包括海河平原和黄淮平原) 地区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黄河泛滥的历史记载只有 2500 多年，就认定在此之前黄河是一条安静的河。在此之前黄河对原始人类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比后来小。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河下流的走向，也仅仅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的历史当中，黄河无数次的以山东丘陵为中线，上下摆动。时而在山东丘陵的北部流入渤海湾，

省 44 个县成为黄泛区，其影响一直到长江以北。对于老蒋的这种行爲，历史上他并不是第一个做的，在随后的历史解读中我们还会看到有人在他之前做这样“以水为兵”的事。当然，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做是要承担很大的道德风险的。不过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所需要清楚的是，人为制造黄泛区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在历史上黄河由于自身的原因决口改道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仅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史书第一次记载黄河改道以来，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这 2500 多年间，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就有 1500 余次，较大的改道有 2、30 次。洪水遍及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 25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可以说华北平原（包



黄河入海口卫星图



黄河入海口



黄河故道分布图

时而又南下覆盖淮河，并反客为主“夺淮入海”流入黄海（可怜的淮海现在被搞得只能流入洪泽湖，而没有出海口了）。黄河这样的反复无常在地缘上所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使得华北平原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使得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治理黄河都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其成败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另一个后果是，黄河从黄土高原上所带下来的大量泥沙淤积在入海口处，使得华北平原的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这一进程至今仍在进行中。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广义上的黄河流域所覆盖的区域。这与现在所认定的黄河流域的

区别主要在下游地区。目前我们习惯上将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称之为“海河流域”，以南的区域称之为“黄淮流域”。不过在历史上，这两条黄河的小弟却无数次被这个喜怒无常的大哥鸠占鹊巢。这也让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也被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所覆盖了（主要是太行山以西，燕山以南地区）。大家参考一下这张《黄河故道分

布图》。需要注意的是，这上面仅仅是标注了 6 次比较著名的改道事件，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大禹所治的那条“禹河故道”。

第五节 黄河水患频繁的原因并对早期华北平原开发的影响

说到华北平原的水患，以及东亚文明的初始，我们就必须先解释一下当时的气候情况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大规模降温的情况，地质学家们称之为“冰河期”。目前的证据表明，最后一次冰河期大约在 1 万年前结束了。随后气温开始回升。从那时起，人类进入原始文明时代。气温回升的高峰期在约 8000——5000 年前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也是东亚地区新石器发展的黄金时段，随后气温开始有所回落。直到 3000 年前的商周交替时期，气温大幅降低。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古中国核心地区，气候由亚热带向暖温带转变。其后又经历过几次波折，但大的气候已经无法逆转了。



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

黄河的水患在周以后，很大程度是由于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过于严重，而造成下流的河床不断抬高，当河床高于两岸的堤坝时，河水就开始漫出，甚至决口改道。而在此之前，黄河（包括从发源于太行山，流经华北平原的几条河流）实际上也还是在不断的将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带入华北平原，只是没有后期那么严重罢了。这主要是由于黄土的特性决定的。黄土颗粒细小，质地疏松，遇水容易溶解、崩塌（可以参看陕北那些“光山”上的沟壑）。因此很容易流失。如果上层有植被覆盖，情况还是会好很多。但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黄土高原都是东亚人类活动的中心，

这加速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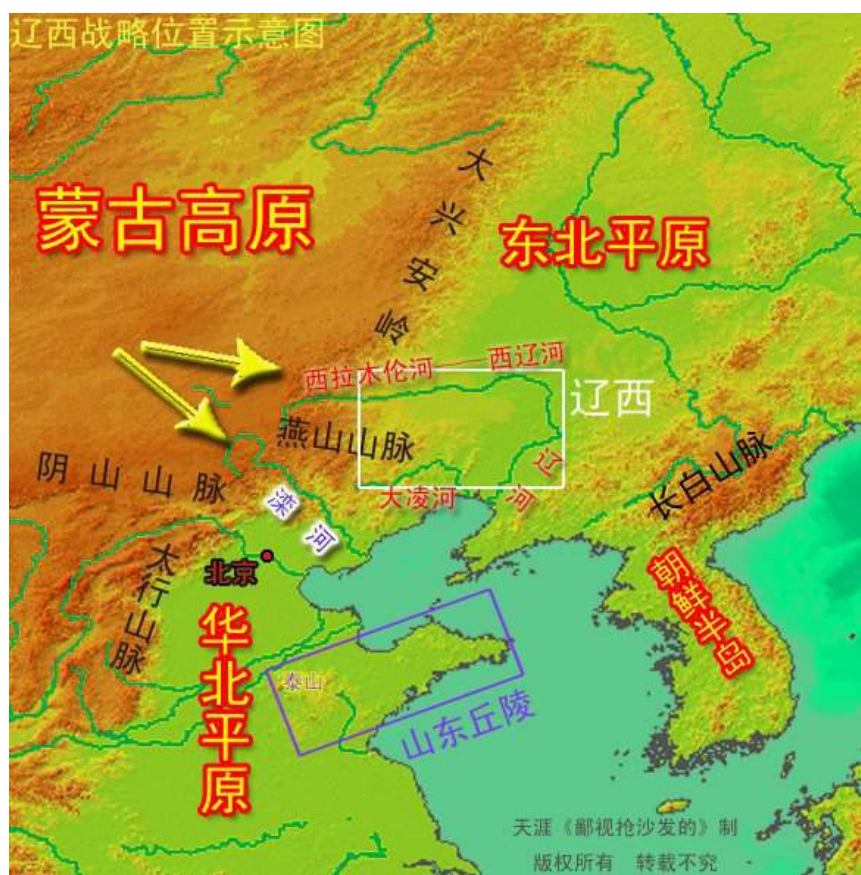
在 3000 年以前，黄河流域还属于亚热带气候时，水患同样是存在的。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气温过高，以至于青藏高原的冰川加快了融化速度，使得黄河中下游的水量过大。在黄土高坡上的那段黄河（也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属于高原山地区，因此水量增大对于地形地貌的影响不大。但在华北平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使得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长时间处在不稳定的沼泽状态，特别是在那个扇形冲击面内。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是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族，还是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大规模的向这一地区渗入，双方基本在各自的区域独立发展。这一情况大概持续到距今约 5000 年左右的时候。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两大族群在此之前就没有过交流，毕竟阻隔双方的并非像白令海峡那样的天堑。只是由于地理的分割，双方尚不至于产生冲突，亦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融合罢了。事实上关于“原始东夷”的族属问题，一直也是一个争论话题。从人类迁移的角度看，双方最初肯定是同源于一族，只是不确定是在什么时候分离罢了。从后期双方的融合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双方很有可能就是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时，也就是大约 10000 年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迁徙。这种迁徙并不限于东西两个方向。只是这两个区域所最终形成的族群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直接起源地罢了（至于最初是从哪里分道扬镳的，还是一个谜，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由于双方在不同的区域独立发展，因此“原始东夷”与“原始西羌”在生产力方面也一定会有差别的。就目前所发现的情况看，东部的发展程度显然要比西部更高。我们知道“玉”和“龙”是中华文明的两大象征。而这两样东西基本可以确定是源于东部的族群。在前面所确定的三个“原始东夷”聚落区中，处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处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已知的两大玉文化集中区。就时间上来说，辽河流域的文明史无疑是最长的。在西辽河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距今已经有 5000—6000 年了，而“良渚文化”比之要晚上将近一千年。因此现在史学界也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辽西地区。

第六节 辽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其早期文明没落的原因

如果说是否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尚属于一个争论话题的话，那么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



辽西战略位置示意图



辽西地区科尔沁沙地

如果将古中国核心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并将古人“天下”的概念完全扩张到几个边缘地区的话，我们会发生，辽西地区完全可以称到上是一个枢纽地区。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辽西地区不止一次的成为几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从它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辽西地区正好被夹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东北平原（渔猎民族）、华北平原（农耕民族），以及朝鲜半岛（农猎民族）中间。而这几个地理单元上的族群（特别是前三个族群）长期以来就是东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如果谁占据了辽西地区，谁就很有可能占据主动。

之所以要现在分析

辽西地区，并非是要详细解读它在后世中所发挥的地缘作用。而是因为在这里虽然较早的诞生了原始文明，但却在距今约 5000 年的时候让出了文明中心的位置。在随后的原始文明史中，山东半岛的那片丘陵地区成为了东部族群的中心地区。为什么最早拥有文明的辽西地区会最终没落，是考古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原始农业是采用轮耕的方式，这种烧一块种一块的耕种方式，对植被的破坏力很大。因此辽西，特别是西辽河地区的环境被破坏，以至于部分地区沙漠化（现在



科尔沁沙地位置图

已经是科尔沁沙地了)。这种情况下，人类自然要寻找更为适合的生存环境了。不过这并非是关键，因为在原始文明中，各个地区所采取的农业方式基本是一样的，烧荒种地现象并非只

是在西辽河地区存在。事实上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你仍然可以在西南地区见到这种原始的农业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辽河地区所处的位置，我们知道蒙古高原是东亚恶劣气候的发源地。在东北平原中北部，由于有大兴安岭作为屏障，因此并不会受到蒙古高原上风沙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恰巧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和东西向的燕山山脉中间的接口之处。地理上的接近使得蒙古高原上的风沙可以轻而易举的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因此西辽河地区的黄金期不能长久也就可以理解了。受到蒙古高原恶劣气候直接影响的并不只是辽西地区，最起码我们可以经常的听到北京又起沙尘暴一类的新闻。尽管气象学家们还在研究这一恶劣气候的形成原因，并希望就此找出解决办法。但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在此相交，不能为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提供足够的屏障，却是事情的根源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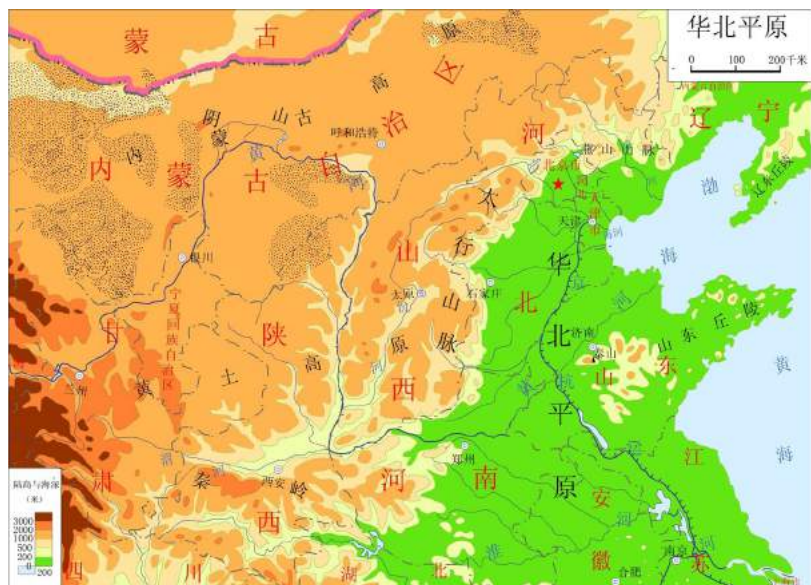
在“原始东夷”的三个聚落区中，辽河流域已经因为气候的原因在 5000 年前没落了。而处在长江以南的环太湖流域由于长江的阻隔，暂时还不会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发生地缘冲突。这使得他们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自己的文化，直到 4000 年前才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山东半岛对于“原始东夷”来说，无疑是最具有地缘优势的。处在另两个亲缘文明的中间是一个因素，丘陵地形也是它能够形成稳定文明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古典时期，大片的冲积平原是农耕民族所不懈追求的生存之地。但在原始文明初期，由于人类治理水患的能力有限，高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

才是最佳的选择。

当原始东夷在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带边缘形成稳定的文明之后，很自然的选择是向华北平原拓展生存空间。尽管这一地区有大片土地被水浸泡而被沼泽、湖泊所覆盖。但在那个扇形冲击面的西部，靠近黄土高原的地区，还是很适合人类生存的。不过，“原始东夷”们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族群。在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们也正有意走下高原，争夺这片同样被黄土覆盖的土地。只是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完成内部的整合。

第七节 原始西羌在黄土高原上发展农业可选择的盆地区

之前我们大致分析了“原始东夷”分布的特点，以及山东丘陵在“原始东夷”聚落区中的中心地位。现在我们要将视线投向黄河的中游，去解读一下黄土高原的地缘特点了。黄土高原本身只是对太行山以西那一片海拔 1000 ~ 1500 米，黄土覆盖厚度 50 ~ 180 米的土地的统称。事实上它还可以被分为数个地理单元。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它包括山西的全境、陕西的中北部、河南的西部、陕西的东



部，以及宁夏大部。如果按照方位来划分，我们可以依黄河“几”字型的河道，将“几”字当中的区域标注为中区，两侧则为西区 and 东区。就目前我们所要涉及的历史来看，故事将集中发生在中区与东区的交界处。

我们知道，最适合耕种的土地一般是位于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区，古典时期的

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

很多文明区也正是集中在类似地区。一般而言，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会形成较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如果人类能够掌握水流的规律并加以控制，无疑是最适合人类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区。不过地球上的河流并不总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特别是那些大河的支流。在这些支流的中下游地区同样会形成小块的冲积平原，而这些地区同样有可能诞生人类文明。我们现在所要谈到的黄土高原就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冲积平原，做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们无疑在中国的地缘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炎黄初始聚落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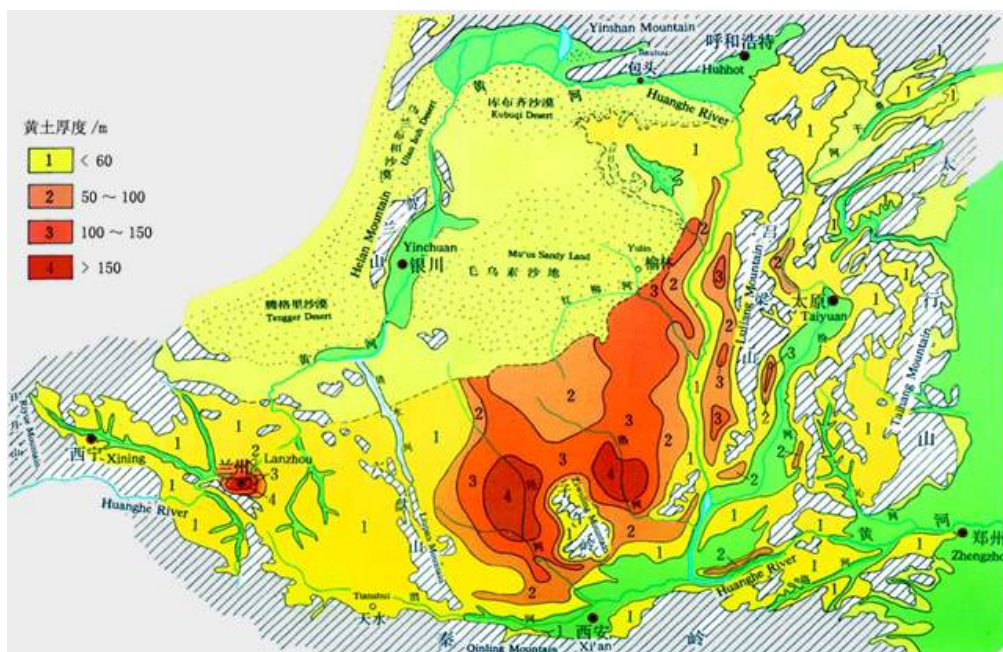
与华北平原相接的“河洛地区”（河南境内）。对于这些高原上的“平原”，地理学家们有时会有不同的叫法，它们时而被称为“盆地”，时而又会被叫做谷地。不过怎么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那平整的地形和富有养分的土壤，同样适合人类生存。并且由于有着高山的庇护，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会比那些处在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区更为安全。

对于“原始西羌”族来说，尽管它们的来源还存在争议，但他们无疑是最先选择了“渭河平原”作为最初的根据地。这块被后世称之为“关中平原”的盆地地区，因为孕育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朝——秦帝国，因此又被称之为八百里秦川。事实上它作为中国地缘中心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了 1100 年前唐帝国覆灭时期。如果“原始西羌”族已经决定在黄土高原上完成他们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事业的话，那么他们有几个合适的地区作为备选方案。

除却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主要由黄河的支流冲积而成的平原地区外（渭河、汾河、洛河），黄河本身在那个“几”字型的西侧和北侧河道两旁还冲积而成了两块条状的平原地带。这两块平原地带有时被合称为“河套平原”，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称谓。西侧的那块一般被称之为“银川平原”，北侧的那块更多时候才是“河套平原”的代言人。“原始西羌”也许曾经向这两个地区努力过，不过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蒙古高原甚至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族群的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典时期。尽管汉族曾经据有过这些地区，并以此为跳板向西、北的游牧民族发起反击。但更多的时候，这两块水草丰美之地起的作用是反方向的。

尽管“原始西羌”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后世子孙们为了占据这两块黄河冲积平原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将这几个小块的冲积平原标注出来。它们分别是，位于黄土高原中区的“渭河平原”，也就是“关中平原”（陕西境内）；位于黄土高原东区的“汾河平原”，也被叫做“汾河谷地”（山西境内）；还有就是位于黄土高原边缘，



黄土高原黄土厚度图

所做的努力。但面对同样的地缘结构，他们所能做出的选择却是相同的，就是占据最为安全而农业条件又极佳的渭河平原作为根据地。这块北有陕北高原庇护，南有

秦岭阻隔的盆地区，的确适合安静的发展文明。更何况它那厚达数十米，质地松软的黄土层，非常适合仅仅拥有石质工具的原始先民的耕种。而同时期的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流地区，尽管由于拥有丰富的渔猎资源，并以此而获得文明初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土质较黄土更为坚硬，要想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始终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要等到金属工具能够完全运用到农业生产之后了。

这也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原始东夷”能够创造比“原始西羌”更为先进的石器文化（玉石文化是石器文化发展的顶峰），却最终还是败于“原始西羌”之手的原因。在技术手段落后的上古时期，易于开垦的黄土地始终是最佳的农业用地。谁占据了这块土地，也就意味着谁就拥有更大的人力资源。

第八节 炎黄二族的发源地及其之间的争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原始先民们也不例外。汉语在造字以及遣词造句方面比之字母文字更有文化上的优势，“江湖”这个词尽管被后世引申为一个有别于正统社会，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之“亚社会”的代言词。但它也正解读了人类社会最初争斗的本质所在，那就是争夺水源及其周边适合生存的土地（江和湖代表的水的意义）。对于“原始西羌”来说，尽管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他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争斗。而这些争斗也正是围绕着那几条河流而展开的。

在说到上古的历史时（即公元前 841 年，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我们还是

不得不从后世的史书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尽管这些通过口口相传并最终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很多时候被蒙上了神话色彩，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符号来充实所要做的推断。如果能够抓住如炎帝、黄帝、涿鹿……这些名词的本质，一个信奉祖先崇拜的民族，口口相传的历史仍然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就我们所要解读的“原始西羌”内部的争斗过程来说，炎、黄更应该被理解为黄土高原上同属一个文化



炎黄战蚩尤图

体系的两个部族。当然，以中国历史的惯例来说，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作用的。因此后世史家将之变化为两位帝王式的英雄人物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炎、黄二族最初的聚落区，历史学家们已经多有考证。炎帝族被认为最初是聚落于“姜水”之畔；而黄帝族被认为是“姬水”之滨。姜水到底指的是哪条河，目前还处在争论当中。不过无非是在岐山以东还是以西罢了，换句话说是在渭河平原的西头。而姬水则是洛水的一条支流（此洛水又被称为“北洛水”，是渭水的两大支流之一），也就是在渭水之北的陕北高原之上。现在那里有一个黄陵县，被认为是黄帝发源及归葬之处。结合历史的记载以及当地的地理特点来看，炎、黄两族最初的坐标我认为是可信的。即在“原始西羌”内部，炎帝族应该是最先进入关中平原，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而在此之后黄帝族也随之从陕北高原进入渭河平原。

关于炎黄之间的争斗，一般被认为是争夺中原的统治权。尽管中原的概念被后世扩展为从潼关一直到泰山的区域，或者说是整个河南省及周边部分地区。但对于最初的“原始西羌”族来说，中原更多的是指黄土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区，也就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河洛地区”。对于成熟于渭河平原的“原始西羌”族来说，当关中平原已经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最为合适的拓展方向便是向东。不过当他们走到黄河那个“几”字形河道右侧的拐点时，他们会遇到两个选择。一是向北跨过黄河进入汾河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二是沿着秦岭与黄河之间形

成的那条狭窄通道进入河洛地区（中心为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处），从而进入华北平原。无论是让原始先民还是现在的我们来选，后一条路无疑都是更具有诱惑力的。

我们无法确定炎黄二族是谁先到达了河洛地区，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族最终取得了胜利。而炎帝族最终不得不跨越黄河去开发汾河平原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此讨论炎黄二族的争斗，并不代表“原始西羌”中不会存在其他小规模部族，亦或已经有部分“原始西羌”族已经向相应的地区进行了渗透。只是对于这样漫长的一段历史来说，他们并没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罢了。

第九节 炎黄部族进行阪泉之战的具体地点

关于炎黄二帝争夺部落话语权的那场战争，史书上记载为“阪泉之战”。对于阪泉这个地方在哪，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个历史可以卖钱的年代（旅游业）。



炎黄出太行示意图

我并无意卷入这种地域之争，只是依地缘的特点做一些推断，希望将来不要被某地政府引为证据。

其实有没有“阪泉”这个地方，或者是否真实存在

“阪泉之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崇尚武力的原始先民来说，为争夺土地而爆发争斗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既然史家们已经把最终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战役称之为“阪泉之战”，那我们也不妨借这个名寻找一下炎黄二族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关于这个地点究竟在哪，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有三种说法，一是位于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之上的“涿鹿”（河北）；二是位于黄河以北，汾河平原以南的“解城”（山西）；以及位于洛水与黄河之交的“洛纳”（现属郑州所辖之巩义）。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涿鹿”，“原始西羌”内部的统一战争还不至于跑到华北平原去解决。关于涿鹿被认为是“阪泉之战”发生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后来这里

的确发生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不过主角并不只是炎黄二族了。由于原始资料的不足，古人往往将两场战争混为一谈了。可能的地点应该是在后两个地区，“解城”可以理解为进入汾河平原的桥头堡；而占据“洛纳”更是可以被理解为取得了中原的所有权。如果按造史学界一贯的观点，认为炎黄之争是为了争夺中原的统治权的话，那么“洛纳”应该更有可能是矛盾的爆发点。

关于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是以推断具多。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名人”的争夺并非始于现代，古人早就在这样做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较早的确认了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周边的族群无论是否能够入主中原，大都希望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是一个讲究祖先崇拜的民族，因此格外注重自己的出身。既然都是推断，以那些相互矛盾的“史书”为主要依据，倒不如从地缘结构入手来得准确。最起码我们知道，现代人和上古的人类本身，在智力和体力上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也就是说我们依原始的技术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会高过古人。所以大家会看到我在上古时期所分析出的一些地缘重点，到了古典时期乃至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不过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标签罢了。

“原始西羌”内部整合的结果就是，黄帝族占据了河洛地区，并得以获得直接进入华北平原的机会。而炎帝族则选择了越过黄河，沿汾河向北拓展领地。对于渭河平原来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认定在当时谁更具有优势。不过在 1000 多年后，同样兴起于岐山之侧的“周人”声称自己是黄帝的后代，似乎证明了这块炎帝族的祖地已经换了主人。其实对于“原始西羌”来说，谁作为盟主并不是最重要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血毕竟浓于水，在遇到共同的对手时，炎黄之间还是能够同仇敌忾的。

第二章 原始西羌和原始东夷的冲突与融合

第一节 渭河平原地区经崤函通道沟通华北平原

下面我们要介绍一条在中国历史当中曾经长期处于战略中心地位的通道——崤函通道。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关中地区（也就是渭河平原）易守难攻，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好地方。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地理原因，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多是那些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名，如潼关、函谷关等等。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关中平原的地缘结构，就能够更深切的理解它的地缘优势。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渭河平原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落差极大的盆地，这个结构可以极大的保证它少受外部的干扰（包括人为和气候的因素），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封闭的地区。

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封闭的地区，即使是地缘结构更为闭塞的四川盆地，先民们也能依靠人力在绝壁上开凿出“栈道”来沟通外部。相比之下，渭河平原与外界沟通就要方便得多了。对于身处盆地区的族群来说，高大的山脉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不过当生活在高山之间的族群希望向外部拓展空间时，这些山脉本身又成为了最大的障碍。希望走出去的人并不奢望这些山脉能够移走，但最起码希望有条通道能够沟通外面的世界。好在山脉和河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不考虑从更高的高原上流下来的河流，那些山脉本身也会在顶部形成一条自然的分水岭。雨水和山中所蓄积的所谓“地下水”也会顺着两侧的山脊流下，在山脚下形成溪水、

河流，这些河流两侧的区域往往就是天然的道路。

对于处在黄土高原上的渭河平原来说，沟通东面华北平原最佳的路径当然就是顺着黄河的流向而开辟道路了。由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结构上的差



崤函通道示意图

别，使得黄河中游并不会像下流那样频繁改道，它更多的是在两条山脉之间冲出一条通路，因此在黄河中游地区我们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峡谷。这种地理结构也使得黄河中游的河道更具有稳定性，也更具有唯一性。涉及到我们现在所要讲到的“崤函通道”而言，这条位于黄河与秦岭之间的通道，自上古时期起就是东出渭河平原的重要通道。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称之为唯一通道。

如果将“崤函通道”理解为陆地上的“马六甲海峡”并不为过，当然这里指的是它在沟通黄土高原（主要是渭河平原）与华北平原，乃至东部其他地区的重要作用而言。事实上如果你不走这条通道的话，那就只能向东北方向越过黄河，穿过汾河平原，再想办法越过太行山脉才能到达华北平原了。当然如果从理论上讲，向北进入蒙古高原，再向东通过辽河平原进入华北平原也是可行的。不过能够做这种选择的往往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农耕民族来说，控制“崤函通道”仍然是必须的。



崤函通道示意图

对于这条通道，我们可能会感到陌生。不过提起它沿路的那些地理名词，对历史稍加了解的人一定会有所了解。华山、潼关、函谷关、澠池、崤山……都能够为大家带来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这些都将在我们今后所要说到的历史中一一解读。关于这条通道的位置，仅从地形图上，我想大家也能够大致划出它的范围了。北以黄河为界，南以秦岭为屏，西面的起点就是在黄河那个“几”形河道右下侧的拐点，而东面则延伸至黄土高原的边缘部分。你如果从现实的行政区划去做理解，大致可以从陕西的华阴划到河南的洛阳。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崤函通道”，与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申请世界遗产的所谓“崤函古道”并不能划等号。前者是对沟通渭河平原与中原地带的狭长地带的统称。后者则是指河南省陕县硖石乡车壕村西南约 2000 米的一条通道，当然这条古道也是位于我们所说的“崤函通道”上。

第二节 黄帝族通过崤函通道渗透至河洛地区

对于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黄帝族”来说，一开始并无可能走得太远。选择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作为新的聚落区是最佳的选择。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积蓄力量，继续向华北平原乃至山东半岛渗透；另一方面也可依托黄土高原的故地，做到进退自如。黄帝族所选择的这一聚落区，也就是所谓的“河洛地区”（洛河下游与黄河交汇处周边地区）。洛阳正是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的东界可以延伸到现在的郑州市。当然就“郑州”这个城市名而言，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也是一个平原城市。不过在它的西面及南面你仍然可以看到山，这其中也包括登封和新郑。前者就是著名的嵩山少林寺所在地，而后者据信就是黄帝建都之地。



河洛地区示意图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立在传说当中的历史是有可信度的。毕竟作为向东拓展生存空间的黄帝族来说，嵩山是他们进入平原地区之

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一组有显著特征的山峰。而将所谓“都城”选在嵩山以东方向最后的丘陵地带，符合华夏族将政治中心放在“国土”边缘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里的地形地貌虽不能跟黄土高原一致（已经渐变为丘陵了），但对于刚从山地高原上走下来的“黄帝族”来说，却是最后可以依托的“靠山”了。黄帝族已经将他们的据点延伸到平原的边缘了，那么另一支进入汾河平原的“原始西羌”族，也就是“炎帝族”，也正在向北拓展他们的领地。尽管我们说“崤函通道”是沟通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很快炎帝族就要在太行山脉找到另一条重要的通道了，不过迎接他们的将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我们分析了“崤函通道”的重要性，依照传说及历史的记载，黄帝族已经取得了这条通道的控制权，以及两侧的渭河平原、河洛地区。至此展现在黄帝族眼前的，将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了。也许刚走下高原的黄帝族，并不一定就想当然的认为，

低海拔的华北平原就一定是他们的新家。但那被黄河水从黄土高原上来下来的黄土，仍然能够让他们找到熟悉的感觉。在这里，“黄帝族”只是一个符号，也许会有“历史学家”们考据出，在 5000 年前走下黄土高原的族群有另一个名称。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任何人想从渭河平原进入华北平原，崤函通道都是不二的选择，这一点在随后的历史中无数次被验证了。

就在黄帝族走下黄土高原的同时，以山东丘陵为中心的“原始东夷”们也开始向西渗透。实际上这种渗透应该早就在进行了，因为从地理的角度看，生活在山东丘陵周边平原上的“原始东夷”们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显然要比它们高原上的对手要低得多，而且也更容易适应。不过由于黄河下游的不稳定性，山东丘陵实际上是处在那个不稳定的扇面区包围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原始东夷如果想走入华北平原，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一片经常被河水覆盖的“黄泛区”。

当然任何事务都不是绝对的。由于黄河水是擦过太行山脉的南端以后，才开始频繁的改道的，因此在这个改道点以西还是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对于这个地区，从距离上来看，渭河平原向之渗透的优势显然是更为明显的，而且从地形上来说也更利于防守。不过从河洛地区到山东丘陵的这一地带，注定会成为东西两大族群争斗的焦点。这一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范围。

第三节 炎帝族经山西境内盆地区进入华北平原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说进入汾河平原的炎帝族了。尽管炎帝族已经丧失了通过崤函通道——河洛平原进入华北平原的机会，但并不代表他们有可能开辟出另一条道路来。地球是圆的，只要有恒心有条件，哪怕就此向西走围绕地球做一个环球旅行，也可以从渤海湾登陆进入华北平原。当然在这里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一点，路是人走出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在 15 世纪欧洲人按照这个思路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陆地上寻找现实的可能吧。

既然我们说到炎帝族的主力已经越过黄河，进入汾河平原了。那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区域的地理特点作一个分析了。从地理结构上来说，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很明显的。如果套用现在的行政区划，那就是整个山西省。我们大致可以将整个山西的地貌理解为“两山夹一沟”，或者说是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两边为西面的吕梁山与东面的太行山，中间则包夹着呈南北走向的条状平原。我们知道平原基本上是由于河流冲积而成，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两条山脉之间都有哪些重要的河流。



山西地形图

一般而言，汾河是山西的代表河流，但它所滋润的土地仅仅是山西的中南部，也就是汾河中下游地区。山西北部的平原，主要是由桑干河冲积而成了。

我们之前分析过，炎帝族（这只是个代号，即使不认同就是所谓“炎帝族”也可以理解为其他“原始西羌”族）越过黄河，首先进入了汾河平原。只是这并不会是终点，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继续寻找合适的土地拓展生存空间是必须的。沿着河道行进是不二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河流能够提供必要的水资源和行进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河流两边的冲积平原往往是最适合耕种的土地。既然炎帝族首先进入的是汾河下游地区，那么沿着汾河自下而上向北走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由于河流两岸的平原被夹在山脉之间，这些平原又被称之为盆地。按照地形特点，这些位于汾河流域的平原从南至北又被分别称之为：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

如果我们随着原始先民们的脚步走到现在的山西省会太原时，会发现再沿着汾河向北走的话便已经不再是平原地带了。这显然不是已经向农业社会转型的“原始西羌”族，所追求的目标。不过好在只需要将视线稍稍向东北方向偏一点，他们马上又会发现一个新的盆地区，那就是忻定盆地。这里同样是一片适合耕种的土地，只不过是由另一条叫做“滹沱河”的河流冲积而成了。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是哪条河流冲积而成的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就可

以了。由此再向北，炎帝族还可以进入“大同盆地”，从而完成他们对山西境内主要平原地带的开发。

需要注意的是，从整个汾河流域平原的三个平原（盆地），直到“忻定盆地”之间并没有高大的山脉阻隔。只是在进入“大同盆地”时需要翻越一条山脉，这条山脉也就是“恒山山脉”。那个著名的北岳恒山，也正是在这条山脉之上（并非上古的恒山，后面会分析到）。不过这比之翻越太行山还是要容易一些，在人口压力不是太大的上古时期，人们完全有理由首先选择更为便捷的迁移路线。但在古典时期，恒山山脉的军事用途便显示出来了。在大同盆地失守于北部游牧民族的时候，华夏族得以在恒山山脉构筑一条新的防线，这条防线在明朝时被称之为内长城。事实上这条防线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不断的有游牧民族侵入“大同盆地”，并以此为跳板进入黄土高原核心地区。

只是上古时期的炎帝族暂时还不必有这些烦恼，马匹还没有为蒙古高原上的原始游牧民族所利用，因此缺乏机动性的“牧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南下“打草谷”。对于炎帝族来说，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向北继续拓展空间已经不现实了（再走就是蒙古高原了）。再想获得新的土地，就需要沿着桑干河向东走下高原。就像他们南边的兄弟（也是曾经的敌人）——黄帝族那样，并最终进入华北平原。



山西地形图

从地理结构上来说，山西是一个半封闭的状态。黄河在西、南两面成为天然屏障，而太行山的存在又使得从华北平原进入这一地区是非常困难的。北面与蒙古高原接壤的地区相对来说危险性最大，但依阴山山脉——恒山山脉建立的两条防线最起码可以保障太原以南地区的安全（也就是汾河流域）。这也使得山西在战乱之时的人口损失相对较小，以至于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移民的来源（另一个有类似人口储备作用的地区是“江西”）。当然这也让阎长官能够长期在此做它的“土皇帝”。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句话叫“地下文物看陕西，地

上文物看山西”，山西之所以有条件保存如此众多的地上文物，与它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

沿“桑干河”进入华北平原并不是从山西进入华北平原（河北地区）的唯一通道。在古典时期的民族征战中，太行山上又被开辟出了一些通道，这也造就了诸如“娘子关”、“平型关”等几个著名的关口。只是在上古时期，“原始西羌”族还没有这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太行山中探寻那些小路。在一个个如珍珠链般连接的“平原”之间，蛙跳式前行是最为自然的渗透方式。

第四节 炎帝族在涿鹿之战中败于蚩尤后求助黄帝族

当炎帝族在太行山的西侧进行扩张时，他们并不会遇到多大阻力。但当他们沿桑干河向东前行，准备进入华北平原时，等待“原始西羌”族的将是来自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们。我们并不能确认东、西两大部族是谁先行到达太行山东麓的。事实上原始东夷们也有动力迁移到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原始位置注定他们只能向西迁移。另一方面是由于桑干河的下游地区正好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角（也就是北京以西的区域），这里正好处在“黄泛区”（广义上的）所覆盖不到的地区。另一个类似的区域则是郑洲以西的“河洛地区”。

谁先到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都有意将此地作为新的聚落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碰撞意味着文化的融合。不过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这种“融合”却意味着血与火。双方在太行山的边缘，桑干河下游地区展开了争夺。根据史书的记载，西部的代表是“炎帝”族，而东部的代表是“蚩尤”。关于这两个名称，习惯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史官们将之具体为两个帝王式的人物，实际上更应该是两大部族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本身是否存在，亦或是不是有其他的称谓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说，只是根据传统的习惯用来标示二者的区别与属性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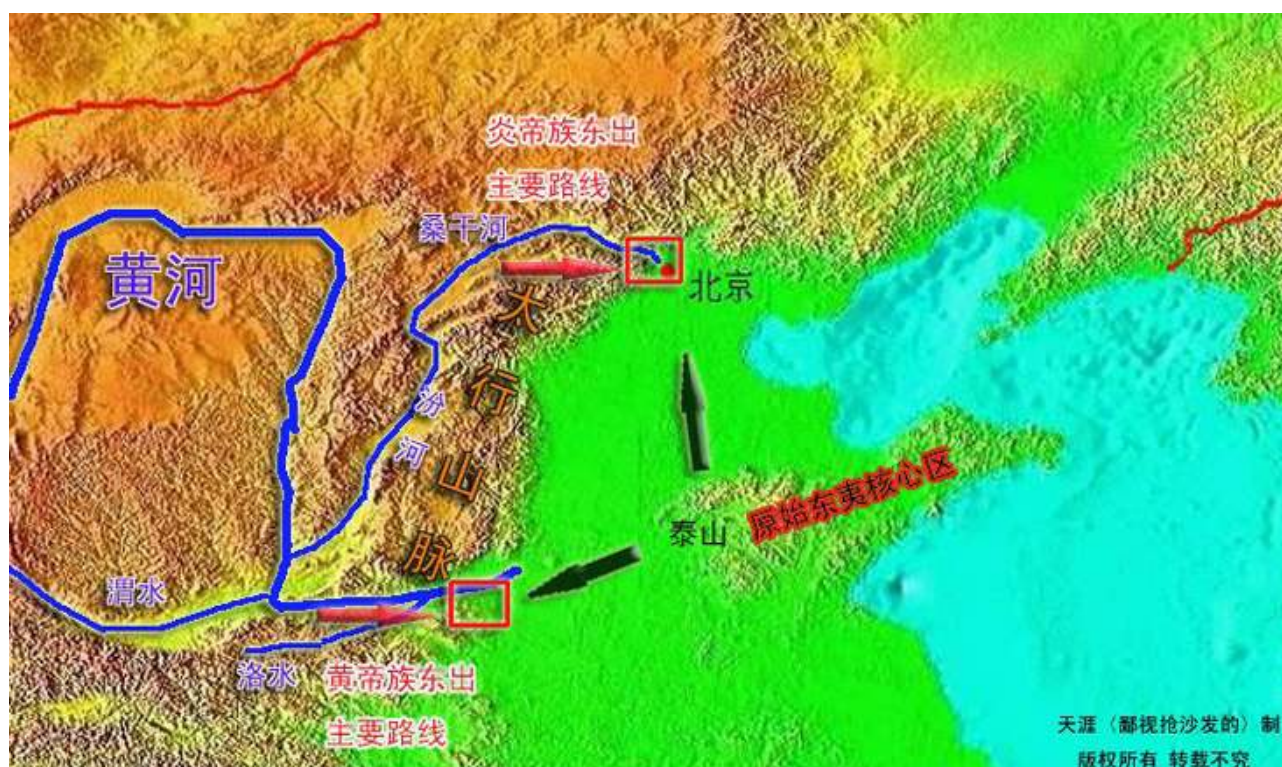
双方最终展开争夺的地区是一个被称为“涿鹿”的地方（桑干河下游）。如果仔细研究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形特点会发现，这一区域也与黄帝“建都”的新郑地区有类似之处，即都处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地形都已经演变为丘陵向平原地区过渡的特点了。换句话说就是再进一步就是华北平原，退一步亦有山可靠。从这一点来看，比较符合刚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原始西羌”的需要。因此如果冲突的爆发点是在这一区域的话，原始东夷作为主动进攻一方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作为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是不大可能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来解决问题的。决定东西两

大部族命运的“涿鹿之战”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冲突的统称。关于这场“战役”的过程与结果，“历史”大概记载如下，一开始是炎帝独立与代表东夷的“蚩尤”作战，其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求助于黄帝族，最终双剑合璧打败了“蚩尤”。

这种记载有一定的合理性，炎黄二族所占据的三个区域（即河洛地区、渭河平原、汾河及桑干河流域）之间是相互连接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及信息的互通是很自然的（尽管信息传递的时间很可能要以“月”为单位）。但按照上古时的交通能力，让黄帝族的战士越过黄河，沿太行山北上去驰援在“涿鹿”作战的炎帝族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山东丘陵与“涿鹿”以及“新郑”（黄帝族的政治中心，河洛地区的东沿）的距离，会发现距离本身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原始东夷是以山东丘陵为中心向西自然渗透，那么与南北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的时间并不会相差太久。当然在与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之后，“原始东夷”选择从北面进攻炎帝族是符合逻辑的。这并不是说黄帝族取得了炎黄争霸战的胜利，就一定说炎帝族的战力要弱一些。而是相比之下，黄帝族经营河洛地区的时间，肯定要早于炎帝族大规模进入桑干河下游的时间，根基会更为牢固。选择实力较弱的对手作为进攻对象是动物的本能，这与有没有“兵书”作为指导并没有关系。

下面为原始羌夷冲突爆发地点分析图（太行山南北两端的两个红框即为炎黄二族东出黄土高原的出口。北以“涿鹿”为中心，南以“新郑”为前沿）。



原始羌夷冲突爆发地点分析图

第五节 黄帝族攻入原始东夷核心区并开启彼此间的融合

在东西两大族群展开大规模冲突之前，双方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了。像旧港片中那种不问青红皂白，遇见就打的情况并不会存在，矛盾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黄帝族沿太行山北上加入“涿鹿之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按照后世的兵法来看，直接向东进攻“原始东夷”的大本营——山东丘陵是最佳的战法。这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作“围魏救赵”。当然处在上古时期的黄帝族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对于他们来说，既然两大族群的战事已开，那么直接向处在自己东面的“原始东夷”族进攻才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双方之前在南北两个点上应该已经全面接触了。（从逻辑和距离上来分析，原始东夷如果向西渗透的话，没有理由只选择东北路线）。

最终黄帝族的南线进攻取得了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东夷的主力已经被炎帝族吸引在北线了；另一方面则是黄帝族对河洛地区的经营时间更长，所积累的资源要更多。之所以认定黄帝族并没有北上直接参与“涿鹿之战”，是因为这场“战役”胜利的标志是黄帝族攻取了“原始东夷”的核心地，也是他们的圣山——泰山。



泰山

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族直接沿着正面之敌的败退路线追击，比之先行北上加入“涿鹿战区”，然后再南下攻取泰山要合理得多。在原始部族的争斗中，没有比占据对方的“圣山”更具有标志性了（在华夏族之后与更具原始性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你仍然会看到类似现象）。

关于黄帝“封禅”泰山一说，史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根据上述分析应该是可

信的，当然形式上与后世的帝王封禅会有所区别。这在之后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每一位自认为有所作为的帝王都会去“封禅”泰山。无论后来的帝王是如何定位泰山的地位，在古典时期之前，也即山东丘陵地区还没有完全融入华夏族之前的这段时间，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尊崇泰山更多的是为了融合两大族群的需要。对于黄帝族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用来标志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对对手表示尊重。因为依当时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没有实力一口吃掉对方，这场大规模的冲突更应该被看作双方融合的开始。自此以后，东西两大族群正式开始“部落联盟”时代。

结合“史书”（传说）与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来看，在东西两大族群之间的这场“战役”应该距今大约4600年左右。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当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核心时间处在4000——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新石器文化现象。一方面这些文化具有一些共性，但另一方面却又像是由不同的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河南大部的龙山文化基础，经考证原始基础应该为“仰韶文化”（黄土高原上的文化主体，距今约5000——7000年）；而山东的“龙山文化”又被确信源于本地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6300年）。

如果结合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时间，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也就是说大概在距今4600年左右，两大族群在经历过一场大规模冲突之后，开始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并开始大规模文化交融。这使得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但双方的文化都开始兼具对方的一些特色了。由于在文化上，东部要更有优势（从玉器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更多的是西部吸收东部的文化因素。

关于所谓“黄帝”诞生的时间，根据史书中的记载甚至可以推断到具体的年份，2009年也即黄帝纪元4707年。我不确认如此精确的数字最初是如何记载下来的，但仅从地缘角度导出的推断以及考古学证据上来说，在大的时间上的确是没有太大出入的。如果最终能够被证实的话，那只能说华夏族对祖先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

第六节 东西部两大族群进入部落联盟时代

将中国部分从上古时期开始是很不讨巧的，直接从春秋战国时起会更好。一是有信史支持；二是经典故事多，写起来会很好看。不过总觉得如果不对上古的“历史”做一个交待，会留下遗憾。事实上在新石器时期，东亚地区决不仅仅在黄土高原、东部沿海，亦或华北平原上有文明的曙光。考古发现证明在很多地区都有生产力水平类似的文明出现，但最终取得东亚主导权的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族群。既然他们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而我们又大多以是他们的子孙为荣，那么选择以西部族

群为主导是很自然的。

其实历史就是一部罗生门，不同的角度和利益诉求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尽管我们力求从相对客观的地缘角度来解读历史，但仍然必须选择一个角度作为主线。换句话说，就是从华夏族的扩张史来解读中国的地缘。而其他的文明或族群只能作为配角，即只有当它们与华夏族的主流接触时才能进入我们的视线。在此之前，即使他们取得再多的成就也只能被无视了。

今后我会抓住这条主线来解读中国的地缘。这样做并不代表其他的族群不重要，也不是说华夏族在此之前就没有进入过某一地区。就像也有人认为所谓“炎帝”早在上古时期就开发了长江流域一样。也许历史上真的有炎帝这个人，亦或他真的已经早在4000多年前就从黄土高坡上下来，去开发长江中游地区了。这些都不是重点，问题在于他并没有使得这一地区在那一时期成为历史的舞台（华夏族的历史）。这就好比就算有人真的考证出徐福当时的确进入了日本，也并不代表什么。日本仍然是在唐朝时全面开始接受华夏文化的。在此我并不想去创新什么历史观，只是借一条相对清晰的历史主线去解读当前中国的地缘，因此希望大家重点关注其中的地缘因素。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一定要符合“地缘”逻辑的。

让我们继续上古部分吧。虽然这部分对于很多人来说太过遥远，不过既然已经开始了，还是姑且看下去吧。所谓“事不关己，关心则乱”，如果我真是个外国人，写起来可能会更顺一些，完全关注地缘便可。只是作为华夏子孙，总是很自然的要夹带些“私货”。即为华夏族目前在东亚的强势地位，寻找地缘上的根据。无论如何，华夏族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有几千年了，仅仅依靠那些英雄伟人是无法成就今天的现状的。

之前已经分析到了东西两大族群之间的那些火并了。抛开司马迁所记录的那些“历史”来看，我认为东西两大族群之间先经历一场大规模冲突，然后进行融合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历史无数次上演这类悲喜剧）。毕竟人类原始的本能还是更相信武力的。当然这些冲突的规模和涉及范围可能并不如后世所想的那么广。最主要的冲突地区，应该是在洛河下游地区与泰山之间的那一区域。这一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尽管后来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最终确立了华夏族的正统地位，并随之将同样来自黄土高原的“炎”、“黄”二族奉为正朔，并描写为那场冲突的绝对胜利者。但事实上，西部族群并没有就此取得从渭河平原到山东丘陵的统治地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一方要想快速取得压倒性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会看到上古的一些记忆中，出现了一个和平时期（史称五帝时期）。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部族共同推选部落联盟的盟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尧、舜”。

关于这些盟主的族属向来都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东西两大族群都有。无论这段所谓“历史”有多少可信度，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文明出现大规模交融却是有考古方面的证据的。大致的时间段在公元前 2600 年——公元前 2000 年（也就是所谓黄帝取得“胜利”之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西两大部族在此期间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了初步融合。

然而正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整个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即使我们只相信公元前 841 年以后的信史部分，也不难发现冲突无处不在。如果我们相信太史公对于断代方面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础，从地缘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它的真实性。如果我们认定“夏”为中华正史的开始，那么“大禹治水”也就是事实存在的了。关于 4100 多年的那场大洪水规模究竟有多大，禹又是在哪里开始治理洪水的，一直是众说纷纭。我们依地缘结构所推算出的结果，这场大水所覆盖的主要范围都应该是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直至江淮流域的范围（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而其中主要的水患来源就是那条在下游不断变道的母亲河——黄河。

第三章 大禹治水的地点和方式及治水成功后的影响

第一节 中原因处在黄河治水关键位置而确立地缘优势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条河流像黄河那样多变，也不会像黄河一样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造成黄河下游如此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黄河下游处在华北平原之上，这一地区不像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高山作为屏障，限制了黄河的走向。一旦水量骤增，是很容易出现漫流的。如果光是这种情况，人类并非没有办法寻找到规律加以控制，甚至利用（比如古埃及人之于尼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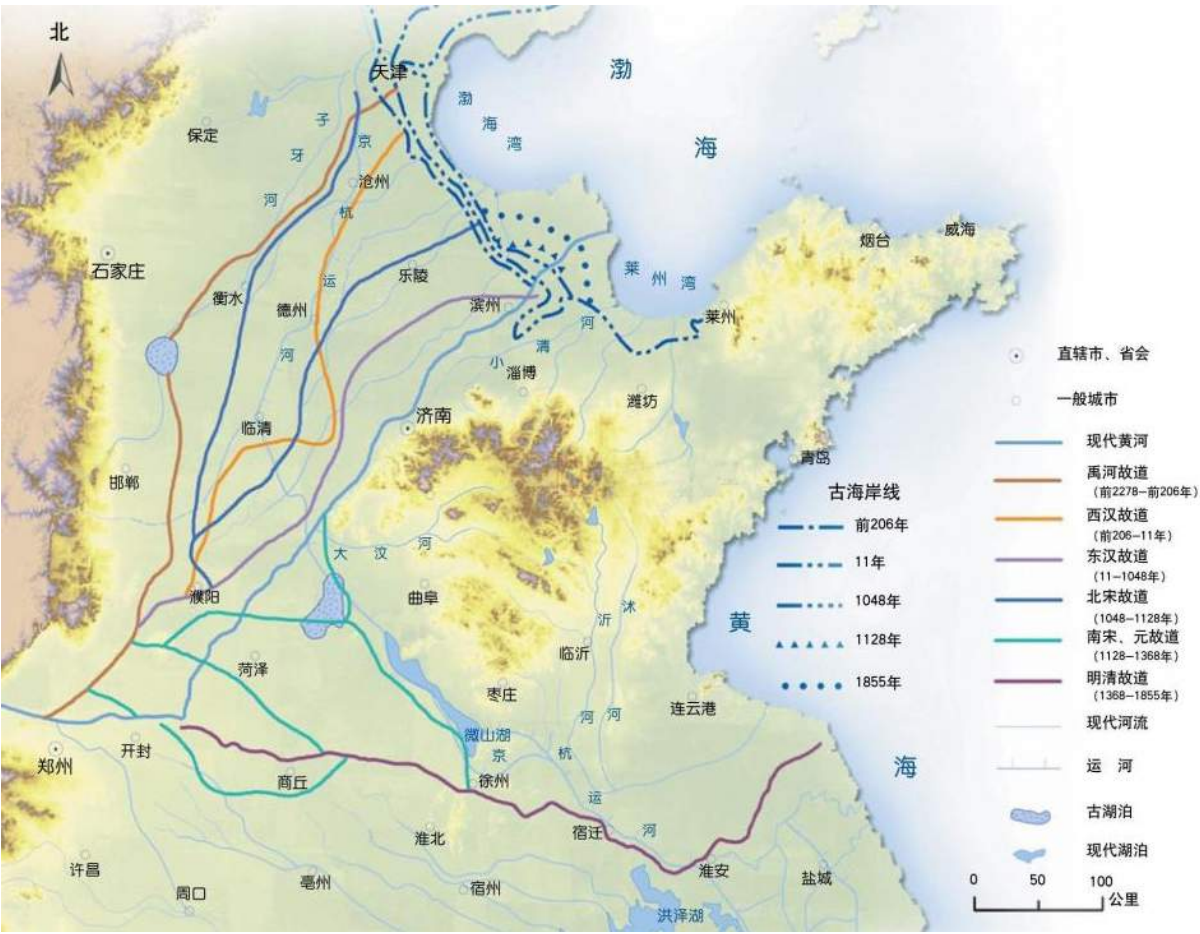
但黄河下游的悲剧在于它的中游经过的是黄土高原。那些厚达上百米的疏松黄土层，虽然让仅有石制工具的原始先民们也能大规模的开垦，却也极易被黄河带走泥沙。这些泥沙在华北平原上垫高了河床，造成黄河所经之处，河床往往都要高出地面。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也和后世的治理分不开的。如果不是人为的加高堤坝，以期减少黄河泛滥所造成的灾害的话，黄河的泥沙将会通过一次次的漫流，均匀的铺在华北平原之上，正如它以前所做的那样。

在 4000 多年前，黄土高原的植被要比现在丰富得多，所带下的泥沙并不如后世那么多，因此下游的稳定性要比后世好很多。但这并不代表河水就不会泛滥，其中在尧时代黄河就发生了一次大的洪水。关于那场大洪水生成的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包括所引发洪水的范围也许并不仅仅限于华北平原。但对于负责治理水患的禹来说¹，黄河下游地区才会是他治理的重点。在文明形成的理论中，有一个理论叫做“治水社会”论，西方用之来解读东方专制文明的形成原因。主要观点是，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专制的制度。

当然，这种解读在中国是被批判的。至于原因，就靠大家去想象了。不管这种“治水社会”的理论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起码在黄河流域倒是的确印证了这种说法。在中国有史可查的长达二千多年的治河史中，如果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地区不通力合作，一旦黄河决口，它所覆盖的范围有可能北到海河，南至淮河。也就是说大部分华北平原，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在这种治理过程中，处于上水地区无疑是占据地缘优势的。如果没有上水地区的配合，下水地区是无法治理好水患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西部族群，能最终融合东部族群的原因。

¹ 尧先命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并失败，后再由其子禹主持治水。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来说，由于地势的原因，他们本身并不用承受黄河水所带来的压力。而对于黄河下游地区来说，这却是最为现实的问题。我们知道，黄河下游一直由北至南呈扇面状变动，这其中大致分为三条路线，一条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路线，从山东丘陵北面贴身而过，称之为中线；另一条是向北沿海河河床进入渤海，称之为北线；第三条就是向南连通淮河的支流，最终夺取淮河的入海口入黄海，也就是所谓“夺淮入海”，称之为南线。这三条路线的变动点并非都在一个点上，但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我们从《黄河故道图》上就可以看出。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黄河下游的变动点西部的起点大致在洛阳与郑州的中点，也就是现今郑州与洛阳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都包含所辖区县）。而东部的变动点则在开封以东，约在现在的兰考县附近（也就是焦裕禄所在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要想治理好黄河下游的水患，或者想改变黄河的流向，这一地区是关键。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而中原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固定的。一般认为现在河南省大致就是中原的范围。不过如果要为中原找出一个核心区，或是最初所指的地区，那么洛阳——开封地区则无愧于这一称号。“得中原者行天下”固然突出的是它在古中国核心区的中心位置，但得之就可以控制整个黄河下游，

乃至整个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才是它的地缘价值所在。

在之前的族群争斗中，西部的族群显然已经在这一地区确立了领导地位。因此作为史记中黄帝的玄孙——“禹”来说，能够领导并取得这场治水之战的胜利，及最终成为东西两大族群的共主，是符合地缘规律的（禹和黄帝是否有亲缘关系，并不能确定，但最起码应该是同族的）。

第二节 大禹将黄河之水引导向北线而让黄淮地区受惠

之前曾经分析过，原始东夷的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最南可达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由于长江在此转向东北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将北起长江南岸，南到东南丘陵北缘的平原地区称之为“江东平原”（这也是三国中，东吴将士自称江东子弟的由来）。历史记载中禹的影响力已达此地，并最终葬于此。但事实上，治理黄河之水（包括受其影响的淮河）所能造成的影响，或战略威慑很难覆盖到这一地区。江东平原和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要在 1000 年以后，方才正式与中原地区发现大规模交集。

如果我们确定禹的儿子“启”最终的确建立了世袭制的“夏”朝，那么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之前的“轮庄”形式，其所依仗的正是发现了治水的关键地区正在自己所掌控之中。其所影响的范围更多的应在黄淮平原，最远推至江淮平原（核心区仍在今天所确定的“中原”地区）。“禹”治理黄河走的是北线，这条线路也被称作“禹贡黄河”或“禹河故道”。在其后的岁月里被无数河官奉为经典，并认为黄河复归此路为害最小。

关于“禹河故道”是否为大禹所引导，有可能又会引发争论。由于时代太过久远，事实上是无法争辩出结果的，一切都只能是推断。既然都是推断，那我也不妨做一个。根据史书记载，禹治水成功后，山东丘陵以南直至东南丘陵的所谓“夷”族纷纷臣服（那些让人云山雾罩的古名称我就不说了）。也就是说黄淮平原、江淮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原始东夷”族都纷纷臣服。如果这个范围没有错误的话，那么黄河在禹之前所为患的地区应当主要为黄淮平原。也就是说当时黄河走的是南线，通过连接淮河支流而进入淮河，进而“夺淮入海”。并造成连锁反应，使得淮河水向南漫流而为害江淮平原。

而禹所治理的办法就是引黄河之水向北，与现河北境内的河流对接，并最终流入渤海。仅仅是这样描述，大家可能依然无法有直观的感受。最起码对这个工作量是否为上古时期的居民所能承受有所疑虑。我做了张《大禹治水地点示意图》，以



大禹治水地点示意图

从地缘的角度推算出大禹可能的治水地点。上面有两个圈，绿圈代表黄河可能向南，进入淮河的连接区；红圈则表示大禹引导黄河向北，连通北路的连接区。我并不确定你看了这个距离会有什么感觉，最起码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量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巨大。

对于史记中的记载，特别是关于上古部分，可能很多人会不屑。但我个人

认为，其中还是有很多信息可供参考的。比如禹这个人的存在与否，是否有治水之事。对于一个以崇尚祖先崇拜的民族来说，可能会夸大祖先的功绩，但无中生有是非常忌讳的（包括黄帝之事，也许那场对东夷的战争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胜利，但东西族群在那一时期开始碰撞却是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我们已经分析了成就“中原核心区”地缘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控制黄河下游走向的力量。

黄河在今后的历史中，还会无数次或被动，或主动的“以水为兵”，但最先掌握它的力量的是“禹”。他的儿子“启”也因此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不过既然“中原核心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被发现，那么希望取得共主地位的族群就必然要以这一地区为争夺目标了。

第三节 大禹在龙门运用疏导河水的方式解决水患

关于大禹治水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在上一节已经分析过了。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诸多地区都有所流传，但结合当时的地缘结构来看，大禹所治之水应该是在黄淮流域无疑。而这其中淮河那些由北向南流，在地理上与黄河接近的支流是将这两大河流连接起来的纽带，也是治水的关键点。

如果结合黄河在后世频繁南北改道的情况，有可能的结论是大禹切断了黄河与淮河的某条北方支流之间的联系，并将黄河之水与河北平原的某条河流连接起来，

使得黄河干流的水流在山东丘陵的北部注入渤海，进而减弱了淮河流域的水患。如果仅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种假设是有其合理性的。最起码它解决了工程量，以及淮河流域最终成为受益者的问题。并且黄河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让以黄河为最初载体的华夏文明成为主导文明的结果，变得符合逻辑了。

我们之前曾经多次提到，那些承载着中华文明记忆的历史“传说”并非完全是神话，更多其实是限于古人的认知能力，以及口口相传中有意无意的误读而被神话的。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如果希望解读出这些所谓“神话历史”的实质，关键在于提取出其中未被神话的要素。这就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某个英明神武的帝王出生时的故事，其中关于他出身地点，以及母亲身份的内容一般是所有可信度的。而那些梦到与仙人交合、吃个鸟蛋之类的就怀孕了，或者说出身时有诸多祥瑞出现的记载就可以完全无视之了。

不要认为这种有意无意的“误传”只会在东方才有，那被西方人视为上帝之子的耶稣出生时的故事和东方的这些传统桥断并无二致。如果谁有兴趣再写一部类似《达芬奇密码》的宗教解密小说的话，那么我建议，耶稣是玛利亚所生，以及没有法律意义上父亲的内容是可以采信，至于处女生子一节就算了。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除却我们刚才所提及的黄河、淮河、工程量（治水九年而成）这三个要素以外，还有二个重要的要素是据有可信度的：一个就是大禹所采用的是“疏”，而不是“堵”的方法治理水患的；另一个则是水道疏通工程的施工地点——“龙门”，也是现实存在的。之所以认定这两个要素是真实可信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让整件事情变得具有逻辑性，也更有可能贴近真实的历史。

如果大禹是按照我们之前所分析的方案来进行治水工程的话，那么他流传于后世的治水手段应该是“堵”、“疏”并举。即一方面阻止黄河之水借淮河的某条支流夺淮入海；另一方面则是将黄河之水北向引入渤海。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疏”不“堵”。即通过疏导黄河北流的河道，引导部分黄河水进入河北平原，以部分减轻淮河流域的压力。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寻找“龙门”的所在了。

实际上在中国，如果想寻找一个上古时期的地名，并非想象中那样难。对于以祭祀祖先为第一要事，并且具有浓厚土地情节的中国人来说。将那些曾经承载祖先光荣历史的地点传承并记录下来，是追思祖先功绩的重要前提。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强烈的祖先崇拜情节使得那些伟大先人的后人，都希望能够在地缘上接近与祖先的关系。具体的说，也就是让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某位伟大先人曾经“出生战斗生活逝世……过”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名人效应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今天有

愈演愈烈的迹象，最新的案例就是对那位以喝酒和写诗而闻名于世的诗仙——李白的争夺。

第四节 禹门口的龙门没有成为大禹治水地点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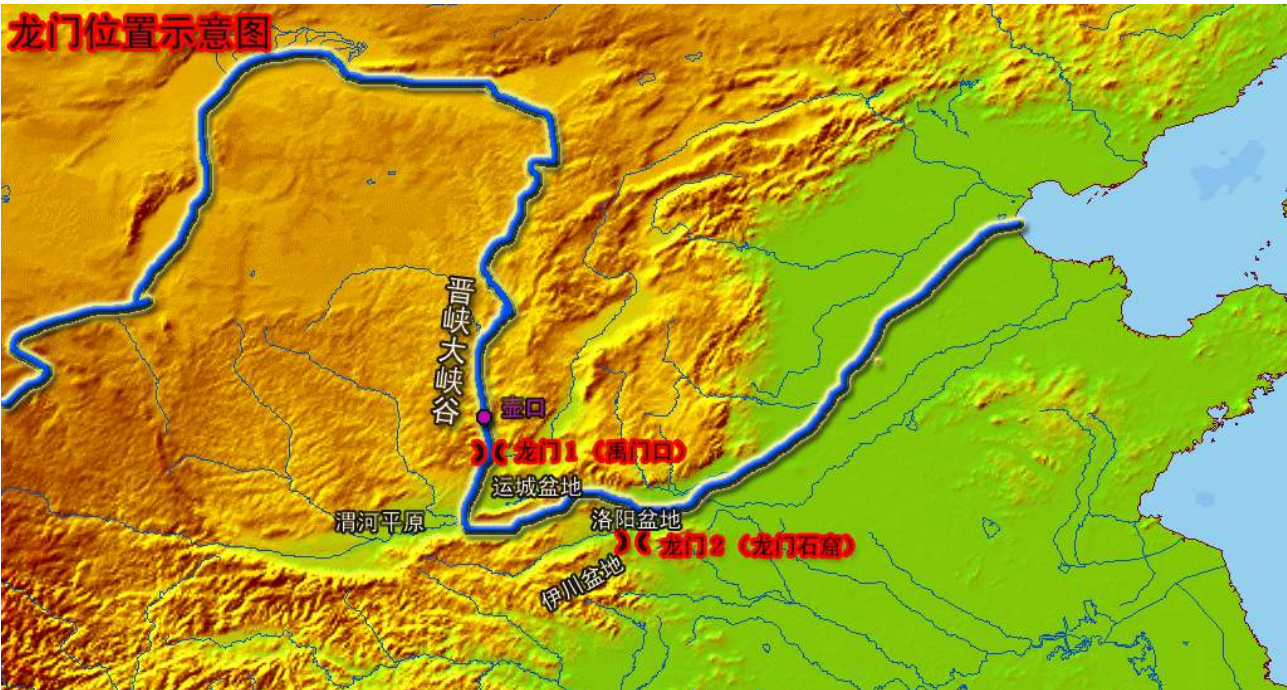
根据口口相传的历史，大禹治水的施工地点是在一个叫作“龙门”的地方。或者说大禹在那里施工后，这个工程的所在地被命名为龙门。如果结合大禹的施工方式为疏导河道，这种命名也很好理解。河道一经疏通，奔涌而出的河水形如蛟龙出水，那么将工程地点命名为“龙门”就再合适不过了。问题是现在被命名为“龙门”的地方有多处，如果百度一下“龙门”这个词条，我们会发现中国境内有近十处以“龙门”为名的地址，分布范围北至辽宁，南到广东。鉴于“龙门”这个名称的寓意颇为吉祥，真正以“龙门”命名的地址应该远不止十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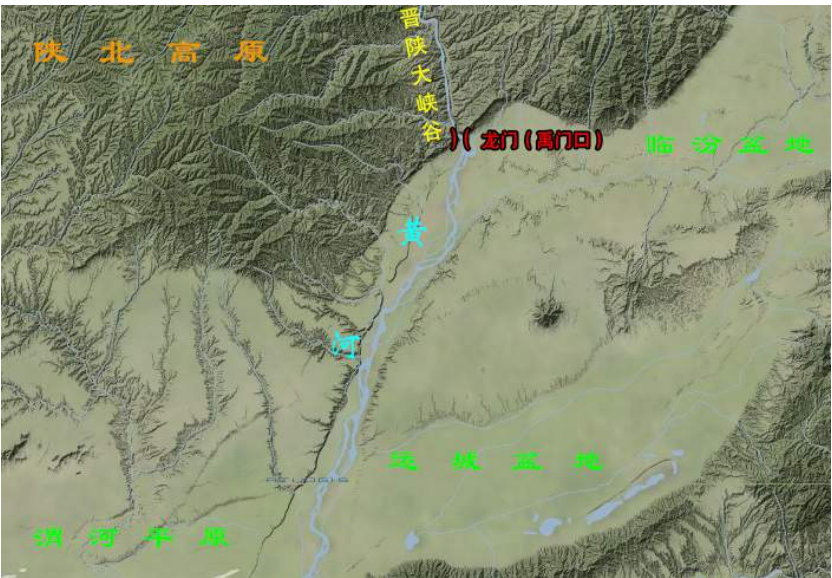
黄河龙门（禹门口）

不过这些形态各异的“龙门”并不会扩大我们的比对范围。因为根据大禹的活动范围，以及治水之后所造成的地缘影响，地处黄河、淮河流域，并且处在河道上的“龙门”才会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寻找，有两处龙门有可能是我们的选项：一是位于黄河中游，壶口瀑布之南的“龙门”，又称禹门口；另一处则是洛阳盆地之南的“龙门”，又称伊阙。此处龙门闻名于世的是刻于两岸石壁上的“龙门石窟”。如果按照大禹所治之水为黄河之水的思路，壶口瀑布南面的“龙门”无疑是最有可能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因为它是唯一处在黄河河道上的龙门，而龙

门石窟所在的“龙门”，实际上是处在黄河的支流“伊河”（古称伊水）河道上的。因此在古典时期乃至现在，黄河之上的这处龙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龙门的真正所在，而它也因此被授予了“禹门口”的荣誉。



龙门位置示意图



龙门（禹门口）位置示意图

为了行文方便，我在《龙门位置示意图》上将壶口瀑布南面的龙门命名为“龙门1”，而将龙门石窟所在的龙门暂称为“龙门2”。如果从工程量上来看，龙门1的位置位于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宽约百米，似乎上古之人集中力量，应该有可能在九年之内疏通这段不宽的

河道。问题在于，黄河在到达龙门1之前的这段南北向的河道，是在山西、陕北两大高原之间行进的（也就是所谓“晋陕大峡谷”）。这就是说，如果龙门1是人工开凿而成的，那么之前未能通过龙门1南流的黄河水又流向哪里，为祸哪里了呢？如果观察龙门1南部的河道是穿行在华北平原之上的话就很好理解了，平坦的地形以及黄河的水量很容易冲刷出不同的水道。

而在晋陕大峡谷中，两侧的山地高原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更何况如果龙门 1 在通行之前，真的高到像三峡大坝大样阻止了大部分的河水，那么黄河之水也最多是在晋陕大峡谷中形成一个大的水库，或者说淹没龙门 1 以北靠近河岸的耕地。只是晋陕大峡谷两侧的土地即使在现在，也并不具备多少耕种的价值。上古之人很容易在龙门 1 的南部发现渭河平原和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这样大面积的种积平原，并不需要费力保护晋陕大峡谷两侧的山地。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三大平原成为了西部族群的兴盛之地。

之所以否定龙门 1 为大禹治水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禹治水的地缘影响是在淮河流域。也就是说大禹通过治水，让淮河流域属于东部族群系统的部族臣服于他。如果将黄河定为治水目标的话，那么真正能够危害到淮河流域的黄河只是下游一段。从这个角度看“龙门 2”将有可能具备这个潜力。唯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龙门 2 并非在黄河之上，而是在伊河之上。难道是黄河之水过大通过伊河水倒灌，进而通过淮河的支流注入淮河并影响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

第五节 伊阙的龙门因伊水在此受阻而成为大禹治水之地

如果伊河不是西南——东北向最终注入黄河的河流，而是反方向与淮河，或其某条南向的支流相沟通的河流，那么黄河之水倒灌伊河，并进入淮河的可能性的确存在。正如之后在古典时期，黄河的每次南向侵夺淮河河道，都是通过那些北——南向的河流完成一样。即使黄河之水大到能够逼迫伊水倒流，那么又会出现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那就是大禹所做的应该是在伊水之上筑坝，以阻止黄河之水流入淮河，而并非是用人力扩大缺口，让黄河之水能够更顺畅的进入淮河。

现在看来，让龙门 2 成为大禹功成名就的地点也遇到了困难。不过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会让一切都符合逻辑。事实上除非有时光穿梭机，否则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被“史料”所证明。特别是在某一个著名景观可以成为聚财之地的情况下，让其他选项就此放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地缘结构的逻辑推测，或者说分析出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逻辑。鉴于以后的内容中还将涉及到类似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声明一下，以上及以下内容，仅为推断，并不被授权引用在具体争议之中。

在推断龙门 2 是否为大禹治水之地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关键点在于转换一下思路，即为害淮河流域的洪水的确是来自黄河，但这里所说的“黄河水”并非是来自黄河干流的水，而是一条本该注入黄河的支流的水。这里所说的支流，就是“伊

水”。如果观察现在伊水的走向，我们发现这条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的著名水流，在通过龙门2那条狭窄的水道之后，越过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区，与另一条同方向的河流——洛河汇集之后注入黄河。这段位于洛阳东北部的河流也因此被称之为“伊洛河”。洛阳盆地所孕育出的河洛文明也因为伊水、洛水的存在也被称之为“伊洛文明”。



龙门（禹门口）位置示意图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伊洛文明”的开创者就是大禹。因为在他开凿龙门2之前，伊河的大部分水流并没有流入洛阳盆地，也没有注入黄河。既然洛阳盆地没有伊河，那么“伊洛文明”也就名不副实了。不过相比于“伊洛”之名，“河洛”的用法要广泛得多。如果从水量及重要性来说，伊水与洛水对洛阳盆地的贡献并没有质的差别。而河洛（黄河、洛水）之称成为了主流的用法，本身就是在暗示在这片土地开始拥有文明的时候，伊河还没有在洛阳盆地存在，或者说它的流量还不足以提升到与洛水齐名的地步。

那么没有流入洛阳盆地之前，伊水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最起码伊水在山上的上游河道，存在的时间绝对不止5000年。只不过由于洛阳盆地南侧的几道山脉连成了一片，伊水在流到了现在龙门2的位置时受阻未能进入洛阳盆地罢了。既然伊水不能按照水流的方向顺利流入黄河，那么它势必会在山谷中蓄积起来，并寻找适当的出路向其他地区漫流。而这就造成了很多朋友所不熟悉的

“汝海”的出现。而伊河之水最终的流向地，正是那个等待已久的“受害者”——淮河。

第六节 伊水因未能过龙门而漫流成汝海并为患淮河流域

所谓伊川盆地指的就是伊河（伊水）中游，流至龙门 2 的那段河谷。而过了龙门 2 则是黄河、伊洛河水共同作用而成的洛阳盆地。伊河之水如果不能顺利的越过龙门 2 注入洛阳盆地的话，在伊川盆地积水成湖是必然的（如果你在 Google 地图上查找，会在伊河中段找到一个叫“陆浑水库”的人工湖）。这个水库所在的地点就是伊川盆地的最低点，通过人工筑坝拦截伊河的水流，我们依稀还能够看到些“汝海”的影子。只不过上古之人与今人所遇到的烦恼正好相反，他们所烦忧的是水太多了，需要有合适的途径排泄掉，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恨不得将每一滴水都利用起来。



汝海范围图

如果所认定的汝海就是蓄水之后的伊川盆地。那么问题在于伊川盆地即使蓄满了水，它的体量似乎也担当不起“海”的称号，更不至于让整个淮河流域都为之所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即然“汝海”前面被冠以的是“汝”字，那么它势必覆盖到汝河的部分河道，否则用词精准的古人会将之命名为“伊海”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地形图，会发现伊川盆地如果蓄满水的话，会依水势向东北及东南两个方向漫流。

不过在东北方向伊水突围的机会不大，有嵩山、箕山两座山脉阻挡，河水至多会淹没两山之间的山谷，并成为“汝海”的一部分。即使不看地理结构，仅从郑国能够安全的在嵩、箕两山东面享国数百年，我们也能判断出，伊川盆地的水患不会影响到此。

既然东北方向无法突围，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东南方向有没有合适的路径。还不错，这里为伊川盆地留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而伊水之南的“汝水”正是沿着这条通道向南注入淮河的。也就是说伊河之水在注满伊川盆地后向东南方向突围，并与汝水汇合，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湖泊。由于这个湖泊的水流最终是通过汝水下游的河道注入淮河的，因此也就被命名为“汝海”了。至于汝海的南界应该在哪，或者说有哪一段的汝水扩张为“汝海”。如果考察地形的话，会发现现在的“北汝河”（也就是古汝水的北段）在郟县（春秋时的郟邑）南部有一条顶角朝东南方向的“V”状丘陵，而北汝河也在此沿着这个角向北拐了个弯后再继续南流。这条“V”状丘陵起到了天然大坝的作用，使得漫流至此的大部分洪水得以蓄积起来，成为汝海的一部分。

在确定了汝海的大致范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上古时期，淮河的水患主要来自何方了。也就是说伊、汝之水对淮河流域所造成的水患才是大禹的治理对象。在伊、汝两河的水流还不算太大时，依托山势，这些水流汇集成了汝海，然后再沿着汝水的下游河道向南注入淮河。但到了雨季，伊、汝两河的水量暴涨的话，那么汝海之水就会向南奔涌而下，进而造成淮河中下游地区的洪水泛滥。



北汝河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汝河之水也是流入淮河的。那是不是说造成上古时期淮河水患的罪魁祸首就是“伊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其实在大禹治水之

后，淮河的治理工作依旧是历代王朝的治理重点，并且作为历史上淮河流域最大的支流——汝水两岸的洪灾也还是一直不断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朝的官员甚至将汝水一截为二，将北部汝水分流入淮河的另一大支流“颍河”（颍水），然后再注入淮河；而南半部的汝水（南汝河）则与其他河流汇集成另一条独立的河流——“洪河”流入淮河。这种分流的作法固然是能够让古“汝水”的下游地区减少洪灾的危险，但同时也让颍水一跃而成为了淮河的第一大支流，并增加了洪涝的风险。

第七节 大禹将伊河之水引入黄河解决了淮河的水患问题

鉴于淮河的水患一直未断，因此大禹的治理将伊河之水北向引入黄河，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方法。大禹之所以为后人所传颂，在于他开创性的用人工治理的方法疏导了河道，减轻了淮河流域的水患（特别是和之前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大禹为当时淮河两岸的部族所敬仰，并由此开启了中央之国的概念和扩张之路。



伊河

至于仅仅是一条伊水的去留，能否造成淮河水量产生质的变化，相信许多人都存有疑问。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河流的水患并不是存在于一年四季的。我们所考量一条河流是否存在水患的危险，是看它夏季（雨水多）的最大水量是否大到足以漫过河堤。而测量流量的方法是计算每秒流过多少立方米的水量。仅仅这样描述，还不足以让大家感受

到伊河水在上古时期的雨季水量会有多少惊人。我们可以得到的数据是，近现代所测量的伊河上游的最大洪峰是发生在 1954 年 8 月，流量每秒 1370 立方米。而黄河在 1958 年 7 月 17 日，于黄河下游郑州北部的花园口所出现的 22300 立方米/秒水流，为建国以来最大洪峰量。历史上黄河的决堤改道，洪峰量也基本为这个数量级。至于 4000 年前的伊水，水量究竟有多大，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最早的洪水记录就是在伊水进行的（公元 223 年），根据当时所留下的记录测算，当时的洪峰达到了 20000 立方米/秒。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上古时期它的水量有多大了。换句话说，一条上古伊水所造成的洪灾，足以抵得上后来的黄河水灾了。在这种情况下，大禹用人工开凿的方式，在洛阳盆地与伊川盆地之间的山脉上打开一个缺口，让伊河水，或者说是汝海的水分流至黄河，足以让淮河流域的部族们的农业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关于龙门 1 堵塞，造成其河水漫流入两侧的渭河、运城盆地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只是这段河道的两侧其实主要还是台地，河水造成大面积漫流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大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他借治水之功，在政治上将西部族群在黄河流域的影响力扩散到了淮河流域。从这一点来看，如果龙门 1 是大禹治理地点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力只能是在黄土高原内部。那样的话，大禹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央之国的基本地缘格局了。

第八节 大禹疏通伊阙而治水成功并由此扩大政治影响力

至于龙门 2 的工程量问题，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这条宽约 150——250 的缺口，石质的硬度在 5 度以上，直观的说就是用铁制工具每次也只能凿出条印子来。对仅拥有石制工具和少量青铜的上古之人看来，即使是 90 年也未必能够凿得开。因此龙门 2 很有可能是天然形成的缺口，只是由于洪水所带来的泥沙，特别是泥石流在此淤积。天长日久缺口之内的河床不断加高，终于在大禹所在的时代改变的伊河水的水流方向。而大禹所要做的就是枯水季寻找到足够的人力，清除掉那些淤泥，重新打通伊水北流的通道。由于淮河流域是最终的受益者，因此让这些部落提供劳动力参与这项工程并不会特别困难。这也使得大禹得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东方族群，并最终凭借治水所带来的威信成为中原之主。由于大禹疏通的这个“V”型缺口是供伊水北流而用的，因此龙门 2 也被称之为“伊阙”（阙有缺口的意思）。

大禹的这次治水工程在地缘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黄河的地缘影响力扩散到了淮河。而大禹本人实际上也凭借这次治理水患，树立了

洛阳盆地在黄——淮之间的政治地位。



龙门 (伊阙)



大禹治水示意图

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大禹及其所代表的部族既然可以通过疏通龙门而减轻淮河的水患，自然也存在人为堵塞龙门，让伊水复流入淮河的可能性。对于淮河流域的部族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地缘威慑力。尽管伊水的水量在后世已经逐渐减小了，黄河对淮河的这种地缘控制力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春秋之后的政治家们，已经有能力通过人为的方式在洛阳盆地——山东丘陵之间的任意一点，将黄河之水向南引入淮河流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决堤）。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集权结构是源于“治水”文明，从黄淮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既然大禹已经通过治水显示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向分散于黄、淮流域的部落们宣示自己的政治权威了。由于淮河流域的诸多部落都在这次治水工程中出了力（当然也有坐享其成的），因此大禹需要找一个地方召集各部论功行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探行为，以观察自己在淮河流域的威信究竟如何。由于评定功过实际上是一个计算过程，所以这次会盟行为被称之为“会稽”，也就是现在“会计”的意思。这种做法倒是很像姜太公在“封神台”上所做的，只是不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创意封神榜时是否受到了大禹“会稽诸侯”的启示。



大禹会稽诸侯地点考

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前者的会稽之名明显有附会的意思。而后者的位于位于淮河的中游，如果大禹希望就此确立在整个淮河流域的威信，“涂山”倒是个合适的地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是在伊川会稽诸侯的，这个“伊川”指的就是伊川盆地（现大部归属伊川县）。如果说大禹希望在自己功成名就的地方会盟诸侯，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涂山和伊川都有可能是真正的“会稽”，只不过对于希望控制淮河流域的大禹来说，“涂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关于“会稽”之地究竟在哪里，一直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主要的说法有二：一是绍兴后面的会稽山；二是蚌埠市西面的“涂山”（行政归属怀远县）。按照

第四章 夏和商在中原统治权的确立并面临的地缘压力

第一节 夏的共主地位受到山东丘陵东部族群的挑战

前面说到夏的问题。夏朝是否存在，亦或能不能算一个王朝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不过通过地缘的推算，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区的西部族群，是完全有可能凭借治水而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威慑力，而垄断东西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的。对于上古时期的所谓“国家”，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更多的只是一个个城邦，或者聚落区。所谓“共主”更多的也只是名义上的。有些类似于后世对边缘地区族群的“羁縻”统治。也就是名义上承认你的老大地位，四时八节的再送点礼就行了。真正的利益还是要从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获得。

当“夏朝”首次将共主的位置按照血缘的关系传承下去后，也意味着东西两大族群之间数百年所达成的平衡被破坏了。中原这个位置，虽然可以控制黄河下流所能辐射的广大地区，但也意味着它有可能遇到来自四个方向的挑战。最先提出挑战的是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族群。时间仅仅是在“启”垄断共主地位之后数十年，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时期。在这里我其实并不想提及这么多上古名词，不过史书中的这部分记载的确符合地缘结构和历史规律，因此你可以认为我是在为上古的这些“历史”寻找地缘根据。但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先研究地缘上的可能性，再去检索史书中有没有符合分析的记载（上古的所谓“历史”中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但大的事件发生应该是可信的）。

挑战最先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东部族群是很自然的。基于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最初的挑战不是来自这个方向反倒会让人奇怪了。来自山东丘陵的东部族群最初取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带长达四十年（史称太康失国）。其后“夏”族又重新夺回来统治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保持了四百多年。顺便说一下，这个族群的标签为有穷氏的“后羿”部。你没有看错，这就是那个嫦娥的前夫。在这里我们不必关心他身上的神话色彩，那些自有电视剧导演去发挥。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个标签后面所暗藏的地缘信息。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分析，“后羿”部之所以敢挑战“夏”的共主地位。除却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以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泰山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使得它可以免受洪水的侵扰（这也是山东丘陵地区成为东部中心的原因）。这一方面使得“后羿”部并没有受到大禹治水的恩惠；另一方面也让“夏”的战略

威慑力无法波及到泰山以东地区。当然，打败了地缘优势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后，“夏”的共主地位的确是更加稳固了。不过所谓“500年必有王者兴”，想做老大的人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只是梦想人人可有，但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地缘优势。这一次的挑战来自北方，族群的名称叫做“商”。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与夏在中原面临的四方威胁

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的用后世的传承关系来套。这三个符号代表的更多的是三个族群，而不是三个朝代。如果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或者说三个族群都是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的。所谓朝代只不过是指谁取得了“共主”的地位。当然这三代与之前的部落联盟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特征是，谁如果想成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山东丘陵的领导者，谁就必须占据“中原核心地带”。这也成为后世诸古典王朝确立正统地位的标志，如果放弃了这一地区，

那只能成为偏安的小朝廷。

关于商、周二族最初的位置，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的。后者是信史的创立者，因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足够确立它的位置了。如果按照划分，周族最初的位置则是在渭河平原的西侧，也就是西部族群的祖地所在。而“商”族最初的根据地，则需要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了。好在中原地区大批商代遗址的发现，使得有些足够的对比对象来找寻“先商”的足迹。在入主中原之前，商族主要生存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之上。当然这里所说的黄河指的是“禹贡黄河”，也就是大禹所引导而成的那条黄河故道。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寻一下“先商”的遗址，大致就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南北一线，向东不会跨过“禹贡黄河”。有一种说法是商族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明”有着亲缘关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三个“原始东夷”根据地之一）。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是符合陆地的迁移路线的。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商族属于“原始东夷”系统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也有认为其是来自东方的族群。其实从位置上看，“夏”族的这次威胁更应被看作来自北方。



夏商周三代地缘关系示意图

从地理位置来看，“夏”所占据的中原核心区固然是处在中心地位，似乎天然就有统治四方的地缘优势。但也很容易受到来自四方的攻击。东面的威胁来自传统对手——山东丘陵地带的“原始东夷”部族。这一地区的挑战早在“夏”族确立共主地位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夏”族得以保住了领导权。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原因是，受到大禹治水的影响，处在黄淮——江淮平原的“夷”族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挑战之中。即使他们保持中立，“夏”族也可以从其他的西部族群那里得到支持。此消彼涨，来自东方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就可以理解了（这里所论述的过程都可以在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大家可以自行查找）。

南方也可能存在挑战，但无论是生活在黄淮——江淮平原上的族群是属于东部还是西部系统，都处在黄河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处在在大禹治水的余威之下。并没有决心和力量发起真正的挑战。何况夏族所控制的核心区南部已为西部族群所控制，东部族群更多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夏族”在南部有足够的缓冲区（在打败来自山东半岛的那次挑战中，也正是依靠这些亲缘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复国”。具体可搜索“少康复国”）。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西部的黄土高原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胁。威胁主要来自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渭河平原。事实上这一地区也的确有力量入主中原，之前黄帝族已经做到了。不过对于留在渭河平原上的炎黄后裔来说，现在占据中原的是同族兄弟，渭河平原对于“夏”族来说，更多的是可以依靠的后援基地。当然，渭河平原的地缘优势依然存在，只是要等到“异族”占据中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

第三节 商族凭借地理位置和掌握青铜技术得以入主中原

关于商族为什么能够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中国历史的轮回来看，每一个所谓“朝代”都有它的周期。古典时期一般在200、300年左右，而三代的时间则要长一些。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很多“专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有从政治角度的，有从文化角度的，有从军事角度的……，黄仁宇先生则是从经济角度来解读的。

从这些角度来解读都有自己的道理，也大都能自圆其说。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不过我们所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些朝代更替的内因有哪些。而是为什么最终取得胜利的会是“它”。就像我们在古典时期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我们的教育无限抬高所谓“农民起义”的力量及正义性，但我们最终却发现，王朝的终结者往往是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在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究竟是谁能够抓住这种历

史机遇。亦或是当这种历史机遇出现之时，你有没有足够的地缘基础来支持你将要进行的挑战。

商族能够最终入主中原，首先要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之前曾经分析过，太行山东侧，燕山以南地区是黄泛区的死角。黄河走南线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走北线，这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河网纵横，黄河一旦泛滥，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而在太行山东侧的商族则不用有这样的担忧，即使黄河出现泛滥，更大的可能也是依地势和流向向东入海，并不会对处于河西岸的商族造成影响。这使得他们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并最终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夏”虽然通过引导“禹贡黄河”而成为黄淮乃至江淮平原的共主。但这条走北线的黄河也事实上增加了商族与黄河以南地区交流的难度。因此商族可以说并不存在于“夏”的控制范围之内。

商族能够最终渡过黄河，并取代夏族成为中原的主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技术优势。“夏”之所以不为西方所承认，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原

地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而商族正是以青铜器闻名于世的。商族很有可能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尽管我们非常希望东亚地区能够独立获得很多技术上的突破，并以此而影响世界。但事实上在古典时期之前，很多技术的确是在西亚地区率先获得突破的，青铜就是一例。商族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路径很有可能是向北进入辽河流域，再向西经过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那个缺口进入蒙古高原，然后通过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最终从西亚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这条路线最初在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迁徙时使用过，在后世的东西方交流中也一直保持畅通（只不过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当然，在这里做这个推断，并不是说商族直接经由这条路线到西亚取得了冶炼青铜的技术。事实上这更有可能是



商代青铜器

通过沿途族群的接力而传播至华北平原的。关于青铜的起源，国内的“专家”更倾向于中国境内独立起源的观点。当然这类“专家”更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中国找到相应的独立起源证据，甚至包括足球。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是在一些新石器遗址中偶有发现的铜片，或青铜小刀一类的“铜制品”（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3000 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不过这种孤例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是成品而不是青铜冶炼技术已通过类似的路线传入东亚地区。

不管青铜冶炼技术是否由西亚传入，商族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技术的掌握所造就的军事优势，不亚于 3000 多年以后，欧洲人由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火器时代。后者依靠这种优势所取得的不对称力量，打破了地缘固有的平衡，并以此而急速扩张自己的地缘纵深（在技术不再被垄断之后，旧有的地缘优势才会重新体现出来）。

关于商人是否早在代夏之前就已经有了青铜冶炼的技术优势，亦或夏是否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不再做讨论了。目前有关部门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把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纳入了夏的体系，并希望以此而将西方认为的华夏 3000 多年文明史推进到 4000 年的范畴，加上又有些“边缘民族”希望在北方青铜文化的所有权上做些文章。因此才说这个问题现在讨论有些敏感。能够独立在中原起源当然是最好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损于华夏 5000 年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

对于不确定的东西，我一般会先声明。就像商族是否率先掌握了青铜技术，是用了“可能”的前缀。如果这段让大家感觉不舒服，可以无视。由于所写内容涵盖的面会很广，而我的出发点又是希望所有人能够看得懂，因此很多时候不会刻意去写些“专业术语”。于某一方面颇有研究者来讲，可能会觉得言之泛泛（如果是写论文或给上头写报告则另当别论了）。不过亦是没有办法的事，希望大家理解。

第四节 商族入主中原后与东夷族群发生冲突

如果说夏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东西两部族群在互相缠斗的话，那么“夏”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了中原的地缘中心位置。即从那以后，谁想成为北至燕山，南至长江，西到黄土高原，东到山东丘陵的共主的话，那就必须占据中原，并以此来号令天下。这个“天下”的概念也就是后来“中国”的概念。当然，它的范围也是一直在扩大的。中原作为权力中心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凡是在此确定政治地位的民族，都不自觉的将自己确立为中心民族，而将四周边缘地区的民族视为低一等的民族。在周以后这一点尤甚，想成为“中国”主人的人甚至还要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

对于商族来说，入主中原后当然会受夏的影响，虽还不至于被完全同化，却也已经和山东丘陵——黄淮平原——江淮平原的所谓“夷”族发生战争了。虽然他们同被归入“夷”族。我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奇怪，东西族群只是根据双方所处的位置以及文化所做的划分，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一定是铁板一块，就像炎黄二族也同样发生过冲突一样。

相对于“禹贡黄河”以南的“夷”族来说（山东丘陵——黄淮、江淮平原），商族与之联系会更少，或者说相对于山东丘陵的位置来说，商人更像是边缘部族。这样一个在“原始东夷”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部族取得了共主地位，原先臣服于夏的那些东部族群不服也是情有可缘的。同样的事情在 3000 年以后也发生了，尽管朝鲜半岛上的某些人认为与“满族”同源。但当满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却宁愿承认为中华正朔。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立，如果一定要解释，用“宁赠外邦，不予家奴”这种心理来解读，可能是最恰当的。

商征东夷的地缘意义主要在于，商与夏的影响力覆盖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黄河以北作为商族的故地，无论“夏”的影响力当年有没有至此，现在都可以被归入同一地缘圈了。至于以渭河平原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从后来周族的兴起过程来看，已经奉商为共主是确认无疑的了。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谁占据了中原之地，谁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夏要面临商的威胁一样，商族也要面临同样的挑战。而这一次的挑战来自于传统优势地区（相对于中原）——黄土高原。

第五节 周挑战商的共主地位并在地缘文化上的贡献

在黄土高原上对商发起挑战的族群就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那些拥有无数天兵天将支持的“周”。当然，在《封神演义》里，大商也有很多仙精妖怪支持的。只不过在小说中，无论死活，无论仙妖都殊途同归的在封神台上封了神。而事实上“周”也的确让东西两部族群真正完成了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华夏”族的概念。

“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完成大一统的“秦”。后世对它的推崇主要是在文化和制度上，以至于在汉代时假托周人之手，制定了很多理想化的制度。不过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周人在地缘上的建树。如果说周以前的夏、商两代的管理形式，更多的只是满足于做名义上的共主，而对地缘文化本身并不会刻意去改变的话（各族群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有文化上的独立性）。周人显然认为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并不利于保持王朝的稳定。在寻找新的管理方式时，周人“祖先崇拜”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尽管在东亚大陆，由于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封闭性，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祖先崇拜的概念。但周人对于祖先的态度，以及对于传承血嗣的态度却是无出其右的。这突出表现在周人“多妻”的态度，以及将宗亲“封建”至各地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周人开始从上而下开始改变，以往为东部族群所占据地区的文化属性。尽管最终所形成的华夏文明带有东西两大族群共同的文化烙印，但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周人”，却为这一共有文化打上了西部的标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但于我们今日来说，要注意千万不要因此而认定所谓“华夏”文明仅仅来自于黄土高原。这样不仅不能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而且会被某些目前仍属于边缘民族的族群所利用。造成这种情况，传统的历史观多少要负上一些责任的。

第五章 周王朝的建立和分封诸侯国

第一节 周经牧野之战灭商取得中原统治权

下面马上进入《封神演义》的环节了。不过希望在其中看到神仙鬼怪的朋友可能会失望，因为封神演义里出现的大部分“法师”，历史上都没有。但《封神演义》也不算纯YY作品，最起码那个起了重要作用的姜子牙老师还是确有其人的。他及他的子孙在灭商以及其后直至春秋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商的资料，随着众多商城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已经变得丰富起来。我们知道商代闻名于世的是青铜器和甲骨文，除却这两个带有文化气质的特点，商族还有两个与地缘相关的特点：一是尚武，基本是东南西北四面出击；二是好迁都，据史料记载前前后后迁了13次之多。现在找到的没那多，但也有7、8个之多。关于商族好战，其实也很好理解。每一个占据中原的族群都会面临四个方向的挑战。在周族决定东出渭河平原时，商族的主力正在东征（据持此种说法者说，有十万人之众）。有一种想象力颇丰的说法，是商族的主力在得知国破之后，转而从山东半岛出海，最终漂啊漂，漂啊漂……结果赶在西方人之前发现了新大陆，并将中华文明传播至美洲。

这种说法的确很有吸引力，只是尽管有证据表明，7000年前东亚地区的族群就已经可以熟练的操作独木舟了。但实在无法想象，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可以将这么多人送到美洲。何况这是一次没有目标的旅行。不过商族在退出中原之后，并非没有在地缘上为孙后代做出贡献。相比漂到美洲的说法，这一次迁移会更符合客观事实，也更有历史依据。关于这次迁移，我们稍后会分析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周人那里，去看看他们是采用什么样的进军路线打败商人的。

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周人的祖地在“岐山”附近。岐山的位置也就在渭河平原的西头。当周人安安份份的呆在岐山时，对商族是构不成威胁的。尽管商族也曾对黄土高原上不臣服的部族发动过战争，但地理距离使得周人在此之前并不会与商族发生大规模冲突。不过岐山在渭河平原属于边缘地区，对于有志于东进的周人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政治中心。因此在进军中原之前，他们必须先占据渭河平原的中心，以控制整个渭河平原。这个中心被选在渭河之南，史称“丰镐”，地理位置在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自周人将这里确定为渭河平原，乃至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区后，在随后的历史中它又多次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商朝在建立以后的“迁都”有 5 次，前期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南的洛阳——郑州一线。最后一次则迁回黄河以北，也就是现在发现甲骨文的地方（安阳）。关于商族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迁都”，史学界众说纷芸。有说是天灾，有说是人祸。不过从结果看，虽然商人越过黄河进入了中原核心区，但却更适应黄河以北的生活。最起码我们知道，在最后一次将都城迁入安阳境内后（黄河北岸），商人的都城就此方稳定下来。在此后 200 多年中，商人就是以此为政治中心，向四周邦国施加影响。



商周牧野之战要图

尽管位于目前河南境内的“安阳”也被划入中原的范畴。但事实上，黄河以南的洛阳至开封一线才算得上是“中原核心区”。这一地区最大的地缘价值在于，可以封锁渭河平原东出华北平原的主要出路。而商族的这一次迁都尽管回到了自己的祖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也为以后的覆灭留下了隐患。200 多年后，周人正是因为商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薄弱，才得以轻而易举的进入河洛地区，然后经“孟津”（津即为渡口，孟津之名三千年未变）渡过黄河，并最终与商族决战于牧野。

如果商人能够继续以洛阳盆地为政治中心，周人决不会这么轻易得手。最起码“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场面是不会出现的（这些所谓“诸侯”很多都是来自黄河以南地区，甚至还有长江流域的“巴人”参与）。后世的帝国多吸取这个教训，将政治中心建于最危险的敌人面前，以此方能集合全国之力以抗之。当然，前提是你要预判出敌人来自于哪个方向。而商人似乎还没有想到这么深远。

封神榜里的“朝歌”是纣王的行都，也就是在正式都城之外的另一个都城。这

在古代并不鲜见，最起码我们马上会在周朝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商人选择迎战周人的地点是在朝歌西南 70 多公里处的牧野。这一战之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从此周人确立了中原的统治权，并将黄河以北直至燕山的范围正式纳入了华夏控制区。而这其中所用的手段则就是那具有开创性的“封建”制度。

第二节 商朝遗民迁移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

关于周人是如何控制这些新臣服地区的问题，要留待后面写了。之前有说过武王伐纣在地缘上还是引起了一个重要后果的，那就是“箕子朝鲜”的建立。如果我们事先没有明确商人的发源地在华北平原（有可能北至辽河平原）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箕子”为什么会选择朝鲜半岛北部作为商族最后的避难所。

事实上早在商族进入中原之前，就很可能已经熟知华北平原——辽河平原——朝鲜半岛这一路线了。只是在之前，中原对于商族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朝鲜半岛而已。箕子朝鲜的这次建立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卫满朝鲜”，汉乐浪郡等都是因袭于他。箕子的这次出走可能是出于为商族保留一点血脉的缘故。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倒是大可不必，因为留在中原的商族还是能够获得了一定的封地，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周人的统治。史书记载，箕子后来也接受了周的册封。因此将华夏族对朝鲜半岛的开发上溯到 3000 年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惜的是听说半岛北边的金太阳早已将箕子墓给铲平了，以期和华夏文明彻底



箕子迁移路线图

划清界线。不过如果同样的事情他们南边的兄弟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个与中国战国时期某国同名的国度，会聪明的突出商族“东夷”的属性，然后结合自己偷换的所谓“东夷”概念（他们现在正以“东夷”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四处活动）反过来证明他们曾经是整个中国的主人。尽管这与生活在尼罗河畔的阿拉伯人以古埃及的后人自

居有些类似（阿拉伯人的理由还充分一点，最起码他们现在的确是尼罗河的主人）。

另外关于地缘研究的现实作用，我想做一个解释。其实已经在之前的内容中作过一些说明了。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地缘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每一个时代的地缘特点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范围扩大，比如在古典时期太平洋上的那些小岛实际上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现在就不同了。而这个时候地缘研究的范围就要拓展了；有的是性质变化，比如伊朗高原的枢纽地位不再仅仅体现在交通线上，而是变得内容更加丰富了（就像举的一个军事上的例子，你在伊朗高原上竖立的中程导弹，所覆盖的重要地区要比其他边缘地区大很多）。

即使人类完全进入太空时代，地缘研究的地位仍然是不会弱化的。只是到时候我们主要参考的就不是地形图，而是星际导航图了（也包括各星球本身的地理气候特点）。之所以要解读中国地缘，一方面是因为越熟悉的环境反而越陌生。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的周边，对中国的情况反而不甚了解，那么总是有缺憾的；另一方面是大家在解读现实的国际关系时，往往会运用一些历史证据。那么了解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并据此做出自己的判断总归不是一件坏事。

第三节 周人重子嗣和生育以服务于分封制度

继续周朝的分析，关于“周”这个朝代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历史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是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周的贡献有二：一是前面讲到的分封制。即将自己的血亲分封至各地，以至上而下将各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整合为一个整体；二是重子嗣、重生育。这实际上和第一条是一体的，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为第一条服务的。这当然主要是指贵族，不过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争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生产出农产品的土地。

说到周人的生育观，有一个传说是周文王（也就是那个会算卦的老先生）有一百个儿子，封神榜里言之凿凿的说他的第一百个儿子叫雷震子，并且还有一对翅膀。封神榜当然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了，文王也未必真有一百个儿子，但多子应当是肯定的。只是这么多孩子不可能是一个人生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文王有很多的妃子替他生育子嗣。相信大家自小就从评书中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也相信在坐的诸位男同胞绝大多数曾经梦想过这种生活。不过周人作为这种一个茶壶配N个茶杯做法的始作俑者，真实的想法只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扩充自己的子嗣（当然也会附带满足一下占有欲）。

周人的这种做法对于东亚地缘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过父系传播最终确立了华夏族在东亚的核心地位。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很难有女性帝王的原因。仅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周文王如果有足够的配偶，是有可能完成他的百子大业的。而武则天即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育事业中去，也最多只能够完成周文王的五分之一。按照自然法则来看，周人将传宗接代的地位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也注定决定了东亚的古典时期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

对于最先开始分封制的周王来说，尚无可能做得非常彻底。最为彻底的方式是将自己的直系子嗣分封至势力所达的每一个角落。之所以一开始很难做到，一方面是在古典时期前期，尚未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王室的力量并不是十分强大，还必须依靠宗亲以外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有足够数量和可供独挡一面的子嗣（当中央集权的制度成熟之后，这一点反倒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磨合，事实上在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帝王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异性封王并非不会出现，只是下场多数是悲惨的。

第四节 周人在原东西部群区域和中原商人旧地封建的封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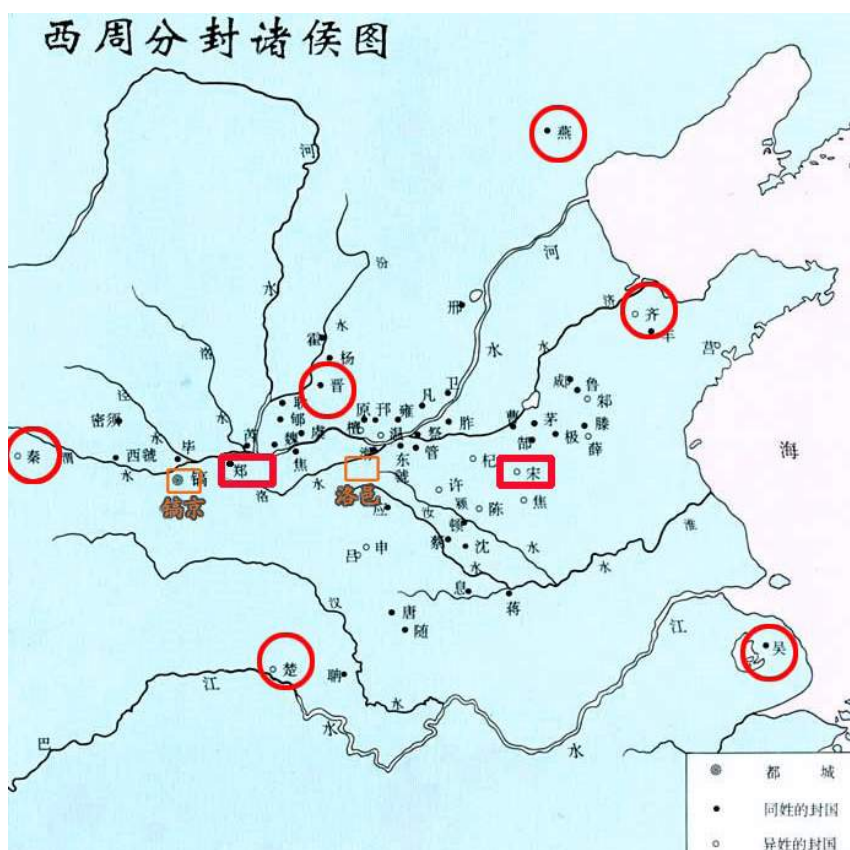
既然一开始将自己的子嗣宗亲分封至所有地区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周王室最初是怎么做的。从《西周分封诸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首先将西部族群的传统覆盖区域分封给了自己的宗亲。这些区域包括三个地理单元，即渭河平原、河洛地区、汾河谷地。对于商人在黄河以北的故地（多属现在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及河南北部），以及商人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所拓展的领地，周人仍给予了一定空间。只是将他们集中起来给予封国的地位，并在其周边建立与周王同姓的封国以对其进行监督。

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商人旧部即封为“宋”（中心位置在今河南商丘），为了表示周人的大度，周王破例给予宋国“公”的级别。要知道，这一般是给周王直系子嗣的待遇。这也使得“宋”有机会在春秋时期去争夺霸主的地位，不过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要想弄清楚周人到底分封了多少同姓及异性诸侯国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却没有必要做到那么细。我们需要关注的仍然是那几个重点地区。

在之前的部分，我们曾经分析到，周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史。即使是周人已经决定创造性的用自己的宗亲和族人，自上而下的改造那些边缘地区的血统和文化时，他们仍然要面对东部族群可能的反抗。因此尽管自夏以来，中原地区的地缘中心位置已经确立了，而周人也将主要的宗亲用来巩固这一核心地



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西周分封诸侯图

区，但他们仍然需要在几个“原始东夷”的边缘部属上自己嫡系力量，以达到最终融合的目的。

早在炎黄部分我们就已经分析过了，原始东夷部有三个地缘中心，即辽河流域、山东丘陵、环太湖平原。经过长期的博弈，这三个地缘中心的族群成分，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如辽河流域的原始东夷部，应当已经与来自蒙古高原的原始游牧民族发生整合；而环太湖平原的原始东夷文化本身，就与东南丘陵地带的“百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管这三个地缘中心的族群、文化变化如何，对于从黄土高原走下来的周人来说，他们无疑都是属于需要重点融合的边缘地区。

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地区就不存在原始东夷的势力了，事实上在整个黄淮、江淮地区基本都为所谓“夷”族势力所覆盖。不过掌握黄河中上游水力资源的周人并没有将他们视为主要的威胁。而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这三个东部地缘中心是处于黄河影响区之外的地区。我们可以将上面的《西周分封诸侯图》以及《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重叠起来看（在脑海中），就会发现，周人在这三个地区分封了三个重要的封国，而这三个封国都所对应的地区正好是原始东夷的三个地缘中心。这三个封国分别是燕、齐、吴。

第五节 周人在山东丘陵分封齐和鲁作为姜太公和周公封国

前面说到周人在原始东夷的三个发源地，或称根据地部属了三个同宗的封国。这三个封国应该说离中原核心区都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北边的燕国和南边的吴国。无论是对于最初的黄帝族，还是后来的夏人、周人而言，山东丘陵所在的海岱地区（泰山以东直至海滨）都是最为直接对手，也是东部族群的地缘中心所在。因此周人需要让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去经营这一区域。

这个人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封神榜中那个用直钩在渭水钓鱼的姜太公，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姜尚”（姜姓吕氏）。至于姜太公在功成名就时是否真的是一把年纪了，一直没有定论。“太公”更有可能是其后人的尊称，而不是他当时实际年龄的体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姜尚是周人入主中原时最为重要的军事家。以至于在后世，他也曾长期居于武圣的要职。当然，由于后世将“忠”、“义”二字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武功之上，他的位置最终还是让位于德艺双馨的关云长了。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则是在这个“姜”字上，这个姓表示这位军事家是属于炎帝族（黄帝为姬姓）。之前在炎黄部分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炎黄二族在经过一场战争之后已经实现了融合。毕竟大家本质上是同属一族了。而姜尚被自认为黄帝族后裔的周人所重用，也正说明了这种融合是成功的。不过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周人来说，在分封时血缘的远近关系还是会放在第一位的。姜尚的封国（也就是“齐”）被封在泰山以东，也可以被理解为让这位远亲去啃那块最硬的骨头。同样的事情周王在对待出身不那么高贵的秦人身上又用了一次。

再随后的历史中，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甚大的人物即将登场了，他的影响是那么的深远，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做梦之后都会立即想到他，他就是“周公”。对于周公的历史作用我们后面会讲到，现在我们要了解的是他的封国所在地。作为周武王最为亲密的弟弟，周公的封国——“鲁”被封在了泰山的西面，一面可以与中原核心区相接，一面又可得泰山之势，可谓地缘条件得天独厚。由于和齐国都是以“泰山”为靠山，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名字经常被放在一起表示一个地理单元。所谓齐鲁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了。

尽管这两个国家有诸多地缘上的联系，也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双方还是具备了不同的气质和命运。与中原核心区的地缘关系，以及先祖的文化创造力，使得鲁国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文化事业上。左丘明（《左传》的作者）、孔子、鲁班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而齐国在征服海岱地区之后，完整的继

承了当地的地缘优势。这一优势一为“海”，二为“岱”。前者一方面提供的是沟通的便利，并可据此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让齐国只需应对西面的地缘压力；后者则提供了战略屏障，并可据此向四周的华北平原渗透。这二点地缘优势，使齐国最终能够成为诸侯国中的最强者之一。当然，比之华北平原的其他封国，有“靠山”的齐鲁两国都比较长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靠山”，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很难有好的前景。

第六节 周公的历史身份问题和齐鲁位置对换的假设

关于周公不妨再多说几句。有一个问题，鲁国究竟是周公的封国还是他儿子的封国。这个周公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周公，也就是那个辅佐武王灭商，创立了周礼，后又成为托孤典范的周公（武王的弟弟）。他的名字叫“旦”，后世也有人将之和他的姓连用，称为“姬旦”的，不过估计这样叫的人也觉得别扭，所以我们一般还是称之为“周公旦”。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周公实际上是一个世袭的封号。即历史上实际上不止有一位周公。

如果周公旦的后代都是湮没无闻的，那么让他独占“周公”这个称号也未尝不可。只是“周公”这个封号在周朝的地位有点像《三侠五义》中的八贤王，王室有什么事第一个就会想到找周公。以至于周王传至第十代时，由于当时的周王（周厉王）失德，引发“国人暴动”（中学历史中学过的），结果是周厉王越过黄河跑到山西去避难。这个时候朝臣们只有请周公和召公出来主政，史称“共和”，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正式的纪年，至此以后的中国历史变得清晰可辨。因此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人只承认中国历史到这一年为止。

既然这位周公（参照周厉王的辈份，也差不多离周公旦有十代八代了，那位召公也同理）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著，那么周公旦即使能够独享“周公”这个称号，后辈也容易将二者搞混。当然，如果真的要争起来，崇尚祖先崇拜的周人（也包括后世的华夏族）是一定会吧“周公”这个称号给周公旦的。因此后面这位周公在历史当中的正式称呼是“周定公”。

周公在周王室的显赫地位只是在王室兴旺的那些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室渐衰，礼崩乐坏，诸侯之间比的是谁的拳头硬。这个时候周公的影响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你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会那么愤愤不平的希望恢复周礼了，毕竟到了比实力的时候，鲁国就只能成为二流的诸侯国了（这和我们都希望中国强盛一样，不过光这样想的话，就有点小人之心了，圣人想的永远要比我们多些）。

周公旦其实并非没有机会改变他后世子孙的命运，问题是他有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从技术的角度看，如果他当时将鲁国的封地调整到泰山以东（也就是姜太公的封地“齐”）。那么无论鲁国后来能否凭借文化和地利的双重优势一统天下，最起码鲁国也可能位列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列，并且会是前三强。只是周公旦当时并没有足够长的历史作为参考，毕竟信史的开始要到他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辈才开始。另外在王朝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般都认为王朝可以千秋万世的传下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事先做好天下大乱的预案。

因此无论是周武王还是周公旦自己，做出将鲁国封建在中原核心区与山东丘陵之间的决定，在当时无疑都是正确的。从王室的角度看，最有思想和辅政能力的人当然要离自己近一点。而让武力最强的姜太公去扫荡山东丘陵那些“夷人”，也属于上策。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尽管先人们一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相对于变化纷杂的政治格局来说，稳定的地缘优势才是最为可靠的。一千多年以后，那位人气极高的刘皇叔也和鲁国一样接受了同样的命运安排。所不同的是，刘备其实是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最起码他身边那位著名的地缘政治家——诸葛亮，在未出茅庐时已经为他指明了方向。只是这一伟大构想最终只完成了一半，荆州的丢失让蜀汉只能以三国中最先灭亡的国家而存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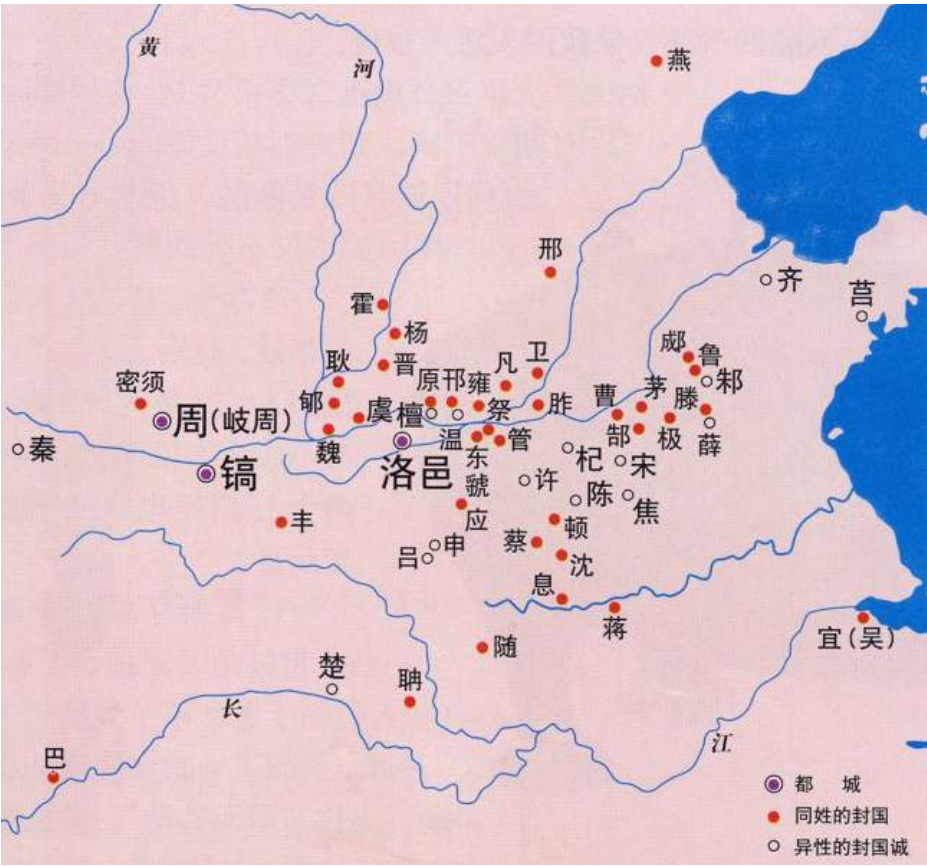
第七节 周人在燕山以南分封燕国作为召公的封国

略知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古时有“三公九卿”之说。“三公九卿”所表示的官职一直是在变化的，不过三公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却是一直没有变化。“三公”的概念始于西周，最初指的是三个具体的人。其中有两个已经出场了，就是封于齐的姜太公和封于鲁的周公。另一个则是后世名气稍小的“召公”，他的封地则在“燕”，也就是在现在的北京左近。

这个“燕”字得名于燕山，据说是召公自己改的。从地缘的角度看，周王之所以要把三个最重要的大臣分封在燕山与泰山两个边缘地区。是因为泰山是东夷族的中心所在，由一文一武两位最有实力的宗亲去消化属于“好钢用在刀刃上”。而燕山以南插入一颗钉子一则可以切断黄河以北的东夷族（也就是商族旧部）与辽河平原的联系，并与分封于黄河北岸的姬氏封国一道压制商族的重新坐大；二则可以抵御来自辽河平原军事压力。

在理论上消除了来自北面和东面的地缘压力之后，周王可以放心的经营中原核心地区了。只是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最大的压力是来源于东、北两面，但并不表示

南面就不会有压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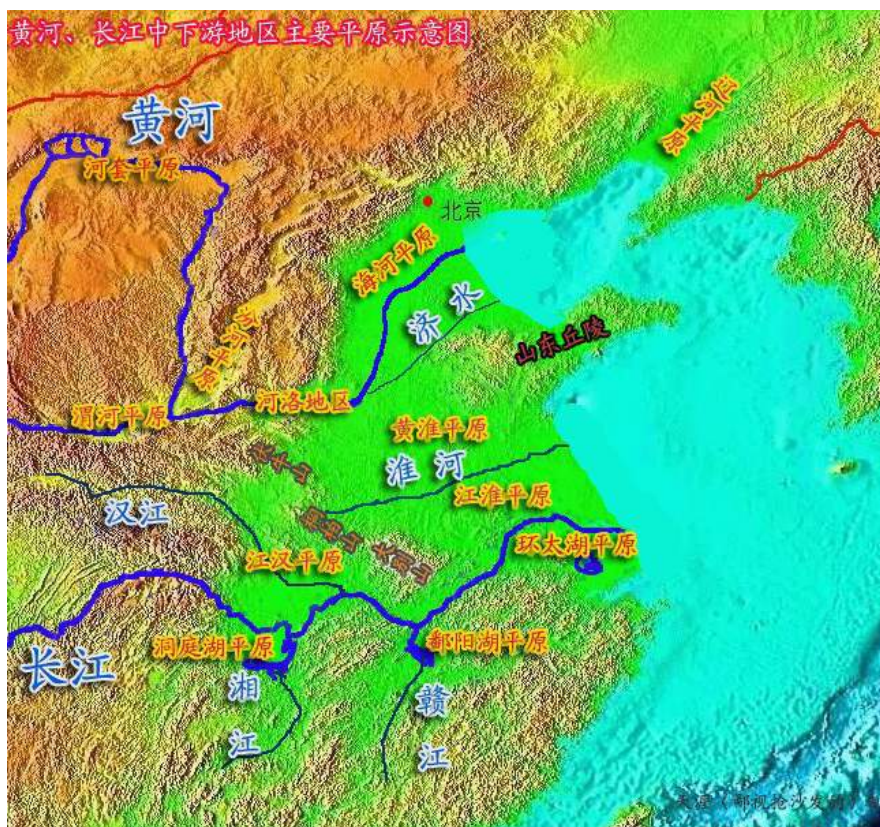
西周分封诸侯国图

由于周人在灭商中曾经得到来自黄淮、江淮二地的“夷”族的支持，因此将宗亲分封于此并不十分妥当。因此我们在《西周分封诸侯图》上会发现这两个区域是一片空白。这并不表示周人对这些曾经的盟友没有封赏，只是没有正式纳入封国体制之内罢了。不能对黄淮、江淮平原进行直接控制，并不代表周人不会想其他办法。这个时候需要周人的视野再开扩一些，跳出黄河流域，将长江流域纳入经营范围了。

第八节 周人在朝歌故地分封卫国以监视商人旧部

前面分析到周王将三个最重要的大臣分封至山东丘陵两侧，以及燕山南麓，以消除来自北方以及东方的威胁。这从战略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正如周人所创立的“华夷五方格局”所论述的那样，对于已经确立了正统地位的周人来说，既然已经占据了天下的中心，那么势必要面对来自四面的边缘民族的挑战。下一个需要重视的方位很自然的是来自南方了。

就东、西两大部族争夺的重点来说，就是中间的平原地带。如果依河流的划分，我们可以将燕山以南直至长江的区域划分为三个亚平原地区。由北向南依次是海河



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主要平原示意图

平原、黄淮平原、江淮平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黄河的不稳定性，这三个平原的区域一直是在变动中的。就周代而言，黄河仍然走的是北线入渤海（禹河故道），也就是后来海河的海口。有一种看法是，这条路线实际上是分为两条相邻的支路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基本的地理划分。由于这个时期海河并不存在，因此称之为“前海河平原”应该

更为准确。这一区域属于商人故地，在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后，很自然的将这一地区分封给了自己的宗亲，燕国只是被分封在最北部罢了。在黄河的北岸，商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周人还分封了大批的姬姓封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占据了朝歌故地的卫国。

像卫国这么重要的位置，当然不能封给别人了。应该有人已经猜到了，这次被封的又是武王的弟弟。所以说周文王被传有 100 个儿子应该还是有道理的。就现在的情况看，就算没有 100 个，也有几十个了。有了这两个弟弟一南一北监视海河平原的商人故地，周人有理由感到安心。当然他们的任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燕国更关注的是来自辽河平原的威胁，而卫国则主要监视中原核心区的商人旧部。

第九节 周人在环太湖平原封建吴国以从南部包夹夷部

黄河以南直至淮河，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之为黄淮平原。不过在山东丘陵北侧有一条重要的河流还可以将之分为两个区域。这条河流就是济水，也叫大清河。是不是看着它的位置很眼熟？没错，现在的黄河就是走得这条路线。所以说黄河是一条性格多变的母亲河，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霸占周边那些小兄弟的家。谁让华北平原上的这些河流中，只有黄河的源头是来自青藏高原呢？且不说那些冰山融化所带来

的水量有多大，仅凭长度和高度所形成的势能，黄河也能在华北平原上傲视群雄。齐国最初的封地北界就在济水。不过周王既然把姜太公封在东夷的中心之地，就是想依靠他的军事能力去收服周边的夷族。因此齐国理想的北界会是在黄河之南，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东夷的拓展区来说，黄河与济水之间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地区。他们主要集中在山东丘陵以南的黄淮地区，以及淮河——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当然是在靠近沿海的区域。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北部地区（长江以北）。他们中最主要的部族被称作徐夷和淮夷，前者的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江苏徐州一带，也就是山东丘陵的南部，后者的位置则更南，直至长江。在大禹治水，将黄河水引入北线后，这一地区无疑是获得的稳定发展的机会。不过无论是夏朝或商朝，都没有真正征服这一地区。无论是通过战略威慑，还是武力入侵，最终所能达成的平衡都是这一区域的夷人部族名义上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罢了。

对于立志于将自己的血脉遍洒势力所达之区域的周人来说，山东丘陵至长江之间的这些独立的方国，当然并不会让他们感到舒服。姜太公之所以被授予征战四方的权力，最为主要战略目标就是这些东南部的夷部。相比于商人从中原核心区发起的远征，周人可以从中原核心区和山东丘陵两个方向同时施加地缘压力。这样做的胜算比之商人自然要大很多，不过这些战略目标要等齐国消化完山东丘陵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西周分封诸侯图》上，山东丘陵至长江一线的大片区域都是空白的。不过仅仅是从北面和西北面施加压力，显然是不够的。正如周人在燕山的南部建立姬姓的燕国，最终对黄河以北的商人旧地形成南北包夹的态势一样。周人也希望在长江沿岸寻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以完成同样的战略包围。很幸运，周人找到了，它就是吴国。

位于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平原，是我们所圈定的三个原始东夷基地之一，按理说并无可能成为周人的封地的。如果说燕国的封建得益于周人对商人的全面征服的话，那么在黄淮、江淮平原尚未征服的情况下，周人的势力似乎还难以到达长江以南地区。不过大规模的渗透固然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但并不代表不会就个体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以下吴国的背景资料为百度百科提供：

吴国——周朝时的一个诸侯国，姬姓，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后扩张到除徽州地区以外的苏皖两省全境。据史书记载，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太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

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太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

关于吴国的先祖是否真的这么高风亮节，亦或吴国的这位开国之君是否真是周武王的远房表弟，一直都有人表示怀疑。不过对于周人来说，这门亲戚算是认下来了。只是周人对于血统的远近还是很在乎的，吴国最终所给予的爵位是“子”，也就是公候伯子男中的倒数第二等（最低的男爵国据说只有二个）。尽管周人从理论上在长江以南封建了“吴国”这样一个同姓的诸侯国，但这并不足以改变环太湖平原地区的地缘属性。对于中原的华夏族来说，吴国始终还是一个化外之国。

而吴国对这种名义上的认亲行为也并不感冒，毕竟周人还未能将整个泛黄河流域纳入核心区。这种时候就想融合长江流域还为时过早。这种地缘上的距离使得吴国最终决定不买周王室的帐，而自己称王。这就使得吴国自认为在名义上获得了与周王室平起平坐的地位。吴国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孤例，它的冤家对头越国，以及江汉平原的楚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

第六章 楚国在江汉平原发展并受到周人的压制

第一节 楚人的族源与江汉平原的地缘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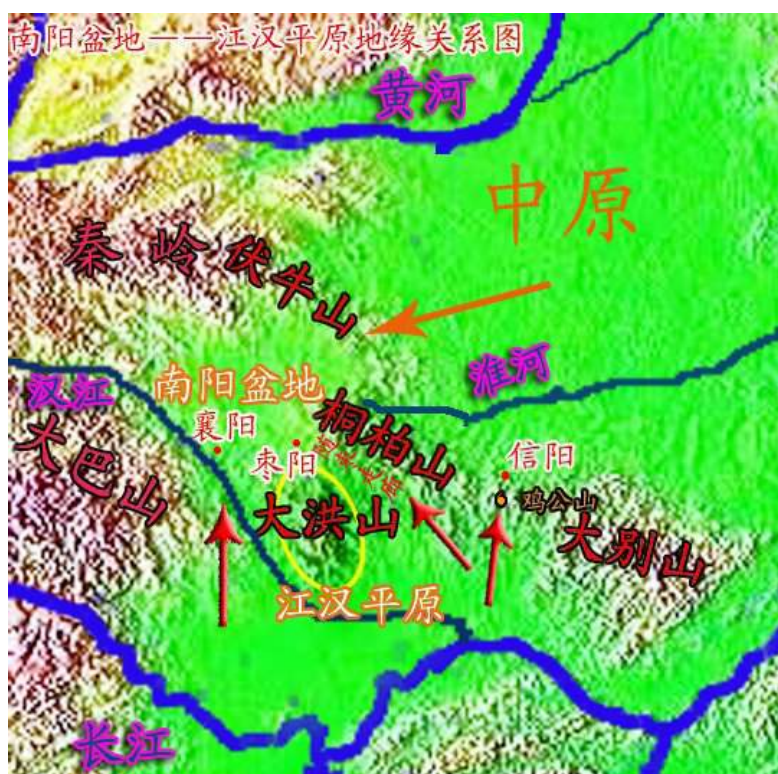
尽管周人所确立的原则为“华夷五方格局”，即东、南、西、北、中的格局。但事实上仅仅划定四个方位是不够的，因此才会有“四面八方”之说。对于周人来说，潜在的威胁不仅来自东南方，更是来自西南方。这一次出场的方国就是来自江汉平原的楚国。关于楚国的原始位置，我们可以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中看到。江汉平原就是楚人的根本所在。

关于楚人最初的族源（实际上也就是其上层贵族的族源），一般都认为是南迁的华夏族。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屈原在《离骚》中的那句“帝高阳之苗裔兮”，翻译过来也就是“我是古代帝王高阳的后代”。这里的“高阳”据传是黄帝的孙子。这种说法无疑也使得楚人获得了西部族群的出身。不过比之吴国来说，他们与周人的亲缘关系显然要更远。这种出身也可能是楚人自己附会上去的，为的是证明自己有比周人更为高贵的出身。无论楚人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周人显然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地理位置决定了在周人眼里，楚人是属于边缘的边缘。周人的目光还是主要集中在东部。

最终楚人所获得的爵位也是“子”。在楚人看来，这就是一种侮辱。特别是他有可能获得的战略纵深，比中原诸国加起来还是大得多的时候。楚人最终亦决定自行称“王”。由于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已经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将势力范围推进到淮河流域。因此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能只贴上“周”的标签，而应当将之称为“周王国”与“楚王国”共同的历史。

之前我们分析了渭河平原相对华北平原的地缘优势，通俗的说就是打出容易，你打进来难。在之前的历史中，基本上只有山东丘陵地区由于也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一为高度，二为海洋），可以与之对抗和争夺中原地区。之所以要争夺中原地区，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夺黄河边上那些松软的黄土地带。在青铜尚属于奢侈品的年代，能够用石制和木制工具开耕的黄土地对农耕民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化，只是最终取得文化主导权的黄土民族，暂时对那些难以开耕的粘土兴趣不大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华夏民族的记忆当中，很少有对长江文明的记载。

不过不被黄河文明所重视，并不代表长江流域就没有机会成为历史的主角。随



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地缘结构图

着金属的广泛运用，长江流域的那些冲积平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机遇。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平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而不同点则是前者位于长江以南，后者位于长江以北。环太湖平原的地理优势一目了然，长江就是它可以倚仗的天险。如果居于其上的族群不是那么有进取心的话，据险自保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而江汉平原的位置决定

了长江并不能成为它的保护者。它需要有其他地理优势以保障自己的独立性。否则这些因技术的提升而变得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土地，只会像华北平原一样成为其他地缘力量博弈的牺牲品。

仔细看地形图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这块平原提供了保护。这无疑提升了江汉平原的地缘力量，如果能够控制这些山脉，那么江汉平原就可以具备像渭河平原那样易守难攻的地缘力量了。当江汉平原的地缘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后，居于其上的楚人也开始表示出对于争霸中原的渴望。尽管周人最初勉强给予了楚国“子”的爵位，但这显然不能满足楚人的胃口。既然周人瞧不起楚人，那么楚人似乎也不再刻意的强调自己华夏族的出身了。

第二节 楚人自认为蛮夷与周人分封汉阳诸姬

对于周人来说，楚人所处的方位应该被冠以“蛮”的称号，以示与华夏族的区别。而楚人索性做得更彻底些，在蛮的后面再加上个“夷”字，即自认为“蛮夷”。并以此为据脱离周人的封建系统，自立为王。从地缘的角度看，楚人自认为“蛮夷”并非只是在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周人所确立的“华夷五方”原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那些边缘民族的方位来源。因此我们经常能够见到“夷狄”、“戎狄”、“蛮夷”的名称出现。

当然，古人在用词上是十分精准的。这种称呼只会出现在相邻的两个方位上，因为相邻的两个方位的民族很容易混杂在一起。而相对应的两个方位是不会连用的，就像你不会看到“蛮狄”的用法一样。而西“戎”与南“蛮”虽然在方位上相邻，但由于秦岭的阻隔，它们之间基本上不会发生交融。因此你也见不到“戎蛮”或“蛮戎”的用法。

对于楚人来说，从东部的“夷地”接收人口和文化显然是很有可能的。在炎黄时代的传说中，东夷的主力——蚩尤族在败给炎黄部落联盟后，就是败退至长江中游地区的。从地缘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那场战争是虚构的，东部文化也很有可能沿着淮河长江传至江汉平原，因此楚人具有综合性的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楚人是否决定称王，周人显然都已经意识到了江汉平原的威胁。周人所作出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封建”诸侯，封建的对像当然是同姓的诸侯。

如果周人想要监控楚人，将同姓的诸侯封建在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一线靠近中原的一侧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这就像如果仅仅在泰山以西封建“鲁”，而不在泰山以东再封建“齐”，就无法打破山东丘陵的地缘优势一样。周人需要超过这些明显的地理特征，将前沿阵地推进到江汉平原的边缘。周人最初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由此在汉水边上诞生了一批姬姓的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关于这些诸侯国的具体位置，一直是有些争论的。我们就从地缘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方位，以及能否对楚国进行有效的控制。

第三节 南阳盆地的地理结构

我们知道，楚国的根据地在江汉平原，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境内。“江”就是指长江，“汉”是指汉江。最早的时候“江”就是特指“长江”的，汉江是被称作“汉水”的。就汉水而言，它对中国地缘的影响并不止于江汉平原，其作用甚至要高于秦岭。不过就目前我们所要分析的方向而言，汉水的下游与长江共同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之前我们分析过，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它提供屏障，由北向南分别为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前者现在在河南省境内，后两者则为河南和湖北的分界线。不过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这三条山脉的西南侧，并非只有江汉平原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事实上这一地区是由两个南北相邻的地理单元共同构成的。南侧当然就是江汉平原了（目前属于湖北），北侧则被命名为“南阳盆地”（目前基本属河南）。

我们先来说说南阳盆地。既然称为盆地，那么它的四周应该是被山包围的了。让我们来看看南阳盆地边缘都有哪些山（山脉）。南阳盆地的西面是秦岭和大巴山脉的东部，北面、东面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伏牛山脉以及桐柏山脉西头。在盆地的南面有一个体量不是很大，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山——大洪山。这几个山（山脉）共同合围形成了南阳盆地。作为盆地，除却周围都是山以外，一般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盆地内部多为适合耕种的平原（东亚地区）；二是有良好的封闭性，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合适的道路与外界发生联系。



南阳盆地地理结构图

其实说到“南阳”，只要看过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主要是诸葛亮的名人效应。名人嘛，大家都喜欢，特别是在现在名人效应可以转变为经济效益的今天。为了争这个“最受群众喜爱的军师”，南阳和襄阳两地可是打了千年的嘴仗了。如果沿着历史的轨迹，我们还是有可能分析出诸葛亮是在哪里种地的。不过这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之所以先将这两个地名提出来，是因为他们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也就是都属于南阳盆地。所不同的是南阳位于南阳盆地北部，而襄阳则在盆地的南部边缘。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差别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战略定位。前者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成为的中原的政治力量向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扩张的战略要地。

不过南阳也好，襄阳也罢，都是要到秦汉以后出现的地理名称了。但这并不表示西周时的政治家们就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战略地位。名字嘛，只是一个符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地缘属性。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地理分割点叫做“大洪山”。比起周围几座山脉来说，大洪山的体量并不算大，被夹在大巴山脉与桐柏山脉的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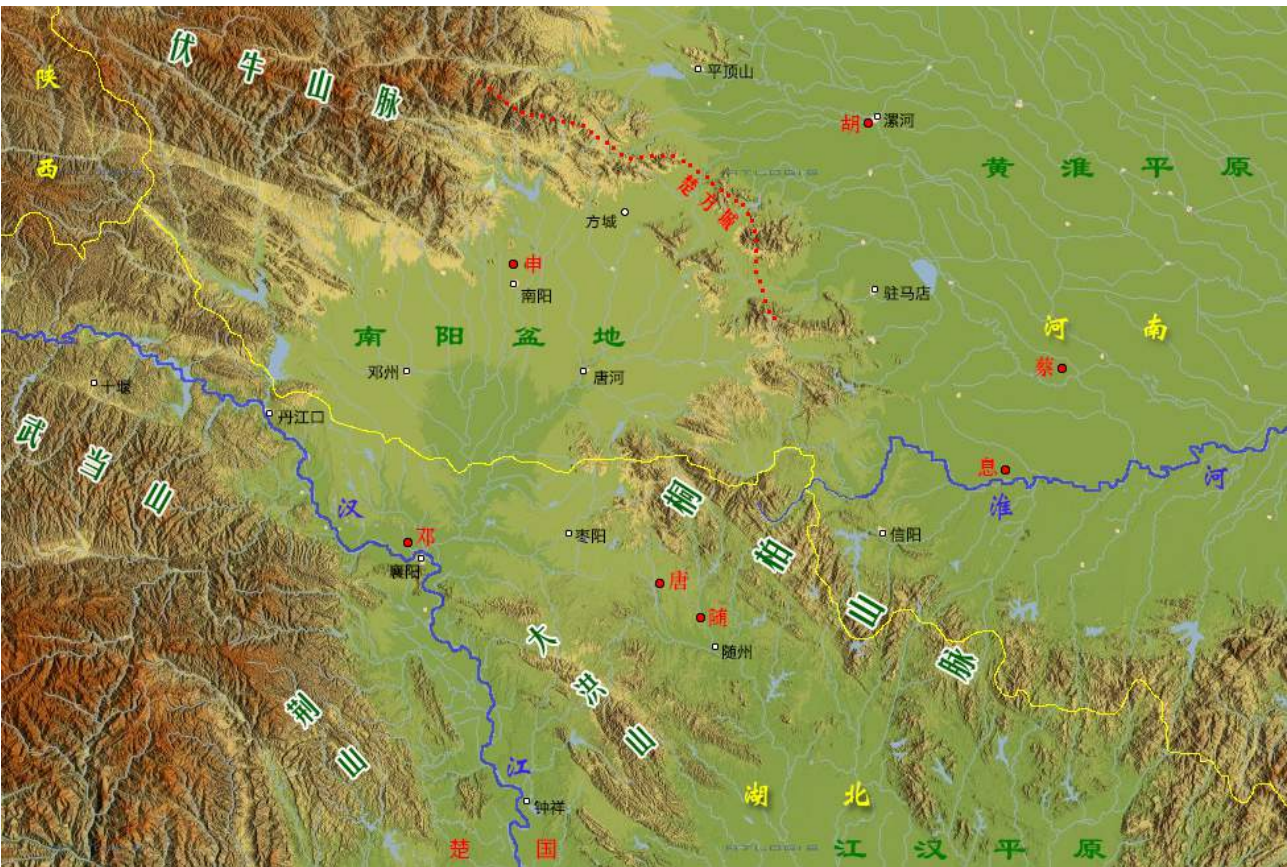
在具体解读大洪山的战略地位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说说大巴山脉。说到大巴山，重庆以外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地理学上的大巴山脉其实是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在地形图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东西向的走向（基本与秦岭平行）。不过古人可没有那么广的视角，他们习惯于为自己眼前的那段山命名。于是大巴山脉东头被分别细分为武当山和荆山。武当山对于男同胞来说，可谓如雷贯耳。在武侠小说中，那可是与少室山（嵩山的一部分，少林寺所在地）齐名的两大武林圣地。不过也许是习内家拳的原因吧，行事风格不似少林那么张扬。以至于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少林寺那些肥头大耳的大和尚招摇过市，却很少有人知道武当山是由哪位道长做掌门。

尽管武当山现在名气没有嵩山大，但还是相当有名的。这不光是金庸老先生的功劳，事实上它早就被那些崇尚道教的皇帝奉为圣地了。不过在道教还没有出现之前，对于楚人来说，位于它东南部的“荆山”更有资格被称为圣山。无论最初的楚人来自何方，荆山都是他们最初的根据地。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荆楚”之称。从这个“荆”字亦可想象楚国先民当日开这片处女地的艰难。对于生活在黄土地区的族群来说，这些布满荆棘，土质相对黏重的土地本来并不会被放在眼里。

第四节 周人在南阳盆地封建诸国以压制江汉平原的楚国

很多的民族最初都发源于山地，但最能吸引农耕民族目光的总是那些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楚人也不例外，荆山可以被作为祖地，但要想为族群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荆山东南部的江汉平原是不错的选择。好在商周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凭借这些利器，楚人得以从江汉平原种出足够的粮食。从农业技术角度看，最终帮助楚人奠定大国地位的并不是青铜工具在农业上的运用，率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铁器才是楚人的技术优势所在。在一个可以互通有无的空间中，技术的优势其实是不可能保有太久的。因此金属工具在农业方面最广泛的运用，是激发了江汉平原的潜力。从此江汉平原的农业实力至少可以与黄河流域的那些平原处于同样的级别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如果不能开耕，再大也没有用）。

对于江汉平原的这种潜力，周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对于这些以“华夏”自称的中原民族来说，边缘民族可以是顺服的臣民，也可以是危险的来源。这一切都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而现在江汉平原地缘潜力已经让周人感到不安了。无论周王是否给予楚国“侮辱性”的“子”爵位，这种威胁都会存在。周人的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将楚人压制在江汉平原，为此他们需要占据南阳盆地，并将之作为控制江汉平原的屏障。在最初的时候，周人无疑是成功的。在清除了南阳盆地的那些小部落后，周人成功的在此封建了一批姬姓的诸侯国（另外还有一些非周人系统，但同样来自黄土高坡的小国）。



南阳盆地示意图

但这并不代表楚人对南阳盆地没有欲望，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刚刚取得共主地位和大片土地的周人气势正盛。而楚人的战略纵深还未及向南方展开，并无实力与周人争夺南阳盆地。虽然南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它东面通往中原的道路还是较多的。这主要是由于伏牛山脉与桐伯山脉，在这里并没有严密的对接起来，双方之间仅仅依靠一些断续的丘陵相连。而这些丘陵之间就形成了多条道路，使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的地缘关系日趋紧密。

这一点从现今的行政区划也可以看出，对于夹在中原与江汉平原之间的南阳盆地来说，与任何一方划分在同一省份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最终的结果是，南阳盆

地大部分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而江汉平原所处的湖北省最终仅保有了南阳盆地的南部边缘（襄阳—枣阳一线，也就是大洪山的北部）。这一点从南阳盆地的地缘文化上来看是合理的，而地缘文化的形成又与地理结构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五节 南阳盆地通过方城夏道与中原沟通联系

关于连接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这些断续的丘陵，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概括一下，就是“方城夏道”。之所以被称为夏道，是因为据传在夏代之时，中原地区就已经探索出进入南阳盆地的道路了，这条道路就被称作“夏道”。其实所谓“夏道”并不止一条，凡在夏代开发的，从中原核心区辐射至边缘地区的道路都会被称之为夏道。只不过在这里是特指进入南阳盆地的道路。



河南 - 湖北地理关系图

关于夏道的具体位置，一直都有人在探究，但到现在也没有确定的结果。事实上将来应该也很难有很明确的结果。即使在《河南——湖北地理关系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比之那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栈道，在那个被我圈定为“方城夏道”区的区域中，有多个明显的山口可以通行。将之称为山口也许是不合适的

的，因为有的丘陵之间相隔有几十公里。因此要想考证出夏人究竟是走的哪条道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所谓夏道并不是单指一条道路。

由于这些丘陵之间的断口过大，过多，并不利于防守。因此楚人在最终夺取南阳盆地之后，不得不在此修筑长城，将那些土山连接起来用于防守。是的，你没有看错，楚人修的就是长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为了防守的需要，都会在边境附近依托地形修筑长城。秦人所整合的不过是北部防止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入侵的，那些靠近北方的六国之中所修的长城而已。楚人据信就是最早修筑长城的。

楚人所修筑的长城被称之为“方城”。由于后世以江汉平原为突出部的长江中

游地区，多将防线退至更容易防守的大洪山一线。因此在楚国之后，这条长城并没有被多加维护，至今已经难觅踪迹了。目前关于方城的具体位置有诸多探索，不过肯定是在我们在图上所圈定的“方城夏道”区域中。其源头很可能就是目前河南省的方城县。可以提供佐证的是自河南省焦作经洛阳、南阳、襄樊到湖北省枝城的“焦枝铁路”就是由中原通过方城县进入南阳盆地的。而拟修建的“郑渝铁路”（郑州到重庆），北线也曾经规划经过方城。在地理条件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现代人和古人在陆地上的选择并不会会有太大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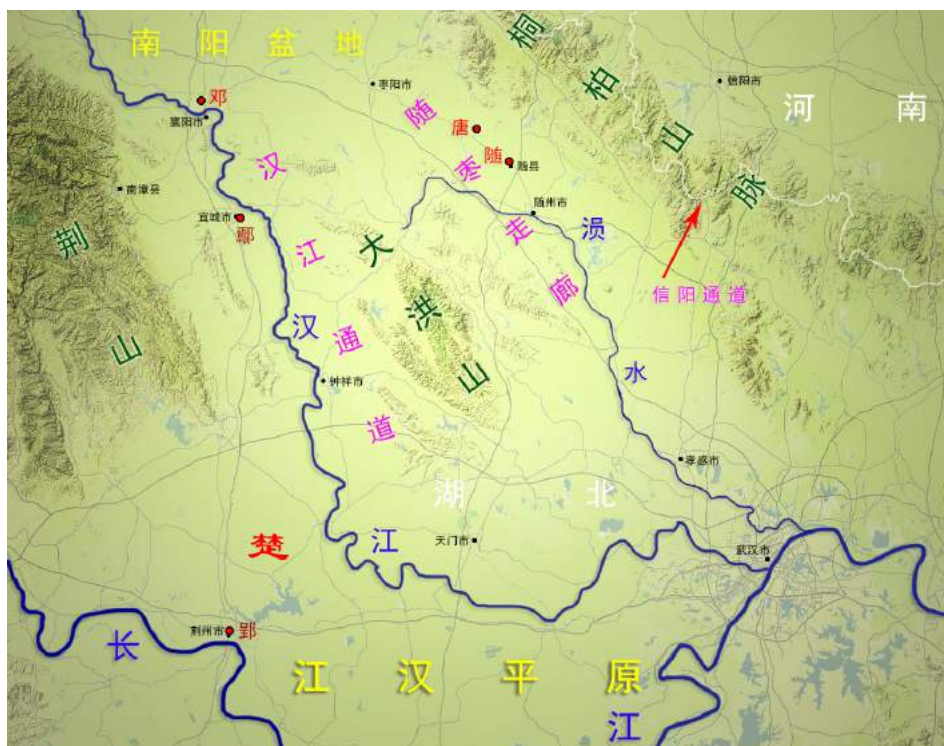
第六节 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沟通联系的通道

分析完了中原地区进入南阳盆地的路线后，接下来现在我们把视线暂时离开“方城夏道”，移向南阳盆地的南部。在那里有一座在中国并不算知名，但两边却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山脉——大洪山。说到大洪山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说到它旁边的襄阳却可以说是名动江湖。即使你不喜欢历史，也可以从金庸老先生的著作里知道这座历史名城。

如果说中原进入南阳盆地的路线，由于是经过一片断续的丘陵而变得难以控制的话，那么由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的路线则要简单得多了。在南阳盆地的南部，荆山——大洪山——桐柏山共同构成了南阳盆地的南部边缘。而进出南阳盆地的道路就是沿着这三条山脉包夹而成的两条通道而修筑的。我们曾经说过，山脉的两侧一般都有河流通过，而这些河流两侧往往能够提供天然的通道。大洪山两侧也不例外，在大洪山的西侧是那条著名的“汉江”（古称汉水）。这条江是如此的知名，以至于在几千里以外的朝鲜半岛也有一条同样名字的江。当然，从韩国人的角度来看，应当能够找到证据证明是他们最先使用这个名称的。

汉水所影响的区域决不仅仅是大洪山和下游的江汉平原，对于这条发源于米仓山（大巴山脉的西头）的大江来说，在今后的章节中我们还将重点分析它的上游地区。对于大洪山来说，从它分水岭上流下来的雨水，最多只是通过支流为汉水提供一些补充罢了。因此提到这条通道，汉水远比大洪山更有资格成为地标。而在大洪山的北麓，汉水的南岸，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也成就了襄阳城，并使其无数次成为了长江防线的前沿阵地。

不过大洪山也不是没有孕育出属于自己的河流，在它的东侧有一条被称作“沮水”的河流，是汉水东面最大的支流。只是熟悉沮水的人更多的只是知道它所流经的那些地区。沮水本身的名气虽然不大，但它所流经的地区却有几个知名度颇高的



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示意图



曾侯乙编钟

做“随枣走廊”。

关于随州和随国，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不过提到“曾侯乙编钟”，那不知道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名字叫“乙”的姬姓贵族，尽管在当年只是一个不入史籍的小封建主，但他的墓地所出土的文物却还是震惊了全世界（由此可以想见那些大诸侯国的盛况）。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疑惑的是，既然“乙”被称为曾侯，那么他的国家就应当叫作“曾国”了。而根据史书记载这里应当是随国的所在地。因此随国与曾国很可能是同一个国家。在周代，封国的名称是有可能变化的（晋和燕都有这种情况）。提出“曾侯乙”来只是为以加深大家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印象，并非在考证历史。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它的地缘属性。

城市。特别是上游所流经的随州。在我们所讲述的这段历史中，随州是被一个叫做“随国”的封国所占据的。在周人所封建的“汉阳诸姬”中，随国是最主要的国家。它也牢牢的占据了大洪山东面的这条通道，是作为监控楚国的前哨。在随州的北部，大洪山的东北部，有一个大体与襄阳平行的城市叫做枣阳。如果说襄阳所扼守的是大洪山西侧通道，那么枣阳则控制的是大洪山东侧通道的入口。而这条通道就被叫

之前曾经说过，在地形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今人与古人在陆地上的选择并不会会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大洪山的西侧，与汉水相邻有一条连接襄樊（襄阳现与汉水北岸的樊城合并为襄樊市）——荆门铁路线和主要公路通过；而在东侧，枣阳——随州——云梦，直至孝感一线成为了另一条铁路线和主要公路的通道。

第七节 江汉平原地区经信阳通道沟通淮河流域

细心观察地图的朋友肯定已经发现了，在这沟通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以东，还有一条类似的通道。不过它的形成与大洪山无关，桐柏山与大别山的连接处才是这条通道的焦点所在。

之前我们已经对南阳盆地的地缘结构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了。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的笔墨在这个盆地上，是因为这个盆地的战略地位太过重要了。就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而言，它是位于中原地区和江汉平原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周初，周王为了压



鸡公山风光



武胜关风光

制江汉平原的兴起，将南阳盆地的零星部落征服后，分封了诸多的姬姓王国，谓之“汉阳诸姬”。随着楚国的兴起，除了占据“随枣走廊”的随国以外，南阳盆地已为楚国所据有。随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主要是因为选择了依附于楚国。也许作为一些热衷于武力扩张的人来说，这一点无法理解。不过事实是，无论在古典时期还是现在，将一个地区直接纳为国土，并不会是控制这一地区的唯一选择。

对于楚人来说，通过大洪山——南阳盆地——方城夏道进入中原地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在他们有实力问鼎

中原后。这条通道可以让他们快速进入中原核心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江汉平原，楚人还拥有一条进入淮河流域的通道。这条通道就位于桐柏山脉与大别山脉的接口处。如果你曾经坐过京广铁路列车的话，在经过河南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之后，就会在一个叫“信阳”的地方看见山的影子，那里有座山叫“鸡公山”。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大别山脉与桐柏山脉的交汇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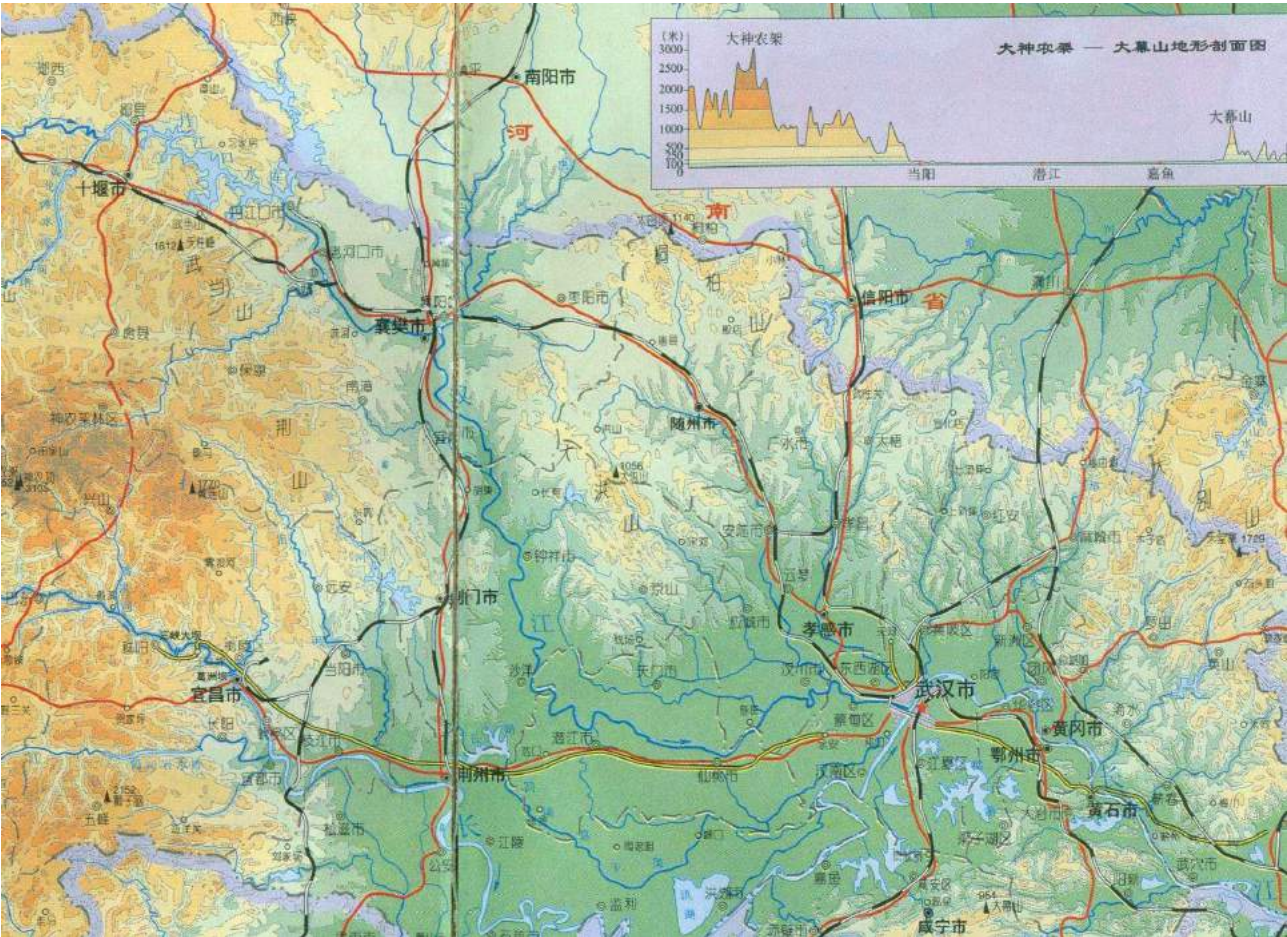


江汉平原与外部的联系通道

在选择陆地道路上，今天和古人的区别并不大。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可以选择从山下挖通隧道前行，而古人则往往需要依地形选择可以通行的山口。当然，这种山口便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出于防守还是进攻的需要，占据了山口的一方都会选择筑一道关城来控制山口两端的交通线。如果地形险要，工程量其实并不会很大。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筑关的地点往往并不是唯一的，因为这类山口都会有一定的长度，而且并不会是一条标准的直线，你可以依地形选择合适的地方筑关，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多筑几道。这样就相当于加上了几道保险。

我们并不十分确定楚人当时在信阳地区筑了几道城，可以确认的是在南北朝之后这里东西向筑了三道关，合称“义阳三关”（信阳古称义阳）。中间的那道关口叫做“武胜关”，是最为主要的关口，即使在现今的地图上也基本会作个标注。关于信阳通道的战略作用，在后面会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对于周初的楚人来说，如何

应对来自南阳盆地的地缘压力才是最为主要的。不过能够被周人当成对手，并花下大力气在地缘上进行布局，足以证明江汉平原已经有资格成为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之一。尽管楚人更愿意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周人封建系统之外的独立王国，并因此而具备有称“王”的资格。但对于同属于黄帝后裔的两大族群来说，这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湖北省地形图

第七章 秦国从陇西向关中发展的历程

第一节 秦非子因对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

在之前的章节当中，我们一直都将视线集中在渭河平原以东地区。这并非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因为东西两大部族的争夺焦点，在黄土高原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平原地区（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那些在古典时期被定义为边缘地区的地方（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地区、西域），这个时候好像被隐身了一样。事实上那些边缘地区同样也在发生属于自己的故事。只是由于技术的原因，他们暂时还无法和东亚核心地区的“农耕文明区”发生正面的对抗。

不过这一切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空中将有机会得到改变，而技术力量之源就是一种动物——马。关于马被人类驯化的时间一般被认定为是 4000 年前，不过最先做到这点的并不是亚洲人。欧洲的游牧民族要更早拥有这种机动力量。商人是我们已知的最早使用马匹的东亚民族。当然，在他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马”都是和“车”组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了力量的标志。能够战胜武力强大的“商人”，周人显然也具备了使用马车的技术力量。在整个古典时期，能够多大程度上得到“马”的帮助，甚至会成为一个帝国成败的关键。

我们并无法精确统计出，在后世当中，“马”曾经多少次成为了“关键先生”。但最早“借马成事”的殊荣应当被授予一个叫“秦非子”的人。与其他被分封的诸侯相比，“秦非子”的出身显得并不那么高贵。与那些“姬”姓贵族继承了高贵的血统相比，他继承的则是祖传的养马之术。在马的作用日益重大的时候，这种本领还是足以获得周王的赏识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会造火箭的专家）。不过在重视血统的周人看来，养马的本领再大，也不能为秦非子带来一个“诸侯”的封号。于是秦非子被封为“附庸”。

这并非是一个正式的爵位，正式的爵位有五等，即“公、侯、伯、子、男”。能够获得正式爵位的贵族，他所获得的封地也就有了诸侯国的地位。而所谓“附庸”，则指的是依附于这些诸侯国的卫星国，如果他们的领地也能称之为“国”的话。“附庸”的称号一般是授予那些被征服地中，臣服于周人统治的部落的。不过对于一个养马的人来说，能够获得一个这样一个称号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荣耀。后来的历史证明，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获得的土地在哪里。像一般的“附庸”之国一样，秦非子所获得的土地就是他所熟悉的土地，也就是他放马的地方。

这块土地位于渭河平原的西侧，或者说是渭河的上游地区。由于秦非子被封于此，因此也被称之为“秦地”。单纯从地图上来看，同属于渭河流域的秦地与关中地区（渭河平原），似乎地缘关系紧密。或者说两地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很方便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秦地（也就是“陇右”地区）与关中地区中间间隔了一条南北向的山脉，我们称之为“六盘山”。这条山脉与渭河平原南部的秦岭整体呈丁字形相交。而渭河就是这两条山脉的分割线。

第二节 秦人被周王室初封在陇右地区

由于六盘山的分割，关中地区与陇右地区足以形成不同的地缘文化了。这在西周时期则表现为，关中地区以农业为主，陇右地区以牧业为主。无论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方式有何不同，他们肯定是存在沟通的渠道的，要不然秦非子也没有机会为周王效命了。按照一般的情况，渭河两侧应当会存在天然的沟通路径。也就是说从陇右地区到关中地区，可以延着渭河东行，很方便的进行往来。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次渭河本身并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陇右——关中地缘关系示意图

在解读陇右与关中平原的沟通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解释一下“陇”的来历。“陇”地之所以称之为“陇”，得名于陇山。而所谓陇山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六盘山”。中国古代有“东为左，西为右”的说法，因此陇山以西地区也就被称作“陇右”。在后世“陇右”的概念被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一线。而实际上，陇右的核心地区只在陇山的西侧，渭河上游的“天水”是它的中心。我们在地形图上可以看见一个以

天水为中心的椭圆形地区，地形要比周边地区略低。这就是最初的陇右，也就是秦人最早生活的地方。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在周人封建之时，各地并没有足够的人口将每一寸空间填满。换言之，那些被封建的诸侯，更多的只是在封建之地筑一个城，然后开始逐渐消化周边的部族。事实上即使是在渭河平原，周人也并不是唯一的部族。那些被周人视为戎狄的边缘民族往往就杂居在周围。所谓华夏与之的区别往往并不是种族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或者说周人自视在文化上处于中心的位置罢了。秦非子最初被封建的地方也只是在陇右的一个点上，具体而言是在甘肃的清水县。当然，后来他们凭借实力，将整个陇右地区消化为“秦地”了。



天水渭河峡谷

对于身处陇山西面的秦人来说，如果不能直接与渭河平原上的周人沟通，那么他们养马的技术再高，也不可能受到周王的赏识的。按照一般理解，陇右与关中地区完全可以通过渭河进行沟通（天水——宝鸡）。但事实上这条通道艰险无比，一直到 1976 年，天水人才修通了第一条公路。而在整个古典时期，陇右与关中地区的沟通需要另辟蹊径。

第三节 陇右地区经泾河河谷和关陇古道沟通关中地区

既然渭水并不能为两地提供天然的通道，那么我们只有顺着陇山（六盘山）北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河流能够冲开一条天然的道路。幸运的是整个陇山地区并非

只有一条河流。在它的北部，有一条和渭水齐名的河流——“泾水”亦流经此处。我们常用“泾渭分明”一词来形容两件事物的不同。这句成语最初的来历则是源于泾水与渭水。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南北向的泾水应该是东西向的渭水的支流。泾水清，而渭水浊。当泾水与渭水在关中平原上交汇在一起时，便形成了清浊分明的奇观。也就是说你会看见渭河一半是清的，一半是混的。

渭水之所以浊，原因其实和黄河一样，主要是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特别是它的上游地区所也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因此整条河流的含沙量都比较大（下游尤甚）。而泾水显然要幸运得多，尽管我们认定泾河的发源地有两支，但这两支源头都在六盘山东侧。而六盘山的植被覆盖情况显然要比黄土高原其他地区要好得多。险峻的山势让它得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人类的过渡开发，这也使得泾水能够成为一条清水河。在这里解读泾、渭两河的源头并非是想为生态环境的研究做些贡献。只是想说明一下沿着泾河北行，能够为关中地区通往陇山以西找到两条道路。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两条道路最终都成为了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陇右——关中地缘关系示意图

不过在秦人为周王牧马的时候，泾河所冲开的这两条道路显然太远。秦人需要一条属于自己的快速通道，以用最少时间到达关中地区。秦人所找到的这条通道，离渭河并不太远。后世将之命名为“关陇大道”或“关陇古道”。按现在的行政区划，

它的位置在甘肃的张家川县与陕西的陇县之间。在整个古典时期它都是沟通关中与陇右地区的快速通道。不过现在大家已经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它了，因为技术的提升，已经让我们可以通过渭河峡谷，直接将关、陇地连接在一起了。关于“关陇古道”的战略作用，在今后的章节中我们会多有涉及，特别是在大家所无限向往的三国时代，它更会是一个关键地区。



关山草原

不过秦人当初发现这条通道时并没有想太多，因为这条横跨陇山的通道实际上是一片优良的牧场。这片位于山地的草原为秦人的养马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这一段陇山也被称之为“关山”，因为这片山地牧场也被称之为“关山草原”。我并不十分确定《寻秦记》中为秦王养马的乌家牧场是否指的是“关山草原”。不过从黄易老先生的描述当中，依稀能够看得出秦非子当年的影子。所不同的是，秦人已经由养马者变成了马的主人了。如果乌家牧场是关山草原，那么项少龙他们最终能够通过雅夫人墓中的通道，逃离来自渭河平原上的追杀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关山草原本身就处在沟通关中与陇右的通道之上，有一条小路能够绕过秦军的关卡退入陇右地区并非绝无可能。

鉴于关陇古道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能够打动周王重用秦非子的理由显然并不仅仅是他高超的养马技术。拉拢这样一个人才，并将之放置在陇山以西。不仅可以为周王获得足够的马匹，亦可以为关中地区阻挡住来自西面的威胁。按照周人所制定的“华夷五方”原则，西面那些不接受华夏文化的部族被称之为“戎”。对于将

渭河平原视为根据地的周人来说，这种思路并没有问题。事实上秦人也忠实的履行着自己的义务。问题是周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翻越陇山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相比于关陇古道的艰险，泾河所造就的两条通道要更容易通行。

对于秦非子而言，能够被封为附庸应该感到知足了。不过如果他知道他的后代将创出一番怎样的伟业，那他应该显得更加有抱负些。不过能否把握住历史的机遇并不在于你是否能够预知未来。作为周人的臣子，能够做好本分就足够了。秦人最终获得了一次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忠心，而那次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最起码它让秦人终于有机会参与到核心政治圈。

第四节 秦人获周王室允许进入汧渭之会放牧

对于秦人来说，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对于周人的价值所在。因此他们一方面为周人牧马，另一方面在陇右地区为周人清除潜在的威胁。这实际上也是为他们自己拓展生存空间。在开始的时候，秦人在陇右的开拓行为并不十分顺利。不过用不了多久，他们的战略方向就会有所转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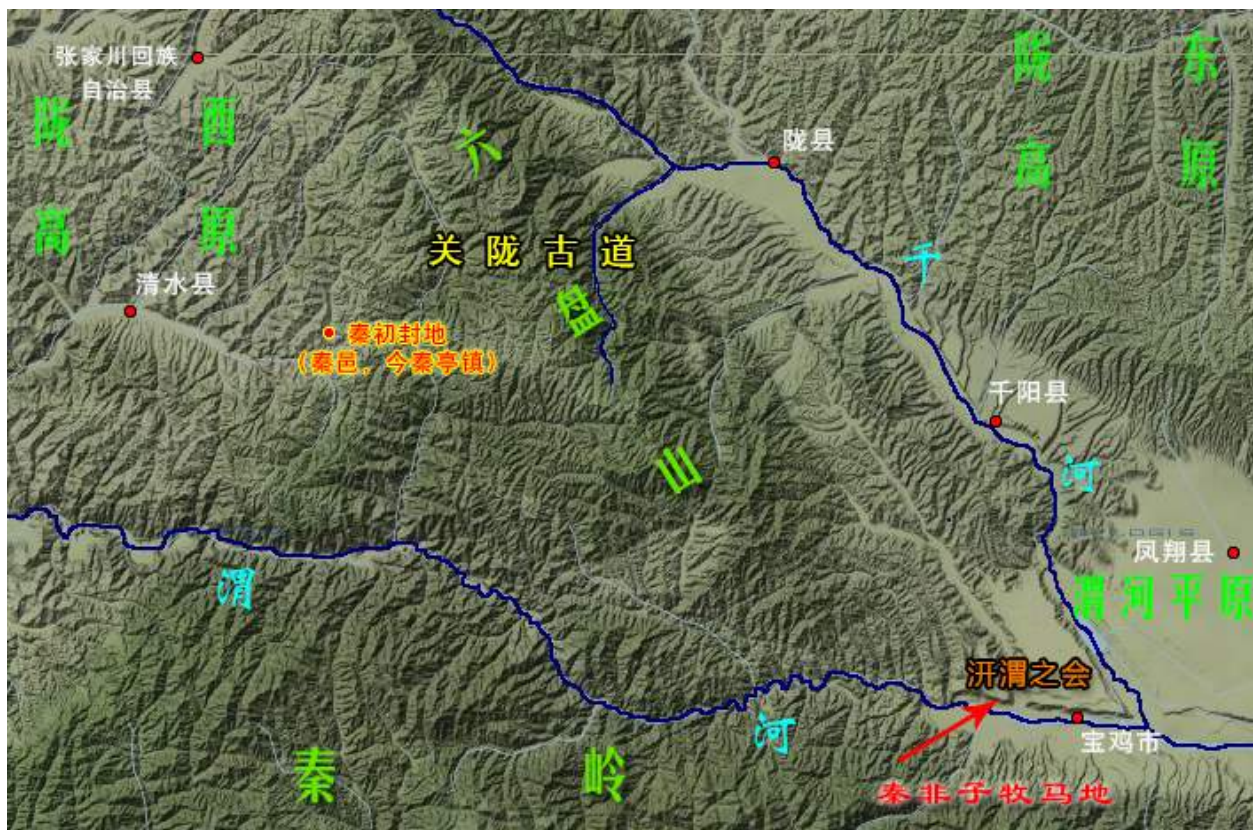
之前我们说到，秦人由于掌控了陇山南部的关山草场，也因此掌握了关中与陇右的交通要道。仅就这一点，周人将之收为己用也就十分有必要了。秦人也用自己的另一项本领——牧马赢得了周王的青睐。秦人因此而得到的奖赏有二，一是在陇右的聚落地被周王正式承认了（附庸的政治地位）。这块封地就是关陇古道的西南部，现在归属甘肃的清水县秦亭镇。当时由于是封给秦非子的，所以被称之为“秦邑”。

如果说这个封赏只是将秦人既成的事实“合法”化的话（周人之法），那么后一个奖赏则对秦人来说更具有战略意义。那就是秦人获得了进入渭河平原的资格。要知道，由于周人将自己的王都设在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因此整个渭河平原都被分封给了姬姓的贵族。就是说在周人的观念中，血浓于水。这些姬姓贵族所建立的诸侯国才是京师最为有力的安全保障。

秦人之所以能够进入渭河平原并非是他们获得了诸侯的地位，并就此在渭河平原得到了封地。而是周王需要他们就近为王朝放牧马匹。这个地点被选在了渭河的最西侧，古称“汧渭之会”，也就是妍水与渭水的交汇之处。关于渭水的位置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过对于汧水来说，很多人就不清楚它在哪里了。其实这也难怪，因为这条对秦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河流现在叫“千河”了。这条发源于陇山东麓的河流并不长，在离开陇山之后就南行与渭水相交。

一般而言，两河相交所形成的三角洲地区都比较肥沃，在长江以南地区，是用

来种植水稻的好地方。而在北方地区，这种三角洲很多时候则因为水草肥美，而成为牧业发达的地区。“汧渭之会”显然是一个为周王牧马的好地方。一方面是因为它水草肥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处在渭河平原的最西面，不会对镐京的战略安全造成大的影响。更何況它的西面还有姬姓封国据守的要害之地。



汧渭之会示意图

对于秦人来说，千河还有更深的意义。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每当我们要在山脉当中寻找合适的道路时，往往会沿着河流上行，这样一般总会有所发现。也就是说河流与道路很多时候是并存的。这一规律对于秦人所据有的“关陇古道”（有时也被称作“陇关古道”）来说同样成立。这条沟通关陇的通道在陇山的东侧正是沿着千河谷地进入渭河平原的。

关于古人为什么总是选择河流两侧作为通行的道路需要解释一下。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一是因为河流的水量并不一定是恒定的，因此在河的两侧很多时候会冲出天然的道路。即使河流的两侧是悬崖峭壁，没有道路可以通行，古人也可以沿着两侧的崖壁开凿石洞，插上支撑点，铺上木板形成道路。这也就是所谓的“栈道”（这是极端的情况，一般而言不需要）。另一个原因则是“水”的问题。无论是迁徙还是定居，人类都离不开水。而延着河流前行则可以随时补充淡水。因此你在今后的章节中会看到，在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并不存在天然的障碍，也就是说完全可以选择最短的距离。但实际上还是会走一些“弯路”，这就是因为水的原因。

在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周王让秦非子为之牧马的区域就是陇山——千河——渭河所形成的三角形地区。如果你对这一概念仍然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任何一张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到的宝鸡市就是这个三角地带的所在处。如果说陇右地区是秦人的第一故乡的话，那么宝鸡所在的千河以西地区则可以称之为秦人的第二故乡了。事实上，人是可以有多个故乡的，只要你或你的先人在那个地方呆的时间足够长。秦人也马上有机会将“故乡”的概念再向东推移了。

第五节 周人面临陇东高原上犬戎的地缘压力

最终改变秦人命运的事件跟一个著名的典故有关，相信在坐的每一位都从小听过这个故事。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司马砸缸”之类的正面教材，而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而存在于世的。尽管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向他学习的可能性，这个典故就是——烽火戏诸侯。关于“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其实这一类的故事都差不多，总之在这类故事中，历代皇朝（王朝）基本上都是“被亡于”美女的枕头，而不是敌人的拳头之上的。

在这里，我并无意于深入探讨弗洛伊德的“性欲论”是否有道理。因为这样有可能最终推导出，某位公公谋朝篡位的合理性（前提是他从生理到心理上对于异性没感觉）。地缘关系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在这出大戏当中各方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又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我们都需要关注，只有某一事件的发生足以改变某一时期的地缘关系时，我们才需要做详细分析。而周幽王所导演的这出大戏显然符合这个要求。

在周幽王决定讨好他那位新娶的美人之时，周人正面临着北方戎族强大的地缘压力。事实上这种压力并不是第一天存在了。就像秦人有第一故乡、第二故乡一样，周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定居于“泾渭”相交的镐京王城的。最初他们所生存的区域是在泾水的中游，一个被称作“豳”的地方，现在则属于陕西彬县境内。这些名词可能会让很多朋友感到陌生，其实不记也罢。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我提供的这张《秦周地缘关系示意图》上就可以了。

和其他的水系一样，东西向的渭水也有很多的支流，其中最大的两条就是南北向的泾水和洛水。这两条河流又和它们的众多支流在渭河北部的高地上形成了各自的水系。并因此而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中的分水岭叫作“子午岭”。请注意，这与三国时魏延所希望出奇兵的“子午谷”不是一回事，后者在秦岭之上。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条小山岭排列得中规中矩，以至于跟“本初子午线”平

行了。

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所分割开的两个地理单元。如果依它们的方位来命名的话，我们可以称陇山——子午岭中间的高地，也就是泾水流域为“陇东高原”；而子午岭——黄河之间的区域为“陕北高原”。单从这两个名字你也可以看出，前者和陇右高原一样被划归为甘肃的一部分（甘肃亦可简称为陇）；而后者则与渭河平原一起成为陕西的一部分。



秦周地缘关系图

看过地图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要从西、北两侧威胁渭河平原的安全，那就有三种地缘上的选择。一是从陇右出“关陇古道”，沿千河河谷南行进入渭河平原；二是从陇东高原沿泾河河谷南行，进入渭河腹地；第三条路则是从陕北高原南行沿洛河河谷南行，同样可以进入渭河腹地（北洛河，与河洛地区的不是一条）。这三条路线是主要的路线。当然你也可以在周边的支流上变换一下行走的轨迹，但大的方向不会有太多变换。

第六节 犬戎将周人赶入渭河平原后占据陇东高原

对于周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无疑是来自于陇东高原上的犬戎部落。与农耕民族不同，已经进入游牧阶段的“犬戎”部落喜欢在高原上自由驰骋。这也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爱好。并不是没有游牧民族进入平原地区，秦人和周人最初很可能也是以牧业为生的。只是各游牧部落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后，基本都会转变为更有前途的农耕一族了。因此和农耕民族习惯于把边缘民族往山上赶不同，周人的祖先被从泾河上

游而来犬戎部落赶下了山，进入了渭河平原地区。

这一赶反倒成全了周人，因为种植业显然比游牧更容易获得足够的食物，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周人很快在渭河平原的北部崛起，成为了关中地区的主人。需要注意的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周人仍然保留着对山的依恋。因此他们先选择了在陇东高原的南缘扎根，由于所靠之山有两个岐角伸出，因此也就被称作岐山了。而岐山南面的平原就被称之为“周原”了。

选择靠山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选择，只是无论是从风水或者军事的角度来说，将聚落之地建于山南水北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尤其是当你的地缘压力来自于北方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居住在水的南面，背后靠山。这样一方面可以据河以缓冲敌方的进攻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依靠背后高山提供预警。于是周人决定再一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把根据地搬到了渭河平原的中心，也就是泾水与渭水相交处。准确的说是在渭水以南，秦岭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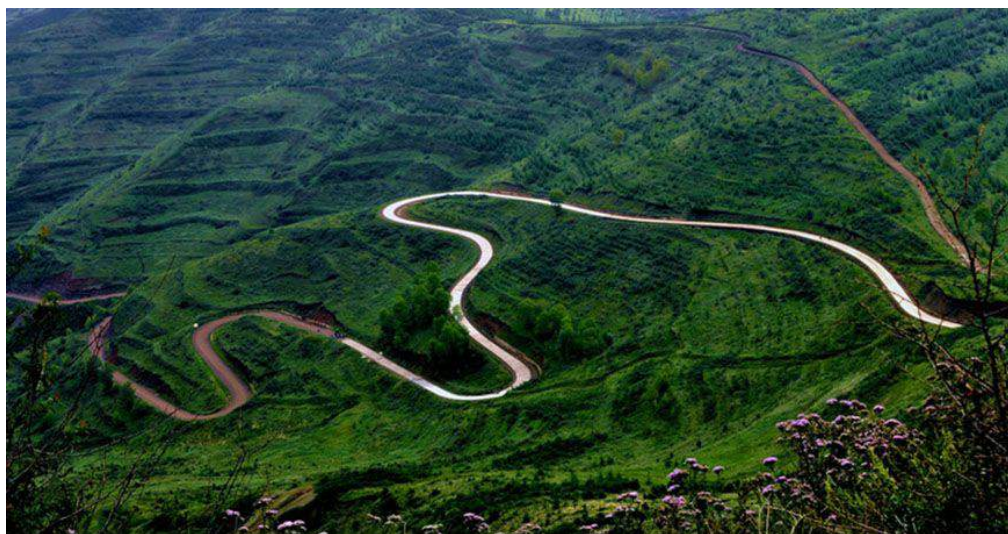
周和犬戎地缘关系图

除了符合上述条件之外，周人决定建都之处（镐京）还有一个地理上的优势。那就是在它的东面，秦岭伸出了一个南北向的小分支。尽管体量不大，但足以保卫王都东侧的安全了。这个南北向的小山就是骊山，在今后的很多历史事件中，这座体量不大的小山都会有着突出的表现。最后一次的突出表现是在1936年12月12日，当时它成为了蒋委员长最后的避难所。当时光推进到周幽王时代时，骊山的作用就

变成了放烽火了。

关于犬戎的来历，我们需要先交待一下。在将周人赶下山之后，犬戎占据了泾河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成为了陇东高原的主人。而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是从陇山以西而来的。如果按照方位来说，也可以称之为陇右地区。不过这与以天水为中心的陇右核心地区还是有所区别的。犬戎部落跨越陇山的通道应该是泾河通道，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在泾河通道的西侧，也就是陇山以西有一个叫“威戎镇”（甘肃静宁县）的地方，据考证有可能是犬戎之都。我并没有办法去深入考证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但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是符合地缘规律的。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泾河在靠近陇山处被分为两支。这两支都有通向陇西的道路。因此戎人走哪支都有可能。而这两条道路最终为华夏族所充分利用则要等到汉朝开通丝绸之路的时候了。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即六盘山、陇山、关山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实际上指的是同一条山脉，但所包含的范围有所不同。在古代，这条南北向，跨越宁夏、甘肃、陕西三省的山脉整体被称之为“陇山”。而它的北部，也就是



六盘山

泾河那两个源头中间的山峰则被叫作“六盘山”。这主要是因为通过这个山峰的道路要盘山六次方能通过。在后世的公路建设中，盘山公路也被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虽然有些绕，但坡度相对较缓，反利于大部队通行。

只是这种盘法，看上去是极为险峻的

（我小时候坐车走盘山公路时是不敢睁眼的）。因此当年毛泽东在过六盘山时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陇山的古称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六盘山成为了整条山脉的代名词。由于我们是以历史为线解读地缘，因此在今后的章节中还是会用古称。如提到六盘山，则指的是泾河通道处的六盘山主峰。而在古代，关陇古道段的陇山又被称作“关山”。其名则取自山上有关口。

无论如何山路总是难走的，尽管毛泽东走过了六盘山，惊叹于它的险峻。但对于古人来说，关山的名声显然要更大些。叹其艰险的诗句也是层出不穷。六盘山和关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不过如果你喜欢看武侠小说的话，那么崆峒山一定看到过。在泾河开始分为两支时（或者说两源合一处）有一个地方叫“平凉”，崆峒山就在那里，泾河就是从山下流过。也许是因为崆峒山自古常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吧。它在武侠小说中的名声好像并不好。崆峒派的武功也总是显得不那么正，典型的代表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七伤拳”。

第七节 镐京在西周封国勤王军队到来前被犬戎攻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小时候听到“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时总有个疑虑。因为根据中学历史的介绍，周人的统治范围已经很大了。如果通过烽火来通知四方的诸侯来勤王，时间不知要多久（如山东半岛的“齐国”）。很有可能人还没到，镐京就不保了。另外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是，如果时间要很久，那位名叫褒姒的美人是否等得了，而且路途不同的诸侯到的时间也会不同，前后差一个月都有可能。能否达到所希望的视觉效果还是一个问题。不过当我们仔细研究周人的地缘布局之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首先，在周人的封建制度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护卫王城的义务的。比如山东半岛的齐国，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征伐“东夷”。对于周人来说，拱卫京师的任务是由那些在王城周边同属于一个地缘区域的封国来完成的。我们可以测量出镐京距离东西两侧最远的“虢”国和“郑”国之间的距离，前者是149公里，后者则是113公里。如果以马车的速度来看，加上中间休息的时间，一天一夜应当是足够了。这样周幽王在前一天点燃烽火，在第二天算好时间，带着美人登高阅兵也就有可能了。关于烽火最初的点燃地点，无疑是在王城东面的骊山之上。传递的路线有可能是南面秦岭边缘上的那些小的突出部上。

100 多公里的距离，对于有马车代步的诸侯们来说，应该也不算太远。问题是

这种狼来了的游戏做多了，大家自然也没有兴趣再玩下去了。因此越到后面，来的人越少也就情有可缘了。只是有一支队伍，却总是会及时赶到，那就是秦人。当那些姬姓贵族都已经不再相信狼会真的来时，秦人仍然忠实的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尽管他们只是附庸，还够不上保卫王城的级别。尽管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养马，如果不来也不至于有罪。也尽管他们的距离最远，甚至有可能要从陇右出发，翻越陇山。唯一有利于秦人的因素是他们应当有最好的马。



犬戎破周·主要诸侯地缘关系图

我们无法具体考证秦人是否及时赶到到镐京。更有可能的是当他们到达时，犬戎已经将镐京劫掠一空，包括那位美人。在这一点上，犬戎做的和他们的大多数后来者一样，抢完了就走，决不留恋平原的生活。因此秦人的忠勇更多的表现在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事实上即使没有犬戎的这次的全面入侵，周人也已经准备将政治中心转移到河洛地区了，他们已经将洛邑定为了东都(也就是后来的洛阳)。可以提供佐证的是“虢”、“郑”两国已经先期在河洛地区选好新的国址了。

第八节 周王室决定东迁洛邑及由此带来的利弊

周人之所以准备将政治中心转移到河洛地区，一是因为犬戎所造成的地缘压力过大，必须有个更安全的地方作备选方案；二是周人已经成为了中原之主，必须将政治中心(最起码是一部分)移至河洛地区，方能统治天下。不过在周人的规划当中，两京制度应当是首选的(包括那些拱卫王城的封国也是一分为二的)，毕竟渭河平原作为祖地是很难割舍的。在后世的汉唐时期，这种模式也被沿袭下来了。

对于周王来说，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固然是好的。不过犬戎的这次入侵改变了贵族们的想法。将政治中心完整的迁入河洛地区，远离这些野蛮之人才是最为安全的。当周平王和他们姬姓贵族们决定迁都至洛邑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东周被开启了。不过它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远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

周人决定东迁至河洛地区从战略上来看是正确的。因为作为天下的共主，只有将政治中心设在中原核心区，才能够将影响力更为有效的辐射至各边缘地区。从这一点上看，周人似乎是吸取了商人的教训。对于商人来说，放弃河洛地区的据点，将政治重心放回到黄河以北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一点在周代商的那一节已经分析过了。不过周平王决定放弃渭河平原却也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缺乏战略纵深的周王室，即使占据了中原核心区，也只是让自己处在一个“四战之地”。而这一恶果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在后世的很多朝代中，做出周平王那样的决定并不一定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这其中的原因与政治制度有关。先秦的政治制度其实和中世纪的西方比较像。即各诸侯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爵位只是代表你身份的高低，并不会互相隶属。每一个诸侯都有自己的领地。从名义上看，所有的土地都是归属周王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周王室并无可能随心所欲的处置这些封国。

周王室所直接管辖的范围，也就是在自己王城的周围，称作“王畿”。对于王国的其他地方，王室则会派出自己所信任的人（主要是有血缘关系的）去管理。并将当地的土地赐给他作为领地，这也就是所谓的“封建”。有时候也会是直接封建那块土地上原有的部族首领，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方的实力过于强大，无法直接征服。这种间接管理的模式并不能以先进或落后来形容。只是需要王室能够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以威慑那些被封建的诸侯。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王室能够占据最有优势的地区了。

当然，你有办法将自己神话，然后又满足于做一个象征性的傀儡的话，这种架构在名义还是有可能保存很长一段时间的，但已经与管理无关了，就像日本王室一样。事实上周王室在丧失了对诸侯的管理权之后，依靠之前的血缘关系及政治遗产，仍然延续了500年象征性的“共主”地位（也就是“东周”时期）。问题是，在弱肉强食的年代，这种没有地缘实力支撑的“王”的日子，甚至还没有一个普通的贵族好过。不久以后大家就会看到，在整个春秋时期甚少露面的周王室沦落到何种地步了。

俗话说“有所失必有所得”。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一个人失去了某样东西，但是又得到了另一样东西作为补偿。西方也有一句意思相近的谚语叫“上帝为你关上一

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只是中国的文化要博大精深得多。比之西方这句直白的谚语来说，中国的“有所失必有所得”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即“既然你失去了某一样东西，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必然得到了这样东西”。对于周王室放弃渭河平原的举动，我们只能用后一种解释来形容了。而那个“有所得”的一方就是“秦”。

第九节 周王室东迁后秦人得到关中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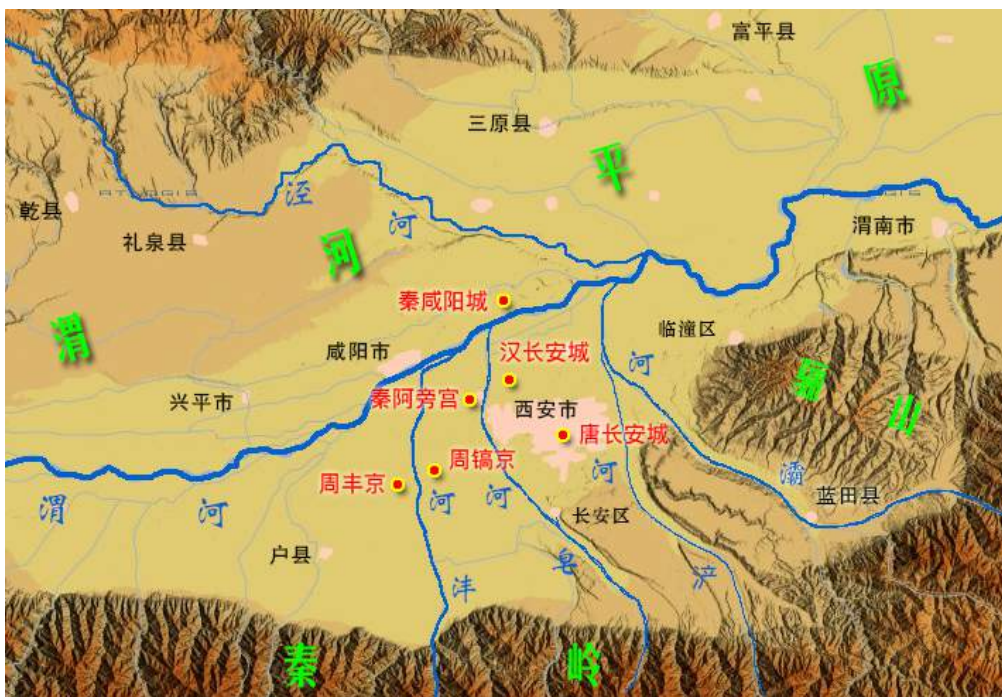
对于已经决定东迁的周王室来说，放弃渭河平原的祖地是一个无奈之举。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那些姬姓贵族在有更好的选择之时，不愿意再承担来自犬戎的地缘压力了。毕竟现在天下已经姓姬了，而河洛地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就此放弃祖地，对于崇尚祖先崇拜的周人来说，还是很难接受的。即使出于对犬戎灭国的仇恨，贵族们也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继续犬戎战斗下去。

这个重任就被交给了“秦”人，作为对秦人忠勇护主的奖赏。岐山以西的土地被正式的封建给了秦人。当然，这些土地大部分已经被犬戎所占据了，要想得到就得靠实力去夺取。而秦非子的继承人也正式的由附庸晋升为“伯”的爵位。这个爵位在五等分封制度中位列第三等，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封号。周王的这种做法其实很象 2700 多年后，国军在去台湾之前大封“反共救国军”的做法。反正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做成做不成于周人来说都没有损失。

对于秦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之前他们在陇右的征战当中，也无法从周王室那里获得直接的支持。反正都是要靠自己，能够将饼画得大点，未尝不是件好事。有一种说法是，秦人在之前已经将活动中心从陇山以西搬至陇山以东了。也就是从关陇古道西侧的秦邑搬至东侧的陇县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周人在犬戎入侵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东迁的计划。对于秦人来说，这是一个向渭河平原渗入的好机会。相比于陇右地区，渭河平原显然要更具有吸引力。

由于千河与渭河之间的土地是周王让秦人为之牧马的地方，也就是说属于王室牧场的性质。因此秦人在此之前虽然能够在渭河平原的西头活动，但始终更像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周王原先给他许下的土地仍是在陇山以西。这次之所以将秦人的封地划定在岐山以西，主要是因为岐山是周人的发家之地。而且也很有可能是周人历代先人的埋葬之地（可参考周公庙考古的新闻）。因此即使周人已经无力西顾，在名义上也不能放弃。最后的事实证明，周人的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如果秦人不能够战胜犬戎，那么孤军奋战的他们也不可能得到岐山以东的所谓“封地”；而如果秦人能够最终战胜犬戎，那么将整个渭河平原纳为所有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终第二种可能成为了现实。秦人成为了渭河平原的主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对陇右暂时失去了兴趣。能够进入中原参与争霸的行列，成为了他们的新目标。不过秦人也并非完全无视周王室的存在，毕竟在大部分的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还是名义上的共主。特别是在春秋时期，各方诸侯争霸之时，还要时不时的借用一下王室这块招牌来号令诸侯。这并不是说秦人就不会跨过周平王为他们划定的岐山之界，困守在岐山以西地区。如果那样做的话，秦人也就无法创造后面的历史了。



镐京和秦咸阳遗址位置图

秦人对周人尽臣子之礼的举动表现在建都地点的选择之上。不得不说周人定都的镐京之地是块风水宝地。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战略防御、物资运输的角度看，被后世称

之为“八水绕长安”的这块土地都是最适合建都的地点。而秦人的选择是一个特例，与周人和之后的汉唐王朝不同，他们将都城建在了渭河北岸，这主要是因为南岸是镐京的旧址所在。尽管犬戎已经将王城掠夺一空，甚至纵火烧城。但占据王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仍然是秦人所不能承担的。当然，在秦人能够一统天下，成为新的天下共主之时，这些顾虑就被抛在九霄云外了。所以你会看见，秦始皇在骊山脚下大兴土木。你并不能认为这是秦人在一吐胸中的闷气，主要是因为那块土地太具有王者之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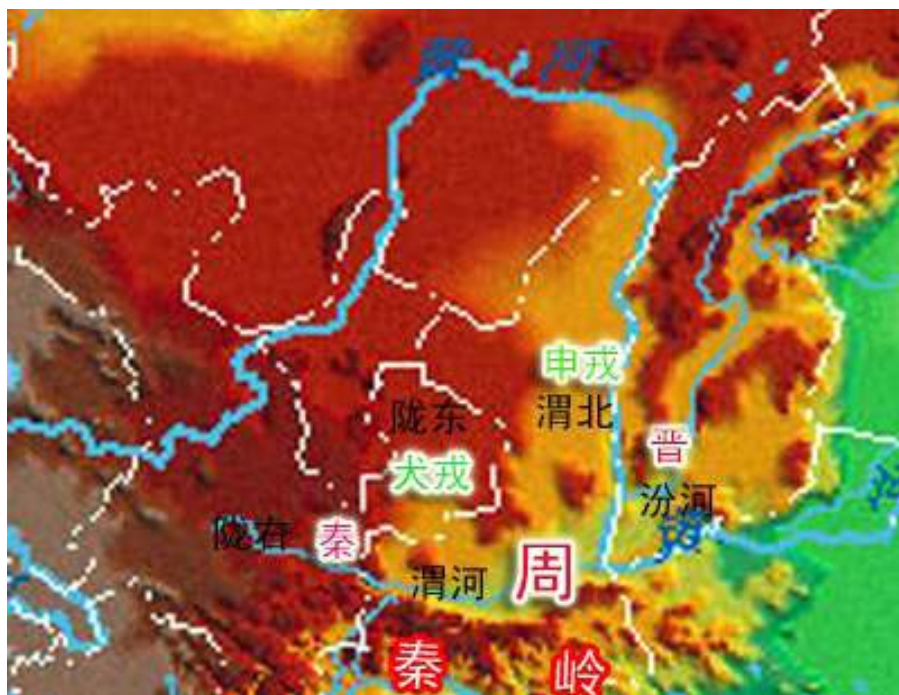
对于渭河平原的新主人——秦人来说，犬戎仍然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双方更多的时候还是像西周时期那样达成平衡，即犬戎满足于在陇东高原一带游牧，而秦人则在渭河平原上发展力量。关于犬戎这个民族的族属，目前仍没有很标准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后世的那些游牧民族是一脉相承的。之所以要对犬戎花上这么多笔墨，一是因为他们的对镐京的这次劫掠间接促成了秦人进入渭河平原，并因此而壮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开创了一个历史，即直接造成了一个中央王

朝的灭亡。在之后的古典时期，这一幕将无数次的上演。

第十节 陕北高原上的申戎与周王朝的关系

关于犬戎破周还有两点地缘上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在古典时期，渭河平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理单元，也就是说是比较安全的。由于南面秦岭的阻隔，在先秦时期，渭河平原的主要沟通方向是来自于另外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又可以再分为五个地理单元。即：西面的“陇右”地区；西北的“陇东”地区（陇东高原）；北面的“渭北”地区（陕北高原）；东北的汾河平原（山西南部）；东面的河洛地区。

对于西周时期的周人来说，威胁主要是来自于西北的陇东高原之上，也就是犬戎所占据的泾河中上游地区。陇右本来也是另一个危险之地，不过通过收伏秦人，周人在那一个方向已经安全了。而河洛地区已经被周人确立为新的政汉中心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退路而存在的。汾河平原是我们后面所要分析的地方，占据那里的诸侯是春秋的最强者之一——晋国。在周王室决定东迁至洛邑之时，晋人也是护卫的主要力量之一。



渭河平原与外围地区地缘关系图

最后没有分析到的区域是渭北地区，也就是位于镐京正上方的陕北高原。这一区域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也是被戎人所占据的。只不过占据陕北高原北部的戎人在周人看来，是可以联合的对象。因此他们也免于在名字前面冠以一个侮辱性的动物名称，而是被称作

“申戎”。如果“申戎”愿意，他们其实也可以给予渭河平原强大的地缘压力。不过周人的做法最终打消了他们的这种想法。周人的这种做法在古典时期非常常见，就是将选取王后的权力交给“申戎”，以婚姻为纽带促成双方的融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所谓华夏与西戎之间的差别，其实更多的是在文明程度上的。包括秦人和

周人本身在没有取得更高一级的文明之时，生活和思维方式与“戎”人并没有多大区别。我们也可以据此认为，所谓“华夏”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其中所包含的因素有祖先崇拜、血缘纽带、文字以及后世所加入的诸多元素。这也是南北外貌差异很大的中国人能够有共同归属感的基础。外表的差异，包括所谓 DNA 的差别，并不会是决定性因素。

申戎对于周人来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周人甚至将他们分封至中原各地，以帮助其征服抵御其他不臣服于周人的地缘力量。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信阳通道的东北侧封建了一个“申国”，以配合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钳制江汉平原上的楚人。在将申戎分封到中原各地为周人扫清障碍之后，陕北高原还是留下部分申戎，以护卫渭河平原的安全，被称之为“西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犬戎破周时他们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他们这次的联盟对象就是犬戎。

因为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周幽王为了那位褒姓的美人，而废掉了申戎族的王后及她所生的太子。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陇东高原与陕北高原同时向渭河平原发动攻势。旧有的平衡被打破了，西周王城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周幽王之所以敢废掉申戎族的王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自认为已经成为了天下的共主。或者已经通过封建手段，将姬姓的贵族渗入王朝的各个角落了。因此申戎对于周王室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了。不过事实证明了，轻视任何一股地缘力量都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当之前的盟友倒向对方时，力量对比的转换可能会是双倍的。

第八章 晋国在山西高原的兴起

第一节 周成王将其弟分封至唐此后以晋为封国名

提到“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的确，在很多时候“晋”就是山西，山西就是“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主要是因为春秋时的晋国主要国土在山西境内，并且由此而成为春秋时代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春秋末期，晋国被拆分成赵、魏、韩三国，大家也仍然习惯性的称之为“三晋”。当然那时候的“三晋”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华北平原以及河洛地区了。不过一个“晋”国所拆分出来的国家，就在战国七雄中占了3席。晋国当年的地缘实力之强，就可想而知了。西方有句谚语叫作“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晋国也是一样。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日后的霸主在西周乃至春秋初期是从哪里开始的。

让我们猜猜看，在山西那一串如珍珠链般串起的冲积平原中，到底哪一个平原才是“晋”国的兴起之地。我不知道大家会作出怎样的判断，如果让我在研究那段历史之前作出判断的话，我会认为晋国是从太原盆地兴起的。毕竟太原是目前山西的政治中心，也是山西的地理中心。从地缘的角度看，的确有资格成为周边地区的领导者。不过很可惜，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在西周初年，周成王（武王之子）将他的弟弟分封在山西境内时，太原盆地还在那些被称之为“戎”、“狄”的边缘民族的控制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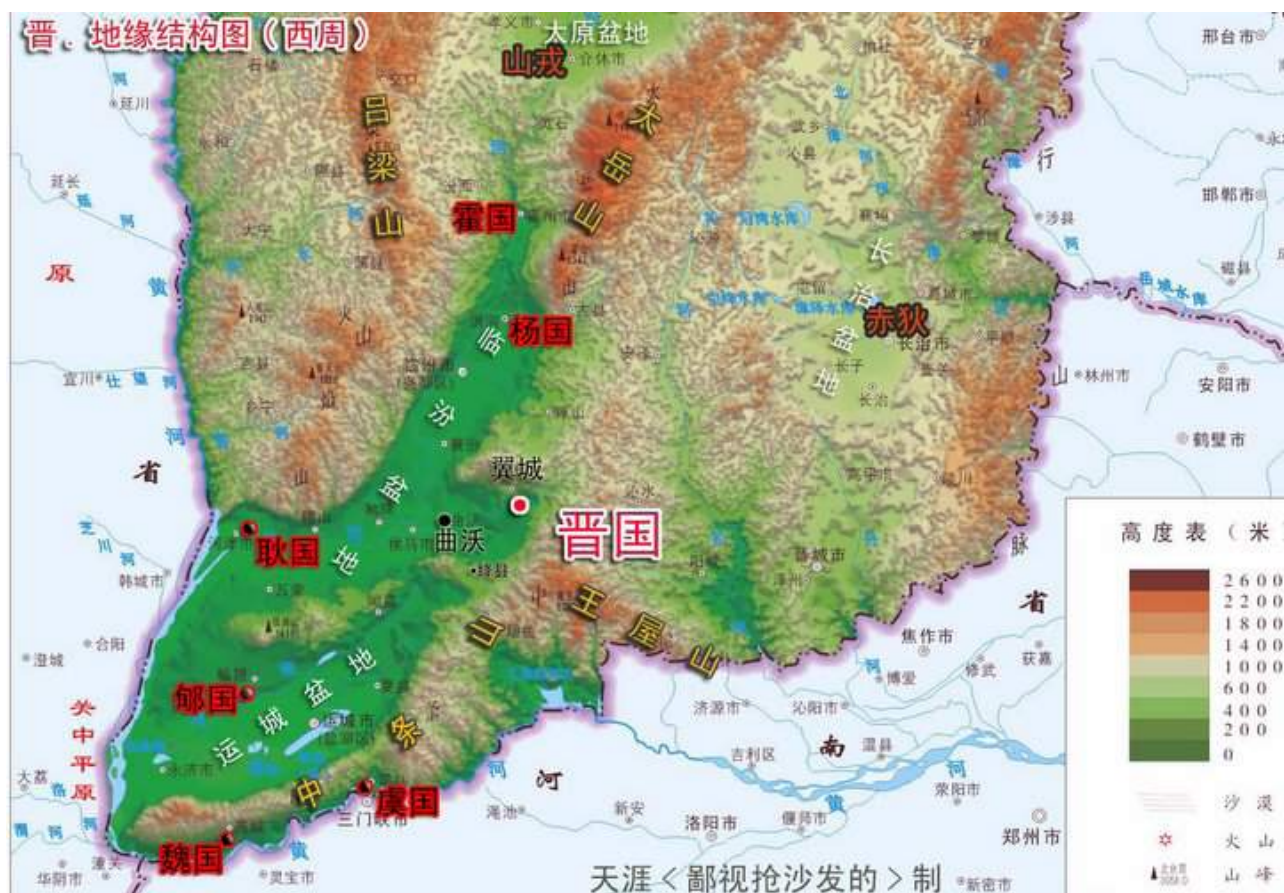
关于晋国初封的典故，可参看“桐叶封弟”的故事。周成王的这位弟弟名叫“叔虞”，他最初的封地叫作“唐”（今山西翼城西），所处的位置是在“临汾盆地”的东侧。这个唐国并非周人所创，在周人代商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周人只不过在征服临汾盆地之后，将原有的“唐”国人迁走，代之于姬姓子弟罢了。对于周人来说，这是用来维系王朝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封建”的实质所在。应该说周成王为他弟弟选的这块封地位置不错，三面环山，一面靠水（沁水），颇具王者之气，和镐京的地理结构有些类似。唯一不让人满意的是“唐”这个名字，新国应该有新气象。因此“晋”取代“唐”成为了这个封国的新名字。不过对于后世兴盛于此的帝国来说，唐和晋都是可供选择的名称。因此在今后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晋”朝和“唐”朝的兴起。

对于晋国的兴起，从根本上我们可以归结于山西的地理位置。作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又拥有如此众多的盆地，山西的确有资格成为乱世中的一极。不过晋国并

不是唯一有这个机会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从临汾盆地至黄河北岸一共有七个封国（包括晋国），而且这七个封国都是“姬”姓的封国。对于这片与渭河平原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周人显然不放心交给外人来打理。

第二节 周人在山西封建的诸侯国和周边分布的戎狄

从《晋·地缘结构图（西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周人在山西境内主要控制了两大盆地，即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除晋国以外，有据可查的在运城盆地的封国还有：郇国（现临猗县境内）；临汾盆地的耿国（现河津市境内）；杨国（现洪洞县境内）；霍国（现霍州市境内）。另外在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还建有魏国（山西芮城境内）和虞国（山西平陆——夏县一带）。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魏国并非后面战国七雄的魏国，但也存在莫大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晋人将之灭国之后，封给了战国时魏国国君的先祖。



晋地缘结构图 (西周)

研究历史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古人很懒，一个地名和国名可以用几百年，上千年，虽然城头早已不知变幻多少大王旗了。不过也正是古人的这种怀旧心理，使得中国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脉络。另一个在黄河北岸的国家是虞国，这个国家尽管地

域不算广阔，发展间也不大。但位置却十分重要，是通往黄河以南的河洛之地的重要通道。这最终也为它带来了杀身之祸，“假虞灭虢”（也称“假道伐虢”）的典故就是出于此。在秦晋争霸时期我们会有详细的分析。上述这些地名可能让有些朋友看得头晕，其实也没关系，那是写给关心这些地区的朋友看的。一般而言，我们只需要关注大的地理结构就行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周人在建国之初，在山西境内所能控制的地理单元以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为主。而与之相邻的两个盆地，即北面的太原盆地和东面的长治盆地，则暂时为“戎狄”所占据。周人对于这些化外之族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活动在太原盆地的“戎”被称之为“山戎”，言外之意就是从山上下来的；而长治盆地的“狄”被称作“赤狄”，红色应该是他们的幸运色。看到这种标注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在周人看来，狄应该是位于北方，而戎是位于西方的才对。其实对于周人来说，按照方位来划分边缘民族的成分只是一个理想值罢了。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就算人家按照你的设想在每个方位布好了阵，但时间一长，仍然是会迁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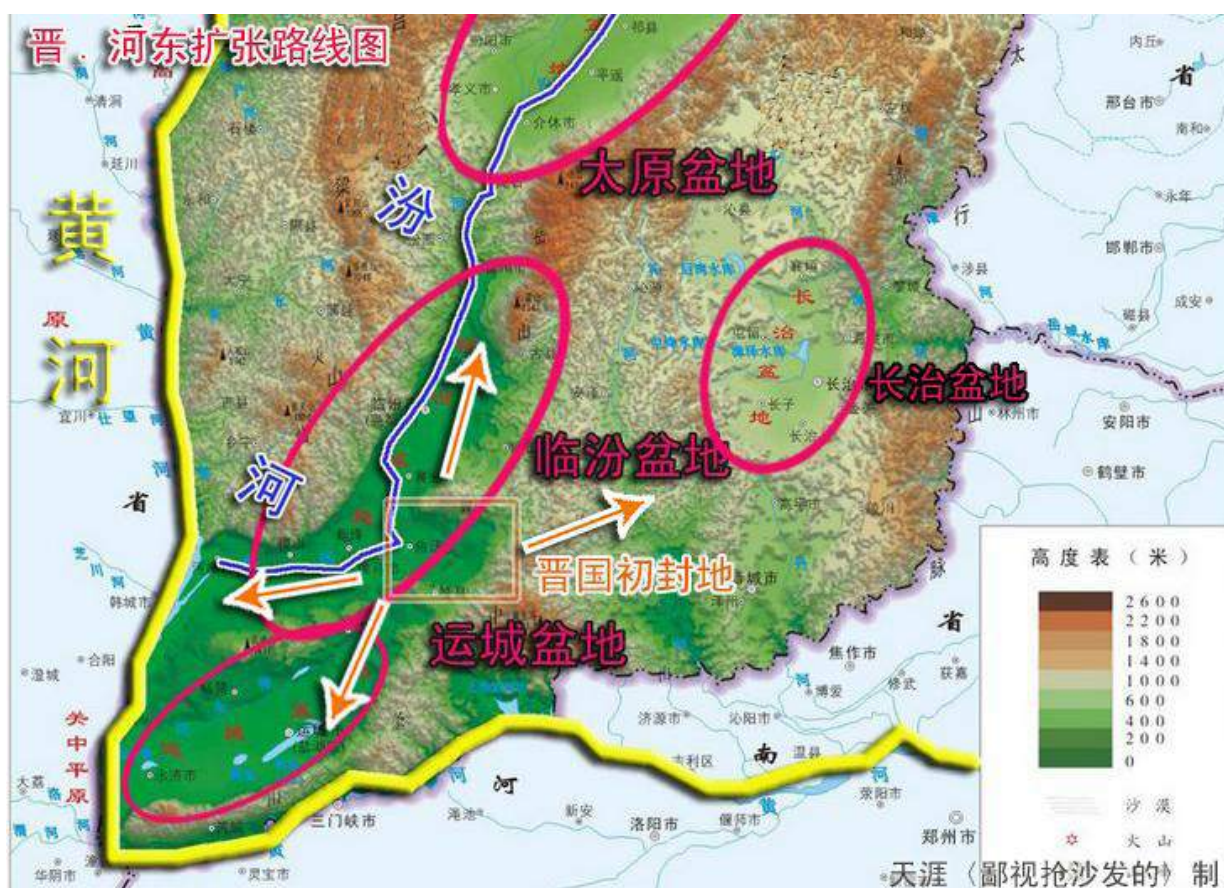
所以到了最后，周人也搞不太清楚应该怎么称呼他们了。很多时候只能笼统的将之称之为“戎狄”了。当然，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华夏族来说，危险主要是来自于西、北两个方向。当他们向东、向南扩张之后，“夷狄”、“蛮夷”之类的名词也相继出现了。这些国家，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中期基本上都被晋国所灭。随后又成为了赵、魏、韩三国的国土。不过这些西周早期的封国也并非没有在后世留下些影子。这些封国被灭之后，他们的后人往往以国名为姓氏，以为纪念。比如出自霍国的霍姓，出自耿国的耿姓。

当然，由于中国历史太长，很多的姓氏有不同的起源。但这些先秦时期的封国无疑是最初的来源地。至于杨姓，实际上最初的来源应该来自于“杨国”。不过杨国被灭之后，土地被封给“伯侨”，因其被封为“羊舌大夫”，因此封地也就被称之为“羊舌邑”了。就“羊舌邑”的位置而言，并不仅仅包括杨国故地，它南边同样位于“临汾盆地”的临汾西南一带（当时属晋）。以及将赤狄逐出长治盆地之后，所占据的沁县一带，都是“羊舌邑”的辖地。真正始于“羊舌邑”的姓氏应该是“羊舌”，不过这个姓已经很少了，我现在也没有遇到过。

这段关于姓氏来源的解读，也不算题外话。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姓氏本身就属于地缘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过是属于细节了，正好也可以说说先秦时那些封国与姓氏起源之间的关系，以后很难逐个解读了。解读完晋之后，会进入春秋争霸时期。那时的重点，就在于我们之前所解读的几个地缘单元之间是如何博弈的了。

第三节 晋国所处位置在地缘上的优势和劣势

在分析晋国的初封地之前，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山西境内的主要河流——汾河的流向问题。汾河在流至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的分水岭时，顺着山势向西而不是向南流入了黄河。这也使得位于汾河下游整体呈现一个“J”字型。不过位于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却并非完全的按照汾河的流向来塑造自己的轮廓。在这个“J”字型的底部拐角处，临汾盆地又向东延伸出了一个突出部。这使得整个盆地的外形呈现为一个不太标准的倒“T”字型。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晋国最初的封地位于汾河以东，临汾盆地中间那个向东的突出部内。



晋河东扩张路线图

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位置，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可以让晋国处于最佳的防守状态。当晋国希望向外扩张的话，向北可以进入临汾盆地的北部，并进而渗透入太原盆地；向西可以沿汾河直至黄河，将临汾盆地的西部收入囊中，并跨越黄河进入关中盆地；向南则可以渗透入运城盆地。即使是向东，在跨越中条山脉之后，长治盆地也可以成为另一个目标。当然要做到这一切，晋国的自身实力要足够强。否则这个可以四面出击的位置，也有可能让其成为四战之地。不过，对于晋国人来说，

最强的对手是盘聚在长治盆地野蛮人——“赤狄”，而这个方向恰恰有足够的山地作为保护。其他那些分封在临汾平原以及运城平原的封国，并不会给晋人带来太大的威胁。

由于汾河谷地与渭河平原是以黄河为界的，晋国主要活动的地区也被称之为“河东”，相应的渭河平原也可称之为“河西”。不过在当时，“河东”、“河西”还有更特定的指向，在秦晋争霸时期我们会分析到。之前我们曾经分析到，山西高原的这些盆地、平原基本是沿桑干河——汾河分布，呈一个珍珠链状的线性排列（长治平原除外）。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各盆地一方面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又由于河流的作用，而存在着相对畅通的通道。这种地理结构，造就了以汾河谷地为主的山西高原有别于渭河平原的地缘结构。即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地缘中心出现，这些半封闭的盆地可以积聚起强大的地缘力量，并籍此与渭河平原对抗。即使是处于劣势时，也可以依托这些盆地，逐级抵抗。

另一方面由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地理上的接近，更容易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晋国的实力都要强于秦国。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条块分割、若即若离的地理条件，固然使得山西高原具有防守的优势，但也很容易造成内部的分裂。套用一句三国中的评语，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末期那次著名的“三家分晋”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罢了，事实上在这以前，晋国就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政治事件。只不过由于这次事件并没有造成晋国的分裂，也没有改变晋国的血缘属性（后世的田氏代齐就不同了），因此很多时候不为后人所知罢了。这就是“曲沃代翼”事件。

第四节 周王室的衰弱助长了晋国的曲沃代翼之乱

根据史书记载，晋国最初的国都叫作“翼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所以华夏民族是一个念旧的民族）。位置就在临汾盆地东侧那个三面环山，近似于反“C”形的突出部内。如果再具体一点，就在这个突出部的东北角。由于这个位置背后的山地呈两翼齐飞的状态，因此山下的都城被命名为“翼城”。这多少与“岐山”的得名有些类似，“岐山”得名是因为有两个形同犄角的突出部（岐有双头之意）。不管怎么样，对于凡事讲究对称与风水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地形算得上是个风水宝地了。

根据周人封建的习惯，一般都会将宗亲分封至附近，以作护卫。晋国国君也不例外。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背山面水的最佳位置，那么很自然的需要将最值得信赖的

宗亲，分封至这个环形突出部的缺口处，用以抵挡外部力量的威胁。这种思路并没有错误，问题是这也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晋国需要承受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那么被分封至这个缺口处国家当然会替国都承受最大的压力。但反之，也最有机会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整个西周时期，整体的地缘结构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室拥有最强的实力。据有渭河平原和河洛地区的周王室，有能力维护王朝的稳定。不过这一切都在周平王放弃渭河平原，东迁至洛邑（洛阳）后开始改变。



晋曲沃代翼示意图

无论王室有着何种理由作出这种决定，最终的结果都是，王室从此将自己放在一个四战之地，并且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支撑自己的地位，春秋之乱也就此开始。一叶落而知秋至，王室的衰败不可避免的影响了那些贵族的心态。就在平王东迁（公元前 771 年）后不久，即公元前 745 年，晋国当时的国君——晋昭侯将他的叔父“成师”封在了汾河以东的那个缺口之处。这块封地名叫“曲沃”，这位国君的叔父也因此被称之为“曲沃桓叔”。

如果按照以往的思路来看，这个选择并没有错。只不过现在已经进入到“礼崩

乐坏”的春秋时代，连王室都无法自保了，那些封国之内的贵族们也有希望凭借自己的地缘优势来上位了。在春秋时期，桓叔有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但决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经过西周时期的经营，晋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山西境内最强的诸侯国。在平王东迁时，晋国与秦国一样都是主要的护卫力量。凭借那次勤王行动，晋国也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更为主要的是，也因此而获得了周王室的支持。

东迁之后的王室也已经感觉到自己无力维护帝国的稳定了，因此他们可以依赖的更多是自己的政治遗产。而在地缘实力上，“周”已经将自己视为与诸侯国平级了。而在诸侯之间的争斗中，王室更多的已经是一个直接参与者，而不是调解者了。既然周王室已经无力控制局面，并且可以以自己在河洛平原的地缘力量给“晋”国以支撑。那么晋国横扫河东诸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个时候，“曲沃桓叔”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了。

比之安居在翼城山下的国君来说，“曲沃桓叔”更有机会向外扩张。当然，如果国君也想有所作为，向东进入长治平原与狄人争地也是一个选择。不过那样做的难度显然要大很多。因此晋国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占据地缘优势的曲沃与占据政治优势的翼城进行了长达 67 年，历经三代的争斗。由于翼城的晋侯是正统的国君，因此也被称作“大宗”，而身在曲沃的同宗挑战者则被称作“小宗”。这有点类似于《笑傲江湖》中华山派气、剑两宗的争斗。也许金庸老先生正是从中得到启发的，毕竟临汾平原离华山并不遥远。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有一个发现来印证金大侠的历史功底。

第五节 晋国做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及古曲沃的位置

之前我们分析过，山西境内一共有六个主要盆地，由北至南分别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另外加上东南角的长治盆地。之所以晋国最早的封地在临汾盆地，或者说周初的那些封国北不过临汾盆地，主要还是地缘结构的原因。我们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到，渭河平原向东过黄河与山西境内的所对接的平原地区，就是位于西南角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因此在周人最初的扩张当中，这两个盆地无疑应该是最先进入的地区。而分封在这两个盆地之中的姬姓封国，无疑可以拱卫渭河平原的东北方向。这并不代表周人就不会再向外扩张了，只是剩下的事就要封国们自己去做了。最终历史选择了晋国来承担这个战略任务。

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问题，总是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即人力难以胜天。或者说人无法变更更大的环境，也就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

就以晋的例子来说，其在临汾盆地的地理位置固然是不错的，但也并非占有进攻性的地缘优势。理论上而言，每一个封闭的盆地都有机会一统江湖。更何况最初的临汾盆地也并非只有“晋”一个封国。如果说周王朝所主导的“华夏”因为在文化上占有优势，并且已经通过农业活动在物资及人口上取得了对边缘民族的优势的话。那么也仅仅能够证明，与渭河平原在地理上相邻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诞生出最强的政治力量(山西境内)是地缘的选择。而身在其中的众多姬姓封国应当都有机会。

历史做出最终的选择，是需要考虑到很多综合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山西南部乃至整个山西诞生出春秋中最强的诸侯国是有地缘上的必然性的。而是否一定是晋国，亦或哪一个晋国的国君能够成为霸主则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了。下面我们就可以看看，谁能够抓住历史的机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山西高原的主人。



临汾盆地示意图

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了，晋国的国都，或者说初封地在临汾盆地东侧那个反“C”型的突出部内。而公元前745年，晋昭侯继位时，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这个“曲沃”在哪，则成了后世一个争论的问题。曲沃是一个古地名，但也是一个现在的地名。具体的位置就在那个反“C”型的突出部缺口处。问题是汉代的记载认定曲沃是在运城盆地的东北角，现在的闻喜县境内，目前也多采取这种看法。尽管这两地相隔并不算太遥远，但正好被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的分水岭隔开，也就是说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实际上这个地方很有可能都是古“曲沃”，因为在周代的时候，封国搬家是经常有的事，在后面分析“东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几个从渭河平原搬入河洛地区的封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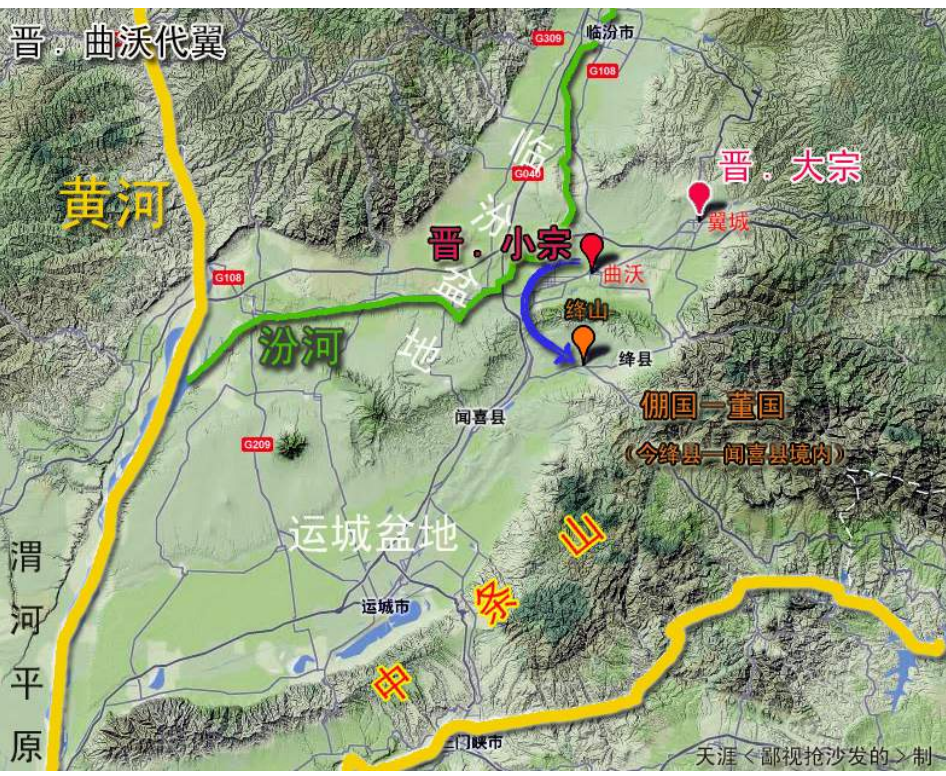
从晋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想统一山西高原诸盆地，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整合西周分封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各封国。如果将这两个盆地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晋国的位置正好处在中心，可以向三个方面进行扩张。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曲沃的小宗得以崛起的基地是在运城盆地的北部，也就是晋国向运城盆地扩张的领土。

第六节 西周时期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腹地还存在的封国

在我们根据历史记载所描绘出的临汾——运城盆地的封国地图上，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除了晋国处在中心位置外，其他有史可查的封国都在边缘地区。而晋国与这些封国之间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片空白。

如果这些土地都是山地，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对于西周初年的贵族来说，尚有足够的平原以供选择，并不需要向这些难以耕种的高地拓展空间。只是这些土地性质都是冲积平原，并没有理由被放弃掉。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土地都是晋国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放在春秋中后期无疑是对的，但在西周初期诸侯国的封地并不会有那么大。即使是按照史书的记载，晋国的封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将汾河以东的临汾盆地都认定为晋国的初封地，仍然无法将这两个盆地填满。

对于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的史家无疑还是比较忠于历史的，但



晋曲沃代翼示意图

很难作到完全的记录。也就是说有部分不太重要的封国被遗漏掉了。好在古人好厚葬，即使是要求“薄葬”的曹操也会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墓室，并放置一些能够表明身份的器物。这种视死如生的做法，最大的受益者是后世那些“寻宝者”。这其中绝大部分是

怀着各种目的的盗墓者，而考古学家则是另一类型的“寻宝者”。

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典籍太过丰富了，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概念是在20世纪由西方传入的。而西方人在考古学上能够先走一步，恰恰是因为他们除了“传说”外，并没有严谨的史书来描述西方的历史。因此从古人遗物中寻找证据，并加以推断成为了西方人认定历史的主要手段。尽管考古研究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并且盗墓者留给他们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但是他们仍然有机会为中国的历史提供些许补充材料。而在运城盆地的西北部，也就是和晋国隔山相望的地区，“侂国”墓地的发现¹，则为晋国的地缘扩张提供了证据。

这表明，晋国最初的封国领地并没有涉足运城盆地。尽管他们就处在那条分水岭的北面。需要说明的是，“侂国”并非姬姓的封国，而是殷商遗民，当然，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归附了周人。周人甚至与其联姻，以加强双方的联系。对于周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政治手段。与西方的贵族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近亲繁殖不同，周人是严禁同姓通婚的。周人当初作出这种规定，可能并非出于优生优育的目的，因为理论上异姓的表兄妹结亲所承担的生育风险，并不会低于同姓的堂兄妹结亲。更有可能的是，周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迅速扩大影响力，并壮大自己的族群。从结果来看，这种开放性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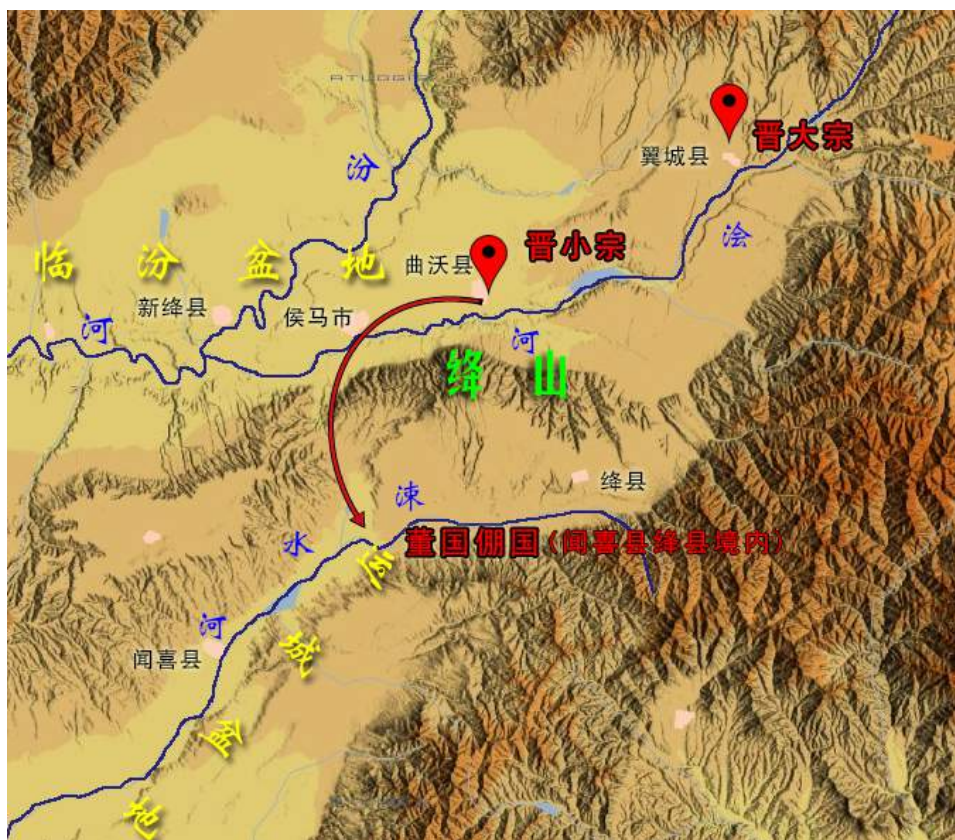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还证明了，在侂国的南侧还有一个“董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位于运城盆地东北部的绛县——闻喜境内。而汉朝所认定的“曲沃”恰恰就在这一地区。

第七节 晋国大小宗的位置及其之间的博弈结果

从考古发现的发现的侂国和董国都处在运城盆地东北部的情况来看，似乎那个“谋反”的小宗曲沃还是应当在临汾盆地，而不是在史家所认定的运城盆地北部。其实这并不会是最有可能的选项。因为晋国的大、小宗之争持续了60余年，如果双方的基地都在同一片平原，又相隔那么近的话，持久战是很难进行下去的。也就是说双方之间需要有一条明显的地理特征作为分界线，以达成地缘上的平衡。

这条平衡线就是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之间的那条分水岭的东段。由于山上的石头是红色的，所以这段山也被称作“绛山”，旁边的县也就被命名为“绛县”了。

1 侂国墓地发现于2004年。该墓地属西周时期墓地，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北约1000米处，北倚绛山，南临中条，跨涑水河。董国方面，则在1978年山西闻喜上郭村出土过该国的青铜器，比较著名的有董矩方觚。另2011年又在翼城县大河口发现了西周“霸国”墓地。是继绛县横水侂国西周墓地之后，又一次将西周时期一处封国墓地揭露发掘。



晋大小宗之争示意图

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晋侯给这个未来的对手所封之地，最初是在现在的“曲沃”，还是在绛山以南地区。如果是在前者，则可能性就是这位曲沃桓叔跨越“绛山”，向南征服佣国、董国等小封国，并随后将自己的“封地”搬至运城盆地，以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如果

是后者，则有可能是以晋侯为主导，灭掉了佣国等小封国，将势力范围拓展至运城盆地，并封自己的叔父封在此以巩固新的国土。而在“曲沃代翼”，小宗代大宗成为晋国的新国君之后，小宗将政治中心搬至现在的曲沃，以标示自己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其中的共性就是“小宗”的根据地是在运城盆地，我们很容易看到今曲沃西南部有一个山口可以直通运城盆地。即使是在现在，这仍然是沟通两大盆地的主要交通路线（大运高速）。根据史书的记载，晋侯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赐封给曲沃的土地竟然比自己的还大，这无疑让小宗的地缘力量得以压过自己，并最终丢失了君位。实际上，晋侯是否真的犯了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宗有这个心，而历史又给了他这个机会。在西周时期，由于有王室的力量约束，各封国只要是经过王室正式策封的，无论大小，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精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战争的对象也更多的是那些“戎狄”、“蛮夷”。

而曲沃桓叔上位时（公元前 745 年），周王室刚刚东迁不久（公元前 770 年）。王室已经无力约束各封国了，各大国开始兼并周边的小国，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曲沃桓叔所做的无非是抓住机会，扩张了自己的封地，并最终取得对翼城的大宗压倒性的优势。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因为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也无法证明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不过那位曲沃桓叔的孙子，号称“曲沃武公”的小

宗领袖，在将自己的的称号改为“晋武公”后，晋国的确开始崛起，并最终走向称霸的道路。既然在晋国的这场内乱当中，晋人已经分别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建立了据点，那么他们接下来将两大盆地收入囊中也就不没有大的障碍了。只有当他们向西扩张到黄河，向南扩张到中条山的时候，真正的障碍才会出现。

之所以要花较大篇幅解读晋国的这场内乱，主要是因为晋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在春秋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这场内部斗争也开创了春秋无义战的序幕。在此之前，尽管平王东迁，王室衰弱使得已经有小的封国被兼并，并且不时的政变发生。但像“曲沃代翼”这样大规模，长达数十年的以下犯上的举动，是开了历史之先河的（期间光大宗的晋国国君就被杀了五个）。

从此西周王室所建立起来的平衡被打破，血统和出身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整个王朝的地缘政治结构面临重新洗牌。无论是当年武王开国时所建的封国（如齐国），还是平王东迁时所封的诸侯（如秦国），能够在春秋之世取得多大的成就，取决于这场乱世开始时你的地缘位置。

第九章 周王室在河洛地区的战略布局

第一节 周王室东迁失势后出现春秋五霸

让我们开始将时光倒流至春秋时代，看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的时代，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即使只通过中学历史的学习，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在春秋时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在周王室因为东迁降低了自身的实力时，那些诸侯国中的强者却通过与异族的战争，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在王室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之后，战争的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那些不承认中央之国统治地位的边缘民族了，实力才是决定你命运的终及因素。

当然，能够对这一“盛世”做出突出贡献的，并不总是那些出身正统“高贵”的封国。那些愿意按照中央之国的管理方式改造自己的边缘地区，也同样显示出非凡的实力。我们先根据中国史家“以人为本”的传统观念，看看春秋时代都有哪些“英雄人物”，并通过观察他们所属封国的地缘位置，来透视一下其中的地缘规律。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顶级英雄，无疑是要具备国君的身份。于是“春秋五霸”便成为了这个英雄群体的历史标签。之所用“五”这个数字，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用“五行”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物质观。

在中国人看来，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足以组成这个世界所需的一切物质。而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向，更是构成“华夷五方”的基本架构。这种观念的影响力一起延续至今，以至于华山论剑也要按照五个方位评出五个最厉害的武林高手。不过也正如华山论剑所评出的高手并不能涵盖所有顶尖高手一样，“春秋五霸”的评定也有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没有争议的有三个，即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而宋襄公、秦穆公、郑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则需要竞争另外的两个名额。

关于春秋五霸究竟是个人荣誉，还是国家荣誉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这是一种国家荣誉。评定的标准也应该以其所处的封国或者地区，具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条件为主要依据。这就好像江湖中更多的是以门派实力来排定座次，而个人的成就也往往是代表的自己所属的门派一样。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候选国与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封国，在春秋初期，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缘位置。

我们知道，周王室以前的政治中心在渭河平原，都城为镐京，也就是后世的长安——西安所在地。而在他们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后，又在河洛地区建立了另一个

都城——洛邑，也就是后世洛阳的所在。说到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阳”字，中国古代认定山南、水北为阳。而城市一般都是建立在水边，因此但凡遇见带“阳”字的城市，基本就是在河流的北边临水而建。反之则可以在城市名中用“阴”字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查找一下。

周王室在渭河平原所建的都城丰镐，又被称之为“宗周”，有宗主之意。而洛邑则因为是成王所建（武王的儿子），因此又被称之为“成周”。在宗周被放弃之后，也就意味着周王室放弃了宗主的地位，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地理位置来看，河洛地区也的确具有王者之气。东周王室甚至将他们在宗周用来拱卫京都安全的亲信封国一并搬迁了过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虢”国和“郑”国。这两个国家在春秋的历史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命运也和东周王室的衰败密切相关。

第二节 春秋时边缘国家相较中原国家具有的地缘优势

现在让我们还是把视线抬高些，从全局的角度观察一下各主要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应该说经过西周时代的磨合，除却一直处于地缘博弈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长江流域也已经正式的登上了这个地缘政治舞台。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位于长河中游的“楚”，以及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尽管这两个国家都自认为与衰弱的东周王室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自封为“王”，但他们也无疑是和那些出身正统的黄河流域的封国一样，处在同一地缘体系内了。也就是说，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在春秋时期开始融为一体了。无论你来自何方，能够称霸中原地区，并号令其他的诸侯，成为了大家共同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秦、晋、燕、齐、吴、楚所占据的地区都属于同一个地缘圈的边缘地区了。对于吴、楚这种地缘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后世区别一个边缘民族，是否具有正史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你仅仅满足于抢一把就走的生活的话，那么无疑只会被当作不归化的化外之人看待，并很有可能在你的族名前面冠以一个带有兽性和侮辱性的前缀。但如果你希望并能够在中国已经融化了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汉人居多的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你就很有可能取得一个被认可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后世的史家们会为你的国家立传。

而从这些边缘国家最终的结果来看，无疑都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只有燕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发力，（这其中的地缘原因会有专门的解读）。而其他的秦、晋、齐、吴、楚连接起来则可以圈出一个“春秋霸主”

圈，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就是渭河平原——汾河谷地（包括山西高原中的其他盆地）——山东丘陵——环太湖平原——江汉平原所构成的边缘地区。而这五大边缘地区中间的黄淮——江淮平原则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



春秋初年主要封国分布图

边缘地区之所以能够具有地缘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进入更边缘的地区拓展战略空间，并最终借助这股力量进入中原争霸。至于他们是如何拓展自己的地缘空间，包括又有哪些地理单元从此融入中国核心区，将会是我们下一步解读的重点。对于地处中原的那些封国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缘劣势。相反这些处于核心地区的封国很可能还在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原的主人而沾沾自喜。在那些边缘地区还没有整合好各自所属的地理单元，并全面对中原地区构成地缘压力的时候，那些地处中原的诸侯国无疑还是有些机会的，最起码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些地处中原，实力较强的国家，以黄河北岸的卫国、河洛地区的郑国、泰山西侧的鲁国、以及黄淮流域的宋国为代表，将之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中原强国圈”。而这其中明确有称霸想法的就是郑国和宋国。后面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解读“中原强国圈”之间的地缘博弈，我们也会在其中看到王室所在的“东周核心圈”将会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境地。

第三节 周王室东迁洛邑后再也无法返回渭河平原

让我们继续春秋部分的解读，春秋的故事那么多，不可能一一点到，只是以历史为主线解读地缘结构。如果能够看透这些图，相信再看一些历史时，很多问题就可以自己得到答案了。如果要说到达到什么境界，那就是你看到一张平面的地图甚至一个著名的地名后，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它周边地区立体的地缘结构图来。

前面我们为春秋初年的地缘结构画了一张图，并为之规划了三个地缘政治圈。即：边缘地区的——春秋霸主圈；中原地区的——中原强国圈；以及河洛地区的——东周核心圈。这一节就从“东周核心圈”开始解读。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都之一，特别是当统治中国的政权来源于渭河平原时，他们一定会在东出“崤函通道”之后，选择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以便控制中原地区。当然，更多的时候，后世的帝王们也不会放弃渭河平原的长安。东西两都的结构更加有利于帝国的稳定。不过对于周王室来说，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洛邑（洛阳）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渭河平原对于王室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至于渭河平原能否重新回到周人的控制之下，一要看秦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扫平渭水两岸的犬戎；二则要看秦人会不会尽臣子之道，将王室迎回镐京。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王室只能在洛邑保留他们仅有的尊严，而渭河平原则成为了秦人的兴盛之地。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责备秦人未尽臣子之道，在那个王室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局面的年代，任何人站在秦人的角度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河洛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更何况秦人并不是王室衰败的直接促成者，如果一定要为这个结果找一个罪魁祸首的话，那么那个曾经备受王室信赖的“郑”国就是始作俑者。这个时候的郑国已经不是渭河平原东部那个郑国了，在随王室正式东迁后，他们被安排在了河洛之地的东部，也就是在黄帝兴盛之地——“轩辕之丘”的东侧建立新的国家。这和他们渭河平原的方位一样，都是为王室把守东大国。为了和以前的郑国相区别，后世也称之为“新郑”，这个名称一直留存至今，目前为河南省的省会郑州所辖。

第四节 周召分陕与虢国被安排在陕地的战略作用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周王室的悲剧也正是从它的核心圈——“河洛地区”开始的。让我们先将这一地区放大，仔细观察一下东周核心圈的地缘结构。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河洛地区的范围。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发源地之一，其西界就在“崤函通道”的东侧。这里有一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县，叫作“陕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标志的地区。在它两侧开始筑关（函谷关）之后，陕县的两侧被分割为“关内”和“关外”地区（主要是汉朝）。换句话说，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王朝将渭河平原以及崤函通道一并视为中央之属地。



渭河平原与洛阳盆地地缘结构图

在春秋以前，函谷关还未筑，但以“陕”地作为地缘分割点的做法在西周初年已经定型了。当年武王在灭商之后第三年就驾崩，成王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之下开始成为中央之国新的共主。为了整合新归属过来的土地，周、召二公以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召公负责陕县以西的周人故地，而周公则负责陕县以东那些新征服的土地。从困难的角度而言，周公所担负的责任无疑更为艰巨，事实上他也是在又经过

了一系列战争之后，方才将周王国的基础打牢。如果他就此取代成王自立为王，那么《封神榜》可能要以他为主角写了（事实上武王伐纣也是在周公的全力支持下方得以成功的）。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周公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后人多颂“周公辅政”，而多不记召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曹操之所以在《短歌行》最后两句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正是想以此表明心迹。也许他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只是天时不可逆，曹丕最终还是没有让他做成周公。

洛邑也正是在周公的建议和主导之下建成的。只是依他当时的想法是要将洛邑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中心，而绝没有想到会成为王室最后的避难所。周、召二公以“陕”地为界的地理分割做法，其影响延续至今。虽然后世的政治中心转移至了中原，而崤函通道也随之成为了中原的属地。但“陕西”还是成为了以渭河平原为中心的地区的省名。而“陕”现在则成为了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归属了“三门峡市”管辖，并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对于东迁的王室来说，将在渭河平原为之把守西大门的“虢”国安排在“陕”地，为河洛地区把守西大门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了。这个新的“虢”国并非仅仅限于黄河以南，事实上它的国土横跨了黄河两岸。因此也被后世称之为“南虢”和“北虢”，事实上是同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将搬迁而来的“西虢”做这样一个怪异的分割，在后面再分析。“虢”这个封国，对于周王室来说非常重要，属于最亲近的封臣，经常带领王室的军队出征以平定叛乱。

因此在平王东迁之前和洛邑初建之时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虢国，被称之为“东虢”。由此就有了所谓的东、南、西、北四个虢国。事实上王室东迁之后，仍然在西虢故地留下了一小部分“虢”人，以为王室保留最后的希望（应该也有监视秦人的意思）。但最终还是被日益强大的秦国所吞并。

第五节 周人在洛阳盆地西侧建立洛邑作为都城

河洛地区的东界就是在现在的郑州以东到开封一线。东虢和郑国是王室在东线的屏障。北有黄河天险，南有伏牛山作为依靠（秦岭余脉）加上河洛地区的一些小的封国（如滑国），位于中心位置的王室应该感觉到安全了。前提是这些与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姬姓封国要保持足够的忠诚。

说到郑国，可以说是春秋中最早称霸的，不过受限于地理位置，郑国更多的是被评为一“小霸”。在昙花一现的成为中原霸主之后，不可避免的苦苦挣扎在边缘强国的夹缝之中。即使是在战国时取代了它位置的“韩国”也属于战国七雄中最为

弱小的一国。如果不是依仗在山西高原尚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以及同属三晋的魏赵两国牢记“唇亡齿寒”的教训，韩国很可能坚持不到最后。关于韩国的问题，我们在战国时会分析，现在还是让我们看看郑国的地理位置。请注意，这次我们说的是东迁后的“新郑”。

新郑控制区域示意图

洛阳盆地示意图



洛阳市

减少，特别是在另一个方向还有河流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后世的开封可以说是最不适合建都的地方，不过如果有得选择，宋人是更愿意将防线推至燕山一线的。

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会筑城的人，

非常会利用现有的地理环境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也是中国人可以筑出诸如长城那样的世界奇迹来的原因。而欧洲的那些城堡，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建筑结构来进行防御，这也让他们的城堡变得非常精致。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这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欧洲的人口基数和战争规模。那种贵族之间的决斗式的战争，不需要很大的城来储备力量。如果放在中国，那些农民出身的军队会很有耐心将这种欧式精巧的城堡包围，然后在周边种地，慢慢得和你玩持久战。当然，在春秋之前，中国的战争很大程度也是贵族之间的游戏，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久之后，大家就能看到最后的贵族——宋国的表现了。

周人在选择洛邑位置的时候，无疑还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对于他们来说，危险更多的来自新征服的东方，因此选择在洛阳盆地的西侧筑城，将东面的开阔地留给可能入侵的敌人，相当于为自己又增加了一道防线。而同样曾经选择在洛阳盆地建都的“商人”，则选择了将自己的都城建在了盆地的东北部，背靠邙山和黄河。当然商人迁都的次数非常多，在洛阳盆地内的都城，现在没有异议的是偃师商城。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思想，因为商人的根据地在黄河以北。

洛阳盆地既然被称之为盆地，那么它也就必然被一系列的山脉所包围着了。这些山脉从西至东分别被命名为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箕山、嵩山。实际上它们都是秦岭东端的支脉和余脉，箕山和嵩山甚至还可以被视为伏牛山的余脉。对于古人来说，很难认清这些山脉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眼前的山势来为之命名。这些呈半圆形将洛阳盆地包括起来的山脉，的确呈现出一种八方来朝的王者之气。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有利于防御的。

既然洛阳盆地的西、南、东三侧都有高山环绕，那么它北面的黄河就可以成为天然防线了。不过既然称之为盆地，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似乎有些不够。好在沿

黄河南岸还有一条纵贯东西的丘陵，被称之为邙山。这条丘陵的海拔只有 300 多米，虽然与其他几条山脉相比要低了许多，不过还是能够为洛阳盆地提供保护的。

说完了山，我们要说说河了，我们常说山水总相连。那些从山脉分水岭上流下来的雨水总是要找个去处的。对于洛阳盆地来说，与渭河平原一样，有两条最为重要的河流从中流过。它们都发源于盆地的西南部，从东北方向在洛阳盆地汇集后流入黄河。这两条河流一条叫洛水，一条叫伊水。现在这个“水”字也都依惯例改成“河”字了。这两条河流与黄河共同造就了河洛文明，由于伊水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被称作“伊洛文明”。关于伊水的历史地位，随后会有专门的解读，顺带可以解开“大禹治水”的千古之迷。之前在“夏”的部分，我们只是大致规划出大禹治水的方向，伊水则可以为找到治水的具体路线了。

第六节 洛阳盆地沟通外部的四条战略通道

现在我们知道洛阳盆地为什么这么受帝王们的欢迎了吧。能够一出崤函通道，就找到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对于出自渭河平原的地缘力量来说，无疑是入主中原绝佳的跳板。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洛阳盆地都有哪些通道可以用来沟通四方。对于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来说，能够拥有与四方沟通，并且容易控制的通道是必须的。在盆地的西侧，崤函通道无疑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对于这条渭河平原东出中原的通道，周王室将从渭河平原一同迁过来的“西虢”国安置在通道的西侧，也就是那个具有地标性质的“陕”地。

尽管在春秋初年，这一带还没有筑关（函谷关），但通道还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布置一个最为亲信的诸侯镇守于此是必须的。“陕”地的战略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通过它可以进入崤函通道，最终进入渭河平原。能够平稳的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高原是它的另一个战略价值。为此，虢国甚至在黄河以北控制了一块地方，为的就是将黄河两岸的渡口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这也是为了保证王室的安全。因此东迁过来的“西虢”也被称之为“南虢”和“北虢”，实际上是一国。

尽管由于“唇亡齿寒”这个成语，让我们觉得“虢”这个国家只是个龙套角色。但在王室眼中，他们确是最值得信赖的一族人。如果你仔细看图，就会发现，早在洛邑建造之时就已经立国的“东虢”国，位置同样至关重要。这个目前行政上属于荥阳境内的（荥阳目前为郑州所辖）小国，据守的是黄河南岸的另一条战略通道。与西面的崤函通道相对应的是，它是洛阳盆地通往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

如果我们对“东虢”的位置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看过三国或经常听评书的人

应该对“虎牢关”这个名字有印象，三英战吕布的地方就是在那。至于刘关张是否真的在那跟吕布打过一架，正史中没有记载。不过如果关东诸侯想进入洛阳乃至长安与董卓PK，虎牢关是必经之路。因为虎牢关具体位置在汜水镇，因此又被叫作“汜水关”。不过评书表演艺术家们显然没有很深的研究过地缘，经常把这他们当成两个关。



洛阳盆地及周边示意图

对于选择洛阳盆地作为东都的周公来说，他很可能早就作好了这个打算了。因为在武王正式伐纣之前，曾经与“八百诸侯”在洛阳盆地的北部，黄河的南岸会过一次盟，史称“孟津观兵”。对于这个“津”字，古意就是渡口的意思，以后大家看到有地名里有“津”字的，基本就可以认定它在古时候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渡口了。对于周武王的那次阅兵来说，更多的是试探商人的反应和自己的支持度，结果当然是让他满意的。两年以后，正式的进攻开始了。商人甚至没有想过在黄河南



龙门石窟

岸建立防线，而只是在周人所带领的联军逼近至朝歌时方才组织力量抵抗。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废弃洛阳盆地的王城并退回

黄河北岸，就意味着王室和贵族们已经希望能够划河而治了。问题是历史不会给他们偏安的机会。

应该说，周灭商的战役充分体现了孟津的战略地位，作为洛阳盆地北出河北地区（黄河以北）的必经之路，控制了它就可以进逼洛阳（洛邑），进而透过崤函通道进入渭河平原。而反过来说，如果要想控制孟津，就需要控制洛阳盆地。对于周王室来说，最初的孟津应该是在他们自己的掌控之中的，不过在王室衰弱之后，他们已经不能控制任何战略要点了。

在《新郑控制区示意图》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洛邑的下方有两条分别来自于“熊耳山”和“嵩山”（又称外方山）的龙脉在此交汇。它们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相汇之处被称之为“龙门”，伊河的河水也正是通过龙门进入洛阳盆地与洛水相汇的。让龙门得以名扬天下的是“龙门石窟”，但实际上早在 4000 多年前，龙门就已经有了人工开凿的痕迹了。只是那一次，不是为了佛，而是为了人。



龙门（伊阙）卫星图

孟津、函谷、虎牢、龙门，是洛阳盆地的四个战略通道。如果东迁尚不足以让王室认识到衰弱已是必然，那么丧失对这四个通道的控制权，则毫无疑问的告诉王室，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你了。率先发难的就是那个王室信任有加的“郑”国，王室对于“郑”的信任并不低于“虢”。在东迁当中，郑、晋、秦、卫四国也是出力最多的国家。在东迁之后，上述四国也是拱卫王室外围的主要力量。阴谋论者可以为郑晋秦卫四国护卫王室的行为找到很多利己的理由，比如秦人就成为了王室东迁的最大获益者。不过如果要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郑国在这次东迁当中，无疑是早有布局的，这也让他们在春秋争霸中抢得了先机。

第七节 勤王四国与东周王室的地缘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洛邑所处的洛阳盆地的地理结构，以及为其扼守东、西两大门户的“虢”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周王室来说，洛阳盆地的体量使得它本身并不能像渭河平原那样容纳更多的封国。也就是说仅仅依靠洛阳平原的力量难以保证王室的安全。因此周王室需要在洛阳盆地四周的地理单元中，选择出能够信任的封国加以扶植，以帮助王室抵御那些边缘民族的威胁。

由于洛阳盆地的南部有秦岭的那些余脉作为屏障，龙门天险足以自保。因此东、西、北三个方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具体的说就是虎牢（东虢）所对应的中原地区；崤函（南虢）所对应的渭河平原；孟津所对应的河北平原。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山西上的临汾——运城盆地。它所对应的就是北虢所据守的黄河北岸的渡口，具体的名称是叫“太阳渡”。换句话说就是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地区，是与洛阳平原相邻的四个地理单元。除却在四个关口上布置自己的亲信力量以外，这四个单元也要有诸侯能够独挡一面，以彻底清除那些野蛮民族的威胁。



勤王四国与东周王室地缘关系图

在王室东迁的过程中，有四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力量，分别是秦、晋、卫、郑。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地理位置，会发现他们正好对应着洛阳盆地所邻近的四个地理单元。即秦对应渭河平原，晋对应山西高原，卫对应河北平原，新郑对应中原地区。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巧合，因为没有历史学家们提示出其中的地缘关系。不过事实是勤王的诸侯并不会只限于这四个国家。之所以这四个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地缘背景是东迁之后的王室，希望他们能够为之消除各自地理单元的边缘民族。而这四个国家也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可以依靠这次勤王行动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以成为所在地理单元的霸主。

而从结果来看，秦人得到了在渭河平原自由行动的权利，并由此而正式进入诸侯的行列。之所以选择出身并不那么高贵的秦人，很大程度是因为贵族们已经对保有渭河平原失去了信心。让一个同样来自西方，并且对王室表现出足够忠诚的部族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而晋人在消除山西高原上那些戎人的威胁之前，首先将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诸侯国尽收囊中。这些也都是在王室的默许之下。

对于本来就倍受王室信赖，尽收河北商人旧都之地的卫国来说，他们得以巩固河北平原第一大国的地位。尽管卫国在后世的争霸过程中并不十分出彩，但他们也得以保持了一个记录，即唯一没有被秦始皇灭掉的诸侯国。卫国实际上是被秦二世彻底消灭的，也就是说，它成了“笑”到最后的人。当然，那时的卫国已经仅仅是象征性的了，封地也已经不在河北了（秦为何要留卫国这根独苗做摆设，至今还是个谜）。如果说晋、卫两国本来就是在自己的地理单元进行扩张，而秦人也已经先期进入渭河平原的边缘活动，最终被授权在渭河平原上征战戎人也是其必然性的话，那么“郑”人最终得以在中原地区发展，并过上一把小“霸”瘾，就可以称得上是处心积虑了。

第十章 郑国东迁中原并在周边地区扩张

第一节 郑桓公在犬戎入侵前向中原转移人口和财物

对于原来身处渭河平原东侧，为王室把守“崤函通道”西大门的郑人来说，他们最终选择在洛阳盆地的东侧重新立国，并非缘于犬戎的那次入侵。事实上在公元前 774 年，郑人就已经开始将人口及财物向中原地区转移了，而犬戎入侵镐京则是在公元前 771 年，平王开始东迁则是在公元前 770 年，我们不得不为郑人的未卜先知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做出东迁决定的郑桓公在犬戎的那次入侵当中，和周幽王一起被杀，但他的这项决定无疑最大程度的为郑国保存了实力，也为他的儿子“郑武公”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郑桓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能够未卜先知。事实上让他做出东迁决定的原因，和后来王室东迁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渭、泾、洛三河的水断流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 780 年，也就是那个败家亡国的周幽王继承王位的第二年，发生的原因据信是一场强烈的地震。对于严重依靠水资源的农耕民族来说，三条大河同时断流不得不说是致命的打击。对于中国的史家，或者说知识分子来说，惯于从人的角度来解读问题的本质。就像一个王朝的灭亡来说，末代之君往往被冠以“昏君”的名义，而“荒淫无道”则是最为常用的罪名。

如果要想将这个罪名坐实，一个美若天仙，又会狐媚惑主的女人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逻辑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往往是大好河山败于一个女人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只能处在从属地位。这种情况并非没有意外，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末代皇帝——光绪就没有担上这样的恶名。这一方面有赖于他进行了一场民主、进步而又短命的维新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仅仅有两个妃子。其中那个长得漂亮些的珍妃又是个悲剧性人物，未能坚持到王朝覆灭的那一天；而“祸国红颜”的另一个候选人——瑾妃，实在难以当得起“红颜”这个称号，即使是让最苛刻的人来评论，也决不可能认为她有惑主及覆国的力量。

好在光绪的妃子并不会是唯一的人选，那个被光绪称为“皇爸爸”的老太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担得起这个恶名。牝鸡司晨¹比狐媚惑主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尽管他们很多人并不相信，光绪如果真的执政就会比慈禧做得更好。之

1 牝鸡：雌鸡；司：掌管；司晨：报晓。雌鸡像雄鸡那样鸣啼，指母鸡报晓。多用来比喻女人篡权乱世，人们认为此是凶祸之兆。

所以作上述这些评论，是想告诉大家，将一个王朝的兴衰寄于一人身上，特别是一个女人身上是非常可笑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王朝周期性的更迭是有内在规律的。关于这一点，已经很多专著说明了。黄仁宇先生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了这个问题。

就我们所要观察的角度来看，水源的断绝是造成周人放弃渭河平原的根本原因。也许他们还寄希望于河流可以复流（后来也确实又复流了），但犬戎的到来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要稻草。关于客观环境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古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不过他们习惯于把天灾的发生归结于帝王个人操守出了问题。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天灾的发生，突出了帝王在个人操守上的不足。

换句话说，如果你仔细研究历史，会发现那些开国之君在对待后宫的态度上，并不一定会比他的末代子孙更君子些。只不过通过王朝更迭的洗牌，社会矛盾得到了充分的缓解，新的矛盾还没有积累到质变，他们的个人操守问题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试想一下李隆基取儿媳杨贵妃的事情，如果放在一个末代国君身上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第二节 太史伯对郑国东迁选址的建议

关于郑国东迁这件事，史书上是明确记载的。当感觉到渭河平原已经不适合作长居之地以后，郑人是最先决定搬迁的。搬迁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搬到哪里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郑人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否则肯定不能作为选项。南方有秦岭阻隔，如果不是为了观赏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暂时也不会成为考虑的对象。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西方和东方了。西方郑人是肯定不会考虑的，那里仍然是戎人的地盘，秦人在那里征战了多年也没有平定。因此对于郑人来说，只可能向东方迁移了。

问题是环顾洛邑四周，经过历代周王的分封，已经没有空间了。对于当时的郑国国君——郑桓公来说，他希望找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来帮他分析。很幸运，他找到了，这个人被称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职责中的一项就是负责修史。既然一时找不到后知五百载的“神人”，那么找个前知五百年的史官来问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从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单元等方面来谈及地缘结构的变化。这一方面可以让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转得头晕；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我们的视角，从全局的角度看待历史的兴衰。不过对于一些关键性人物，我们还是必须花些笔墨的，而太史伯就是这样一个人。

太史伯为郑桓公提出的建议是在“虢——郛”之间建国，虢指的就是东虢，而郛的封地就是后世的“新郑”周围。这一地区地处嵩——箕山的东侧，如果将东迁的郑国建在这里，一可以背靠高山，减少自己的防御面；二可以以王室为依靠，或者缓冲，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扩张。问题是这种建议在王室权威尚未消失时显然有些超前，毕竟这两个国家是经过正式封建的，特别是“东虢”还是属于王室最为亲信的诸侯国之一。

因此郑桓公希望将东迁的地点设定在王朝的南部边缘。江汉平原是郑桓公最先想到的，毕竟江汉平原的农业潜力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从那些自视为蛮夷的“楚”人身边夺取土地，比从“虢”、“郛”两国身上下手，要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郑桓公之所以能做这个构想，主要是缘于汉阳诸姬已经扼守住了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汉平原进一步压缩楚人的空间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向边缘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说周人所封建的诸侯国，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后再换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国名也不会换。当然，这一次如果郑人成功了的话，我相信他们还是会用“郑”这个名字的。

太史伯显然没有郑桓公这么乐观，因为他对楚人的力量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一个作战略转移的国家来说，和这样的强敌对抗显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结束这段谈话时，他将秦、晋、齐与楚一并视为王室衰弱之后能够兴起的国家。如果这段谈话不是后人附会的话，太史伯应当是中国最先意识到边缘地区力量的人。既然向江汉平原迁移的第一方案已经被太史伯否定了，那么移居南阳盆地则成了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陕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经领王命在南阳盆地的北部立国，诚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里原先也并非无主之地。

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谢西九州”。“谢”指的是古谢国，地点就在现在的南阳市（古亦称宛城）。这里目前被认为是谢姓的发源地，申国的新封地就在那里。至于“九州”的意思，并非完全是后世代指“中国”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为一“州”，而“九”则是一个泛指的大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已经臣服于周人的地区。也就是说郑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阳盆地西侧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国。不过在太史伯看来，申国西面的那些子民并非那么容易训服，他很怀疑郑人是否有力量在那里立足。后世中央帝国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开创者。

当然，根据方位的不同，可以将之改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将勇武而又与周人有亲缘关系的申戎放在南阳盆地，就意味着南阳盆地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么最先被放在陇右征战戎人，后

又被授权在渭河平原收拾残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参考。太史伯当然明白郑桓公的顾虑是什么，不过就像后世评书里的那些神机妙算的“军师”一样，他已经为郑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来，王室失于戎人之手是迟早的事，而“东虢”和“邠”两国的国君私心极重，必不会来勤王。到时候，忠勇护主的郑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门户，以儆效尤。当然，洛阳盆地的东大门不能没有人看守，在这个时候王室将这两个不忠之国的封地分封给东迁的郑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最终的结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预测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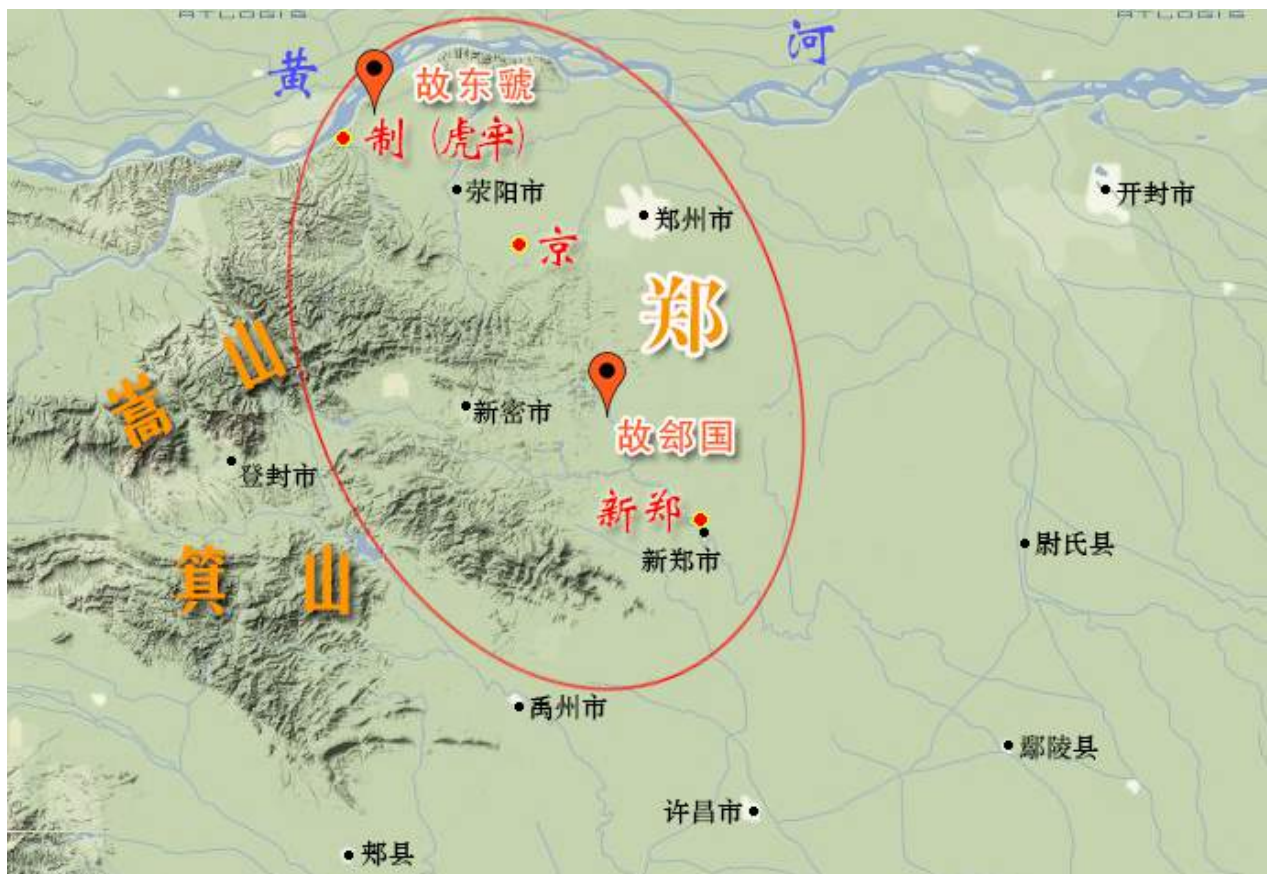
第三节 郑国东迁中原后灭掉东虢和邠两国

在东迁之后的第三年，郑人就借着视查“虎牢”防务的机会，将东虢从地图上抹去。而王室对此则是持默许的态度。对于王室来说，在犬戎之祸中忠勇护主的郑人（郑桓公甚至为此丢了性命），比之贪生怕死的“东虢”要更可信得多。邠国甚至在王室东迁之后就立即被郑人所灭，与之相比，东虢的那身黄褂还让他们多活了两年。顺便说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据说是因为周穆王曾经在此关过老虎方得此名。只不过，后人显然对周穆王西游艳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兴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经到东方抓过老虎。根据虎牢所处的位置，这只老虎很有可能是华南虎，而且决无可能是用年画翻拍的。

实际上郑桓公在结束与太史伯的谈话之后，就马上开始行动了。就此灭了“东虢”、“邠”两国当然是不现实的，郑人需要等待时机。不过先将财物和人口转移过去却是可以的。这需要虢、邠两国的配合，也就是说需要他们先让出点土地来安置郑国的人口和财物。这个时候，郑桓公在王室的官职发挥作用了。作为为王室主管征发徒役、劳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问地方诸侯要点土地来寄放家财，只会让这两个国家感到荣幸。只是如果让他们知道郑国的最终目的，恐怕肠子都会悔青了。郑人所得到的土是在虢、邠之间（荥阳境内），也就是两国在相会之处各让出了部分土地来孝敬上差。而郑人后来在那里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城作为“京城”。

对于郑人来说，灭掉“东虢”还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毕竟“虢”国人是深受王室信赖的。不过对于志存高远的郑国人来说，已经选择了将嵩山——箕山作为靠山，那么留下这么一个战略通道在王室手中，并不能让郑人感觉到安全。事实上他们所担心的并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迟疑下手只会让潜在的竞争对手抢得先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东迁后的西虢最终没于晋人之手。

这也为郑国后来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东迁后的郑国示意图

在灭掉了“东虢”和“郕”国之后，郑人的核心区也就建立了。他们在郕国国都的南侧又建起了新都，这个国都也就是“新郑”。最终郑人正是依托虎牢——京城——新郑三地所构成的核心区开始了他们的复兴之路。而最初引领郑人的就是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写在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郑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叫法是否就是后世将帝都称之为“京城”的开始。

第四节 太史伯建议郑国向谢郑之间进行扩张

对于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的郑人来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进行扩张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得一小块生存之地，郑桓公也没有必要和太史伯进行那样深入的谈话。关于郑人扩张的方向，太史伯实际上也为郑人指出来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谢郑之间”。“谢”我们已经知道了是指南阳盆地的“申”国；而“郑”则位于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东侧。找到这个地点在现在的位置并不太难，诚如中国的很多地名一样，这个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现在只是根据它的行政级别在后面加了个县字而已，

全称叫作“郟县”。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北部，行政上归平顶山所辖。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郑国扩张路线图》，会发现，太史伯所指的这一地区实际是在箕山与南阳盆地之间，也就是伏牛山的东部边缘地区。如果王室能够依靠余威而保持洛阳盆地稳定的话，这种沿着山地边缘扩张的路线，显然可以让郑国获得边缘地区的身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太史伯所述，这一地区显然还没有归于王化。不过与南阳盆地的谨慎相比，太史伯似乎对郑人消化掉这里更有信心。



郑国扩张路线图

对于消化那些体量不大，而又缺乏足够战略纵深的边缘民族，姬姓诸侯们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农耕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人口基数，以及技术的优势是他们信心的来源。因此太史伯不建议郑人进入南阳盆地的原因，更有

可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开楚人的攻击。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王室衰弱之后，楚人很有可能崛起，而他们最先进攻并谋求消化的地区就是南阳盆地。有申国和汉阳诸姬作为缓冲，郑人也许有足够的时间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

如果要想向南发展，那么位于黄淮平原西侧的一系列封国显然并不会感到高兴。这些封国主要包括许国（今许昌）、胡国（今漯河）、蔡国（今蔡国）、息国（今息县），对于这些“地主”来说，尽管郑人属于王室近臣，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扩张欲以及虢、郕两国的下场让每一个国家都感到不安。与他们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之前被划入中原强国圈的卫、宋、鲁三国。如果说卫国与郑国之间有黄河和济水作为缓冲；位于泰山西侧的鲁国又距离尚远；那么同样处在中原核心区的宋国是最容易感受到郑人的威胁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郑、宋两国成为了中原争夺战的主角，

双方也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过自己有号令诸侯的能力。

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他们无疑是王室最为信任的诸侯国，这也从王室对他灭掉东虢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郑人甚至已经可以说成为了王室的代言人。这不得不说是太史伯为郑人选了一块在洛阳盆地附近的风水宝地之功。相比于勤王四国中的其他三国，郑人的位置显然是与王室最为亲近了。虽然我们一直常说“距离产生美”，但如果你想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时候，还是离他近些比较好。特别是在东迁时的周平王只有 12 岁的时候，离他最近的人显然有办法将自己的权力放大。

本来那个一直在王室左右，而且一直倍受王室信赖的“西虢”也是有机会重振雄风的，不过总得有人为渭河平原的这次战乱承担责任。而西虢之主（虢石父）据说就是献计点燃烽火以搏美人一笑的奸臣；而郑桓公那时则扮演的是一个忠臣的角色，他不仅劝阻周幽王不要这样做，最后还以身殉职。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虢石父是否真的出了那个馊主意。不过在中国传统的史家看来，末代帝王的身边，女子和小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先前周王最为信任的西虢来说，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第五节 郑国灭掉胡国并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

当郑武公在“京城”站稳了脚跟，又成为王室最为倚重的大臣之后，他显然认为自己有力量进行扩张了，这也是他们进军中原的根本目的。现在就向东面进军，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早已在中原周边立国的卫、鲁、宋三国并不愿意看到郑国这个外来户从他们碗里分肉。而郑国也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新得来的土地。不过这并不代表郑人就不会有所行动了，基于之前所定立的战略，南方直至南阳盆地的土地是扩张的主要方向。

最先被拿来祭旗的是一个叫“胡”的国家，这个位置基本上位于郑国核心区（也就是之前“虢”、“郕”两国的土地）与南阳盆地中间，中心地区在目前的河南省漯河市。关于郑国灭胡国，经典之处在于郑武公先把女儿嫁给了胡国的国君，然后又杀了一个力主灭胡的大臣（名叫关其思）。这种做法显然让胡国人倍为感动，而这一切显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胡国的覆灭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并不能怪胡国人没有防人之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东周之前的战争手段。甚至在不久以前，郑人在攻灭虢、郕两国时，还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未去勤王）。

不过对于处在春秋乱世的各诸侯国来说，他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危机四伏的生活了。当然也并不是每一次联姻都代表着危险，这更多的是取决于你的实力。对于意在中原的郑人来说，南阳盆地的“申”国就是郑国的另一个联姻对象。也许郑人



郑国和胡国位置图



秦陵铜车马

将虎牢至方城夏道的土地都消化掉以后，申国会成为下一个胡国。但在此之前，这个实力颇强的国家还是郑人联合的对象。郑人的这种“远交近攻”之法并非出于偶然，在后期的中原争霸中我们还会经常看到类似的例子。如果郑人善于总结的话，这种战略性的外交手段，应该不会等到战国时才会由秦国提出来。

不过郑人的这种非常规做法，在春秋初始还有显得有些异类。因此明显的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甚至于连王室也开始觉得郑人有些尾大不掉了。尽管在之后的大部分岁月之中，王室已经接受了自己只作一个配角甚至龙套的角色。但在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之前，王室还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局势的。对于王室来说，最先做也是最容易做到的是表明自己态度，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并不是郑国的天然支持者。具体的方法就是分权，让那个为王

室镇守东大门的“西虢”重新受到了王室的器重。虢国公（西虢）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成为了“右卿士”，而郑庄公为“左卿士”。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是以“右”为尊的。

另外说下“虚左以待”这个成语，其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很多时候被用来证明先秦亦有尊左的习惯。其实通读一下原文就会清楚了。当时的情况是公子（信陵君）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自赶马车去接那位“夷门侯生”。由于古代的赶车人是坐在右边，乘者是坐在左边的，因此才有虚左以待之说。

赶车人之所以要坐在右边，是因为一般人是右手执鞭，如果坐在左边的话，会影响到乘者的安全。所以只是一个实用的安排，与尊卑无关。如果就此理解为马车上以左为尊也可以，坐车的总是比“司机”要高贵些的，但用来证明文化上的以左为尊就不对了。

周王室这种行政上的调整预示着郑人对王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们需要有新的手段来恢复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在此之前，郑人需要先解决内部的矛盾。家和万事兴，对于家国一体的中国人来说，郑国国君家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容易造成混乱的时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这里所说的“改朝换代”既包括外部原因造成的王朝更迭，也包括内部原因造就的储位之争。而郑国时下所遇到的麻烦就是属于后者，而起因则是郑武公去见郑桓公了。

第六节 武姜偏爱次子段为郑国君位之争埋下隐患

对于君位传承的顺序，周人做法与商人明显不同。为了保持家族的稳定性，以及血统的一致性，周人所定立的家法（也是国法）是嫡长子继承制。“嫡”是指正妻所生，而“长子”则是指最大的儿子。而商人的做法则要随意许多，兄死弟及，亦或再将君位传回给兄之子的事是经常有的。在后世的游牧民族中，这种做法也是常见的。这也成为华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而郑武公的夫人正是来自申国，不过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在于她能够为郑、申两国的友谊做出多大贡献。对于这位戎人出身，被称之为“武姜”的夫人来说，对周人礼法制度的理解程度明显没有根正苗红的郑武公来得深。具体的表现在她希望自己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成为君位的继承人，而所陈述的理由是老大生孩子时让她承受了更多的痛苦，换句话说也就是难产了。至于这种感受是否是因为第一次生产经验不足所造成的，并不是这位夫人所关心的。总之在她心目中，老二才是最有孝心，也是最应该成为郑国之君的人。

于是一出被中国历代政治家引为经典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拉开了序幕，而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中学的课文之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郑伯就是郑庄公，也就是真正让郑国成为中原小霸的人；而“段”又叫“共叔段”，就是那位在出生时就显得更有孝心的小儿子。郑武公作为一家之主，也是一国之君，并没有同意武姜的这种提议，老大最终还是成为了郑国的君主，也就是郑庄公。不过除了长幼有序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外，“孝道”也是周人包括后世其他王朝所遵循的原则。因此有着君位的郑庄公和有着母亲支持的“段”之间的争斗也就再所难免了。关于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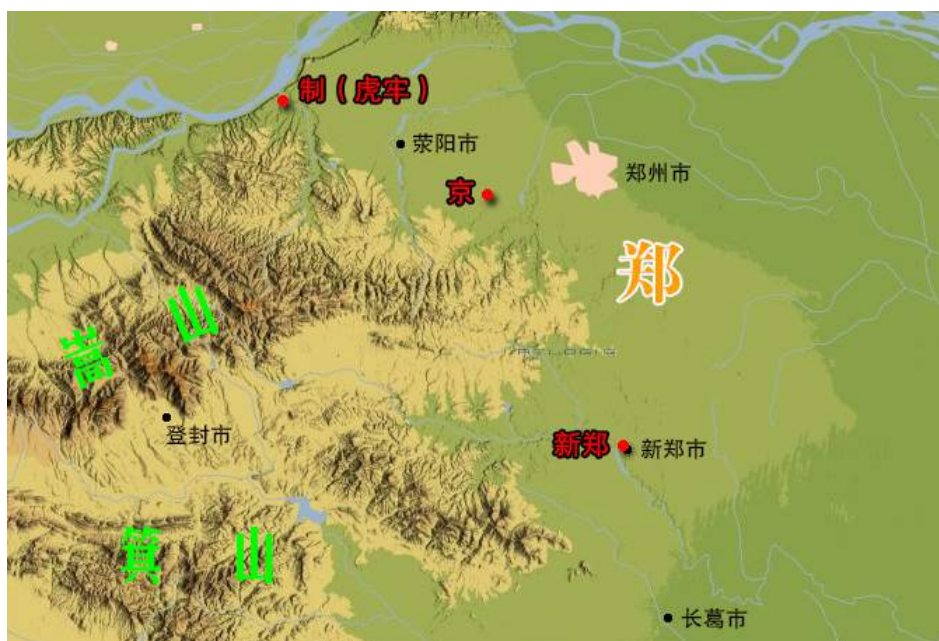
故事的基本内容，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熟知了。我们的关注重点则在这其中所包括的地缘问题。

第七节 郑庄公将京城让给段作为封地

《郑伯克段于鄢》里面一共出现过四个地名，分别是：制、京、焉、共。让我们在图上先仔细观察一下这四个地名都在哪里，它们与郑国的地缘结构又有怎样的关系。

郑庄公的母亲从心里是希望小儿子“段”继承君位的，问题是郑武公并不赞成这种做法。特别是郑武公去世时，继位的庄公刚满 15（虚岁），在古人看来，这个年龄只能勉强算是“舞象之年”，也就是刚好够上战场的年龄；而“段”的年龄显然是未成年（比庄公小三岁）。将一个刚刚稳定下来的新国家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何况这也有违礼法。由此看来，那位“武姜”夫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历来的君位之争都是存在变数的，即使是王室未迁之前，各国的宫廷政变也是时有发生。对于庄公来说，那个一天天长大的弟弟就是他最大的威胁。

庄公继位时，“段”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对于武姜来说，在这种时候就以段为主策划政变夺取郑庄公尹位并不是个好主意。因此为他寻找一块有地缘潜力的封地以积蓄力量，是稳妥的办法。武姜为小儿子选定的封地叫作“制”，也就是东虢故地——虎牢。那个从小不受母亲喜爱的庄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将如此重



郑国三城位置图

要的战略要地交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无异于将性命交给了对方。因此庄公拒绝了这个要求，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意思就是：虎牢之地是个险要的地方，当年东虢



荥阳郑国京城城墙遗址

由于当年恒、武两公的悉心经营，“京城”的规模已经非常宏大了。以至于在后世它的行政级别被定为“县”的时候，不得不在城中间修了一道城墙，以使它不至于超越一个“县”城所应有的规模。将这样一个位于核心区中央，而又规模宏大的城邑交给“段”，危险指数并不会低于让出“制”地。只是庄公既然已经答应了母亲，也就只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了。非常有可能的是，武姜当时想要的就是“京城”，因为这个位于郑国中心的城邑更能切割庄公所能控制的土地，而先提出要“制”地不过是一种技巧罢了。这种给对方下套的做法，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商场，都屡见不鲜。

最终的结果也是向着有利于“段”的方向发展。占据了郑国的中心之后，“段”很自然的开始向北和西两个方向蚕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郑国将会由北向南一分为二形成对抗。对于武姜和他宠爱的小儿子来说，并非没有相似的案例可循。因为与此同时，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小宗代大宗的好戏，那个被称之为“曲沃桓叔”的晋

的君主就是因此而身亡（也就是说我不愿让弟弟去承担这个风险）。如果要其他的地方，我都会听母亲的。

我们知道，新“郑”国的核心区就是东虢和郕国的故地。其中最为重要的城邑有三个，最北边的就是东虢故地“虎牢”（也就是郑人所称的“制”地）；中间的是东迁之初所建的初都“京城”；最南端的则是郑人在郕国故都附近所修建的新都“新郑”。既然“制”地已经被庄公所否决了，并且理由显得那么的善意。而将从庄公手里“抢楼”，将都城“新郑”作为段的封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规的想法。因此无论是谁，都会将第二方案锁定在“京城”之上。

国贵族，已经率先向君位发起挑战，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曲沃桓叔被封曲沃的时间为公元前 745 年，而郑庄公继位的时间为公元前 743 年）。

第八节 郑庄公先发制人击败段迫使其逃亡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段”具体是哪一年被封到“京城的”，不过在公元前 722 年，双方的矛盾终于开始爆发了。这离郑庄公继承君位已经有 23 年了。对于段来说，他需要时间来积蓄力量。而对于庄公来说，他同样需要时间来布局。尽管在后世，帝王们往往只需要发现有人有谋反的企图，就会毫不手软的将之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时候，与帝王的血缘关系并不会成为救命的稻草。相反，在大部分的时候，这正是惹来杀身之祸的原因。

但在周之礼法尚有余威的时候，郑庄公并不愿意承担道义上的风险。也就是说，他需要等待“段”的意图表露无疑的时候再动手。这与他们共同的母亲——武姜尚在也不无关系。郑庄公的这种等待也让他的大臣们感到不安，对此他的回答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当然，郑庄公创造性的总结出这句名言，并不代表他真的只会等待结果的发生。对于一个即将创造春秋霸业的人来说，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最终的攻击还是由郑庄公发起的，结果是“段”不得不向南跑到了一个叫“鄆”的地方。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做法，这个地名也被保留了下来，现在它的名字叫作“鄆陵”县，行政归属河南省许昌市。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南方正是郑国扩张的方向。无论鄆地当时是否已经为郑国所吞并，它的左近都没有其他大国为它提供保护。因此郑庄公很快又攻下了鄆地，而“段”这一次必须寻找一个大国，来请求政治避难了。而另外三个中原强国鲁、宋、卫都是有力量为他提供保护的国家。

“段”最终的选择是越过济水、黄河，到卫国去寻求保护。对于段的这种忽南忽北的大范围转移，后世的我们可能会不太理解。这样做难道不会遇到郑庄公的堵截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春秋之时，人口的密度较低，尚不足以铺满每一寸土地。也就是说，城邑及它的周围才是人口密集之处，而城与城之间存在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尽管他们在名义上可能属于某个封国，但很多时候不要说军队，就是普通居民也不会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马够快，突围并不是一件难事。另一个原因是中原腹地的地势平坦，并没有天然的山脉提供可以据守的关口，这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想法成为一种奢望，也让围捕者无法预知被围捕者运动的方向。

卫国将逃亡过来的“段”安置在自己的西南部，一个叫“共”的地方（目前为河南省辉县市地）。“段”也被称之为“共叔段”，这种叫法有可能是因为他避难于“共”地而得名。就像他在京城时，被人称作“京城太叔”一样。不过这个“段”字终究是他的本名，他也因此成为了“段”姓的始祖。



郑卫位置图

关于庄公与“段”之间的战争是谁先发起的，实际情况有点像苏德战争一样。在那场战争中，苏联之所以在初期遭受重大损失，是源于他们本来也是想发起进攻的，也就是说苏联前线的战略部署都是为进攻做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德国人的闪电进攻，初期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段”当时也正准备主动向新郑进攻，而庄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一则可以将“段”的谋反之事坐实；二则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果段事先能够得到消息，固城以自守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场内战将变成一场拉锯战。

郑国的这场内战之所以被引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郑庄公的老谋深

算。郑庄公的这种深谋远虑也使得郑国能够率先从春秋诸国中脱颖而出。经过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三代的经营，郑国俨然已经具备了霸主之相。而他们也被“郑”姓人氏奉为始祖，合称“郑氏三公”。郑国之所以能够在春秋初年如鱼得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倚仗王室的力量。一方面王室所占据的洛阳盆地可以解除郑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郑人也可以凭借王室这块金字招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易中天在为曹操辩解时曾提到，曹操是“奉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基于曹操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不过在春秋时期，能够拥有自己一片天地的王室，应该还是当得起这个“奉”字的。只是对于天下共主的来说，被别人“奉”起来做傀儡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能够自己发号施令才是“王”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在郑人完成内部整合，并愈发显得霸道之时，王室开始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第十一章 郑卫之间的矛盾与郑国衰落的原因

第一节 周郑交质让郑国失去了周王室的倚靠

在郑庄公平定“段叔”之乱后的第三年，周平王做出了一个决定，即重新重用“西虢”国。当时郑庄公在朝的职业是“卿士”，这个职位和后世的宰相，以及现在的总理相似。而周平王的想法就是将“卿士”一职分为左右两职，这与后世的左右丞相之法类似，应该说是保持权力平衡的正常做法。只不过春秋之时以“右”为尊，隋唐之后则以左为尊。而这个“右卿士”的位置，周平王则准备让搬迁至陕县的“西虢”国君来担当（也就是南虢）。

这种想法当然会让郑国人感到义愤，而面对郑庄公的质问，周平王所能做的就是否认。只是郑庄公显然并不相信这个答案，于是一出旷古未见的奇事发生了。随后郑国和王室互相交换质子，也就是将自己的儿子交由对方为质，以取得互信。尽管这种做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常见（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就曾经在赵国为质），但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竟然与一个诸侯国互换质子，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这等于向天下表明，“周”在事实上已经将自己降为诸侯国的一员了，笼罩在“王”身上的光环开始消退，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了。郑国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赢家，只是他们真的有可能笑到最后吗？

对于王室来说，事情本来并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当郑人在中原坐大时，秦、晋、卫三国应当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问题是，刚刚加入诸侯行列的秦人还在渭河平原上征伐。在他们未能扫平丰镐之地的犬戎之前，并没有可能介入这场争斗之中。而晋国则一直是王室所倚重的重臣，按理说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替王室出头。只是当时的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大、小宗之争。对于王室来说，所有正统地位的大宗当然是被支持对象。只是以运城盆地为基地的小宗已经占据了优势，即使是大宗的晋侯有心驰援王室，也无法绕过小宗。现在看来只有卫国能够成为可以依靠的对象了，而最终为王室出头的也的确是卫国。

在周、郑交质之前，郑人可以凭借自己“卿士”的位置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他大国虽然对于郑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但碍于王室与郑国的关系，并不好指责郑国。不过现在看来，郑国与王室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无法修复的地位了。因此周边的大国终于有机会，可以对这个新来的“暴发户”群起而攻之了。最先挑头的当然是那个同样倍受王室器重的卫国了。卫国人之所以收留了段，也是为将来在郑国扶植起一

个受自己控制国君做准备。这种做法和现代政治家们的做法无异，今后我们还会看到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发生。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时期，灭掉一个国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扶植一个对自己没有威胁的国家作为缓冲，是大国们所惯用的控制手段。

从郑国的角度来看，能够要挟王室当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从单纯防御的角度看，郑国所在的中原之地其实是个四战之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西面嵩、箕两座体量不大的小山脉，以及北面的黄、济两河。这固然可以让他们在中原诸国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让郑国在诸侯国中独大。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实力以一敌众的时候，就抛弃了王室这杆大旗有些早了。

尽管王室的权威已经江河日下了，但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只会让郑国成为众矢之的。而这样做的具体后果就是，郑国不得不开始面对来自四方的地缘压力。特别是王室所在的洛阳盆地与河北平原的卫国。对于郑国所表现出的扩张欲，同为勤王四国的卫国当然不会感到舒服，只不过碍于有王室为郑人撑腰，因此只能静观其变罢了。而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即使王室的力量暂不能为卫人所用，但也不会为郑人所用了。

第二节 卫国收留郑国政敌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庄公克“段”之后，“段”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有一种说法是“段”并没有脱身，跑过去的是他的儿子“公子滑”。不过到底是谁跑过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卫国收留了庄公的政敌。这种收留他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对政治家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对于收容国来说，如果被收留者有机会回国执政，那么所能取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最低限度可以降低该国对自己的安全威胁。不过这种买卖也不是谁都能做的，最起码你要有力量抗衡对方的压力。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达赖不是跑到印度，而是尼泊尔；西哈努克不是到了中国，而是去了老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金刚钻的国家是不会揽这瓷器活的。

从卫国收容在郑国失势的“段”也可以看出，卫郑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是不可调合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同为中原强国，并且相邻，地缘矛盾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家都是勤王四国的成员，卫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与郑人同等的地位。而“段”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舍近求远，从南边的“鄆”地

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也许南阳盆地的申国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因为那个深爱他的母亲——武姜就是出于申国。但问题是庄公也是武姜所生，尽管他那么不讨母亲喜欢，但这仍然能够保证申国之于郑国的“舅国”的地位。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现实存在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为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的个人好恶而平生事端。可以肯定的是，郑庄公当然也不会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态度而疏远与申国的关系。

如果庄公不是武姜所生，情况可能会大为不同了。当日申族人为了保证同样母出申族的太子能够继承王位（也就是平王，申后所生），不惜引犬戎入侵镐京，并直接造成了西周的覆灭。我们并不能就此责怪申人不识大体，这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罢了。只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再次出头了。而卫国既然接受了这次机会，那么卫郑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卫郑之间的战争并非始于周郑交质（公元前 724 年）之后，在庄公克段（公元前 722 年），“段”的儿子公子“滑”逃至卫国之后，双方就已经注定要爆发冲突了。



郑卫地缘关系图

战事可以说是由卫人挑起的，只不过是公子“滑”出面，越过黄河夺取了一个叫“廩延”的地方。这个廩延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因此后世也被命名为“延津”（在现在河南省延津县的北部），之前在郑国的扩张当中已经并入了郑国。在段叔占据京城的时候，作为郑国北方门户的廩延已经被他强

行兼管了。这一次公子滑的由北而来，廪延是首先需要“收复”的。问题是，郑庄公的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廪延被迅速夺回了。而接下来，郑国开始对卫国兴师问罪了。值得关注的是，郑人为了处理这件由家事引发的争斗，动用了“王师”和“虢师”，也就是王室和虢国的军队。作为王室的卿士，郑国似乎有权力这样做。但这种做法明显有“假公济私”之嫌，由此而引发王室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郑卫与中原其他诸侯国图

中首次采取了联盟的方式。在随后的东周乱世之间，各诸侯国之前也进行过无数次的组合，以期在地缘格局和地缘实力上压倒对手。当然，这些同盟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唯一不变的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总是那些大国，而小国们更多的只能如墙头草一般左右逢源。

对于郑、卫两国来说，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对方吞并，因此在卫国的这次进攻后的第二年，郑国又开始主动进攻卫国。从此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当中。也许在他们看来，谁能够将对方斗败，就能够成为中原的霸主，进而成为春秋乱世中的强者。在初期的争斗当中，郑、卫两国也的确是主角，能够领导一些小国加入自己的同盟。不过用不了多久，双方就会发现，在春秋这场大戏当中，自己其实也只是

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前 722 年，也就是郑庄公平定段叔之乱的同一年。而在周、郑交质之后，卫国正式开始了反击，这一次卫人不仅自己出兵，还联合了郑国东面“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周围），南面的“蔡国”（今河南省上蔡）、陈国（今河南省淮阳附近）。这无异于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郑国进攻。而郑人这次已经很难从西面的王室获得支援了。卫国的这次联合进攻也开创了一个历史，即在诸侯间的争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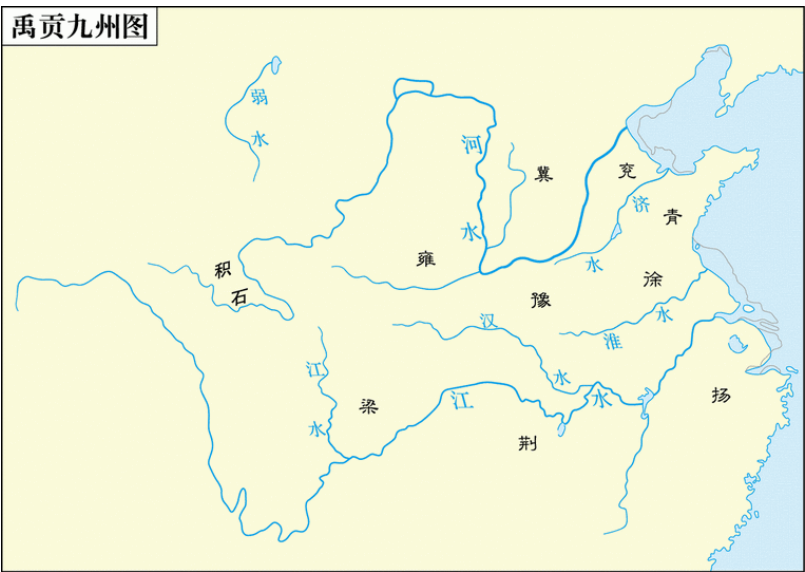
一个配角，尽管他们在剧本开始时的戏份比较多。

第三节 河济平原在春秋时的地缘地位相对不高

在郑、卫两国的争斗当中，有一个地理单元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河济地区”，也就是黄河和济水之间的地方。我们知道，黄河在春秋的时候仍然是走的北线，也就是按禹贡黄河的路线入渤海（黄河古称“河水”）。而现在的黄河下游，在当时则叫做“济水”，发源于太行山南部的“济源”。而它的周边则有一系列被以济为名的城市，如济阳、济南。河济之间的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河济平原”，由于它位于河北平原与中原、山东丘陵之间，也注定成为了一块夹心地，或者说成为黄河以北、济水以南的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



河济平原示意图



禹贡九州图

就河济平原而言，并非没有可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地缘力量，毕竟黄河和济水的切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在天下九州的划分当中，它的确也被单独划为“兖州”。不过在春秋乱世中，它注定不能成为主要的地理单元。这一方面是因为河济平原的地势过于平坦，没有高度优势。黄河和济水当然是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尽管理论上河岸的每一部分都有可能成为渡河攻击的对象。但实际上，成为渡口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水流、水深，以及上岸后有没有合适的道路都会成为渡口形成需要考虑的对象。因此渡河的地点还是有数或者可控的。

单纯以河为城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控制住渡口，而在于河流在冬天是否会结冰。如果河流会在冬天结冰，而过河之后又是可以四面出击的平原地区的话，那么对于防御方来说，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这也是在古典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在华北平原如入无人之境，但在进入江淮流域之后却举步为艰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影响河济平原地缘地位的原因是因为黄河的不稳定性。在战国时期各国开始筑坝以控制黄河走向之前，黄河在华北平原实际上是呈漫流状态的。它甚至在济水之北形成了数条支流，并造成了大片的沼泽地。这些漫流的支流也被称之为“九河”，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九条，按照古人计数的习惯，和我们现在用“N”来做数量词的意思类似。在这种地理结构影响下，河济平原只在靠近济水的部分存在一些小的封国，而它靠近西面的部分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卫郑两国的缓冲地和争夺的对象了。

第四节 郑国缺乏战略纵的地缘位置使其走向衰落

就郑国来说，并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相反郑氏三公的先知先觉已经让郑国抢得了先机。只是当年所选择的东迁地点，固然能够让他们在中原争霸当中拥有一定优势，但仍然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如果按照太史伯为郑国规划的南进方案，应当是一个阻力较小的选择，但这也无异于拉长了自己的防线。整个国家的东面没有任何可供防守的山脉，使得郑国即使能够在南线开疆扩土，也无法稳定的持有。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郑国在南线取得了对胡国、许国、陈国、息国等小国的一系列胜利。但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这些小国大多仍能保持独立。

郑国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在郑庄公在位时，向东他们已经扩张到现在的开封附近；向南则将国土延伸到许昌周边；而在河间平原，他们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顶峰的时候，郑庄公甚至召集了齐、卫、宋三国在延津附近会盟（公元前701年，古称恶曹会盟）。这表明郑国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最强者。

之所以要将齐国拉入，是与郑庄公的战略眼光分不开的。如果仅凭自身的力量，郑国很难在中原地区独大。特别是在西面的王室已经不能为其提供支撑之后，郑国在其他地区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同盟，以牵制其他中原强国的力量。在南面，通过联姻，南阳盆地的申国至少已经在郑国南扩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了；而在东面，郑国的选择则是与泰山以东的齐国结成稳定的同盟；而在北面，郑国甚至参与了晋国的小宗代大宗的战争。而与王室最初的态度不同的是，郑国人务实的选择了站在小宗的一面。

如果边缘强国本身并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并且能够稳定的与郑国保持同盟关

系，这些战略布局无疑能够让郑国成为中原的霸主。问题是霸主之梦你做得，旁人也做得到，尤其是那些拥有更广阔战略纵深的边缘强国。郑人之所以能够抢先出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边缘国家需要时间来整合自己所在的地理单元。而这些被整合的对象，有那些非华夏系的边缘国家，也有同样受王室封建的亲缘小国。而对于后者，在王室的权威尚存时，大国们至多只能使其依附于自己，而不能直接吞并。

如此看来，郑国最终的衰落似乎已经是命中注定了。在恶曹会盟的同一年，郑庄公病逝，郑国亦由盛转衰。传统的史家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郑庄公没有安排好接班人的的人选，以至于郑国内乱。这种看法倒是符合“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过郑庄公的继位难道就是一帆风顺了吗？如果再横向对比一下其他大国，没有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过君位之争，即使是在郑庄公病逝之时，晋国的大、小宗之战仍在继续。因此决定郑国命运的，仍然是它的地缘位置，即使郑庄公能够选择一位强势的继承人，也至多是将郑国的辉煌再持续一代。因为中原很快就要成为那些边缘强国的战场了。

第五节 郑国东迁地的假设及与王室关系恶化造成的影响

对于郑国来说，并非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假设历史永远不能得出标准答案，但也不妨站在东迁之前的郑人的角度，看看郑国人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一种选择是留在渭河平原。出于与王室的关系，郑国人应当很容易取得对渭河平原的管理权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郑国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并不会是犬戎，而是秦国。尽管在初期双方可能会合力将犬戎逐出渭河平原，但在此之后双方的竞争在所难免。判断这种竞争的胜利者会是谁是很困难的，不过相比于在中原四面受敌的地缘位置。郑人在渭河平原所要面临的形势要简单得多。而位于汾河谷地的晋国与洛阳盆地的王室，为其提供地缘支持的可能性很大。

抛开亲缘关系，郑人在渭河平原的扩张，要比直接进入中原争霸要更少触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毕竟将一块已经为犬戎占据的土地夺回来，与从其他封国手中蚕食土地性质有所不同。很不幸，郑人的先知先觉让他们希望成为第一个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的国家，因此上面的战略构想最终被秦人所实现了。而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如果能够选择另一块边缘地区作为根据地，也同样存在坐大的可能性。

应该说郑桓公当年希望进入江汉平原以及南阳盆地的想法并没有错。这两个地理单元最终都成为了楚人争霸中原的基地。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所提供的保护，能够让身处其中的国家有机会摆脱其他中原国家的干扰，完成内部整合。而

太史伯为郑人所选择的更为稳妥的方案也不能算错，毕竟对于一个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国家来说，直接面对已经兴盛的楚国并不是明智的举动。问题并没有出在郑人最初的选择上，因为这样能让郑国迅速的恢复国力，并直接获得王室的支持。只是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之后，马上就进入中原争霸的行列是否明智，亦或有其他的选择能让郑国的国运更加长久些。

毋庸置疑，与王室的关系恶化，是造成郑国形势急转之下的直接原因。在周平王的继任者周桓王试图恢复王室的权威时，郑国甚至对王室宣战。并且进入洛阳盆地收割王室的庄稼。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以北王室亦直接控制有土地，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温县附近，当时被称做温地。这表明王室将通往河北平原的通道两端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和在陕县的虢国地跨黄河两岸的原因是一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洛阳盆地的安全。如果郑国不与王室反目成仇，洛阳盆地的安全应该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只可惜本应该替王室把守东大门的郑国，这一次不仅直接入侵洛阳盆地，甚至还越过黄河，将王室在温地的庄稼也一并收走。这种做法有其战术上的目的，即向王室表明，洛阳盆地对于郑人来说，已无险可守了。

我们很容易认为，如果郑国能够保持与王室的和谐关系，它仍然能够借天子之威横行于中原。即使在后来，王室已经不能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了，但希望称霸的诸侯们仍然会选择尊王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不过问题在于，在王室的权威被郑国戳破之前，王室并不当然的认为他们会失去权威。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郑国使得王室威信无存，才使得后世的霸主们仅仅是对王室表达一些尊重，就可以让王室感激不已，并获得“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当然，能够成为霸主的根本原因，还是拥有足够的实力。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让事情变得事半功倍。

对于郑国来说，如果不愿意做那个出头的椽子，而是恪守人臣之道，也并不代表它不会失去王室的信任。除非它不在中原进行扩张，否则与王室的关系破裂是迟早的事。这是因为，中原诸国都是受过王室册封的诸侯国。郑人借王室的力量进行扩张，只会让王室失去对其他诸侯的影响力，并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死结，无论是郑人，还是王室，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无法解开。

如果重新让郑国选择一次的话，借助王室的力量与残存的影响力，挑起对楚国的战争是险中求生的方案之一，也许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对于周人来说，楚国是一个异类。将江汉平原作为扩张的方向能够最大程度获得王室以及诸侯们的支持。尽管周人在大洪山周围布置了诸多姬姓的封国（汉阳诸姬），并在南阳盆地迁入了申国以为后应。但这种以防御为目的的安排，最终仍然让整合好江汉平原的楚国各

个击破。如果郑国能够奉天子之令，领导这些国家对江汉平原发起主动的进攻，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即使在这个过程中，郑国对楚国周边的诸侯国进行整合，甚至吞并，亦不至于引起中原诸国的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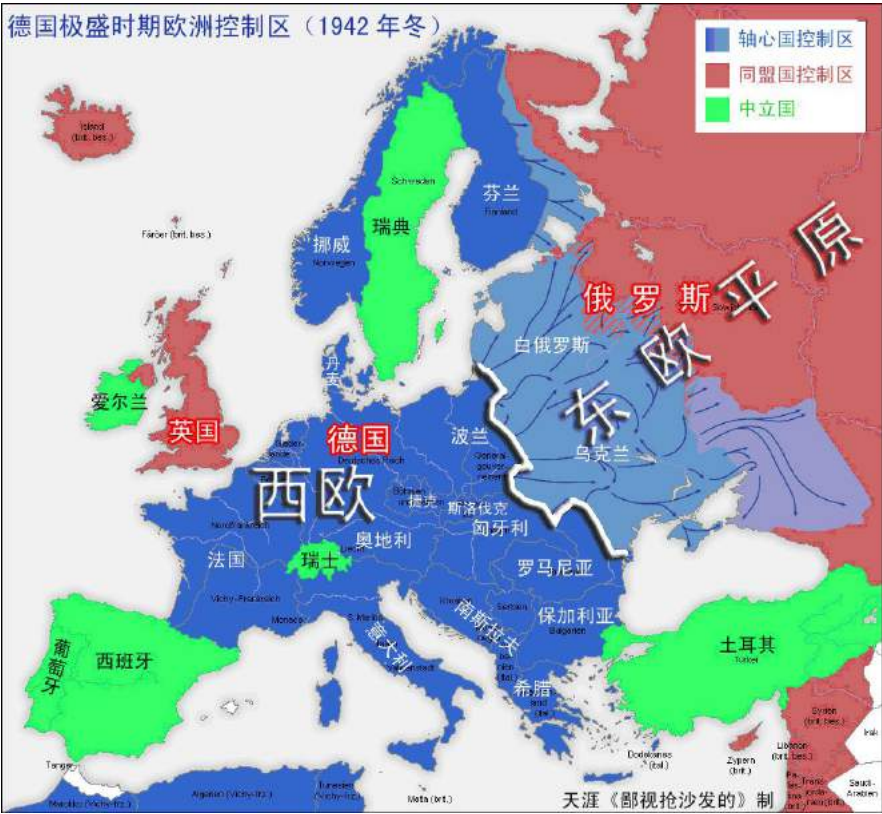
第六节 郑国与上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面临相似的地缘格局

我们经常喜欢将春秋乱世与现有的国际格局作对比，也因此能够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那么我们现在不妨也来做一下类似的对比，只不过参照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的国际格局，而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如果将欧洲看成春秋诸国纵横的舞台，那么那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无疑就是楚国的最佳人选。而在中原抢得先机的郑国的地缘位置则可以与德国类比。有所不同的是，欧洲并不存在周天子这样的共主，但共同的价值观或者阶级利益，使得他们并不希望苏联这个异类做大。其实无论俄国人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东欧平原与西欧的地缘矛盾都是现实存在的。这就好像楚人的长江文化始终是与周人的黄河文化有所区别一样。

德国之所以在最初的崛起过程中一帆风顺，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西欧诸国希望它能够将矛头指向东欧平原，去抵御俄国的威胁。在最初的时候，德国人似乎也准备这样做。不过最终他们还是选择先避免与苏联人对抗，而先去完成西欧的

整合工作。相比于郑国在中原的成果，德国人的整合工作要显得更成功些。只是这种整合的结果无疑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欧洲以外已经存在足够强的地缘力量，来影响欧洲的地缘格局的时候。而德国人随之再在东线发起的进攻，使他们陷入了两线作战，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郑人的选择和最初的德国一样，没能够抵



德国极盛时期欧洲控制区示意图

挡住核心地区的诱惑（对于德国来说是西欧，对于郑人来说是中原），而先将那些潜在的同盟作为了对手。有所不同的是，德国从表面上完成了对欧洲的整合，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而郑国并没有能够完成中原的整合，亦不愿意与楚国发生正面对抗。尽管做出东迁决定的郑桓公，最初的确想将江汉平原作为东迁的地点，甚至第二方案迁入南阳盆地也是为进入江汉盆地作准备。但太史伯的建议还是让他们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方案，而随之而来的就是陷入无休止的中原争斗当中，以至于失去了王室的支持。

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楚国，并不代表楚人对中原就没有渴望。正如德国如果不主动发起对苏联的进攻，俄国人亦会主动向西欧扩张一样。在分析到楚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楚国很快就会成为郑国的恶梦了，在将势力范围覆盖至南阳盆地之后，楚人也开始了争霸中原的征程。而对于这个时候的郑国来说，楚国并不会是唯一对它施加压力的国家。正如德国人一样，无论他们是否先向俄国人发起攻击，四面受敌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郑国的命运已经被定格了，下一个地理单元将会是河北平原。卫国会是主角，而那个游离于春秋政治圈的燕国也将会出场。到时候我们将有机会了解黄河下游在春秋时期的走向，以及它对河北平原地缘地位的影响。

第十二章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并调整和安排封国

第一节 周人在商王畿故地部署三监以监视商王室

在武王最初的封建当中，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以及河北平原（南部）是重点。这很好理解，因为这里是商人所占据的核心区。而从商人手中夺得天下的周人，首先要做的就是瓜分商人的直接领土。而那些臣服于商人的边缘民族，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愿意臣服于周人，亦可以原地予以封建。反之，则可以逐步吞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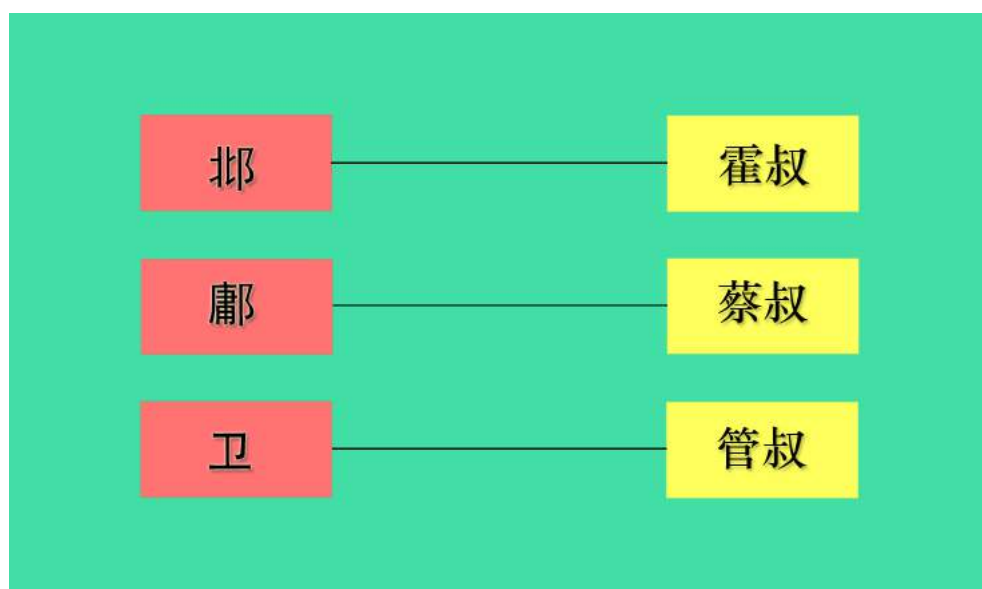
由于商人在后期已经将政治中心迁回至黄河北岸，用专有的名词说就是商人的“王畿”在河北平原的南部。这一地区是周人需要重点整合的地方。先秦的惯例是“灭国不灭祀”，也就是即使你将一个国家灭掉了，也应当另外给块地方让他的宗室建“国”，以祭祀祖先。当然这个“国”已经是名义上的了，很多时候也就是在被灭国的宗庙陵寝附近划块地，换句话说也就是让他们去守陵。这个规矩到了后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已经不能被严格遵守了。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不遵守这个惯例会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对于新的天下共主来说，没有比保留商族王室的宗庙更能安抚前朝遗民的了。因此纣王儿子（武庚）被允许留在了朝歌，以为商王室保留香火。

不过这并不代表周人就能够完全信任商人了，相反，周人为此做了周密的部署。这一部署历史上被称之为“三监”，具体的措施就是将商人的“王畿”分为三个部分，由武王的三个弟弟去管理，根本的任务则在于监视商王室，以免死灰复燃。这

三个部分被称之为“邶”、“卫”、“鄘”，分别位于朝歌的北、东、南方向，而与相对应的三个王叔则是霍叔、管叔、蔡叔。至于西面，有太行山作为屏障，周人并不用担心这个方向。关于三监的具体



卫国核心区域示意图



西周三监封国与对应人物图

位置，有多种说法，分布的范围也很广。不过如果周人的目的是为了监视留在原处的商王室的话，那么这三个类似于现代的“军管区”（想想二战结束时的柏林）无疑会在

朝歌附近。朝歌的位置是明确的，位置就在河南的淇县。

那个叫做“邶”的地方，据考证应该是在淇县北部的汤阴县，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邶国村，应该就是所谓的“邶”地。当然，这并不代表霍叔的管理区域仅限于这个点，从“邶”地往北，黄河以西一直到安阳、邯郸的商王畿的区域都归属他管。而蔡叔所管理的“鄘”地，城邑则应该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管理范围向南延伸至新乡市。至于三监中的“卫”地，则是位于朝歌东侧，直接面对朝歌的商王室。从这种安排也可以看得出，管叔是三监中的领导，地位最高。

武王做出这种安排，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即能安抚商朝遗民，又能将商朝的核心区严密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武王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也许这种地缘格局会一直保留下去。只可惜新的周王朝注定要经历一场大的变故，方能坐稳江山。

第二节 周公平定三监和商朝王室的联合叛乱

在武王离世后不久，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又将被打破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继任的周成王只有 13 岁，如果在王朝稳定之后，这种年龄倒也不能算小，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往往能够帮他过渡到能够独立执政的年龄。而在一个王朝初建的时候，没有成人的“王”，只会让那些不安于现状的政治力量燃起希望。

一般而言，这种时候有两类势力会有想法，一是尚未完全融合的前朝遗民，尤其是新朝与旧朝属于不同的族群时；二是开国的功臣，特别是有实力独挡一面的宗室，毕竟王位的诱惑是很多人无法抵挡的。而这一次成王所面临的局势要更为严峻，因为刚才分析的两类势力都有异动。如果说商朝的遗民希望借机复国尚属预料之中

的话，那么负责在河北平原监视他们的“三监”竟然也和商人达成了同盟，共同向王室发难就属于意外了，这让周人之前所部署的应急预案功亏一篑。

这一次率先发难的就是那个“三监”的核心——管叔，而蔡叔显然也是赞成他这样做的。因此这场被称作“三监之乱”的叛乱也被称作“管蔡之乱”。至于“邶地”的霍叔，应该算是个协从犯，因此在失败之后所受的惩罚也最轻。之所以要拉那个受监视的对象入伙，是希望借助对方残存的力量。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在 1945 年以后，我们一样能够看到国共双方共同的敌人在内战当中为双方服务。对于尚未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商王室来说，这是一次可以把握的机会。

尽管周人“大度”的给予纣王之子(武庚)一个“殷侯”的封号，并让他保留宗庙，但并非每一个帝王都如后世的刘阿斗一样，能够安于现状，因此这位新任的殷侯决定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对于商人来说，寄希望于就此恢复天下共主的身份是不现实的。但拿回河北之地，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还是可以期待的。如果叛乱者面对的只是年幼的成王，他们成功的机率应该很大。

问题是，并非武王的每一个弟弟都像他们那样有野心，周公和召公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按照秦以后的说法，他们的角色就是“顾命大臣”，也就是先王托孤来辅佐幼主的。而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周公，鉴于周公王叔的身份和对朝政的影响力，后世很多人认为他实际上已经摄政称王了。不过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公就此扭转了危局，为周王朝奠定了稳定的地缘格局，并且他最终将权力交还给了成人后的平王。因此即使他因为形势所需曾经称王，后世的士大夫们也并不会因此而责难周公。

不过士大夫们怎么想的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对于我们来说，所关注的是这一次变故究竟对周王朝的地缘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三监的命运又将如何。周公执政之后最先做的事，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周召分陕”，即让召公管理“陕”地以西的黄土高原，而周公负责崤函通道以东的那些新征服地区。当然，对于那些反叛者来说，一场新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就进攻的路线来说，实际上并不会与上一次的灭商之战有多大区别，敌方的力量仍然是集中在河北平原。

只不过这一次对于周人来说，有一部分力量分化到对立面了。但更为有利的是，那些先期封建至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大多数并没有背叛王室，特别是那个被封在泰山东侧，负责征讨东夷的姜太公。这使得周公所面临的地缘形势要好于四年前，平叛过程也因此并没有显得过于复杂。

最终三监之乱得以平定，那位“殷侯”的下场自不必说，追随纣王而去是他唯

一可以选择的结局。而对于同属宗室的三位王叔，简单的一杀了事是不可取的，最终决定三人命运的是他们在这场叛乱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主犯的管叔来说，当然是不能得到赦免的，杀一儆百对于政治家来说，已经是仁慈的表现了。而作为从犯的蔡叔来说，流放的命运是逃脱不掉的。霍叔的协从身份，仍然不可能让他置身事外，被夺去爵位已经算是一个好结局了。

第三节 周公将商王畿故地封给康叔并命名为卫国

周公在解决政治上的问题之后，剩下的事就是重新规划王朝的地缘结构了。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于商“王畿”的处理，三监及他们的子孙肯定是不能留在原处了，将河北平原的商族遗民全数迁走也不现实。因此需要安排一个可靠的人选来控制这一区域。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周文王的“远见卓识”，尽管很多人认为，帝王们的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但这种安排的实质其实是为了有足够的血亲资源以供使用。如果周文王真的如传说中那样有一百个儿子，那么从中挑出几个忠孝两全的儿子亦不算难事。当然，如果真有这么大的基数，那么出现管叔、蔡叔这样的“叛逆”者也属正常。

关于周文王有多少个儿子，相信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过这一次周公的确又找到了一个弟弟来管理“三监故地”，也就是商人从前的“王畿”，这个弟弟人称“康叔”。由于那位“殷侯”的“自绝于人民”，因此这一次的封建就不需要采取复杂的“3 + 1”模式了，康叔所建立的新国家覆盖了“邶”、“卫”、“鄘”三地。鉴于卫地属于中心位置，因此这个新国家没有叫“康国”，而是被命名为“卫国”。

如果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将这样一个不稳定而且非常重要的地区，交给一个诸侯似乎更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情况。不过周公却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因为尽管周公、康叔与管、蔡、霍三叔都是周文王的儿子，但与后三人相比，周公和康叔要更显得“根正苗红”，因为他们与武王都是同母所生。当大家父系的血缘不能产生差别时，母系的血缘往往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尽管在历史和现实中，同室操戈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就中国的地缘文化来看，血浓于水还是会确定为一条基本准则的。

第四节 周公对三监在商王畿故地以外的封国的处理

对于失败的三监来说，尽管已经被挤出了政治核心圈，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就此消失在西周的版图之上。即使对待不同族的敌人，周人都能按照“灭国不灭祀”



郑州商代夯土城墙

的原则来执行，那么对待自己的直系亲属，这条标准更没有理由不被执行了。实际上对于三监来说，在朝歌附近的“邶”、“卫”、“鄘”三地并非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封国，他们在各自所管理的地区更多的执行的是一种军事管理权。而这三地的殷商遗民名义上应该还是为那位“殷侯”所辖的，这种做法也是为了政权能够平稳过渡。就霍、管、蔡三叔来说，他们仍然有自己的封地。在晋国部分时，我们曾经在临汾盆地的最北部，与太

原盆地的交接处标注过一个“霍国”（现山西霍州）。不用怀疑，这就是霍叔的封国。鉴于他的罪责较轻，在被贬为平民之后，这个位于山西高原，而又地处王朝边缘的国家，被安排由他的儿子接任了。

而作为罪魁祸首的管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他的封国正位于王朝的中心，具体位置也就在现在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事实上就郑州本身来说，只是一个因为铁路修建而兴起的新兴城市，但实际上在 3600 年前商人就已经看中了这个位置。在商人决定将都城迁回河北平原之前，这里曾经是商人的政治中心。如果你现在去仍然能够看到商人用黄土夯制的高大城墙，这应当感谢在随后长达 3000 多年的历史中，这里没有建筑新的城市，由于没有“靠山”，在这里筑城的确不符合古典时期的防御需要。

这个商人旧都所在的区目前被称之为“管城区”（郑州市区内），由于回族居民较多，按照“民族自治”政策，它的全称又被称为“管城回族区”，这个“管”就是得名于管叔所受封的“管国”。也就是说，管叔的受封地是商人的旧都，这也

足以佐证管叔在周朝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只可惜管叔的野心，让他的封国成为了西周最早消失的封国。不管周公采取了什么方式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的合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

我们在中国部分的内容里，经常能够看到 3000 多年前的历史还能够在现实中留下足迹。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中国人祖先崇拜的地缘文化，而这一点正是由周人所确立的。周人所确立的那些封国之名不仅在地名、姓氏中得到保留，甚至也影响了后世朝代的命名，在随后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商人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中国没有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象形文字传承，那么中国的历史会模糊很多。

对于蔡叔来说，他的封国则位于河南南部的上蔡县。就他自己而言，当然是没有

资格再享受这块封地了。好在蔡叔的儿子在周公看来是个有德行的人，因此蔡国也被保留了下来。关于蔡国，在随后的历史中还会经常涉及到，只是这个蔡国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卫国核心区域示意图》上



卫国核心区域示意图

很容易看到，蔡国的位置就在南阳盆地的东北侧，也就是说一出“方城夏道”，蔡国就会首当其冲。因此在楚人进入中原争霸时，蔡国也就成为了牺牲品。值得蔡国人庆幸的是，尽管楚人以“蛮夷”自居，但对于“灭国不灭祀”的规矩遵守却不比周人差。因此在楚人的控制下，蔡人得以在异地复国，而这个新“蔡”国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新蔡县”。

对于“灭国不灭祀”的做法，其实跟上古之人的鬼神文化有关。既然人死之后

尚能成为鬼，那么让这些“鬼”成为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而纠缠自己死后的魂灵，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因此除非你有很大的决心，否则绝人子祀，在上古时代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当然，后世的中国人逐渐变成了无神论者，灭人九族的事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而对于满天的神佛的态度，也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保佑现实的利益。就像我们求佛祖、耶稣、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所保佑的基本都是升官发财、有情人终成眷属、早生贵子之类的。不过咒人断子绝孙仍然是被列为最恶毒的诅咒，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惯性。

其实就管、霍、蔡三国而言，管国即使不在西周初年消失，它那居中的地缘位置也很难让它的国运长久；而蔡国的位置注定它成为楚国的牺牲品；只是霍国的地理位置应该是更具潜力的，而为什么它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匆匆过客呢？要解读这一问题，我们还要回到周公身上。对于三监的处理，只是周王朝地缘结构调整的一部分。要使得王朝稳定，卫国的封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周公要做的还有很多。

第五节 周公东移原有封国和向边缘地区分封新封国

在处理完“商王畿”的问题之后，其他地区的调整也再所难免了。武王所进行的第一次分封集中在中原地区，而这一次周公则希望掌握更多的边缘地区，除了将已有的封国向东迁移以外，新建的封国也尽可能的向边缘扩散。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将中原地区包围其中，已防止新的动乱产生。首先要作调整的是齐国，就齐国来说，封地本来就已经在泰山以东了（初封地在现在的山东省昌乐县），这个位置并没有作大调整的必要。对于那些不臣服的东方部族来说，让“武功”最盛的姜太公去处理是最能保证中原地区安全的。鉴于这次黄淮、江淮流域的“夷”人部族也跟着一起造反。因此齐国获得了在东部地区的征伐权，也就此从东方诸国中脱颖而出。

将召公分封在燕山以南，河北平原的北部，也是这一次调整的结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与河北平原南部的卫国遥相呼应，防止商族遗民向北迁移，成立新的国家以威胁周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燕山以北的边缘民族越过燕山进入河北平原，进而入侵中原核心地区。当然，召公本人是没有办法分身去燕国受封的，代替他去的是他的长子。相比于其他诸侯国，燕国可以说是孤独的，因为它和南方其他封国之间，还有大片为戎、狄所占据的土地。不过这也让它在后来的春秋乱世中可以远离地缘博弈的中心，独立发展，并最终在战国时期跻身七雄之列。

在稳定山东丘陵与河北平原之后，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地理单元是山西高原。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在山西高原诸多盆地当中，能够与渭河平原直接对接的

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是周人最为关注的地区，也是最先覆盖的地区。对于这样一个与渭河平原地缘关系紧密，对王室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需要一个可信的诸侯国来担当重任。

在山西高原南部的诸多姬姓封国当中，霍国本来是被寄予厚望的，将霍叔封建在临汾盆地的北端，以控太原盆地的戎、狄，足以显示霍国的重要性。问题是，三监之乱使得王室对霍国失去了信任。尽管霍叔在这样动乱当中，更有可能持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骑墙态度。但在政治斗争中，骑墙派的结局往往是两面不落好。因此霍国自然也就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了。

就“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来说，地理位置是一方面，政治也是一方面。如果你政治上不能取得相邻地区的支持，那么再好的地理位置也是枉然。尤其是你所面临的地理单元，是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将地缘力量放大的“王畿”时，这种地缘影响更为明显。对于王室来说，当然不可能放弃对山西高原的控制，因为这一地区不仅对渭河平原的镐京具有屏障作用，对于洛阳盆地的洛邑也同样具有战略防御的作用。现在我们将视线重新转回到晋国，当解读到秦晋争霸时，大家就会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不管怎么样，周人需要在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封国来担当此重任。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那就再封建一个，于是那个被封建在两大盆地交界处的“晋国”就此诞生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带有颇为经典的故事，也就是“桐叶封弟”。大意就是年纪尚幼的周平王在和一个小弟弟（叔虞）玩耍时，随手将一片桐叶剪了“圭”形，并对弟弟说我要封你为诸侯。故事的结局是周公知道了这件事，并认为君无戏言，于是便真的将叔虞封建至了汾河谷地，也就成就了“晋国”。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信息来。首先“圭”是个好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材质的都代表着权力。曹操墓之所以能被确认，墓中发现了石制的“圭”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当然，这并不代表你自己在家里参照网上的图片做一个“圭”就能够一步登天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你本身有没有实力。对于叔虞来说，他的实力就是他是成王的弟弟，这也是这个故事所反应出的第二个信息，血缘关系的远近又一次成为了政治决定的关键因素。其实对于周公来说，将一个与自己或成王关系更为紧密的宗室封建至山西高原是必然的，而这个小孩过家家式的游戏之作只是一个契机罢了。政治上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成王的威信，并且让晋国更加感谢自己以及王室。

关于晋国的位置，我们在之前的部分已经分析过了。这的确算的上是一块风水宝地，有了王室的支持，晋国无可置疑的成为了山西高原的老大。在王室东迁之后，勤王四国的身份又加强了它的政治优势。即使是在晋国内部出现大、小宗之争时，

也并没有动摇晋国的整体实力。在“曲沃代翼”之后，晋国凭借正盛的武力统一了两大盆地并开始向四面扩张。而王室所做的，无非是在大、小宗之间做一个选择罢了。尽管出于维护正统的需要，王室首先支持的是大宗的晋侯，不过在小宗取得完胜之后，王室也接受了这个结果。

第六节 周人对河北平原的商族遗民的处理方式

在确立了山东丘陵、河北平原、山西高原这三个重要边缘地区的地缘格局之后，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如何整合成为了问题的关键。而这其中又牵扯到了对那些商族遗民的处理。卫国的封建对于控制普通的商族百姓来说，周人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对于他们，周公甚至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即商人百姓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生活，而不必完全按照周礼的约束。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人可以聚众喝酒作乐（商人很喜欢杯中之物，甚至每个人的墓中都会有酒杯陪葬，这似乎和他们来自于寒冷的北方不无关系），而周人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这种类似于优待少数民族的做法，如果放在现在，一定会被批得体无完肤。不过在当时，它的确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也许在周人看来，这才是消除商人威胁的最好办法。不过，任何一个族群中都会有精英阶层的，对于那些贵族来说，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最多，也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周人决定将这些“顽民”迁到洛阳盆地，也就是洛邑的边上，让他们接受最为严厉的管理。这种恩威并施，区别对待的方案，加上洛邑和卫国的地缘布局，最终为周人的东进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实“商人”这个名词现在作为交易中间人的代名词，可能是源自“商族”。无论这个推断是否正确，商族在经商和手工业方面的技巧是很突出的。当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企图时，这两方面的优势反而能够得到体现。这种情况与东南亚华人在饱受政治压迫，最终却在商业领域建树颇多的情况有些类似。被大面积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商族遗民们，将精力放在“商贾”这个自古以来就广受轻视的职业，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证明自己的机会。商族遗民的这些能力，最终还是被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所利用了。在郑国东迁至洛阳盆地的东侧之后，郑人给予这这些商族遗民更为宽松的政策。而这些之前属于社会底层，现在重又回到主流社会的“商人”所带来的财富与能力，也成为了新“郑”的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商人”们甚至在春秋争霸的政治博弈中亦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后来我们将到分析到的“崤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个叫弦高的商人机智的劝退了秦国的远征军。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位弦高是否就是郑人所收容的商族后裔。但由此可

可以看出，郑人当时的政策的确让治下的民众产生了足够的向心力。做上述分析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在国际政治和地缘博弈当中，将“非我族类”的人全部消灭或迁走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就像《国产凌凌漆》曾经的领导说过的一句名言：“就是一张卫生纸，一条内裤都有它的用处”，问题是在你怎么用。

第七节 周人为黄河以南的商族遗民建立宋国

让我们重新回到周公的时代，在处理完河北平原的商人之后，如何稳定中原的局势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地区封建更多的姬姓封国，当然是必须的。但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经过商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后，黄河以南同样分布着大量的商族遗民。对于这部分商人的处理方法，还是要看他们在这些叛乱中的具体态度。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一族群并不一定会持同样的政治立场。就像贵为宗室的三监可以和那位“殷侯”合力反叛周王室一样，黄河以南的“商人”们也可以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他们在商王朝时与王室的地缘关系亲疏，显然与距离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复国这件事，黄河以南的“商人”们，并不像河北平原那些“天子”脚下的遗老遗少们热心。如果“三监之乱”成功了，中原的这些“商族”们应该会遭到清算，最起码其中的贵族是没有权利分享胜利果实的。放在现代社会，汪精卫似的下场是他们所能期待的。只不过史书是由取得胜利的周王室来书写的，因此这部分“商族”被受到了优待，并被立为典型。而直接的地缘后果就是，一个新的商人诸侯国诞生了。而纣王的一位庶出的哥哥——“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



郑国扩张路线图

算，最起码其中的贵族是没有权利分享胜利果实的。放在现代社会，汪精卫似的下场是他们所能期待的。只不过史书是由取得胜利的周王室来书写的，因此这部分“商族”被受到了优待，并被立为典型。而直接的地缘后果就是，一个新的商人诸侯国诞生了。而纣王的一位庶出的哥哥——“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

主，祭祀商族先人的重任也随之转移。

为了表彰他们对角色转换的适应程度，这个被称之为“宋”的商族国家甚至被授予了最高的爵位——“公”，要知道燕、齐、晋最初被封的爵位也只是第二等的“侯”。可以想见，即使是商朝未亡，“微子启”庶出的身份也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待遇，因此宋国就此真心融入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当中，成为众多诸侯中的一员也就不奇怪了。

宋国的核心地区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据信这里也曾经是商人旧都之一。从这一点来看，让商人在此建国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不过当你全景似的观察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这是一块无险可守的土地。相比于在河北平原可以面河背山的位置来说，商人的这个新国家，注定会成为四面受敌之地。只是宋国人在当时未必意识到这一点，能够在中原腹地占据一席之地，并位列“公国”的结果，让他们在春秋乱世中也做起了霸主的美梦。我们经常用“春秋大梦”来形容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宋国无疑是最早做“春秋大梦”的国家。

第十三章 戎狄渗透至河北平原并入侵邢卫两国

第一节 四渎在中国古代的神圣地位

在了解周公又做了哪些安排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四条在中国古代具有神圣地位的河流。这四条河流在之前的分析中都有所涉及，也就是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四条河流。这四条河流在上古时期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能够独流入海，并且拥有各自的支流，能够形成独立的水系。所不同的是，长江、黄河由于发源于青藏高原，水量足够大，因此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两条河流。

而淮河和济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的命运被那条反复无常的黄河所左右。目前的情况是，济水已经不复存在，它的河道被黄河征用了。而之前黄河在北线的河道，形成了以海河为主的河流系统。淮河也正是在黄河的反复入侵之下，被折磨的成了一条没有独立出海口的“内流河”。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黄河下游地区仍然不算安定，存在改道的现象，但尚未开始南侵。也就是说这四条河流还是各自独立的。

在古人看来，高山大河都是有神性的，特别是在它们能够影响人类生活，而我们又暂时无法对其施加有效影响的时候。古人希望通过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来祈求那些山水之神来保佑依附于它们的人。理论上每一个人或族群都可以将自己附近，对自己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山川用来当作崇拜的对象。不过对于一个拥有天下的“国家”来说，并不可能面面俱到，王室（或者皇室）需要选择出几个代表来作为国家级祭祀活动的对象。按照五方论，五座高大且具有灵性的山峰被选出来成为“五岳”，并享受香火。

而成线性排列的河流，并不具备形成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条件。如果是湖泊，倒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因此也有“五湖”之说。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四”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于是江、河、淮、济这四条东西向的大河被赋予了神的属性，被称之为“四渎”。这个“渎”字从字面上看，亦有河流的意思，但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这四条河流的专属后缀，并因此也具有神性。也就是说在提到这四条河流的时候，需要在后面加上这个“渎”字，比如长江被称之为“江渎”。“四渎”能够成为众河之首并享受香火，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对周边的人类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可以改变所覆盖地区的地缘结构。

并且不像黄河那么反复无常，使得济水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中轴线，而它的两侧也成为了争夺的重点。济水能够成为四渎中最受称道的河流，还源于它是四条河流中唯一清流入海的河流。

在中国人看来，清浊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水质，更可以象征人的品质。既然四渎都具有神性，那么能够在其他三渎皆浊的情况下独清的济水，自然会让人联想到管理它的神在品德上更为高尚。如果仅仅是清流入海，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尚不会达到那么高，因为要想在古人活动范围内找到一条清水河，并非难事（比如泾水）。问题的关键在于济水从太行山上下来后，居然能够向东穿越黄河而仍然保持河水清澈，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神奇了。在古人看来，这已经不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层次了，更可以提升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了。这样一条位置又重要，水质又神奇的河流，很自然的会在华夏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关于济水为什么能够穿越黄河而不浊，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因为济水的河道已经被黄河所占据了，黄河最后一次夺济入海是在 1855 年，如果能够再晚 100 年改道，也许我们今天就能够实地见证这一奇迹的诞生了。有一种说法是济水在穿越黄河时变成了一条地下河，也就是从黄河的河床之下穿越过去再成为地上河。并且在除了黄河之外，济水还用同样的方法穿越了另外两条河流，因此也被称为“三伏三见”。这种说法太过神奇，在这里无法对其作出判断，也许地质专业的人员可以提供些参考意见。

第二节 周公七子的受封与邢国封建的初衷

在周公重新规划周王朝的地缘格局之时，血缘关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在中国人看来，天下无非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罢了，因此经常会有“家天下”的说法。基于这个原则，周公也当然的将自己一脉的子嗣分封在王朝的各个地区。你并不能认定这是出于私心，在“家天下”的观念影响下，这是让王朝稳定的最佳途径。

周公一共有七个儿子受封，封国分别是鲁、邢、凡、胙、茅、祭、蒋。其中邢、凡两国在河北平原（邢国在卫国的北部，凡国在卫国的南部）；祭、胙两国在河济平原的西部；鲁、茅两国在济水的南部；而蒋国则向南封建至淮河之阴了。从这七个封国分部的方位上来看，与整个周王朝在“陕”地以东的影响力分布状况相吻合，即河、济是王朝初期经营的重点地区，而淮河则是扩张方向；至于长江，周人尚没有能力去实施实质的控制。

这些上古的封国名称可能会让你感到头晕，如果你的姓氏恰好与其中某一个封

国的名称相吻合，不妨多去找些参考资料看看，基本上它们都会是你的姓氏的最初来源。不过在我们随后的分析当中，只有邢、鲁两国是重点。其他五个国家除了蒋国以外，过于靠近中原核心区的位置，让他们在春秋乱世中很快成为了牺牲品。而蒋国的位置，注定它将成为楚国吞并的对象。

周公七子分封示意图

从地理的角度看，河北平原是夹在山、河之间的一块菱形的平原地带。西、北面是太行山——燕山山脉，而南、东面则是走北线入渤海的黄河。在西周时期，黄河下游走的还是当年夏禹治水时期所整治的“禹河故道”，而在进入春秋之后的公元 602 年，黄河下游向东玩了一次“漂移”，经由卫河河道再向北进入渤海湾。这也是黄河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黄河就没有变过道。实际上这两条黄河故道之前的水文状况极不稳定，黄河经常在这一区域之间游走。因此在战国以前，这个“黄泛区”更多的是作为河北平原与河南诸国之间的缓冲之地。



卫国核心区域示意图

和卫国是周公的兄弟之国不同，这一次周公将自己的一个儿子分封在了这个中间地带。

第三节 山西高原上的戎狄渗透至河北平原滹沱河两侧

实际上仅仅依靠“邢国”并不可能让周人将整个河北平原纳入势力范围。如果周人希望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变成华夏文化圈的话，那么在“邢国”与“燕国”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中再分封几个姬姓的封国是势在必行的。问题是想到这一点并不难，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是依靠一场战争就够完成的。对于河北平原的地缘形势来说，黄河的流向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条让生活在其周围的居民又爱又怕的大河的

由于河北平原的南北长度远大于东西宽度，因此仅仅在平原的南北两端分封诸侯国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南面的卫国和北面的燕国之间，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承上启下，以连通南北，这个国家在周公分封卫国和燕国之时也同时诞生了，它就是“邢国”。与燕国

每一次改道，只是在不断的侵占其他河流的河道罢了。无论黄河如何变化，对华北平原构成地缘压力的永远是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以及燕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和“辽河平原”。

如果不能将防线推进至山西高原和燕山之北，河北平原的地缘安全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想必后世的宋朝人是深有体会。我们在分析晋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在西周和春秋前期，周人或者说晋国的覆盖区域还仅仅在山西高原的南部，也就是临汾、运城两个盆地。包括山西高原东南部的“长治盆地”也是被那些边缘民族所占据。这就使得整个太行山西侧都是那些好战的边缘民族的活动区。而在山西高原的北部地区，这种情况尤甚。

不可否认，晋人在山西高原的经营是成功的，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张，以期占据整个山西高原。问题是对于那些边缘民族来说，希望将他们全数围歼或者融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承受了晋国强大的压力之后，这些边缘民族如果不想被融合的话，就只能迁移了。根据一般的地缘定律，胜利者总是会选择地理条件更好的低地作为根据地。特别是对于农耕民族来说，那些由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总是能够提供肥沃而易于开垦的土地。因此失败的民族所能够选择的，往往就只能是向海拔更高的地区迁移了。

对于山西高原上的这些“戎狄”来说，如果他们不能承受晋人的压力的话，退入两侧的山地和蒙古高原是必然的选择。只是对于其中的部分人来说，越过太行山脉进入河北平原是一个更值得考虑的选项。如果从自然渗透的角度来看，尽管太行山脉地势险峻，但先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出诸多小路以完成与河北平原的沟通。而这些渗入河北平原的“戎狄”部落主要集中在“滹沱河”的两侧，也就是邢燕之间的平原之上。

事实上“戎狄”们对于河北平原的渗透并非始于晋人兴盛之后，只是在晋人取得对山西高原的统治权之后，这一点显得愈发明显罢了。在周人之前，河北平原就不是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如果从族源上来看，这些来自西部的部族无疑与华夏族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只是在周人确立了自己正统的身份之后，这些不服王化的部族无论来自何方，都不可避免的被视为野蛮人了。

对河北平原有兴趣的并非只有来自西部的高地民族，来自东部的商人无疑在很长时间成为了这场竞争的胜利者。在商人洗白了身份，入主中原成为开下共主之后，河北平原的南部成为了商王畿，并由此成为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而周人又从商人手中继承了这一区域。在商人时期，邢国所在的邢台地区正是护卫王畿的外围地区，而周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邢国所承担的任务，也是抵御那些来自西北方向的边

缘民族的进攻。在整个西周、春秋，以及大部分的战国时代，华夏族实际上都无法征服整个河北平原。在滹沱河两侧，那些来自于山西高原的边缘民族总是能够获得一席之地，这种情况直到那位战国时期著名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之后才被彻底改变。

第四节 鲜虞在滹沱河两侧生存并在春秋后期建立中山国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这些从山西高原北部下来的边缘民族被称之为“鲜虞”，也有将类似民族统称为“白狄”的。对于这些非华夏族的部落，先人们对他们的描述总是带有随意性的。在华夏族看来，这些人究竟应该怎么分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融入华夏体系。只是现实的“专家们”似乎对于他们的分类乐此不疲，不过古人尚且分不清，作为后人的我们，希望从史官的记载中得出准确的结论似乎更不可能。



春秋时河北平原地缘格局

好在我们的关注点不
在于此，对于我们来说，
知道这些非华夏体系的部
落真实存在于河北平原的
中部就足够了。如果从地
形上来看，整体呈南北状
的太行山脉在南北各有一个
转折，而北边这个向东北
方向的转折区域就是“鲜
虞”部族的活动区域。之
所以选择这个区域，滹沱
河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条被称之为“小黄河”
的河流，不仅能够提供充
足的水源，更能够成为一
条现实的防线。如果按照
现实的区划，现在河北省
的石家庄——保定之间的
区域就是它的大致位置。

换句话说，石家庄以南地区为邢国的覆盖区域，而保定以北则被燕国所占据。

如果根据我们之前所总结出来的结论，无论是黄河还是滹沱河实际上都不能成为可靠的防线。或者说如果那些被称之为“白狄”、“鲜虞”的山地民族，如果在进入河北平原后，希望完全农耕化，并据河以自守的话，他们并无可能坚持数百年之久。对于防守者来说，那些一到冬天就会结冰的河流，远没有山地来得可靠。并没有证据表明那些来自太行山以西地区的“戎狄”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最起码有一支部族是肯定意识到了山地的重要性。

他们甚至在春秋后期按照华夏族的规则建立了一个国家——中山国。这个国家显著的特点就是城中必须有山，换句话说就是中山国人始终将太行山脉的边缘作为自己的核心地区。这种不忘本的做法，让中山国一直生存到了公元前 296 年，期间虽几经反复，但都顽强的生存下来了。曾经也有一次中山国试图离开山地的边缘，向东在平原地区建都，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并回到了太行山的边缘。如果中山国能够再坚持几十年，是被秦而不是赵灭了的话，史家们甚至有可能将战国七雄改称为战国八雄。

不过最终影响中山国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很可能还是他们那不太正统的出身。尽管中山国已经竭力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这在后世已是一个规律），并按照华夏族的规则处理国际事务，但除非他们的后世子孙能够入主中原，否则被史家们透过有色眼镜观察几成必然。如果出身不是那么正统的秦人和楚人（刘、项皆为楚人），最终没有做的这一点的话，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地位肯定也会大打折扣的。

第五节 邢卫两国在戎狄入侵下被迫迁移河济平原

处在抗击“戎狄”的第一线，以及身为周公的后代，邢国之君“邢侯”无疑是十分尽职的，因此也留下了“邢侯搏戎”的美名。问题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邢国还是卫国，都不可能依靠那些东西向的黄河支流（如漳水、淇水）长期抵御来自北方的入侵。来自西北方向的地缘压力最终还是需要晋国从山西高原内部解决。只是从晋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解决东、北方向那几个盆地中的戎狄也并没有地理优势。尽管他们最终找到了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到秦晋争霸时就会分析到是什么办法），但在此之前，太行山两侧的地缘优势还是掌握在这些戎狄手中的。

很不幸的是，邢、卫两国都没有坚持到晋国完成山西高原的整合之时，就被迫迁移了。在北方戎狄入侵之下，这两个诸侯国都陆续败退至了黄河以南，济水以北的河济平原之上。这一次入侵是连续性的，前者的亡国之时是公元前 661 年，后者

则是在公元前 659 年。而这时的晋国则刚刚完成内部整合不久（曲沃代翼，公元前 678 年），还未能尽收太行山以西的几个盆地。对于邢、卫两国的亡国，最为紧张的无疑是济水以南的那些国家了。因为邢卫这两个国家如果失于戎狄，那么黄河和济水被突破也就朝夕可至了。

邢卫两国退入河济平原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河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不为华夏族所控制了。在邢、卫两国的故地之上，戎狄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应该泾渭分明，双方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但现实永远是复杂的，在以后的中原争霸中，河北平原的戎狄部落们经常被作为诸侯们联合的对象或者说是雇佣军，来对抗其他的诸侯国，这其中就包括退守河济平原的邢、卫两国。在一个诸侯或者说军阀纷争的年代，现实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所谓民族大义往往并不会是第一选择，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初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第六节 邢卫两国退守河济平原后的不同命运

在退守河济平原之后，邢、卫两国实际上都失去了成为一流大国的可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 在诸大国之间摇摆，以获得生存空间。公元前 635 年，在邢国联合戎狄进攻卫国之后，卫国在晋国的支持之下反过来灭掉了邢国。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河济平原上的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但实际上，卫、邢两国都只是大国之间争斗的棋子。在不久以后，无论是河北平原还是河济平原，都将成为山西高原（晋国），以及山东丘陵（齐国）直接博弈的地区。

关于卫国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再交待一下。在争夺河济（西部）的过程中，卫国无疑是有先发优势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王室最早授予它的权力是管理朝歌周边的商族遗民，而河济之间也是商人的重要聚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卫国经营的时间较长，可以更早的控制河济平原上的小国。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燕”国。请注意，这个燕国并非我们所熟悉的燕山以

南，位列战国七雄的那个“燕国”。而是位于河济平原，卫赵之间的南“燕”国（今延津县东北部）。在大部分时候，南燕国都是卫国坚定的同盟者。

我们经常可以在史书中看到有“燕国”随同卫国与其他诸侯国（如郑国），甚至王室作战，这个“燕”指的就是河济平原西南角的“南燕”。而北“燕”在春秋时期，只是孤立的生存在燕山以南，并未参与中原争霸战。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黄河的不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战国时期各国开始筑坝以固定黄河的流向之前，希望越过那一大片黄泛区发动进攻，始终是



黄河下游主要诸侯国分布图（春秋）

非常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河北平原中部的戎狄们封堵了燕国南下的道路，这让燕国更像一个化外之国。看看中原那些国家的悲惨命运，燕国生存在这种被遗忘的角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卫国在几经存灭之后，始终还是在河济平原保留住自己的封国，尽管他们在最后仅仅剩下濮阳一地了，但始终没有灭祀，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卫国仍然没有灭祀（只是留个地方保留宗庙罢了）。对于这种结果，一般的解释是卫国独因弱小而存。只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秦始皇那种强势的政治家来说，仅仅因为突发善心就留下了卫国是不可能的。最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商鞅”，无论这个来自卫国，又被称为“卫鞅”的贵族在当时所做的改革是否得到理解，但从结果来看，后世之人都会认可是他从技术上使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因此秦始皇因此而保留卫国的宗庙以示对商鞅的纪念也就情有可缘了。

第十四章 齐鲁在泰沂山脉的封地与胶莱河的地缘分析

第一节 齐鲁两国在泰沂山脉地区融合东部族群

现在我们要跨河济平原去解读一下齐鲁大地的地缘结构。根据一般的常识，“齐”、“鲁”二字一直都是可以和山东省划上等号的。不过，这两个字带有的地缘属性却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就山东省的地缘气质来说，并不会是只有一种面目示人，而这一切又与山东省的地理结构有关。让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重要的地理特性影响了山东的地缘结构，或者说是造就了齐、鲁两国的百年恩怨。



齐鲁地缘关系示意图（春秋）

我们仔细观察山东的地形图，很容易在中部发现一条弧形的山脉将山东省大致划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条东起于济水（今黄河下游）的山脉在现实

中又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最为主要的部分自西向东分别为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尼山，这当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泰山。而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地标，沂山和它南面的蒙山经常组合在一起，被称之为“沂蒙山”，而出现在我们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当中。这些具有连续性的山系我们可以将之合称为“泰沂山脉”。而泰沂山脉的南部，大部分在春秋时期是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鲁文化的发源地；北面则基本可以归类于齐文化的范畴了。

不过山东丘陵地带在周之前一直是东夷的地缘中心，作为西来的齐、鲁两国尽管成功的将其改造成为了华夏的文化中心，但却很难将东夷的文化遗存完全抹去。而在整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在相互争斗的同时，也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进

行着地缘扩张。尽管齐、鲁两国最终成为了山东的主体文化来源，但并不代表在先秦的时候，来自黄土高原的齐、鲁两国就能够独霸山东半岛。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在山东半岛兴盛了数千年之久的东方部族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山东沂山



山东鲁山

一般而言，只要是存在复杂地形的山地丘陵地带，往往都能够保有一些独特的，不同于平原地区的文化。这种现象即使是在今天也能够被观察到，在长江中下游的那些丘陵地带，很多地区仍然保留着独具特色的方言。甚至于直线距离仅有数十里之遥的一些村落，之间的方言也不能互通。这些都表明，地理条件本身影响着文化的形成，或者不同的地理特征能够催生出不同的地缘文化。

这并非意味着那些藏身于山地的部族一开始就成长于此，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迫于外来民族的压力转而放弃那些肥沃而又易于开耕的土地的。从山东丘陵的情况来看，这种平原与山地交错的地形，意味齐、鲁两国如果想彻底覆盖山东地区必须经过长期的地缘博弈。在周人到来之前，泰沂山脉周边无疑是存在着许多同属于东方系统的大小部族，而在周

人到来之后，一些小的部族相继被迫迁移、融合或成为附庸。不过仍然有较大的部族可以依托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齐、鲁两国相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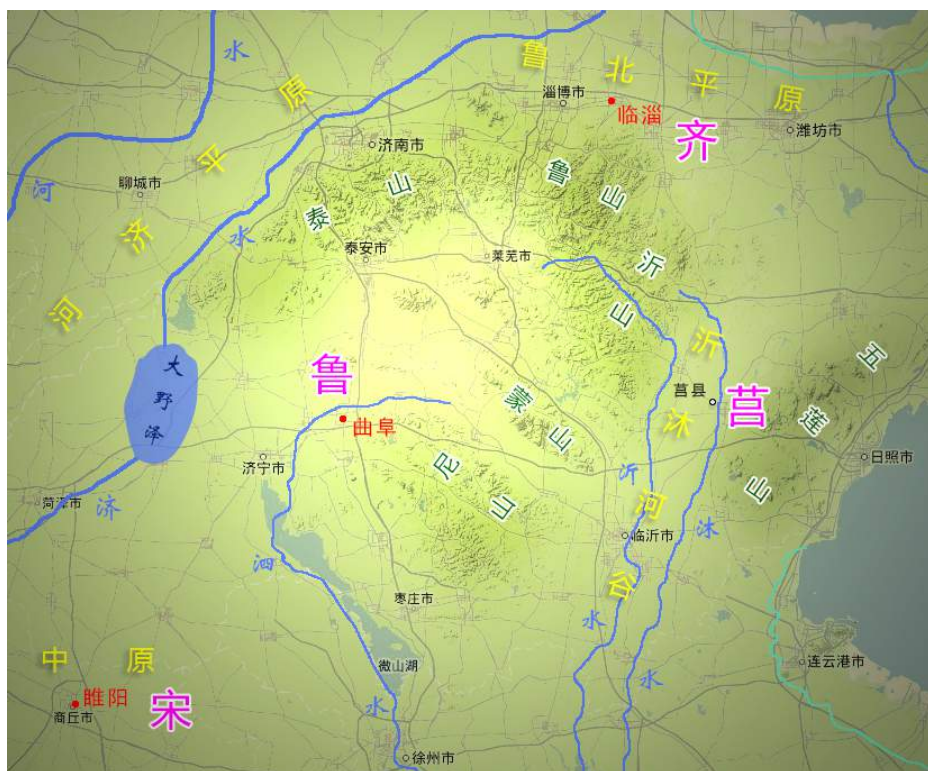
第二节 齐鲁两国的初封地与在沂沭河谷生存的莒国

就齐国初封的位置来说，是位于泰沂山脉北部的“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其后又将国都向西迁移至临淄（今天临博市临淄区）。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遥远，都属于同一地理单元。也就是说南起泰沂山脉，西至济水，北至渤海（莱州湾）的平原地区是齐国最先经营的根据地。这一地理单元我们可以称之为“鲁北平原”，与其隔济水相望的是“河济平原”。由于济水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河济平原”的东部也已经成为了山东省的一部分，因此现在“鲁北平原”的概念已经包含了这部分河济平原。不过在春秋时期乃至后面的很长一段历史，它们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



齐·地缘结构图（西周——春秋）

在泰沂山脉的南部，鲁国成为了主角。当年周公选定的初封地在“尼山”的西侧，也就是弧形的“泰沂山脉”所围成的口袋形地理单元的出口处。这个位置无疑让鲁国将这个口袋的内侧当成了自己的后院，并将之重点经营成为自己的核心区。如果“泰沂山脉”能够向东连续性的伸入大海，那么齐、鲁两国最终以“泰沂山脉”为地缘平衡线，形成拉锯的情况将成为山东半岛的主要地缘矛盾。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大部分的时间也的确形成这种状况。只是“泰沂山脉”并没有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延伸入大海，这使得泰沂山脉的东侧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并在齐、鲁



齐鲁莒位置图

相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地缘作用。

在“C”形的泰沂山脉以东，一直到海洋的区域并非全部都是平原地区，事实上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又崛起了一座与海岸线平行的条形山脉——五莲山。这就意味在泰沂山脉（沂蒙山段）与五莲山之间，形成了一条具

有通道性质的山谷通道，这条战略通道的意义在于，通过它可以很容易的进入鲁北平原以及胶东半岛（胶莱河以东）。这使得齐、鲁两国在经营好自己的根据地后，都希望能够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可惜对这条战略通道有所企图的并非只有齐、鲁两国，在其后的春秋争霸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来自江淮地区的诸侯国也一次又一次的希望通过这条战略通道进入山东半岛的核心地区。

如果沂蒙山与五莲山之间的距离足够近，那么这条战略通道很有可能仅仅成为像“崤函通道”那样的兵家必争之地，或者说仅仅是在山口处筑上几道关城就足以控制它了。只是两山之间却还是有些一定的距离，这使得这条战略通道本身又具备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一般而言，两条山脉之间的距离如果够近，那么从分水岭下来的溪流往往能够汇集成一条大河。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条战略通道的宽度足以让两侧山上下来的水流汇集成数条河流了。而同样发源于沂蒙山，却分列通道两侧的沂河与沐河是其中的主要河流，我们因此也可以将这片谷地称之为“沂沐河谷”。

“沂沐河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地理单元，一是因为它的两侧有沂蒙山与五莲山作为屏障；二是因为河谷的东西向有着足够的纵深。另外在河谷的北部，存在一些海拔只有2、3百米的丘陵将沂蒙山与五莲山连接起来。尽管这个高度并不足以成为沟通的障碍，但如果被军事家加以利用，还是能够赶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在战国时期，来自江汉平原的楚国控制住“沂沐河谷”之后，齐国也正是依托这些丘陵修筑了齐长城的东段，用以抵御楚人的进攻。

不过在西周——春秋时期，沂沐河谷是被一支被周人视为东夷的“莒”人部族所占据，其建立的国家叫“莒国”。依托有利的地形，在齐人还未能将山东半岛的北部地区整合好之前，莒国甚至有力量影响齐、鲁两国的政治格局。当然，在齐国与其他边缘大国都完成各自所在地区的整合工作之后，莒国注定成为了大国争斗的战场，基本上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再作为一个诸侯国而存在了。

关于莒国和鲁国后面会分析到，在公子小白（齐桓公）那次传奇式的君位争夺战中，我们有机会窥探一下三者之间的地缘关系。有一种说法是莒文化也应当是山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根据地理结构和历史，沂沐河谷地区的地缘文化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不过在齐、鲁、莒文化之外，胶东半岛独特的地理形态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尽管在很多时候，它已经被归类于齐文化了，但究其最初的来源，却与一个叫作“莱”的东方部族分不开的。而在齐人的扩张当中，被称之为“莱夷”的部族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第三节 齐国面临来自河济平原方向的地缘压力

经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当年齐国的兴盛之地是在泰沂山脉以北的鲁北平原之上。对于齐国来说，除了把鲁北平原上那些残存的东夷部族消化掉之外，它还可以向西面的河济平原，东面的胶莱平原，以及泰沂山脉以南扩张。如果从难度上来看，向东、西两侧的平原地区扩张显然要容易得多。

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的不稳定性，河济平原（特别是平原的东部）在先秦时期并不是特别受青睐的地区。在水患频繁的地区，如果可以选择，山地丘陵与平原的交界处是定居的首选之地。因此对于齐人来说，他们需要倾注更多精力的是在东方。当然，这并不代表河济平原就不重要了。在河北平原的地缘力量能够形成强大力量之后，河济平原成为了齐国面对东北方向地缘压力的重要缓冲区。这方面的案例已经在我们叙述过的历史中出现过了，邢、卫两国在戎人的入侵之下，丧失了对河北平原南部地区的控制权之后，齐人主动提供支援并将之安排在河济平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的。

尽管河北平原的霸主并不总是来自西北方向山地之中的戎人，但这些有能力在河北平原上称霸的政治力量，在希望扩张时总是会将河济平原以及鲁北平原作为渗透对象。在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从山西高原上走下来的晋人，以及来自燕山南麓的燕人都曾经成为齐人的强敌。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因为这些被河流分割而成的冲积平原之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相比于山地而言，无论是自然渗透，还是战

术性的军事行动，跨越这些平原之上河流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如果齐国所依托的仅仅是这些河流，他们显然不具备成为大国的潜质。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当年姜太公之所以被分封于此，是因为这里是东部族群的核心地区（也就是周人所认定的“东夷”）。而东部族群之所以能够以此为根据地，与黄土高原上的西部族群进行长达数千年的对抗，地理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大片可以依托的山地丘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东丘陵”。而齐人来此的目的，当然就是为周王朝整合这一地区，以从地缘上彻底实现东、西融合。只是在历史进入春秋乱世之后，当年的王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齐人依托王命所获得的土地成为了齐国争霸的地缘优势。



齐鲁地缘关系示意图

就河北平原本身的地理结构来看，是无法成为强势的地理单元的。也就是说，如果控制河北平原的政治力量不能同时控制部分西、北方向的山地，他们就只能在历史舞台上成为配角。这其中的反面例子就是邢、卫两国。而能够将势力范围拓展到燕山的燕国，以及从山西高原上渗透至华北平原的晋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从这个角度看，河北平原与太行山、燕山的过渡地区才是河北平原的地缘核心。而如果从直线距离上来看，从泰山北麓渗透至河济平原（东部）显然要短得多。

另外，跨越济水的难度相比于跨越那条(甚至是数条)多变的黄河也要容易得多。因此我们会看到，尽管齐人与华北平原的政治力量在春秋战国时期互有攻防，但河济平原的东部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够在齐国控制下的。反过来说，齐国也很难稳定的渗透至河北平原。这种地缘结构甚至影响到了现实的行政区划，从现有的山东行政区划上我们可以看到，山东的西北省界基本与先秦时期的黄河故道重叠。也就是

就河北平原本身的地理结构来看，是无法成为强势的地理单元的。也就是说，如果控制河北平原的政治力量不能同时控制部分西、北方向的山地，他们就只能在历史舞台上成为配角。这其中的反面例子就是邢、卫两国。而能够将势力范围拓展到燕山的燕国，以及从山西高原上渗透至华北平原的晋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从这个角度看，河北平原与太行山、燕山的过渡地区才是河北平原的地缘核心。而如果从直线距离上来看，从泰山北麓渗透至河济平原（东部）显然要短得多。

说河济平原的东部与山东丘陵地区的地缘关系更为紧密。

第四节 胶莱河对山东的地缘分割作用和胶莱平原的特点

对于齐人来说，在西周和春秋前期，其实并不太需要为来自西北方向的地缘压力而烦恼，因为华北平原尚不能与其西、北方向的山地在地缘上融合为一体。对于齐人来说，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来自于鲁北平原以东地区。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条河流，它就是“胶莱河”。这条连接莱州湾与胶州湾的河流对于山东地区的地理结构起到了两点重要作用：一是与支流共同冲积而成了胶莱平原；二是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地理分割线。它的东部地区被称为“胶东半岛”，也就是狭义上的山东半岛（小山东半岛）。

对于这两点影响，我们需要解读一下。首先胶莱平原与鲁北平原虽然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它还是具备不同的地缘特点的。对于鲁北平原来说，南面的泰沂山脉是很好的依托。这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古人能够在山地和平原之间游走，以抵御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外敌的入侵以及水患。因此我们会发现，齐人的初封地和国都的所在地其实都地在泰沂山脉北麓和平原的过渡地区。对于周人来说，首先倾全部力量占据一块最有地缘潜力的土地，以彻底解决山东丘陵地区地缘威胁的问题。而有了这个支点，齐人才有可能行使他们征伐东夷的权力，并最终成为东方的霸主。



齐·地缘结构图（西周——春秋）

可以将之分为两大块。即以泰沂山脉为核心的“鲁中南山地丘陵”，以及胶东半岛上的“胶东丘陵”两块，而胶莱河流域（胶莱平原）就是二者的分割线。就胶莱平原来说，甚至在炎黄时代，这一地区也很有可能是一片泽国。由于地势过低又临

我们一直在提到“山东丘陵”的概念，实际上山东地区的丘陵地带并不是一个统一体。从大的区域划分上，我们



山东半岛地形图

海，它所受到的困扰并不仅仅像内陆平原那样来自河流，在文明初始时，海侵才是问题的主要来源。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上古时期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实际上如果胶莱平原不能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幸免的话，鲁北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也会没于海面之下。对于这种可能性，哥本哈本会议上的那些环保主义者会更有兴趣。

而我们所关注的则

是，相比于鲁北平原，胶莱平原的地缘定位更像是一个缓冲区。无险可守的地形使得它必须依附于两大山地丘陵地带。这也就是说，胶莱平原本身虽然可以成为一个地理单元，但居住于其上的族群如果试图以它为根据地地进行地缘扩张是不现实的。看这张《山东半岛地形图》需要注意一点，在春秋时期黄河三角州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东营及其以东的那个三角形突出部还没有形成。这主要是清流的济水不能像后世的黄河那样提供充足的泥沙。尽管黄河的这种行为使得中游地区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但却为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造就了新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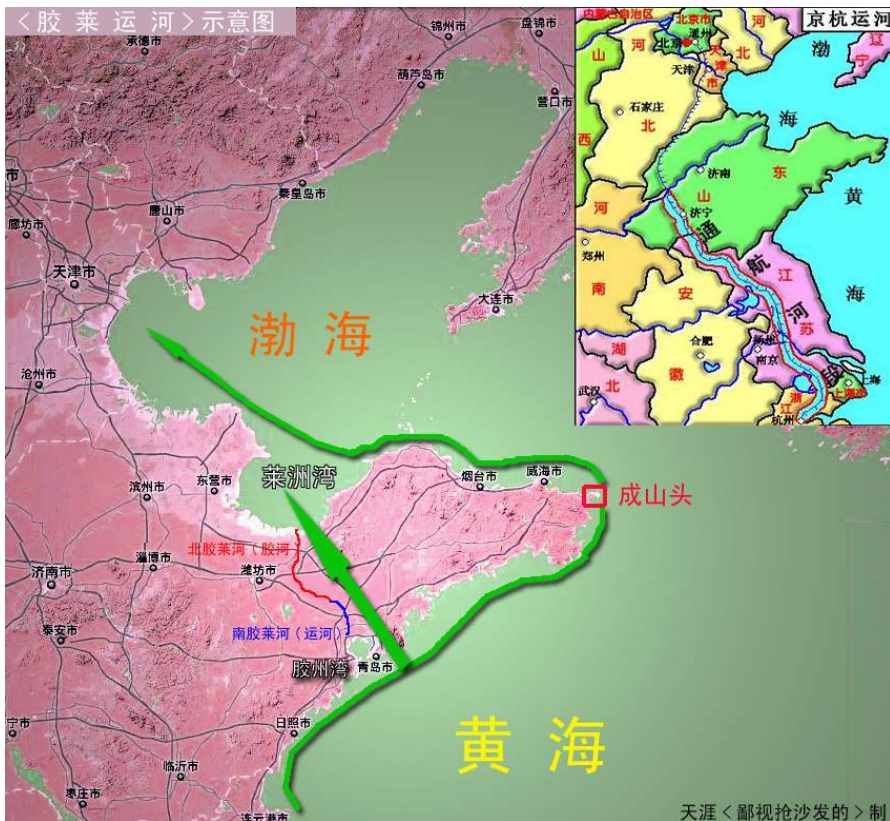
只不过由于黄河现在流入的是中国的内海——渤海，因此并不能为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划分做出贡献。因此有一种提法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让黄海改道复归南线，让它流入黄海，以此加强黄海的控制权。要想做到这一点，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只是真要这样做了，对于沿岸各省所造成的地缘影响甚至要远大于三峡工程，决非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

第五节 元朝时因海上漕运需要打通胶河南部入海通道

上一节分析到胶莱河有两个特点，其一就是河流本身成为了胶东半岛与大陆的分割线，而胶莱河及其支流所冲积而成的胶莱平原，也是胶东丘陵与鲁中山地丘陵的过渡区。关于胶莱河本身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解释，从地图上看，我们很容易认为

这是一条连接渤海与黄海的河流。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胶莱河的定位就应当是一条连接渤海与黄河的快速通道了。如果是自然而形成的，那它就不应当叫作河流而是海峡了。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否则胶东半岛就应当叫作“胶东岛”了。

其实在上古的时候，是没有胶莱河的，有的是一条发源于胶莱平原中南部向北流淌的“胶河”。如果不是人为的作用，时至今日胶莱平原应该会被叫做“胶河平原”。这种改变离我们今天所叙述的时空又相隔了将近 1000 年，而做出这项决定的是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事情的起因是华北平原的北部逐渐成为了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这意味着这片土地需要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因此需要从农业潜力已经得到开发的长江下游地区，调入粮食和其他物资。而在古典时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物流行动，水路是当仁不让的先择。



胶莱运河示意图

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并非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隋炀帝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计划。尽管评书表演艺术家们认定这位“十恶不赦”的二世祖只是为了南下寻花问柳而开挖了京杭大运河，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附加功能。只是在王朝初定的时候进行如此大的工程，并不是一个好

时机。在此之前秦王朝已经有过失败的案例了，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用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固然是一个好方案。只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这条运河终有不堪重负的一天。更何况河道的淤积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寻找备选方案成为了后世诸多王朝所要思考的问题，元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既然水运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那么将视线再向东移，经由海岸线进行海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可行之处，在于帝国的中心（北京）离海并不太远，并且有河流连通渤海，而

海上的航道也不需要像运河那样维护。

不过相比于运河，海洋的不确定因素更多，特别是在那些台风高发的季节。如果选择靠近海岸航行，以及根据经验挑选气候相对较好的时节出发，还是能够最大程度规避掉这些不利因素的。与气候原因相比，航线的距离成为了海运的一大不利因素。如果中国的海岸线都如东南沿海那样圆润，从江南沿海岸航行与沿运河航行至北京的距离并不会会有太大差别。只可惜距离北京最近的海岸线是渤海湾，这个由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包夹而成的内海，在为帝国的中心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拉长了海运的航线距离。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长江下游沿海路将物资运入渤海湾，就必然围着山东半岛转一圈，这显然增加了物流的成本。



山东荣成市成山头

更为不利的是，当船只航行到山东半岛最东端的那个岬角——“成山头”附近时，所要面对的风浪较之前要大上许多。这些因素都促使元人希望寻找一条横穿山东半岛的水路，将渤海与黄海直线连接在一起。鉴于“胶河”已经横穿了大部分的山东半岛流入莱州湾(渤海)，因此元人的工作主要是向南往胶州湾方向挖掘运河，换句话说也就是让胶河源头的的水向南北两个方向流动。当然，南段这条运河中间也会有其他河流补充水源，在它的水量过剩时，甚至也会有部分水流漫过源头的分水岭流向北侧的胶河河道。

胶河水如何流动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这条看似应该流淌着海水，而实际是一条淡水河的河道理论上的确可以用来接近渤海与黄海之间的距离。经过五年

的开挖之后，元人也的确完成了这项任务。由于新的河流（胶河 + 南运河）的南北两端分别是胶州湾与莱州湾，因此被命名为“胶莱河”。

实际上胶河无论是否向南延伸，又或是否更名为“胶莱河”，都无关胶莱平原在春秋时期的地缘定位。即使是在元、明两代，胶莱河南端的运河也未能充分发挥漕运的功能。由于维护费用巨大，它在投入使用后不久就被废弃了。

第六节 新胶莱运河对沿途和周边地区带来的利弊

之所以要在这里重点解读一下胶莱河这条河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胶莱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山东半岛乃至黄——渤海地区的地缘结构。这是因为以胶莱河为基础的，新的沟通黄渤海的计划又被提出来论证了。只是这一次，所设想的不再是一条只能通行低吨位船只的淡水河，而是一条宽度及深度足以与巴拿马、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的海峡式运河了。

关于新的“胶莱运河”目前已经有专家在专门讨论了。正如之前的三峡工程一样，这种足以改变某一重要地区地缘结构的工程，都会有立场鲜明的正反两方。这种讨论甚至争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它可以让最终的决策更加理性。希望将胶东半岛变成“胶东岛”的一方理由似乎十分充分，像元人那样接近黄、渤海之间的距离只是目标之一，更为时髦的理由是为了环保。

这主要是因为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海，而沿岸又多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因此水质十分恶劣。换句话说，也就是不能与黄海充分对流。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办法还是减少污染，否则就算有办法让渤海的污染物都能及时流入黄海，也不过



胶莱运河环流示意图

是一个“祸水东流”的利己方案而已。问题是根据计算，试图依靠一条新“胶莱运河”就能很快将渤海之水换完是不现实的。不过，对于山东省来说，净化“莱州湾”的水质还是可以期待的。实际上青岛



胶莱河

港所在的胶州湾水质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这个微缩版的渤海湾也可能在这个循环系统中同样率先获益。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开挖新的运河固然能有上述的诸多好处，甚至可以让胶莱平原上的诸多内陆城市变成“沿海城市”，也参与海洋利益的分配。但所带来的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最为

重要的影响就是对农业用地的影响。鉴于运河是在肥沃的平原上开挖，因此所占用的土地基本上是耕地，据测算会有数万亩之多。在以粮为纲的中国，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问题不仅在于此，由于新的运河中流淌的是海水，运河两测的土地会不会盐碱化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更何况开挖运河会牵扯到大量的搬迁工作，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沿岸城市的战略规划及定位。

有鉴于此，新“胶莱运河”究竟命运如何还未有定论，最终的结果所依据的无非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罢了，只是算这笔帐时务必要把环保帐也算进去。无论这项工程的命运最终如何，将之拿出来讨论，比之将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或者去“收复”西伯利亚之类的想法要务实得多。只是这条设想中的运河全境都在山东境内，并且最有可能受益的沿海地区也是山东的，因此省外之人往往关注度不够罢了。

第七节 新胶莱运河对中国沿海地区地缘格局造成的影响

我们今天不妨从整体的战略角度再来审视一下“胶东岛”的形成，会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地缘格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沿海的三大重点地区之一，凭借京津地区所具有的政治优势，这个经济圈将会成为经济的热点地区。从山东的情况来看，北部沿海城市无疑更容易从中直接受益。而相比之下，环渤海经济圈对以青岛为龙头的山东半岛南部黄海地区的辐射力度就要减弱很多了。如果有一条沟通黄、渤海的快速通道，不仅能够让黄海沿岸地区更容易融入整个经济圈，也可以让山东半岛的内陆地区（胶莱河沿岸）有机会直

接从这个“以海为媒”的经济圈中受益。

经济的因素固然是现在行事的主要考虑方向，不过传统地缘研究者往往更关注于战略安全。从这个角度看，这条快速通道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对于这一点，负责渤海以及连云港以北的黄海地区海域安全的北海舰队应该深有体会。相比于绕经成山角的航线，新航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往来于渤海——黄海之中的舰只完全处在陆基力量的两面保护之中航行，并且大幅度的缩短航程。特别是在旧有航线的东段处于朝鲜半岛的地缘威胁之下时。



黃海——渤海地緣關係示意圖

如果说北海舰队对于来自东面的地缘威胁感受尚不明显的话，那么 115 年前的北洋水师对此应该深有体会。渤海东部的地理结构，使得日本联合舰队可以在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海域设置封锁线。尽管从感情上我们不愿意使用“关门打狗”这句成语来形容这种情况，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最终以保舰为战术目标的北洋水师，失去了它绝大部分的舰只。将北洋水师甚至清朝的没落归结于渤海的半封闭地形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如果能够拥有一条更为安全的快速通道进入黄海，无论是当年的日本联合舰队，还是将来有可能对中国实施军事行动的海洋国家都必须重新制定他们的攻击预案了。

对于新“胶莱运河”的分析本来并不应当放在春秋部分的，不过关心山东和现实国家安全的朋友都比较多，所以也就顺便分析了。至于这条运河是否应当开挖，

自有各方利益去博弈，我个人只是将它的利弊从不同角度列出来罢了。上述言论应当也没有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

第十五章 齐国征服莱夷与胶东半岛的独特气质

第一节 齐国攻占莱夷所占据的胶莱平原

让我们从海洋回到陆地，继续春秋时期的“胶莱平原”。毕竟在那个时代，肥沃的土地才是各地缘力量争夺的目标。当齐国在鲁北平原站稳脚跟后，它首先要面对的并非泰沂山脉以南的鲁国。在那一地区，鲁国同样面临着大量的整合工作，这两个同为王室所倚重的大国暂时还没有机会发生冲突。

一般情况下，平原地区总是更容易突破，也更具有诱惑力，因此在鲁北平原东侧的胶莱平原，成为了齐人重点扩张的对象。而这一地区在当时为一支被称之为“莱”的东方部族所占据。有时候他们所占据的区域也会被后世称之为“莱国”，不过在周人看来，所谓“莱国”是不能位列正统及与系出西方的诸侯国相提并论的，因此将之称之为“莱夷”似乎更符合周人的看法。如果单单比较鲁北平原和胶莱平原，应该说这是两个具备同等防御力的地理单元。

也就是说平原本身都无险可守，齐国可以很容易的进入莱夷的势力范围，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于齐人来说，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是，周人已经成为了天下共主。那些分封于中原各地的诸侯国，最低限度也可以提升齐人的战略威慑力。而“莱”人所依仗的则是本土优势。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东方的土地并非无主之地。齐人希望接收胶莱平原，乃至整个山东半岛的愿望，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齐·地缘结构图（西周——春秋中叶）

最初的攻击是由莱人发起的，这给立足不稳的齐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抛开政治层面的因素，齐人将支撑点建立在泰沂山脉与鲁北平原的过渡地区，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使得他们有机会顶住最初的攻击，并保存自己的力量。最终站稳脚跟的齐人还是将“莱”人赶出了鲁北平原，并反过来进入了胶莱平原。这种形势的逆转当然不是一两场战斗就能够做到的。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齐人南靠山地的地缘结构无疑加强了他们的抗击打能力。这使得西进的莱人即使占据了鲁北平原，漫长而又无险可依的防线也很容易被齐人突破。

而在齐人开始战略反攻之后，莱人在胶莱平原上的失败也是可以预见的，毕竟胶河两侧同样无险可依。失去了胶莱平原，对于莱人来说并非末日。退入山地丘陵地带据险以自守，更加有利于将战争变为持久战。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西南面的鲁中山地丘陵与东北面的胶东丘陵，都可以是莱人部族放弃平原地区之后的选择。由于地缘压力是由西而至的，胶东半岛上的那些丘陵地带成为了莱人重新整合力量的根据地。

在莱人退于胶东丘陵之后，他们在胶东半岛的北部建立了新的都城。这个地方现在叫作“龙口”，为了区别于以前的“莱国”，这个偏安一隅的新“莱国”被称之为“东莱国”。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龙口粉丝”的知名度显然要高过它作为东莱故都的声望。不过作为一个族群，“莱”人并非仅仅蜗居在龙口一地。事实上在整个胶东丘陵地区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其对地缘文化的影响，至今仍有残留。

第二节 莱夷退入胶东丘陵后主要活动的区域

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很容易在胶东半岛找到一系列带有“莱”字的地名，比如莱州，莱阳、莱西、蓬莱等等。将这些地点标出来，我们很容易获知莱人在胶东半岛的地缘影响范围。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莱人是在齐人占据了胶莱平原之后，才进入胶东丘陵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齐国强盛之后，莱人的活动范围就只能局限在这个东方的“天涯海角”了。

在莱人到来之前，应该还会有其他一些小的东夷部族活动于胶东半岛。只是历史永远是由强者书写的，齐国所代表的华夏体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也就当然的成为了山东半岛的重要代言人。而“莱”人在东夷体系中亦属于强者，所以他们也在山东丘陵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至于其他的东方部落，大多数就只能湮没在历史当中了。

在这些以“莱”为名的地名当中，有两个地点需要特别关注一下。一个是莱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图，会发现莱阳地区的风水也不错。胶东丘陵在它的周围围成了一个保护圈，越向中心地势越低，整体上呈一个盆地状态（莱阳盆地）。换句话说，莱阳盆地是胶东半岛的地理中心。如果莱人以此为核心，与齐人对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可惜盆地的南面是地形最为平缓的区域，在齐人强大的地缘压力之下，莱人最终的命运就只能是再次向胶东丘陵的边缘进行迁移。而那些介于海洋和胶东丘陵之间的狭小的沿海平原则成了莱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了。



齐·地缘结构图（西周——春秋中叶）

凭借丘陵与海洋的保护，齐人长期只能在莱阳盆地与莱人展开拉锯战。只可惜对于古典时期的东亚民族来说，海洋的战略优势尚未能充分体现出来。胶东半岛本身的地理情况及所具备的农业条件，又很难支撑他们对齐人发动反攻。最终在长期的消耗战后，齐人得以在战国时期统一整个胶东半岛。其实莱人并非只是向胶东丘陵转移，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胶莱平原的地理位置亦可以让他们有机会退入沂蒙山一带。

当然，散居在山中的莱人在历史上是很难留下痕迹的。那些能够在地势较平缓的地区聚居并能形成城镇的人，才有机会让后世之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位于沂蒙山系西侧的“莱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莱芜所在的地理单元，被称之为“莱芜盆地”。尽管由于规模的问题，这个山间小盆地在地缘博弈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也为部分流落于此的莱人提供了庇护。需要注意的是，沂蒙山以西并不是莱人的传统势力范围，莱人的主力还是在胶东半岛。也就是说，在这一区域本身已经有了同属于东夷体系的其他部族。关于莱芜盆地的地缘结构，以及它的战略地位，会在分析鲁

国时作出解读。

第三节 齐国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之滋生孤立主义思想

对于已经统一了泰沂山脉——五莲山以北地区的齐人来说，地缘重心还是在鲁北平原和胶莱平原，因为在严重依赖农业的古典时期，水源丰富的平原地区能够提供最好的耕地。在这一点上，齐国与那些内陆诸侯国并无二至。不过胶东半岛的那些沿海丘陵虽然不能成为齐国的另一个粮仓，但通过漫长的海岸线所获得的渔盐之利却是内陆诸侯国所不具备的。而且胶东丘陵中所蕴含的丰富矿藏，特别是铁矿使得齐国的在春秋后期又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粮、盐、铁三项是古典时期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掌握了这三项无疑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齐鲁地缘关系示意图

另外齐国三面临水（渤海、黄海、济水），一面临山（泰沂山脉——五莲山）的地理结构也非常有利于抵御外敌的入侵。并且山东半岛南北面海的地形，还可以很方便的让齐国人北上与辽东半岛，南下与江淮地区进行贸易。这种复合型地理结构，使得齐国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应该说齐国的地理条件是诸侯国中最好的，不过有时候过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也未必是件好事。当你能够依靠自身的地理条件过得比邻居富，并且有机会远离地缘博弈的中心时，孤立主义便会抬头。

也就是说，如何保住既得利益会成为主要目标。

在春秋和战国前期，由于江淮地区和河北平原尚能对齐国造成强大的压力，因此齐国即使想偏安也不可能。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当渭河平原上的秦人与三晋及楚人展开激烈博弈时，孤立偏安的思想萌芽便不可避免的在齐人脑海产生了。

第四节 方士以炼丹药和沟通仙人的技能活跃于历史舞台

从胶东半岛的地理结构和地理位置来看，它所丰富的并不仅仅是齐国人的物质生活，在齐国人满足了生存需要，并开始脱离“低级趣味”之后，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粉墨登场了。这项活动的主角是一群被称之为“方士”的特殊人群。关于方士的职业定位，并不是件特别明确的事。有时候他们会被当作医生看，因为方士们经常对有追求更高层次精神生活的贵族说：“我的长生不老药是用硝石、硫磺、白矾等七十二种配方，加上连须葱白汁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可以延年益寿以外，还可以有“伟哥”之效！真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心中默念）之必备良药！”



古代炼丹术

按照现代科班出身的那些医生的看法，方士们所炼制的丹药即使不会像“含笑半步颠”那样具有怪异的毒性，但吃下去对身体也是有害无益的。不过让人感到神奇的是，

这些丹药在发挥诸如万艾可那样的功能时，却往往能力见奇效，尽管在很多时候，这方面的效果与益寿延年的目标是成反比的。比之虚无缥缈的长生，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奇效更能让贵族们体验到生活之乐，因此方士们的炼丹术也得以代代相传。

至于这些丹药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就需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精神的医学专家去亲身体验了。不过方士们的炼丹行为也并非一无是处，由于他们喜欢把各种矿物混和在一起加热的方式，也让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化合物。这让一些

热衷于通过“提升”古人科技水平，借以增强自己国际影响力的“专家”为他们安上了个“化学家”的美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将宋朝某个在椅子上绑上火药，试图白日飞升的人，论证为载人航空第一人的做法）。

由于这些方士和他们的继承者需要在各处游走，包括去人际罕至的深山大海中寻仙采药。因此如果需要，把方士们论证为旅行家、地理学家、甚至某国的皇族来源都不能算是空穴来风。在这里分析这些“方士”那近乎某某功的神奇历史，似乎与地缘这个主题无关，其实却还是绕不开地缘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胶东半岛那么受到神秘主义者的热爱，以至于有无数方士（道士）以及帝王希望在此受到上天的眷顾。

我们先需要从逻辑上解读一下方士们为什么能够长期活动于历史舞台。依靠那些有“奇效”的丹药，以及一些魔术手段以换取一时的信任并非什么难事。但如果方士希望长久保持他们的威信，就需要让人相信他们具备另一种超出凡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与“超人类”沟通的能力。而这种“超人类”可以是由人死后的灵魂所变身而成的“鬼”，也可以是在想象中的天庭中为官的“神”。不过更吸引人的是介乎神、人之间，更具浪漫主义气质的“仙”。由于“仙”的这种中间身份，他们有时候被称作“神仙”，有时候也被叫作“仙人”。

无论“仙”在中国的神秘主义文化中占据何等地位，这些具备长生不老能力的“超人类”都是贵族阶级尤其是帝王们的最爱。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方士们告诉他们，凡人可以通过修行或药物达到这个级别。在人类尚无法解释很多自然现象的时候，相信神魔仙怪一类的超人类存在，以解释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一种类似于法律条文中的兜底条款的终极解决方案。即使在科学已经成为主流思维的今天，这种想法仍然存在于一些貌似无神论者的头脑之中，只不过神魔仙怪们被看似更为“科学”的外星人所取代了。

对于古人来说，他们倒不是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他们也同样的认定那些天上的星星中存在着外星人，只不过古人没有科学这层外衣（应该说是伪科学），还是将之归类为神、仙一类的范畴。只不过对于方士来说，仅仅让神仙们生存在天空之中是不够的。尽管他们可以通过天人感应一类的心理暗示游戏，来证明他们的超能力，但无法白日飞升的现实，还是让方士们需要在人力可能到达的地区设定有“仙”的存在。这一方面是为他们自己保留希望（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成真理，会有一部分方士们仅仅出于信仰也认可这种说法），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的恩主们感觉到希望触手可及。

第五节 方士将云雾飘渺的山峰设定为仙人居住地

为神仙在地球上找个住处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需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不能让凡人太容易接近，或者说不能生存在人类容易聚居的地区；二是人力又有可能到达的地方，否则方士们又要费心表演那些有可能被识破的“魔术”了，并且也很难借此得到那些凡人才需要的交通工具。按照这两个原则，那些为凡人所倚重的平原地区显然是不符合要求。鉴于人类在发明大型挖掘机械之前，挖地的能力尚显不足，因此为这些地区安排一些土地神之类的龙套角色，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些角色的设定，显然不是方士们的希望所在，因为他们的恩主需要身份更为高贵的“仙”来配合他们的身份。因此土地公公之类的小神就只能服务于平民百姓了。让神仙们住在水下，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问题是，方士们如果表明



郎山云海奇观



蓬莱阁

他们具备与水神们沟通的能力时，对方士本身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意。特别是西门豹在漳河边让巫婆（方士的一个变种）们下河与河伯直接对话之后，基本上已经不太有人敢声称自己具备与水神沟通的能力了。

既然平原和水下都不是仙人的好去处，那么高山之中就成为了仙人修行的不二选择，特别是那些山势险峻，而又云雾飘渺的山峰。人际罕至而又更具神秘气质，帝王们深信（也包括许多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那里才是仙人

们的福地。即使是方士本身，也不乏真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因此我们会看到那些具备这种气质的山峰们，基本都被方士们所占据了。只不过在春秋战国之后，方士们从老子身上找寻到的理论基础，让他们有机会更加深入的影响世俗社会。在“道”的大旗之下，方士们被组织了起来，自此以后他们开始被称之为“道士”。

只是在宣扬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同时，寻访仙人（或者希望自己修炼成“仙”）仍然是找到组织的方士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相比于内陆的那些青山峻岭，沿海的那些山脉会更容易被认为有“仙”的气质（简称“仙气”）。这一方面因为海洋多变的气候以及充足的水汽，能够让这些“仙山”更具有神秘感，包括在山上产生更多的云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海洋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能够加强“仙山”们的仙气。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一座云雾笼罩的险峻山峰，矗立在海边，近处是惊涛拍岸，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种气势不由得你不相信只有具备超能力的“仙人”们才配居住在此。



海上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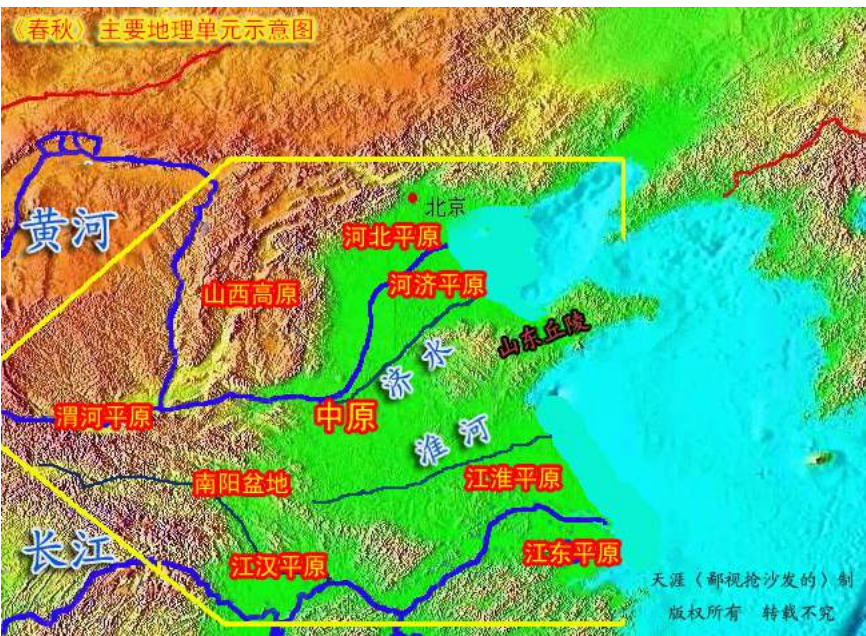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方士”的解读上，似乎这些神秘主义者与我们现在解读的地缘大背景无关。只是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这类神秘主义者都是会有生存空间的，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能够影响历史。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人其实是“无神论者”，或者说更注重现实，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地缘文化中就没有宗教性质的文化存在了。因此花点时间来解读“方士”和与他们具有相似职业特点的人还是有必要的。准确说是在为这些神秘主义者找寻一下地理上的生存空间。

之所以在齐鲁部分涉及到这一主题，是因为山东地区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但泰沂山脉两侧在文化气质上却又具有明显的不同。相比于鲁国的关注重点在于内部社会结构的调整之上，齐国则更具有开放性的气质。为方士这一类的神秘主义者

提供土壤只是其中一个表现罢了。这些文化特点的形成背景，当然与两国的地理结构分不开。在那些求仙问道之人看来，胶东半岛有充足的理由成为圣地。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海陆交界处的险山峻岭总是在世人眼中更显神秘。从春秋时期的中央之国覆盖范围来看（也就是诸侯博弈的区域），胶东半岛的那些滨海丘陵甚至没有竞争对手与之抗衡。

第六节 胶东半岛特殊的地理结构体现出的地缘优势

我们先来看一下，春秋时期，诸侯们已经将哪些地理单元纳入磨合的范围了，沿海地区又具有什么样的地理特征。下列几个地理单元应当是春秋时期诸侯们的争夺重点。如果由北往南看，分别是：河北平原、河济平原、山西高原、渭河平原、中原（包括洛阳盆地）、山东丘陵（包括附近的外围平原）、南阳盆地、江淮平原、江汉平原、江东平原（主体为环太湖平原）。这九个地理单元之间的博弈也就是我们在解读春秋争霸时的基础。当然，在这九个核心地区的外围，也会与之发生地缘碰撞，只是大部分时候都与诸侯之间的争斗无关。如有需要，在具体解读时也会涉及到。



春秋时期主要地理单元示意图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春秋时期，中央之国沿海区域的地理特征。如果从地理单元上来看，能够兼具海洋与陆地双重气质的，大的地理单元有河北平原、河济平原、山东丘陵、江淮平原、江东平原。仅仅从位置上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山东丘陵处在春秋时中央之国沿海地区海岸线的中间。而山东丘陵的东部分布于胶东半岛之间，这个向东突出的半岛是这条海岸线中唯一具有山地气质的地理单元。这些都显示了胶东半岛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气质。而这种地理结构能够从军事、商业等方面体现出胶东半岛的地缘优势，而统一了胶东半岛齐国，显然已经开始从中受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春秋时期，中央之国沿海区域的地理特征。如果从地理单元上来看，能够兼具海洋与陆地双重气质的，大的地理单元有河北平原、河济平原、山东丘陵、江淮平原、江东平原。仅仅从位置上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出，山东丘陵处在春秋时中央之国沿海地区海岸线的中间。而山东丘陵的东部分布于胶东半岛之间，这个向东突出的半岛是这条海岸线中唯一具有山地气质的地理单元。这些都显示了胶东半岛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气质。而这种地理结构能够从军事、商业等方面体现出胶东半岛的地缘优势，而统一了胶东半岛齐国，显然已经开始从中受益。

不过对于倾心于陆地的华夏族来说，在整个古典时期，胶东半岛在商业及军事上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而直到古典时期行将结束之时，来自欧洲的德国，以及来自海洋对面的近邻——日本却比中国人更先看透胶东半岛的地缘优势。以至于双方都费尽心机希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日本，在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巴黎和会，而日本却企图就此接收德国在胶东半岛的势力范围，这当然不能为中国所接受。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日本人当时的图谋重点是整个山东。

包括陈道明演的电影《我的 1919》中也是这样理解的，电影中甚至臆造了一个情节，让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用孔子比作耶稣，以示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的基督徒不愿失去耶路撒冷一样。不得不说，这种比喻方法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真的发生在历史中，都会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过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他们的重点是在于控制胶州半岛上的那些重要港口（青岛、烟台、威海等）。对于孔子，只有在日本人有信心征服整个中国之后才会是目标。

可能会让很多朋友扼腕的是，封闭的地缘结构，让中国人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并不用承受来自海外的地缘压力。这就使得在地缘博弈中，海岸线的地位远不如那些能够成为主要产粮区的平原高。即使是一直存在的海上贸易，以及间或有军事行动利用了海洋的力量，都不能改变海洋的从属地位。很多时候，在帝王们的眼中，海洋最为重要的价值却是为他们保留了长生不老的希望。



胶东半岛的一处海岸线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海边的那些“仙山”尽管能够被方士们描述为

仙人最有可能居住的福地，但它毕竟还是在陆地上。换句话说它们的神秘感还是会随着人类活动而逐渐消退，特别是当掌握有足够人力资源的帝王对这些“仙山”抱有浓厚兴趣的时候。总之方士们需要在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恩主设定一个更加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而这个地方就只能选定在海中了。

当然，根据不要把仙人设定在水底的原则，这些具有长生不老能力的仙人们所居住的地方会是海洋中的小块陆地，也就是岛屿。由于山地能够具有更多的“仙气”，于是那些海中小岛也必须是以山的形式存在于海洋当中。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

第七节 胶东半岛由于仙气和海市蜃楼存在而受方士青睐

我们在《山东半岛地形图》上可以看到，在半岛东侧有一条山脉叫“昆嵛山”。在人类尚没有能力覆盖整个胶东半岛的时候，这条位于胶东半岛最东侧的主要山脉被视为仙人们最有可能的居住地。所谓“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其实最早就是被定义在这条山脉当中的。而之后，因为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原因，这三座“仙山”被虚化到了海洋之中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家”的。但起码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且开始希望永享富贵之后，方士们已经无法凭借陆地上的“仙山”来忽悠这位中央帝国的缔造者了。如果不让仙人们居住在海里，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了。



胶东半岛地形图

不得不说，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每个方士们都能意识到这点。最先感觉到危险存在的是那个叫作徐福的方士，而他之后所做的事相信大家都会清楚。无论徐福最终是否到达日本，并成为第一

代天皇，他的这种远见卓识都为其留下了一线生机。而剩下来的那样方士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焚书坑儒”的典故让很多人认定秦始皇跟孔夫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实际上他活埋的是那些骗了他无数金钱与时间的方士。



昆崙山



海市蜃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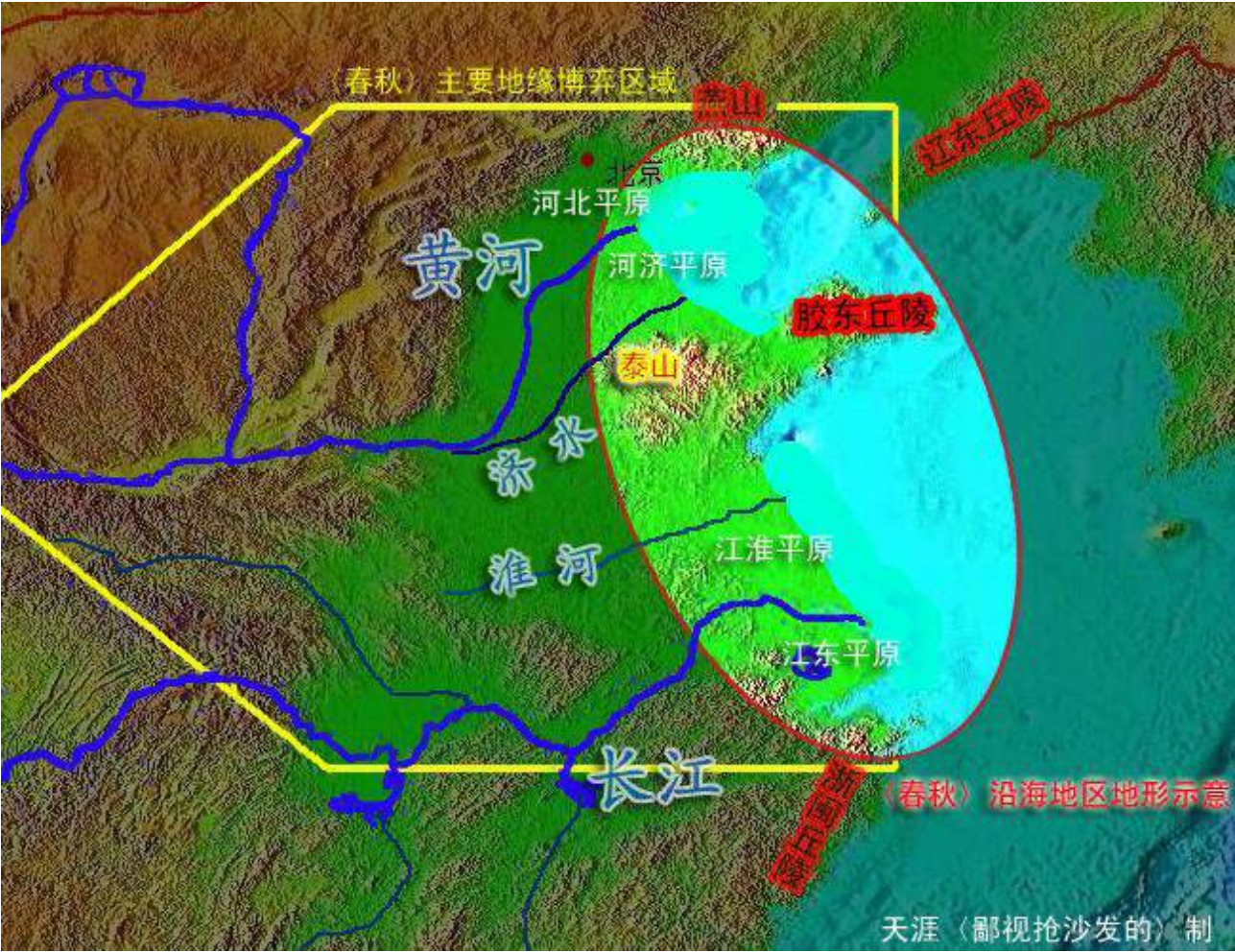
无论秦始皇是否在临死前已经彻底醒悟，在科学成为主流思维方式之前，那些兴起于春秋时期的方士总还是会有他们的市场。而胶东半岛无论从方位（日出的东方是最为神圣的）、地形上来说仍然还是有仙气所在的，也一直受到方

士（道士）们的青睐，这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尽管我们提到全真教总是会 and 终南山联系在一起，不过这几位祖师爷却是在昆崙山上创建全真教的。

胶东半岛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秘主义的大本营，还有一个气候上的现象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那就是“海市蜃楼”。在不能从气候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时，任何一个看到海市蜃楼的人都不得不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将之臆化为海上仙山便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据说在胶东半岛的最北端是这种气候现象的多发区，因此这一地区也将三大仙山中的“蓬莱”揽了过来，成为了一个凡人所使用的地名。

最后要说一下，中国的神秘主义者后来都找到了组织，或者说是从单打独斗整

合成了团队（用范厨师的话说就是“组团忽悠”）。运气好，理论基础找得好、组织早的成为了宗教。运气不好、个人崇拜搞得太厉害、搞得晚的就成了 X 教。而这其中能够与道教（方士们组团后所成立的组织）相抗衡的就是佛教。虽然佛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修行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云雾缭绕的山峰会更能提升修为。但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还是不可避免的本土化了。换句话说中国的信徒们也同样相信，佛和菩萨们也应该居住在那些有仙气的地方。只是山东丘陵已经被本土宗教经营太久了，因此佛教徒们只能向南寻找新的圣地。



春秋沿海地区地形图

好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东南丘陵（包括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也正好开始纳入了中央帝国的管辖范围。因此双方得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争夺这些地区。最终的结果我们会看到，佛教的滨海圣地都集中在东南丘陵地带（如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

第十六章 鲁国的位置和境内分布的山河湖泊

第一节 鲁国初封地的地理位置

关于鲁国，如果从人文的角度来解读，相信可以写很多。单是一个研究孔子本人，就可以写成一部巨著了。要是再顺带把儒学拿出来点评一下，估计就得再改名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既然我们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此也就不在圣人的学说上面多加笔墨了，基本的着眼点还是会在鲁国地缘结构之上。

对于鲁国的位置，一般都会有个概念，即与齐国分列泰山南北。也就是齐国在北，鲁国在南。这个方向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太含糊了。根据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清楚了，分割齐、鲁的山脉可以统称为“泰沂山脉”。这个山脉又由五个相对独立的小山系组成，即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尼山。其中泰、鲁两山在春秋时为齐、鲁两国的势力分割线。而沂蒙山以东的地区，则在大部分的春秋时期为莒国的控制范围，不过后来在齐、楚、吴的争霸战中几经易手。齐国由于在地缘上更具优势，因此在大部分的时候，控制灭国后的莒地相对容易些。在这种时候，沂蒙山或者说整个泰沂山脉成为了齐鲁双方的战略平衡线，或者说是争夺的目标。

如果以泰山为起点，尼山为终点，整个泰沂山脉大体上成一个反“C”形。尽管一般认为鲁国在泰山之南，但实际上鲁国的初封之地（也就是鲁国的国都）并不是在泰山附近。这个名叫“曲阜”的地方的准确位置是在这个“C”形山脉的另一个角上，也就是那个被叫做“尼山”的小山系上。据说尼山最早叫“尼丘山”，当年孔子的父母在山上祈祷，后生下孔子。因此将孔子取名为孔丘，字“仲尼”。后世之人说是为了避孔子的名讳，而将之改名为



鲁国地缘位置示意图

“尼山”。其实要避就再避得彻底点，干脆连字里的“尼”字也换掉，方显对圣人的“尊重”。应该说，当年周公为自己选的封地，位置是相当不错的。

“礼崩乐坏”是目前大家对社会普遍的感觉，其实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在整个中国都处在转型的阶段时，很多旧有的价值观被打破了，而新的价值观又没能建立起来。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现在的“礼”已经被扭曲了，但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礼”，谁又能说得清呢？在这种时候，通过追忆历史上的某个辉煌时期，借以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往往倒是能够收到奇效。欧洲的文艺复兴走的就是这条路，这也让欧洲在近代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不过欧洲人并不是最先想到这个办法的，早在 2000 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克己复礼”的概念，希望能够为纷杂的春秋乱世打造一套价值体系。只是在当时，这个旧瓶里面装的新酒还不够多，也没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地缘基础。直到汉朝中国真正有机会开始实现中央集权体制了，儒家的那些思想才真正有机会在经过修饰之后粉墨登场。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军事思想为主导的“丛林法则”才更具有指导意义。

有一种说法是周公在立国之初就预见到了鲁国会败于齐国。理由是齐国在教化子民方面更加务实（特别是对殷商遗民），一切因俗就简；而鲁国则要繁琐得多，或者说礼数要多得多。如此下来齐国的人民更容易归附，国力也就会比鲁国强大（由此还诞生了“平易近人”的成语）。很怀疑这段故事是后人附会的。因为周人当初的立国之本就是那些在今人看来繁复无比的“周礼”，也是华夏与蛮夷们最大的区别。至于对待那些新近归附的化外之族，周人倒是非常宽容的，而这种政策的制定者正是鲁国的创立者——周公。也就是说，周礼本身并不是鲁国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鲁国在三监之乱平定后由鲁阳东迁至曲阜

关于鲁国究竟是封建给周公，还是他的长子伯禽的，一直都有争议。就我个人来说，倾向于是封建给周公本人的。只不过由于周公对于王室太过重要，需要在朝稳定局势，因此才由嫡长子前去继承他的封地。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过，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曾经重新进行一次大的封建。不光封建了一批新的诸侯国，也将之前集中在中原地区的姬姓诸侯国向外围迁移，以扩大周人的覆盖范围。而作为周公的嫡系诸侯国——鲁国，也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列。

鲁国的最初封建之地是在伏牛山的东侧，那一地区在唐朝之前被称作“鲁阳”，而之后就一直被称作“鲁山”了（即现在的河南省鲁山县）。其实与周公齐名的召公，最被的封地也不是燕山南麓，而是在洛阳盆地的东北角——偃师。这倒符合周公主

外，召公主内的分工。其实不管鲁国是否周公本人封国，都改变不了鲁国在西周时期的政治地位。与春秋时期鲁国的二流地位不同，西周时期的鲁国可以说是最受王室重视的诸侯国，将之称为诸侯国之首并不为过。



鲁国东迁示意图

我在之前也曾经说过，如果当初周公让鲁国和齐国对调一下封地，可能最终的结局就大不相同了。只是无论是出于与王室保持密切关系的原因（周王在西周时期的大部分时期，其实就坐镇洛邑了），还是选择相对更有利的地形防守的因素，周公将自己的封地建在泰山之阳都是最佳的选择。尽管鲁国在初封之后没多久就搬迁了，但有一点是没有变的，就是无论是在中原地区的西侧还是东侧，寻找到“靠山”都是必须的。对于周王也必须时时祭祀的泰山来说，让周公的后代去看护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相比其他诸侯国而言，鲁国在春秋之时并没有争霸的意思，这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因为鲁人以恪守周礼为荣。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鲁国深知自己的政治地位来自于王室，或者说如果不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局，鲁国挟礼以自重的辉煌是不能重现的。如果地理条件允许，鲁国人的心态并非不可能发生变化。

只是在进入春秋之后，他们最终会发现，如果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泰沂山脉的腹地，那么等不到鲁国成为中原的霸主，齐国人就会越过泰沂山脉，逼迫他们离王室更加近一些。因此鲁国人依靠残存的政治影响力来联合泰山以西的诸侯国，共同对抗齐国反而更为现实些。当然，这也正是那些眼红齐国坐收渔盐之利的内地诸侯国所希望见到的。

第三节 鲁国与古泗水的关系

提到曲阜，我们就必须提到一条古代名水——泗水了。与江、河、淮、济四渎不同的是，泗水是一条南北走向，没有独立入海口的河流。准确的说它应当是淮河的支流。只是现在泗水基本已经不存在了（只在上游有一段大部分时候没水的河床）。一般而言，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条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主要河流，比如渭水之于秦国，汾水之于晋国，汉水之于楚国。对于鲁国来说，那条发源于蒙山，绕曲阜而过的古泗水就是鲁国的命脉所在。之所以要在泗水前面加上一个“古”字，是因为这条河流目前只有上游还残存了一段河道。因此尽管泗水在古代的名气颇响，但今人知道的并不多。

泗水的命运被改变，很大程度还是因为那条母亲河——黄河。我们知道，黄河下游经常在山东丘陵的南北摆动，其南线基本就是夺淮入海。只不过淮河与黄河都是东西向的河流，如果不借助其他南北向的支流，黄河很难侵夺淮河的入海口。也就是说，那些上游与黄河接近的淮河支流都面临着被黄河侵占河道的危险。很不幸的是，在公元 1128 年，黄河由北线改经南线，并且在此后 600 多年间都没有再回到山东丘陵的北边，而这一次为黄河提供南下河道的就是泗水。

我们很容易将黄河的多变归结于天灾，而实际上黄河之所以为害华北平原，更多的却是因为人祸。正如这一次的改道，就是因为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公元 1127

年）为了阻止金军南下而主动挖开黄河南面的提坝一样。这种以水为兵的做法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 900 多年之后，同样为了对抗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蒋委员长又做了一次。如果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战术意义还是很大的。无论对方是骑兵部队，还是机械化部



鲁·地缘位置示意图（春秋）



吴·称霸伐齐路线图

队，黄泛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道天险。问题是，这种仅仅为了军事利益而人为改变黄河流向的做法，对于沿岸的居民来说却是巨大的灾难，其所造成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掉。

实际上改变河流的走向并不一定会带来灾难。对于人类来说，改变自然的能力很大程度都是通过控制水流来体现的。当然，这些改变在大部分时候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从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峡工程，莫不如此。就泗水本身来说，

古人对它的改造并非开始于南宋那次不负责任的决堤行动。在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始强大，并进入中原争霸的时候，泗水的命运第一次得到了改变。

对于长江以南的吴国人来说，越过长江，将势力范围扩大至江淮平原并非什么难事。只不过当他们再想将兵锋指向中原以及山东丘陵时，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了。换句话说，马匹是立足于江、淮流域的诸侯国的短板，如果没有其他可供利用的资源为吴国人运送兵员及后勤补给的话，希望争霸中原只能是一种奢望。对于谙习水性的吴国人来说，用河流来承担物流任务，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他们需要找到一条河流将江、淮、济、河四渎连通起来，以让吴国的力量通过这些河流扩散到它们周边的地区。

这条预想中的河流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但施工难度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大。首先，鉴于吴国控制江淮平原并没有太多地理上的障碍，所以将淮河与河、济两水连接起来就可以完成物流任务了；其次，黄河与济水本身就是相交的，因此摆在吴国人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将济水与淮河连接起来。鉴于济水和淮河都有很多支流，那么将一条济水南面的支流与一条淮河北面的支流连接起来的方案，所需的工程量将是可

以被接受的。最终鲁国西侧的泗水（淮河北支流）与菏水（济水南支流）被选定为最佳拍档。

当然，当吴国人可以在鲁国人的家门口挖掘运河时，也就意味着鲁国人希望向中原扩张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争霸游戏的主角成为了那些边缘国家。只不过由于地理的接近，鲁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能够控制住菏水以东地区的。也就是说，菏水、泗水成为了鲁国西面的地缘平衡线。对于鲁国人来说，周公为他们选择的这块风水宝地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背山，能够在获得“水”的保护，也是鲁国能够生存到战国末期的重要原因。而济、菏、泗三水无疑是保证鲁国西、北安全的重要屏障。这三条河流在历史上甚至先后形成了三个著名的湖泊，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在鲁国附近。

第四节 鲁国故地存在的大泽湖泊

我们来看看鲁国或者说泰沂山脉南边有哪三个大湖。这三个湖分别是：大野泽、菏泽，以及微山湖。如果从现在的认知度来看，微山湖无疑是最高的。当年铁道游击队就是活动于此，那首“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不知被多少人传唱。微山湖的湖址其实就是古泗水的一段扩张而成的，具体的形成时间是在明朝。在此之前也曾经反复形成过湖泊，这一方面是与那一地区地形的洼陷有关，而决堤南流的黄河则为它提供了额外的水源。不过在春秋时期，黄河还是走的

北线，因此现在微山湖所在的位置还是泗水的中游。

与泗水相对的就是菏水，这条济水的支流在古时候也经常因济水水量暴涨而倒灌成泽，古人将这一湿地称之为“菏泽”，现在它也作为山东最西部的一个城市的名称。只是无论是古菏水还是“菏泽”都已经不存在了，继承了



鲁·地缘位置示意图（春秋）

菏泽这个名字的城市以出产牡丹而闻名于世。

实际上在先秦时期能够位列华北名湖泊的是“大野泽”（巨野泽）。与北面的黄河在改变流向之时形成了“巨鹿泽”（大陆泽）一样，济水也在流经中原地区，并开始拐向泰山以北注入黄海之时形成了一个方圆几百里的大湖，这个湖就是“大野泽”。只不过随着黄、济两水的变化，大野泽在历史上的面积也并不是固定的。在五代时期由于黄河数次决口并向南漫流，湖水的面积被大大增加了。由于在湖面中间有几处丘陵高出水面，因此一湖中有山，山外有湖的景象也被称之为“水泊梁山”，而湖水本身也因此而被叫作“梁山泊”了。由于地形易守难攻，“八百里水泊”也成为了一些不满现状的“好汉”们落草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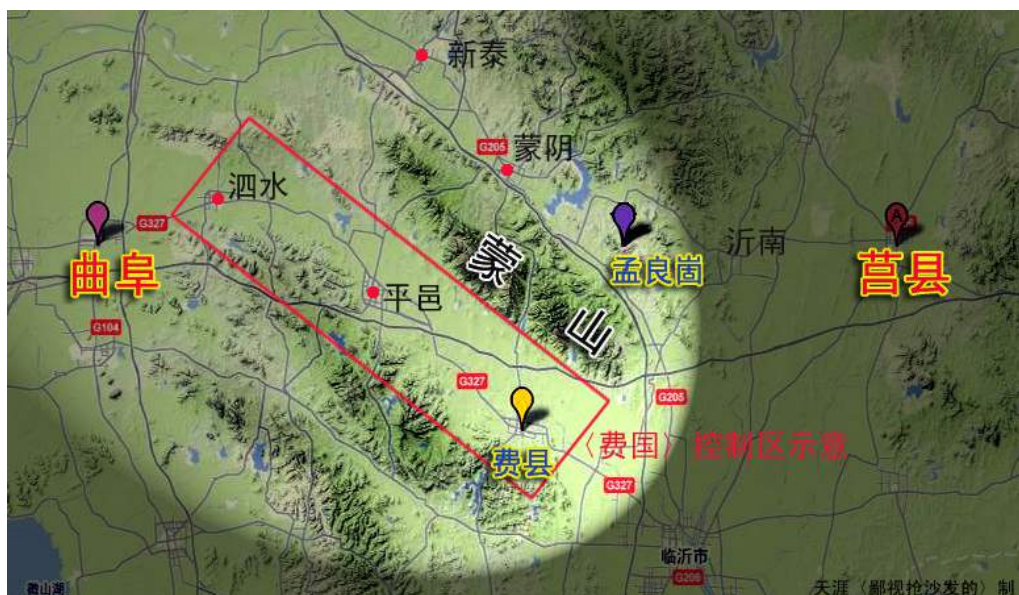
只不过现在无论是大野泽，还是扩容后的梁山泊都已经不存在了。只在北边还留有些许湖水，被称作“东平湖”。即使如此也还是能够位列山东第二大湖。在鲁国兴盛时期，大野泽至泗水一线都是它的势力范围。而菏水左右则经常成为卫、宋两国与之拉锯的区域。

第五节 尼山和蒙山在鲁国的地位和对其的影响

在说完鲁国西侧那些河流湖泊的前世今生后，我们要回头看看鲁国的那些“靠山”了。毕竟相比于河流来说，山地所能提供的保护更加牢靠些。就鲁国国都曲阜的位置来说，尼山和蒙山是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座山脉。其中尼山甚至与孔圣人的身世联系在一起了。由于《史记》中记载孔子的父母“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由于有“野合”二字，因此有关孔子的出生问题变得无限八卦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尼山在圣人出世的事情上出过力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成人后的孔子来说，在尼山求子当然不会是他的追求，圣人需要有一个更有气势的地方来暗合他的理想。人们常说“站得高，望得远”，登高远望确实能够让人豪气顿生。有机会到上海的话，买张票登上那些高楼的观光厅也会有心胸顿时开阔的感觉。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一般而言，如果一家公司有几个层面的话，老板也总是会在最上面一层选择一个视野开阔的房间办公。不必为老板的特权感到不平，要是你碰到一个喜欢在阴暗的角落潜伏的老板，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总之，视野的开阔与否确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胸怀。于是当孔子的视野还局限在鲁国的时候，他选择了在曲阜东面的蒙山登顶来感受世界，因此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说。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蒙山之于鲁国来说，的确有制高点的地位。我们在地形图上很容易看出，在蒙山南北有两条天然的通道通向东面直达莒地。在齐



费国控制区示意图



蒙山

邑——费县三地。

对于山东以外的人来说，这些市县的名字可能会感到陌生。将他们列举出来的意义在于说明，如果鲁国想要抵御来自东面的地缘威胁时，并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蒙山南北本身可以成为长期拉锯的地区。蒙山北面有个比较著名的地标，相信了解解放战争史的人都应该知道，那就是“孟良崮”。这个山头矗立在蒙山北通道的东端，曾经成为一代名将张灵甫的葬身之地。

相比于北通道，蒙山与尼山之间的南通道要更宽阔一些。当然鲁国为了抵御莒国的威胁，曾经布置重兵在通道的东端，当时那里所建立的城邑叫作“费邑”，所在地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费县。之所以在这里要提到费邑，是因为它与春秋时期和鲁国著名的“三桓之乱”有关。所谓“三桓之乱”也就是三个位高权重的家族架

国的势力尚未向南渗透时，东面的威胁主要来自莒国。就这两条战略通道本身来说，实际上并不只是单纯的道路。或者说南北的纵深尚宽，亦可以建立有自己能力的城邑。就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北通道由西至东分别建有新泰——蒙阴——沂南三个市县；南通道则同样条状分布着泗水——平

空了鲁侯，掌控了鲁国的政权。三桓除了让鲁国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以外，还使得孔子出走，并从此周游列国，希望有诸侯可以提供舞台实现他的抱负。也可以说是让孔子切身感受了一下什么是“礼崩乐坏”。

如果鲁国够大，或者说像晋国那样拥有一连串相对独立的盆地，那么三桓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战国时期成为一方诸侯。只可惜鲁国的地理结构即使是不分裂，也很难成为一流的诸侯国，因此三桓注定也无法像三晋（赵魏韩）那样位列战国七雄。在鲁国的公室最终夺回国家的控制权之后，三桓之中只有最大的“季孙氏”在春秋末期得以占据了蒙山与尼山之间的这片谷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费国。这倒是和沂蒙山——五莲山之间的莒国的地理结构有些类似。只不过这一类型的诸侯国，在历史舞台上注定只能是过客了，战国伊始就被灭了。

关于三桓和季孙氏，记得中学有篇课文叫《季氏将伐颛臾》，里面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孙氏的费国西起卞邑（泗水县），东至费邑（费县），也算是为鲁国在东面建立了一个缓冲国吧。

第十七章 公子纠和小白的君位之争及引发的齐鲁战争

第一节 公子纠和小白各前往鲁国和莒国政治避难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齐桓公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争霸之路。无论春秋五霸的称号究竟应该颁给哪五个君主，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都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上，也正是齐桓公正式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在此之前的郑庄公，虽然也曾经在中原称雄一时，但只能被称之为“小霸”。

这一方面是由于郑国在扩张过程中与王室反目，不能名正言顺的号令诸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郑国在中原地区的扩张困难重重，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在实力上与边缘大国相比（郑国当时视齐为联盟对象，并非常尊重齐国的大国地位）。郑氏三公之所以能够在春秋历史上拔得头筹，在郑国部分已经分析过了，盖因“老虎”们还在整合自己家园。

齐桓公在继承君位之前的名字叫“小白”。和他的兄弟“纠”相比，这个名字可能显得不是那么有霸气，不过事实是小白笑到了最后。在后世，人们常称一些富家子弟为“公子”，其实东周时那些诸侯后裔才算真的有资格称为公子。无论生前是否被封为公爵，诸侯们死后所加的谥号多为公。这就好像军中如有阵亡者，往往会追授一级一样（比如日军）。在春秋乱世之中，规矩已经不是那么严了，反正是给死人用的，因此大家都尽量往大的封。当然，对于那些之前为王室所封建的诸侯们来说，能够自封为公已是到顶。而那些长江流域的蛮夷们，倒是在生前就已经称“王”了。

就齐国的爵位来说，历来都有些争议，有说是侯爵的，有说是公爵的。不管怎么样，“纠”和“小白”两兄弟都还是被称作“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与后世那些有点钱就枉称“公子”的纨绔子弟相比，他们显然更有资格接受这个封号。关于兄弟争位的起因，相信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了，即使不是很清楚的也可以百度一下。简单点说就是齐国当时的情况有点乱，因此两兄弟都逃了出来。其中公子纠到了鲁国，而公子小白则到了莒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避难。

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是非常常见的，即使是两个经常发生战争的世仇，也乐于接受对方的贵族前来避难。这并不难理解，现实的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本，而接受国所要付出的无非就是一些招待费罢了。不过也不是什么国家都能够做这种事的，最起码你的实力不要和对方差距太远，否则很

有可能惹火烧身。

就当时的情况看，鲁国和莒国都还自认为与齐国处在同一数量级上。从两位公子的角度来看，选择鲁、莒两国避难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出了事找舅舅的传统不只在民间才有；而公子小白的母亲则是卫国人，不过地理更接近的莒国看似更为合适，毕竟他还寄希望于有一天可以回到齐国参与君位争夺战，因此太远的诸侯国就不在考虑的范围了，这种深谋远虑也的确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公元前 697 年，机会终于来了。因为他们二人的哥哥齐襄公在前一年死了。说起这位齐襄公来，所做之事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得上是“惊世骇俗”了。为了能够和他的妹妹文姜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他甚至将妹夫鲁桓公给谋杀了。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哥哥，也难怪两个弟弟被吓得逃到了国外。本来齐襄公死了，两兄弟就有机会回来争夺君位的。

不过杀死齐襄公的人自己篡位成了国君，这种时候回去等于去送死，人家正想斩草除根呢。好在春秋初期礼崩乐坏的程度还不太深，因此贵族百姓们在第二年就把这个叫公孙无知的乱贼给杀了（到了春秋末期田氏做同样的事，就没那么多“义士”了）。对于给两兄弟出谋划策的参谋们来说，这正是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剩下的无非是谁的马快能够跑先回临淄去坐上君位了。

第二节 公子纠和小白分别回国的路线

我们先来看下公子纠的回国路线，从地处泗水之阴的曲阜（鲁国国都）到临淄需要先向北行到泰山南麓的泰安，然后折向东行至莱芜盆地，最终再向北，沿着鲁山山脉与泰山山脉中间的山谷到达目的地。经过测量，全程大约是 250 公里。这条道路也是连接齐鲁两国的主要道路，在齐国强盛之后，一方面沿着泰沂山脉修建长城，另一方面也在各个路口修建了关城。而公子纠的这条归国路线无疑最需要得到重视的，因此在山谷中间齐人修建了青石关，以抵御来自南面的入侵。

相比于鲁、齐之间略显曲折的道路，齐、莒之间的通道要显得平直一些。从莒国的都城（今莒县）出发，所需要做的就是沿着泰沂山脉的东侧北行，经由临朐到达临淄，整个行程约 170 公里，比公子纠的归国路线整整少了 80 公里。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在同一时间出发，公子小白的胜算要大得多。事实上，公子小白还有可能先出发，因为双方安排在齐国的线人都会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回来，而基于路程的远近，小白得到消息的时间会更早些。

作为公子纠的第一参谋——管仲而言，当然是非常清楚他们的劣势在哪里。如果要想跑赢这场比赛，有两种选择：一是轻车简行，选择最好的马，带最少的人和随身物品快速前进。问题是，这样做的话倒是有可能跑得更快些，但对于一个回去争夺君位的人来说，只身回到齐国（包括只带几名随从）显然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另一种选择则是阻止公子小白回国，没有了竞争对手，那么公子纠就可以从容做好准备以回去继承齐国国君的位置了。相比于前一种方法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办法，所要考虑的无非是在哪里下手罢了。



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归国路线图

关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君位之争，可以说是春秋时期的一件重大事件，所引出来的历史名人也不少，管仲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从知名度来看，他甚至超出了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这不仅是因为管仲有过人的政治才能，更因为他是一个理财高手。换句话说，也就是管仲的智商和情商应该都很高，这从他最初请命阻击小白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小白当时选择莒国作为避难之处，其实就已经棋胜一招了。与小白的舅国卫国相比，莒国更可以让他有机会介入齐国的权力中心。因此管仲选择了我们所分析的第二方案，这应该是公子纠获得先机的唯一机会了。

尽管我在图中将齐长城标示了出来，但事实上在两位公子争位的时候，齐长城还没有修建。在春秋初年，各诸侯国还在自己的初封地附近扩张。换句话说，齐国暂还不用担心那些边缘大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自己的附近。不过有没有城墙与齐、



齐长城遗址

鲁、莒三国之间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长城的作用很大程度是将那些山中原有的路口横向连接起来，而这些路口就会建筑关口以为防守，有的时候甚至会在同一道路上建筑几道关口，以增加保险系数。

如果公子纠当时希望获得距离上的优势，他还可以选择在莱芜盆地等待时机，这样当机会来临之时，回国的路程可以缩短一大半，也自然可以赶在小白的前面了。由于当时王室刚开始衰弱，因此鲁国还有些老本吃，莱芜盆地尚在鲁人的控制之中。

只是这种控制并非直接控制，因为在莱芜盆地当时有一个东夷小国——牟国，算是鲁国的附庸。对于以周礼自持的鲁人来说，一般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就足够了。而由于王室的倚重和鲁人的“知书达礼”，那些东夷小国也愿意依附于鲁国。不过到了春秋后期，牟国终究还是让齐国给灭了。泰安——莱芜一线成为了齐国的直辖地，而鲁国也不可避免的衰弱了。

由于莱芜盆地当时并非鲁国所直接管理，因此公子纠不大可能将自己的安全交付给牟国。事实上在春秋之时，这一类处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往往是墙头草，真要是过去了，齐国的新君一施压，将自己做了投名状交了出去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同样的道理，选择在莒国避难的小白也应当是呆在莒国的国都（今莒县）。齐、鲁与齐、莒三国国都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竞赛的客观长度。

关于牟国的情况可以再多说两句，实际上牟国还有一个称呼叫“牟子国”。就这个“子”字而言，是一个爵位，也就是“公、候、伯、子、男”中的第四等。有一种说法是，“子”这个爵位其实和“男”是平级的，只不过前者主要是用来封建给那些蛮夷之国的，就好像楚国也被称之为“楚子”一样。另一个情况就是关于“莱芜”二字的来历，关于这个“莱”字的背景，在前面我们已经交待过了，应当是在齐人

重压之下被迫迁移至此的部分莱人的标签。而这个“茌”字则被认为有可能是“牟”字的误传。这一类的考证事实上是很难证明的，不过中国的文字的确是可以传递很多地缘文化上面的信息，这也让我们探究先人的行踪之时能够有迹可循。

第三节 管仲前往穆陵关附近阻击公子小白归国

当管仲决定阻击公子小白之时，他应当是只身（或只带少数随从）前往的。如果从距离上来看，这样应该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因为从距离上来看，如果管仲从曲阜（鲁国国都）出发，到达阻击地点的距离，和到达临淄的距离差不多。之所以认定管仲是只身前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管仲在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之后，未能上前验证自己的战果。对于贵为公子的小白而言，他同样有数量不少的随从，这一一定程度上也会减慢他的行进速度。当然，这也让管仲失去了上前补上一箭的机会。

当管仲从莱芜盆地选择向东插入公子小白的北上路线之时，理论上他可以在齐



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归国路线图

莒通道的任意一点上实施他的计划。不过最理想的阻击地点是在两条路线的交汇点上，这个点在后来齐人的防御工事——长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齐人也据此修筑了齐鲁第一关——穆陵关。之所以这里会成为战略要地，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里正好处在“沂沐河谷”的北端，在这里沂蒙山与五莲山之间存在着一些断续的丘陵，也让可以选择的道路开始收窄，变得利于防守和伏击；另一个原因则是，对于后世的齐人来说，主要的地缘压力来自北部的河北平原与南面的江淮平原。在后者占据主导地位的诸侯国（主要是吴、越、楚），如果想快速进入齐国核心地区的话，沿沂蒙山东侧通过穆陵关进入齐地是最为理想的线路。

不管怎么说，如果管仲真的如历史所记那样，进行了这次传奇式的阻击，那么上述线路是他最有可能的选择。尽管管仲当时轻装简行，速度应当比公子小白要快，但在行进距离差不多是小白的三倍的情况下（曲阜——穆陵关约 260 公里，莒县——

穆陵关约 83 公里)。能够与公子小白基本同时到达穆陵关附近仍然是一个奇迹。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管仲本人当时是在牟国（莱芜）等待消息。尽管公子纠呆在牟国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但作为一个幕僚来说，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管仲在收到消息之后，一方面派人前去曲阜通知公子纠，另一方面前往齐——莒通道上截击公子小白就变得更加合理了。在双方都倾尽全力的情况下，在莱芜收到消息就东行的管仲，应该正好比在莒县收到消息再北行的公子小白早一点到达后来的穆陵关附近，并选择好伏击地点。

在管仲自以为阻击成功，而公子小白抢先一步到达临淄之后，这场好戏才算刚刚开始。在没有彻底铲除对手之前，成了齐桓公的小白并不能算是完胜。而由于有了鲁国的介入，其后发生的两场战争成为了齐鲁两国达成地缘平衡的最佳注脚。

第四节 鲁国护送公子纠归齐争位失败后与齐国发生干时之战

在公子小白回到临淄之后，未能抢得先机的公子纠自然是不会甘休的。其实就算公子纠肯让出君位，鲁国也断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即使鲁国没有野心借此控制齐国，但让自己的外孙做了齐国国君，并就此与鲁国修好还是可以期待的。由于收到了管仲所传递过来的错误情报，公子纠和护送他的鲁国军队走得并不算快，一共花了六天时间走到了临淄附近。如果以 250 公里计，一天大约 40 多公里，也就是 80 多里地。换句话说也就是军队日行夜宿的正常速度。这种走法倒是有利于保持体力，不过当他们进入齐境之后，相信一定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急行军以争取时间。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由于齐、鲁之间的距离远长于齐、莒之间的距离，因此即使公子纠昼夜行军也未必能够先一步到达临淄。因此鲁国这次是派遣了军队护送公子纠，换句话说，鲁国方面已经预料到这场赛跑并不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如果鲁国的军队在帮助公子纠取得君位之后，并“适当”的留下着部队，将自己的防线向齐国方向推进一点，我们也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现在的形势很明显了，如果鲁国人不想空手而回的话，那么一场大战就不可避免的了。在鲁国军队向北走出泰沂山脉，准备向东拐向临淄时，已经接受公子小白领导的齐国军队也已经在临淄城的西面布阵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在现在淄博市的背面，一个叫“桓台县”的地方，春秋时那里叫“乾时”（也称“干时”），因此这场遭遇战也被称作“干时之战”（公元前 685 年）。

如果仔细观察地形图的话，会发现泰沂山脉向北延伸的那些丘陵到这里便到头了，也就是说有足够的开阔地来进行春秋各国所习惯使用的“车战”。其实在后

世，战争的双方并不一定有机会在开阔的战场排兵布阵，来进行一场“公平”的角斗。如果有机会，占得先机的一方更愿意使用伏击的方式来解决。特别是在宋襄公坚持这种“君子”的战法，被楚人打得满地找牙之后（泓水之战，公元前638年），军事家们就更加坚定了以结果为导向的战术了。在其后不久秦、晋之间所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崤之战”（公元前627年）就验证了这一点。



干时和长勺位置图

虽然“崤之战”的地缘背景非常值得探究，并且还进入了中学课文，但它现在还不是我们的重点。不过有另一篇彪炳“中学课文”的战役会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以“曹刿论战”而闻名于世的“长勺之战”。长勺之战实际上还是齐国那场君位之争的延续，在齐国的领土战胜了鲁国人，固然能够让齐桓公（公子小白）就此稳定自己的地位，但鲁国和公子纠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威胁。相比于鲁国来说，公子纠倒不会成为重点，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在形势尚未明朗之时，鲁国人尚不能捧他上位，现在齐桓公在干时取得的胜利更是让国内那些还在犹豫的贵族们倒向了小白一方。

而鲁国人如果留下了公子纠只会惹火上身，因此在齐国的压力之下，鲁国人主动清除了这颗过气的棋子。只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当中，很多人和事件只是一个诱因罢了，或者说起的只是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对于齐桓公来说，无论公子纠死没死，他都需要以鲁国为目标，主动发起一场战争以确立齐国的大国地位。

第五节 齐桓公进攻鲁国引发长勺之战

关于“长勺之战”的发生地点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莱芜的东北部，也就是鲁国人选择了在齐国人刚刚走出山谷之后，便在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片开阔地就与鲁国人相遇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曲阜的北侧。

就这两种说法而言，我更相信前者。因为齐国的这次远征其实并不是一次突袭，鲁国人在杀掉公子纠之后就已经知道齐桓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战争的准备一早也就在进行之中了。就鲁国的实力而言，大部分人都认为无法抵御齐国，而曹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自告奋勇指挥这场战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役的地点发生在曲阜附近，那么在此之前势必会发生一些规模较小的战斗。除非鲁国人将所有的兵力都龟缩至都城，而放弃了北部的战略纵深。如果从军事的角度看，这种选择无异于自杀。即使侥幸取得了胜利，鲁国人也很难将结果转变为一场彻底的歼灭战。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齐国人在徂徕山附近构筑防线，将泰安——莱芜一线变成齐国的前沿。因此长勺之战发生的地点应该就是在莱芜盆地的东北方向。

关于干时、长勺的战场情况，大家可以借助 Google 地图详加考察。借助这两场

战役只是想说明，在春秋之初，泰沂山脉本身还是齐、鲁双方的地缘平衡线。或者说就算这两场战役本身的胜负结果发生了变化，但还是会有新的战役让双方回到这条地缘平衡线上来。如果泰沂山脉南北就是中央之国的全部，我相信齐、鲁两国的地缘博弈还会长久的进行下去。不过很快，无论是齐国还是鲁国，都会发现最大的威胁并非只是来源于对方。

就齐国来说，它的地理结构要好得多。如果齐国人愿意，他们其实是可以置身



山东地势图

于中原争霸之外的。而鲁国人的情况就要糟糕得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地处西侧的中原大国——宋国固然一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但宋国本身的地缘实力决定了它的江湖地位（尽管宋襄公不这样认为），双方更多的是在泗水两侧对那些小诸侯国展开政治上的争夺。作为商王族的后裔与周王朝最有礼数的国家，宋、鲁两国都清楚，即使抛开实力而论，灭国的危险也不会来自对方。

地处中原边缘的地理位置，使得鲁国所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中原那些诸侯，来自南方长江流域的那些蛮夷才是更让人头疼的。在这些“蛮夷”成为中原争霸的主角之后，鲁国的地缘空间变得更加狭窄了。这也直接导致后来齐国能够越过泰沂山脉，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至徂莱山——蒙山一线。而那些“蛮夷”也将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目标。

第十八章 长江流域和江东平原的地理结构

第一节 春秋时长江流域存在的不同气质的国家

终于可以把视线真正投向长江流域了，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当中，一直都是黄河和黄土地在唱主角。这并不意味着长江流域中所发生的故事就不精彩，只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是由黄土地而开始的，因此在长江流域的“蛮夷”们有机会进入中原显示他们的力量之前，史官们更多关注的仍然是那些黄河流域的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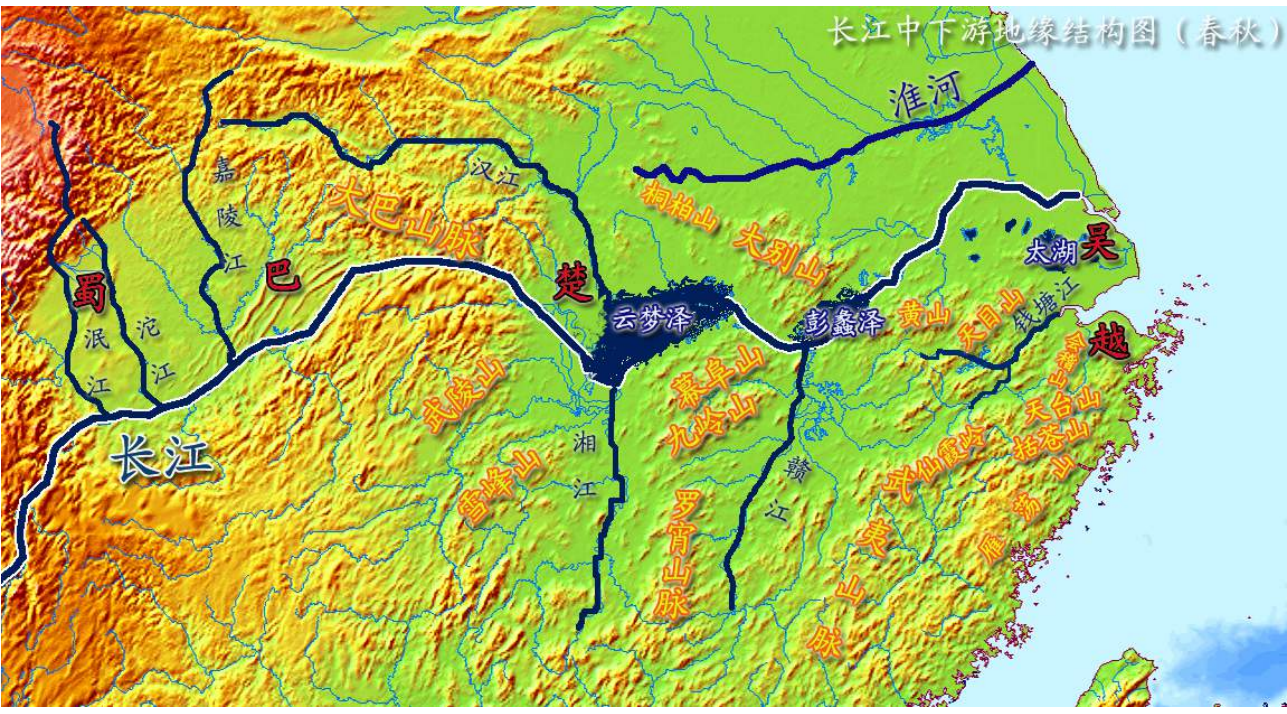
虽然随后的主角是吴越，但还是需要全景式的观察一下整个长江流域的地缘结构，特别是在之后解读长江流域的地缘博弈时，了解长江流域的地理结构是必须做的功课了。其实了解地理结构，很大程度就是从山、水着手。一方面山脉与河流（包括湖泊）是分割与“独立”地理单元的重要坐标；另一方面山、水本身对于依附于其间的族群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春秋时期是了解中国内部各地理单元的最好时期，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人口密度，决定了大部分的地理单元都能够对应相应的诸侯国（一个或数个）。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诸侯之间的博弈，来细细解构那些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所以在春秋阶段我们花的时间会比较多，在以后的历史中能够如此花费篇幅的也就只有三国时期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存在着N多小型的部落，不过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由西至东主要是蜀、巴、楚、吴、越五国。尽管在黄河流域的周人看来，一句“蛮夷”就可以概括这些南方族群，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具有的气质却是大不相同的。

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即使是在现在，这几个诸侯国所对应的省份（蜀对应四川，巴对应重庆，楚对应湖北，吴越对应江浙）也决不会被归为一类。只过不由于地缘关系的远近，有些地理单元之间的区别无法为外人所了解罢了。就比如，成都与重庆这两方水土孕育出的到底是不是同一气质的族群；江苏与浙江究竟可以归类为同一类，还是又可以被细分为几块，都可以从春秋乱世中找寻答案。就亲缘关系来说，蜀、巴、楚这三个位于长江中游的诸侯国之间的相同点还是比较多的。而与之相比，吴越的气质显然要异类得多。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张《长江中下游地缘结构图（春秋）》，我们首先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与蜀、巴、楚三国相比，吴越所在的地理单元是唯一处在长江之南的。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的认为，这就是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缘气

质迥异的主要原因。但吴越所处的江东平原能够凭借长江天险较少的承受北方的压力，的确使得它们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有自己的特点。与江东平原相比，四川盆地（巴蜀所在地）、江汉平原（楚核心地区），虽然也有山脉河流庇护，但那些位于长江以北，由北向南注入长江的支流，却让他们与北方族群的联系更加紧密，或者说承受来自北方的地缘压力也更大一些。



长江中下游地缘结构图（春秋）

第二节 长江由于河道较稳定而需湖泊来调节水量

我们说过了，就地理结构而言，山脉（丘陵）、河流（湖泊）是关注的重点。从山脉的角度来看，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还不足以让那些山脉的位置和高度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脉和古人所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人类的活动也不是不能对那些高地做出些许改变，比较典型的是将那些身披绿装的青山变成了黄色。

相比于山地的稳定性，河流湖泊的变化就要大得多了。由于最肥沃的土地都是冲积平原，因此连带平原大小、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在北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黄河下游的改道事件。这条个性十足的母亲河，每一次搬家对于它周边的平原都是一场灾难。河水在漫游的过程中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大泽（如之前说过的大野泽、大陆泽、菏泽）。在人类有能力筑坝将黄河变成一条地上河之后，华北平原的湖泊数量明显要减少许多了。也许那些喜欢湿地的环保主义者会为此扼腕，不过希望他



长江位置示意图



长江（三峡段）

们在了解了这些湖泊形成的背景之后，能够理解人类为了生存所做的这一切。

相比于黄河来说，长江的行进路线要稳定得多了。即使我们粗略的扫视一下地形图，也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江中下游的那些丘陵地带很好的固定了长江的流向。并且长江要想在南方的粘性土质中开辟新的道路，难度显然要比在华北平原那相对松散的黄土中大得多。不过，这并不代表长江就不会影响周边地区的地缘结构了。即使你不关心历史，仅从《新闻联播》中也能够得出长江流域的

水患要更为密集的结论，虽然新闻本身往往突出的是领导在第一时间做出指示的英武形象（当然，《新闻联播》我个人不大看）。

那些季节性的水患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从大的地缘背景来看，只有水系本身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才是需要重点拿出来解读的。既然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长江本身并没有什么机会发生改道事件，那么长江那超出黄河的水量就需要另外找个途径来调节它那过剩的水量了。如果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湘江下游的洞庭湖，与赣江下游的鄱阳湖，无疑是两个能够帮助长江调节水量的天然水库。这两个位列中国四大淡水湖的著名湖泊也极大的影响了湘、赣两省的地理结构。问题是在先秦时期，这两个湖泊是否就已经存在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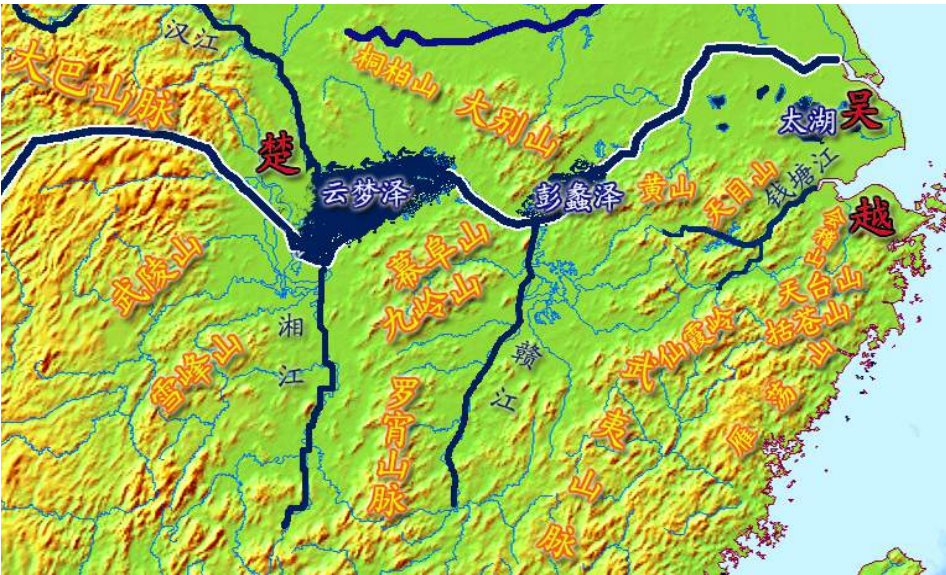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两个上古名湖——云梦泽、彭蠡泽将要进入我们的视线了。古人喜欢将这些水面宽广的大湖称之为“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的水位并不是恒定的，随着为湖泽提供水源的江河水量变化，湖面本身也会季节性的变化，在边缘地区也就形成了一片片水陆相间的沼泽地。对于这些湿地，农耕民族总是想方设法的将它的水排尽，变成良田。只不过风水轮流转，现在湿地已经成为香饽饽了。

第三节 云梦泽和彭蠡泽的位置和消失原因

关于云梦泽和彭蠡泽，今人往往不是特别清楚它们的地理结构。这也难怪，毕竟它们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太远了，不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还是不妨了解一下。一般而言，对于前者的误会是在于面积上。由于先秦的文献中经常有“楚王游（猎）于云梦”之类的记载，加之云梦泽在晋之后已经消失，因此“云梦”与“云梦泽”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这种理解的后果就是云梦泽的面积被大大夸大了。

实际上作为楚王狩猎区的“云梦”，是包括云梦泽周边的山林沼地的，否则楚王也不用带人去打猎了，直接弄几条船去打渔就行了。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云梦泽的主体是在长江以北，汉江以南。其主要是由汉江和长江交汇的三角地区汇聚而成的。也就是说现在江汉平原的主体，包括武汉在内的大部分城区，在大部分的先秦时期是一片湖泽。

对于彭蠡泽而言，经常被人搞错的并不是它的面积，而是它的位置。事实上在很多介绍鄱阳湖的资料中，彭蠡泽被当作是鄱阳湖的古称。而实际上与云梦泽一样，彭蠡泽也是位于长江以北的，换句话说，它是与现在的鄱阳湖隔江而望的。就湘江、



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缘结构图（春秋）

赣江的下游而言，在先秦时期并非没有形成一些小型的湖泊，事实上它们下游的支流在汇入干流时也时常会扩大自己的面积。只不过对于长江而言，在先秦时期还是倾向于“关照”江北的那些支流。



长江



黄河

这与当时长江以北的地质结构有关，或者说云梦、彭蠡两泽所在的位置，地势更为低陷。因此在先秦时期能够大到让人无法忽视的湖泽主要还是在江北。

如果长江真的是如很多人想象之中那样清澈的话，也许这两个古泽还能留存在现在，并且位列四大淡水湖之列。只可惜在古人看来，长江也是一条浊流（四渎中唯有济水是清流），只不过黄土高原的土质太过松软，使得平均年输沙量达到16亿吨的黄河，一个人担了浊流之名。与之相比，年输沙量达到4亿吨的长江被很多人认为是一条清水河也就情有可原了。一般而言，江河中所带的泥沙在水流趋缓时

最容易淤积。而能够让水流放慢速度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就是沿岸的湖泊，一个就是入海口。因此上述两个古泽在汇集了大量的江水之后，也不可避免的沉淀了大量的泥沙，日积月累也就逐渐变成了冲积平原。当然，这并不代表大泽会完全消失，在那些低洼之处仍然会星罗棋布的分割出一些规模较小的湖泊，而它们的周边往往就是肥沃的耕地。

对于长江而言，既然江北已经不能成为主要的泄洪区了，那么转而向江南，去支持那些支流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有了长江的鼎力相助，湘、赣两江下游的那些小湖泊得以被整合成两个大湖而留存至今。也许有人会担心，如果有一天洞庭、鄱阳两湖也淤积成平原，那么江水会不会转过头去影响江北（主要是湖北境内）的地理结构。理论上这种担心当然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人类活动对于江河湖泊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改变的速度。无论在江南和江北，围湖造田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

人类征服自然的标志性手段。

在农民看来，土地所能带来的收益要更加稳定和可靠，因此即使是在几十年前，这种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做法还被大肆宣传。所以说就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所要考虑倒不用是环境的自然调节功能，而是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的改变。其实人类对于河流湖泊结构的干预，并非源于今天。如果说大禹治水还只能归于传说，那么对于先秦时期，那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对地缘结构的改变就不会产生任何疑问了。

对于楚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在等待云梦泽的自然消亡，并为之提供更多的耕地。而对于秦人来说，显然更愿意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领地的自然属性，特别是在他们征服“蜀”国之后，不过这一节要到战国时期再写了。我们随后的重点还是会在吴、越的地缘结构之上了，相信看完这一部分后，大家会清楚，哪里是吴，哪里是越。

第四节 江东平原的概念和地理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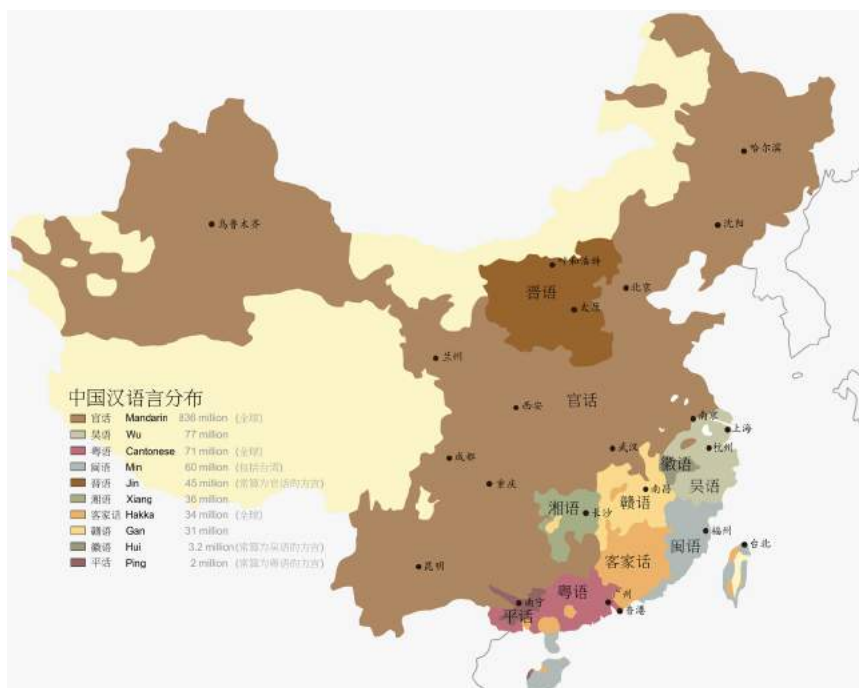
关于吴越之地，对于黄河流域的周人来说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长江的阻隔，使得吴越所在的江东地区能够较少受到北方地区政治及文化的影响。换句话说，吴越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自成系统，并依靠自身的地缘力量成就独特的地缘文化和政治体。这其中，最初也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由于这两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关系太过紧密，使得大多数人并不太清楚两者之间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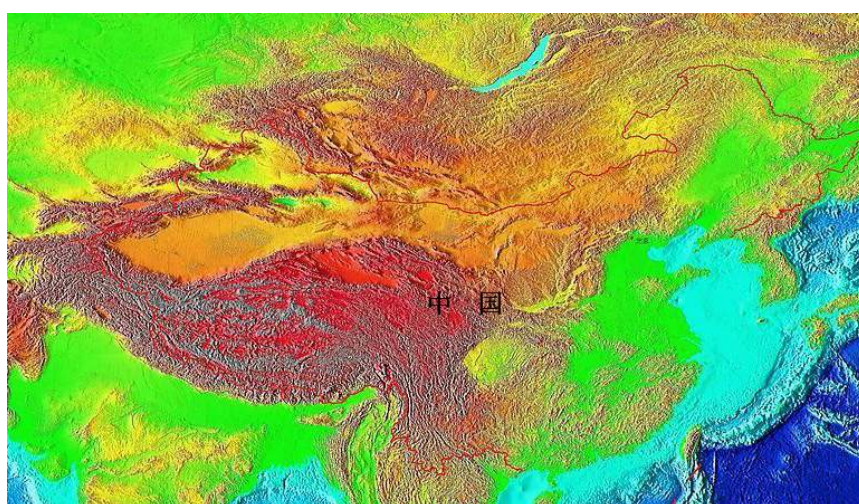
吴语分布图

事实上就结果而言，吴越之间的融合度也的确很高，而吴越之地的主要势力范围从今天吴语的分布状况也可以看出。如果从现有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浙江省的大部、江苏省的南部（主要是长江以南部分）、江西省的东北部、安徽省的东南部都是吴语的主要分布区。说到吴语，我们就必须说下中国的方言分布状况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方言都是属于汉语的分支。那些属于不同语系的语族暂时不是我们观察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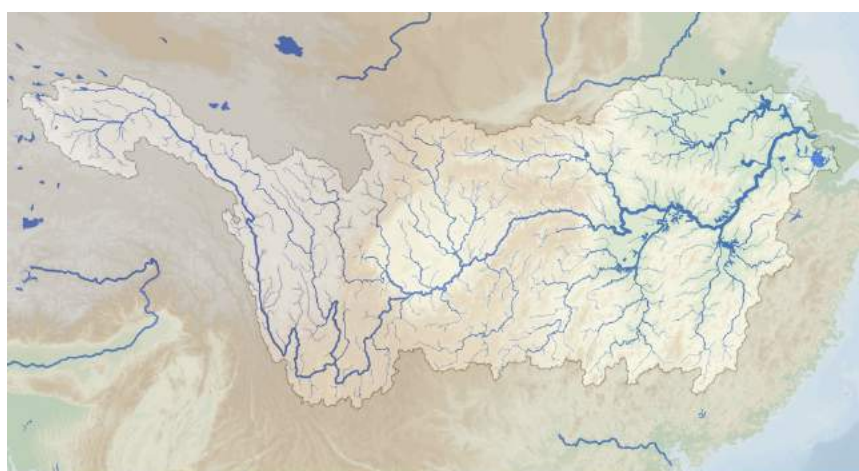
就汉语的这些独特分支来说，北方除



中国汉语语言分布图



中国地形图



长江水系图

了山西及其周边省份的部分地区的“晋语”可以独立成支以外，绝大部分的方言都分布在长江至南部沿海之间的南方地区。这与长江以南地区的地形以丘陵为主有关（长江中下游丘陵和东南沿海丘陵）。这些海拔并不算高的丘陵之所以能够分割出一个个方言区，主要源于它们的密度。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山地丘陵区，即使你能够在上层政治上将之整合为一个整体，但生活在其中的族群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仍然还是一个半独立的小社会，这一点在缺乏信息沟通渠道的古典时期尤甚。

关于方言与地缘的关系，我们在今后的内容中还会涉及到，而吴语的分布范围则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如果比照吴语的分布区与长江的位置关系，我们其实可以对“江东”这个历史概念作一个方位上的

的解读。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尽管黄河的那个“几”字形弯是那么的出名，但

实际上长江的曲折程度也并不比黄河差多少。我们甚至可以将长江的整体走向看成一个倒“几”字形，只不过这个倒“几”字形的主要弯曲处在四川盆地南部的横断山脉边缘，比之河套地区对于华夏形成的重要度自然是要差了几个等级，因此受关注度低也就情有可原了。



吴楚地缘结构图

不过长江是如此的长，河流走向发生转折的区域并不只是在西南，在长江到达九江（鄱阳湖北部）之时，它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只不过这一次是向北转折，转折的方向准确的说是东北方向。在江水沿东北方向前行数百公里之后，在南京江水又开始转向东偏南的注入了东海。如果为长江划分上中下游的话，那么九江以东的长江就是下游。而如果说以九江——南京段，南京——上海段长江为一个矩形的两条边，海岸线为另一条边，我们可以划出一个稍显圆润的矩形区域，而这个区域大致与我们所认定的吴语区相重合。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江东”，之所以被命名为江东，地理上的原因是九江——南京段长江大致呈南北走向，那么从方位上来看，江南和江东都是可能的选项。

对于吴越之人来说，早期的地缘压力是来自于长江中游，由于所关注的方向主要在西面，因此也就习惯将自己所在的区域称之为江东之地（比如三国时期）。只不过到了古典时期的后期，吴越之地通过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与华北平原政治中心的沟通愈发紧密，因此在华北平原的帝王看来，用“江南”来定位吴越之地的方位会更为准确，所以到了那位著名的十全老人兼风流天子——乾隆皇帝出巡时，出巡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的路线已经被称之为“下江南”而不是“下江东”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解读的“江东”算是广义上的江东，如果从狭义上来看，江东之地应当指的是长江——太湖——杭州湾一线的平原地区。基于土

地的平整度以及肥沃度，这些平原能够养育更多的人口，并达到更高的经济水平，是广义江东地区的核心区，也就是我们在图上所标注的“江东平原”。

解读江东平原，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三水一丘”。“三水”就是：长江——太湖——钱塘江；“一丘”就是“浙闽丘陵”。就地理范围而言，江东平原北至长江，东临东海，南止浙闽丘陵。西侧的分割线则是浙闽丘陵向北延伸至长江的那些低密度的断续丘陵，如果从现有的行政规划来看，也就是南京所辖地区以东的平原地区。从内部结构来看，江东平原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长江——钱塘江之间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平原”；另一部分则是钱塘江以南至浙闽丘陵边缘的那条东西向的沿海冲积平原，由于这条平原地带目前主要由绍兴——宁波两市所辖，因此被称作“宁绍平原”。

单从面积上来看，即使减去成陆较晚的上海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太湖平原地区在江东平原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在春秋时期，宁绍平原的大部分还都为海水所覆盖，而江东平原的地缘重点则在环太湖平原地区。关于环太湖平原的结构，以及形成原因、变迁过程，我们后面再解读。对于吴越部分的解读，会较多的结合现有的行政区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现有的行政区划与历史地缘格局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整个江东平原所倚重的地缘属性虽有所变化，但其在现代中国的地缘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比之古典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会花较多的笔墨。

第五节 太湖的独特性和其形成的原因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太湖。与长江中游的另外两处名湖相比，太湖的气质非常独特。这首先表现在它的稳定性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湖，跟 2000 多年前的位置并没有什么变化。而长江中游中位于江北的云梦泽与彭蠡泽都早已经消失了（或者说水面缩减为一些互不相连的小型湖泊），取而代之的是长江南岸的洞庭湖与鄱阳湖。

其次则表现在太湖的形状上面。与洞庭、鄱阳两湖那树状的外形不同，太湖的形状很像一个右面有所缺失的圆形，并且这个外形历经数千年都没有大的变化（洞庭、鄱阳两湖的水面形状变化就很大了）。这种地理结构的稳定性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环太湖平原的文化可以一脉相承的保存下来。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太湖，会发现太湖本身并不是与长江相连的。也就是说太湖并不是一个由长江与支流相交，所汇集而成的湖泊。这并不代表太湖的水不会注入长江，只是需要通过太湖东面的几条河流沟通长江罢了。这种间接连通长江的结构，也使得太湖能够不受长江水流的影响而独善其身。

对于太湖的形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比较传统的说法是太湖及太湖以东地区原



长江三角洲地图

来都是海洋，由于长江不停的向东南方向输送泥沙，而钱塘江则向东北方向做同样的事，这些泥沙在出海口处会形成条状的沙洲（比如长江口的崇明岛就是成陆了的沙洲），最终两条沙洲带在东海合围，并将沙洲以西的海水与海洋隔离，形成了一个咸水湖。而西面山地之上流下来的河水逐渐将海水转换成为了淡水，由于泥沙仍会在湖内淤积，因此大部分的湖面成为了平原（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剩余的水面

则成为了太湖。



太湖



太湖卫星图

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种两江输沙，天然筑坝形成陆地的情况并不鲜见。在长江以北，淮河与长江也同样有过成功的案例，向东拓展了江淮平原。只是这仍然很难解释太湖的形成原因，因为理论上太湖也应该被淤塞成平原。能够形成湖泊的地区，地势肯定是要比周边地区要低的。就太湖而言，

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形状。尽管中国有很多内陆湖，但是像太湖这样轮廓近似于圆形的湖泊并不多见。这一类的湖泊如果在山顶之上，那么是火山口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就像那些以分布在各地以天池命名的湖泊一样，只可惜太湖的所在地并不存在这种条件。

既然地球下面的岩浆不能为太湖的形成做出贡献，那么我们就需要将视线投向遥远的太空了。如果在某一个时间，从外太空恰巧有一块没有在空气中燃尽的陨石，掉在已经成陆的长江三角洲上，那么无论这块石头的形状如何，它都可以将地面砸出一个圆形的坑。随后的事情就简单了，那么发源于西、南两面丘陵之上的河流，会逐渐将之填满的。

太湖究竟是不是陨石造就的，目前还在论证之中。不过它的形成时间应该并不久远，因为在湖底已经发现了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就是说，在太湖的湖址形成之后，被河流注满水之前，吴越先民们已经在此生活了。

第六节 太湖与大海连通的河流通道

由于太湖本身不是由天然的河道扩张而成的，那么湖水在蓄满之后必然要寻找出路，最终流入大海。如果太湖的形成时间能够早些的话，那么它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类到来之前，向东冲击出几条天然的河道连通大海。只可惜对于吴越先民来说，太湖的形成时间太晚了，因此太湖泄洪通道的形成过程注定要影响人类的活动。换句话说，先民们需要通过人工干预，尽早的将太湖连通大海的河道固定下来，以减少湖水漫流对于陆地居住区的影响。



吴越地缘结构图

鉴于上古时期，石制工具是人类可以使用的主要工具，因此疏通太湖河道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在《吴越地缘结构图》上为太湖划出了三条主要的入海通道，由北至南分别是娄江、松江

（苏州河）、东江，这三条江都是在人工疏导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并不是说吴越先民们就此挖了三条运河，而是说他们在湖水漫流之时，就势加深加宽了河道，使之能够更快速的起到泄洪的作用。

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太湖中的水并不是流入长江，而是直接流入大海的。关于太湖有哪些河流帮助它，历史上一直有“三江”之说，至于这“三江”究竟是哪三江则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条在无数描述上海的电影中出现的苏州河，是将太湖水引入东海的主要河流。就苏州河而言，最早它的名字本来是叫松江的（现在上海还有松江区，以前是松江府），也被叫作吴淞江。在西方殖民者

到上海开阜之后，这条古老的河流成为新兴的上海与太湖东岸的苏州进行物流的主要途径。由于可以帮助那些老大帝国的子民们上溯到苏州，因此苏州河成为了它的新名字。



太湖——长江地理关系图



上海苏州河（吴淞江）

即使是在现在，苏州河的河水也不是直接注入长江的，在上海的外滩它首先流入黄浦江，然后黄浦江水再注入长江。从这个角度看，苏州河已经成为了黄浦江的支流了。尽管现在黄浦江的名气要比苏州河大得多，也要宽得多，但在春秋时期，它最多不过是一条浅浅的小河沟。由于当时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未成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段将上海分割成浦东、浦西，并看尽上海滩百年风云的黄浦江下游河道，在春秋之时其实并不存在。

至于它的上游河道则是在楚人吞并越国（战国时期）之后人工疏通入海的。主导这项工程的是战国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当时这片吴越故地是被楚王封建给这位真名叫黄歇的楚国贵族，因此黄浦江最早是被称之为“黄歇浦”，后来为了顺应以江河为后缀的潮流，更名为黄浦江。

第七节 钱塘江入海口的特点与越人在宁绍平原的立国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吴国建都的地方是在苏州一带。它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在《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中所标示的苏锡常平原。之所以以“苏锡常”命名这片平原，是因为这一地区目前主要为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目前也是江苏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亦是长三角经济带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地处吴地的核心，直到现在，居于其上的原住民仍然以最为纯粹的吴人自居，所操持的吴语也被认为是保有其地缘文化的重要标志。

如果要为苏锡常平原划定一个范围的话，那么太湖以北直至长江；以东直至东海（春秋时期）的平原地带都属于这个地理单元的范畴。而太湖以南与钱塘江之间的平原，则为浙江北部的杭州、湖州、嘉兴三市所辖，因此也被命名为“杭嘉湖平原”。目前苏、浙两省的边界线可以被视为两大平原的分割线（太湖本身属于江苏）。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我们之前说过，江东平原的地理特点是“三水一丘”，下面三水中最南边的钱塘江就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说起钱塘江来，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这条发源于浙闽丘陵中的江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它的江口。尽管很多江河的入海口都呈喇叭状，但像钱塘江这样既大又折的入海口，除了长江以外无人能及。

只不过钱塘江本身的体量要比长江小得多，河道也要窄浅得多。喇叭口式的入海口中又缺少崇明岛那样的缓冲地，因此在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



钱塘江潮

至十八日，海潮最为汹涌的时候，当喇叭口内的海水发力向西面的江口涌入时，壮观的钱塘潮也就出现了。

对钱塘潮感兴趣的人，可以到时候去看一下，需要提醒的是，在强大的海潮面前，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每年基本上都能听到因为观潮而被潮水卷走的新闻，所以去之前买份保险还是有必要的（开个玩笑）。尽管钱塘潮是那么的知名，但其实对于地缘文化有重要影响的还是钱塘江本身。这条体量不大，流域和影响力基本只在浙江省北部的河流，

还有一个名字叫作“之江”，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取其形，因为它的走向（特别是下游河段）曲折。正因为河道曲折，所以“折江”与“浙江”也是钱塘江的别名。也许“浙江”才真的应该算是这条河流的正名，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所在省份的名称。

钱塘江的那个喇叭口（现在的地理标签为“杭州湾”）成为了一条天然的分割线，在它的南面直至浙闽丘陵，有一条依山临水的平原带。由于这片平原西有绍兴，东有宁波，因此被称作“宁绍平原”。而西面的绍兴就是春秋时越国国都所在的核心区，由于绍兴后面的山脉叫作“会稽山”，因此在越国建都之时的名称为“会稽”。根据历史传说，会稽山也是当年大禹大会诸侯的所在地。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让大禹千里迢迢从中原南下，越过长江至此会盟诸侯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他真的想就此号令东方的部族，选择在江淮平原上会更为合适。毕竟让各部落都越过长江、钱塘江，再爬到山上去不太现实。

关于大禹当初到底有没有在会稽山上会盟诸侯，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毕竟很难寻找相关的证据。鉴于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治水第一人的名气，因此把治理太湖的功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劳也被记到了他的头上，这就好像后人们，总喜欢把一些发明创造记在鲁班身上一样。将大禹与太湖乃至整个江东平原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为吴越之族寻找到一个华夏之根。这在边缘地区或边缘民族融入华夏核心圈的时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无论大禹是

否真的有空在治理完黄河水患的同时，又跑到太湖去治水，吴越先民通过太湖水道的治理，掌握了很高的治水技巧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可以依靠人力改变地理结构的能力，在吴国决定越过长江，进入江淮平原，并北上黄河流域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越人从浙闽丘陵下来，在会稽附近立国是无可置疑的。就越人的原始属性来说，与平原湖沼地带的吴人其实是迥然不同的。东南沿海的那些丘陵地带是他们生活的主要范围。这条从浙江中部向南经福建、广东，一直延伸至广西东部的丘陵地带，是古越人的兴旺之地（整体可称之为“东南沿海丘陵”，北部为浙闽丘陵，南部为两广丘陵）。即使是在现在，越人在这一地区仍然留下了不少文化烙印，如发源于浙江的越剧；又如广东省的简称“粤”（越、粤同义，从这个角度看，“越南”的得名也算名副其实了）。

对于越人来说，并不愿意只满足在沿海丘陵中生存。从迁移的角度看，越人最初是从中南半岛沿海岸线向北逐次渗透的。在经历过漫长的迁移变迁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与原始的华夏文化发生碰撞了。在杭州湾南部的海水开始消退后，越人终于有机会走出山地，在浙闽丘陵的北缘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并以此为据点绕过杭州湾，向更为广阔的太湖平原挺进，首先进入他们视线的就是杭嘉湖平原。而此时，松江（苏州河）以北的吴人，也正在向南渗透，双方的地缘博弈再所难免。

第八节 吴国和越国在江东平原的地缘分割线

前面已经说过了，上海人民的母亲河——黄浦江也是人工疏导的河流，只不过

这一次主持工程的是楚人。其实长江三角洲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几千年来一直都是由人力在维护的，无形当中也加深了这一地区的地缘凝聚力。这和黄河下游的情况有些类似，都是治水文明的体现。对于平原地区来说，水患总是会频繁些的。

就“黄浦江”这个名字而言，很多时候容易与“黄埔军校”联系起来。其实两者并无关系，后者是建在广州珠江中的一个岛上，那个小岛名叫“长洲岛”，也叫“黄埔洲”。所以此“黄浦”非彼“黄埔”。不过搞错也属正常，谁叫我们所

解的历史以1927年以后为主呢，那个时候上海的政治风头已经盖过了广州，两个名字又那么接近，认定黄浦江与黄埔军校有关联也属正常。

也许有人问杭州湾会不会消亡。我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不过纵观历史，杭州湾也好，长江口也好，位置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就长江口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的位置是在镇江以东，常州以北，泰州以南的位置。在那个时候，长江口还是在偏北方向入



吴楚地缘关系图

海，这也使得长江带来的那些泥沙开始向北沉积。当江口北部的泥沙越积越多时，水流的方向开始逐渐南移。而泥水也就向南面沉积，如此周而复始，所以我们会看到长江下游的那些河道是呈波浪形前进的。就吴越相争所处的春秋中晚期而言，长江南岸的苏锡常平原已经基本形成，而现在的上海则大部分在海岸线以东尚未成陆。如果按照现有的地名为这条古海岸线划定几个坐标的话，那么由北至南的张家港（江苏）——嘉定（上海）——闵行（上海）——奉贤（上海）大致就处在海陆交接线上。

吴国的核心区之所以在苏锡常地区（特别是苏州——无锡一线），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结构已经稳定了。而在苏州以南，三江（娄江、松江、东江）

本身的状况并不是十分稳定。在洪水到来之际，三江所过之处受到洪涝灾害的概率要大得多。于是这片三角形的区域也就成为了古苏锡常平原与太湖南面的“杭嘉湖平原”之间的缓冲区，或者说是将两者分割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地理单元。

由于越人也在向北渗透，因此太湖东南侧的嘉兴地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至于说吴越两国的国界线，其实更多的是象征意义的，并不能够成为地缘文化的分割线。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尽管环太湖平原被分割成了两块，即苏锡常平原被划入了江苏，杭嘉湖平原被划入了浙江。但这两大平原的地缘文化其实是共通的（特别是完全属于平原文化的嘉兴），或者说更偏向于吴文化。当然，现在“吴文化”这个概念，很多时候已经包含了整个吴越在内。不过如果要细分的话，杭州湾本身还是可以做个分割线的。或者说嘉兴——湖州一带与苏南的地缘文化接近度，要高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

做以上分析并非是在强化地域区别，主要是说明地理结构对地缘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平时，我们所习惯的以行政划分来认定各自所属地缘文化的方法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主要语言分布图》，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苏锡常平原与长江之间，还有一个区域并未包含在吴语区。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就是在南京——镇江一线。这一区域目前被语言学家定义为江淮官话区。所谓的江淮官话，其实也就是北方汉语与吴语的混合体。或者说是带有一些吴语发音特点的普通话。这一类型的语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一带主要是吴越先民向长江以北地区的主要渗透区。



中国主要方言（汉语分布）图



江淮官话分布示意图

历史上吴越先民曾经广泛分布于上述区域。而在春秋之时，吴越两国越过长江

准备进入中原争霸的时候，所主要占据的地区也基本就是江淮官话主要分布的地区。江淮地区在后世的历史中，也成为了退守江东的偏安王朝的缓冲之地。这种悲剧性的地缘定位，使得江淮地区在文化构成上成为了中原文化与吴文化的混合体。也使得江淮地很难成为一个有独立性的地理单元。

问题在于南京——镇江一线位于长江南岸，由于有长江的阻隔，应该保留有比较纯粹的吴文化，为什么也被列入了江淮文化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一则是因为它们属于江南防线的第一线，当中原政权退守过来时，势必需要将主要军政人员布置在这一线，以抵挡北方民族的南侵；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南京——镇江一线的地形与东面的平原地区略有不同，有一些丘陵分布其上，这也增强了它们防御能力。



南京和镇江位置图

而南京更是凭借这一点，成为了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被很多短命王朝所看中，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在江东地区另一个有资格入选古都的城市是杭州，也同样是因为依山傍水的地形而被南宋王朝选中作为南迁后的都城。只不过杭州地处吴越之地的腹地，因此在文化上并未发生大的改动。

第十九章 伍子胥入吴并对吴国产生的影响

第一节 吴国称霸过程中面临的地缘压力

由于在江东地区，吴国率先开始了争霸的历程。因此我们站在吴国的角度来看，在它的争霸过程中，会面临来自哪几方面的地缘压力。或者说吴人需要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谁。对于兴盛于江东平原核心地区（太湖平原）的吴国来说，它所受到的地缘压力要较那些中原诸侯少得多。首先对于沿海的诸侯国来说，东面的海洋是暂时可以忽略的。其实在东面那个岛国开始窥伺大陆之前，历代王朝基本都只会考虑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

就春秋时期而言，能够得海防之利的并不仅仅是吴国，北方的齐国也是海洋的受益者。而这两个“海洋大国”之间的距离虽然并不算短，但由于二者之间并没有重量级的大国隔开，因此在齐、吴两国都希望成就霸业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这一次并不像后世所经常看到的那样——北风压倒南风，主动发起进攻的是吴国（包括后来的越国）。至于其中的地缘背景，我们后面会分析到。

如果说北方的齐国由于距离的问题，暂时还难以与吴国发生冲突，那么南面的越国和西面的楚国就需要吴人随时提高警惕了。对于吴国来说，如果越人能够老老实实呆在浙闽丘陵之中，或者仅仅满足于杭州湾南面的那一小条平原地带的话（也就是后来的宁绍平原），吴国人并不会介意这个来自山上的朋友呆在自己的后院。事实上吴王夫差在战胜越王勾践之后，所做的地缘上的变动就是让越国人退回到钱塘江以南。当然，这种轻敌的做法让吴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由于杭州湾的存在，如果双方愿意的话，的确可以相安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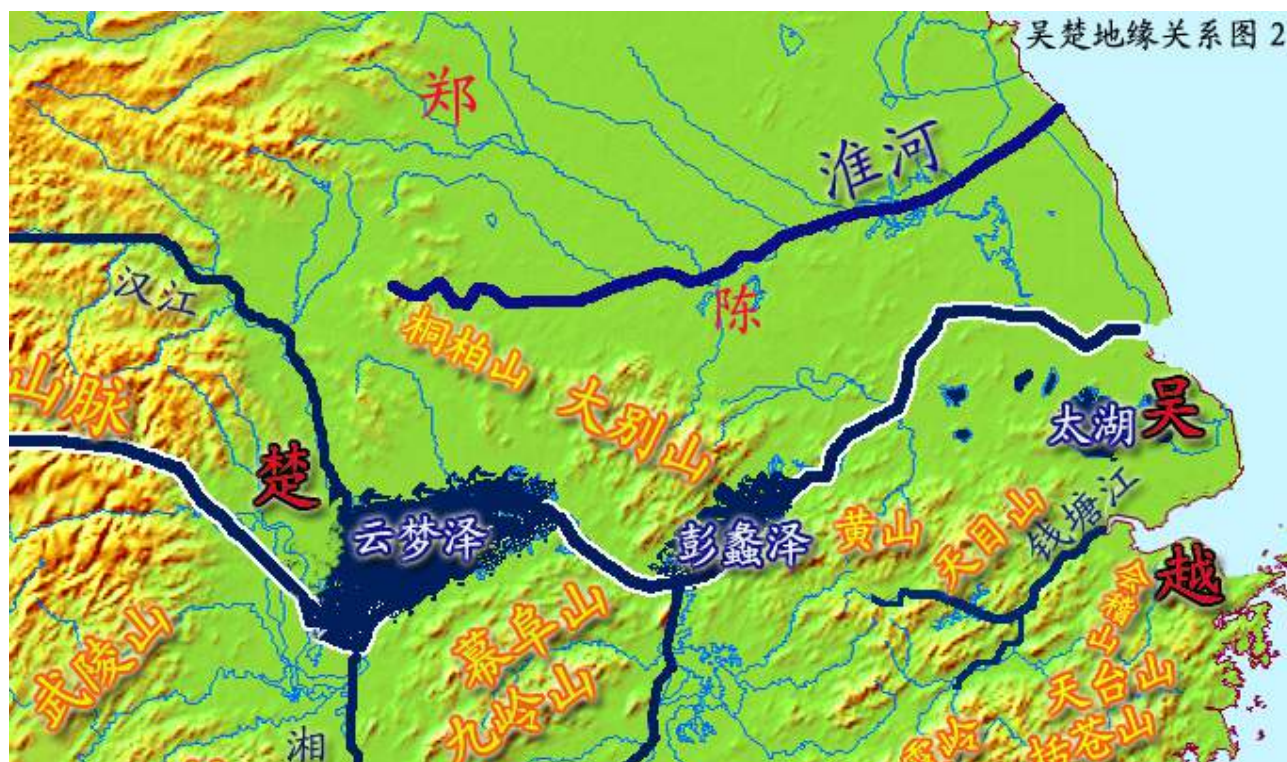
对于吴王夫差来说，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因为即使是放在现在，宁绍平原所能提供的耕地也远比太湖平原小得多。更何况在春秋时期，宁绍平原的海岸线要比现在向南深入更多。因此吴国人有理由相信，越国人已经失去了战争潜力。在那个灭国不灭祀的年代，让勾践在会稽山下保留百里的土地祭祀祖先算得上是常规处理。更何况越人已经让人相信，他们所祭祀的祖先就是大禹，在华夏族已经确立了正统地位的年代，让开创了夏朝的大禹绝祀是要冒很大道义风险的。

关于吴越之间的博弈，还会有更详细的解读。对于吴人来说，越人是一个对手，但还算不上是最大的对手，他们真正的对手是来自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楚人。在吴国开始有实力登上春秋政治舞台，并成为主角的时候，楚人已经成功的跳出江汉

平原，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张。在北面，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已经被楚人消灭得差不多了。即使是没有灭国的（如随国），也可以算是楚人的附庸了。在控制了南阳盆地之后，楚人已经开始穿过方城夏道，北进中原核心地区，直接参与中原争霸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在国家之间的地缘博弈中也有一条类似的定律，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前面，总会有一个倒霉蛋无奈的倒下”。在楚国北出南阳盆地之后，这个倒霉蛋是谁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个曾经在春秋初期红极一时的郑国注定要成为楚人争霸中原的牺牲品。不过在楚人的中原争霸过程中，包括郑国在内的所谓“中原大国”已经退居二线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是真正的手。真正的手是那些同样来自边缘地区的北方大国。基于楚人的北上路线，这个对手经常是与楚国处在同一经度的晋国。

能够进入中原核心地区并成就一番霸业，当然是每一个诸侯国的梦想。不过，对于身处长江中游的楚人来说，并不会甘于像那些嫡系出身的诸侯国一样，只是做一个“奉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楚人所希望做到的是，与周王室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一是基于周人的排斥；对于以“华夏”自居的周人来说，无论楚人再怎么努力，“蛮夷”的身份也无法改变。因此楚人早早的将周王室所施舍的那个专门赐给边缘民族的“子”爵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吴楚地缘关系图

如果楚人像秦始皇那样在思路中具有创造性的话，也许他们可以先想到将三皇五帝的尊号集于一身。只是在有实力横扫六合，并吞八荒之前，自封为王已经够让

那些姬姓诸侯们震惊了。既然楚人已经决定独自挑战整个周王朝，那么仅凭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地缘潜力，并不足以支持他们向周王室询问鼎的大小。对于这一点，楚人自己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越过方城夏道向北扩张的同时，如何能够一统长江流域的各诸侯国，最终与黄河流域诸国形成对峙状态才是务实的想法。

就楚国的位置来说，向西进攻巴国，进而控制整个四川盆地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只是要想从陆地上越过四川盆地边缘上的那些山地，比登天还难（不是我说的，是李白说的）；既然陆地上困难重重，那么顺着长江沿江而上则是另一个选择。在后世，四川盆地也正是通过长江水路与中下游地区进行沟通交流。问题是，对于楚人来说，要想逆流而上，进入四川盆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得选择了，楚人也许会倾力一试（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但如果有更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绝大部分人都会愿意做相对容易的事。

除去北方和西方，楚人还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首先就是向南越过长江，进入湘江流域。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地理的阻隔，湘江地区只能是楚人的后花园。楚人在湖南境内并没有碰到真正的挑战。相比于湘江流域，江淮地区对于楚人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一方面由于整个淮河两岸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大国。楚人在东出信阳通道之后，可以很容易的向东在淮河流域拓展自己的空间（特别是江淮流域）。只是江淮之间没有大国，并不代表整个长江一线都没有大国。当楚人向东扩张到长江那段标志性北向航道时，他们开始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那里，有一个同样自封为“王”的蛮夷国家在等待着楚人的到来。这个国家是谁，我不说大家也清楚，它就是这几天一直在分析的“吴”。

对于同处长江中下游，又同样拥有独立战略纵深的吴、楚两国来说，发生地缘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解读清楚双方之间的博弈，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他就是那个出身在楚国，服务于吴国的春秋名人——伍子胥。关于伍子胥传奇的一生，以及他对吴、楚两国的影响，我们后面再接着分析。

第二节 楚国封堵伍子胥入吴的地点

关于伍子胥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对于这个父兄都被楚王诛杀的楚人来说，他一生最大的建树都是在吴国完成的。而整个吴国的兴衰轨迹也与他的到来与“离去”息息相关。由于伍子胥在助吴攻楚之后，曾经做过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就是将杀他父兄的楚平王挖出来鞭尸，因此对于伍子胥的评价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些争议。不过伍子胥这种快意恩仇的行为是否合适，并不是我们现在讨

论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他到了吴国之后，是如何让太湖平原成为中央之国地缘结构中重要一环的。

在了解伍子胥如何为吴国谋划地缘战略之前，我们先要解读一下他入吴之前的逃亡路线。对于很多不太关心历史的人来说，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甚至是他们对于这个著名历史人物唯一的印象。不过大多数人的关注点在于伍子胥在过昭关之前，有没有真的一夜白了头，或者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演义的成分在里面。却很少有人关心，昭关究竟在哪里，亦或伍子胥为什么一定要走昭关才能入吴。

鉴于楚国在长江的中游，而吴国在长江的下游，理论上伍子胥的逃亡路线应该是顺江而下，由西向东直入吴境的。不过如果再仔细研读一下历史会知道，伍子胥最开始选择的避难国并不是吴国，而是位于中原的宋、郑两国（中间还去晋国转了一圈），之后才从郑国南下吴国。如果这样看，伍子胥的入吴路线是不可能顺着长江而下了。他需要先穿越淮河，再越过长江方能进入吴境。鉴于由新郑南下到达江东的路线，所要穿越的基本都是平原地带。似乎不大可能有类似崤函通道这样的单一路线，让楚人设卡。也就是说，伍子胥应该会有很多路线入吴，并不需要为过不了昭关而急得白了头。

让我们站在楚人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如何封堵伍子胥的逃亡路线。既然在长江、黄河之间那片广阔的平原地带，无法凭借险要的山势来控制南下的路线，那么伍子胥是否真得可以像水银泄地一样，让人无迹可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要知道，对地理结构影响最大的地理形态，除了山脉以外，还有河流（包括湖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河流的每一处河岸都有可能成为码头的备选地，但实际上，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水流的速度，水面的宽度，堤岸的地质条件）真正适合建立渡口的地方还是可控的。也就是说，楚人可以通过控制东西向河流上面的渡口，来封堵伍子胥的南下路线。

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已经分析过了，对于春秋之时的中央之国来说，一共有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也就是所谓江、河、淮、济四渎。鉴于郑国位于河、济二水的南端，因此在河、济的主要渡口上设卡并不会成为选项。其实就算伍子胥从河北平原出发，楚人也不可能在河、济之上展开他们的追捕行动，因为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央之国之前，还没有哪个诸侯能够完全控制河、济两水所流经的区域。而来自长江流域之地的楚人当然更没有这种能力了。

去除掉河、济两水，摆在楚人面前的就只有淮河和长江了。对于控制江淮地区，楚人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即江淮之间没有有实力的大国；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楚国的地理位置。如果楚人希望东进的话，他们

的船队除了可以进入长江，顺江而下直指江东以外，还可以越过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信阳通道，控制淮河的上游。然后借助淮河的水流，楚人亦可以快速的将军队和补给运送到淮河两岸，并最终一统江淮平原。



吴楚地缘关系图

不过在春秋之时，楚国的东进大业还未能完成。在与吴国展开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楚人虽然已经将防线推进到江东平原的西部，基本上与吴国隔江而望，但由于吴国的存在，长江以北地区（江东平原的北部，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北部）还未划入楚国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使得楚人如果希望控制整个淮河之上的所有渡口成为了不可能。实际上，江淮平原东部的不可控，让楚人在江北设卡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因此如果伍子胥希望逃入吴国的话，理论上他应当可以先东行，在泰沂山脉的南部转向，沿泗水南下，穿越淮河，进而渡过长江到达吴国。伍子胥如果选择这条路线的话，完全可以绕过楚国的势力范围，更不必牺牲自己的满头乌发。

不过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又或是伍子胥真的不了解这条路线能够让他逃过楚人的追捕吗？问题的答案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所分析的所有环节中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就是长江的最后一段江面在春秋之时没有渡口！也就是说，如果伍子胥希望直接从长江的北岸渡江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我们期待已久的昭关即将浮出水面了。紧接的出场的还有两个古渡口——渔邱渡和乌江渡。

第三节 伍子胥过昭关后再经渔邱渡横渡长江进入吴国

通过观察现在长江下游的结构我们知道，长江越到出海口，江面越宽。也就是说长江的最后一段水道基本是呈现喇叭状的。由于江水遇到海水之后水流变缓，因此泥沙便会沉积下来变成沙洲，然后慢慢的与一侧陆地相连，将整个海岸线向东扩张，在老的喇叭口变窄，成为正常的河道之后，新的喇叭口又在东面形成了（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长江口与崇明岛的地理关系）。

由于受技术条件限制，古人需要选择江面较窄，水流较缓的地方作为渡口的所在。像长江出海口附近那么宽的江面和壶口那样湍急的水流，希望横渡水面都是非常困难的。现在长江的江面也要到南通附近才开始明显走宽，而春秋之时，长江在



长江北岸成陆时间示意图



长江江面（南京段）

流到南京之前就已经开始变宽了。也就是说长江在开始折向东行时，江面已经变得宽阔无比了。并且由于古人对于水资源的利用，远没有达到今人这样掠夺的程度，因此古时候的江面要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还要宽阔。即使是在现在，乘坐机械动力的渡轮从上海市区到达崇明岛也要一个小时。古人依靠人力渡过比这还要宽的江面需要多久，就可想而知了。

就长江的下游而言，南京是一个分界线，长江过了南京之

后，开始正式拐向东流。而在此之前一直到江西九江的江面（也就是鄱阳湖的背面），可以看作是南北向的。一直到三国时期，孙策渡江仍然是选择从这段江面横渡长江，进入太湖地区。在那时，镇江一线的江面宽度仍有 40 里，这里并非不能渡江，只是远不及南京以上的江面容易过。因此在唐朝以前，如果希望进入长三角的话，方向上的选择 90 % 仍然是由西至东的。既然选择了东西横渡长江，那么江东的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



吴楚地缘关系图

我们先来看看伍子胥最终是从哪里渡江的。这一点倒是有明确记载的，是从一个叫做“渔邱渡”的地方渡江的。这个渡口现在隶属于安徽和县，古时候的名字叫作“历阳”，它的对面就是著名的长江三矶之首的采石矶。因为是进入江东地区的重要入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的孙策就是从历阳的横江浦渡江的。

对于古人来说，长江的水流之急仍然是一个障碍，因此他们往往选择在长江的某一条支流的入江口作为渡口。也就是说先在支流上面上船，然后转向长江。这与现在长江上的那些能够接收海轮的港口的功能是一致的。这样看来，如果要封锁渡口的话，可能要封锁一段江面，或者在江口这处设置一道水上封锁线，盘查过往的船只。这种做法当然还是可行的，不过楚人有一个更为简便的方法，那就是切断通往渡口的道路。

如果长江西岸是一片平原地带，要想封锁道路是非常困难的。但在这一段南北状的江面两侧却存在一些密度不算大的丘陵，从形态和走势上来看，算是安徽、浙

江境内的江南、浙闽丘陵的余脉。长江以西的由于位于江淮之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淮丘陵”，主要分布在安徽省的中部；长江以东的则可以称之为“江东丘陵”，江苏的镇江、南京，安徽的马鞍山是这一丘陵地带的三个重要城市，他们所对应的西陵渡（京口）、燕子矶、采石矶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地标。实际上，如果是在缺水的西北，这些稀疏的丘陵本身的防御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不过如果辅以江河湖泊的水力之功，再加上坚固的城墙，那么所建成的立体防御系统效力就非比寻常了，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南京城。



昭关位置示意图



安徽含山县昭关镇的丘陵地貌

在春秋时期的江淮丘陵，水同样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渔邱渡（和县）的西面就是江淮丘陵的分布区，昭关也就位于此（含山县北）。如果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即使守住了昭关也决无可能封锁住渡

口的道路。不过在春秋之时，这些丘陵的附近却是一片湖泽之地。这些漫流在丘陵之间的江湖之水，事实上成为了长江西岸的一个隔离带。而昭关所处的位置，在春秋之时是当时唯一通往江边渡口的道路。只不过后来由于自然的作用，以及人类不停的将湿地湖泊中的水排干，以获取耕地的行为，使得通往江岸的道路变得多了起来，昭关也就失去了它的防御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昭关所在地的政府一定要感谢伍子胥，否则是没有多少人会知晓这个地方的。

第四节 吴国将楚国列为率先需要解决对象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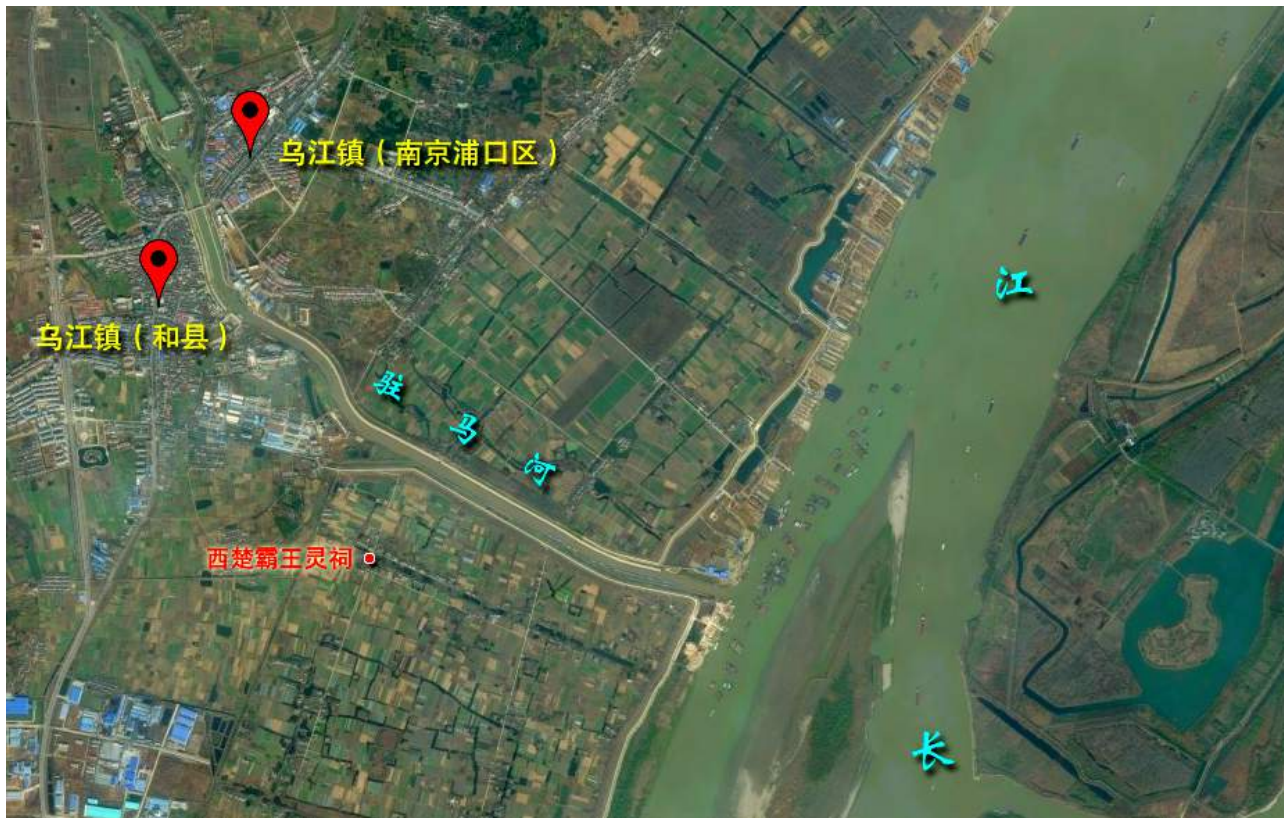
了解完伍子胥的入吴路线后，我们应当清楚了，为什么吴国与其西面的楚国的地缘冲突，要远大于北面的齐国。因为无论是吴，还是后来的越，如果想越过长江，向北方的江淮平原渗透的话，就必须先西向进入江淮丘陵地带。而这时已经是春秋末年了，强大的楚国早以越过大别山向东扩张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如果不能战胜这个对手，就不仅仅是能不能向外扩张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生存问题了。

事实上在伍子胥入吴，并帮助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具体可参看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专诸”的事迹）谋划攻楚大计之前，吴楚双方就已经在长江之上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场水战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最早的水战。结果是楚国凭借上游之势取得了胜利，并成功的突入了江东，占领长江东岸的芜湖地区。对于吴国来说，如果没有楚人的压力，他们最先应该解决的应该是来自后方的越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楚国成为了最先解决的对象。当然，吴国之所以制定了先楚，后越，再齐的战略攻击方向，伍子胥的个人恩怨应该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诚然这种“攘外不先安内”做法是有点冒险的，不过吴国最终还是差一点成功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伍子胥在战术的运用上的成功。如果就此认为伍子胥只是运气好，或者是仅仅是个冒险家那就错了。之所以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笔墨，是因为他的经历能够带给我们所需要的地缘信息，伍子胥的入吴路线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之所以现在吴地的民众仍然还在纪念这位春秋名臣，是因为他对于太湖流域的地理结构作出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影响甚至流传至今。这也是我们下一节分析的方向。

最后说一下“乌江”的情况。如果说春秋之时，伍子胥所能够选择的最北边的渡口是渔丘渡的话，那么到了300年后的楚汉相争时期，方便横渡的江面已经北移了数十公里了。当时这里有一条叫作乌江的小河连着长江，项羽当时率领八千江东子弟就是从这里跨出江东的土地，颠覆大秦王朝的。由于在秦朝时，这里已经可

以渡江，因此秦人在此建立了乌江亭以为驿站。当项羽在垓下败给刘邦之后，他实际上是在循着原来的出征路线回到了长江边。只不过因为到达江边时，身边已无一兵一卒。八千江东子弟出来打天下，如今只剩下一人，如果项羽还有颜面回到江东，那么他也就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了。



乌江镇位置图

由于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舡船待”的记载，因此很多后世之人，想当然的认为项羽要渡的是一条叫作乌江的河流。如果再模糊一点的话，甚至会与贵州那条由于被红军横渡过而名声大噪的乌江混为一谈。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乌江¹，就是乌江亭。当然，根据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长江渡口的设置情况，渡船所在地也的确很有可能是在乌江边上。但那位亭长当时要项羽渡的绝对不是乌江，而是长江。

第五节 伍子胥帮助吴国营建都城以及开挖胥溪和胥浦

¹ 乌江渡的位置处在安徽——江苏边境的长江西岸，为安徽省和县乌江镇所辖。不过名人现在人人想要，因此在它的旁边，南京市建了个乌江镇（原名林山乡），并且用项羽一条路作为招牌。如果希望去追思项羽的朋友切记不要搞错了。

伍子胥入吴之后，并不仅仅是在口头上为吴王规划出攻楚、灭越、伐齐的大计，而是实实在在的为吴国的基础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之一便是为吴国营造都城。

关于吴都的位置，传统的说法就是在现在的苏州，而苏州也一直以吴文化的中心而自居。不过近年来在无锡和常州交界处也发现了一座春秋大城的遗址。因此苏州的这两个兄弟之城，也希望考证出吴都其实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其实这种争论无论结果如何，苏锡常平原作为吴国的核心区是可以肯定的。其实筑城一直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只不过吴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后世所谓“南舟北马”的概念，很大程度就是自吴人而起的。因此吴都在建筑时除了一般的“陆门”以外，还有“水门”。而这些水门在后来吴国的征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伍子胥对于吴都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伍子胥建城也有诸多传说。最经典的是他当时已经预感到吴国日后会有难，所以用糯米饭作了很多砖，作为一个城门的基础，日后果然救了一城百姓。这个传说和另一类很经典的传说很相似，即民间一说某处城堡坚固，就说是当年建筑时，用了鸡蛋、糯米、红糖的混合物作粘合剂。这些传说是否有理论依据，学建筑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个建议。不过我很怀疑这些无论对人还是动物都很有诱惑力的有机物，是否真的能够作为建筑材料。实际上应当是几千年来，饱受饥荒的中国农民的一种幻想（这已经是当时的穷人，所能想到的最滋补的营养品了，只有坐月子的产妇才有可能享受到的高级食品）。就像饿极了的人，看到什么都能想到食物一样。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把一种白色的粘土当成是观音娘娘赐给的食物而吃下肚子。

关于中国人筑城，究竟使用了何种建筑材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吴都的水门却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并不能认为，这些水门只是让城内的水道与护城河连为一体。如果真的这样做，并不会有多少实际意义。最多是让吴王在希望绕城巡视时可以坐船而不是马车罢了。事实上这些城内的水道是需要同外部的江河相连的。我们之前说过，由于太湖本身形成的时间较晚，因此它用于泄洪的河道多有人工修葺的痕迹。对于吴人来说，将太湖之水从河道导引入海，以减轻耕地的水患；或者将城内水道与河网相连，以为都城运送物资并不需要多少创造力。环境早以使得他们掌握相关的水利工程经验。

不过伍子胥的到来，还是为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赋予了新的意义。既然吴人的优势是在水上，那么他们就需要将这种优势延伸到战场上去，或者说要让舟船获得与马车同等的技术优势。只不过与马车能够自由驰骋在陆地上不同，舟船的行动必须有水道支撑。这种区别有点类似于汽车与火车的区别。前者的优势在于调控自由；

而后者的优势在于，一旦轨道布局合理，它的运量以及性价比会大大超过前者。

对于伍子胥来说，既然他已经将楚、越两国定为最先要征服的对象，那么在通往这两个国家控制区的水路就势必要打通了。在太湖形成的过程中，太湖周边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很多的河流，而伍子胥所要做的就是，用人工开凿的方法，将一些同一方向排列，相互距离又不太远的河流连接起来，以通往楚、越两国的控制区。

如果从水的角度来看，吴人的核心在太湖，楚人的核心在长江（中游），而越人的核心而是钱塘江了。因此吴人最先需要作的是将吴都的各个水门与太湖连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由于吴都就在太湖边上，工程量实际是很小的。下一步就是要将太湖与长江、钱塘江连接起来了。如果从理论上来看，通过那条东西向的松江（苏州河）先航入东海，再由东海北上进入长江口，或者南向进入杭州湾（钱塘江出海口）是一条可行这道路。不过这种绕大圈的航线只能是做战术路线而备用，是不可能常规使用的。

绕海入江的战术固然是很难做到的，而最为简单的路线，就是在太湖与楚国、越国之间拉条直线（大体上的）。由于楚人已经逼近了江东，因此伍子胥首先要做的是，将太湖与长江连通。这样在与楚人的对抗中，吴人可以通过水道将都城内的兵员和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长江前线。因此在太湖的西北方向，伍子胥主持挖通了一条运河，直通长江边上的芜湖。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吴人在伍子胥到来之前曾经攻入芜湖，因此吴人迫切需要将交通线连至芜湖，以阻止楚人再北上寻找渡口以登陆。由于是伍子胥主持修建的，因此这条运河被称之为“胥溪”。

需要注意的是，胥溪本身是条运河。由于在实际修建过程中，实际上靠这一



吴楚地缘关系图

小段运河将旧有的河道联通起来，所以工程量并不会特别大。而广义的胥溪可以被认为是太湖——芜湖之间这条水道的全称；也可以狭义的认为是人工修筑的那一小段。在修建完胥溪之后，吴人还需要一条南向的水路通道直逼越人的核心区。因此由太湖南向入杭州湾运

河——胥浦也诞生了。这两条以伍子胥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不仅能够让吴都与楚、越两地通过水路进行沟通，而且有利于加强吴王对运河两岸的控制。

第二十章 吴国攻楚前所做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吴国与楚国的对手晋国结成政治盟友

就春秋的历史来说，吴国的这段应该说是非常好看的。一则是它跳出了泛黄河流域，将一个全新的，属于长江流域地理单元加入到了中央之国的地缘博弈中。尽管之前楚国已经代表长江流域的蛮夷们成为了北方诸侯的恶梦，但吴国及江东地区的加入无疑全面拉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神秘的面纱。另一个让吴国历史好看的原因就是吴国的兴盛时间很短，基本上就是吴王阖闾、夫差两代。但其实所造成的地缘影响却遍及整个江、淮流域，以至于北方那些以华夏自诩的诸侯们都不得不为之侧目。

更为戏剧性的是，吴国在其最高峰之后便迅速消亡，取而代之的则是越国。而越国从地缘特征上来看，可以说是吴国的延续。以至于吴、越两字在后世已经合为一体了。由于作为国家来说，吴国的消失是那么的彻底，而它的兴盛期是又那么的辉煌，用“生如夏花”来形容也是毫不为过的。而吴国的这一系列辉煌又与两个“外国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就是楚国人伍子胥，另一个就是齐国人孙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诸侯国都是吴国最主要的手，吴国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了楚、齐两国。也许吴王夫差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留下了越王勾践，而是没有收服范蠡，否则吴、越之间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探讨某位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影响，是历史史家及文人所热衷的，在这里就不再凑这个热闹了。我们还是借这段历史来了解江、淮地区的地缘结构吧。既然伍子胥是那么的有才，复仇之心又是那么的强烈，而于公于私吴国和楚国都将会有一场总决战，那么吴国将首要攻击目标定为楚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说吴国是长江流域后起之秀的话，那么楚国则是当之无愧的是长江流域的老大了。对于北方诸侯来说，这个从荆山上下来，以蛮夷自居的国家，永远是那么让人头痛。在王室还能够号令诸侯的时候，部署在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们还能够阻挡住楚人向北方渗透。但当王室势衰，诸侯们内斗不止之后，等待汉阳诸姬的命运就只能是各个击破了。

除了向北，向东也是楚人的渗透方向，而在这个方向，楚国的主要对手就是吴国。如果将处在长江以北的楚国（江汉平原）与处在长江以南的吴国（太湖平原）南北对齐，拉两条线的话，我们会发现，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成为了双方的缓冲地，或者说成为了双方都想争夺的战略空间。而长江与淮河本身的控制权，则是决定这

场争夺战中鹿死谁手的关键。当吴国开始希望越过长江成为“国际政治圈”的一员时，楚人已经在江、淮流域获得了足够的战略纵深了。

如果吴国希望从楚国手中夺取江淮霸主的名头，它所需要做的准备有很多，首先要做的就是地缘政治上的准备。在一个繁杂的国际环境中，没有战略性的盟友就想挑战一个大国是不可想象的。除非这个世界只有你们两个国家，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当然是不存在的。对于吴国人来说，有利的情况是，相比于在江淮流域称雄，楚国人更希望能够“问鼎中原”。也许后人用这句成语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一种霸气，但楚人却是真的去向周王室询问过鼎的尺寸、重量。

楚人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营，得中原者得天下，或者说据有中原，方才能真正的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即使是后来的吴国，也是在彻底解决越人的隐患之前就急于北上争锋了。楚人优先向中原争霸的这种做法给吴人留下了两个机会，一是楚国在中原争霸过程中，严重消耗了自己的实力；二是楚国与北方大国，特别是与它处在同一经度，也一直在向南扩张的晋国成为了死对头。

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国际政治“准则”，晋国和吴国成为了盟友。这并不表示吴国在最终的攻楚行动中会获得晋国的实质支持，但在日后的吴楚争霸中至少可以依靠晋国的影响力，约束那些中原诸侯们不要倒向楚国。

第二节 方城夏道和长江水道不适合作为吴国攻楚的路线

既然吴国已经遵循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原则，让自己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优势，那么下一步就要在攻楚的战略上作出决择了。从大的方向来看，长江和淮河本身都是两条可以选择的路线。特别是对于善使舟楫的吴人来说，河流本身的运输能力能够大大加强他们的攻击力。至于到底选择哪一条路线作为主攻方向，又或者是两路齐进，吴人还没有做出决定。但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吴人最先要做的就是越过长江，在江淮地区获得前进的基地。

客观的看，由于地处长江的下游，吴国在与楚国的争斗过程中是处在不利地位的。即使他们能够获得淮河下游的控制权，也无力改变地缘上的劣势。但这并不代表吴人就没有机会了，相反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积极做着准备。胥浦的挖通就是一个例子，这条将太湖与长江连通起来的运河（芜湖——太湖）似乎向世人表明，吴人决定在长江中与楚人展开大决战了。而接下来的事情，又让人感觉吴人准备步步为营的与楚人打一场消耗战。

我们先来看看《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如果将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看作是楚国核心控制区的话，那么这一核心控制区与东部地区之间有一系列的山脉丘陵作为地理分割线。这条分割线由北至南分别是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江南丘陵地带（包括黄山山脉及其以西的山地丘陵）。而这四处山地之间又为楚国留出了三个战略通道。即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的“方城夏道”；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的“信阳通道”；大别山与江南丘陵之间的长江。



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

三条通道中，方城夏道是纯粹的陆地通道。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的那些断续丘陵，一方面为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的沟通提供了多条宽阔的战略通道（这似乎也能解释，南阳盆地最终在行政上归属于河南而不是湖北），但也为防守方提供了更大的挑战。因此楚人在此修建了长城也就是所谓“方城”将那些断续的丘陵联系起来，用以抵御北方诸侯的入侵（至今那里还有个方城县）。而楚人也经常越过方城，直接进入中原参与争霸。如果从结果来看，楚人对于中原诸侯的威胁要更甚。这与中原地区的地理结构无法成为一个封闭性的地理单元有关。既然不具备封闭性，那么任何想单独统一中原地区的想法都是徒劳的。因此四分五裂的中原地区也不可能在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构筑起一道属于自己的长城了。

由于方城夏道的地理位置偏远，吴人实际上是不可能选择它作为穿入楚国核心

区的路线。即使是中原那些国家这次都站在吴人这边，为它的攻楚行动提供方便，相比于另两条通道能够直接进入江汉平原相比，绕道南阳盆地，再通过大洪山两侧进入江汉平原都显得多此一举。不过吴人没有选择走北路，并不代表楚人不会利用它。随着战役的进行，方城夏道仍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吴楚之间的长江地区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南边的长江通道。如果观察江东平原与江汉平原的地理关系，我们很容易在两者中间发现一个三角形区域天然成为二者的缓冲地。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它是由长江北面的大别山与长江南面的“江南丘陵”包夹而成。只不过江南丘陵是一系列山地丘陵的总称。在大别山南面相对的区域有一条江将这这一片丘陵做了一次分割（类似的分割

还有江汉平原的南面，即湘江），这条江叫赣江。而位于赣江——长江三角洲东侧的山脉就是著名的“黄山”。而西侧那条叫作“幕阜山”的山脉名气则要小得多了，不过这条山脉向东延伸至现在的鄱阳湖附近时，切割出了一组体量不是很大，但名气很大的山峰，这些山峰被总称为“庐山”。

如果从现在的行政划分来看，这个位于大别山脉——黄山山脉——幕阜山脉之间的三角地带，跨越安徽、湖北、江西三省。如果没有长江的存在，我们可以肯定，楚国或者吴国会在此筑城以期获得战略优势。不过由于长江的存在，据险以筑城的想法是无法实现了。因为长江本身既是一道天险（相对于长江以北地区），又是一条战略通道（相对于长江沿岸地区）。更由于三山形成的合围状，让长江水在此得以自然蓄积成泽，只不过最早江水是在北岸蓄积彭蠡泽），而后又在南岸成湖（鄱阳湖）。

无论江水主力在哪个方向成泽，都使得想从陆地上沿江沟通东西的想法变得更为艰难，水路的控制权成为了各政治力量争夺的目标。因此无论是江汉平原还是江东地区的政治力量，如果想压倒对方，都必须占据这一段长江，或者说是在彭蠡湖（或

鄱阳湖）上拥有强大的水上力量。也正是由于这种中间位置，吴头楚尾的称号被授予了这片湖泽及其周边地区（也成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割点）。

第三节 吴国从江淮地区经信阳通道攻楚比从长江水道更稳妥

相比于方城夏道的“陆”性，以及长江通道的“水”性，对于吴人来说，位于中路的信阳通道可以说是二者兼备了。发源于桐柏山脉的淮河东向奔流入海，成为了沟通楚地与吴地的天然“道路”。当然，行驶在这条道路上的不能是车，而是船。不过这正是吴人的强项，要知道，即使是没有天然河道的情况下，吴人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人工开凿出运河来，更何况淮河这种航行条件极佳的大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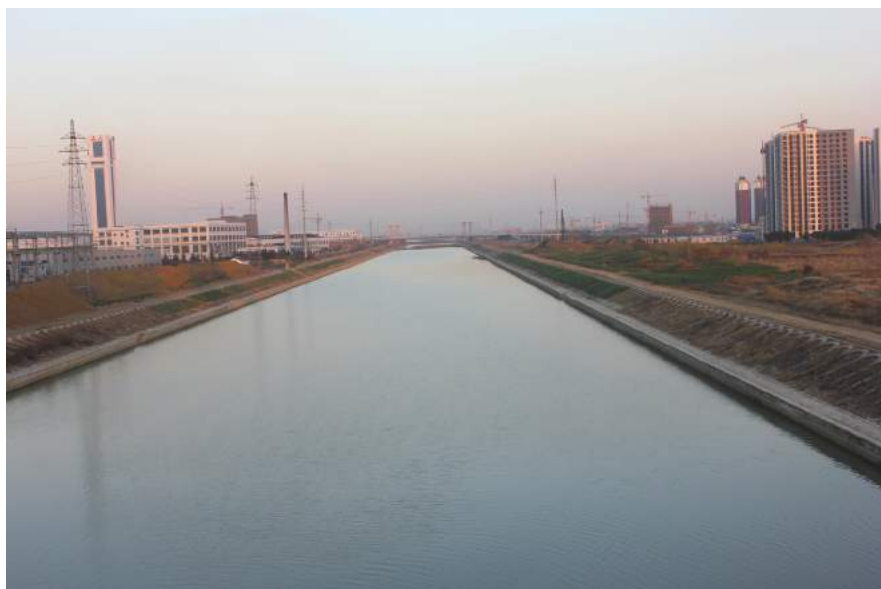
然而淮河本身并没有穿桐柏山而过，也就是说吴人即使通过水路推进到极限，也只能到达桐柏山脚下，因此如果吴人想通过淮河西征楚国的话，在到达信阳通道附近时，就需要弃舟登岸了。所以这条中路通道的地理特性是水陆并用的“混合”型的。如果吴人想通过长江溯江而上的话，江东平原的地理位置，使得吴人在自己的控制区进入长江成为可能。为了更方便的从吴都进入长江，吴都——太湖——长江之间修筑了一系列运河，而伍子胥主持开挖的，太湖与长江之间的胥溪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楚地缘关系图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胥溪本身可以起到连通太湖与长江的重要作用，但与太湖东面的松江作为太湖的泄洪通道有所不同，在长江流向的引导下，胥溪的水流是流向太湖的。如果长江只是一条安静的河

流，这种流向更多的只是让吴人西出太湖时多费些力气罢了。然而长江实际上并不比黄河老实多少，它在下游地区的“恶名”之所以没有黄河那么大，根本原因是因为有那些丘陵的固定。现在你人工开凿了一条新的通道，等于是为长江增加了一条新的泄洪通道，这让本身就水量甚多的太湖不堪重负，也让太湖平原反受其害。因



芜申（太）运河溧阳段

此在后世胥溪也是几经存废，以至于今人对它甚为陌生。特别是相比于吴人在北方所挖掘的另一条运河而言。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在胥溪故址仍有一段运河被称之为“胥溪”，但太湖与长江（芜湖口）之间的水道已经很难通行。如果

按照现有的技术条件，控制长江进入运河的水量并非什么难事。因此重新疏通这条运河，为长江在长三角地区中间开辟一条新的航运通道，成为了运河两岸省市（安徽和江苏）的重要关注点。由于运河西起芜湖，东到太湖，因此也被称之为“芜太运河”¹。只是这类能够改变周边环境的重大工程，都是需要在前期多方论证的。

吴人尽可以选择逆江而上进入楚国的核心地区，不过楚人在长江之上的水上力量显然并不弱。在伍子胥入吴之前，吴楚两国曾经在长江之上打了一场水战，在那场战役中，楚人取得了胜利，江东的芜湖口一度陷于楚人之手。即使吴人凭借地缘优势，能够控制住长江下游，但当他们溯江而上行至彭泽之时，也一定会碰到楚人的强力阻击的。因此胥溪的战略作用，更多的只是方便吴国将兵力和物资投放到江边，并进而越过长江进入江淮地区。要想将彭泽和云梦成为吴国水军驰骋的疆场，吴人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既然通过长江直捣楚人心脏的计划过于冒险，那么将拓展方向放在与江东地区一江之隔的江淮地区是最为稳妥的了。这样做的意义还在于，只有能够控制住江淮地区的东部，沿着淮河西进到达信阳通道的战略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无论是出于长远还是现实的需要，江淮地区都将成为吴人的重点渗透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淮河流域（特别是东部）是被一些称之为“淮夷”的东方部族所控制的。就淮夷这个概念来说，古人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混乱的。有时候它被定为整个淮河流域夷

¹ 在目前的规划中，划定的路线为从安徽省芜湖市出发，经安徽省芜湖县、当涂县、郎溪县，至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溧阳市、宜兴市，入太湖，穿太湖经太浦河口，在苏州市吴江区进入上海，也就是运河从芜湖连接到太湖后，再延伸至上海，故又称“芜申运河”。目前该运河有的地区航道已通航运行。

人部族的总称，有时候又被具体安排给某一个部族。

实际上淮河流域的东部可以说是整个东夷部族最后的保留地。在齐——楚——吴三国的压力之下，那些旧有的东夷部族，除了愿意按照华夏的游戏规则改造自己的部族之外（这部分部族也会被周王室给予正式的封爵，一般为子爵。如莒国），剩下的基本都集中在淮河流域的东部了，基本上也就是现在江苏省的中部。由于在地理结构上无险可守，且力量分散，淮夷被周边的诸侯国消化掉只是时间的问题。

第四节 吴国灭掉淮泗地区的徐国和钟吾国

在吴人开始强大时，楚人已经占据了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了。从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河南省的下半部，那些淮河支流经过的地方，大部分都被楚人所控制住了。而在东面，楚人则在淮河流域的中部，由北至南筑起了三座城邑，以作为东进的基地。这三座被称之为“夷”、“六”、“潜”的城邑，现在的位置都在安徽省境内（涡阳、六安、霍山）。

除却构筑军事重镇之外，楚人还通过控制淮河流域诸侯国的方式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方法并非是楚人的独创。在春秋那种诸侯国林立的环境之下，再加上有“灭国不灭祀”的文化传统存在，让一些实力较弱的诸侯国依附于自己，有时



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

比自己直接控制性价比要更高。由于楚人本身的蛮夷出身，使得他们在与这些同属于夷部的小国沟通时更有共同语言，也更不刻意追求去改变他们的文化，因此楚人在江淮流域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这也是楚人能够成为南方大国的重要原因。

对于楚人在江淮地区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吴国来说，他们也在寻找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在方法上，后起的吴国更愿意采用硬突破这种方式。这

也难怪，后起之秀要想搏出位，往往是要有些非常手段的。而最先成为牺牲品的就是淮河下游最为重要的两个诸侯国：徐国和钟吾国。

这其中的徐国需要重点说明一下。其实将徐国定义为“小国”，徐国人一定会觉得很委屈。因为在周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扩张之前，徐国可是东方大国。那时他们根基在山东丘陵地区，只不过在齐鲁两国的压力之下，徐国被迫南迁，而现在的徐州就是徐国南迁后的新都。但徐州并不是徐国的最后一站，在吴、楚两国将江淮地区作为战场的时期（也就是春秋末期），徐国已经顺着泗水南迁至淮河北面的泗县了（今属安徽）。

而另一个名气较小的夷国“钟吾国”也有的类似的经历。他们当时的位置要较徐国更北一些，在现在江苏的宿迁一带。淮河以北的东夷诸国，很多都与泗水相邻。这条淮河下游最重要的支流成为了连接山东丘陵与江淮地区的纽带。如果地缘压力仅仅来自于山东丘陵的齐、鲁两国，这些南迁的东夷国家的国运应该会更为长久一些。就像他们在江、淮之间的那些亲缘部族一样，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

如果我们为那些边缘大国划定“地缘利益区”的话，那么淮河下游对于吴人的意义应该要高于楚人。吴人在进入江淮地区东部时，仅仅征服江淮之间的“淮夷”诸部是远远不够的，要是不能将防线推进到淮河北岸，吴人并不能长时间保有无险可守的江淮平原。因此徐国和钟吾国注定要成为吴人北扩的牺牲品。只是对于徐国、钟吾国这样的小国来说，生存之道就是在大国之间玩平衡。而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其实是联合较远的大国以对抗邻近的大国（越近，地缘冲突的可能性越大）。这两国也正是依据这

在江汉平原的楚国开始越过太别山，向东扩张时，淮泗地区就不得不面临新的地缘压力了。但一方面，由于楚人的核心区相距较远，并且同属为周人所不耻的“蛮夷”。因此楚人对于淮泗地区的控制手段相对要温和得多。而徐国和钟吾国也乐得依附于楚国，借此抗拒北方齐鲁（主要是齐国）的地缘压力。这种平衡关系一直到吴人到来之后，才被打破。

如果我们要为那些边缘大

个原则，选择了与楚国结盟。

这一次它们仍然觉得没有改换门庭的必要。只是他们这次高估了楚国的实力（楚国在中原争霸中已经元气大伤了），也低估了吴国在江东所积蓄的力量。因此在吴国的闪击之下，徐国和钟吾国相继被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异地复国了。征服这两个淮河北岸的国家，意义不仅在于将淮河下游整体纳入吴国的防线，更让吴国有机会从容的在淮河下游做准备，并找准机会溯江而上，逼近大别山麓。

第五节 吴国以疲楚和分化楚国盟友之策为战争作准备

如果没有伍子胥，吴人也许会满足于步步为营的与楚人（也包括齐人），在江淮地区展开争夺。而有了伍子胥，吴国将目标大胆的锁定在了楚国的核心区——江汉平原（对于伍子胥来说，如果不能攻入楚国的都城，为吴国占据再多楚国的土地，也不算报了仇）。楚人所据有的江汉平原，在此之前，还从未被北方诸侯们攻入过。即使是强大如晋国者，在南阳盆地的楚“方城”面前也只能望城兴叹，更别说穿越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平原了。相比于方城夏道，信阳通道的防御能力要更为强大，楚人也因此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方。

伍子胥应该很清楚楚人的战略重心在哪里，只是奇袭信阳通道如果成功的话，固然能够直捣楚人的心脏，但在此之前，吴人必须由东至西，横穿整个江淮地区。如果吴国不能够快速通过这一地区的话，楚人要想封闭信阳通道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因此伍子胥和孙武在点燃吴王灭楚的雄心之后，又适时的交了盆冷水，并花费数年时间进行战术上的准备。如果按照毛主席语录中的名言概括，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吴人的战术准备工作总结下来有二：一是不断的攻击楚国在江淮、淮北的军事重镇（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夷、潜、六”三城）。这种攻击其实只是虚招，目的是让楚国产生错觉，以为吴国只是依常理在江、淮流域展开拉锯战罢了。由于吴国的这种高频率的骚扰性的军事行动，实质上并不会对楚国产生真正的威胁。久而久之，楚人也就放松了警惕，而这也正是吴人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另一项准备工作则是分化瓦解楚人在淮河流域的盟国。在吴国准备集结的淮河下游地区消灭徐国、钟吾两国，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吴国人希望顺利的到达信阳通道的话，他们最起码还需要在拟定的登陆地点获得足够的安全保证。而有可能帮助吴人完成这个任务的，则是那个曾经为周室重臣的蔡国。

第六节 蔡国成为楚国附庸国后又被卷入吴楚博弈中

蔡国自从参与了“三监之乱”后，事实上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们的最初的封国在河南省上蔡县，在楚人有能力无视汉阳诸姬的封锁突破南阳盆地时，蔡国成为了楚人进入中原的首批牺牲品。关于楚国的这次试水，喜欢听香艳故事的朋友可能会更有兴趣，因为它与一个女人有关。就像历史上那些祸国红颜一样，这个女人也是一个绝代佳人，只不过引发战争的原因并不是在于她本人的“狐媚祸主”。

事实上这位出身于陈国，嫁给息国国君，被称之为“桃花夫人”的绝代佳人算得上是一个贤内助。当时的息国在自不量力的挑战郑国之后，已经变得更加弱小了。即使息侯在夫人的支持下有想法重振国威，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也并不会好于郑人初到中原之时。因为离息国更近，威胁更大的楚国已经开始了东扩的步伐。而位于淮河上游的息国（现河南息县），则是楚人征服淮河流域首先要征服的诸侯国。



蔡国位置图

如果楚人希望东扩的话，他们尽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过这一次机会却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起因则是这位桃花夫人有一次经过蔡国时被蔡侯看见了，并且被蔡侯非礼了，而桃

花夫人的反应自然是很气愤了。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很老套，两个反目成仇的男人需要用某种方式来为自己争回面子。只不过蔡、息两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压倒对方，而楚国则成为了双方借力的对象。一种说法是息侯先找到楚王，联合灭了蔡国，而后蔡侯又鼓动楚王将息国也灭了，将桃花夫人抢了过来；另一种说法则是蔡侯先向楚王描述了桃花夫人的美貌，诱使楚王灭了息国，然后楚王又反手灭了蔡国。

其实谁先谁后并不重要，有没有桃花夫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楚人如果想东扩的话，横亘在方城夏道东侧的蔡国与信阳通道东侧的息国，都没有机会独立生存下

去。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春秋之时尚有灭国不灭祀的传统。如果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这种传统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征服国自身的地缘实力不足以将被征服国完全消化（比如人口数量）。而由于诸侯众多，被征服国也较容易从外部找到支持自己的力量（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坐大）。因此让一个实力被削弱的诸侯依附于自己的间接控制方法，能够最大程度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到了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兼并行为愈演愈烈，那些有足够地缘实力的大国们，已经不需要严格遵守这个优良传统了。因此包括蔡、息两国，以及后来被楚国所灭的，位于颖河中游的陈国都被允许复国。只不过赔了夫人又灭国的息侯无福享受这种“优待”了，忧愤交加的他不久就追随息国的祖先而去了，息国就此绝祀。

而蔡国的生命力要顽强得多，公元前 684 年那次引狼入室的行为，让它由一个嫡系诸侯变为了楚国的附庸国。只不过对于曾经荣耀过的蔡国来说，沦为“蛮夷”的小弟实在是一种侮辱。这种心态也广泛存在于那些不得不委身于蛮夷的姬姓诸侯中。因此一旦有能够对抗楚国的力量出现，蔡国总是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楚国的控制。

最先有力量与楚国 PK 的大国是晋国。在晋、楚两国成为中原争霸的主角之时，蔡国很自然的倒向了同样具有“高贵”出身的晋国。只不过晋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对控制河北平原更有信心，而处在南阳盆地旁边的蔡国，仍然无法摆脱楚国的控制。在晋人进攻南阳盆地未果，而退回河北之后，蔡国被秋后算帐的时间也就来到了。只是楚人仍旧给了蔡国人一个机会，允许他们复国（公元前 531 年），但地点则必须向南转移，以让楚人更好的控制。这个新“蔡国”立国的地点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新蔡”。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蔡国已经远离了中原核心区，成为了一个淮河系的国家。而蔡国新的地缘定位，又让他们卷入了另一场大国争斗之中。

蔡国这个国家在之前的内容中也多次出现过，不过在不久之后，他们将永远消失在这个舞台上了。因为不管蔡国人愿不愿意，蔡国都将卷入新的地缘博弈。而这一次，影响蔡国命运的不仅仅是来自北方的晋国和那个“恶邻”楚国，从太湖平原走出来的吴人让蔡人所要面临的地缘格局更复杂化了。前面已经解读过了，吴国如果希望溯淮河而上进攻江汉平原，是要进行诸多准备的。事实上这种穿越整个江淮平原的攻击行为是非常冒险的，由于淮河流域基本上是一马平川，且支流众多，因此理论上，溯江而上的吴军在淮河中游受到南北向攻击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长江（长江中下游由于两岸山地丘陵的存在，双方一般只需防备正面之敌）。

吴国为了这场远征所做的诸多努力其实都是为了保证淮河航线的安全，而夺取淮河下游的控制权，并让淮河中游的楚军放松警惕之后，登陆地点的安全与否将是淮河航线安全与否的关键所在了。

第二十一章 长江中下游沿岸省份的地缘分析

第一节 江南省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的经济和人才优势

最近的主题是江淮地区。一直也有朋友希望从地缘的角度对这块位置非常重要，却又一直处在夹心层的地区多着些笔墨。其实我们从春秋时的地缘格局，就已经能够看出些端倪了。江淮地区（包括淮河以北的淮河流域）无大国的地缘背景，就是无法形成具有封闭性的地缘结构。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多少改变。

也有朋友问到合肥为什么会成为安徽的省会。如果按照历史顺序来写的话，最起码要到清朝才会涉及到这个话题（1949年以前，合肥还只是个只有数万人的小县城）。不过既然我们是以解读地缘为主，有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顺序。将一些后世的行政区划提前拿出来解读，能让大家对江淮地区的地缘格局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实如果想要解读安徽，就必须将之和江苏放在一起观察。事实上这两个省份，在清康熙以前，它们是作为一个省份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的，这个省就是“江南省”。而在明朝，它的名字叫作“直隶”，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之意。在永乐皇帝将京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直隶”之名也随之给了河北。但南京实际上还是有都城性质，因此拱卫南京的这个省份仍然保留了“直隶”的称号，只是需要在前面加个“南”字，以示区别。

关于江南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结构。应该说江南省的地理条件是非常好的，这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水”多，四条独流入海的“渚”有两条经过这个富庶的省份。长江、淮河不仅为江南省提供了充盈的淡水，还使得它80%的土地都为冲积平原。这些平原大部分为肥沃的耕地，在养活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之后，更成为帝国的粮仓。对于农民来说，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些沿海的土地，由于成陆时间不久，尚不能用来耕种。

不过上帝在对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你再打开一扇窗的。早在吴越春秋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这扇“窗”反而比“门”要大得多。那些沿海的沙地固然不能用来耕种，但用来晒盐却是再好不过了。这种人类所需的最为重要的矿物质，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利益是十分惊人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政治家还在为是否应该解除它的专卖而思虑再三。尽管强烈要求保留食盐专卖制度的人，所打的幌子是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加碘），但如果大家真的认为他们有这么伟大的话，



江苏——安徽地缘结构图

那只能用阿娇的那句名言来形容了¹。

“水”不仅为江南省带来了粮食和食盐，还为其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在古典时期，陆地运输的能力非常有限，水路交通无论在运输量和运输的效率上都最佳的选择。这种情况即使在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的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长江、淮河以及沿海的航道，足以让江南省尽得水利之便。

不过对于古人来说，海路所面临的危险更为不可控，一场台风足以破灭你所有的希望。吴越之人所造的楼船能够在江河之中顺利穿行，但到海面去就经常面临灭顶之灾。这些都促使古人在陆上寻求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以沟通南北的物流。

关于江南省的那条沟通南北的重要河流——“京杭大运河”相信是无人不知的，不过最先开始这项伟大工程的却并非是隋炀帝。等我们解读完江南省的背景之后，回到春秋的时空，就会清楚谁应该享有运河的知识产权了。长江、淮河、运河、海路，两纵两横的水上交通线，使得江南省尽得地利。这种优势在古典时期后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东移之后更是显露无疑。

帝国有 1 / 3 的税赋出自这个省份（清初数据），而由于人民的生活相对富足，也有更多的人可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接受教育，因此也成为才子之乡，在上榜的进士中能够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这样一块“才”、“财”兼备的土地，无疑是极受帝国统治者的关注的。

第二节 清帝国出于对江南省的忌惮将之纵向一分为二

江南省（南直隶）的经济人才优势，最迟在明朝时就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如

1 阿娇一句名言：很傻很天真。

果明朝的继任者仍然属于“正统”的华夏体系，那么它的地缘格局可能并没有必要改变。只可惜这对于清帝国来说，江南的财富和人才固然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但面对一个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的统治者，越是富庶的地区越会感觉到恐惧。更何况强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加排斥这种改变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改变的力量来自于非传统的力量时。因此江南地区对于满洲人的抵抗也是异常激烈。如果不是后来清帝国的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汉化的策略（如果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汉化的目的就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种局面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作为边缘民族统治如此大的帝国，居安思危是必须的。为此满洲人做了种种努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江南省作为帝国的经济支柱，则需要做出一定调整，以变得更加稳定。如果可能的话，帝国的新主人会毫不犹豫的将经济中心迁至关外，这种情况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并不鲜见。但在古典时期，人类对于土地的依附力要远甚于现在。你可以把机器搬到你想到的地方，但却不可能把能够有丰富物产的土地移走，更何况江南地区的交通优势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行政划分方法成为改变地缘结构的唯一手段。作为“地缘”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衍生品——“地缘政治”，并非只能用于外部，对内也同样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做出这个决定的，是那位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具体的手段是将江南省一分为二。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一直是政治家的最爱，即使是在一般的管理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按照地缘文化的情况来进行分割，东西向的将江南省分为两部分看似是最为合理的。问题是这样做并不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所谓的“分而治之”是需要将尽量多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以避免其内部形成新的合力。如果让经济地位及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南北两岸）仍处在同一省份的管理，那么这个新江南省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并不会明显的减少，因此最终江南省被按



江苏——安徽地缘结构图

理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按照地缘文化的情况来进行分割，东西向的将江南省分为两部分看似是最为合理的。问题是这样做并不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所谓的“分而治之”是需要将尽量多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以避免其内部形成新的合力。如果让经济地位及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南北两岸）仍处在同一省份的管理，那么这个新江南省尾大不掉的可能性并不会明显的减少，因此最终江南省被按

照南北向的中间线一分为二了。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每一个省份都包括了三种明显不同的地缘文化。以江苏为例，北部以徐州为代表的地区，明显属于中原文化区；而长江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则属于吴文化区；至于两者之间的江淮地区则形成了过渡性的“江淮文化”。中国的南北文化差异，尽在旧江南省故地显露无疑。而其中由于地缘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间隙至今未能弥合。在分割江南省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两个新省份选择自己的行政中心了。在古典时期，东亚的行政中心同时还要承担经济中心的任务，这一特点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变。就一个城市的建设来说，防御和交通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重点，因此面山背水的地点总是更容易受到青睐。



江苏——安徽南部地区图

就两个江南新省而言，长江和淮河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不过在古典时期的后期，长江的风头显然要盖过了淮河。能够扼守长江航道，又有丘陵可以倚靠的南京、安庆成为了新的行政中心。

所谓江苏省，也就是取了江宁（南京）、苏州两字之首而组成的；而安庆和徽州（黄山）也各贡献了一个字成就了“安徽”的省名。如果仔细观察这四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在帝国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要纵向分割江南省了。

虽然江南省已经被分割了，不过“江南”的概念还是保留下来了。那位一般被我们认为只是去“江南”寻花问柳的乾隆皇帝，其实更为关心的还是这一地区的稳定性。而在清朝时期，最起码江淮地区还是被包含在江南的文化概念中的，特别是江淮地区的东部。在“江南”已经成为富庶的代名词，而江淮之间的以扬州为代表的地区又凭借淮盐之利、运河之便富甲一方时，长江这条地理分割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只是到了近代，运河和淮盐的重要性都大不如前了，经济上的落差使得江东平原开始有意无意的强调长江这条地理分割线（甚至是语言分割线），并且设定出“江

北人”这个带有贬意的称谓。

理顺“江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地域歧视，有的只是经济上的差异。当一个地区能够在经济上变得发达时，它的地位自然会上升。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出很多努力，而地缘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即如何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现在各地区热衷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各种规划，所考虑的基本要素就是自己的地缘结构。尽管有的时候领导们会一相情愿的放大自己的地缘特点，但基本的思路和最终的结果还是必须依据客观的地缘条件而获得的。

第三节 合肥成为安徽省会的历史背景

关于合肥，我个人年幼时最初的印象来自两件事：首先是一个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谜面与“两个胖子”有关的谜语；二则是小学地理老师的一次授课。当时他在讲解中国省会的位置，其中特别提到省会城市一般都在大江大河边上，因为在古时候能够运输大量的物资，然后他顿了一下说到合肥是个例外。也许他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合肥为什么能够成为省会，因此补充到，据考证，合肥在古时候也是有大江大河经过的，至于是哪条江河就没说了。当时留下的印象极深，以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

关于将城市建在江河之滨，除却得到淡水资源以外，能得交通之便的确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对于安徽省来说，长江和淮河都是可能的选项。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首次展开同一级别的竞争之时（春秋战国），楚国人就曾经将他们的都城东迁至淮河南岸（郢都，今淮南寿县）。而三国时期的袁术也曾在此称帝（寿春）。至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安庆在安徽建省之初就成为省会的所在，其扼守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战略地位也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鉴于淮河在近代的地缘作用极速下降，特别是被黄河夺取了出海口之后。因此将安徽的省会设定在长江沿岸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事实上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会即使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不能临江而建，也有足够宽阔的水路与长江相连。换言之，能够多大程度利用长江之力，是能够成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筹码。而恰恰是在这点上，合肥并未能争取到足够的分数。

如果说古典时期江河能够提供给城市的是交通之便的话，那么在工业时代，铁路的修建极大的提升了陆地交通的运输量。这使得陆地运输线的重要性有机会超越内河航道，而随之而来的地缘改变则是铁路沿线兴建了大批新兴城市。而那些能够处在两条铁路线交汇之处的城市，无疑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从而脱颖而出，其中的

佼佼者甚至能够成为一省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郑州和哈尔滨就是典型案例）。参照这一类案例，合肥也许是因为铁路之便而从江、淮城市的包夹之中突围，一跃成为安徽的省会。只可惜在查看了铁路网之后，我们会发现铁路并不是合肥的强项。那些地方铁路并非是促进合肥成为行政中心的源动力，反而应当是合肥成为中心城市之后而带来的经济效应。

如果交通不能成就合肥成为安徽省会的地理优势，那么也许它那处在安徽地理中心的位置是选择合肥的唯一理由了。这样做似乎也能够让合肥成为江淮之间的平衡者。问题是这是真正的原因吗？从历史的角度看，合肥本身也并非没有战略价值。由于合肥的东南方向即为“江淮丘陵”，而合肥则是江东地区的这个外围缓冲区的第一线。不过江淮丘陵本身的密度并不足以构筑强大的防线，因此如果北方来敌突破淮河防线之后，江淮丘陵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迟滞敌人的行进速度，以为江东地区可能的反击获取时间。从这个角度看，合肥的战略作用其实也不算特别重要。

合肥的防御力不足，在国共内战中也有所体现。当国军退守长江以南之后，突破了淮河防线的共军将合肥作为了南下的前进基地，并将之暂定为安徽的行政中心（皖北行署），以管理已经解放的皖北地区。先入为主的想法，被认为是合肥有可能最终成为整个安徽行政中心的重要原因。不过审视一下 1949 年以后的军事形势，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合肥被确定为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了。所谓成也长江，败也长江。长江沿岸城市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这是条能够沟通东海的大江。

而安徽境内的沿江城市之所以退出了省会城市的竞争，也是因为长江。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的共和国尽管自认为在陆地上可以无敌于天下，但在水上并没有任何优



合肥市

势可言。换句话说，那些被历代王朝所倚重的江岸城市，这时却很有可能被最先突破。由于长江沿岸各省的中心城市都与长江沟通，因此理论上东南之敌在获得足够的支持之后可以溯江而上，

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一网打尽。而安徽的地理位置，则是敌方突破长江防线，向北突入中原的首选地区。因此将政治中心依惯例放置在这段南北走向的江面两侧，就好像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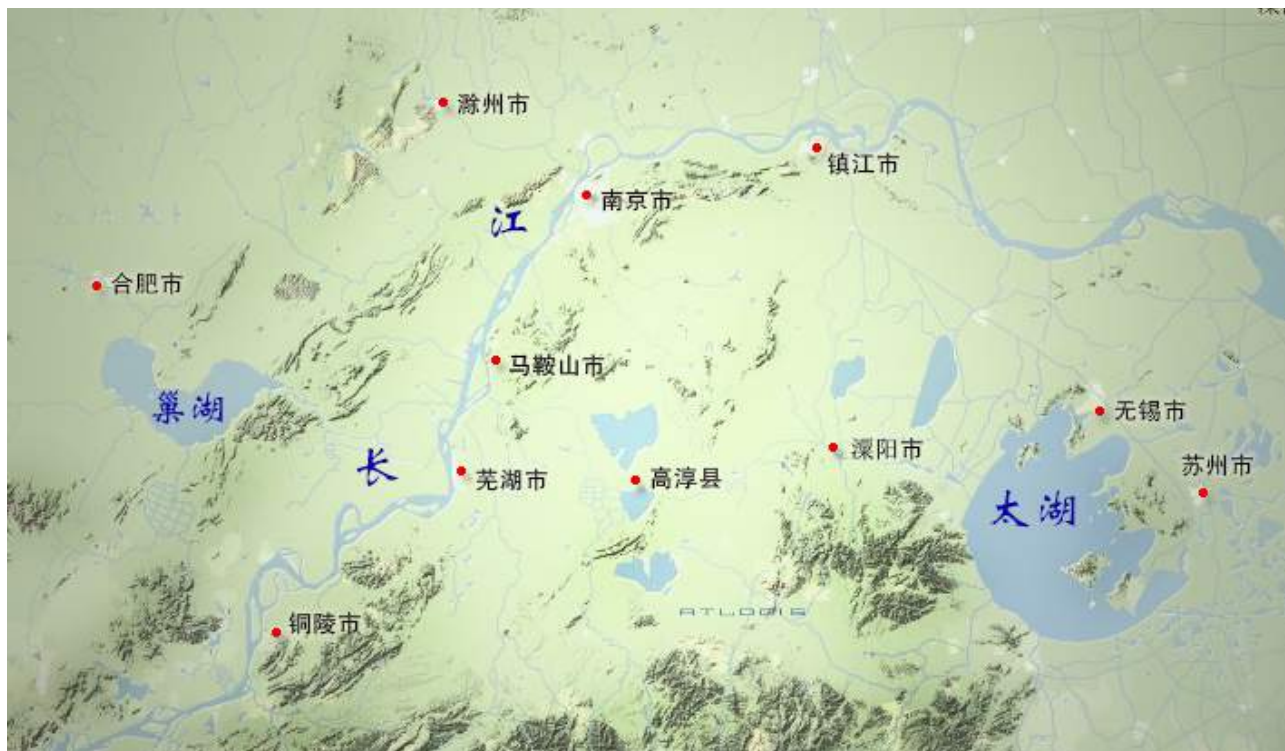
合肥位置图

在这种军事战略的影响之下，在江淮丘陵的西北侧选择合肥作为政治中心，以在长江防线从东南方向失守之后，依托江淮丘陵逐级抵抗，将反攻之敌胶着在江淮丘陵，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在陆地上的优势。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将政治中心设置在淮河沿线似乎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如果你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防守者的话，在机械化的攻势面前，淮河与江淮丘陵之间的大片平原会将胜利的天平向对方倾斜。因此在江淮丘陵的边缘，或者说把宝压在江淮丘陵和丘陵之间的那些湖泽之上，是更为安全的选择。最低限度也能为中原地区争取更多的时间。

第四节 合肥成为省会城市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影响

客观的说，如果从经济角度看，在同一起跑线上合肥应当没有理由竞争过长江沿岸城市的。纵观安徽的地理结构，处在江东，能够更好对接长三角的芜湖应当

更具有区位优势。这并非是说芜湖一定会成为安徽新的行政中心，只是根据它的地缘位置有可能使其在安徽一枝独秀。经济上的发达与否很多时候并非是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对于政治家来说，军事战略往往是他们选择政治中心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长江下游沿岸城市分布图

这也造成了很多“双城”现象，即很多国家或地区都会逐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加一个经济中心。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即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使得政治中心的吸附力过于强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行政中心更能够利用行政权力获得额外的地缘优势（比如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交通网）。因此在地理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依据政治优势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重庆之所以要从四川分离出来，合肥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数万人的小城，发展成为安徽的经济龙头，都是有着这样的地缘背景。

安徽的情况就大致分析到此了。对于安徽来说，长江是它下一步发展的地缘资本。如果从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比另一个长江省份——江西更具有优势。这两个省份的沿江地区在历史上共同享有“吴头楚尾”称号，如果再要细分的话，安徽的长江两岸归为“吴头”，江西的北部归为“楚尾”似乎更为准确。这也是目前皖江经济带在大长三角地区的声势日隆，而江西仍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游移不定地缘原因（如果两湖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话，江西与它们组团的可能性

更大)。

至于合肥的省会设定是否是一个错误，在安徽省内一直是有所议论的。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设定对于消除地区差有一定好处，最起码安徽的地区矛盾或者说地区的经济差异不像江苏那样尖锐。只不过这种平衡在过往并没有起到共同富裕的效果（和中国前 30 年的情况很类似）。也许在今后安徽出现几个经济发达城市之后，合肥的平衡作用才能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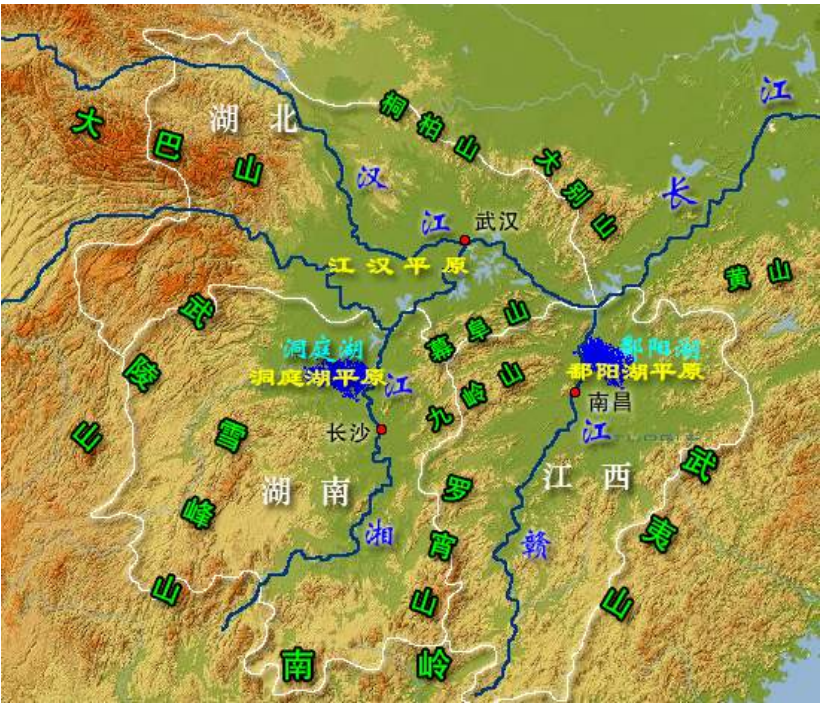
最后说一下，就江苏、安徽两省的行政范围来说，南部和中部属于江南（地理上的）、江淮两个地理单元，两省北部则属于黄淮流域的。而前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南部分来分析的，也就是吴楚争霸的重点区域。到了吴齐相争时，黄淮的东部区域会是重点，到时候会有一个“未来”省份——淮海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区域。

第五节 鄂湘赣三省的区位和彼此间的地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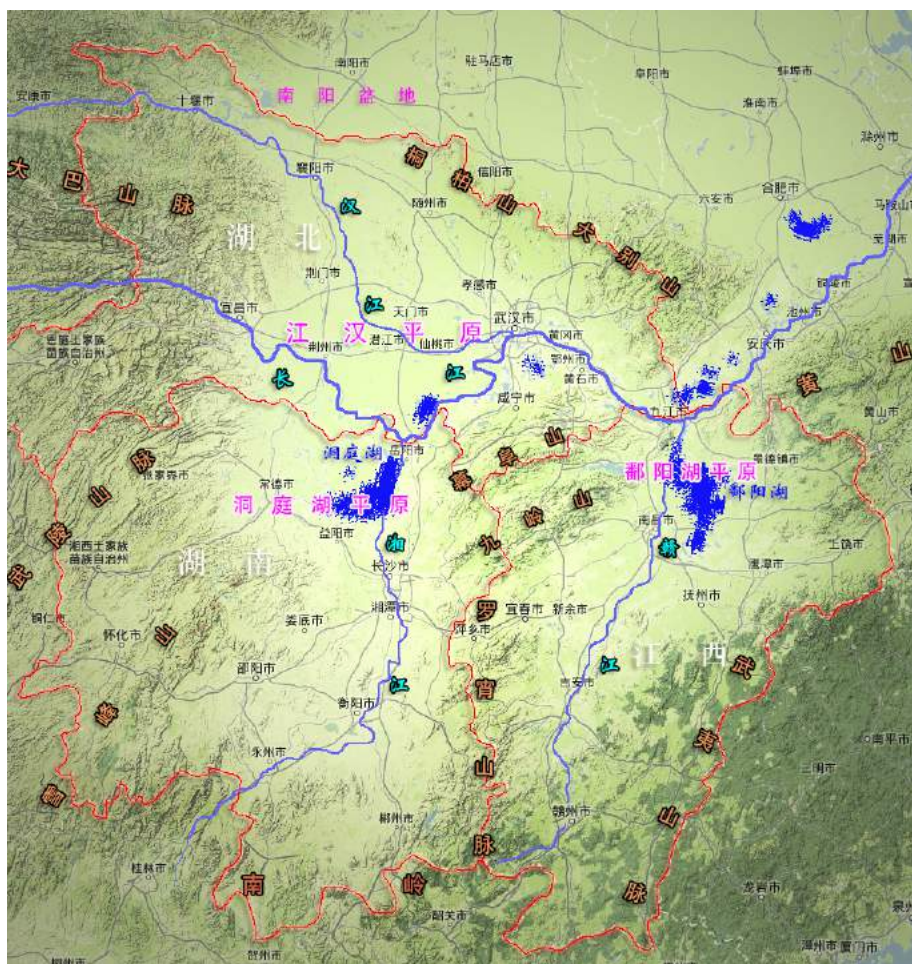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将视线投向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南两省。应该说这两个省份在整个古典时期的地位不算突出，在先秦时期也并没有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角。这一切都与这两个省份的地理结构有关。要分析江西、湖南，就必须与湖北放在一起分析。这三个同属长江中游，呈“品”字型排列的省份，彼此之间地缘关系十分密切。在春秋时期其核心区都为楚地。之前我们对长江流域的分析重点在江东平原以及江汉平原，而位于两大地缘政治区之间，长江以南的湘、赣流域，由于开发较晚，在先秦时期

的战略地位并不算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形，会发现这三个省份是被一系列的山脉、丘陵呈三角形的包围而成的。这些山脉包括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武夷山、南岭（江西、湖南的南部）、雪峰山、武陵山、大巴山。我们并不需要对这些山脉逐一分析，需要的只是在头脑中大致形成一个印象就可以了。如果这三个省



鄂湘赣三省地理结构图



鄂湘赣地理结构图

份之间再没有河流、山脉分割的话，那么这个群山环绕的三角形地区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就像它们西边的“四川盆地”一样。为这个“大三角”作分割的是东西走向的长江，以及南北走向的幕阜——九岭——罗霄山系。长江与这一系列山脉呈丁字型排列，并按照地缘规律分割出了湖北、湖南、江西三个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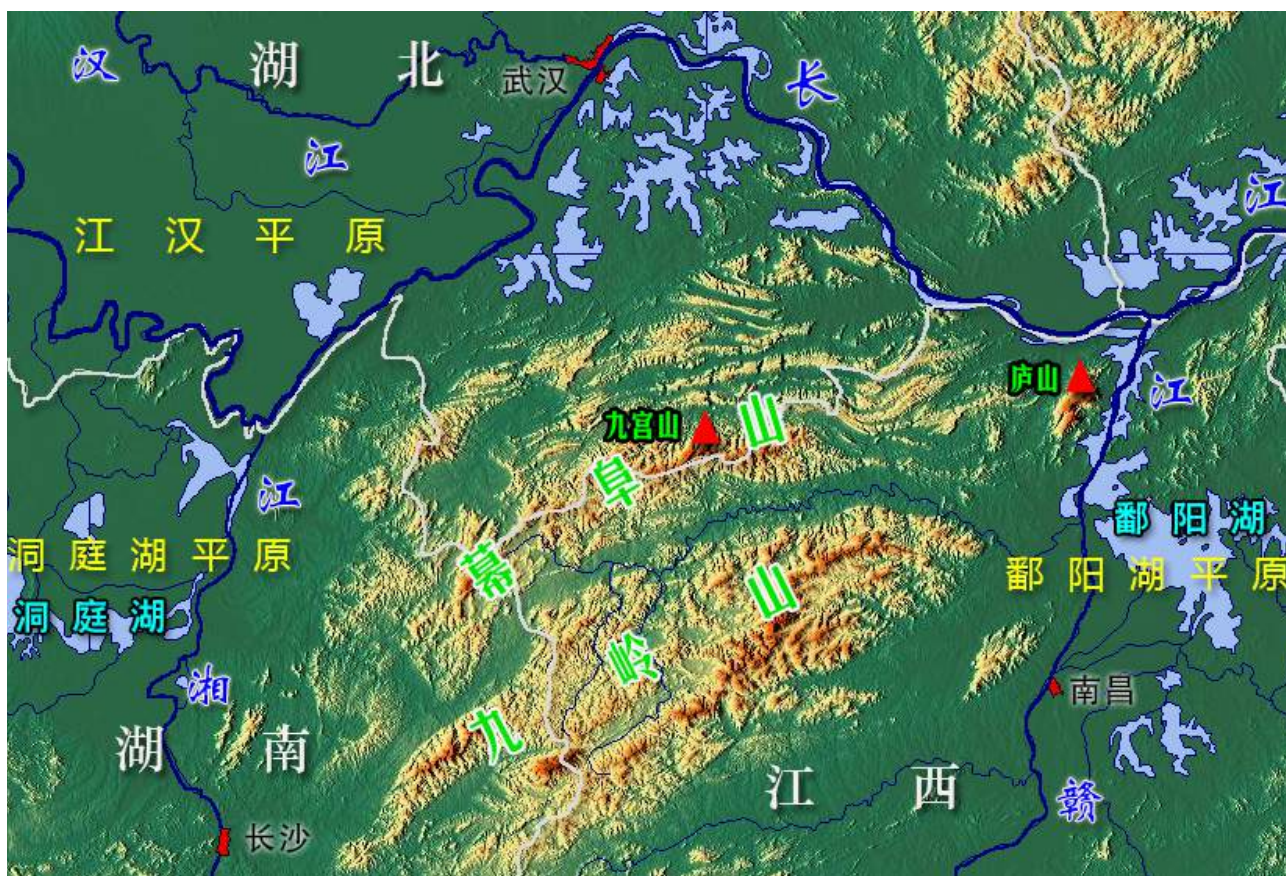
应该说，三个省

份中位置最好的是湖北。江汉平原既可北上南阳盆地，侧击中原；又可借上水优势，东出江、淮流域称雄。对于这些地缘优势，在对楚国的分析中已经解读过了。而江西的地缘位置则要差得多，在吴楚争霸中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大别山在江北的阻隔，赣江流域的地缘力量（江西）如果要想进入黄、淮地区，就必须面对东西两侧的江东地区、江汉平原的夹击。或者说只能在地缘上依附于二者。

与江西尚可左顾右盼相比，湖南的地理结构使之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是作为湖北的后花园而存在的。而将之分割为两个地理单元的地理特征就是长江，以及长江及其支流蓄积而成的湖泊（前为江北的云梦泽，后为江南的洞庭湖）。如果想从江汉平原进入洞庭湖流域，或者反方向的行动，长江是双方之间的主要障碍。相比于山脉，河流湖泊的地缘阻隔作用要小得多，并且水文状况也一直是在变化当中。云梦——洞庭两湖的变迁，加深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平原的形成也一般会经历湖泊——沼泽——陆地的过程，云梦泽的淤塞成陆，与洞庭湖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因此湖南湖北有时也会被看成一个地理单元。长江不仅将湖南湖北连接了起来，也将湖北与江西串在了一起。在古典时期如果想从江汉平原进入鄱阳湖流域，顺江而下是最佳的选择。而从江东平原进入江西境内，也是一样的。因此在古典时期，

我们经常会看到鄱阳湖作为长江流域决战的战场，而很少听到江西境内发生过以陆战为主的决定性战役。应该说长江是连接鄂、湘、赣三省的地缘纽带，不过具体到湘——赣之间的关系而言，长江本身却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鄂湘赣沿江地区示意图

那条横亘在两省之间的幕阜——九岭——罗霄山系不仅分割了赣江水系与湘江水系（也是湘赣两省划分的地缘基础），也为二者之间的交流留出了足够的通道。说到幕阜——九岭——罗霄，这三条南北相连的山脉，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山脉中还可以分割出一些更细的小型山脉，而在历史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往往就是这些山脉。作为整个山系最北端的幕阜山脉，它实际上是处于三省的地理中心。如果它是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的话，那么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应该不会低于成都平原。只可惜这条横跨三省的山脉，除了作地理分割线以外，更多的则是为三地的旅游事业作贡献了。

如果从开发旅游的角度看，江西的获益最大。因为幕阜山脉大部分在江西境内，它的东端有风景秀丽的庐山风景区。在幕阜山脉的北端，也有一座山比较出名，那就是“九宫山”。之所以出名倒不是因为风景，而是有一个大人物——李自成在兵败南逃至此，被当地农民用锄头给打死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估计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农民起义”的领袖会死在农民手中（印象中官方说法是死在

地主武装手上的，还是阶级仇恨）。

第六节 鄂湘赣三省的省会城市选择的地缘背景

长江以南的那些山脉丘陵固然秀丽，名山甚多。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所渴望的是成片可以耕种的平原。如果从地理结构来看，江西和湖南倒是有条件成为鱼米之乡。因为湘、赣两江作为长江的大型支流，有条件带来足够的泥沙形成冲积平原。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由于黄河流域较早形成了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率先在政治上觉醒，并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核心区开发的大方向是自北向南的。由于江汉平原与江东平原能够与南下的黄河文明直接对话，因此也较早的得到开发。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由于汉代以后，云梦、彭蠡两泽的水面减少（泥沙的淤积与人类的围湖造田都是主要原因），或者说这两处古泽的蓄水功能减弱，调节长江水量的功能便都转移到了长江以南。湘、赣两江的江口开始形成了洞庭、鄱阳两湖。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拥有这样大的两个淡水湖，是湖南、江西两省的幸运。不过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湖泊所能提供的食物是远比不上耕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所拥有的土地是耕地，就意味着你的单位面积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地区自然也就拥有更强的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湖岸边的农民往往热衷于围湖造田的原因。

洞庭、鄱阳两湖的存在，还对湘、赣两省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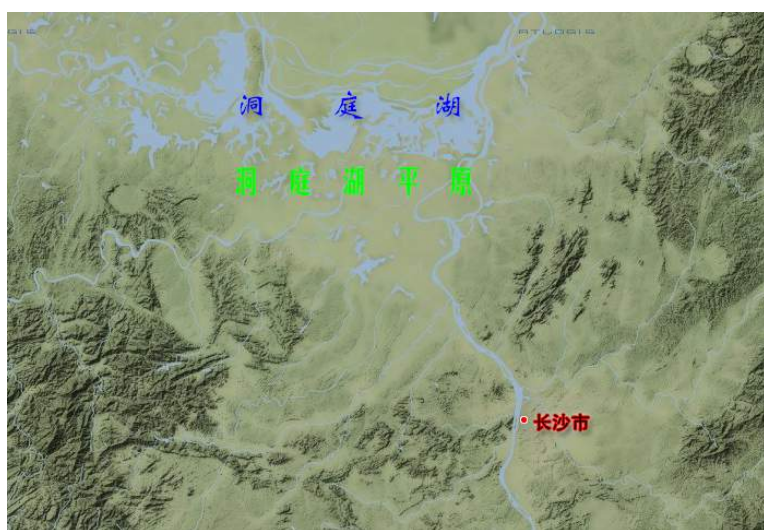


鄂湘赣长江沿岸地区示意图

管从交通的角度看，长江两岸的城市更具有地缘潜力，也应当更容易凭借人口基数等硬实力成为省会城市，但江西、湖南两省的省会却都选在了湖的南面（南昌、长沙），也就是说并不能直接依靠长江的力量。



鄂湘赣行政地理图



长沙位置图

这种选择的地缘背景，就是因为两大淡水湖的阻隔。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长江南岸的岳阳、九江成为了两省的省会，那么具备地缘和政治双重优势的两个城市，将会很容易在本省的经济中脱颖而出。

问题是由于两大淡水湖的存在，岳阳、九江所处的地理单元实际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也就是说它很难向南部地区辐射其地缘影响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湖的南部，湘、赣两江之滨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本省的政治中心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基于安全的需要（包括战争及水患），合格的城址除了面水以外，还需要面山。因此地处洞庭湖平原与湘中丘陵盆地过渡地带的“长沙”；与位处南鄱阳湖平原，西接九岭山余脉的“南昌”，成为了两省的省会。

与江西、湖南湖南省的政治中心被设在大湖的南侧不

同，湖北的政治中心“武汉”则位处江汉三角洲，既可通过汉江辐射省内，又可直入长江与外界通连，可以说是尽得地利之便。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则是因为云梦泽的消失成陆，使得江汉三角洲由湖泊变为了陆地（在此之前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在西面的荆州）；二则是因为江汉平原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使得湖南湖北两省之间，并没有以长江为地缘分割线，长江的岸线大部分为江汉平原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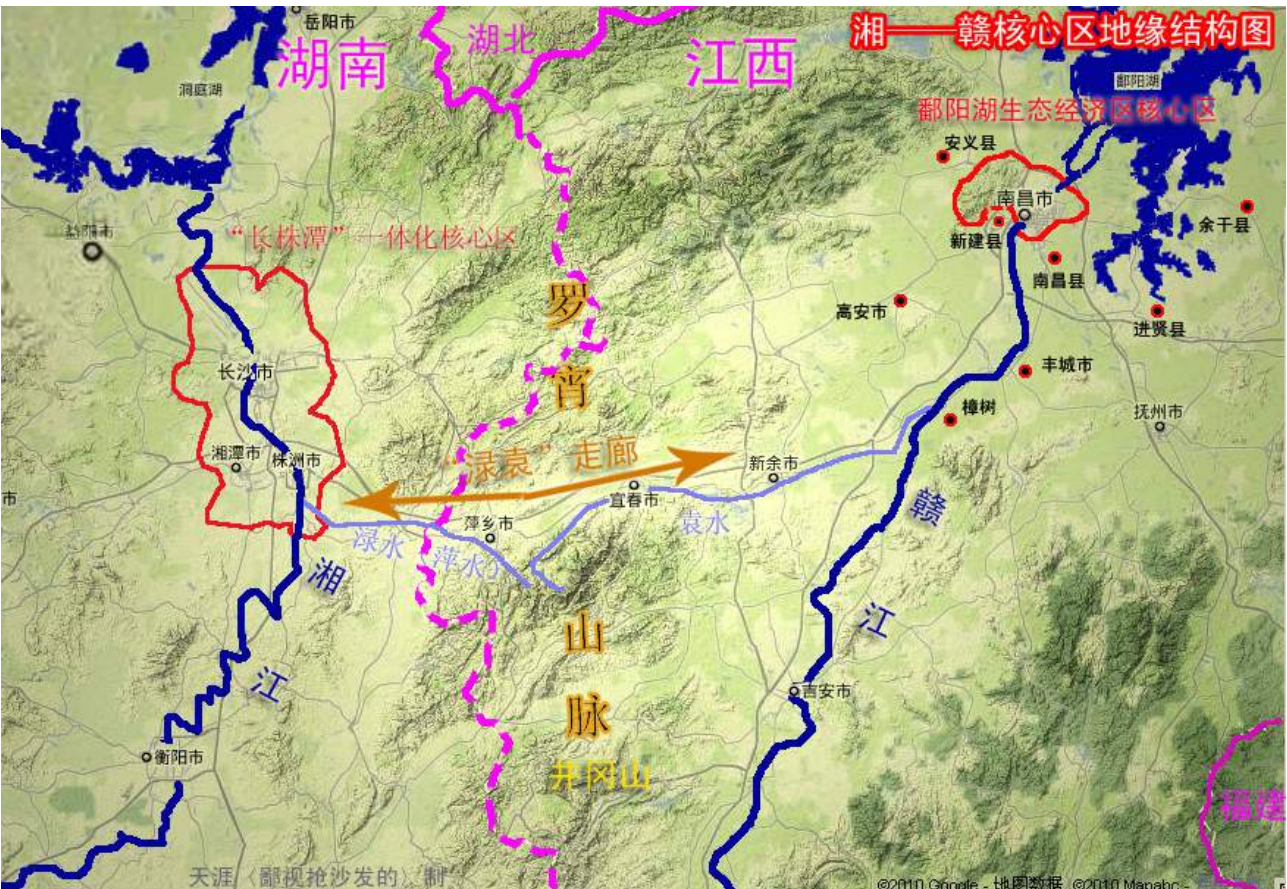
一个横跨长江的城市，有利于保持江汉地区在长江的地缘优势（如果华夏民族是由岭南向北扩张，那么湖南湖北的地缘格局很可能会倒过来。即荆州——武汉一

线有机会成为双方的地缘分割线)。

第七节 袁渚走廊在沟通湘赣上的重要作用

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看，江西、湖南两省的相似度是很高的。虽然两省之间存在着幕阜——九岭——罗霄山系，作为二者的地缘分割线。但对于人类来说，山脉从来都不曾真正切断交流。只要需要，人类总是能够在山脉之中找寻开辟出道路的。就像四川盆地北缘的那些栈道一样。

与四川盆地的封闭性相比，湘、赣两省之间的沟通渠道要畅通得多。除了那些开辟在山脉之中的战术性通道以外，湘江、赣江流域之间还存在一条战略性通道——袁渚走廊。这条由湘江支流——渚水（江西境内称之为“萍水”），与赣江支流——袁水共同组成的通道是两省之间交流的主要通道。关于“袁渚走廊”，知晓的人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湘赣两省在历史上都不是主要的地理单元。或者说有帝王之志的人，无法单独以之为基地成就霸业。因此渚袁走廊虽然对于湘赣两省很重要，并且拉近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却并没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内部博弈的天王山。



湘赣核心区地缘结构图

在历史上，它曾经发挥的最多重要的作用，是为那些出身于湖南，谋事于江西

的红色领袖们提供了在两省之间游走的空间。这并非表明江西终于有机会成为了中央之国地缘舞台上的战略要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江西历史上不属于需要强力控制的区域，才为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红色领袖们希望最终夺取政权的话，将自己的发展重心移向西北几乎是必然的。

所谓“战略通道”所指的并不是一条具体的道路（如果只是一条路的话，就是战术通道了），一般而言，都是以宽阔谷地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战略通道本身具有自给能力，可以建立城市，甚至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地理单元。就“袁渚走廊”而言，属于赣江流域范围的袁水流域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因此在地图上，我们会发现，以罗霄山脉为界的湘赣两省边界，在这里向湖南方向偏移了一些。也就是说，发源于罗霄山脉西侧的“袁水”使得江西取得了这条通道的控制权。并得以建立萍乡——宜春——新余三座地缘城市。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位于两个地理单元交界处的地区，往往在地缘归属上都会左右不定，萍乡就是这样一个节点。袁、渚两水都发源于萍乡境内，使得它在地缘归属上具有两面性。并且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更偏向于湖南境内，与湖南的地缘中心距离较近，因此无论行政归属如何，在地缘经济以及地缘文化上融入湖南有其必然性。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各个省市都有。

就好像经常有人会问到的，南京有没有成为直辖市的可能。如果让我分析，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是有的。但结合现有的行政格局来看，难度比较大。如果南京要直辖的话，势必要吸收安徽的沿江城市。尽管这些地区与南京整合在一起，在地缘背景上难度不大，但这样做这无异于断了安徽最能依靠的地缘优势，决策者不可能不考虑这方面因素。

第八节 湘赣地缘潜力对比与长株潭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回到湘赣的话题上来。如果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江西的潜力是大于湖南的。这主要是因为鄱阳湖——赣江流域平原的面积，要大于洞庭湖——湘江流域。因此在历史上江西的小农经济极为发达。这当然也得益于它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不那么重要的地缘位置。不过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商业社会了。物流对于地缘经济的影响要远甚于古典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地缘优势就率先显现出来了。

这种地缘优势具体体现在京广铁路的修建上。尽管湖南、江西两省在历史上都存在跨越五岭，进入岭南地区（两广）的通道。但最初的南北大动脉——“京广线”



京广线与浙赣线铁路



长株潭位置图

选择了从湖北——湖南过境。其实京广线选择从湖南过境，并非是因为早期的红色政治家多出身于湖南，而是因为武汉的地缘地位极为重要（有多重要，前面已经分析过了）。1949年以后所做的主要是在武汉境内的长江上修了一座大桥，将20世纪初所修建的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连接起来。

对于湘江流域来说，由于可以直接对接江汉平原，因此比它的近邻江西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袁渚走廊”也成为了另一条同样修建于上世纪初的东西通道——浙赣铁路的修建地。浙赣铁路的修建固然让江西受益颇多，但也让湖南有机会成为了一个同时拥有东西及南北铁路线的省份。这其中最为受益的就是处在铁路交叉点上的株洲，就像郑州和哈尔滨一样，位于长沙东南部的株洲也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城市。株洲，以及位

于长沙南部，株洲西部那个因红色“伟人”而兴的湘潭（毛泽东、彭德怀、陈赓……的家乡），凭借区位、政治优势成为了湖南中部的两个重要城市。这也成为长沙欲成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地缘筹码。而湖南的政治家所希望做到的就是将三个呈品字型排列，地理临近的百万级

人口城市融合为一体，最终成为中部的地缘中心，以进入千万级的超大城市行列。

应该说从地缘基础来看，“长株潭”一体化还是存在很大可能的，毕竟三个城市的地理距离比较近。但如果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还是很大的。毕竟长沙与株洲、湘潭两地之间那些交错的丘陵，会影响到三地之间的自然融合，使之在城市建设上很难真正融为一体。而“长株潭”的竞争者——郑州，在拉入其东部的“开封”进行郑汴一体化时，所面临的地缘融合问题，就要相对容易得多。大平原的格局让执政者在做城市规划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另一个中部中心的有力竞争者就是江汉平原上的武汉。实际上早已整合了武昌、汉口、汉阳三市的武汉，从城市规模上看，在上个世纪就可以算是特大城市了，并且其中部中心的位置也得到了认可（02开头的电话区号都是被认可的区域中心城市，包括：020 广州 021 上海 022 天津 023 重庆 024 沈阳 025 南京 027 武汉 028 成都 029 西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武汉所面临的是对手的挑战。如果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江汉平原还是有很大可能保住它地区中心位置的。前提是它有足够的实力将地缘影响力幅射到周边省份。

如果从地缘结构的角度来看，湖南、江西两省是它可以选择的影响对象（归属河南的南阳盆地也可加入），正如它在古典时期所做的那样。如果现在的地缘格局还像古典时期那样，地缘影响力自北向南单向流动的话，武汉的大哥地位是并不会受影响的。现在的问题是海洋提升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这使得江西有机会在临海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做出选择。而湖南似乎也看到了机会，摆脱湖北二千

多年来的地缘影响，独自上位成功。这些地缘上的变化，使得曾经的楚地很难再在地缘上成为一个整体。

相比于湖南、湖北两省，江西并没有显现出什么野心。或者说江西清楚自己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或者成为临近区域的争取对象；或者继续封闭自己，过着撑不死，也饿不死的小农经济生活。这种由于地缘封闭性所引发的小农经济的结构，使得江西一直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历史上，鄱阳湖南部的平原上，除了省会南昌之外，甚至



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



鄂湘赣三省铁路示意图

没有一个地级城市。

因此当江西省以生态为切入点，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¹时，南昌并没有机会提出“长株潭”一体化，“郑汴”一体化之类的构想。符合实际的想法，就是将其周边位于平原之上的几个县级城市吸收为卫星城，以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如果向塘的位置再离南昌远一点，京九铁路又能先于京广铁路数十年而修建。那么凭借京九铁路与浙赣铁路交

汇的双重交流优势，向塘这个镇级行政单位应该有机会取代株洲成为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也许就可以提出所谓“南向一体化”而提升自己的地缘位置了。

当然，以上论述，仅仅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南北大动脉为什么先选择经由湖南而不是江西，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地缘优势与结构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认清自己的地缘位置，顺势而为罢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提出要做“国际大都市”，甚至金融中心，就是属于地缘定位不清）。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指以江西省鄱阳湖为核心，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的经济特区。

第二十二章 安徽巢湖地级市被拆分的背景分析

第一节 上海力图以自己为核心打造长三角都市圈

这两天关于“巢湖市”被拆分的消息¹，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既然这件事情跟地缘有关，那么我也不妨做个背景分析，也以此为例，解读一下中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行政重组风。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似乎只是安徽省内的一件行政事件，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安徽这次“大手笔”的把一个地级市给拆分了，却和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有关，或者说这是长三角内部的一场地缘博弈。

首先我们要来解读一下“长三角”这个概念。作为中国经济的三大重点地区中的一员，长三角和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这三个地缘概念应该说出镜率都非常高了。而对这三个地缘板块的具体描述，也因角度不同而不尽相同。有时它们被称之为“经济圈”；有时又以“城市群”、“都市圈”的面目示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几种表述并没有太大差别，毕竟就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说，城市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重心。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无论我们单从地理的角度来探讨长三角的范围，还是把视线锁定在城市上，并以此来数字化“长三角”的行政边界，都会发现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的视角总是会为这个概念，带来不尽相同的容量。按所谓“泛长三角”的概念来看，你甚至可以把长江中游的江西纳入这个范围当中。不过如

果我们参照历史当中的地缘博弈情况来看，如果你试图以江东平原为核心向外进行

¹ 2011年，安徽省政府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将巢湖市一分为三，其中巢湖市区和庐江县划归合肥，和县的沈巷镇和无为县划归芜湖，和县（除沈巷镇）和含山县划给了马鞍山。



长三角都市圈地缘结构图

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都市圈的话，苏南、浙北的这块平原之地，正是它需要最先连接的通勤区¹。

具体到“都市圈”这个概念来看，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江北紧邻长江口的“南通”；浙北的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乃至外海的“舟山”，都会是以上海为核心，打造都市圈的一级伙伴。从技术上看，这个都市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补上北端的长江口，以及南端的杭州湾两个缺口，以让这个都市圈在地理结构上完整化。同样的问题，也是珠三角所需要解决的。只不过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长三江要走得更快些，杭州湾大桥已经建成。长江口的桥隧工程，最迟在2012年也可全面贯通。

第二节 南京规划自己的都市圈时所选定的范围

在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热点地区时，有一个城市的地缘定位，就有些

¹ 也称通勤带，指沿高速交通线发展起来的上层和中上层人们的住宅区。人在市中心工作，使用月票乘车往返于两地，故称为通勤带。一般布局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带。

尴尬了，这个城市就是“南京”。从历史来看，以“六朝古都”自居的南京，仅仅在 60 多年前，还是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而现在，在面临上海的地缘压力时，已经降格为江苏省省会的“南京”，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是甘为上海的小弟，还是找机会做大自己，以和上海抗衡。

单从行政划分的角度来看，如果南京能够把自己行政中心的地位延伸到经济影响上，以自己为中心整合规划江苏的话，南京是具备与上海抗衡的实力的。即使是不能像上海那样，因沿海而具有的国际影响力，起码也可以在国内与之同级抗衡。问题是，从地缘属性来看，江苏的经济重心位于江南的苏锡常地区，而苏锡常地区更愿意与上海连成一片，共同规划自己未来的蓝图。这种尾大不掉的格局，让身为省会的南京感到难堪。



江苏——安徽地缘结构图

很难帮到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富的管不了，贫的带不动，南京要想突围的话，只有无视那不合理的行政边界，依照自己的地缘属性来重新定位自己的腹地。唯有如此，南京才有可能恢复自己的江湖地位。而具体到行动上，这个地缘规划就是横跨江苏、安徽两省的“南京都市圈”。

曾经不止一次，有朋友问我，中国下一个直辖市会是哪个城市，南京的可能性

事实上南京的这种尴尬地位，早在当年纵向切割“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时，就已经埋下了。在这个原来为拱卫都城南京而设立的直隶省（江南省的前身）中，南京是当然的地缘中心。而现在纵向一划，不仅让江苏、安徽两省都横跨了三个地缘文化截然不同的板块，更让南京成为了江苏省的边缘城市。既无法掌控尾大不掉的苏南地区，又

大不大。政治上的事，要考虑的情况很多，有的时候不是你的经济或者体量到了，就一定能够升级的，行政、地区平衡等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不过这倒也不妨碍我们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一下，南京如果要想直辖的话，会有可能切割出哪些区域作为自己的辖区。而目前南京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南京都市圈”，其实就可以看作这种设想的预演。



长三角都市圈地缘结构图

都包含在内了。

基于南京在江苏省的边缘位置（地理上的），当这座曾经的帝都为自己划定直属势力范围时，不可避免会需要把触角伸到隔壁的安徽去。在你想成为某一板块的地缘中心时，在自己的周边打造均衡的缓冲带，是很正常的做法。在南京划的这个圈里，江苏境内的镇江、扬州、淮河以南的盱眙、金湖两县；安徽境内的滁州、马鞍山、芜湖，以及巢湖市所辖的居巢区、含山县、和县，都包含在内了。

应该说，不考虑行政分割的因素，单从单纯的地理、文化背景来看，南京的这个都市圈，还是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的。一方面，南京的历史、政治地位，使得它对周边地区具备天然的优势。最有可能因为经济实力尾大不掉的苏锡常地区，被排除在外了。换句话说，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实际上已经认同了苏南的这片平原之地，作为上海的直接辐射地存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尊重地缘规律的选择。就像珠三角内部也会存在几个次一级的都市圈一样，长三角也同样存在这种亚板块。只是比之珠三角，上海在整个长三角的核心定位，要清晰得多。

单从地理结构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南京在打造都市圈时的规律。和上海的天然辐射地主要在江东平原不同，南京都市圈所圈定的范围，恰好把长江与两岸的“江东丘陵”、“江淮丘陵”（参见《江苏安徽地缘结构图》）给包括进去了。在历史上，这片横跨长江的区域，就是作为江东平原的缓冲之地而存在的。而南京，也正

是为了增强这种防御力，而逐渐成为政治中心的（政治中心不一定在最富庶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是在战略要点上）。

在不挑战上海大哥地位的前提下，南京把自己周边具有共同地缘特征的区域，整合为一个实力略低的都市圈，应该说也是符合长三角这个大板块发展的整体利益的。否则完全以上海为唯一核心的话，反而不利于地缘整合。就像广州也不可能控制整个珠三角一样。

第三节 合肥在安徽省内构筑自己的都市圈

如果当年的“江南省”没有拆分，那么作为地理、政治中心的南京，在自己周边共建一个都市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事实上，其他省份大都也是在做，以期在都市竞争中抢得先机。问题是，现在江南省已经拆分了，而南京的行政影响力，并不能直接覆盖到安徽治下的城市中。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安徽境内的几个城市也愿意跟经济更发达的南京，走的更近些。或者说接受以南京为核心的整体规划，但安徽境内毕竟还有个不尴不尬的省会“合肥”在。没有谁天生就愿意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尤其是这个人还需要从自己身上割肉来壮大自己。

之所以说合肥的地位有些尴尬，是因为这个省会城市的位置没有按常理出牌。以安徽境内，有江、淮两条重要河流的格局来看，如果要在这一区域来选择政治中心的话，要么靠江，要么靠淮。而江、淮两岸的城市，如淮南、安庆，也的确在不同时期成为了区域的政治中心。至于合肥在 1949 年以后，才被确立为安徽的省会，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历史原因了。

时刻担心对手从东南方向，沿水路攻入大陆腹地的红色政权，不愿意把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放在长江边上。而把安徽的地缘中心放置在江淮丘陵的边缘，可以更好的为中原腹地提供缓冲（在对手准备北上时）。不管当时的这种考虑有没有历史的局限性，把安徽的省会放在江淮之间更靠近地理中心的位置，倒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就是可以平衡安徽的南北关系。否则像江苏这样，政治、经济优势都集中在长江一线，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的不平衡感，就越来越强了。

虽然合肥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在省内天然的竞争力而得到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以政治中心的优势，来真的为自己打造安徽的内部结构（交通、经济等）。在中国这种权力集中使用的文化影响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希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中心，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交通当然是一方面。在诸多因素中，这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了。就像如果中国有一天把首都迁到青藏高原上的话，假以时日也一定会



长三角都市圈地缘结构图

有一张条条大路通高原的交通网出现的。

另一件比较潮流的事情，就是以合肥为中心，也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都市圈，以让自己的各方面指标强于省内其他城市（特别是沿江城市），以避免出现某个城市因经济实力强而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在行政主导，权力集中的中央之国，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从定位上来看，合肥都市圈的定位，应该是比南京都市圈要低一个级别。首先在区域划定上，合肥并没有南京那样沉淀的影响力，因此合肥都市圈所圈定的区域，

都在安徽境内。事实上本来就在安徽地理中心的合肥，也没有必要把圈划到外面去。合肥北面的淮南，西面的六安，东南面的巢湖，共同成为了合肥市共建都市圈的“伙伴”。从这个都市圈的划定来看，应该说合肥是在尽量避免与南京都市圈发生冲突。换句话说，如果大家相安无事的话，那么长三角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上海、南京、合肥三个不同级别的都市圈来支撑。后者与前者不是竞争，而是补充关系。

问题是我们刚才也说了，不是每个人都天生愿意低人一等的。就像南京也未必不想有一天，能和上海平起平坐一样（如果升级为直辖市的话）。合肥对于南京把手伸到自己的境内，也并不满意，因此一场暗战也即将开始。

第四节 合肥拆分巢湖市的目的及对南京都市圈的影响

在合肥所划定的都市圈里，有一个区域是和南京都市圈有交集的，那就是位于合肥东南部的“巢湖市”。在南京的预想当中，这座地级市的市区（区巢区），连同北部的含山、和县两县，都应该是南京都市圈的一部分。这个地级市因安徽境内最大的淡水湖“巢湖”而得名，也因此而控制了巢湖的大部分的水面。合肥将之划为自己的直接辐射区，也是很自然的选择。就像南京希望自己的周边，能够均衡分布有腹地一样。

如果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对安徽治下各地有行政管辖权的合肥，应该是更有机会控制这块竞争之地的。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行政并不总是万能的，那些位于边缘的板块会选择用脚投票，向更有吸引力的，相对发达地区靠拢。就像南京也同样无法用行政命令，来打消上海对苏锡常地区的影响一样。特别是单从构筑都市圈来进行区域整合这件事来说，合肥也好，南京也罢，都是以城市的角色和其他城市相互协调的。虽然说二者都兼负省会的职责，可以让自己在行政上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但这种影响力，在法理上始终是无法转变为直接的行政命令的。更何况就算你能让官僚体系执行自己的规划，却无法让资本和民意随之而转向。特别是在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

前面也有不少朋友说了，仅从道路这项基础设施来比较，车从江苏进入安徽，就能够感到明显的不同。在这种经济差异的背景下，如果你需要在南京和合肥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你会更愿意和谁对接呢？合肥和整个安徽经济在先天上的不足，让它们似乎只能接受成为南京乃至江苏腹地的角色，或者说捆绑在江苏的车头上，担当一个配角的角色。问题是，从地缘背景来看，安徽方面肯定是清楚自己无法和兼具江海优势的江东平原同级PK，但如果和去除掉苏南地区的江苏相比，安徽方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少劣势。毕竟安徽境内的那段长江（称之为皖江），甚至比江苏境内的还要长点。



南京长江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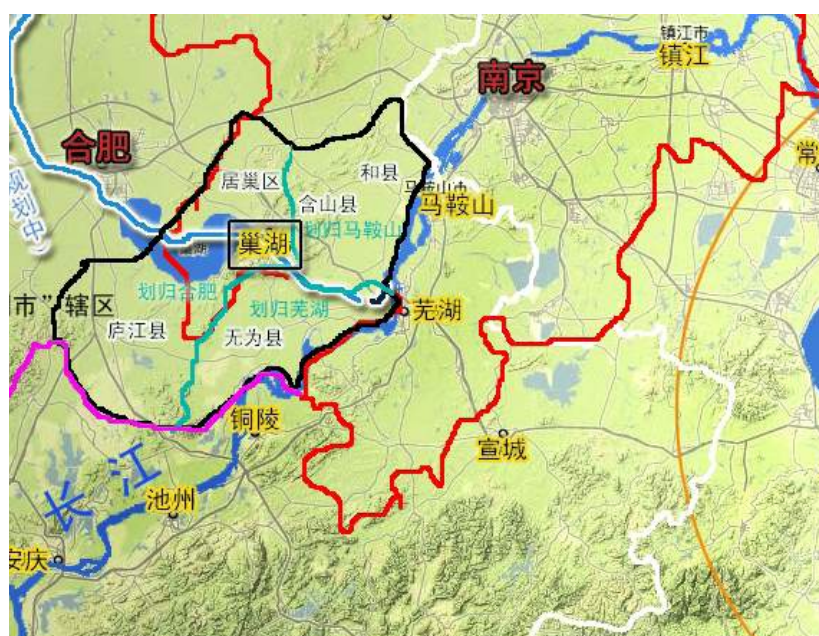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南京长江大桥当初建得太低的话，皖江两岸在接受海洋经济的辐射方面，并不会比南京差多少（现在万吨轮，到了南京就过不去了）；而安徽在江东的部分也能够

不通过南京方面，直

接与太湖流域的苏南、浙北地区做无缝对接。这样对比下来，让合肥方面看到，自己在与南京的PK当中，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南京更加近海，更容易从最发达的上海、苏南地区受益，固然是一个客观优势（还有经济的先发优势），但南京受地理位置所限，必须把一部分触角伸到安徽，才能补圆自己的都市圈，却也是个现实的劣势。如果合肥方面能够将行政手段运用到极致，还是有机会做大自己的。



巢湖市拆分示意图



长三角都市圈地缘结构图

都希望自己成为整个安徽省的老大，但并没有到不尊重地缘规律的地步。作为最有机会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皖江城市带(尤其是与江东核心区对接的马鞍山、芜湖两市)，安徽方面还是在尽全力加以扶植的。

当然，基于中国地缘政治情况，行政中心一定也希望自己是经济、文化中心(看看北京就知道了)。如果做不到的话，经济基础就会影响上层建筑的稳定了，就像苏南地区在江苏省的离心力那样。因此单从合肥这座城市的利益来看，扶植芜湖、马鞍山两市，甚至规划“芜马一体化”进程，以期借长江经济提升整个安徽的竞争力，并不是为了搞乱自己的行政体系。而唯一避免尾大不掉情况出现的办法，就是在提升皖江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也做大合肥这个行政中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辖区比合肥还大的“巢湖市”被拆分了。分拆之后的巢湖，与合肥接壤的市区和庐江县被划入了合肥；而与江东的马鞍山市隔江相望的含山、和县两县，则被并入了马鞍山；至于这两个县南面的无为县，也被隔江相望，位于马鞍山南面的芜湖市所接收。这种分割方法，应该说是充分考虑了地缘规律。局限于江东，辖区面积狭小的马鞍山、芜湖两市，在土地面积上得以飞跃，并且和南京一样，成为了横跨长江的城市。为了更合理分割，芜湖甚至还得到了和县南面，与之相对应的那个角。

这些都表明了，虽然合肥作为安徽的省会，希

具体到实践当中，就是通过拆分巢湖，扩容合肥。通过提升合肥的竞争力，增强对周边城市的向心力，最终坐实自己地缘中心的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合肥拿走了巢湖市近一半的土地，并由此而成为安徽省内体量最大的地区（地级）。

拆分巢湖的做法，固然是立足于安徽省内地缘架构的重新洗牌，但却直接影响到了南京构筑都市圈的战略计划。因为这不仅让南京以自己为中心，辐射巢湖的计划成为泡影（同为省会的合肥，是不会愿意服从于南京的指挥棒的），更让芜湖、马鞍山两市，有机会把视线从南京身上转移，打造自己的小圈子，并以上游地区的皖江城市为腹地做大自己。

第五节 合肥计划开挖江淮运河所产生的影响

让芜湖和马鞍山两市做大，这在安徽的计划当中，也的确是一个“双核”的计划。即以合肥、芜湖为双核心，带动整个安徽的经济发展。这种自成体系的做法，让一向视安徽为自己地缘利益区的南京，感到措手不及。可以预见的是，南京都市圈的这块西南角，再参与南京方面所组织的协调会议时，就不再会那么积极了。相比芜湖等长江城市，合肥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是很明显的。这不仅影响到合肥的经济潜力，更会影响到合肥在安徽省内的江湖地位。因此除掉行政上的调整，增加自己的体量以外，合肥也希望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地理结构，让自己不仅仅是因为行政的选择而成为安徽的中心。

所谓“无水不兴”，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工业时代的现在，得水之便的城市，都会因为生产、生活用水、水面交通的优势，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从河流的角度来看，有江淮两水横贯其间的安徽，并不缺少。但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却正好处于江淮之间，位置不尴不尬。如果合肥想要有足够的水资源来支撑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巢湖这个在中国还算排得上号的淡水湖，就是它唯一可以依靠的了。当我们在地图上标示出合肥在这次分割中所得到的部分时，就会发现，巢湖实际上已经成为合肥的内湖了。

将巢湖变成合肥的一部分，终于可以让合肥像其它大型城市那样，发展自己的水岸经济区了¹（大家都在热衷于在近水处建新区）。只是水还有死水、活水之分。如果仅仅是一个不通江达海的淡水湖，那么你除了以“湖景房”的噱头，做高湖边的房价，并得到足够的生产、生活用水外，并不能像长江城市那样，得到交通之便。

¹ 目前安徽已在巢湖北部规划和建设合肥滨湖新区，并希望以此通过巢湖走入长江、融入长三角。

能够通过水运，摊薄物流成本，是江、海城市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重要因素。因此和南宁方面希望打通广西盆地的出海口一样，合肥也同样有计划，将巢湖与长江连通¹，实现自己通江达海的愿望。



长三角都市圈地缘结构图

这项目能够改变安徽地缘结构的工程，叫作“江淮运河”，目前还处在计划当中。从名字中也可以看出，这并不仅仅是一项为合肥打造水运出海口的计划。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安徽境内的长江、淮河两大河流，通过合肥这个行政中心连通起来。在这种“工”字型的水网结构下，本来不上不下的合肥，终于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地理中心，并通过天然的地理关系来辐射、影响江、淮两地了。

江淮运河工程如果实现的话，意义并不只圆了合肥地缘中心的梦想（安徽境内），另一项重要意义，则是为淮河输水。尽管在我们解读先秦历史时，淮河还是一条体

1 现在巢湖通过裕溪河（原濡须河）连接长江，全长 77 公里，是巢湖唯一的通江河流。并且可通航货船，夏季最高可通行 2000 吨左右的船舶。

量位列四渎的大河。但在被黄河多次扰乱水系之后，淮河的水量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条曾经非常重要，并能够独流入海的大河，甚至已经没有了天然出海口¹，主流只能借由江苏境内借长江入海。将之视为长江的支流也不为过。江淮运河的贯通，不仅可以通过调水、航运，拉近安徽境内江、淮地区的地缘关系，更可以扩大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区，进而提升整个安徽的经济实力。

以上这些内容，只是就长三江的地缘格局，以及分拆巢湖市这件事，所做的一点技术分析，并不代表任何一种地方利益。至于博弈的结果究竟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把自己做大做强，并带动周边地区，那么这种竞争并不会是有害的。

1 由于黄河曾经夺淮入海 700 多年，所带来的大量泥沙把淮河下游河道淤高堵塞，使淮河失去了出海口。淮河于是向低洼处汇流，形成了洪泽湖和高邮湖，淮河水通过这两湖和大运河汇入入长江。另外，1951 年从洪泽湖大体直线向东建设了一条苏北灌溉总渠连通大海，以作为淮海入海口，只是流量太小，不足以承担淮河水入海的需求。

第二十三章 吴国通过柏举之战中攻入楚国郢都

第一节 吴国军队沿淮河水陆并进并通过信阳通道

经过数年的等待，吴国人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事情的起因是已经南迁至淮河北岸的蔡国出兵灭掉了一个叫“沈”的小国。沈国的位置在蔡国的北面（河南平舆县），与蔡国一样都属于楚国的势力范围。所不同的是，被楚人灭而复生的蔡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仍然继续向晋国靠拢。在晋国的授意之下，亲楚的沈国被蔡国所灭。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蔡、沈两国的事情，而实际上他们只是为晋楚两国打了一场代理战争。现在忠实的小弟被灭了，楚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了。如果说吴国灭了徐、钟吾两国，楚国由于鞭长莫及而无法施加保护的话，那么应付家门口的蔡国，楚人还是游刃有余的。因此蔡国旋即被楚军所伐。按照常理，蔡国应当向晋国求援，但这一次蔡人有更好的选择，就是和吴国人站在一起。而吴国所等待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在和蔡国达成同盟之后，吴国人将登陆地点放在了蔡国之南（淮纳）。即使蔡国的军队由于楚军的攻击不能前来接应，也可以固守以吸引楚军在江淮地区的主力，以让吴军可以顺利登陆。



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

按照伍子胥和孙武所制定的计划，攻击行动是水路并进的，陆地上的攻击主要是扫清淮河北的楚军据点。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夷、六、潜三城。对于淮河两岸的楚军来说，他们已经被吴军骚扰了数年之久，这种游击性质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的让楚军产生松懈之心。而吴人要的也就是这种效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压上全部的本钱，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正如那两位高参所料，在听惯了“狼来了”的假警报之后，面临真正的攻击时，楚军的抵抗瞬间被瓦解了。

不过这并不是吴人的最终目的所在，吴人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保证沿淮河西进的水军不受攻击（包括以后的补给线）。也就是说，在陆地攻击开始之时就已经西进的水军，才是吴国的主力。在两翼陆军的护卫之下，吴国的水军得以到达他们此行的终点——淮纳。登陆后的吴军开始向信阳通道进发，在这里吴国将要遇到真正的挑战。从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本来有足够的理由将陆军的主力放在北线中原方向，而将水军的主力放在南线长江之中的。因为即使江淮尽失，楚军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在信阳通道封关以自守。

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楚人是否已经在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信阳通道筑关（所谓“义阳三关”的称谓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即使是没有筑关，楚人也很容易在这条车马不能并行的狭窄通道上设伏的（就像崤之战中晋人所做的那样）。如果远征而来的吴军止步于大别山东侧，那么势必使战争陷入拉锯状态，而这正是吴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要知道，淮河那漫长的补给线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吴人通过信阳通道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中国史家言简意赅的记事风格，使得我们无法探知其中的细节。不过在这场战争中，主动倒向吴国的并非只有蔡国，唐国是另一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国家。如果观察唐国的地理位置，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吴人可以那么有信心顺利的通过信阳通道了。唐国故址是在山西，被认定为是帝尧之后。由于故址被封给晋国，因此被周王室南迁。

相比发源于荆蛮的楚人来说，唐国算得上是根正苗红了。周王室为其封建的地点就在随枣走廊之中（今随州西北），与其他的汉阳诸姬一起封锁楚人的北上路线。在楚人坐大之后，唐国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满足于这种定位的，蔡国是一个，唐国也是一个。因此吴人幸运的在桐柏山——大别山防线的西侧找到了盟友，而这也让楚人的信阳防线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境地。如果考虑到吴国这次的军事行动带有奇袭的性质，信阳通道的楚军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唐军从背后解决掉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越过信阳通道之后，吴人终于可以踏入楚国的核心区了。不过，如果想真正的征服楚国，吴军还必须攻下楚人的都城——郢都。而这时，一道新的防线正在等

待着吴军。

第二节 吴军没有攻击楚国的汉水防线而是退入柏举

吴军在蔡、唐两国的协助下顺利登陆，并穿越信阳通道。在越过桐柏——大别山脉后，他们首先应该会面对随枣走廊中那些被归为“汉阳诸姬”的小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个以出土“曾侯乙编钟”而闻名的随国。

如果从方位来看，随国的位置位于唐国的南部（现湖北随州），更为靠近信阳通道。如果它愿意的话，是可以帮助楚人延缓吴军的进攻的。不过这些姬姓诸侯依附于楚国都是为形势所迫，即使没有胆量出头反抗楚国，保持一个模棱两可的中立态度，静观形势之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比之唐国的出头鸟行为，明哲保身的人总是能活得更长。



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

现在对于楚国来说，他们在大洪山——云梦泽一线已经无险可守了，唯一能够抵挡吴军的就是汉江防线了。楚人当时的国都被定在现在的荆州市北（离城8公里的纪南城，时称郢都），汉水之西。从防御的角度看，荆山——汉水——长江为郢都构成了一道天然的三角形防线。如果吴军所选择的路线是溯长江而上的话，那么汉水西岸和长江北岸都会是

可能的突破点，但前提是他们有信心突破楚军的水上防线。而吴军显然还没有信心在逆流的情况下，在楚国的地盘上打一场水战。

因此对于选择陆地攻击的吴军来说，如何突破汉水防线就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了。在吴军止步于汉水东岸时，楚国方面也在思考击退吴军的方法。如果当时的地缘形势还像春秋之初时，在北面汉阳诸姬和东面吴军的共同压力之下，楚国很可能只能向西退回荆山之上，重新去适应山地那艰苦的生活了，就像后来被楚国所灭的越人那样。而现在，楚国所能够掌握的战略纵深要大得多，北面的南阳盆地已经被楚人

纳入势力范围了。

楚军所制定的方案是，在据汉水以御吴军的同时，分军沿汉水通道北入南阳盆地，然后再西出方城夏道，旋即折向南攻击吴军在淮纳（登陆地点）的船只及后勤基地。得手之后再沿吴军的攻击路线向西封堵信阳通道。应该说，这个计划很完美，如果真的能够成功，那么攻入江汉平原的吴军就将陷入关门打狗的境地。拥有伍子胥的吴军不可能不知道楚国能够有这样的迂回路线，因此吴军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迅速越过汉水攻入郢都，然后再回军消灭那支已经失去了目标的孤军；要么就将主力退回信阳通道，将主要精力用来消化了已经占据的江淮地区。

后一个方案看似是最为稳妥的，只是如果吴国的水军不能将彭蠡泽以东的长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话，江淮地区的安全就无从谈起（这也就是后来长江中下游的水上决战，很多都集中在鄱阳湖之上争夺的原因）。因此吴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话，仍然只能是迅速占据楚国的核心——江汉平原，以断绝楚人的根本。实际上就算楚军不分兵迂回，远道而来的吴军也不可能坚持太久，毕竟他们的远征路线太长了。因此对于汉水西岸的楚军来说，如果能据险以自守，将战争拉入僵持状态的话，楚人还是有很大机率取胜的（如果他们在退入汉水西岸之前，有时间和决心在东岸坚壁清野的话，会有利于缩短相持的时间）。

如果吴军固执的将思路放在如何突破汉水防线上的话，缺乏水军支援的吴军是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的。不过对于优秀的军事家来说，他们所思考的方向并不会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如何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说，伍子胥和孙武所希望的是能够在吴军势头正盛时与楚军的主力决战，至于决战的地点是在汉水以西还是以东都不是问题。于是留守在汉水西岸的楚军不久后就欣喜的发现吴军撤了。基于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理由，吴军的撤退并不会让楚军感到意外。现在，摆在楚军统帅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仍然按照既定的方案，等待迂回的楚军形成合围之势后再开始攻击；二是乘势掩杀，一鼓作气将吴军赶回吴地。

最终，楚军的统帅选择了后者。当然，这种选项并不是必然的。在二百多年以后，面临同样选择的廉颇和赵括就选择了不同的答案。只能说，吴国为了这次进攻做足了准备，伍子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岸的楚军统帅会掉入这个陷阱。假使楚军沉得住气没有追出来，那么吴军也有足够的时间从容退去。虽然没有取得全功，但也算得上是战果辉煌了。只不过对于伍子胥来说，他就没办法完成那惊世骇俗的“鞭尸”壮举了。

在楚军越过汉江开始反击时，他们已经不能够得到地利之便了。而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吴军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路线向信阳通道方向退却，而是沿着云梦泽的北

沿向大别山方向退却，这条路线无疑会让吴军陷入绝地。因此即使楚军在追击中的数次接触战中都落败了，但还是决定继续追击。最终吴军止步于大别山西麓的“柏举”，并列阵以待楚军。

第三节 吴军诱使楚军追击进入柏举后将其歼灭

对于“柏举”，大家可能会感到陌生。不过提到麻城，凡是对中国革命史有所关注的朋友都应该有所耳闻。麻城和它西侧同属大别山麓的黄安（现名红安），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爆发了一场著名的起义——黄麻起义。如果中国革命是以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力量为主取得胜利的话，那么黄麻起义的历史地位无疑会高于秋收起义；大别山在红色中国的象征意义也会高于井冈山（不过黄安、麻城地区所出的将军之多，在共和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能够被红色军人看中的地区一般都是地形复杂的山地。在楚人看来，吴军退到这里无疑是自寻死路，除非他们也想在大别山中建立根据地打游击。

如果吴军真的是被迫退却至此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结果当然是不容乐观的，但如果是主动诱敌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按照一般的诱敌之策，吴军应该作出败荒而逃的样子的。而这一次的情况去完全相反，楚军在追击过程中连吃败仗，或者说吴军并没有主动向楚军示弱。只是吴军每次接战，挫敌锐气之后又继续向东退却。能够将吴军逼入绝地的想法，让楚军欲罢不能，最终还是尾随吴军到了大别山麓。这场战斗并没有留下诸如“破釜沉舟”之类的典故，不过依吴军所选择的决战地点来看，伍子胥显然是希望吴军在断绝后路的情况下，与楚军决一死战的。最终的结果是吴军取得了胜利，并反过来向西追击溃败的楚军。

这种时候，楚国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而从北路迂回的楚军这时已经快要到达吴军的登陆地点了（淮河北岸，息县附近），汉水楚军的贸然出击打乱了整个战役部署。即使迂回的楚军能够破坏掉吴军的舟楫，失去了江汉平原这个根本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迂回的楚军只得西入信阳通道，以回救江汉平原。问题是，对于这支楚军来说，他们等于是围着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并且所要直接面对的不是原定计划中的吴军留守部队，而是深入江汉平原的吴军主力，最终的结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所以要对“柏举之战”花费较多的笔墨，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缘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在解读楚国成为北方诸国最主要敌人的原因，那就是够“大”。仅仅是江汉平原——南阳盆地——江淮平原就已经让楚国拥有北方

诸国所无法匹敌的战略纵深了。而到了战国时期，楚人的势力范围还在继续扩大。拥有多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地理单元，使得楚国就像“九头鸟”那样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就像这一次吴国的进攻，在战术上应当是非常成功的。楚军如果能够按照既定计划迂回合围的话，吴军也未必能够攻入郢都。

对于像楚国这样疆土辽阔的国家来说，都城的失陷并非意味着亡国。在秦国开始强大之后，秦人也曾经攻破郢都（公元前 278 年，屈原也是因此事而投江），楚人随即迁都至淮河中游的寿春。如果这一次吴军能够长期占据郢都，楚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南阳盆地组织力量反攻。吴人可以通过精心的战术准备，一战而攻入江汉平原，但要想消化如此广阔的楚地，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第四节 楚国向秦国求援以帮助其击退吴军

应该说楚国这次的落败，北方诸国是乐得在边上瞧热闹的，毕竟楚国这个“蛮夷”一直都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即使有人想救援，一般的小诸侯国也是决不敢趟这池混水的。或者说只有与楚国同等数量级的边缘大国，才有这个实力做这件事。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楚人希望从外部寻找到力量帮其击退吴军，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渭河平原的秦国，山西高原的晋国，以及山东丘陵的齐国身上了。由于晋国与楚国一直是中原争霸的直接对手，楚人如果向它求援的话，无异于引狼入室。这样看来，只剩下齐国和秦国作为选项了。

如果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齐国应当是很好的求助对象，因为吴国一旦坐大，势必会沿海岸线向北扩张，并直接影响到齐国的利益。问题是如果齐军从山东半岛起兵前往江汉平原的话，他们的行军距离甚至比吴军还要远。并且齐军亦无法像吴军那样借淮河之力，降低行军的强度。当然，如果齐国人愿意的话，攻击淮河下游以及江东平原，逼迫吴军不得不回援本土也是一个好办法。这样的话，“围魏救赵”的典故也就会提前发生了，只是相对应的成语会变为“围吴救楚”罢了。

不过富庶的齐人偏安思想过于严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对于长江流域的蛮夷之地都缺乏足够的兴趣。更何况无论是吴国，还是楚国成为了江淮流域的老大，都有可能会沿泗水而上，影响齐国的利益（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站在齐国的角度来看，看着两个潜在的对手拼得你死我活，自己在边上坐山观虎斗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经过排除法，秦国成为了最后的答案。如果放在战国时期，楚人是决不会想到向秦国求援的。因为向南扩张至汉中盆地以及四川盆地的秦国，已经直接与楚国发

生了地缘冲突。并且占据了上游优势的秦国，对于楚国的威胁要远甚于三晋（那时晋国已经分裂为赵、魏、韩三国了）。而在春秋时期，秦国的基本力量还是被限制在渭河平原。对于秦国人来说，能够进入中原参与争霸，一直是他们的梦想。只是由于晋国占据了崤函通道，秦国人在大部分时间（春秋）还是只能困于关内。

就渭河平原与楚地来说，并非不存在直接沟通的途径。只是仅据有渭河平原的秦人尚无实力和勇气去对楚国发起挑战。而对于这一次吴楚相争，困于渭河平原的秦国本来是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因为无论吴、楚两国谁成为了长江流域的老大，都暂时不会与秦国发生地缘冲突。这也是楚人最终决定向秦人求援，而秦人犹豫要不要去淌这池混水的根本原因。

最终的结果是，在楚人的苦苦哀求之下，秦人还是决定出兵相助。毕竟能够有机会东出渭河平原，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对于秦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那么秦人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出征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秦——楚两国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第五节 吴国攻楚的战略目的并非消灭和占领楚国

在秦国登场之前，我们还要对吴国这次攻楚行动的战略目的做个分析。后世很多人将吴国未能最终灭楚，归结于伍子胥入郢都后那惊世骇俗的“鞭尸”行为。按照这种看法，如果不是伍子胥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吴国看似应当有机会消化掉整个楚国的，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春秋之时，虽然诸侯相互征伐，攻入一个国家国都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一般情况下战胜国在劫掠一番后都会主动撤离，特别是你的对手已经不再是一个城邦国家时。

之所以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客观原因：一是国都及其周边地区是一国的根本，也是经营时间最长的地区。如果要将它消化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如果将对方的国都纳为己有，而又不让其异地复国的话，很容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并干涉战胜国的这种兼并行为；第三是当时的人口基数过小，没有足够的人口迁入来消化被占领土地。如果希望靠军事手段强行消化的话，兵力本身也是一个大问题（柏举之战，吴军倾全国之兵也只有数万，而对面的楚军则号称 20 万），特别是当对方的核心区与自己的核心区距离过远时，当中尚未能消化的缓冲区随时会出现反复。

综合以上因素，吴国的这次远征，战略目的并不会设定在让楚国完全消失上。也就是说，对于江汉平原的攻击，更多的是从根本上打击楚国战争潜力，以让吴国

得以顺利的在江淮地区推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吴国攻入郢都后的行为来看，也印证这种战略想法。在纵容伍子胥寻找楚平王的尸体以报家仇时，吴国的军队也没有闲着。楚人在都城所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而吴军也看起来也并没有让江汉平原的楚人转变为吴国臣民的想法。

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没有外援，吴军最终也很有可能会主动退出江汉平原，而将江淮地区作为自己主要经营的对象。只不过让吴军在楚地呆的时间越久，楚国的损失就会越大。因此秦国在楚人的求助下粉墨登场了。我们知道，秦国所处的渭河平原被称作“四塞之地”。也就是说理论上这个地理单元有东、南、西、北四个出口，如果控制好这四个出口，渭河平原的战略安全便有了保障。

其实所谓“四塞”只是虚指，渭河平原与外界沟通的路径并非只有四条，除却我们之前曾经分析到的关陇古道（陇关）、崤函通道（函谷关、潼关）、泾河通道（萧关）以外，在今后的历史中我们还将涉及到数条重要的通道（每一条通道后面都有些经典的故事）。现在浮出水面的就是渭河平原与南阳盆地之间沟通的重要通道——丹江通道。

第六节 秦国通过丹江通道出兵救楚

对于丹江通道，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如果提到武关，如果你关注中国古代史的话，应该会有些了解。一般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关隘都会扼守一条重要的通道，而每一条重要的通道又会连接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武关所扼守的丹江通道用来沟通的地理单元则是渭河平原与南阳盆地。

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条天然通道沿西北——东南方向穿越秦岭，既然称之为“丹江通道”，那就应当有一条叫作“丹江”的江了。丹江是汉水最重要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北沿的商山（陕西省商洛市），在南阳盆地的西侧与汉水合流，合流之处则被称为“丹江口”，现在也成为了那片土地上所建立的城市名称。由于水量丰富，地理意义上的“丹江口”现在被筑坝蓄水成为“丹江口水库”，并成为了南水北调的重要源头。由于丹江在到达武关之前，实际上已经向南折转了，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沿着这条天然通道东行，因此武关的得名是来源于丹江的一条支流——武关河。

至于丹江本身，最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具备了通航条件，秦人灭楚之战中很有可能已经得水利之便了，但由于丹江本身是发源于秦岭之上，并非贯通于渭河平原与南阳盆地之间，因此经由武关的这条陆地通道仍然是渭河平原——南阳盆地之间最

为重要的沟通渠道。如果大家希望在地图上寻找“丹江通道”的具体位置，可以参阅 312 国道，对于现代人来说，将古人所修建的道路扩建为公路是最为省时省力的办法。

丹江通道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无数次重要的作用，最为著名的应该是刘邦与项羽之间的那场竞赛。当项羽还在河北与秦军苦战时，刘邦则已经通过武关抢先进入渭河平原了（武关春秋时叫“少习关”，战国时更名为“武关”）。在秦国成为楚国的主要对手后，楚国的防御重点事实上就是“丹江通道”，为此楚人也修建了“方城”（而且有数重之多）。不过在吴楚“柏举之战”后，丹江通道却成为了秦人救援楚国的快速通道。从军事角度看，能够让秦军实地考察一下这条通道的通行程度，也是秦国答应援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楚柏举之战战役要点示意图

秦军在经由“丹江通道”到达南阳盆地后，可以选择沿汉江而下，与吴军在郢都决战，不过这样做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战术。最好的办法还是东出方城夏道，至淮河上游操吴军的后路。只是吴军在打破了楚军的合围计划后，显然也意识到了到方城夏道的战略威胁。因此吴军除了继续在郢都寻找楚平王的尸体以外（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财宝物资），也分兵推进至方城夏道的南端。最终南下的秦军和楚军汇合后，与北上的吴军在方城夏道的最南端相遇（稷地，今河南省桐柏县），并展开激战。

有了秦国的生力军加入，吴军再也未能延续他们的连胜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在吴国的大后方，越国已经向吴国发起了进攻。如果按照正常的战略思维，吴国其

实应该先搞掂这个死对头的。虽然伍子胥说动了吴王先攻楚，并取得了胜利，但攻楚的成功并不代表就能抵消越国的战略威胁。因此吴国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是解决越国的问题了。对于伍子胥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虽然未能抓到活着的楚昭王，但能够将杀其父兄的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并打上三百鞭子，大仇也算是报了。

第七节 吴军撤出江汉平原后唐国和随国的命运

吴楚柏举之战虽然以吴军撤出江汉平原，楚人复国而告终，但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吴军的这次攻击打破了楚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楚国从此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只需将主要精力放北方，它必须时时防备来自东面的地缘威胁了。现在我们要交待一下，柏举之战之后，吴楚之间的地缘形势了。首先那个位于随枣走廊的唐国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在失去了吴军的庇护后，秦楚联军首先就灭掉了唐国。而位于唐国之南的随国却赌对了命运，因为他们在楚昭王跑去避难的时候收留了这位落难的楚王。

虽然随国人告诉吴军的理由，是占卜的结果是如果交出了楚王，对他们不利，也就是说老天要收留楚王。这个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随国人懂得审时度势。或者说随国人清楚，楚国并不会那么容易被灭的，最低限度楚人还是能够保有大别山以西地区的。而到了那个时候，楚人就算暂时没有实力恢复他们在江淮地区的势力范围，但做个内部清理的实力还是有的。

在两个实力接近的对手进行博弈时，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根据自己的情况站队是很正常的。随国人最终选择站在楚国一边也属正常，因为作为汉阳诸姬的主要国家，随国在楚国向北扩张的过程中总是首当其冲。最开始随国也并不愿意服从于楚国这个蛮夷之邦，但在经历过数次打击之后，随国已经很清楚自己无法同楚国对抗了。即使是吴国这次有机会灭楚，随国人也不再愿意冒险了。随国这种紧跟楚国的态度也得到了回报，在春秋末年各大国开始大规模兼并小诸侯国时，随国成为了汉阳诸姬中仅存的诸侯国。

与唐、随两国相比，位于淮河上游的蔡国尚能够得到吴人的庇护。在吴军退出江汉平原后，他们并不会轻易放弃在江淮地区所拓展的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也是吴人此行的真实目的。不过楚人也并不甘于就此放弃他们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在柏举之战后楚军也试图发动反击。

一方面楚国的水军顺长江而下，希望通过攻击江东地区来迫使吴军放弃江淮地

区。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如果吴军不能在长江下游取得优势，那么他们也就很难保有在江淮平原所拓展的势力范围。因此楚人的这次攻击从战略方向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并且顺江而下的楚军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只是当时的吴军势头正盛，并且作好的充足的准备，楚人的这次报复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而在陆地上，吴、楚两军在蔡国北部又进行一场战役，结果仍然是吴军取胜。在水、陆两线的反击都失败后，楚人终于认识到，即使地缘优势在他们一面，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恢复到旧有的实力。并且反击的失败让楚人成为了惊弓之鸟，为此他们甚至将国都迁至汉江通道之中（郢地，因成为新都称之为“郢郢”，现宜城市），以作好依托南阳盆地抵御吴军再一次入侵江汉平原的准备。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楚人有些多虑了。

第八节 吴国和楚国在江淮地区形成的地缘平衡线

相比于楚国已经整合好自己的核心区，吴国还必须在它的后方面对越南这样一个实力对等的国家。只要不是太急，楚人还是有机会慢慢恢复他们在江淮地区的势力的。而对于吴国来说，以江东地区作为支撑，希望控制整个江淮地区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吴楚双方后来虽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吴国的势力还是逐渐退至淮河中游，按现有的行政区划看，基本算是淮南——合肥一线。从地缘的角度看，吴国控制住了江淮丘陵地区以和楚国达成地缘平衡。而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否控制住江淮丘陵地区，也成为了江东地区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志。



吴楚地缘关系图

吴人的这种战略后撤，应该说是符合地缘规律的。只是当初站队在吴国一边的蔡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蔡国人来说，如果继续留在原地（新蔡），那唐国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蔡国人也只能随着吴军沿淮河向东迁移，并最终移至吴国边境的“州来”（现安徽中部的淮南市凤台县），史称下蔡。蔡国人的这次迁移时间是公元前493年，与柏举之战相隔13年。而后经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楚人开始乘越甲吞吴的机会继续向东推进（吴国于公元前473年为越国所灭），东迁的蔡国撑到公元前447年终于撑不下去了，再一次被楚人攻破后，蔡国算是真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再也没有机会异地复国了。

通过对柏举之战的解读，相信大家已经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缘结构有所了解。在今后的历史中，江汉——江淮——江东这几大地理单元还将会上演无数次类似的悲喜剧。这三大地理单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地缘博弈的关键基本锁定在长江上了。毕竟，面对淮河流域那近乎一马平川的地形，江东平原的政治力量要想重现吴军破楚的攻击路线难度是非常大的。即使是江汉平原的政治力量想通过江淮平原攻击江东地区，到了最后也还是要面对长江天险。

因此长江成为两大平原地缘博弈的主战场也就有其必然性了。到了那个时候，彭湖——鄱阳湖将成为地缘博弈的关键点。接下来我们会回到江东地区，去解读春秋故事中最为精彩，最具有戏剧性的“吴越春秋”了。

第二十四章 越国的势力范围与宁绍平原的海侵问题

第一节 越人以越国为历史源头并自认为大禹后人

说到“越”这个概念，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要探究“越”这个概念的地理特征，那么“山”、“海”是它的突出特征。或者说越人的分布范围是在整个东南沿海丘陵地带。至于越人最初的迁移路线，应该是自中南半岛向北迁移，最终止步于长江下游，随之与向南渗透的北方族群相碰撞。关于越人最初所建立的国家（指能够为华夏文明所承认的，具有类似组织结构的“国家”），无疑是那个吴越春秋中在勾践时期达到顶峰的“越国”。

越人开始真正融于华夏，也正是源于此。因此在后世诸多以“越”为名的政治势力一般都奉此“越”为正朔，并以它的继承人自居。由于越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丘陵地带，因此很容易被山脉分割成相互独立的族群。时间一长，这些在族源和文化上都有共通性的族群，在文化上会形成独立的各具特色的亚文化。而我们对这种亚文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各具特色的“方言”。由于分布范围广，相互之间又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因此实在是分不清它们之间区别的中原民族，笼统的将之称为“百越”。

对于百越之族来说，将自己的历史源头定位在那个曾经称霸于春秋的“越国”，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在越国被灭之后向南回迁的越人，还是在北上过程中沿途定居的越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被切断，而将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或分支作为族群共同的记忆和源头，是人类正常的心理状态。

为自己寻找一个拿得出手的出身，并非只限于春秋战国之后的百越之族。在到达长江下游的那部分越人开始接触到黄河文明，并希望与之成为一体时，这种想法就已经存在了。受华夏族的影响，如果要让自己与其他民族处在对等的地位，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华夏族的“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尽管这样做并不能消除那些来自黄土高原，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族群的歧视，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有无数的边缘民族都依这种方法先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正统的出身，然后再从文化上与华夏族融合，最终“洗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从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国家（或者说族群）来看，吴人将自己定位于与周人同源。在吴人所陈述的历史中，周人的始祖周太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太伯”

为了礼让弟弟继承君位，而南下到了吴地。这种说法让吴人自认为与周人获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楚人的野心显然要更大些，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时期。在楚人决心与周人决裂，并视周人所封“子爵”为侮辱时，他们向周人强调，黄帝的儿子“高阳氏”是楚人的直系祖先。从这个角度看，楚人的出身要比周人高贵得多。

而在楚、吴之后，也希望融入中央之国的越人很明显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黄帝级别更高的祖先了。如果将周人的始祖定位为自己共同的祖先，即使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也不可能压倒它的对手——吴人。如果再向前追溯的话，商族也是一个选择对象，不过商族那明显来自东部族群的出身并不能提升越人的身价，因此合适的对象应该再向前追溯。而开启了中央之国概念的夏人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对象了。因此那个以治水而闻名于世的“禹”成为了越人所祭祀的对象。

第二节 汉朝为加强中央向心力认可越人对大禹的追认

按照越人所描述的世系，夏代的第五代君王“少康”有一个庶出的儿子被封在钱塘江以南，也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地区，成为了越人的祖先。在夏人为商人所灭之后，越人作为大禹的直系后代，仍然延续了大禹的香火。其实楚、吴、越三国所陈述的历史即使是真实的，也最多只能证明他们的贵族阶级最初可能源自黄土高原。而基本的族群构成在当时仍然是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族群。

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在黄河文明还未能与长江文明发生碰撞，并明显占据优势时，你很难想象几个来自黄河流域的贵族到了那些“蛮夷”之地，就会被当地的部族奉为首领。不过这些说法在汉朝时期都被正式得到了认可。作为真正将长江、黄河两大文明统一在一起的王朝，汉朝在民族、文化融合上所做的工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或者说从汉朝起，整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汉文化”概念，取代了狭义的，仅涵盖出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化”概念。汉人也成为了两大文明融合后新的民族的符号。

当我们解读到汉帝国时，会涉及到汉武帝如何将浙闽丘陵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的。随着帝国疆土的南伸，怎样让浙闽丘陵归附的“越人”对中央政权产生向心力是摆在帝国决策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对于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东亚族群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为双方找到共同的祖先。因此当初越人所附会的出身于夏人之后的说法被官方正式确认了。并且为了加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帝国还需要加强那些沿海山地与帝国中心的地缘联系。具体的措施则是将无明确记载与定论的大禹下葬之地——“会稽”，考证在浙闽丘陵的最北部（也就是宁绍平原的南部）。大禹大会



浙江绍兴大禹陵（会稽山下）

诸侯之山也被命名为“会稽山”，被认定在越国故都（绍兴）的南面。而承担这项重大历史使命的就是司马迁。

毫无疑问，这种安排是成功的。由于司马迁在中国信史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大禹”成为了连接东南沿海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纽带。而这种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让黄帝陵成为黄河流域的文明符号和让大禹陵成为长江流域的文明符号，对于华夏文明内部达成地缘平衡具有重大意义。更何况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发达，出自这一地区的海外华人要明显占有绝对优势。

做这些分析，可能会让有些朋友感觉到不舒服。毕竟这会让我们现有的民族意识有一种被安排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感觉，中华文明的形成主要还是表现在文化上的。地理结构也好，人为做出的地缘结构调整也罢，都是为了让这种文化更具有凝聚力。

从这个角度看，古典时期的政治家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在历史上还有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汉朝及以前的南岳衡山是在长江之滨的（安徽省安庆市天柱山）。但到了隋朝，由于帝国的疆土持续向西南方向拓展，如果再将南岳放在长江边上，显然不足以让它的“神力”辐射至整个南疆，因此南岳的称号被现在的“衡山”所取代（湖南衡阳市）。

第三节 越人因宁绍平原成陆不稳定而在闽浙丘陵徘徊

现在让我们回到江东。在吴军的主力回到江东以后，他们所要面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越国”。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就越人的整体迁移路径来看，是由南向北逐

渐迁移的，而越国的鼎盛则是在越王勾践时期。在越王勾践那传奇的一生中，越国不但越过钱塘江进入太湖平原，而且最终在吴越争霸中笑到了最后。

就越王勾践的王都所在地，一般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是“会稽”，位置就是在现在的绍兴市。如果观察现在的地图，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越人是凭借宁绍平原所打下的农业基础，与太湖平原的吴人进行长期对抗的。而实际上宁绍平原当时的地理结构并不稳定，也就是说当时的宁绍平原大部分还是海洋或者滩涂，真正能够作为耕地的并不多。而越人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在闽浙丘陵里面徘徊。



宁绍平原地理结构图



吴楚地缘关系图

就杭州湾的地理结构而言，其实是一直不太稳定的。与长江口的不断东进不同，杭州湾更喜欢南北方向摆动。比较春秋时期与现在的海岸线我们会发现，杭州湾整体向北移了。也就是说北面太湖平原的部分土地变成了海洋，而南面的宁绍平原则向北扩大了。其实这种变化并非是单向的，宁绍平原的成

陆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反复。就宁绍平原现在的结构而言，主要是由西面的绍兴平原，以及东面的宁波平原组成的。而两大平原中间是由一条两山相夹的河谷相连接的，这条河谷中间所经过的河流叫作“姚江”，因此也被称之为姚江河谷。而姚江河谷的北面其实还有一块突出部，叫作“三北平原”（因在慈溪、余姚、镇

海三地之北而得名）。

第四节 姚江河谷的率先成陆及后又反复遭海水入侵

如果从成陆的时间来看，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宁绍平原最先成陆的是“姚江河谷”。在距今 7000 多年前，入侵至闽浙丘陵北沿的海水开始消退，由于姚江河谷北依“慈南山地”，南靠“四明山”，东西两侧又有些低山丘陵，实际是一个半封闭的盆地状态。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姚江河谷更容易淤积泥沙，因此姚江河谷也成为最先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可以提供佐证的就是长江下游最为著名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河姆渡遗址。只不过最先成陆并不代表最为稳定，在距今约 5300 年前河姆渡文明消失了，而它消失的原因是因为海水的又一次入侵。



姚江河谷地理结构图

其实对于水患的危险，古人是一直是比较忧虑的，因此在上古乃至古典时期，最好的居住地都是依山傍水。也因此河流边上的台地，总是能够成为人类最安全的居住地。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本来也是这样选择的，河姆渡的位置正是位于四明山的北麓。只不过这一次海水上涨的高度已经吞噬了他们大部分的耕地，因此南退浙闽丘陵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关于海洋对于姚江河谷的威胁，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到 1959 年，姚江都还是一条潮沙河。连续晴个几十天，河水的水量一小，海水就倒灌进入河道，虽然还不至于像上古那样淹没整个河谷，但两岸土地的盐碱化却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让大禹来治理这种类型的水患，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堵或者疏都不能完全将问题解决。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安装活动水闸，在河水量大的时候开闸，而在海水开始倒灌前闭闸。

所以说人类并非不能影响地理结构，只不过这种影响力实施起来要非常慎重。就像姚河海水倒灌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水流也由此变缓，海水的冲刷作用也没有了，河道所沉积的泥沙已经让河床越抬越高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开始为能够用筑坝的方法，防止黄河水患而沾沾自喜时，黄河河道越积越高的泥沙已经在为后来的决堤改道而蓄积能量了。



浙江省姚江

关于河姆渡人究竟是属于东夷体系还是越人的一员，一直都有些争议。如果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河姆渡文化与山东丘陵乃至辽河平原的新石器文化都有关联。但从地理位置来看，也很难说与越人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前面也已经分析过了，夷越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同源的。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分化的，依靠现有的考古证据还很难得出结论。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越人显然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族群。而当越人进入中央之国的视线时，无论他们在此之前是否尝试过进入宁绍平原，山地民族的属性已经印在了越人的身上了。

第五节 杭州湾造成宁绍平原的海侵并使越人留在浙闽丘陵

我们可以来看看《越国迁移图线图》，通过这张图上所标示的越国都城的迁移路线，我们会发现越人其实早在约 3900 年前就已经到达了宁绍平原的边缘了（公元前 1888 年立国），并建都在今绍兴市南的花街城（时称“望南”）。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宁绍平原扎下根来，在后来又向南回迁，直至春秋之时才开始复而北迁。而吴国按照历史记载来看，是从“太伯奔吴”时期开始立国的。这位太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是周文王的伯父，为了让位于弟弟才跑到太湖平原自力更生的。



越国迁移路线图 (至越王勾践止)



钱塘江口——杭州湾历史变迁图

尽管吴人认定自己与周人同出一脉并不十分让人信服，但按照东亚民族的习惯来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般都是尽量往早了说。因此吴人最终得以在太湖平原成为政治力量的时间，应该与西周灭商的时间差不多。或者说略早一点，具体时间应该在公元前 11 世纪初。如果按照吴越两国立国的时间来看，越人实际上比吴人更有机会占据整个江东地区，成为整个江东平原的主人的（包

括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而让人费解的是,越人在比吴人早差不多 900 年,就已经迁移到江东平原的边缘了,是什么原因让越人止步于此,放弃了那些本应该更具有吸引力的冲积平原呢?

让越人最终还是决定留在浙闽丘陵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水。通过河姆渡文明的兴废我们可以得知，整个宁绍平原其实一直在受到海侵的困扰，造成这种情况与杭州湾的特殊结构有关。如果观察中国的海岸线，会发现杭州湾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海湾。尽管在很多江河的入海口都会有一个喇叭型的湾口，但杭州湾的体量却与钱塘江的水量不成正比，已经和长江的入海口处于同一级别了。

也就是说，靠钱塘江的水量和输沙量并不足以形成如此巨大的海湾。如果再对



长江口和杭州湾卫星图

是说是说算是长江的一段，而杭州湾则是一个三角形的海湾了。

如果说长江口的变迁是由于长江在起主要作用，相信没有人会觉得有问题。但如果说杭州湾的形成也是因为长江，恐怕很多人就不清楚了。实际上长江三角洲（杭州湾以北，长江以南的陆地）的形成基本上靠的就是长江所带来的泥沙，即使是在现在，长江入海的泥沙还在随着洋流向南输入杭州湾。但长江三角洲在不断向东成陆的同时，并没有持续向南扩张，与浙闽丘陵连成一片，而是留下了杭州湾这样一个巨大的喇叭口。

第六节 杭州湾海潮破坏湾内泥沙成陆和侵蚀两岸平原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对比春秋时期与现在的海岸线，我们会发现杭嘉湖平原在春秋时的面积甚至要大于现在，也就是说经过 2000 多年的冲积，杭州湾北岸的土地反而减少了。这并不代表杭州湾的面积有多大变化，因为南面宁绍平原面积反过来有所增长了。一进一出，造成了整个杭州湾向北移动的感觉。杭州湾之所以在历史中一直保持喇叭口的形态，应该说是在长江与浙闽丘陵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比一下长江口与杭州湾的情况，我们还会发现有两个方面明显不同：一是长江口其实一直是在东移的，或者说长江所带的泥水在遇到海洋的阻力后，不断在江口沉积下来，让长江口的海岸线也随之向东延伸。而杭州湾的情况就比较奇怪了，它的整个形状在几千年来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在不断的北移；另一个不同就是，长江那个喇叭状的人海口中不断的在形成沙洲（现在主体已经成了崇明岛了），并且水质基本为淡水，也就



吴楚地缘关系图



钱塘江潮

在长江的泥沙不断向东南方向淤积形成现在长江三角洲的雏形，并与浙闽丘陵包夹而成杭州湾之后，泥沙再想沉积下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这主要是因为杭州湾东宽西窄的喇叭形构造，使得海水潮汐的力度被放大了。这些奔涌的潮水除了在涨潮时形成壮观的“钱塘潮”以外，在退潮时也同样会破坏湾底泥沙的稳定结构，使之无法淤积成陆。非旦如此，潮水也会对杭州湾两岸（特别是北岸）已经固定住

的滩涂造成影响。杭嘉湖平原以及宁绍平原中的“绍兴——三北”两大平原由于位于喇叭口的内侧，受害力度也是最大的，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造成陆地崩坍现象，杭嘉湖平原的北退就是最明显的变化。

对于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古人当然也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在海水水位低的时候，构筑堤坝以防止海水的再一次入侵（古人称这种防潮堤为“海塘”）。这种类似于荷兰人围湖造田的工程最早开始于宋帝国迁都杭州之后。帝国政治中心的南迁，使得工程能够得到足够人力、物资支持。由于杭州湾两岸的平原在南宋以后，日益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因此杭州湾的地理结构在人力的干预下也日趋稳定了。

实际上，如果钱塘江的水量和输沙量足够大的话，杭州湾应该早就被填平了。只可惜它的水量既不足以将海水挤出杭州湾，输沙量也不足够顶住海水退潮时的力量，所以也就只能以举世罕见的壮丽钱塘潮来聊以自慰了。杭州湾的不稳定状态对于北部的杭嘉湖平原，以及南部的宁绍平原都有很大影响。相对而言，南北纵深较

小的宁绍平原所受的影响会更大。



钱塘江海塘

对于受到海侵困扰的土地，即使是海水退却之后露出陆地，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用于耕种的。首先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河流冲刷，让土地的盐碱度降低。不过如果想靠河流将那些滩涂自然改变成耕地，需要更长的时间。当越人在浙闽丘陵北沿立国时，他们所面对的宁绍平原其实还是一片湿地（北部还是浅海）。如果不想办法将水排干，越人除了能在里面打些鱼以外，并不能够收获到粮食。

对于当时的越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治理水患的经验。这并非说浙闽丘陵里的那些河流就不会出现洪灾，只是越人会将居住地建在高地上，以避免受到水患的困扰。因此尽管越人很早就有机会进入宁绍平原，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越人的主体还是选择在浙闽丘陵徘徊。

第七节 越人在吴人开发苏锡常平原后亦进入杭嘉湖平原

如果说宁绍平原当时因为海侵的原因，阻止了越人的北迁的话，那么太湖平原的情况应该要好些了。由于太湖平原的体量较大，最起码太湖周边地区应该不会再受到海水的困扰了。不过我们之前对太湖的情况也分析过了，太湖之水在寻找入海通道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样让周边的平原处在不稳定状态。因此早期迁居其上的部族都比较分散，且力量薄弱。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前 11 世纪，吴人的到来之后才有所改观。

尽管吴人后来的基本构成，应该还是以先期从浙闽丘陵上零星渗入的越人为主，

但他们最初的来源应该还是来自于江淮地区的东夷部族（这在太伯奔吴的传说中也可见）。从安徽境内穿越江淮丘陵后渡江进入江东地区，是吴国先人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而大禹治水对于淮河流域的这些“夷”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这些在江淮平原已经掌握了平原治水技术的部族，在东渡长江之后，逐渐对太湖的水道进行了疏通。将那些对于越人来说只能打渔的湿地，变为了大片的耕地。并最终“吴国”的形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由于吴国是从江淮丘陵渡江的，因此在穿越江东丘陵后，他们最先到达的是苏锡常平原，也就是太湖的东、北面，这里也成为了吴人的地缘中心。对于吴人来说，太湖南面的杭嘉湖平原并非不是进行地缘扩张的方向。只不过当他们在苏锡常平原干得有声有色时，浙闽丘陵上的越人也已经从吴人的开发中意识到，这些湿地其实是可以为越人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在一个能够交流的空间中，技术优势并不会一直保持下去）。因此越人也决定向太湖平原进发，而最先进入越人视线的就是杭嘉湖平原。最先进行这项工作的并非我们所熟悉的越王勾践，而是他的父亲——允常。

第八节 越国与楚国以黄山山脉一带为地缘分割线

就“越人”和“越国”这两个概念而言，其实也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应该说广义的“越人”是由南至北广泛分布在东南沿海丘陵之中，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越国”之人，在当时被称之为“于越”，应该是迁移得距离最远的。能够占据浙闽丘陵的北部，也让他们有机会与来自长江以北的族群接触，并接受新的文化。从地缘的角度看，有机会处在不同文明交汇点的族群，总是比封闭的族群要拥有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当你能够与更为先进的文化体系相接触时。因此“于越”在越人当中最先组建了中央之国所认可的“国家”，并在之后被认可成为了整个百越体系的源头。（如果不加以说明，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段的叙述中所指的“越人”就是“于越”，或者说“越国”之人。）



吴越地缘结构图

就浙闽丘陵这个概念而言，主要是对分布于浙江、福建两省境内的山地丘陵的总称。而越国则主要占据了它的北部，至于南部还是存在一些同属越人体系的部族。在越国强大之后，这些部族事实上也都臣服于越国了。如果细分浙闽丘陵北部的地理结构，由西至东分别是天目山、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这些山脉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与江东平原对接，因此也成为越人控制的核心区域。这其中除了天目山对接太湖平原以外，其余四山所对接的都是宁绍平原。因此天目山北也就成

为了吴、越的接触点之一。在天目山最北端与太湖相接的地方，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山体叫作“莫干山”，也就是干将莫邪当年为吴王铸剑之地。

在越人强大的时候，他们也在向西扩张。天目山以西的黄山山脉虽然在地理结构中被划入“江南丘陵”，但是对于习惯于在山地中迁移的越人来说，这些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当他们穿越黄山山脉，向西南方向进入赣江——长江三角洲时（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鄱阳湖），那里也尚未形成稳定的大片平原，或者说湿地仍然是赣江——长江三角洲的主体。在越人开始有信心和实力开发这些湿地时，他们发现江汉平原的楚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未来的鄱阳湖地区。不过楚人控制赣北，主要是为了取得对江东平原的水上优势。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要想获取更多的耕地，江淮地区有大片更成熟的平原等待他们去渗透。因此楚人并没有像吴人经营江东平原那样，将赣江——长江三角洲打造成为主要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真正的开发要到汉代了）。



吴楚地缘结构图

既然楚人控制赣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那么他们对于东面的那些山地丘陵更不会有什么兴趣了。最终越人与楚人的地缘平衡线就是以江西东北部的那些山脉丘陵为线（主要为黄山山脉）。也就是说，楚人主要控制低地，以为他们的水上力量提供基地；越人则控制山地丘陵。事实上楚、越两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也不愿意打破这种平衡。因为对于双方来说，太湖平原上的吴人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越人所占据的浙闽丘陵是大片的平原，也许已经直接接触的楚、越两国本身也

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地缘冲突。而现在的地理结构，双方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因此楚、越两国的地缘关系，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越国占据了整个江东平原，并有意参与中原争霸后才被打破。

尽管越人在高峰时期控制了浙闽丘陵北部，以及黄山山脉地区，但他们的政治核心区还是在绍兴平原以南的龙门山——会稽山之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越国国都的迁移路线中看出，在越国长达 1400 年的时间中（计算到越王勾践迁都会稽时止），一共迁了八次都，而都城的地点实际上都是在龙门山——会稽山之间变换。而最终越人最终所选择的突破点，也就是在两山之北的“绍兴平原”之上。

关于绍兴平原为什么会成为越人的“龙兴”之地，在随后的内容中会继续解读。需要说明的是，“龙门山”与“会稽山”之名并不能用来证明越国的核心区就是大禹治水以及会盟的地方。只能说是越人既然选择了做大禹的子孙，那么用大禹生平最重要的两个地标来命名自己的两条“龙脉”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越国迁移路线图（至越王勾践止）

第二十五章 吴越两国爆发携李之战和夫椒之战

第一节 吴国在柏举之战前对越国的携李发起进攻

我们已经分析了越人开始强大时所控制的地区。如果从地理单元上来看，这些地区主要包括浙闽丘陵的北部、尚未完全成陆的宁绍平原，以及杭嘉湖平原的大部。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越人的主要控制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而在越人与楚人达成联盟后，他们也加强了对于黄山山脉的渗透（安徽东南，江西西北部），以从陆地上配合楚人封堵吴人。

至于越人开始从山上下来，大规模进入太湖平原的时间，则是在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做越王的时候。允常使得越国走向地缘扩张之路的时候，吴人也正式开始进入他们的黄金期。而这时的吴王就是那个将楚人伍子胥、齐人孙武收为己用的“阖闾”。在越人进入杭嘉湖平原，并希望进一步向北扩张生存空间的时候，吴人通过经营苏锡常平原，也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进行扩张。吴国甚至为他们即将进行了三场战争（楚、越、齐）进行了战略规划。

在分析吴王阖闾领导的吴楚“柏举之战”时，我们曾经说到，如果排定顺序的话，吴国其实应该先行解决掉越国，统一江东之后再与楚人争夺江、淮地区的控制权的。当然，毕其功于一役，先战胜最强的敌人以震慑其他对手，也是一种战术。只不过这种战术的风险较大，如果不是碰到一个有野心的君主和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参谋，吴楚之间的决战应该会在吴越 PK 之后进行的。尽管吴王选择了将楚国作为主攻的目标，但也并不表示他就真的放心把大后方置于越人的威胁之下。因此吴国在柏举之战之前，除了派遣小股部队不断的骚扰楚国在江、淮流域的军事要地外。吴军的主力在公元前 510 年（也就是“柏举之战”前四年）对越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也正是这场战役正式拉开了吴越争霸的序幕。

如果吴人愿意，他们可以选择从太湖的西侧，透过江东丘陵往南，向天目山方向发起进攻。只不过吴人真的选择这条攻击路线的话，那才正中越人的下怀。长期生活在山地之中的越人，在山地战中凭借少量的军队也足以拖垮吴军。这并非是说吴军就不能进行山地战了，事实上吴国的陆军也是以步军为主，而吴人的来源很大一部也是与越人同源的。

在柏举之战中，吴军之所以要将决战的地点选择在大别山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挥自己的步兵的长处。因为楚军长期在中原以及江淮平原征战，战车的比

例要远高于吴军。所以将之拖入地形复杂的山地之中，让其无法充分发挥快速机动的作用，战争的天平自然就向吴军倾斜了。只不过所有的优势都是相对的，与习惯了车战的楚军相比，吴国的陆军在山地当中固然能够讨得便宜，但与那些“山越”之民相比，吴军就没有优势可言了。

其实对于吴军来说，并没有必要越过天目山、钱塘江、龙门山，然后去攻击越国在龙门山与会稽山之间的核心地区。因为对于习惯了平原生活的吴人来说，这些山地并没有多少价值，他们的战略目的只是将越人赶出太湖平原。如果越人肯就此回到那些山地丘陵之中，去过他们原来过的那种“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吴人其实是不会介意浙闽丘陵姓“越”还是姓“吴”的。因此吴人选择的攻击目标是越人在太湖以南，杭嘉湖平原中的重要据点——携李。



吴越地缘结构图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这个叫携李的越国边境重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西南。而嘉兴也常常被当作吴越之间的分割点。吴国的这次进攻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并不

让人意外。在太湖平原经营多年的吴人，显然比从山上下来不久的越人，更习惯于在河流纵横的平原地区作战。更何况作为主动进攻方的吴人，已经为军事扩张做足了准备。在发动正式进攻之前，吴人曾经作过一次政治努力，就是希望越国跟随他们一起进攻楚国。不过越人的心中自然清楚，如果楚国灭了，吴国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越国。

而由于吴国占据了太湖平原的北部，以及江东丘陵，越人唯一能够与之联系，并引之为外援的大国，就只剩下楚国了。因此越国并没有答应吴国的要求，而吴人其实也并没有奢望越国能够提供一支生力军。这次政治努力只是为了让自己随后的战争行为，作个铺垫或者找个理由罢了。如果吴人愿意，在占据携李之后他们可以选择继续追击，并寻机与撤退后的越军主力决战。不过按照既定的作战顺序，楚国才是下一步的主战方向，占据携李只是为了暂时消除越人在后方的威胁。因此吴军在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并没有再花力气扩大战果。而四年之后，吴军在正式攻楚之后，在战术上亦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第二节 越王勾践击败第二次进攻携李的吴军

在对楚战争取得胜利后，吴国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越国身上了。只不过越国并不愿意再一次坐等吴军打上门来。在柏举之战后第二年，越人乘吴军主力还在楚地，而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只不过，吴军主力回防的速度出乎越人的意料，这很大程度要得益于淮河所提供的交通便利。顺流而下的吴军，要比之前节省最少一半的行军时间。如果吴军是败退回来的，越人的这次报复行动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战果。只可惜，当时的吴军由于战胜了让人闻之色变的楚军，又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正处在军事实力的顶峰。这种时候与其开战，赢面是非常小的。结果不出意外，吴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越国在吴军主力尚未回师江东的情况下，主动对吴国发起了攻击。这次攻击的背后其实亦有楚国的影子，无论是对于已经受到重击的楚国，还是即将受到打击的越国来说，吴国的强大都是一件让人如梗在喉的事情。越王允常领导这次的进攻，以吴军主力迅速回师的情况下以失败而告终。差不多十年后（公元前 496 年）吴国又对越国发动了一次进攻。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越王允常死了，而继位的越王就是勾践。

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还是在吴越交界之处的“携李”。如果从实力对比上来看，越国的胜算其实是很小的。已经拥有苏锡常平原和半数江淮平原的吴国，显然比刚

在杭嘉湖平原站住脚跟的越人，要拥有更多的人口及物资储备。不过就具体的战役而言，拥有更强实力的一方往往并不当然就是胜利者，否则大家只要找个公证人，评估一下双方的战力就裁判胜负好了。如果战术得当，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案例，在战争史上也并不鲜见。越国的新王勾践就完成了这样一次经典案例，只是他用的方法实在有些过于离奇，以至于在今后的历史中无人仿效。

这个方法就是让数千敢死之士排好队列走到吴国的军阵面前，然后集体自杀。这种“自残”以震慑对手的做法，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纵使你的心理素质再好，当你知道面对的是一群敢死之士时，也很难不乱阵脚。尽管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在后世已经没有在战争中运用了，但在一些街头争斗或者更有组织的黑社会对决中，还是屡有运用的。比如自己扎个三刀六洞，或者弄块火炭放在身上，看对手敢不敢学，不敢做的一方就算是输了。更夸张的做法也有，割块自己的肉就烛火烤了吃的事也是有的。越国这种以命相搏的战术，的确让越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出奇致胜，而吴王“阖闾”受伤之后不治而亡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这个收获在我们看来可能微不足道，那就是一个大脚拇趾。

只是这个大脚拇趾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如日中天的吴王“阖闾”。阖闾所受之伤在今人看来，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会让他走路的时候有点跛，但对于一个“王”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问题是在春秋之时，那些名医还只能用一些动植物的某个特殊部位，或者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矿物来治病疗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而在南方湿热的气候下，这些天然药物却很难有效的阻止伤口发炎并引发败血症。因此在青霉素尚未被发现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一点小伤都有可能使你失去生命。并非说不存在幸运儿，只是这位让吴国开始强大的“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携李之战的失败，以及“阖闾”的死，使得吴国不得不全面退回苏锡常平原。在他们的新王，也就是“夫差”与他的臣民在磨合好之前，地缘实力仍然占优的吴国暂时不会发起新的进攻了。

第三节 越国未选择吴淞江而决定从太湖进攻吴国

吴国虽然不进攻越国，但战争的进程并不是由单方决定的，吴人可以乘越人王位交替时发动进攻，越人自然也可以在吴王夫差立足未稳时发动反攻。即使没有两个先王之间的恩怨，太湖平原半封闭的地缘结构，也不可能允许两股地缘势力同时存在，最大的不同不过是在于是谁先发动进攻罢了。



吴楚地缘关系图



吴淞江

州河”。

由于上海的逐渐成陆，以及河道本身的淤塞，现在的苏州河平均河宽约只有40 ~ 50 米了。苏州河不能有效的将太湖之水引入江海的情况，在明朝时期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因此在当时开挖疏通了一条新的河流——黄浦江，承担了引湖水入长江口再入东海的主要任务。而已经变成一条小河浜的苏州河变成了黄浦江的一条

就以往吴越之间的战争而言，杭嘉湖平原基本都是主战场，或者说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苏锡常平原上的吴国手中。而这一次，挟“携李之战”胜利的余威，越王勾践希望就此攻入吴国的腹地，以成为整个太湖平原的主人。只不过当越人准备向吴人主动发起进攻时，如果他们想真正战胜吴人，就必须熟悉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水战”了。之所有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与吴国的地理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分析过，在太湖水向东排入东海的过程中，有一条叫作“吴淞江”的河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条连通太湖与东海的河流，也被叫作“松江”、“吴淞江”，而它流经上海的部分也被称之为“苏州河”。

支流，原先的出口——吴淞口也成了黄浦江的入江通道。好在名字还未曾变成“黄浦口”，让人们依稀记得吴淞江当年才是太湖流域的第一大江。

吴淞江在春秋时期及至后来近千年中，其实是很宽的一条河流。最宽的地点甚至超过10公里，以至于海潮过大，雨水过少时，它甚至会将海水导引入太湖造成灾害。因此吴淞江两岸本身在春秋时期并不稳定，特别是在南岸经常是一片湿地。如此宽广的江面，以及两岸的湿地，让这条横贯太湖——东海的大江，在春秋时期成为北面苏锡常平原的吴人天然的防线。在携李之战中战败的吴人，最终也正是退守到了吴淞江的北面，以稳定国内形势，积蓄力量以备再战。

如果越国准备从水上进攻吴国，它可以选择从太湖南岸出发，然后向东北方向进攻苏锡常平原；也可以选择在合适的地点渡过吴淞江，然后与吴军在陆地上决战。后者似乎更简单些，因为江面再宽，也不会比太湖的纵深大。越国如果是想与吴国决战于陆地，这条路线能够让他们减少行军的时间。只是越人最后还是选择了前者，原因有二：一是吴国的地缘特点就是河流湖泊众多，并且在吴人的治理之下（特别是伍子胥到来之后），吴国已经在苏锡常平原打造出网状的水面交通网。吴人甚至能够从水上将自己的影响力幅射至淮河乃至黄河流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水上力量，想要在吴国的腹地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越国如果能够控制住太湖的水权，他们就可以向东、北方向任意攻击吴人在苏锡常平原的沿湖据点（特别是吴国的都城），并最终控制住整个苏锡常平原。基于上述原因，从浙闽丘陵上下来不久的越人，准备在太湖之中与吴国的水军决一死战了。我们并不能因为越国的核心区一直是在浙闽丘陵的腹地，就认为越人不善舟楫。其实从整体上来看，一直沿东南沿海丘陵迁移的越人，有不少是生活在海边以捕鱼为生的。这使得越国能够招募到足够数量的水手，并打造出漂亮的战船。

第四节 越国水军意图先攻取太湖中的洞庭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太湖南岸出发的越人，会在哪里与吴国的水军遭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太湖的地图，会发现在太湖的东南角有两个体量较大的岛屿。这两个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的岛屿被称之为“西山岛”与“东山岛”。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习惯于将之称为“西山”、“东山”。这两座露出水面的“山”又被全称为“洞庭山”，在春秋时的名字为“夫椒”。

就“洞庭”的名字而言，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它其中的含义，不过对于“夫椒”



太湖地图



太湖东山岛

这类的名词，我们就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它的意义了。事实上它与“姑苏”、“无锡”一类的词一样，都是由古代吴语的发音音译过来的。至于究竟是什么含义，就要靠语言学家去探究了。但将“姑苏”引申出一个有关“姑娘”或“姑姑”的故事；“无锡”变化出一个曾经的锡矿来，都属于附会之言了。可以确定的是，在越人进攻之前，“夫椒”或者说整个太湖的控制权是在吴国的控制之下的。越人能够在太湖南岸依托杭嘉湖平原打造

水军，并不代表他们就能随意驰骋在太湖之中。要想做这一点，东、西两山是必须争夺的战略要点。

有了这两个大岛为依托的话，越国的水军最起码有把握控制住太湖的南部水域。更为重要的是，越国如果以夫椒为跳板，向东攻击前进并登陆的话，将很快到达吴国的都城——吴都（又称“阖闾大城”，现在苏州市区内）。关于西山和东山两岛，现在是太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号称有 72 峰。只不过这些所谓“山峰”海拔其实也不过二、三百米，这种高度其实也就勉强称得上是丘陵。如果你是来自真正的山地，包括浙闽丘陵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可能对此会不以为然。但这些“奇峰”对于生活



太湖西山岛缥缈峰

在太湖平原的居民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景了。

我并不能十分确定，出生于杭嘉湖平原南部的金庸先生（浙江海宁），在他年少之时有没有去过太湖游玩。但《天龙八部》中的“缥缈峰”（地处西山，位列太湖 72 峰之首，海拔 337 米）、“天山 36 洞”，以及“72 岛”

的构思应该就是来源于此。身为越人的金庸老先生，甚至还将他的处女作命名为《越女剑》。可见地理环境不仅对于一个族群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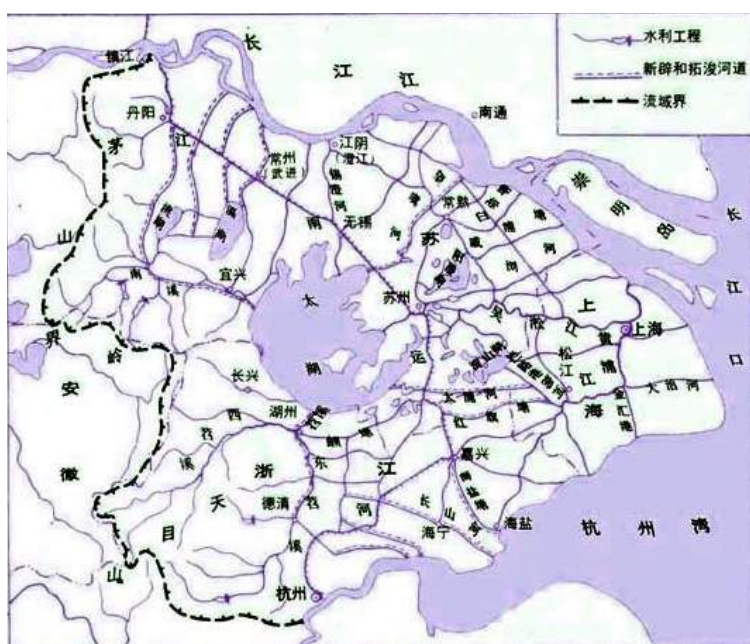
应该说越人选择从水路攻击太湖的东、西两山，在战术上并没有错误。因为以越国的地缘实力来看，如果与吴国进行长期拉锯的话，是很难占到便宜的。所以越国必须选择一条攻击线路，能够一战而胜。而越国倾力打造的水军，如果能够取得太湖的控制权，则可以直接进攻吴国的核心——吴都。

第五节 吴都通过胥江连接太湖并接入长江

为越国水军提供进攻吴都路线的，恰恰是那位帮助吴国战胜楚国的伍子胥。在得到吴王阖闾器重后，伍子胥首先为吴国打造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水运系统。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工程就是建造水陆两栖的“阖闾大城”——吴都。之前我们已经对这座都城的特点作过些许解读，那就是通过水路可以到达城内的任何一个地点。并且每一个城门都是水陆并列，与外面的河道相通。

为了让吴人能够通过水路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吴人在吴都之外的江东地区还疏通了不少水道，这其中就有为攻楚而准备的“胥溪”。我们在“柏举之战”中已经解读过了，这是一条东西向连接长江与太湖，带有人工疏导性质的河流。其实整个太湖流域的水系大都带有人工的痕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能在太湖平原看到许多横平竖直的河道的原因。

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太湖水系，已经是二千年来多少代人不间断改造的结果了。当年吴人所疏导的那些河道很多在路线上也会有些变化，甚至变换了很多名字。



太湖水系图



吴越夫椒之战示意图

除了胥溪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条可以溯源到春秋时期的河流，那就是“胥江”。如果说胥溪是用来连接太湖与长江（东西向）的水道，那么“胥江”就是用来连接吴都与太湖的水道。相比于其他与苏锡常平原腹地沟通的水网，能够连接太湖乃至长江的“胥江”无疑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

如果楚国最终能够攻破吴都，那么他们的水军在顺长江而下，再经由胥溪——太湖——胥江后就能够直抵吴人的心脏了。当然，吴人最初设计这条线路决不是敌人准备的。只不过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同样的线路你用得，

你的对手也一样用得。不过在柏举之战后，楚国水军顺江而下的报复行动已经被吴人击破了。楚人在损失了两位统帅以及七名贵族之后，甚至被迫将都城北迁至汉江通道中去了（郢都，今宜城）。问题是吴人的对手并非只有楚人，相比于核心区远在江汉平原的楚人而言，已经控制了杭嘉湖平原的越人更具有地缘上的优势。

也就是说越王勾践这次先发制人的水上军事行动，比之楚国水军而言，成功的概率要更高些（上一次楚人还没有机会攻击到太湖）。如果越国能够如愿占据“夫椒”这个战略要点的话，不仅能够获得太湖地区的水面优势，也相当于打开了吴都的门户。即使不能够一鼓作气顺胥江而下攻入吴都，也可以对吴人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越人甚至可以以东、西两山（岛）为基地，在楚国水军的下一次进攻之时以为后应。而丧失了太湖水权的吴人，即使能够守住胥江不失，也无法保住苏锡常平原与太湖相接的漫长岸线不失。

第六节 越国在夫椒之战中落败并被吴国乘胜攻入核心区

现在看来，“夫椒”确实是吴越两国争夺太湖乃至太湖平原的“天王山”。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史书中已经记载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越人完败。吴军在取得太湖水战胜利之后，乘胜进入杭嘉湖平原，并最终越过钱塘江攻入绍兴平原。而勾践带着最后剩下的 5000 甲士在困守会稽山后乞降，从此开始了“卧薪尝胆”的艰苦历程。

吴人之所以没有像上次“携李之战”那样放越人一马，是因为按照既定战略，在对楚战争胜利后的攻击目标就是越国。对于志在江北的吴人来说，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的。而勾践之所以急于发动进攻，也正是获知夫差已经做好了攻越的准备，而希望先发制人，出奇制胜。

越国的水军在“夫椒之战”中落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太湖大部以及夫椒本身是在吴军的控制之下，吴军占有地利。更何况在当时吴人使用舟楫的能力，要强于刚从山地之上下来的越人；二是越人低估了吴人在苏锡常平原打造水面交通系统的战略意义。吴人可以通过这个水网将人员和物资迅速集中到吴都中，再通过胥江运至太湖。而越人的核心地区在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的交界处，如果要想为太湖前线提供支援的话，即使拥有和吴人一样的内交通系统，在地理距离上也吃亏不少。更何况当时的越国还没有时间和精力在杭嘉湖平原上，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水利体系。

越国在战败之后的命运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越人之所以翻盘成功，则一直被归结于夫差的妇人之仁上。当然这其中也穿插了“贿赂”与“奸臣”这种亡国的必须“要素”。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吴、越两国的地缘背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研究吴越两国的地缘属性我们会发现，核心地区在苏锡常平原的吴国，固然得平原水利之便，更具有战争的潜力。但系出浙闽丘陵的越人，却是很难被完全征服的。如果吴人希望完全征服散布于浙闽丘陵的越人的话，势必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山地战。即使取得胜利，那些山地丘陵对于吴人来说也没有多大价值。

而要是吴人满足于占领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放弃对山地之中残存的越人进行清剿，这些失去政权约束的越国遗民势必会不时的袭扰平原之上的吴人。就像后世蒙古高原上，那些定期南下“打草谷”的游牧民族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一个被吴国控制的“越国”，让其约束浙闽丘陵之上那些部族，比从肉体上消灭勾践，让那些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越人为害吴人的后方要有利得多。这种做法与 2000 多年后，

西安事变后延安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吴人所面临的局面，从《史记》中的记载中看出些端倪来。当时勾践派人乞降时的原话是“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我们也可以理解夫差留下勾践，是遵循“灭国不灭祀”的优良传统。不过正像我们在之前所分析过的那样，所谓的“灭国不灭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战国之前，诸侯分割得太细。很多时候一个诸侯国虽然有实力攻占一方的国都，但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来统治对方的人民，更何况其余的大国不愿意坐视一国随意坐大，经常会加以干涉。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无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尊重”传统的原因，越国作为一个“国家”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就像日后绝大部分的战败国那样，领土的损失再所难免。

吴国可以保留一个依附于自己的政权（按现在的话就是“伪政权”），但也不会傻到让它保存原有的战争潜力。越国的疆域被限定在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交界之处，钱塘江成为了吴越新的分割线。换句话说也就是，越国丧失了他们在杭嘉湖平原的纵深，并且不再控制能够对江东丘陵及杭嘉湖平原构成威胁的“黄山山脉”、“天目山脉”。按史书的说法就是从一个“千里之国”锐减为一个“百里之国”。而为了进一步控制越国，越王勾践以及大批越国贵族被留在了吴都为质（在经过数年观察，感觉越人已经“真心”臣服后，基本上都被放回越国了）。

如果越国一直保持现有的规模，而吴国本身又不出现大问题的话，即使勾践最终被放归回缩小版的越国，越人也很难反攻倒算成功。就算勾践再能招募到数千死士，也无法与占据整个太湖平原的吴国打一场新的战争。问题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两点都发生了变化。在接下来的解读中，我们将会把视线转回到吴国身上，去看看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吴国，又将地缘扩张的目标定向何方，而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对

于地缘结构，以及吴越两国的命运又有何种影响。

第二十六章 吴国北上伐齐和进入中原争霸

第一节 吴国决定从海上沿海岸线北上攻击齐国

在夫差自认为解决了越国的问题之后，吴国需要向北方扩张了。实际上对于已经自认为是中央之国一员的吴、楚两国来说，与长江流域的竞争对手互搏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果你不能让那些河、济之滨的诸侯国认可自己实力的话，这些江淮大国即使能够为自己找到更高一级的华夏先祖，也仍然无法洗脱自己蛮夷的身份。基于这个原因，也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经常会看到，楚人在中原的西线与晋人争斗不休。

而现在吴国已经成为江、淮地区的老大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吴国将东线开辟为了主战场，PK的对象则是山东半岛上的齐国。经过我们之前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吴国的日常生活乃至军事行动严重依赖水运。也就是说，水道延伸之处，都有可能是吴人扩张的方向。但问题是，在中央之国目前的版图上，江、河、淮、济这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能够将东西向的地理单元串接在一起，却没有一条河流能够从南北向将这四渚连接起来。

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国西高东低的整体地势，决定了自西向东的河流是主流，而那些南北向的河流由于水量的问题，在自然竞争的情况下，只可能作为东西向河流的支流。看来吴国人如果想向中原及更远的纵深扩张的话，打造一条南北向的河道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了。不过将主攻目标选定为齐国的吴军，暂时还不用面对这样的烦恼，因为他们有一条天然的水上路线可以直接攻击齐国，那就是“海路”。吴军对于海上航线的使用并不陌生，在之前的“柏举之战”中，从吴都出发的舰队就是从吴淞江东向入海，然后沿海岸线北上进入淮河河口，并最终溯淮河而上攻击楚国信阳通道的。

只是与上一次借道海路入淮有所不同，吴国的这次伐齐是一次纯粹的海上军事行动。在以往的战役中，吴国的水军虽然在淮河、长江、太湖中称霸一时，但内河航行与作战的经验并不一定就完全适用于海上。在海上航行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气候的影响，相比于内河航道，海上的风暴常常能够使得整支舰队葬身海底。这种危险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典时期，其实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蒙古人对日本的两次远征。无论蒙古人在陆地上有多么强悍，所谓的“神风”却可以让他们尚未与敌军主力接战就损失大半。



砂质海岸



基岩海岸

为了最大限度的规避这些风暴所带来的危险，古典时期的水手们除了凭借经验尽量选择风平浪静的日子出发外，其次就是沿海岸航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即使船只沉没，你获救的机会也会更大些。对于海上的航行者来说，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补给问题。尽管从地图上看，海岸线上的每一个点似乎都能够成为停靠的地点。但事实上由于地形的的问题，很多海岸线都还是慢慢没入水中的滩涂沙地，并不适合船只靠岸。

相比之下，那些沿岸多山的地形，却能够成为天然良港¹（其中原因，在江南省一节中已经分析过了）。基于上述原因，吴军的这次行动其实是非常冒

险的。即使能够凭借水手的经验避开风暴来袭的时间，但江淮地区漫长的海岸线也因为港口的缺失，而缺乏足够的补给地（基本上相当于现在江苏省的海岸线）。另外，无论是经营太湖平原还是江淮地区，吴人的水上经验更多的是限于内河航道。这使得他们面对真正的海战时，并不能像之前那样应付自如。

第二节 吴国水军在与齐军的海战中失败

无论要面临多少困难，自认为已经对楚、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夫差还是决定出发了。吴国水军（其实可以叫“海军”了）最有可能的路线还是东出吴淞江（松江），然后北上经过长江口，沿海岸线北行到达山东半岛。另一种可能性是通过运河由太

¹ 存在山地的海岸，也就是基岩海岸，在建立港口上的有利条件：一是岸坡陡峭，有一定的航道深度，利于停泊船只；二是岸线曲折、湾岬相间，利于躲僻风浪。



吴·北伐争霸示意图

湖的北端经镇江进入长江，然后再沿着长江口的北沿东行，到达东海后再折向北，最终逼近山东半岛。这条路线的关键在于，连接太湖（无锡地区）与长江（镇江）的运河有没有开通。这段运河后来成为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江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出海，吴国水军北上的路线是不会有变化的，那就是沿着着现在江苏省的海岸线北行，在行至连云港（当时还是岛屿）时转向东，向五莲山脉以东的齐国逼近。当吴国的水军逼近胶州湾（现青岛港所在地）的时候，他们将要遇到齐国水军的阻击了。在齐鲁部分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齐国的核心控制区在泰沂山脉——五莲山脉东北。齐国人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沿着山脉分割线修筑了一道长城以自守。不过对于齐国来说，最大的对手是来自于泰沂山脉南侧的鲁国（有点像现在的印、巴两国）。

尽管鲁国相比于齐国来说，实力有限，但“人缘”不错的鲁国，却经常会集合一帮大小诸侯国来对抗齐国。因此在春秋中前期，齐长城的主要修筑地点还是在西线，即泰沂山脉之上。而在东线，沂蒙山——五莲山之间“莒国”，在齐鲁两国的共同压力之下，已经衰弱为一个三流国家，并成为了齐国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可以依靠莒国作为缓冲，应对来自南方的压力。所以东线的齐长城在吴国决定北伐齐国时，尚未修建。具体修建时期则要到50年后了，那时的楚国已经恢复了元气，除了夺回他们在江淮地区的失地外，还并吞了困居于沂沭河谷中“莒国”。面对强

大的军事压力，齐国人被迫将长城延伸至海洋之滨。

齐国人在山东半岛南岸的海上防线始于五莲山脉的东北角，在那里五莲山脉的余脉其实已经与海洋连接在一起了。齐国人在这个山、海相连的地方建立了“琅琊邑”，以作为最南面的海防基地。于是沿海岸前行的吴国水军与以逸待劳的齐国水军，在此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海战”。结果是海洋气质更强的齐军取得了胜利。只是吴国并没有就此丧失基本力量，事实上夫差在派出水军从海上攻齐的时候，吴国人已经在着手做第二手准备的。而这一次，吴军将回到他们熟悉的环境中了。

第三节 吴国开通邗沟后沿河再次北上伐齐

吴国人选择的第二条攻击路线，和他们在“柏举之战”做法如出一辙。首先对于严重依赖水运的吴军来说，需要一条南北向的水上运输线，以接近泰沂山脉北侧的齐国核心区，只是这样的天然河道并不存在。好在吴人通过对太湖流域的治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水利技术。因势利导将一些地理上接近的河流湖泊连接起来，以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线，是吴人能够做到的。

吴人北向最先连通的河道是太湖——长江口(镇江)之间的运河。之前为了伐楚，吴国人已经西向的修筑了“胥溪”运河（至芜湖），如果借助这条水道当然也是能

够进入到长江的。只不过对于吴军的北伐而言，这条路线太远了。更何况芜湖——南京段的江面，随时面临着楚军的威胁。在春秋时期，长江口的大致位置在现在的扬州——镇江之间。当吴国的水军可以从太湖向北以最短的航程航行到现在的镇江之后，还需要有一条更重



吴国开发主要运河示意图（春秋）

要的运河将行至长江的吴军送至淮河。于是吴人在长江口的北岸修筑了一个新的城市——邗，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并以邗城为起点北向沟通和连接那些因江、淮之水暴涨而形成的湖泊，最终形成一条沟通江、淮的运河。

由于起点在邗城，这项工程被命名为“邗沟”。在夫差决定从海路伐齐之前就开始了，而在海路伐齐失败后的第二年完工（前486——484年）。从时间上来看，吴人治水的效率已经远超当年的“大禹”了。这不禁让人以为他们才是“大禹”的直系后代。需要说明的是，从长江口向北沿海路到达淮河也是可以选择的线路。只不过这样做的航距有些远，并且海上多变的气候会增加不安全的因素。如果只需要2年多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条运河的话，从工程量和时间上来看，还是很划算的。更何况这样的设计对于吴人治理江淮平原（东部）多有帮助。

在邗沟完工之后，不甘心上一次失败的吴军马上开始了新的北伐。因为能够由运河到达淮河的吴军已经不需要再修筑一条新的运河，就能够到达齐国的家门口了。要做到这一点，那条淮河之北最为著名的支流——泗水将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齐鲁部分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泗水是发源于蒙山南麓，西流之后折向南流入淮河的。对于北上的吴军来说，并不能凭借这条河流越过泰沂山脉到达齐国核心区内，但却可以到达齐国的死对头——鲁国境内（鲁国的国都曲阜就在泗水的南岸，泗水西变南流的拐弯处）。

第四节 吴军沿河北上时得到泗水两岸小国的支持

在解决完线路的问题后，吴军需要关注一下航线的安全了。在上一次的伐楚过程中，吴军通过直接攻击和寻找联盟的方式保证了淮河航线的安全。而这一次，航距并不比淮河航线短多少的泗水航线，也需要做类似的事情。在吴人到来之前，泗水两岸分布着众多的东夷小国。由于周人自西向东的地缘布局，这些残存在泗水流域（包括沂水、沭水等支流）的夷族需要不断的承受来自中原——山东半岛大国的压力，经常被迫迁移（比如徐国）。

之前我们曾经解读过的莒国也是其中一员。只不过由于沂沭河谷地理结构较好，相比于其他泗水小国，莒国的日子还算好过。到了春秋末期，诸侯们的兼并行为愈发激烈，疆土弱小的莒国也只能被迫依附于齐国了。实际上在春秋的大国博弈中，泗水小国两侧的宋、鲁、齐等大国都希望拉拢这些小国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些小国也在不断的根据形势转换门庭。而到了春秋末期，随着长江流域的楚国向东扩张，吴、越两国开始坐大，泗水小国又开始要应付来自南方的威胁了。

及至战国时期，宋、鲁这两个有着高贵出身的诸侯国，在边缘大国的挤压下也变得越来越衰弱。地缘地位的下降让它们不得不与另外十个残存的泗水小国为伍，被统称为“泗上十二诸侯”¹，并作为大国争斗的夹心层而苦苦挣扎。

吴国人开始介入泗水流域始于上一次的攻楚之战。在柏举之战之前，吴国已经攻灭了泗水下游，淮河之北的“徐”、“钟吾”两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小国是决不敢与吴军为敌的。对于吴国来说，最需要与之达成联盟的是泗水上游的鲁国。鉴于齐鲁两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地缘矛盾，吴鲁联盟的达成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实际上，在上一次吴国水军从海上攻齐的行动之前，吴鲁两国就已经达成同盟了。

加入这个反齐联盟的还有泗水中游的“邾国”与沂沭河谷南侧的“郯国”（位于莒国之南）。在吴国水军行动的同时，鲁、邾、郯三国的军队也从陆地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只不过作为联盟老大的吴国未能在海上取得胜利，那三个饱受齐国压力的泗水国家就更无法独挡一面了。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有的只是共同的利益。对于春秋诸侯而言，所有的联盟都不是长期的。仅仅是在两年前，吴国还曾经帮助邾国攻打过鲁国。只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外交原则，对付齐国这个共同的敌人（鲁国出于自保，吴国为了争霸），联合起来才是硬道理。

第五节 吴鲁联军在泰莱盆地击败齐军

有了鲁国在泗水上游的接应，溯泗水而上的吴军很顺利的到达了泰沂山脉南麓，并与鲁军合兵一处。不过与柏举之战相比，吴国在泰沂山脉的北侧还缺少一个内应（上一次是桐柏山西侧的唐国）。这样看来，吴国要想从陆地攻入齐都“临淄”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好在身为齐人的孙武与齐国公室并没有血海深仇，因此也不会像伍子胥那样鼓动夫差对自己的“祖国”打全面战争。实际上在柏举之战胜利之后，孙武就已经隐退了。或者说知道吴齐之争不可避免的孙子，不愿意让自己处在两难境地。

不管怎么说，吴国需要的是将齐国打服，而不是征服。有了在楚国的经验，即使夫差再狂妄，也应该知道，要想消化像齐国这样的大国，以他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做到的。只是如果齐国的主力仍然在泰沂山脉的北侧，并据险以自守的话（泰沂

¹ 关于“泗上十二诸侯”，在宋、鲁之外究竟还应该包含哪些国家，一直没有完整的答案。因为这些泗水小国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从地缘的角度看，将之理解为一个位于淮济之间的地缘集团就行了。



艾陵之战示意图

山脉上的齐长城已修筑），吴军很有可能会无功而返。问题是这时节已是春秋末年，礼教不能再帮助鲁国获得额外的优势了，而在地缘博弈中占据上风的齐国已经将控制区渗透至泰沂山脉南麓。现在，泰沂山脉那五山环绕（泰、鲁、沂、蒙、尼五山）

的中心点——“徂徕山”成为了双方新的地缘分割线。如果从地形的角度看，徂徕山与北部的泰、鲁、沂三山合围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盆地。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个盆地的西部是泰山南麓的“泰安市”，东部则是莱芜盆地中的“莱芜市”。因此这个盆地也被称之为“泰莱盆地”。

对于鲁国来说，丢失“泰莱盆地”是不幸的，但对于寻机与齐军决战的吴军来说，这又是幸运的。因为穿越泰山与徂徕山之间的难度，要远低于越过泰——鲁两山之间的那些狭窄通道。并且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吴军来说，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将决战的地点选在地形起伏较大的丘陵之中，就像他们在柏举之战中所做的那样。战役的发展也的确是朝着有利于吴鲁联军的方向变化的，能够借舟楫之利免受行军之苦的吴军，与在本土作战，且熟悉地形的鲁军优势互补，势如破竹。很快就攻陷了齐国在泰莱盆地两头的据点。败退后的齐军在退至一个叫作“艾陵”的地方后，止足了脚步，并调集主力准备与吴鲁联军决战。

第六节 吴鲁联军在艾陵之战中再次击败齐军

说到“艾陵”，可能有很多人感到陌生。不过说到“长勺”，拜中学课文《曹刿论战》所赐，知名度要高得多。在分析齐鲁大地时，我们也曾经对“长勺之战”做过分析。位于泰莱盆地东北侧的“长勺”当年是鲁国的前沿，鲁国也正是在这里抵挡住了势头正盛的齐桓公的进攻。而“艾陵”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在长勺一带。如果说长勺一带是鲁国当年的最前线，那么现在这一地区就是齐国在泰莱盆地，或



莱芜市境内的齐长城遗址



春秋战车（模型）

者说在泰沂山脉南侧最后的据点了。齐军将战场摆在这里，还是符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理念的（毕竟泰莱盆地不是齐人的核心区）。如果再后退，建筑于泰沂山脉之上的齐长城，将成为齐都临淄的最后屏障，一旦不守，齐人很有可能重蹈楚人的覆辙。

齐人将决战地点选择在泰沂山脉的南侧，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对于吴军来说，其实也是正中下怀。泰沂山脉上的长城与当年攻楚之战中的汉江，对吴军都具有同等的阻隔作用。也就是说，如果齐军或楚军老老实实的呆在山脉、河流所构成的

的天险后面，远道而来寻求速战的吴军基本上是无计可施的。因此当年吴军才会费尽心机，引诱楚军主力自己越过汉江，并在大别山麓与之展开决战。现在吴军已经不用再为寻找齐军主力而大费周章了。不希望将战场引入自己核心地区的齐人，已经主动放弃了长城防线，在吴军所善长的地形中摆开了战场。

“艾陵”这个名称并不是一个城邑的名字，而是指一片叫“艾”的丘陵地区。从这个名字中我们也可以得知，这一地区的地貌以低矮的丘陵为主，正是步兵逞强的好战场。最终吴鲁联军与齐军决战的结果是非常据有历史意义的，在吴国强悍而又灵活的步军面前，齐国的失败非常彻底。参与决战的十万齐军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艾陵之战”的战果也成为了歼灭战的典范。而齐军那些不适合山地作战的战车，共计八百辆也成为了吴鲁联军的战利品（古制，每一乘战车附有各种兵种的士兵共计100人）。不过对于习惯于以船代马的吴军来说，拥有过多的战车反而会拖累他们的战斗力，因此吴军大方的将这些战利品都送给了鲁国。对于有志于称霸中原的夫差来说，对盟友表现得大方一点，也是霸主也应有的气概。

“艾陵之战”之所以成为经典战役，还在于吴国首次使用了“预备队”。也就是说，吴军并没有一下子将兵力全部投进去，而是留下了四分之一的部队。然后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时及时杀出，瞬间打破了平衡（双方的总兵力相等，都在十万上下）。如果是在平原地区作战，齐军的统帅应该很容易发现吴军有部分兵力没有投入战斗，并对己方的参战部队作出调整。不过在丘陵地带，如果齐军没有占据战场的制高点，做不出正确的判断也属正常。

尽管吴军在对齐作战中取得了大胜，但齐国却并不是吴国的最终目标，能够在中原称霸，号令诸侯，才是春秋大国们所追求的。我们常说一战打出了多少年的和平，经过艾陵之战，齐国已经对于这些来自江东的“蛮夷”产生了心理上的畏惧。而现实的损失也让齐人最起码在数年之内无法恢复元气（更何况齐国的老对手，从这场战役中增强了实力），现在夫差终于可以完成他的夙愿——中原争霸了。

第七节 吴国开挖深沟以让其战舰进入中原河济两渚

在地缘格局还过于复杂的春秋时期，希望像后来的秦始皇那样，统一中央之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大国们更多的是满足于成为能够号令诸侯的“霸主”。这种霸主的地位类似于武侠小说中的“武林盟主”，上位的形势也是如出一辙。即你必须让其他与自己实力接近的高手认可自己的地位。而纵观春秋末期的地缘形势，江汉平原的楚国、山东半岛的齐国，以及山西高原的晋国，都是这个大国俱乐部的成员。齐恒公，晋文化，楚庄王就是这三大地缘政治区的代言人，也都曾经成为“霸主”。

如果从地缘实力上来看，渭河平原的秦国应该也能够跻身大国的行列。不过秦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如果想进入中原争霸的话，就必须越过晋人这道关。而仅仅依靠渭河平原的地缘力量，却又很难突破晋人对崤函通道的封锁（关于秦晋之争，后面会有分析）。因此对于夫差来说，秦人并不会成为争霸的障碍，在西征楚国，北伐齐国大获成功后，吴国只需再越过晋国这座“天王山”就能够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了。

当吴国崛起之时，齐、晋、楚三国都已经相继称过霸了。这三个国家与吴国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为“边缘国家”。所谓的“边缘国家”，意味着他们的背后没有能够对其形成威胁的势力。当然，吴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吴人自以为已经扫清的后院不久以后就要起火了。边缘国家的身份，只是表明他们的地缘实力有可能支持他们成为霸主。但要想成为中央之国的霸主，还有一个形式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到河济相交的中原地带和大小诸侯举行一个仪式，以昭示天下自己的霸主地位，而

这个仪式即被称作“会盟”。

一般而言，如果要想让霸主的地位更加名正言顺，还需要周王室派使者到场，以示认可。现在已经打败了楚、齐两国的吴国，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仪式。相比于晋、楚、齐三国而言，吴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以船为马”。同样作为交通工具，船与马的区别在与，前者的运能巨大，成本低，只是必须有合适的水道；而用马（马车）在陆地上运输，虽然性价比不及前者，但更加灵活机动。如果与现在的交通工具类比，就是火车与汽车的区别。通过开挖邳沟，吴国连通了江、淮二水，并通过泗水，让吴国有能力将它的力量延伸至中央之国的东、南两条边缘地带。

问题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央之国的任督二脉还是在于河济两流。吴人已经通过泗水在中原的东侧，山东丘陵以西延伸了它的地缘力量，实际已经介入了河、济流域。但如果不想办法让吴国的战舰出现在这两条河流上，那些分布于河、济流域的诸侯们并不会感觉到真正的威胁。试想一下，要是美国的海军只能在夏威夷以东活动，它对中国的压力还会有这么大吗？

其实就工程量来说，吴国的船只想进入河、济并不难。因为泗水的上游离济水很近，特别是在曲阜旁边的那个弯角处。这也是吴国要拉拢鲁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就算鲁国打不过你，也没有可能让你平平安安的在泗水与济水之间挖条运河（鲁国及泗水上游的小国，很可能还要为吴国提供劳动力）。

吴国新开挖的这条运河叫作“深沟”，起点在现在的山东济宁（曲阜边上），终点则在菏泽。关于“菏泽”，在齐鲁部分已经有过解读，这个位于济水南侧的古泽又叫作“雷泽”。在



吴·北伐称霸示意图

济水为它补充水源的时候，也为它带来了泥沙，特别是黄河夺济出海之后，这个古泽后来就湮没了。并不十分确定吴国决定开挖“深沟”时，雷泽是否存在，规模又如何（有一种说法，雷泽最初并未与济水相连，而是由另两条河流汇聚而成的），但雷泽一带当时的地势肯定是较低

的，否则也不可能有机会汇聚成泽。因此吴国选择向这个方向挖掘运河，可以更为节省人力。

至于深沟与“菏水”的关系，则有些模糊不清。有认为菏水就是深沟的，也有认为菏水是菏泽的延伸，或者是水量减少后的菏泽。由于上古的水患频繁，河流湖泊迁移的情况较多，实际情况如何已经不可考，但夫差在泗水与济水之间连通了一条新的运河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这条运河究竟有多少是天然河道，有多少是人力所为并不重要。

第八节 吴国参与黄池之会并在会盟中的惊人表现

吴国挖通深沟，所花的时间大约也是两年。在艾陵之战后第三年（公元前482年），夫差决定向他的最后一个对手——“晋国”发起挑战了。挑战的地点被选定在一个叫作“黄池”的地方，具体的地点在现在的河南省封丘县。对于我们而言，黄池现在划归哪个省县管辖并不是重点（对于有志于靠旅游拉动GDP的领导来说很重要），我们所要关注的是，黄池是在哪个地理单元。从《吴·北伐争霸路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池是位于河济平原的西侧。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河济相交的这个夹角是最适合会盟的地点了。当年最早搞会盟的郑庄公，也正是在黄池西面的“恶曹”（今天河南延津地）确立他春秋“小霸”的历史地位的。



吴国开发主要运河示意图（春秋）

如果从整体来看，吴国的最后一个对手——“晋国”的情况还算不错，因为在晋国几大著名家族的共同努力下，晋国在春秋末年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高原，并进而将控制范围渗透至河北平原了。但晋国的政治结构并不稳定，公室在春秋后期已经被架空了。那些大家族所做的，正如当年诸侯做大之后，架空王室一样。而这种

结果的出现，实际是跟山西高原的地理结构有关的。

无论晋国的内政如何发展，在吴国决定争霸的时候，它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春秋之时的会盟其实和小说中的江湖之争很像，光靠谈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有很强的实力、军力作后盾。当然，这并不代表“会盟”就一定会变成“邀战”（春秋时很流行的，以约定好地点，双方摆好阵势决定的形式）。在参与会盟者都保持理性的情况下，各方都会对对方所展示的军力作个评估，并结合对方的地缘实力作出个判断，以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吴国一定要挖通深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深沟将吴军强大的舰队运送到济水，停泊在黄池边上，吴国的那些步军在北方诸国的战车面前，气势上很难占据上风。



张艺谋电影《英雄》画面（一）



张艺谋电影《英雄》画面（二）

当吴国将所带来的数万精兵，以及庞大的舰队摆在晋国以及参与会盟的诸侯面前时，的确让大家震惊了一把。更为别出心裁的是，夫差还运用了一些美术知识来加强吴军的气势。即让左右两军分别以红、白两色的衣甲装饰自己（包括所有的旗帜军器）。如果大家不能理

解这种行为艺术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那就回想一下张艺谋所拍了一些电影。从这点来看，夫差如果活到现在，说不定也能够成为一个国际大导演。

总之，夫差当时摆下的阵势的确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场行为

艺术秀也为后世留下了“如火如荼”的成语典故。只不过，黄池之会虽然让吴国出尽了风头，并让夫差的争霸事业达到了顶峰，但高潮背后所隐藏的危险甚至没有等到会盟结束就暴露出来了。而吴越春秋的另一个主角——“越”，在退居钱塘江以南多年后，又将卷土重来，并终结吴国的霸业了。

第二十七章 越国恢复国土和控制外越地区

第一节 吴王夫差对越国所犯的错误

越王勾践的那次复仇，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这一方面是“卧薪尝胆”的典故对于励志教育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则要拜美女“西施”的影响力了。对于这两者的演绎，二千多年来已经有无数文人骚客在做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仍然是其中的地缘背景。至于西施是否真有其人，亦或勾践尝的是什么胆就不做讨论了。

在这个戏剧化的故事中，有一点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那就是由于夫差的妇人之仁，放勾践归国，以至于最后国破身亡。这也被认为是吴国败亡的根本原因。如果从根源上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误，毕竟越国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反攻倒算成功。不过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灭国不灭祀”在春秋之时是很普遍的事情；另外吴国其实也没有能力将越人一网打尽。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吴国所犯的根本错误并不在于保留了越国，而在于让勾践回到了“会稽”。也就是说，吴国虽然将越国由千里之国缩小为百里之国，但却没有动越国的核心区。这种削其皮肉却不伤其筋骨的做法，无疑为越国降低了复兴的难度。在这一点上，楚国人做的就要聪明得多。在它所灭的小国中，虽然很多都保留下了对方的宗庙，但大都是异地重建（比如“柏举之战”一节中分析的蔡国）。

如果越国仅仅是保留了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北部的疆土，勾践也未必能在他这一世就传奇般的复仇成功。在战国后期，楚国击败越国成为太湖平原的主人后，越人又一次退回到了钱塘江以南，并从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中消失。而楚人也没有再乘胜追击，毕竟宁绍平原在当时所能提供的地缘潜力不大，这与将越人逼上绝路，而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不成正比。这一顾虑也正是当年夫差所疑虑的。只要控制得好，宁绍平原的地缘潜力是无法与太湖平原PK的，更何况江淮之间的大片土地（东部）往往会为太湖平原上的地缘力量所控制。

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的北部（也就是越国的核心地区）最终被外部力量所征服的时间，是在秦王扫六合时。对于志在天下的始皇帝来说，那些曾经参与过中央之国地缘博弈的地区，都是他征服的目标。而越人在丧失了固守千年的核心区后，作为一股地缘力量，并未从中央之国消失。在向东南方向退却后，他们在汉武帝时期又一次成为了主角，并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央之国。关于这部分内容，要到汉朝时分析了。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春秋时期，去看看夫差又犯了什么错误，让自己的后院不守。

如果说勾践回到“会稽”的史实很多人都有所了解，那么在后来夫差又让越人回到杭嘉湖平原的情况，相信很多人就不甚清楚了。在最初，越国的确是被控制在钱塘江以南。而整个太湖部地区，包括杭嘉湖平原，以及有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黄山”、“天目山”两山都成为了吴人的控制区。吴人为了加强对杭嘉湖平原的控制，在吴淞江与杭州湾之间修筑了一条新的运河——“胥浦”，大致位置在今天浙江的嘉善与上海的金山之间。这条水道无疑拉近了吴都与杭嘉湖平原之间的关系，也让苏锡常平原已经成熟的水面交通网能够向南沿伸。



吴楚地缘关系图

在伍子胥看来，保留越国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在无法劝说夫差同意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将越人的活动范围限定在钱塘江以南，便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而为吴国在杭嘉湖平原上修建一条新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则是为吴人消化掉整个杭嘉湖平原所做的准备工作。如果吴人不是那么急于北上争霸，而是休养生息，花上二、三代人的时间将杭嘉湖平原消化掉，那么越人将很难有机会重返太湖平原了。问题是，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能达到事业的顶峰，夫差也不例外。

只是吴国在与楚、越、齐，包括其他小国之间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及物资储备。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损失，是必须通过时间才能恢复的（物资还可以通过掠夺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吴人并没有多余的人力来开发杭嘉湖平原。而这时越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夫差感觉到越国已经甘心成为吴国的附庸了。于是将越国在杭嘉湖平原的部分土地归还给越人，让越国从浙闽丘陵招募人力，以开发和耕

种杭嘉湖平原，并为吴国供给北伐所需的粮食物资，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第二节 越国所恢复的国土的范围

越人最终被恢复的国土，大概位置在“携李”的东、南方向。可以看得出，吴国还是为太湖——吴淞江防线留出了缓冲地。只是越人重返太湖平原，还是大大拉近了越人与吴国核心区之间的地理距离。实际上等于又一次让吴淞江——太湖成为了吴国的前线；更为重要的是，吴人重新“赏赐”给越人的那些土地，最终并没有为吴人的北伐争霸事业服务，而是加强了越国的实力。

也许夫差认为，将越人置于杭嘉湖平原的南部，等于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只要监控得当，并不会反受其害。要是吴国的主要力量老老实实的呆在苏锡常平原，这种想法也不算天真。只是当你的对手处心积虑的要复仇的话，机会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夫差将主要兵力陈于黄池争霸的时候，对于勾践来说，就是最好的机会。当然，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吴国让越国恢复其在太湖的疆土只是夫差所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没有这个错误，越国也在积极做着准备。而这些准备活动，不仅改变了吴越两国的命运，也最终改变了越国的地缘属性。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夫差为越国扩容后，越国的控制范围恢复到了什么程度。按照史书记载，扩容后的越国“东至于句甬，西至于携李，南至于姑蔑，北至于平原”。



越国在杭嘉湖平原恢复的国土

这些古地名其实都是古吴语的发音，所以大家很难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们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看“携李”。在“携李之战”中，我们已经对这个地点的位置作了分析。大致就在现在的浙江省嘉兴市西南，再具体一点应该在桐乡市一带；“平原”的位置则在现在的海盐县，

东临杭州湾。对于海盐，如果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朋友应该有印象。不过海盐陈阁老¹究竟是不是乾隆的生父，目前看来只能是小说家言了。对于出身在海宁的金庸老先生来说，用身边熟悉的人物入书，倒也在情理之中（海宁就在海盐西侧）。



夫差增封越国土地示意图



龙游石窟

我们如果在地图上标出“携李——平原”的位置会发现吴王夫差赐给越国在杭州嘉湖平原上的土地，实际上还是越人的故地，或者说是越人在落败之前，在杭州湾北部所经营的最稳定的根据地。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句甬”，“甬”是宁波的简称，得名于宁波的母亲河——甬

1 陈阁老——即清代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转工部尚书陈元龙，为海宁盐官镇人。有清一代，海宁陈氏有“海内第一望族”，素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誉。乾隆六下江南中，其中四次到海宁，且每次都住在陈阁老家。

江。句甬指的就是宁波平原一带。当然，在春秋之时宁波平原的陆地还没有现在的规模。而越人当时的经营重点还主要放在绍兴平原。

“姑蔑”则在现在的浙江金华、衢州之间的龙游县。这一带的地理名称是“金衢盆地”，是浙江腹地中最大的盆地，也是越国直接控制区的最南部。就“龙游”这个地方来说，近几年比较出名的是“龙游石窟”。关于这个在山中向下挖掘的巨大石窟，最为引人入胜的说法是越王勾践的藏兵洞。不过从逻辑上来分析，如果是为了不让吴人发现，越人完全可以将兵员和物资藏于山中，并没有必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在山中开凿如此规模的石洞。

关于“金衢盆地”与越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浙闽丘陵在春秋时期的地缘结构，我们后面会有具体分析。现在看来，夫差为越国增封的土地名义上的确够大，因为之前的越国被限定在绍兴平原与会稽山一带。但有实际意义的还是在杭嘉湖平原上的越国故地，因为在此之前，吴国并没有能力深入到浙闽丘陵之中，去实际控制那些越国土地。吴国“还给”越国部分土地的用意，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主要是因为连年征战的吴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开发及控制这些土地了。这种情况下，让一个顺从的属国来提供部分后勤保障，也不失为一个方案。

第三节 吴人开凿胥浦与越人开发宁绍平原

就越国在杭州湾北部复得的这些土地而言，其实并没有涉及到“胥浦”所流经的区域。吴人开凿的这条新运河在杭嘉湖平原的东侧，入海口则正好位于吴越新国界的东北侧。也就是说，吴国还是可以通过胥浦将吴都的军队以最短的时间运送到吴越边境。吴国最初决定修建胥浦的时间是在“携李之战”之后，夫差新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 495 年）。那时由于吴王阖闾受伤而亡（公元前 496 年），越国的控制区已经向北扩张到了太湖南岸。而真正修成的时间，应该是在夫椒之战以后，即越人完全退回到钱塘江以南之后。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无论吴国有没有让越人重返太湖平原，胥浦的修建都是有必要的。这对于吴国控制杭嘉湖平原，并开发胥浦两侧的土地都有莫大的好处。从农耕的角度来看，与现在修建水渠主要用于输水不同，太湖平原的很多人工河道是用来排水的。也就是说，将那些湖沼之中的水尽量的排干以获得更多的耕地。如果说向湿地要土地，是吴人得以开发太湖平原的成功秘诀的话，失败之后的越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从吴都回到越国的勾践来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将都城从会稽山上搬了下来（公元前 489 年）。新的国都被设定在绍兴平原之上，具体的位

置在现在的绍兴市越城区。

对于习惯于在山谷之中生存的越人来说，将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搬迁到水患频繁的沿海平原之上，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如果勾践希望积蓄足够的实力向如日中天的吴国复仇的话，那些山谷中有限的耕地是很难提供足够的支持的。越人开发绍兴平原的方法是围堰筑塘，即在湿地的边缘筑起低坝，然后将其中的水排干（这项工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吴国被征服之后，大批的吴人被征用至此，以扩张绍兴平原的陆地）。而吴都四通八达的水道，以及它们在“夫椒之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让越人更加意识到，谁更善于借助水的力量，谁就更有可能成为江东之主。因此越人在修筑都城（包括其他城邑）时，也参考了吴都的修建方法，以让自己从一个山地民族，转变为一个水上民族。



夫椒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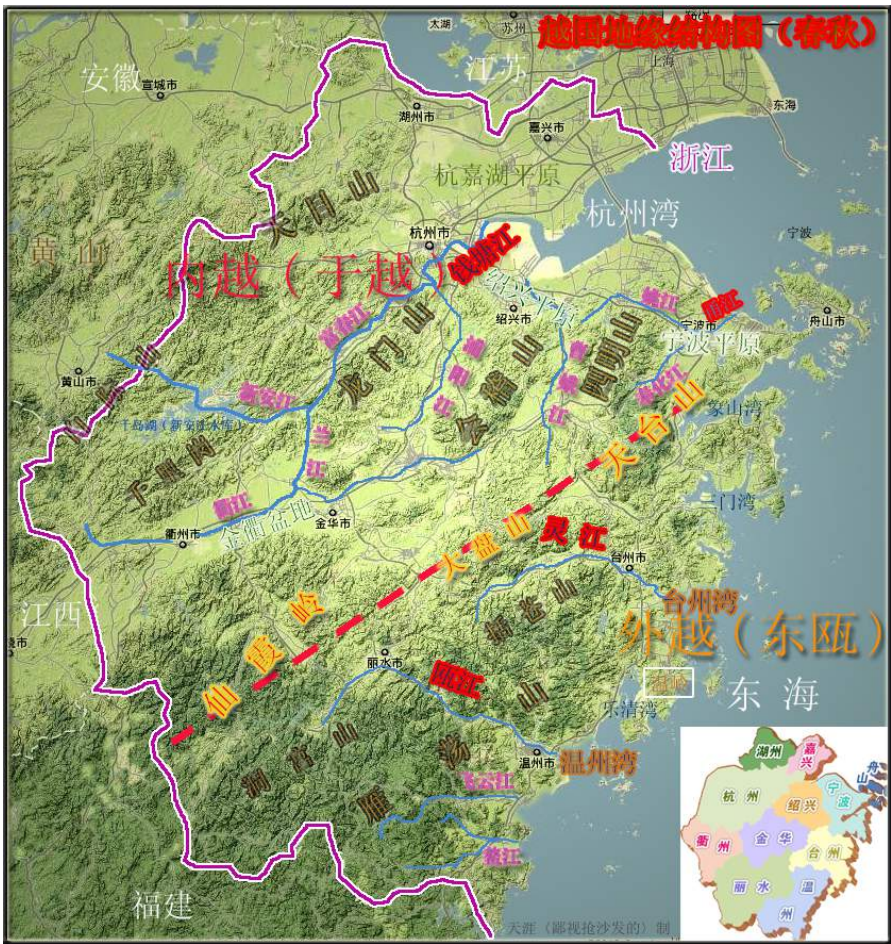
不过越人与吴人最终的成功虽然都与水有关，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与吴人善于利用平原地区的河道湖泊不同（包括改造河道），越人则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海洋之上。而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与吴越之间不同的地缘背景有重要关系。后面我们将继续分析，到时我们就清楚，为什么越国的国运要远长于吴国？究竟越国是靠什么打败了吴国，过程又如何？为什么获胜之后的越国要迁都于“瑯琊”？东瓯与越国的关系又是怎样？

第四节 浙江境内的内越和外越的地缘分割线

在之前的解读中，由于吴越之间的地缘博弈主要在平原地区，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了江东平原之上。而现在我们则要把目光投向浙闽丘陵，去具体了解一下，“越”

这个族群在浙闽丘陵的地缘结构（浙江部分）。而在解读完之后，相信大家对整个浙江省的地缘特点也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如果单看地形图的话，面对浙闽丘陵繁杂的地形会有无从下手的感觉。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规律的。在解读地缘结构时，山脉河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影响族群发展的两个重要地理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山脉看作支撑一个人整体结构的筋骨，河流则是为之输送养分的血管。



越国地缘结构图

雁荡山等 12 条山脉。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些基本都呈西南——东北方向排列的山脉中有很多“名山”。好在我们评选“脊柱”的依据不是名气，而是它的地缘位置，因此未被“入选”的山脉所在地的旅游部门，也不要有什么想法。

现在我们可以公布评选的结果了。最终获得浙江“脊柱”称号的就是仙霞——天台山系（包括两山中间过渡的“大盘山”）。这条山系发源于武夷山（江西福建交界处），东至杭州湾口，呈对角状切割浙闽丘陵（浙江部分）。如果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仙霞——天台山系的确位于诸多山脉的中间位置，但作为“脊柱”光有居中的位置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在地缘结构上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从地缘文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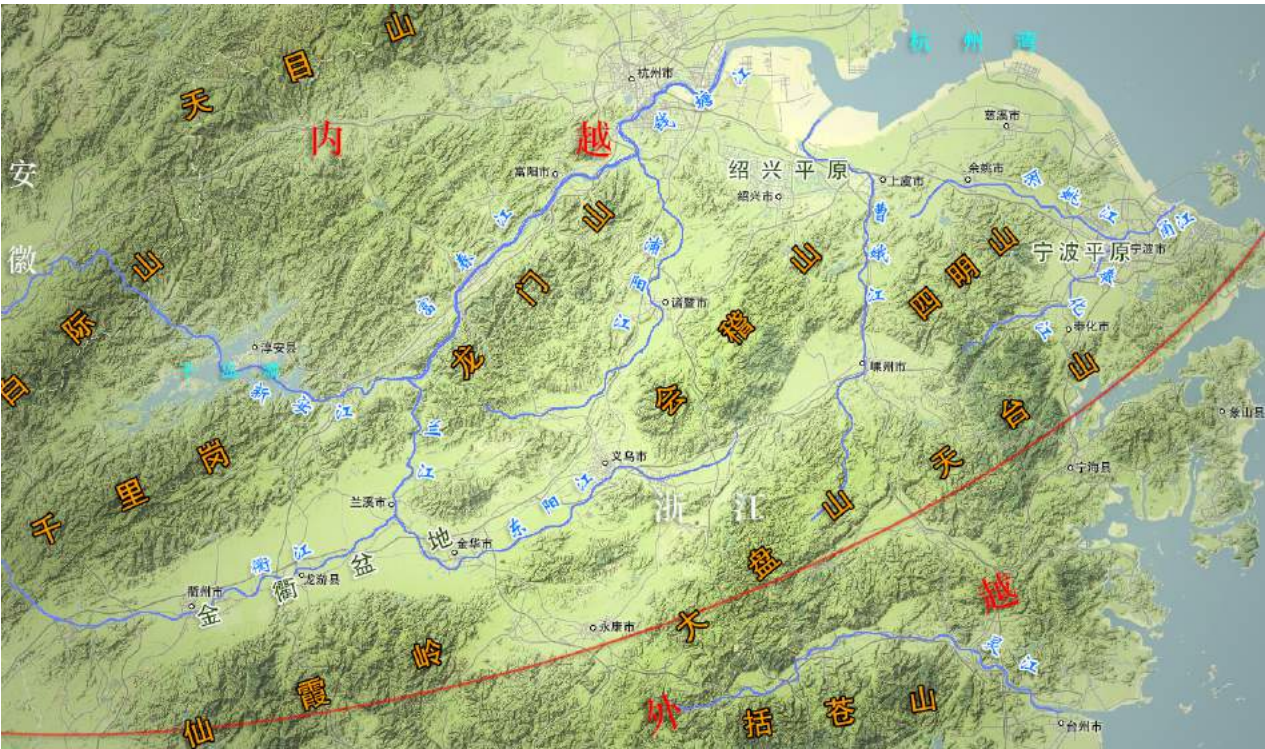
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山脉的支撑作用，那我们就不妨来寻找一下，浙江境内的山脉当中究竟有哪条山脉是最为重要的“脊柱”。我们先来看看，如果细分的话，这些山地又可以细分为哪些山脉。如果从北向南排列的话，浙江境内的山脉大致可以划分为：天目山、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白际山、千里岗；天台山——大盘山——天台山；括苍山、洞宫山、

角度看，仙霞——天台山系也是一条重要的分割线，这也是它最终当选“脊柱”之名的真正原因。

从先秦的越文化来看，脊柱两侧虽然同属于越文化，但还是有着一定区别的，这也就是所谓“内”、“外”越之分。在我们之前的讲述中，所谓的“越国”主要指的就是内越这支，在当时被称之为“于越”；而于越的东部则是“外越”，也称为“甌越”，或者“东甌”。

第五节 钱塘江水系对于内越发展和交流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个文明都必须有一条养育它的河流，像血管一样为文明输送养分。而于越的主动脉就是“钱塘江”水系。说到钱塘江，它的很多部分都有自己单独的名字。准确的说，它从山上下来，进入平原（钱塘江是杭嘉湖平原与绍兴平原的分割线）之后才被称之为“钱塘江”。只是由于这段江面处在政治经济中心之内，因此“钱塘”之名也就成为了整个水系的代言人了。而钱塘江位于龙门山西侧的中游则被称之为“富春江”（位列十大传世名画的《富春山居图》就是描绘此地的景色）。



内越地区示意图

而钱塘江上游的水源则有两条，北源叫“新安江”，一般被认为是钱塘江的正源。只“新安江”这个名字不太出名，在将它的主流筑坝变成“新安江水库”之后，当地政府觉得应该有个更有气势的名字来与之相配，于是“千岛湖”成为了“新安江”



千岛湖



宁波平原示意图

水库”的新标签。不过千岛湖的出名固然与景色优美有关，但更多人是因为有个与农业有关的矿泉水厂家，一直在广告中声称它所卖的水取自湖底而让人们知道了这个人工湖。相比于北源，南源的“兰江——衢江”段，对于“于越”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段江面与其东面的支流共同冲积而成了“金衢盆地”。当年于越之族正是先在此繁衍生息，继而沿钱江水系北上宁绍平原，融入中央之国的。

如果我们跟着越人的足迹沿钱江水系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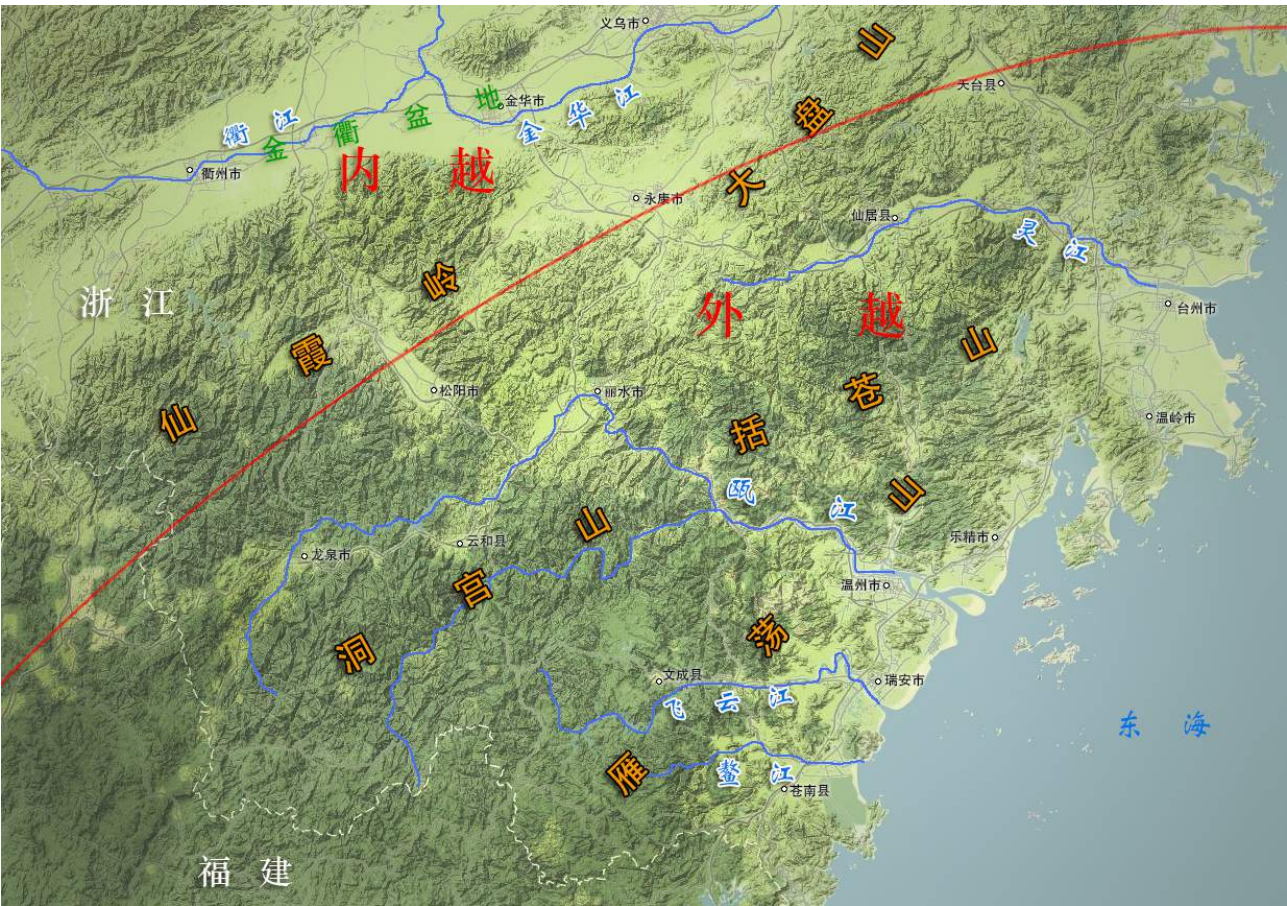
会发现他们最先到达的是绍兴平原，并且很容易越过钱塘江向北进入杭嘉湖平原。而位于宁绍平原另一端的“宁波平原”则拥有自己独立的水系——甬江水系，甬江是由四明山北侧的姚江与发源于四明山东麓的奉化江二江汇集而成。前者因著名的新石器遗址——河姆渡遗址而闻名于世；而后者中“奉化”之名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因为蒋氏家族。由于甬江水系的独立性，所以顺流而下的越人最先开发的是绍兴平原，并以此为依托进入太湖平原。

不过钱塘江水系、甬江水系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向北流入杭州湾（包括二者之间的曹娥江也是如此）。这些特点使得居住在这些河流两侧的“于越”族，地缘扩张的方向更容易指向北方，也更容易与中央之国的其他地缘力量（特别是太湖之侧的吴人）发生冲突与交流。更多的交流也让“于越”族所立的“越国”最先为中央之国所认可，继而在越人体系中占据优势，并最终成为整个“百越”之族的代言人。

简而言之，北流入海的钱塘江水系可以称为越人的母亲河。而绍兴平原、金衢盆地，加上稍后开发的宁波平原，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根基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内越”。这种影响延续至今，绍、宁、金、衢，加上钱塘江入海口的杭州也成为了浙江腹地最为重要的五个城市。由于杭州连接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与杭州湾的枢纽位置，也让它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整个浙江的地缘和政治中心。

第六节 外越地区分布的山脉和形成的地缘文化

现在我们要将目光投向仙霞——天台山系的东侧了，如果要为这一地区在公元前找到一个地缘标签的话，那就是“东瓯”。如果从历史地位来说，“东瓯”地区在中央之国的地缘位置并不突出。多山的地形让它在以农耕为主要特点的文明中，很难获得突出的地位。尽管在我们的印象中，整个浙江应该都可以与富庶的“江南”挂上钩，但在古典时期，江南的盛名其实是来源于杭州湾两侧的平原。而在最近三十年，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是因为温、台两州的崛起，特别是温州商人是那世界级的知名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东瓯”地区的地缘结构。



外越地区示意图

“东瓯”在春秋时期是属于所谓的“外越”，也就是说“越国”对于这一地区的控制其实是属于间接控制。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居于其上的“瓯越”族，与“越国”的“于越”族具有不同的地缘文化。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山脉的阻隔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外越”都有哪些山脉。外越的山脉主要有：洞宫山——括苍山——雁荡山，这些山脉比之内越的山脉要更高，也更密集。而由于仙霞——天台山系的分割，外越的河流走向也与内越截然不同，基本都是向东直接流入东海的。这些水系主要包括由台州地区入海的灵江；以及由温州地区入海的瓯江、飞云江、鳌江（合称“浙南三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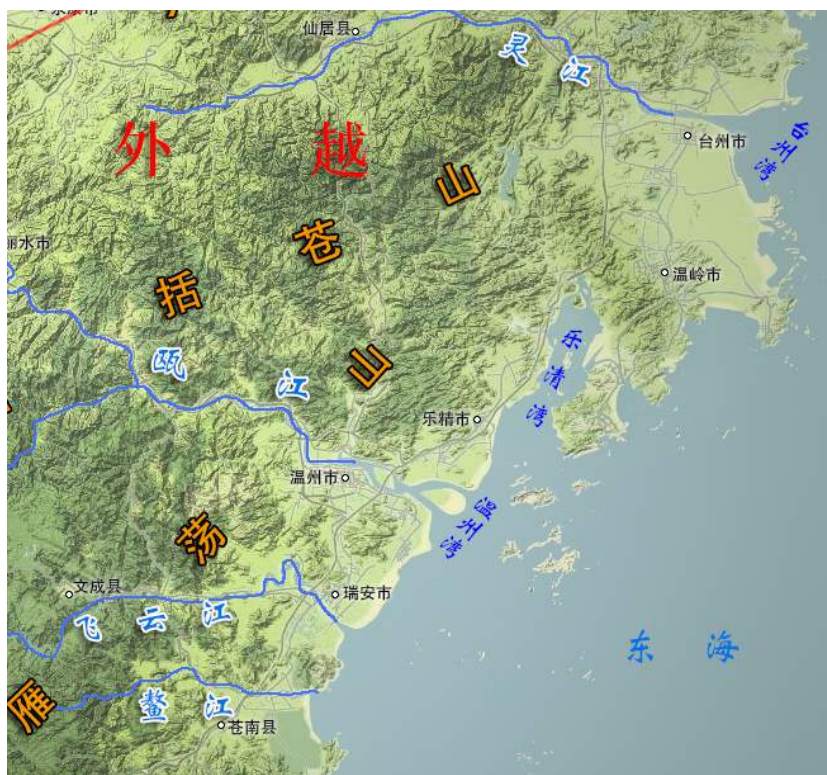
越人最初的迁移路线应该是自海上逐次北上的。当他们顺着外越的这些河流西向进入丘陵腹地之时，会发现洞宫、括苍、雁荡三条山脉之间基本没有成规模的河谷盆地，只有在越过仙霞——天台山系之后，才有可能发现规模较大的金衢盆地。这些险峻山脉的阻隔也造成进入钱江水系的越人形成了具有独立地缘属性的“于越”族。而留在外越的瓯越之族虽然在河流两侧找到些小规模谷地生存（如瓯江上游的丽水盆地），但这些不成规模的小块平原，并无法支撑瓯越族整体转化为农耕民族。因此瓯越的地缘中心仍然是在那几条河流的入海口，或者说他们保留了越人海洋民族的原始属性。

最后说一句，如果要研究地缘文化的话，春秋是非常好的载体。可以说中国核心区的地缘文化，都可以在那些诸侯国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春秋的地缘影响力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晋、鲁、楚、吴、秦、巴、蜀……，这些诸侯国的名称，不仅成为了文化标签，有些甚至直接成为了一些省市的简称。这其实要感谢春秋纷杂的地缘结构，使得政治博弈最大限度的展现了地理格局的原貌。

如果说地缘文化研究的最佳时期是“春秋”，那么“战国”时代就是研究地缘政治的黄金时期，到时的分析方向也会偏向地缘政治。而如果要看军事地理的话，三国时期是很好的载体。只可惜电视剧是由艺术家编写的，在他们看来，那些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随意搬用也不用负什么责任。似乎按照编剧、导演、演员的个人理解，充分挖掘英雄人物的“灵魂深处”才是票房最有力的保证。

第七节 越国利用控制的外越地区发展海上力量

我们已经分析了外越地区（东瓯），这一地区其实还可以分为三部分，即灵河下游的台州湾地区；以瓯江下游的温州湾地区。另外还有的就是瓯江上游的丽水地区。由于瓯江的南部还以飞云江、鳌江两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因此以温州湾为核心



乐清湾位置图

的“浙南三江”地区成为了瓯越之族的主要聚居区。

而东瓯的政治中心则被设在温州湾以北的一个半岛上。这个半岛向南延伸，与大陆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海湾——乐清湾，这些天然形成的海湾都是船舶驻扎的好地方（可以避免受到海洋恶劣气候的影响），也是东瓯地区海洋实力的支撑点。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温州湾以北，台州湾以南的这个半岛是

东瓯两大主要地理单元的地理分割线。目前就东瓯国的政治中心究竟在哪里，还不是十分明确。但无论是瓯越族内部的政治力量，还是来自于西北方向的越国（内越），想要控制台——温两地，这个目前归属“温岭”市管辖的半岛，都是可以南北兼顾的好地点。

对于东瓯以外的人来说，温岭地区是否为东瓯的政治中心，并不是大家所关心的。不过在21世纪的第一天，温岭却着实的出了一次名，因为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中国大陆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就是照在温岭的。对于凡事都喜欢抢个头彩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个吉祥之地。

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分析“东瓯”，是因为在吴越争霸初期，越国所倚重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出身于山地的步兵。应该说，在越国可以开发宁绍——太湖两大平原之前，居于山地之间的越国人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不过这也让越国的军队更加剽悍和不畏生死，所谓“光脚的不怕穿脚的”。这些因地缘条件而形成的特点，在“夫椒之战”中得到了全面体现。越人派至吴军阵前自杀的死士，让越国在实力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取得了战术胜利。只是这种不怕死的打法，固然能获得一时之胜，但在吴越两国的长期对抗中，拼得还是地缘实力。而吴国对于太湖平原水网经营的得心应手，也让越国无法在杭州湾以北立足。

应该说失败之后的越人开始向吴人学习，将国都迁至绍兴平原之上的“会稽”就是最显著的表现。不过越人如果想在太湖平原上翻盘，或者说想在平原河流中与



外越北部沿海地区示意图

因为天台山脉一直延伸入海而形成的（包括已经与大陆切断联系的舟山群岛）。问题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无论出于生产还是生活的需要，人类总是会选择有淡水资源的地区居住。而河流湖泊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人口密度与地缘实力。而这些因天台山而生的海湾地区，之所以在先秦地区成为地缘争夺的盲点，正是因为缺乏较大规模的河流。在人口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那些大江大河边上总会成为被优先得到开发的。这也为内、外两越在东北部留出了足够的缓冲地。

不管越国用什么手段控制了外越地区，他们最终都增强了自身的海洋实力。这种新的地缘优势，在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与晋国争霸时开始显现。越国的水军乘吴国内部空虚，分兵两路沿海岸线北上。一路从淮河入海口入淮，进至泗水——邗沟交汇处以切断吴军主力的退路；另一路则溯吴淞江而上，直捣太湖东侧，吴淞江北的“吴都”。

对于夫差来说，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抛开海洋的因素，

吴人一较高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对于越人来说，他们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特点，让海洋成为自己水上力量的载体。尽管越国已经落败于吴国，并且由于仙霞——天台山系的分割，创建越国的“于越”族，已经与东海之滨的“瓯越”族有了显著的分别。但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地缘实力上，越国还是能够用间接控制的手段，让东瓯族那些熟练的水手为越国的复兴事业做出贡献的。如果地图看得仔细的话应该会发现，在宁绍平原与台——温两湾之间，还有一个地理单元我们没有分析到，那就是象山湾。

象山湾南至三门湾地区，目前是东部沿海港口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些海湾、港口实际上都是

即使吴国“赐还”给越国杭州湾以北的部分土地。越国的军队要想进击至吴淞江，并最终进入苏锡常平原，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夫差已经为吴国在陆地上留出了足够的缓冲之地。如果越人开始“造反”，进入济水的吴军是有足够时间回防的。正如当年在柏举之战后，吴军凭借淮河水流迅速回防击败越国一样（这次吴军如果沿济水——泗水——邗沟回到江东，也是顺流而下）。

第二十八章 越王勾践灭吴并沿海路北上进局

第一节 吴王夫差从中原回师救援江东的根基之地

当夫差在黄池得到越国进攻的消息时，回师江东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无论越国是从陆地还是海上进攻，在吴军主力尽皆北上的情况下，吴国的留守部队都不可能支撑太长时间。只是吴国预定的归国路线已经被越国切断，即使能够突破越国在淮河设立的防线。等他们到达江东时，吴都应该也已经陷于勾践之手了。因此得到消息的夫差并没有将越国进攻的消息公布，而是选择继续留在黄池与晋国争霸。

关于争霸的结果，史书的记载不尽相同，《左传》认为是晋国“先歃”；《国语》则认定是吴国“先歃”。所谓“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歃血为盟”，具体的做法就是将献祭的牲畜之血抹在嘴上，先做的就是盟主。这种做法其实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结盟的双方不再是国家，而是个人（结义）了；另外大家可能觉得直接抹血太腥，就改为喝血酒了（牛羊也变成鸡了，当然，也有为表诚意用自己血的）。

现在一般认为夫差还是在黄池完成了他最后的辉煌，力压晋国当上了盟主。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采信了《国语》的说法。不过当没当盟主，对于吴国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从夫差的角度来看，让军队表演“如火如荼”的行为艺术，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回师江东之时，不至于被晋军掩杀。而最终晋国也的确没有进行追击。

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吴国终于可以回到江东与越国决战了。问题是夫差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越国抄了底，现在即使能够回到江东，其实也没有什么胜算了。这种时候对于吴国来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迁都至江北，经营好自己在江淮的土地。在春秋之时，诸侯国异地重建是常有的事（人口密度低，为诸侯国的迁移提供了空间）。比如东迁的郑国，以及那些被大国灭了之后，异地重建的其他例子。在战国后期，秦国攻占江汉平原之后，楚国也曾经将国都迁至淮河流域，以期东山再起。

为此夫差甚至起了依托自己手上的军队，在士气未散之前攻下宋国的念头。尽管单看宋国的位置是处在四战之地，但如果加上吴国在泗、淮流域已经占据的土地，吴国还是能够保有一定实力的。只不过如果吴国真的定下了这样的战略，所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吴国需要在江、淮流域经营出新的水面交通网。这一方面是为了开发江淮地区（主要是东部，现在江苏长江以北的部分），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防守的目的。如果吴国在太湖平原的根基稳定，吴国下一步开发江淮东

部的水网是肯定的。

而在丢失了江东之后，那些北方大国已经不可能留给吴国充足的时间开发江淮地区了（江淮东部的人工水网后来还是形成了，并且在后来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新的吴国也没有长江天险为之提供保护，很难像之前那样偏安一隅。因此夫差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师江东，与越国一争短长。当吴军



吴越夫椒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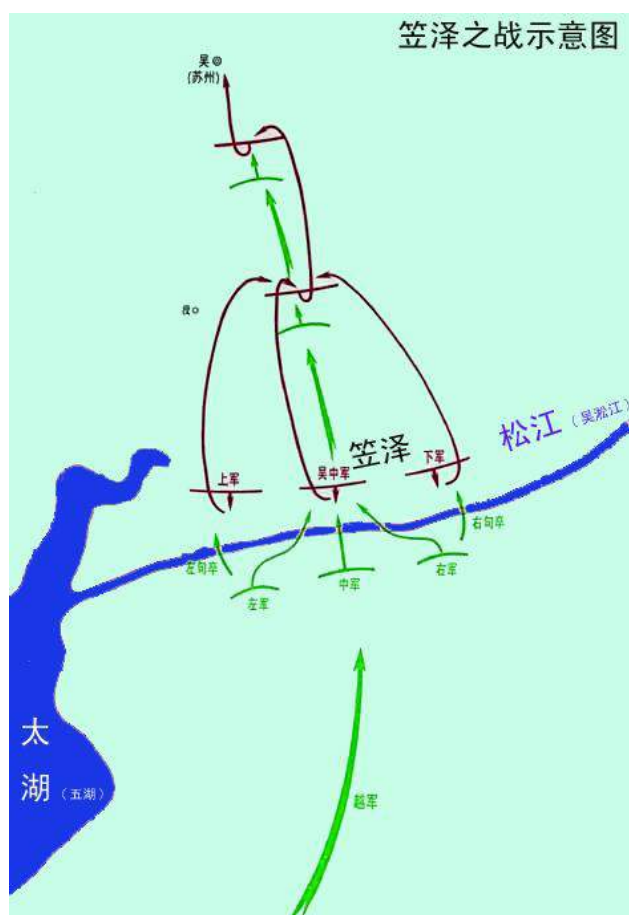
回师江东后，越国已经攻破吴都，并杀了夫差的太子了。不过尽管越国与回师后的吴军主力进行过几次接触战，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吴军主力尚在，越国要想毕其功于一役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吴越双方暂时还是停战言和了。只不过与当年的情况有所不同，求和的一方是吴国（公元前482年）。

最终的结果是，越国获得了吴淞江——太湖以南的土地，也就是说取得了整个

杭嘉湖平原的控制权。而吴国则暂时得以保住了他们在苏锡常平原的根基。只不过连年征战的吴国，内部早已空虚不堪。另外攻入吴都的越国军队，对吴国的物资和基础设施进行过什么样的掠夺和破坏是可以想见的。越国在撤退之时，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就是吴国在太湖之中的那些大型战舰。而丧失了这些船只，对于吴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以他们残存的实力，已经很难再将水军恢复到原有的实力了。因此吴越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大逆转，形势变得对越国愈发有利，或者说越国成为江东之主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二节 吴国在笠泽之战中落败和吴都失守后亡于越人

在吴越双方停战言和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478年，越国终于对吴国展开了决战。而这一次，吴国已经没有了在杭嘉湖平原上的缓冲地了，吴淞江直接成为了吴越两军的分割线。最终越国凭借强大的水陆两军，兵分三路，轻松的突破了吴淞江防线。



笠泽之战示意图



宁波平原示意图

研究战史的人一般将吴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夫差的判断失误，将主要兵力用于防守越国的左右两军，而让越军主力从中路突破。

其实对于当时的吴军来说，已经没有实力防守整条吴淞江了。军力占优的越国，在多点齐发的情况下，攻入江北实属必然。渡江成功的越人与吴军决战于江北，由于江北那片湖泽之地被称之为“笠泽”，战役因此也被史家称之为“笠泽”之战。而失去了最后保护的吴军，只能向吴都退却。在吴都城进行了几次失败的抵抗之后，吴国最后残存的力量可以选择的只有退入“吴都”，做最后的挣扎了。

不得不说，吴人苦心经营的具有水陆两栖特点的都城足够坚固。吴人据城自守了三年之久。只是城墙再坚固，粮食也有吃尽的一天。于是历史开始重演当年夫差破越都的一幕，只是这一次被围在“山上”的是夫差，而胜利者则是勾践。如果勾践愿意，在夫差请降之后，历史可能还会按照当年的路子走下去。但最终的结果是，夫差自尽，吴国

从此绝祀而灭国。如果光看结果，我们会认为勾践做事有些不仁，因为当年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夫差还是保留下了越国的。

实际上当时勾践也并没有做得这么绝，或者说他也表示愿意保留吴国。只不过勾践不可能不吸取当年夫差的教训，让吴国原地重建。越国为吴王选定的新领地在“甬东”，也就是宁波平原的东部。相信从前面一直看的话，不用看地图也清楚，那里是越国的大后方，并且尚属待开发地区。将吴王放在这样一个在越人与大海包

围之中的土地上，夫差重演卧薪尝胆的一幕，基本是不可能的。这和二战之后，苏联将德日战俘放在西伯利亚搞开发，算是一个路子。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不失为一个活命的选择。但对于一个曾经的霸主来说，这种选择无异于侮辱。因此夫差选择了自杀，吴国也因此而灭亡。

吴越之间的争斗，对于后世来说，成为了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中无数人在为勾践的大逆转而喝彩；也有很多人在为当年夫差的一念之差而扼腕。实际上就吴越两国的地缘关系而言，吴国要想彻底消灭根植于山地之中的越人，是有很大难度的；而越国反制成功后，要想清除吴国在太湖平原上的势力，要容易得多。但这并不代表吴国就会败于越国，相反，如果吴国不是那么急于北上争雄，而是经营好太湖平原，并进一步开发宁绍平原的话，代表江东北上争霸的仍然会是吴国。

无论吴越两国谁取得了成功，江东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吴越争霸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让江东地区通过内部博弈，融合为一体。这种整合，晋人在山西高原上，齐人在山东半岛上都在做。越国故事的传奇之处在于，它是在春秋时期，是诸边缘大国中唯一由山地而起，进入平原成为主要地政治力量的国家。特别是其所面对的是吴国这样一个已经成熟的大国时。

取得胜利后的越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承吴国在长江以北未竟的事业。只不过，这一次越国的做法和吴国有所不同。他们将在地缘战略上作出系列的调整，以让自己不再重蹈吴人的覆辙。

第三节 夫差入列春秋五霸的问题与春秋战国断代的标准

关于夫差是否能够位列“春秋五霸”，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一是不能十分确定黄池之会他到底有没有当上“盟主”；二是即使从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算起，吴国也没有富过三代。吴人在阖闾、夫差父子两人的带领下，压倒过所有主要对手后（楚、越、齐、晋），吴国便完全亡于勾践之手了。在开始分析春秋时我们也说过，“春秋五霸”的称号表面上是授予某个君主，但实质上是对这个诸侯国实力的肯定。或者说这个诸侯国有足够的地缘实力。风水轮流转，每一个边缘地区都迟早会诞生一位能够在某一时期号令诸侯的霸主（有的诸侯国还不只出现一位候选人，比如晋国）。从这个角度看，吴国的兴亡转换过快，夫差位列五霸，还欠一口气。

既然夫差很难代表吴国竞选春秋五霸，那么他的对手——越王勾践是否又有可能竞选成功呢？如果勾践想跻身五霸之列，他首先要面临的是时间问题，这就要牵扯到春秋战国的断代问题了。司马迁当年是最先划定春秋战国标准的，基本依据是

孔子所修定的《春秋》一书。即将书中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周王去世的那年定为春秋的最后一年（周敬王 44 年，公元前 476 年。春秋记事至公元前 481 年止。而孔子逝于公元前 479 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越王勾践灭吴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473 年，算是进入战国时期了。以战国之身份竞争春秋之霸主，估计报名时就会被刷下去。

实际上这种以某人之生死，为历史时期划分标准的做法，是很不准确的。更何况王室在春秋末年甚至连象征意义都快没了，以某一个周王离世时间划分春秋、战国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很牵强的。因此现在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以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元前 403 年为春秋战国划分的标准。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决定战国格局的重大事件——三家分晋。也正是因为有了赵、魏、韩三国的加入，才有了“战国七雄”的概念。所谓春秋、战国的划分，也才会有意义。

实际上自古以来，吴越相争都是被看作是春秋之事。上述分析只不过是在厘清司马迁当年未能表述准确的概念罢了（他老人家太过权威了，所以后人即使感觉有异，也不太敢提出意见）。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解读一下春秋战国的划分标准，除了审查勾践的参选资格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回到黄土高原后，很快就要进入战国时期了。现在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吞吴之后的勾践，或者说越国，它的实力有没有得到北方诸国的认可，并成为真正的霸主。

第四节 越国接收吴国江淮之地后所作的调整

在灭吴并占据整个江东之后，越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顺理成章的接收吴国在江淮地区所扩张的土地了。由于打败了楚、齐两个大国，吴国的国土已经扩张到淮河以及泗水的中游了。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可以理解为整个安徽——江苏两省都为吴国所控制。只不过吴国扩张得过快，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掉这些土地。对于越国来说，将吴国在江淮地区所吞并的土地继承下来，是一个很诱人的想法。

如果真的那样做，勾践的越国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之地，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在春秋诸国中也算数一数二的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土地中大部分为适合耕种的平原地区，只要能将河道治理好，便能够为越国进入中原争霸提供非常大的物资保障。如果吴国所占领的江淮地区，能够像它西面对称存在的江汉平原、南阳盆地那样，受到伏牛——桐柏——大别山脉的保护，相信越国会毫不犹豫的全盘接收吴国在江北的遗产（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感受了下，将为楚国提供保护的这一系列山脉，在脑海中对称的翻印在东部）。

因为即使越人不是出身于山地民族，也会有信心防守住诸如“方城夏道”以及“信阳通道”这样的战略要地。而现在，无论是之前的吴国，还是现在的越国，如果想要在这个大平原地区进行全面防守的话，都是非常困难的。假使面临这个问题的还是吴国，吴人所采取的经营手段将和他们在太湖平原上一样，即开挖运河，疏通河道，形成密集的水面交通网和渠灌网，以将自己的地缘特点发挥出来。事实上吴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连接江淮的“邗沟”，以及连接淮济的“深沟”，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体现。

虽然越国已经接收了吴国的核心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越人愿意，他们应该可以运用吴国所拥有的技术力量（包括人力资源），来构筑江淮地区的水网体系。只是现在的越国在经历过与吴国的战争之后，自身的实力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人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越人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让自己再一次的休养生息。这实际上也是吸取了吴国连年征战，以至亡国的教训。因此越国最终在长江以北作出了重大让步，并由此奠定了越国新的地缘结构基础。

首先，无论是吴国，还是越国，他们在成为江东之主后，最大的对手都是江汉平原上的楚人。“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地缘格局，使得双方在共饮一江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因长江而发生地缘冲突。在吴国为江东之主时，为了对抗如日中天的吴国，楚越两国实际上达成了战略同盟。现在轮到越国在江东坐庄了，理论上楚越两国应该会立即“化友为敌”了。不过对于勾践来说，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与楚国维持和平关系的。因为勾践其实很清楚，当日吴国虽然经过精心谋划，在“柏举之战”中一举攻入郢都，但最终楚国还是复国成功了。越国如果要和楚国再战的话，其实也很难取得更好的结果了。更何况经过灭吴之战后，越国的人力资源也消耗很大，江东的吴国故地还需要花费时日来融合。

因此勾践在灭吴之后，将当日吴国在淮河流域攻占的楚国土地还给了楚国（也就是以夷、六、潜三城为代表的淮河北部的土地）。相当于把淮河中游地区基本让了出来。自己保留了淮河下游的土地。对于这种结果，楚国当然还是很满意的。毕竟如果要硬拼的话，楚人也没有把握从越人手中夺回这些土地。现在越人肯主动示好，并没有理由不接受。楚越两国在淮河流域的这种平衡持续了 160 多年。不过双方的地缘矛盾终究还是有爆发的一天，公元前 305 年，越国还是败于楚国，退回了钱塘江以南。

除了在淮河流域有所收缩以外，越国在泗水中游也作出了调整，具体做法就是将吴国原先侵占的宋国土地还给了宋国；并将鲁国南部，吴国通过吞并一些小诸侯国所占据的一些土地，送给了鲁国。这些调整一方面树立了越国在北方诸侯心目中

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让越国不像吴国那样树敌太多。对于越国来说，作出这些调整是有其必要的。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如果越国硬要守住这些土地，在缺乏山脉作为屏障的情况下，守得了一时，却守不了一世。因此勾践并没有驱使被征服的吴人去开发江淮地区，而是将之驱至宁绍平原，去帮忙开发经营越人的大本营。

如果光看越国的这一系列调整，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勾践是一个不思进取，没有太大野心的君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越国之所以作出这些调整，从根本上来说是顺势而为，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因为与吴国的地缘优势在内河之上不同，越人的优势主要在海上。所以让自己的国土尽量沿海布局，以期随时得到海上力量的支持，是明智之举。这种战略调整，也让越国的国运得以支撑到战国后期。即然我们说越国的地缘优势在海上，那么在江淮地区有所收缩的同时，在沿海地区，越人就没有理由再后退了。事实上与吴国相比，越人在对沿海地区的控制上要更胜一筹。

如果越国希望控制住东部沿海地区，首先需要对外越地区进行直接的管辖，以增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因此在灭吴后的第二年，勾践就派人在此筑城，以稳固自己对外越地区的控制。至于筑城的地点究竟是在温州还是台州，亦或是在二者之间的温岭，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按照常理，在灭吴之后，越国其实应该把国都迁至太湖平原的中心——吴都，以便更好的控制整个江东平原。

但这时的越国，已经严重依靠海上力量支持了，因此处在平原中心，远离大海的吴都并没有成为越人新都的当然候选地。在大部分时期，越人还是将主要的政治中心，放在南靠浙闽丘陵，北临杭州湾的“会稽”。或者说绍兴平原山海之间的地理位置，更能充分发挥越人的地缘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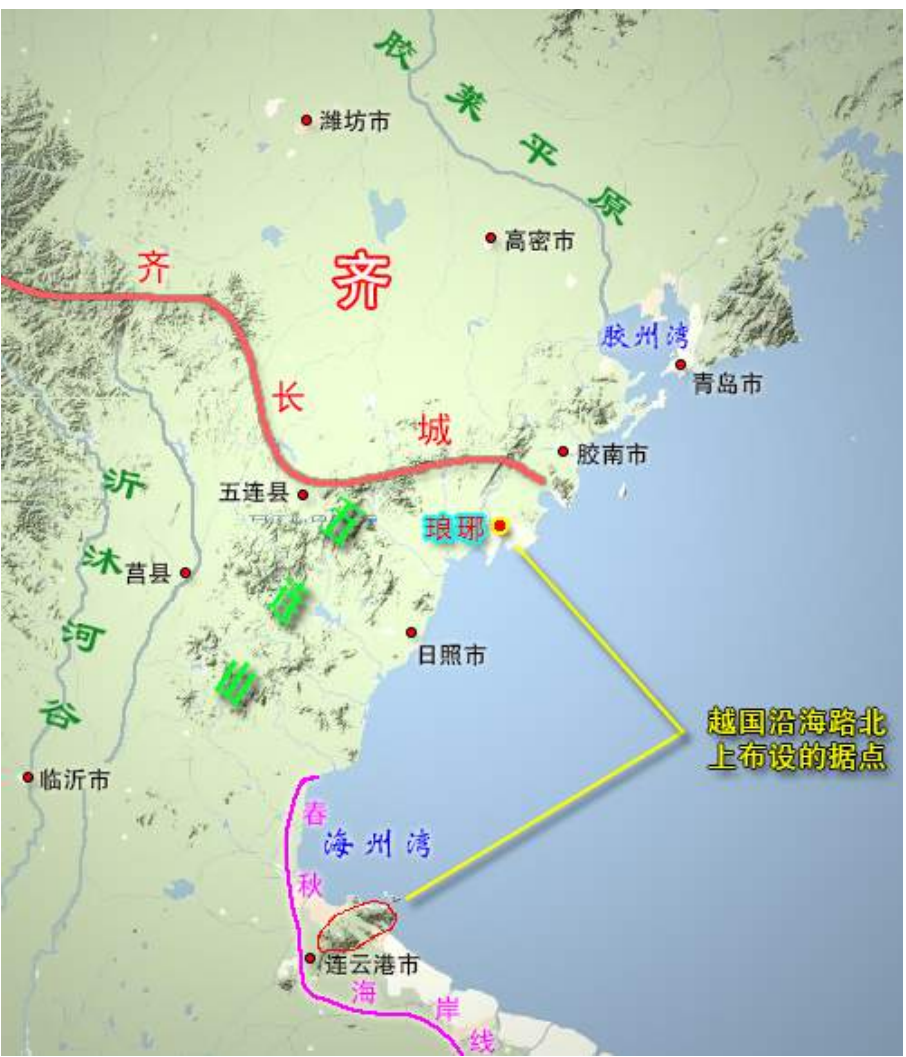
第五节 越国沿海路北上在今连云港一带和琅琊布设据点

在稳定了对长江以南沿海地区的控制之后，越人需要在北方沿海获得必要的支撑点了。而如果要达成这样一个战略目标，齐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日吴国也做过同样的构想，只不过是以失败而告终。吴人挑战齐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其实更适合控制内河湖泊。而越人则与之相反，海洋是他们优势地区。

如果我们沿着海岸线越过长江口北上的话，会发现存在大段的滩涂地。这在分析“江南省”时已经有过说明了。整个江苏境内的海岸线由于缺山，绝大部分是不存在天然港口的。这种情况一直到江苏北部的连云港才有所改变。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地区有一小块单独的山丘，海拔要高于周围地区。这也让连云港市

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江苏省唯一的海港城市。不过在春秋时期，海平面要高于现在，连云港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大陆，成为了岛屿。为了控制沿海地区，越人在这个岛屿上也建立了据点，以为中继（目前在连云港锦屏山已发现了越国筑城的遗迹）。

当越人沿海路北上，布局至“连云港”时，实际上还不会与齐人发生冲突。如果勾践及越国的野心不够大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止步于此了。不过吴王夫差既然已经在黄池“称霸”，那么吞吴之后的越王勾践就没有理由只是偏安于东部沿海了。只是连云港这个小岛，固然能够为越人在长江以北的海面上营造一个据点，但由于地理上不与大陆相连，并不能发挥太大的战略作用。因此越人需要再向北，在山东半岛上获得一个港口，以为支撑。而这就必须与齐国发生矛盾了。



越国沿海路北上布置的据点

越人在山东半岛选定的登陆地点叫作“琅琊”，位置就在现在青岛所在的胶州湾的西南。如果从地形上来看，正是五莲山脉与东海的那个夹角之上（现胶南市琅琊台），当时齐国已经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此，并在其西北设立琅琊邑。越人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登陆，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从地理条件上考虑，琅琊东北部的胶州湾会是更好的选择，正如青岛在近代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一样。

但问题是，胶州湾的背后就是胶莱平原，而胶莱平原现在已经是齐国的腹地了。如果越人希望占据胶州湾的话，势必会引发与齐国的全面战争，而这是越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越国最终还是将目标锁定在琅琊，并在此筑城。而五莲山脉与东海之间的

这条狭长地带，原先是由莒国及一些小型的东夷部落所控制。齐国也只是刚刚渗透进来，并没有进行过实质的经营（甚至可能没有真正派军控制）。所以对于越国的强势介入，齐国选择了退避，并在五莲山的北端，筑长城以防止越人（包括后来的楚人）进一步的北侵。

根据史书记载，越王勾践在灭吴之后，曾经将国都迁至“琅琊”。这一点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因为琅琊的位置离齐国实在太近了，并且远离越国本土。如果按照陆地扩张的原则来看，越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控制这块“飞地”的。由于这种选择有些不符合常理，因此对于“琅琊”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位于齐长城南部，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台以外，江苏的连云港地区（古属赣榆所辖）是最被怀疑是“琅琊”的真正地点。



越国控制范围示意图

而只需要控制住相应的港口就行了。而越人如果想要控制东部沿海的话，在东瓯——杭州湾——连云港——山东半岛，这四个地点依次建立据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当然，连云港和琅琊台的地理条件固然能够为越人提供相应的港口，但如果要作为越国的国都，还是有所欠缺足够的战略纵深。

因此更大的可能是越国只是将二者作为威慑北方诸侯，保护其沿海领土的军事

实际上前人的这种怀疑，都是基于陆地思维。在陆地上进行扩张，的确是需要有将所控制的国土连成一片，并且一般不能过于狭长，否则很容易被对手切断（特别是在没有山川进行保护的时候）。问题是海洋扩张的形式与陆地并不完全相同。在海洋上进行扩张时，你并不需要控制所有的海岸线，

据点，而非真正的政治中心。在越人强大的海上力量面前，唯一有能力挑战的只有齐国。不过越人“聪明”的选择，并没有侵犯到齐国的核心利益。并且越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并非吴国所能比。更何况越国的陆战能力亦让人胆寒，特别是那种不怕死的打法，让富庶的齐人更愿意与之和平共处（史书记载越人派到琅琊台的是：“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虽然不可能与齐国打一场全面战争，但足以威慑齐人）。

第六节 越国在泗水河畔举行会盟和称霸

经过对准、泗、海三地的调整之后，越国实际上已经与楚、齐、鲁、宋等国达成了地缘平衡。一方面越国通过主动让出吴国所侵占的土地，向邻国示好，树立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则通过向东南方向收缩江北的国土，建立强大的海上基地，来确立自己东海大国的地位。现在的越国，无论是从实力上，还是声望上都可以称霸了。因此勾践也随之渡过淮河，在泗水河畔（今山东滕县，也就在现在的微山湖西，枣庄的北面）与齐、宋、晋、鲁等诸侯会盟，并号称“霸王”（项羽后来就“继承”了这个称号）。为了让这个程序更加完美，已经势微的王室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盟。

不过周天子是不可能给勾践封王的（当年楚人倒是提出过这种要求），他所做的表示是将越国由那个专属蛮夷的“子爵”，升至“伯爵”。这样做不仅等于认同了勾践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也算是为越人洗刷了“蛮夷”的身份。对于越人来说，也应该满意了。

勾践当时应该还是想进军中原的。不过与楚国相比，越国的组织结构更为松散。在灭吴之后，勾践大封子弟为王为君。这种裂土封侯的做法，也算是学习周制。只是进入战国之后，中原诸侯们控制国土的方式都已经由“分土”制转变为“分人”制。也就是说，周朝所建立的层层封建，间接管理的形式，开始向郡县制的中央集权转变（统一后的秦国只是集大成者）。在这种情况下，后起的越国却还在因分封所造成的内部分裂而无力扩张（这种相对落后的管理方式，对于越人的影响力甚至延续到了汉朝）。

其实千万不要小看了楚国的管理能力。最早设立君主直属的“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就是楚国（公元前 690 年，楚灭湖北境内的权国，将之设为县，归楚王直辖）。不过在早期，郡县一般是设立在边缘地区，用来控制新征服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则开始改革而成了一个普遍的制度，并延续了 2000 多年。

吴越的部分就分析至此了，越国的基本地缘结构在战国时期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越国所占据的那些土地，本来就不是北方诸侯与楚国争夺的重点。因此

在战国时期，越国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游离于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之外的。

对于中央之国的诸侯们来说，黄河流域仍然是天下的中心。而黄土高原上的山西高原以及渭河平原则是争夺这个中心的枢纽地区。它们的归属与走向在公元前后，直接决定了中央之国的命运。因此我们还会花费笔墨，对这两个地理单元的代言人——秦和晋两国做重点分析。

第二十九章 秦国和晋国对河西之地的争夺

第一节 秦晋争夺河西之地的历史背景

最近都在长江流域转悠，现在该回到黄土高原了。让我们去看看黄河两岸又有哪些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分析到的。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对于黄土高原上的“秦”、“晋”两国已经做过一次分析，不过那时候的重点在于分析秦晋两国初始的情况，而对它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却没有进行解读。事实上即使是只看过“炎黄”章节的人也应该意识到，这两个共处于黄土高原上的诸侯国，地缘关系应该是十分紧密的。

纵观历史，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秦晋博弈的篇幅都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赵、魏、韩三国又称“三晋”，皆为春秋晋国分裂而来）。而将这一部分放在最后，既是作为压轴，对春秋时代做一个总结，也是通过“三家分晋”的典故，开启战国时代的地缘格局。要想搞清楚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我们还得先回到东周之初，即“平王东迁”的时代。在王室被迫由“镐京”东迁至“洛邑”时（也就是由“渭河平原”迁至“洛阳盆地”），一共有四个诸侯国出了大力，也就是秦、晋、郑、卫四国（勤王四国）。这四个国家也因此取得了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四大地理单元的地缘优势。

如果要横向比较这四个诸侯国当时的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晋国，最弱的则是秦国。晋国的优势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则是地缘上的。当年周公在重新分封诸侯国时，之所以将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在与渭河平原隔黄河相望的汾河谷地，目的就是为了拱卫王室的安全。因此晋国不仅获得了一块位置绝佳的封地，还得以在春秋之时，在山西高原诸盆地中开疆扩土，并吞其他诸侯国。

而秦国的情况则要比晋国差得多了。在王室东迁之前，秦人不过是以“附庸”的身份帮王室养马罢了。如果纵向和自己之前的状况相比，通过这次忠勇的护驾行动，秦人应该是获益最大的。不仅受封进入了诸侯的行列，还得到了周天子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岐山以西的土地。当然前提是你有本事赶走那些入侵的戎人。最终秦人的确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张空头支票兑现了。不过在秦人由西至东“为”周王室收复渭河平原上的土地时，与晋人一衣带水的“晋人”也没有闲着。

晋人在春秋初年通过“曲沃代翼”完成内部整合后，一方面加大了对山西高原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诸侯国的并吞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假途伐虢”之计，将势力范围向南越过黄河，控制了“渭河平原”至“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

“崤函通道”。控制这个战略要点的目的，是为晋国稍后进入中原争霸做准备，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考虑的。而与之相比，晋人对于渭河平原的兴趣显然要更大些，因为这块丰腴之地才真正能够为晋人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秦人经过数代努力，好不容易收复丰镐之地，并逼近黄河时，却发现晋人已经在黄河西岸等着他们了。这让已经将自己认定为河西之主的秦人，觉得既无奈，又愤愤不平。只是从表面上看来，王室虽然授权秦人对戎作战，但却并没有将渭河平原所有的土地都分封给秦国¹。所以晋国越过双方的地理分割线——黄河（这段由北向南的黄河，古称“西河”），由东向西做同样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妥。



秦晋地缘关系示意图

在当初分析秦人的先祖——秦非子是如何进入渭河平原时，我们曾经做了一张《秦·周地缘关系图》。在这其中，作为渭河（水）的重要支流——泾河（水），对周人的兴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实际上，渭水之北，除却泾水外，东面还有一条水量最大的支流——洛水，也注入了渭水。只是洛水与渭水汇合之后，很快就流入了黄河。因此洛水其实也不应归属于渭水的支流（有点像洛阳盆地上的伊、洛两河的情况）。

不管渭、洛两河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主谁次，整个渭河平原，或称关中地区的水系，主要是由两纵一横的泾、洛、渭三河组成是不争的事实。而秦晋两国最初达

¹ 东周平王元年，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周以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之地赐予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始封为诸侯，立西峙，祠白帝（即少昊）。即周王室赐给秦人在渭河平原的土地只是岐山以西，只是秦人没有严格遵守，还是向岐山以东扩张了。

成的地缘平衡线就是洛水。从此之后，洛水与黄河之间的这片土地，就成为了秦人的心病。整部秦晋关系史，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块土地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由于这块土地位于陕北高原以南，黄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之为“河西之地”。

第二节 秦国意图趁晋国出现内乱之机夺回河西之地

虽然秦国在后来一统江湖，成就了伟业，但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实力才算得上是诸侯中的老大。这主要得益于山西高原那独特的地理结构。对于晋国来说，外有黄河、吕梁山、太行山拱卫，为之提供安全保障；内有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那些如珍珠链般的盆地群，为晋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大片平整、松软，易于耕种的黄土。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得晋国在统一山西高原内部各地理单元时，能够较少的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统一之后，又容易保得住胜利果实。

当然，内部条件好，并不一定就能够成就霸业。如果远离地缘博弈中心，偏安一隅往往更容易成为选项（比如以后我们将要分析到的成都平原）。不过山西高原这个地理单元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周王室的政治中心是在渭河平原，还是洛阳盆地，与之都只有一河之隔。而如果晋人愿意，向东走出山西高原，就是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带。坐拥如此优越的地理单元，晋人的地缘优势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山西高原的地缘结构便之能够攻守兼备的话，那么秦人所在的渭河平原其实也具备类似的条件，只不过与山西高原内部的平原，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几个盆地不同的是，渭河平原本身并没有天然的山脉将之切割为数块。也就是说，渭河平原更有条件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出现在地缘政治的舞台上。而现在的问题是，晋人由于先发优势，不仅取得了秦人进出中原直接通道——崤函通道的控制权，还直接进入渭河平原，将秦人的势力阻挡于洛水——华山以西地区。这实际上让秦国不得不与晋国分享渭河平原，并且在面对晋国时，需要长期保持一种低姿态。这种强弱有别的格局，也成为了“秦晋之好”的地缘基础（两个同样强势的人，一般是很难和平相处的）。

不过地理相邻的两个国家，地缘矛盾始终是会存在的。更何况晋人在占据了河西之地后，等于直接侵入了秦人的核心利益区。因此秦人始终是在处心积虑的向黄河渗透，“夺回”河西之地。从战略上看，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秦人经营好现有的土地，积蓄力量自然是最重要的；而如果在晋人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出手，则是一个战术机会选择的问题了。好在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内部总是不断上演着阴谋与背叛的剧目。

特别是经过“曲沃代翼”这种不义行为洗礼后的晋国，公室内外的政治斗争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当秦国处在他们最强大的君主（春秋）——秦穆公当政的时期时，晋国内部又一次出现了君位之争。这使得秦国第一次有机会“收复”河西之地。

第三节 秦国在夷吾许诺割让河西八城后扶持其归晋继承君位

秦人第一次“收复”河西之地的机会出现在公元前 651 年，距王室东迁（公元前 770 年），秦人受命征战渭河平原已经过去快 120 年了；而距晋国内乱 67 年之久的大小宗之争结束之年（曲沃代翼，前 678 年）仅仅 27 年。故事的开始具备中国传统宫廷斗争的典型特色，男女主角照例是一个漂亮而又年轻的女人和被她迷惑且位居君位的男人。至于故事的内容其实更加老套，即这个女人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而她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除掉原“太子”，以及除掉所有有资格争位的公子。其实这种事关生死与国家命运的大事，一般只跟权力与阴谋有关。由于这个“狐媚惑主”的女人叫作“骊姬”，因此由她引发的这场政治斗争也被称作“骊姬之乱”。

事实上这场动乱本身并无关地缘，之所以要在这里提起，是因为它的发生让那些将受其害的公子必须逃离晋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到外国去“政治避难”。这种现象在现在也不鲜见，在春秋之时更是司空见惯。在之前齐国就已经上演过类似的一幕，那次笑到最后的公子小白成为了春秋第一霸——齐桓公。而这次晋国的这出悲喜剧也将诞生一位同等重量级的霸主。为这些落难的公子提供帮助，并从中获取好处，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向来都是十分有兴趣的。作为与晋国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大国——秦国，当然是不会成为局外人的。

最先成为秦人帮助对象的是一个叫“夷吾”的公子。当时的情况和齐国那一幕很像，即留在国内的君位继承人，在动乱中都被谋杀了。因此需要从这些外逃的公子中选择一个人回来继承君位。只不过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生死时速般的归国竞赛有所不同，这一次外逃的几位公子却没人敢回去。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被扶上君位的两位公子（都是骊姬的儿子），都马上被大臣谋杀。如果加上之前已经被害的太子，等于先后已经有三位公子死在这场君位之争了。虽然说君位人人想做，但现在回去难保不会成为另一个牺牲品，因此外逃的几位公子都不敢贸然回国。

不过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夷吾”决定冒一次险。只不过如果没有外援的话，这个险是断然不能冒的。“夷吾”求助的对象锁定在了秦国身上。其



秦晋地缘关系示意图

实他之前避难的国家并不是秦国，而是在渭河平原东北角的梁国。按现在的行政归属看，梁国的位置在现在陕西韩省城市的南侧；从地理位置上看，梁国则是位于渭河平原的最北部，晋陕大峡谷的南侧，黄河的西岸，也就是河西之地的北端。对于梁国这类小诸侯国的存在，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虽然

河西之地现在是晋国的势力范围，但在春秋时期，特别是早期，基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兼并行为尚未白热化的原因，诸侯们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方式是很多样化的，除却自己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邑之外，让一些居于其间的小诸侯国甚至边缘民族依附于自己，更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模式。

就梁国来说，收留晋国的公子算是一种政治投资，但从实力上来说，这个小国并没有能力帮助“夷吾”摆平国内的动乱，因此夷吾转而向已具大国气象的秦国求助。只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特别是在政治交往中。因此夷吾向秦穆公所提出的条件是割让河西八城（也有说五城的）给秦国。一般认为这种做法是将河西所有的土地都交给了秦国，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城邑并非是晋国在河西土地的全部，但应该已经是主要部分了。不过让秦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城邑并非只在河西之地中，亦包含有崤函通道中的战略要点（史载东尽虢略）。崤函通道由于位于黄河以南，秦岭以北，又被称之为“河南”地，是秦人直接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能够同时向河西、河南两地渗透，无疑能够极大的扭转秦国在地缘格局上的被动局面。

最终在秦人的帮助下，公子“夷吾”回到了晋国，并坐稳了君位，史称晋惠公。只不过当他坐稳君位之后，却并没有履行诺言，将河西（河南）八城割让给秦国。之所以做出这种决定，表面原因是因为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如果从道义上来看，这位晋惠公无疑是一位不守信用的人。但从国家利益上来看，晋国如果真的让秦国控制了河西之地以及崤函通道的话，那么秦国将不可避免的成为晋国逐鹿中原最大的对手。因此在国家利益以及个人信誉之间做选择的话，晋惠公只能自食其言了。在这种情况下，秦晋两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四节 秦晋以饥荒借粮问题为导火索而爆发战争

在秦国准备通过战争手段向晋国索要河西地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晋国因灾而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援，而秦穆公则不计前嫌，给予了援助。对于一般人甚至君主来说，以德报怨说说可以，真要做到却是非常难的。秦穆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在累积政治资本。对于一个志在中原的君主来说，做一些看似吃亏的事情，以博得其他国家，甚至敌国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

地缘政治研究的目的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有哪些地区是可以为你提供地缘基础的，至于谁能够成为那些兵家必争之地的主人，却是不一定的。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会很多次的看到，一些出身于四战之地的君主，通过自身的努力，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并最终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

现在对于秦穆公来说，无论他的志向有多么远大，都必须解决眼前最现实的问题。一是如果处理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晋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取得最应该夺取的土地——河西之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即如何能够让晋国退出河西之地。如果要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秦国这次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其实并不简单。秦国当时派遣了大批的人员和船只从秦都（雍城）出发，水陆相接，延绵八百里，将粮食运至晋都¹。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军事演习，让护送粮船的军队熟悉一下将来的进攻路线。当然，对于优秀的政治家来说，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追求一石二鸟，甚至数鸟的效果。

因此秦穆公如果真的在树德的同时，有这种务实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想现在那些在联合国授权下的维和行动就明白了）。因为无论如何，只要晋国不肯退出河西之地，战争迟早都会发生的。最终战争在公元前 645 年爆发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秦国也遭灾了，而晋国却拒绝救援。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自然让秦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更具正义性（以晋惠公在继位之前答应割让河西之地为借口，虽然也说得过去。但当时多少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关于发动一场战争是否需要正当的理由，政治家们一般都会有充分的考虑的。

1 冬，晋荐饥，使乞糒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左传·僖公十三年传》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却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说不需要考虑旁观者的感受。但实际上，这种考虑是有现实意义的。除却可以激发己方的士气以外，更重要的是让旁观者在选择支持对象时，必须考虑道义上的风险。按孟子的说法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发动战争的理由充分与否，会直接决定敌我双方盟友的数量。而从现在情况来看，晋国只能独自面对秦国的进攻了。

第五节 秦军攻入晋国河东之地所用的黄河渡口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秦国的进攻路线了，对于秦国与晋国决战的地点——“韩原”究竟在哪，一直还是有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韩原大战”到底是在河西打的，还是在河东进行的。最正统的说法是由司马迁他老人家认定的，也就是在陕西韩城一带，其实韩城也是司马迁的故乡。至于这种关系有没有对他的判断造成影响，就不好妄加揣测了。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韩原其实在河东。最主要的依据是《左传》，在那里明确记载了，秦穆公所带领的秦军最终是渡过黄河，然后与晋惠公带领的晋军主力决战的¹。而在此之前，秦军已经取得了三次接触战的胜利。

如果从地缘和逻辑上来看，秦军渡河而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不是秦军已经进入晋国的核心区，晋惠公亲率大军迎击的必要性不大。不管是谁渡河与对方展开决战，如何渡过黄河都是一个问题。如果将崤函通道也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秦晋之间所争夺的这几个地理单元，是由一段“L”形的黄河作为切割线的。而这段河面上最为著名的渡口有三：一是中条山西北侧的蒲津渡；二位于中条山西南侧，黄河拐角处的风陵渡；三是陕地（现属河南三门峡市）对岸的茅津渡。

当然，黄河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渡口，如太阳渡、大禹渡、夏阳渡、龙门渡，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应该说蒲津渡、风陵渡、茅津渡三个渡口，在历史上对于陕、晋、豫三省的地缘关系最为重要。当关中（渭河平原）

¹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余，故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

——《左传·僖公十五年传》

的政治力量想进入运城——临汾盆地时，他们会首选从蒲津渡渡过黄河，直接进入运城盆地，进而向北进入临汾盆地；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经由风陵渡渡河，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可以北上进入运城盆地，也可以顺着中条山南麓东行，到达茅津渡，然后南渡黄河入陕地，至洛阳盆地。



秦晋地缘关系示意图



黄河龙门（禹门口）

对于秦人来说，如果能够渡过风陵渡，占据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这条狭长通道，就可以切断晋人与崤函通道的联系。这样做不仅能够保障自己与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的交通线，也可以切断

晋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路径（晋人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要大得多），进而在秦晋争霸中占据地缘优势。无论是秦晋之好，还是秦晋争霸时，秦人都曾经多次经由风陵渡渡过黄河。在秦穆公时期，他还到茅津渡东侧的山地上去与戎人作战。这种做法虽然看似是为了整个周王朝的利益，并得到了王室的授权，但实际的



蒲津渡遗址位置图



蒲津渡遗址的铁牛与铁人

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室其实只是让秦人把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扫清就行了）。

由于黄河刚从晋陕大峡谷出来之时，水流还很湍急（像龙门渡只有在3月冰融之后，6月雨季之前才能渡河），因此在古典时期，水流已渐平缓的蒲津渡一直是进出晋陕的主要渡口。由

于这一段黄河在二千年来一直在小范围变迁（总体向西移动），蒲津古渡遗址已经离黄河有几千米了。这个渡口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有三：一是在此挖出了唐代的铁牛与铁人（记得中学语文课中有介绍的）；二是渡口处有一座著名的楼阁——鹳雀楼。相信王之涣那首著名的《登鹳雀楼》，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第三就是蒲津渡早在秦昭王时期（战国）就已经铺设了浮桥，这也极大的提升了蒲津渡的战略价值，唐代所筑的铁牛铁人，实际上就是用来固定浮桥的。

划分河东、河西的黄河（西河）由于不断的变迁，还造就了一句俗语，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即由于河道经常会变化，河东的村庄几十年后也许就跑到河西去了。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秦晋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恰当的。因为所谓秦晋之争，本质上也就是河东、河西之争。当晋人能够占据河西之地时，他们则占据了主动；而当秦人能够在河东立足时，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的衰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我们认定河西之地主要指的是陕北高原以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片三角地，也就是渭河平原的最东端（亦包括渭水以南至华山一线的土地，因为不堵上这个口子，晋国就无法占据整个崤函通道）的话，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认定一下河东之

地的范围。从地缘结构来看，运城盆地是河东之地的主体。当秦人渡过蒲津渡或风陵渡之后，他们首先要占据运城盆地，之后再向晋国国都——翼地所在的临汾盆地渗透。因此秦晋之间发生在河东的主要战争，大部分都集中在运城盆地一带。

第六节 秦国在韩原之战中打败晋国后取得河西之地

韩原之战算是秦国正式攻入晋国本土的第一战，最终那个无信的晋惠公接战的地点，据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汾河南侧，临汾盆地的入口处（山西河津东南）。对于晋国来说，这场战役的失败，意味着秦国已经打开了晋国核心区的门户，形势是极为不利的。不过秦人也十分清楚，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的整体实力就超越了晋国。虽然这次战役是发生在河东，而且晋惠公本人也在战役中被俘。但就秦人来说，他们的战略目的还是拿到河西的土地。

最终，晋惠公还是交出了河西之地，秦国算是正式成为整个渭河平原的主人。双方所签订盟约的地点是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点就是洛、渭、河三者相汇处，与蒲津渡隔河遥望，时称“王城”（现陕西大荔东）。当然，那个时候，渭河平原上还是有一些小的诸侯国和部落，晋国在边缘地区也依然还留有一些据点。在秦国成为河西之地的主导者之后，他们首先就将北面的梁国给灭了。而晋国也未放弃重新渗透入河西地区。



秦晋地缘关系示意图

终整个春秋时期，秦晋之间仍旧在河西进行过数场战争（如辅氏之战、彭衙之战），晋国与其盟国甚至曾经越过洛河深入秦国腹地攻至泾河。不过秦国通过韩原之战，还是从战略上扭转了自己形势，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主动权，晋人始终未能恢复他们在河西之地原有的地缘优势。这种地缘平衡直到晋国分裂后，被新兴的魏国打破。那一次，魏国强悍的步兵（魏武卒）从秦军手中夺取了河西之地，拉开了战国争雄的序幕。

当然，秦国人也并不总是任由晋国的军队攻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军也曾经数次进入河东地，与晋军交战。比如令狐之战、河曲之战。这其中可以特别说一下的是令狐之战。秦晋之间发生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是因为晋国又爆发了君位之争，而秦国所支撑的公子，在秦军护送回晋国之后才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于是不甘心的秦军与晋军展开了激战，最终的结果是秦军落败。

这场战役的起因和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这只是秦晋百年恩怨中的一例，算不上是改变二者地缘关系的关键战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个叫“令狐”的地点。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蒲津渡的东北，运城盆地的西北。也就是说，晋军截击秦军的地点，在秦军将要北出运城盆地，将要进入临汾盆地之时。晋人选择在这个地点接战，说明他们比当年韩原之战时的反应要快，结果也不出乎意料。只是我相信“令狐”这个名称为大家所熟知，应该不是因为所谓的“令狐之战”，而是那位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其实写武侠小说的人为物命名时喜欢用复姓，多是为了让他们显得更特别些，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更酷些。

不过我个人宁愿相信金庸在为华山派弟子选择“令狐”这个姓时是做了一番思考的。因为河东的令狐之地，正是令狐这个姓的发源地。而令狐所在的河东之地，与华山的地理距离，以及地缘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真的要是华山派，相信它的弟子应当主要来源于河西、河东二个区域。前段时间听说几个地方为了西门庆的祖地而起争端，其实将令狐之地考证为令狐冲的家乡（现在那地方叫令狐村），并建个故居，搞个“笑傲江湖主题公园”什么的，估计比西门庆红得快。

第三十章 晋国假途伐虢及与楚国发生城濮之战

第一节 晋国意图灭掉虢国以取得崤函通道东端控制权

前面我们说过，晋国在秦国征战渭河平原时，不仅抢先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东端——河西之地，还取得了崤函通道的控制权。如果说河西之地对于秦人的意义，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以自保的话，那么崤函通道则是秦人进入中原，参与争霸的必经之路了。

崤函通道的西头，就在黄河的那个拐角与华山之间，后来著名的“潼关”在这里筑关在此。这里本来是分封给郑国的。不过在郑国先知先觉的东迁之后，晋人填补了它的空缺。这样，洛水——华山一线就成为了秦晋之间的地缘分割线。而在崤函通道的东头，晋人同样希望取得主动权。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个东迁到陕地，并且跨河立国的“虢”国，就为了晋人的眼中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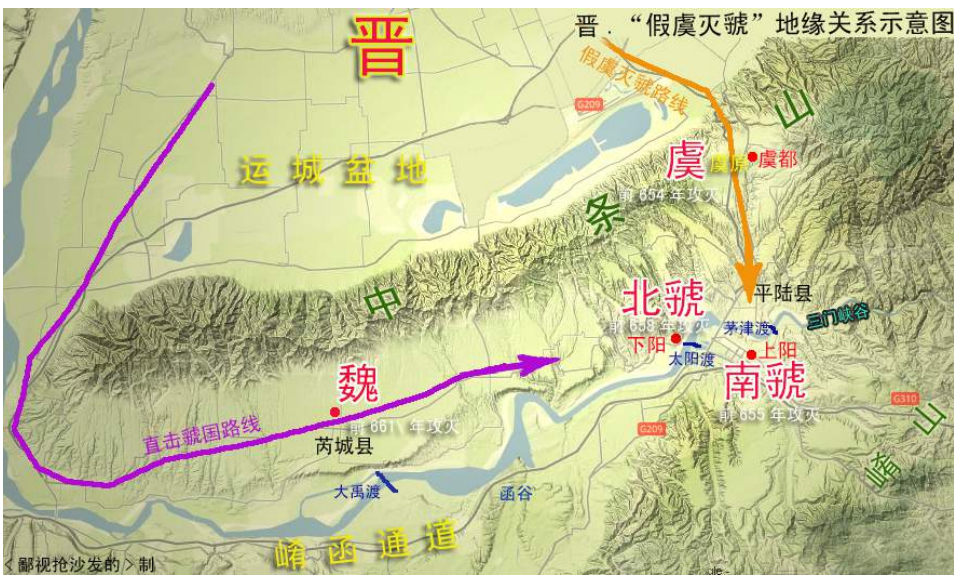
晋假虞灭虢地缘关系示意图

由于这个虢国的国土分列在黄河的南北两岸，因此这个新“虢”也被分别称之为“北虢”和“南虢”。其实他们是一个国家，主体是在黄河南岸。虢国人在此所筑的都城叫作“上阳”，而他们在黄河北岸所建立的战略要点叫作“下阳”。就陕地和南、北虢国的地缘价值，我们在春秋之初已经做过一些分析了。应该说南虢所在的陕地，不仅能够限制住秦、晋两国的势力沿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向中原渗透；

也能封堵住晋人南渡黄河，直接进入崤函通道东端的路线。因此，对于整体实力越来越强的晋国来说，拔除掉这颗眼中钉是他们争霸中原的前提。

陕地（现属河南省三门峡市）所在的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黄河之北的中条山，与黄河之南的秦岭在这个点上都有向黄河挤压的态势。也就是说，黄河南出晋陕大峡谷后变宽的河道在陕地开始收窄。这种地理结构，让陕地成为了枢纽地区的可能性。由于过了陕地之后，直到进入洛阳盆地前，黄河都是在峡谷中穿行，因此陕地一带（包括它对岸）成为了进出山西高原的重要渡口所在地。无论是从中原——洛阳盆地西进山西高原，还是山西高原上的居民想进入洛阳盆地，大多数时都会选择在此渡河。而这里也诞生了著名的黄河古渡“茅津渡”。

茅津渡的地理结构其实和龙门渡有点像。都是在黄河进出峡谷的节点上（前者



晋假虞灭虢地缘关系示意图

为三门峡，后者为晋陕大峡谷）。只不过龙门渡的水流刚出峡谷，水势正强，渡河的难度很大。而茅津渡则不一样了，这里由于河道变窄，水流反而变得缓慢了，加之河道不宽，所以成为了历代兵家的

必争之地。不过说到晋国“假途伐虢”之役，却并没有利用到“茅津渡”，晋军是从茅津渡西面的“太阳渡”渡河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茅津渡一带的地形已开始进入山地，而控制它的，正是被周人所鄙视的“戎狄”。

晋人在实施“假途伐虢”战术之前，已经基本整合好了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但当他们希望继续南进，企图掌握黄河两岸的控制权时，却遇到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中条山”。由于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北岸，晋人的南进路线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最为平缓的路线是先绕至中条山的东头，沿蒲津渡、风陵渡南行至黄河北岸，再东进攻击虢国。虽然说这条路线较为平缓，但最大的问题是路线较远。不过距离倒不是最致命的，晋人可以沿中条山南麓逐次攻击前进，在将中条山以南、北虢以西的土地都收入囊中后，再对虢国发动最后的攻击。

事实上晋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公元前661年，晋军攻灭了中条山南麓的“魏国”

（现山西芮城县北），并将之分封给了一个叫“毕万”的大夫，而这位毕万的后代也成为了“晋国六卿”之一，并成就了战国七雄中的“魏国”（也成为了魏姓的始祖）。只是当晋国通过灭魏，进逼至北虢西境时，却并不代表顺势拿下北虢。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是因为所谓“北虢”，其实只是黄河南岸的“南”虢在北岸所控的一块飞地（下阳），如果晋人发动攻击的话，虢军可以从黄河南岸的上阳城渡河支援下阳；另一个原因则是，在虢国的北部，中条山中还有一个诸侯国——虞国。

第二节 晋国通过假途伐虢的战术吞并虢国和虞国

说起虞国的位置，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因为它的核心区其实是建在中条山中的一小块平原之上的。由于这块平原是中条山中的小盆地且为虞国的故地，因此古称“虞原”。虞原地理位置的特别之处在于，虞国人可以比较容易的在中条山南北两侧穿行。并且只要控制住盆地南北两头的山口谷道，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抗打击能力。如果说虢国控制的是黄河渡口，那么虞国控制的就是穿越中条山的快速通道了。而这两个点又恰巧呈南北方向排列，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形态。在两国达成同盟时，如果晋人从北进攻虞国，虢国可以从南面给予支援；而如果晋人从已经吞并的“魏”地东南进攻虢国的话，那么虞国则同样可以对虢国以支援。



晋假虞灭虢地缘关系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晋国能够采取突袭的方式，迅速攻灭一国。只是不仅虞国的核心区处于中条山的保护之中，就是北虢的下阳城也不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中条山南麓所延伸的那些南北向的支脉，让由西至东的攻击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晋国有足够的军力和耐心分别从中条山南北两侧发动进攻，通过持久战同时解决掉虞、虢两国。而比这种硬碰硬的打法更值得使用的是打破“虞虢联盟”，然后个个击破。

晋国最终选择的拉拢对象是虞国。其实即使虞国保持中立，仅仅是借道，晋国的目的就达到了。不过贪图财物的虞人不仅同意借道，还直接参与了对下阳城的攻击。在曾经的盟友转变为敌人的情况下，虢国丧失他们在黄河北岸的据点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一年是公元前 658 年，离晋国攻灭魏国仅仅过去了三年。晋国之所以这么高效率，或者说是如此急于取得黄河渡口的控制权，是因为在前一年（公元前 659 年），秦国那位胸怀大志的君主——秦穆公上位了。

他刚一上位，就对占据茅津渡的戎人发起了攻击（史称“茅戎”），并取得了胜利。相比于虢国所控制的太阳渡，茅津渡的河面要更窄，也更方便渡河。这也使得茅津渡在以后的历史中，成为了从山西高原南渡黄河的主要渡口。秦国的这种跳越式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的是很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秦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肯定也是向茅津西面的虢国借道了。虽说秦人打的是为王室驱戎的旗号（因为茅戎经常凭借茅津之利，南渡黄河侵扰洛阳盆地），但在王室控制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秦人亦有很大的可能回手就将虢国给灭了。如果秦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假虞灭虢”的典故就将被改写为“假虢灭茅”了。

由于黄河这条天然的地理分割线存在，晋人就算可以容忍秦人通过崤函通道进出中原，也断然不愿意看到秦人越过黄河，渗透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就像秦人对于晋人占据河西之地，一直耿耿于怀一样。因此对于晋人抢先采取这种有失光彩的战术，吞并两个同宗诸侯的心情，我们也应当表示理解。毕竟春秋乱世的格局已经形成，谁能够抢先一步将防线推进至天然障碍面前，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比起后起的秦国，晋国显然是抢占了先机。

需要说明的是，“假途伐虢”的战术，晋人其实实施了两次。公元前 658 年那次先攻占了黄河北岸的下阳；三年以后又故技重施，渡河攻占了上阳城，完全灭掉了所谓的南北二虢；第二年又借回师休整之名，出其不意吞并了虞国。至此晋人算是完全控制了河东地区，并将势力范围延伸至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假途伐虢”战术的实施者就是那个娶了骊姬，并欲废长立幼，触发“骊姬之乱”的晋献公。

在此，我需要向看贴的朋友，以及为丰富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而辛勤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道歉。因为在此之前我曾经建议想象力丰富的朋友，抢在那些著名编剧之前，将这个有“桃色”潜质的故事包装成影视剧。但事实上我低估了艺术家们的历史敏感度，因为早在 2003 年，36 集的《骊姬传奇》便横空出世了。那位以军人形象活跃在荧幕上的段奕宏亦在此片中担当主角。不出所料的是，编剧们丰富的想象力依旧是“绕枕三日”，让人“三月不知肉味”（吐的）。最经典的桥断是段团长所扮演的角色，QJ 了秦海璐所饰的骊姬，并生下了晋国新的继承人。只是不知道

晋国的那些先人们九泉之下看到这些情节，会不会从坟墓中跳出来。

第三节 秦穆公扶持公子重耳返回晋国继承君位

关于“骊姬之乱”在秦晋地缘关系上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在之前已经交待过了。实际上在晋惠公上位，秦晋通过“韩原之战”夺取晋国控制的河西地之后，这场动乱所造成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因为秦晋争霸的主角之一“晋文公”也就是“重耳”还未正式出场。重耳和夷吾（晋惠公）都是晋献公的儿子，也因骊姬之乱的原因在外避祸。相比于夷吾躲在左近的“梁国”，重耳跑的范围就要广得多了。在他十九年的逃亡生涯中，齐、楚、宋、郑这些大国都曾经留下他的足迹。对于一位公子来说，这当然是一种磨难。不过这种流亡的经历，也让重耳充分了解了黄河下流乃至长江流域几个重要大国的地缘结构。这也是他仅仅在位九年，便成就了霸主地位的基础。

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继承君位，仍然与秦穆公有关。对于地缘上相对劣势的秦国来说，通过介入晋国的君位之争，以获取政治筹码，一直是秦人所惯用的方法。因此在韩原之战后，秦国在取得河西之地的控制权后，还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将晋国的太子，也就是晋惠公的继承人入秦国为质。这种做法当然是有要挟的意思，不过对于秦穆公来说，他的本意其实是培养晋国的下一代君主在感情上更亲近于秦国。因为以双方的整体实力对比来说，秦晋之好的局面，比秦晋争霸的局面，要对秦国更为有利。

因此对于这位入质的太子，秦国给予的待遇是很高的。秦穆公甚至将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这位晋国太子，希望再结秦晋之好的诚意应该是足够的了。问题是与秦穆公的战略眼光相比，这位晋国太子显然要差许多。在自己的父亲病重之时，由于担心太子之位不保。在没有通知秦人的情况下，这位秦穆公的女婿独自跑回了晋国，并成为了新的国君。其实这位太子如果不是自己跑回去的话，秦国也一定会派军护送他回国继承君位的。而他这种“忘恩负义”的做法让秦国对于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的想法落空了。也让秦穆公意识到，他需要再找一位投资对象，以替换掉这位没有政治眼光的“白眼狼”。

这位新的投资对象就是重耳。而这其中让喜欢八卦的人感兴趣的是，秦穆公将被前太子遗弃的女儿又嫁给了重耳。尽管先秦之人的观念比之现在要开放得多，不过这种把侄子的妻子改嫁给伯父的做法，也的确够可以的。只能说在政治家看来，所谓儿女之情并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能够为之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才是最吸引人的。关于这段真实“艳史”的细节，感兴趣的可以在网上自行查找。在这里我们所关心

的是，晋文公上台之后，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解读的（电视剧《酈姬传奇》里重耳与骊姬还发生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所以想看艳史解读的，还是找这些导演编剧比较对路）。

重耳终于在秦穆公的支持下成为了“晋文公”，秦晋两家由于姻亲的存在，也开始了一段蜜月期，所谓“秦晋之好”就是从这里来的。对于秦穆公来说，之所以费尽心机介入晋国的内部事务，除了想拿回河西之地以外，更想东出崤函通道去中原一试身手。如果晋国从此能受秦国控制，自然是最好；即使不能，双方保持一个良好关系，并达成同盟，共同图谋中原，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于还未完成渭河平原整合的秦人来说，能够在晋国的引领下到中原地区去一试身手，会安全得多。

第四节 宋国国土缺乏山地保护而只能依托河流防御外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原及东方诸大国的情况。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公子小白），在晋文公登上君位之前就死了，齐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君位之争，并因此而陷入了周期性的衰弱，已经不具备争霸的条件了。而昔日的河北大国——卫国，在戎狄的压迫下，在齐桓公时代就已迁入河济平原，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至于先知先觉的郑国，已经耗尽了它的先发优势。这个小霸之国此时正在遭受来自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选择依附于楚国，让楚国派军队驻扎于国都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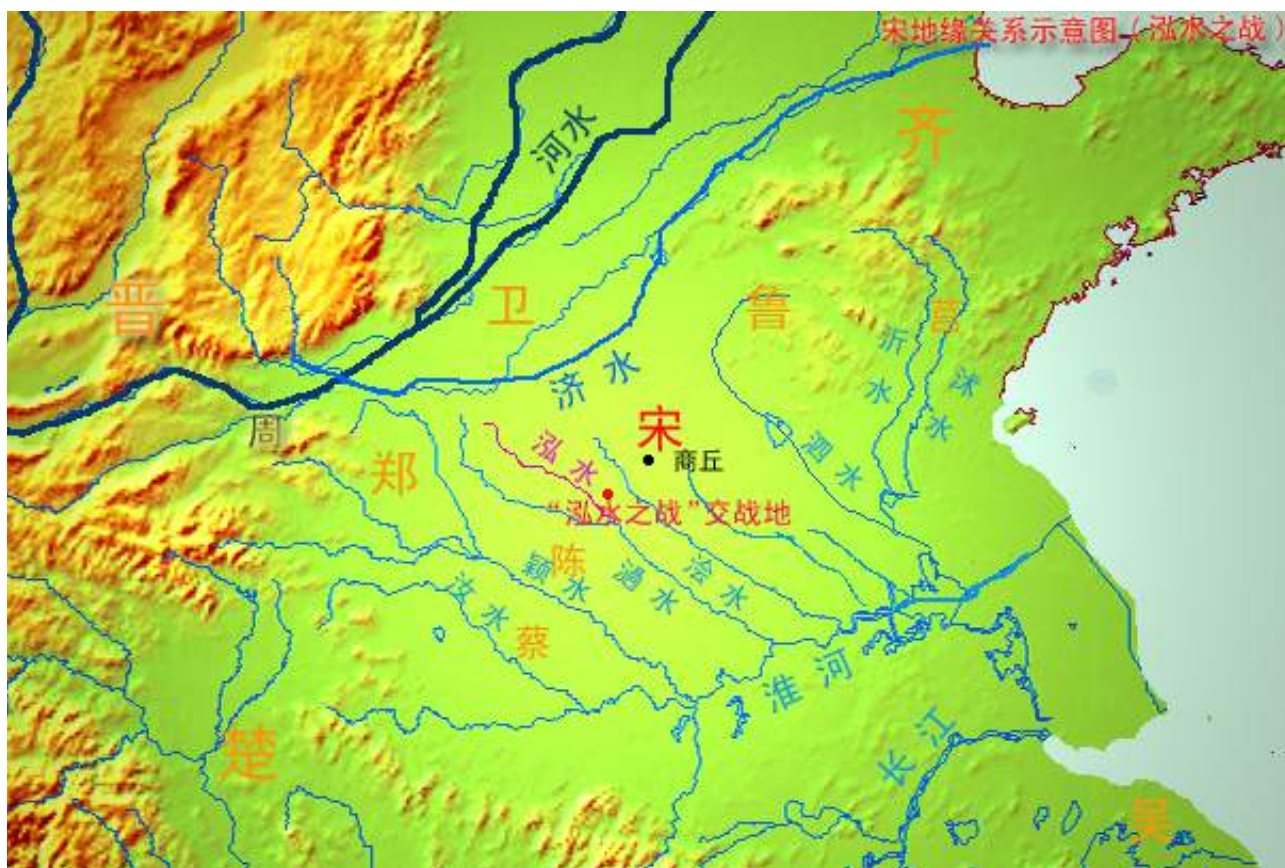
也许鲁国有机会出来重新显示一下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有齐国这个“天敌”在后面，鲁国人的注意力依旧无法从泰沂山脉和泗水流域转移出来（郑国当初能够小霸，是因为它的后方是衰弱的王室）。如此看来，那个被周人所不齿的南方蛮夷——楚国倒是最有机会入主中原的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姬姓诸侯们已经不能同心同德的时候，楚人开始了他们的强势扩张。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淮河流域的蔡、陈、息等国，甚至之前的小霸郑国，都为楚国所控制。楚人现在正在东北向的向济水渗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个霸主就应该是楚国了。

依楚国的地缘条件，在春秋乱世中称霸一时几乎是必然的。只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真空时期，有这种想法的并非只有楚国。那个虽非姬姓诸侯，却也有着高贵出身的宋国，也同样有意竞争霸主之位。宋国在中原诸强中的地理位置居于东南向。国都所在地是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这里也是当年商王朝诸多都城中的一个。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宋国的地理特点就是“平”，无论向哪个方向拓展，宋人基本都不会遇到山脉的阻隔。如果从城市建设和耕种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非常适合居住的一片土地。但问题是，当你处在乱世之中时，这种没有天然山脉保护的大平原地区，

事实上会让你四面受敌，成为所谓的“四战之地”。

依托纯粹的平原而成为一方霸主的例子并非没有，后期发迹于太湖平原的吴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吴国经营江东地区成功的经验，在于提升了河流的战略作用。在平原地区依靠人工修筑引导，构筑出一套河网系统。这一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吴人提供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

与吴国依托长江构筑自己的防御体系相比，宋国所能够依托的河流主要就是济——淮之间那些南北向的河流了。这些河流基本都是淮河的支流。如果这片土地让吴人来经营的话，他们会想办法向北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济水，向南延伸至淮河，然后再在商丘东西两侧选取两条甚至数条南北向的河流，构筑一条可以循环的河网系统。事实上后来吴人可以北上中原争霸时，也正是这样做的。“深沟”的开挖，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产物。



宋地缘位置示意图（泓水之战）

不过对于春秋初年的宋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吴人那样的意识。无法像吴人那样四季行船（冬季有可能结冰），是影响宋人乃至河、济诸国以船代马的地理因素（另外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没有长江那么宽）。问题是，即使不能构筑出封闭、全面的水网防御系统，河流本身防御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当宋人的威胁来自于西南方向的楚人时，那些南北向的淮河支流仍然可以为他们的逐级抵抗提供支持。

第五节 宋襄公称霸失败后与楚国爆发泓水之战

在齐国陷入内乱时，宋国的君主正是那个以“仁义”著称的宋襄公。现在的问题是，宋襄公图谋称霸时，并没有将地缘因素考虑进去。在他看来，资格似乎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王室的控制力依然存在的话，即使需要在诸侯当中找出一个领袖人物的话，也只可能在姬姓诸侯中作出选择。在那个时候，鲁国是最具有资格成为诸侯领袖的。而齐国以非姬姓诸侯的身份成为春秋首任盟主，让宋襄公也看到了机会。尽管宋人和楚人一样，都是属于非华夏体系。但宋国殷商王族的身份，还是让他自视比楚人更有资格成为新的盟主。

如果宋人能够认清形势的话，他们应该会清楚，在春秋乱世之中，如果不通过与其他大国进行一场，甚至数场战争的话，是根本无法获得霸主地位的。而宋襄公的悲剧在于，在他仅仅通过对几个小国的胜利（如曹国）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称霸的实力。所以在他召集齐、楚两国会盟，试图让自己“盟主”的地位获得大国认可时，悲剧便发生了。首先齐国与鲁国这两个有实力的国家根本就没去；其次楚人早有准备，将企图论资排辈“以德服人”的宋襄公扣了下来，后来又在诸侯的调解之下放了回去。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领袖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征服这个国家，仅仅扣留一个君主，并不会当然的取得胜利（有时候对于对方来说反而是好事，可以另立一个更有能力的君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战争即可以说是宋襄公挑起的，因为他向已经依附于楚国的郑国发起了进攻；也可以说是楚国挑起的，因为楚军旋即以救郑的名义进逼宋国的国都。其实战争是谁挑起的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还对称霸抱有幻想的宋国，还是自视最强的楚国，都需要用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场战争由于发生在宋国西部的泓水之滨，因此也被称之为“泓水之战”。

在楚军来犯之时，宋军可以依托的防线正是泓水。问题是这条天然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则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渡河并列阵之后方才应战。这种被毛泽东比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并非宋襄公所创。因为在上古之时，战争多是采取邀战的方式，即双方约定在一片开阔地，然后列队厮杀。这种战法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式”的战法，春秋之时还能看到些许案例，到了战国时期则基本看不到了。那时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为全方位的对抗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地形、计谋的运用等都成为一支军队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宋

襄公只是因为他那不合时宜的行为，成为了“最后的贵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欧洲，他可能会觉得更适应些。因为在欧洲，即使是在中世纪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依然热衷于这种“优雅”的战争方式。东、西方之所以会在战争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国家的组织形式就已经开始由层层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了。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基本都已经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全面战争。而西方所一直延续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缘结构非常复杂，很少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有胆量打一场全民皆兵的全面战争，因为你的对手可以是一个，也可能是数个乃至数十个。

在这种情况下，将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贵族之间，既可以保证领地内部的稳定；也可以让战争的损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贵族的命总是比平民要更值钱的）。实际上，无论宋襄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宋国“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都很难让它成为一流强国。如果宋襄公及宋国历代君主能够正视自身的地缘劣势，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出正确的拓展方向的话，也许宋国的命运还能得到些许改变。在这方面，东迁之前就为自己选定一块风水宝地的郑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六节 楚国为称霸中原而进攻宋国和齐国

当楚军在“泓水之战”中战胜宋军后，楚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可以说，济水以南的诸侯基本都在楚国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河济平原，对于一个有志于称霸中央之国的诸侯来说，能否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沟通河、济两水之间的河济平原，是决定成为盟主的必要条件。因此河济平原在春秋之时，无数次成为会战与会盟的地点。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当时战败了楚、越、齐国，势力如日中天的吴国，也将会盟的地点选定在河济平原的黄池之上。

在楚人图谋河济平原之时，在这块夹心地上除了周边大国所占据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诸侯国是“卫国”了。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齐桓公刚登上君位后不久，卫、邢两国就因为戎人的进攻而被迫迁至河济平原之上。只不过在楚宋泓水之战后3年，邢国就被同姓的卫国所灭。卫国之所以敢对受到齐国支持的邢国下手，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楚国作为后台。无论卫国这种依附蛮夷，向同宗下手的行为，在春秋之时有多么的让诸侯们所不齿（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也正是由此而来的），楚人都已经具备称霸中原的必要条件了。而能够给楚人制造麻烦的，

似乎只有那个还未被打服的宋国和余威尚存的齐国。

在公元前 632 后，也就是泓水之战后五年。楚人决定解决掉这两个麻烦。这一次，宋国的国都——睢阳（今商丘），以及齐国在河济平原的边邑——谷邑（现属山东东阿），同时成为了攻击目标。之所以选择了攻击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而不是齐都临淄，是因为泰沂山脉的存在，让楚人无法像围攻宋都那样直击齐国的核心。而如果将齐国压缩至济水以南的话，那无论楚人是否再乘胜追击，齐国都无法再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

楚人对齐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鲁国的支持。对于鲁国来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削弱齐国的机会的。现在看来，唯一能够阻止楚人称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上的晋国了。认可宋襄公“仁义”之风，并让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认为晋国之所以对宋国施以援手，是因为齐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留亡生涯中，曾经受到过宋襄公的礼遇（当时泓水之战刚结束后不久），所以才在刚登上君位后就帮助宋国对抗楚国。实际上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感性了，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每做出一项决定都不会是简单的感情用事。

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国也曾经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否则重耳也不会对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诺。其实晋文公当时作出这种承诺，就已经在表明，晋楚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不失原则的承诺，比之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诺（割让河西之地），的确显得更有远见。

第七节 晋国为救宋而攻卫曹两国并在得手后退至城濮

正如楚国采取了“围宋救郑”的战术一样，晋国也没有直接对宋国施与救援，而是对楚国在河济平原中的盟友——卫国发起了攻击。在攻击卫国得手之后，旋即向南越过济水，解决掉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晋楚两国最后的决战之处应该是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了。

不过晋文公最后还是将决定的地点选择在了河济平原的中心一个叫“城濮”的地方。在春秋之时，河、济两水之间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河流，叫作濮水，而“城濮”的位置，正是在濮水之南。实际上濮水更像是济水的一条支流，而后来的历史中，濮水的部分河道，也的确被看作是济水的一个分支——北济水的一部分，而我们在春秋之时所认定的济水也被称之为“南济水”。由于黄河与济水在历史当中都曾经多次变道，要想具体弄清这两条河流在每一个时期的干流是什么流向，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我们来说，大致知晓它们的方位就行了。

简单来说,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是位于濮水之北,河水之南(春秋时期的河道),水北为阳,濮阳之名也因此而来;而山东的菏泽市则是位于濮水之南,济水之北(南济)。而两河在将至泰沂山脉时,共同形成了大野泽。

晋文公选择从济水之南的曹国(现山东定陶一带),退至濮水之南的“城濮”(现山东鄄城县临濮镇)。表面上看,是为了遵守当年对楚王所作出的“退避三舍”的承诺(一舍为三十里,汉以前,一里约为415.8米。三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华里)。而实际上,晋军的这种后撤,一是为了避楚军的锋芒;二是为了与前来支援的秦、齐两军会合。齐国与晋国联手对抗楚国很好理解,因为在晋军到来之前,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谷邑,正遭受楚军的攻击。而秦军之所以和晋军结盟共图中原,则是秦穆公一直所希望的。当然,后来在秦国自觉有机会独自在中原打出一片天地时,秦晋之好还是变成了秦晋争霸,这种变化在“崤之战”中会有详细的解读。



城濮之战示意图 (前 632 年)

如果仔细测量曹国与城濮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止75华里,大约在120华里左右。不过所谓三舍之数,本来也不必太过细究。多退一点,反而更显得晋文公是个守信之人。如果从表面上看,晋文公选择在濮水南岸驻扎,有背水一战的气势。但实际上,晋国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决心。所谓的背水一战,是需要自烧渡船以示决心的。而晋国选择在城濮这个重要的渡口处驻扎,恰恰是因为刚刚登上君位的晋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战胜兵锋正盛的楚军。如果晋军在城濮战败,他们可以迅速渡过濮水,然后沿濮水之北,西向至黄河。在那里有一个渡口叫作“棘津”,进入河北平原。晋军正是从那里渡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的。



晋军行军路线示意图（城濮之战）

晋军这次军事行动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先从“太阳渡”（也就是被灭的南北虢的所在地）南渡，然后沿黄河南岸东行至洛阳盆地，再经由孟津北渡黄河进入河北平原（孟津就是当年武王伐纣渡河处，洛阳盆地进入河北平原的主要渡口）。而晋军如果战败由“棘津”退入河北平原后，将可以按原路回到晋国本部（临汾——运城盆地）。

第八节 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而成为新的霸主

如果从救援宋国，或迎战楚军的角度来看，晋军所走的这条路线并不是最经济的。最直接的路线应该是在第一次渡过黄河后（太阳渡），然后沿黄河南岸经洛阳盆地，过虎牢关进入中原，直至宋都“睢阳”与楚军决战。

问题是这条路线必须经由郑国所控制的虎牢之地（也就是郑国灭东虢所获得的战略要地，在郑国部分已有过分析）。而引发“城濮之战”的原因，正是宋国由东向西进攻郑国，以至楚军以救援盟国——郑国的名义围攻宋都商丘。因此如果晋军走这条路线的话，实际上等于是必须与郑国接战。即使是取得了胜利，宋国也早已被楚军所灭。因此晋军所采取的这种“曲线救宋”的方式，在战术上是非常合理的。而晋军退避三舍后，看似背水一战的布阵方式，也正是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在晋军联合了秦、齐两军在城濮布阵时，楚军也将进攻齐地“谷邑”的军队调回，与围攻商丘的军队会合后渡过济水，准备与晋军决战。对于这场战役，应该说晋楚两军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从整体实力来看，势头盛的楚国应该还略占上风（还带有淮河流域的陈、蔡两国军队）。问题是远在南阳盆地等候消息的楚王，面对三

大强国的阻击，也显得信心不足，因此未能及时派遣足够援军支援。

最终的结果是，晋军险胜楚军，楚国也暂时的推迟了称霸中原的时间。直到 21 年后的公元前 611 前，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重新向中原扩张，在与晋国经过多次战争后，终于在公元前 597 年，在“邲之战”中一战击溃晋军，从而称霸成为了新一任的“盟主”。而“邲之战”的地点，正是在晋军上次所绕过的战略要地——“虎牢”一带。在那次争战中，楚军先灭了重新附于晋国的郑国，然后再在虎牢之地与急于东出中原，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晋军决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应该说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就击败楚国成为了新一任的霸主，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不过就晋国当时的实力而言（已经完成了临汾——运城两盆地的整合），进入中原称霸，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以及在楚庄王死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晋景公、晋悼公，也都曾经称霸一时，甚至被列入“春秋五霸”的候选名单。

相比于晋国的风光无限，位于晋国后方的秦国，则是不甘心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秦穆公之所以在取得“韩原之战”胜利后，仍然希望将重耳扶上君位，以维持所谓“秦晋之好”，无非也是看清了晋国的整体实力强于秦国，暂时不愿意与之全面对抗罢了。在与晋国联盟而进入中原征战的过程中，秦穆公也在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新的霸主。而年事已高的晋文公并没有让他等太久，在他去世之后，秦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三十一章 秦国东征郑国引发与晋国的崤之战

第一节 秦穆公在晋文公去世后欲独自进入中原称霸

之前我们分析了，从大的背景来看，完成了临汾——运城盆地整合的晋国，能够在某一时期称霸中原，有其必然性。而晋文公成为霸主，则有一定偶然性。至于秦国，在取得渭河平原的主导权后（从晋国手中夺取河西之地），也必然希望向中原扩张。只不过相比晋文公来说，处心积虑布局多年的秦穆公，看似更应该在他的任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尽管从大历史的背景看，某一位英雄人物的生死并不会改变大的历史走向，但在微观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我们平时看的，注重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的确会造成一定影响。

而晋文公的死，就直接影响了秦晋之间的关系。晋文公是在公元前628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在霸主的位置上坐了4年就走了。尽管在我们看来，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晋国的整体实力达到了。但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对于这一点却是很难认清的。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对手出现权力更迭时，往往是最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秦穆公来说并不陌生，之前他已经数次运用这种机会来干涉晋国的内政，并借此“取回”了河西之地。现在，秦国的兴趣点已经不再是晋国的君位传承了，能够借这个机会入主中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才是秦穆公最想要的。

如果秦国想从晋国的手中夺取盟主之位，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与晋国开战，并取得胜利。在之前和之后的春秋历史当中，每一位霸主的产生都伴随着与其他大国的战争。问题是对于秦国来说，有两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一是之前秦晋两国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秦晋之好”的状态，如果在晋文公刚刚去世之时，就与之开战，有失道义。对于一个有志于成为诸侯领袖的君主来说，名誉还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即使是秦国偷袭晋国得手，也并不代表就能够称霸中原。因为由于地理格局的关系，与其他几个大国对决的战场都是在济水南北，一场大战的胜利，不仅能让主要对手退出争霸的舞台，更能让中原那些国家臣服。

而秦晋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基本只会在河东、河西两地，并不会对中原乃至更远的边缘大国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即使取得了对晋战争的胜利，也还必须再入中原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直接进入中原寻找一个实力在自己之下的诸侯国开刀，以证明自己的实力。至于这个牺牲品是谁，相信看过《崤之战》一文的人都已经清楚了（以前的中学课

本里有的，现在不知还有没有），那就是曾经的小霸——郑国。

第二节 晋国获得在河北平原土地让郑国以此离间秦晋伐郑

在晋、楚、齐等边缘大国的挤压下，先知先觉的郑国现在已经成为二流国家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国在大部分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在北面的晋国与南面的楚国之间摇摆。在城濮之战前，郑国是依附于楚国的。而在城濮之战后，郑国自然选择了倒向晋国。不过郑国并未就此完全切断与楚国的关系。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楚国并未在城濮之战中伤及根本，或者说楚人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情商一直很高的郑人，首鼠两端也就情有可原了。

对于郑国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霸主的晋文公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晋国准备通过武力，让郑国明确自己的位置。与城濮之战一样，晋文公的“岳父”——秦穆公又一次的成为了联合对象。秦晋两军分两路向郑国发起攻击。这种联合军事行动也为郑人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每一次听到对手有新的盟军到，就哈哈大笑一样。这种因为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组合，的确也很容易因为利益而分道扬镳的。

郑国离间秦晋联盟的说词就是摆明三者之间的地缘关系。因为在城濮之战前（公元前635年），周王室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当时为周襄王，其弟谋夺王位，周王出逃）。对于东迁之后的王室来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而言可以考虑的是当年的“勤王四国”，即河北平原上的卫国；中原的郑国，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以及渭河平原上的秦国。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卫国和郑国应该是能够最快给予支援的。不过卫国这时候已经和邢国一道，被戎人驱逐至河济平原落户了，因此周襄王就先逃到了郑国，然后向晋秦两国求援。最后的结果是，更具交通优势，也更有实力的晋国，抢在秦国之前帮助周襄王复位成功。秦晋两国争着来做这件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累积政治资本，因为最先称霸的齐桓公为盟主设定了一个政治标准，就是获得王室的认可。

而晋国的这次勤王行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政治资本，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向河北平原渗透的权利。无论是晋国主动要求，还是周王主动示好，晋国得到了阳樊、河内两地的封赏。前者位于太行山的边缘（河南济源市西南），原来是属于一个叫“樊国”的小国；而后者则指的是河北平原（黄河以北称之为“河内”，以南称之为“河外”），或者说主要就是当年封给卫国的殷商旧地。王室做出这种决定，其实就像当年把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秦国一样。因为当时的河北平原，已经是戎狄的天下了。

之前拱卫洛阳盆地的卫、邢两国都已被迫迁至河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让勤王四国中最具实力，地理上也接近的晋国去收拾烂摊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虽然王室新封给晋国的土地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实际意义还是挺大的。至于究竟有什么意义，相信“奉（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丞相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王室做出这种“赏赐”，很大可能是因为晋国的要求。毕竟去收拾河北平原上那些戎狄，比到中原去灭掉几个同宗的诸侯国政治风险更小。更何况从地理的角度看，晋国有很大机会征服山西高原上那些戎狄，让太行山两侧都成为晋国的势力范围。

当然，无论是山西高原上的戎狄，还是河北平原上的戎狄，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晋国要想真正完成它的“统一”大业，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技巧。最起码在晋文公余下的那几年，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了。不过晋国在名义上取得了河北平原的控制权，却让郑国离间秦晋双方的关系找到了突破口。我们都很熟悉战国时期秦人所采取的“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但对于郑国这样的二流国家来说，“远交”的策略是必须的；“近攻”的能力却未必有了。真正适合这类国家的战略是“远交近防”。就郑、秦、晋三国的地缘关系来说，郑人要防的就是已经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河北平原，与其一水之隔的晋国；而要交的则是势力范围尚未东出崤函通道的秦国。

最终虑及攻郑之战有可能为晋国作嫁衣裳的秦穆公，成为了郑国新的保护者，并派兵帮助郑人守护国都（新郑）。至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当然是由郑人点明的。而他的“女婿”晋文公，暂时还不想捅破“秦晋之好”这层窗户纸，也就此退兵放弃了对郑国的攻击。

第三节 秦穆公欲东征郑国以在中原获得立足之地

军事地理对于地缘格局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相信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看一些历史故事，总觉得进攻方为什么这么傻，非要纠结于某一个点上，为什么不能在双方的地理接触面上展开全面进攻。如果要问的话，我们所能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那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就是要让这些战略要地立体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并使大家能够深刻理解，它们究竟是怎样影响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的。

秦国成为郑国的保护国，看似让秦国向中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相比于晋国可以通过控制河北平原向中原渗透；齐国可以透过河济平威慑中原；楚国可以占据淮河流域北入中原。单纯的和郑国结盟，并不能让中原诸国真正感觉到秦国的存在，因此也就无从谈起称霸中原了。也因此晋文公去世之后，秦穆公希望对郑国发起

一次远征，以真实的在中原占据一块土地。支撑秦国这次冒险行动的动力，除了晋文公的去世这个“利好”消息以外，就是之前秦国帮助郑国驻守新郑的将领已经取得了郑国的信任，能够成为秦军的内应。

如果单从“人”的角度看，秦穆公在竞争对手离世，且有内应接应的情况下，做出远征郑国的决定，应该说不能算是冲动之举。但问题是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次行动实在太过冒险。一是秦军在经由崤函通道东出中原时，必须经过晋国的控制区；二是行军路线过长，不仅要经由滑国这类的小国，还必须经由新郑北边的那些郑国城邑，才能到达新郑。在这种情况下，秦军即使不在行进中受到攻击，也很有可能过早的暴露出自己的军事意图。很不幸的是，这两种最坏的情况都让秦军碰到了。

至于秦军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军路线，这条行军路线又为何造成了秦军的这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第四节 陕地经三门峡所在的黄河水路沟通下游时航道不佳

无论是 2600 多年前的秦军，还是现在的我们，在陕地至洛阳的路线选择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如果再想沿着黄河东行是不可能的了。也许有人认为可以走水路，很不幸，水路也不行。秦晋相交的那一段，由于河道较宽通航条件还可以，秦穆公给晋国送粮食走的就是水路，史称“泛舟之役”。

黄河到了三门峡河道就骤然收窄了，仅仅通过常识我们也会清楚，三门峡段的黄河水流一定是很急的。一般河道缓慢变窄的情况下，水流不会变急。而三门峡则由于那几个岛的存在，河道是骤然收窄的。这就好像将水管口一下子堵住一半，水



黄河三门峡

压一下子变大了（我估计大家小时候都玩过这种游戏）。另外茅津渡的确是在现在的“三门峡”市的北面，但地理概念上的“三门峡”，指的是三门岛所在的那一段河道，离茅津渡还有几十里地。

更大的问题是，三门峡的所谓“三门”，指的是河中的三个岛，这三个

岛被分别称之为“神门岛”、“鬼门岛”、“人门岛”。三个岛把本来就窄的航道又切割了一次，也就人门岛边上勉强能通过。至于“鬼门关”，基本是有去无回。另外在三个岛下面，还有几块大礁石¹，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中流砥柱”。这些都对三门峡段黄河的通航造成了障碍。不过为了更有效的渗入中原，三门峡还是在秦控制河东之地后强行通航了，在后世也一直是漕运不断，只不过代价是很大的。



黄河三门峡位置图



三门峡大坝（水中礁石为中流砥柱）

至于说从中原溯江而上的航道，在汉代也成为可能了。当然，风帆和桨在湍急的水流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关中的政治中心漕运粮食，靠的是在岸边崖壁上开凿“栈道”，然后用人力沿栈道拉纤。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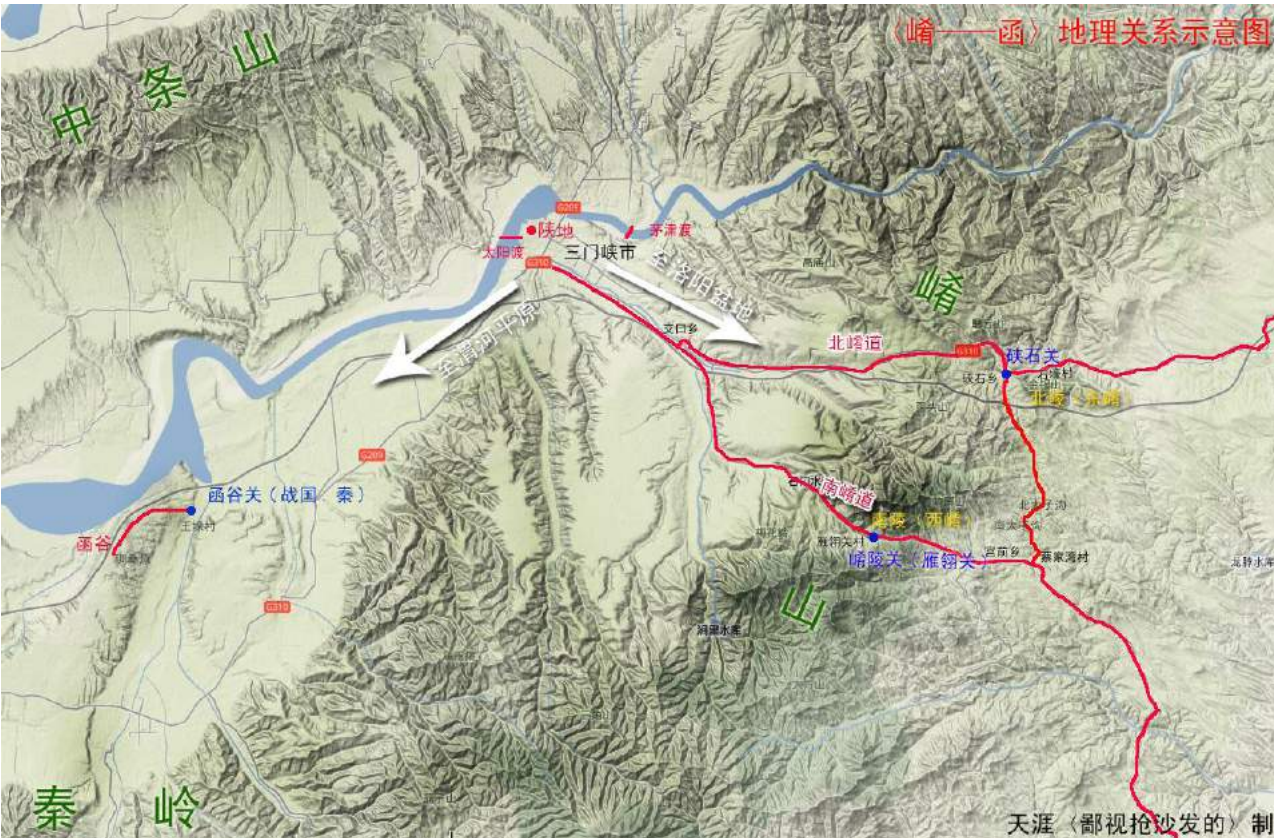
1 三个石岛形成的三条狭长水道被分别称之为“人门”、“鬼门”、“神门”。其中南岸一座与陆地相连的半岛称之为“狮子头”。中间两座岛叫“鬼门岛”和“神门岛”；和北岸相连的半岛叫“人门岛”。三岛下面礁石为炼丹炉、梳妆台、中流砥柱。1957年兴建三门峡大坝时，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岛、以及梳妆台被炸掉，只有炼丹炉和中流砥柱依然屹立于黄河中心。

种代价高昂的运输方式，也是后世放弃在关中平原立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相比之下，通过京杭大运河向华北地区输送物资要容易得多。也因此崤函通道中走陆路才是主要的途经。无论是先人还是我们，都需要先从陕地向东南方向折行，看在崤山之中能否找到像“函谷”这样的通道。

第五节 陕地经南崤道和北崤道沟通洛阳

当从陕地行至崤山西麓时，很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崤山之中找到两条东西通道。根据它们的方位，这两条通道被分别命名为南、北崤道。而这两条崤道在崤山以西的相交处，现在则归属于一个叫“交口”的镇所管辖。

如果按照《崤之战》一文的记载，崤道的开通可以上溯到夏代。因为在秦穆公准备出征时，他那位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左右手——百里奚，曾经力阻秦军的这次远征。他甚至预言晋军伏击秦军的地点是在所谓的“文王避风雨处”与“夏后皋之墓”之间。而这两个地点，分别就是在南北崤道最为险要处。所谓“文王”指的就是周文王；“夏后皋”则说的是夏代亡国之君“夏桀”的爷爷。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就说明在夏商两代，南北崤道就已经开通了。其实如果我们认可炎黄二帝曾经进入中原的话，那么崤山通道的开通应该能够上溯至 5000 年前。



崤函地理关系示意图

不管怎么说，在秦军东征之时，他们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在军事家看来，山谷通道是构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隘的最佳地点。在后世，北崤道中构筑的关隘叫作“硤石关”；南崤道构筑的关隘被叫作“崤陵关”，不过由于历代文人及评书表演艺术家们的误传，崤陵关通常被称之为“雁翎关”，事实上它跟大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真正能表明身份的是那个“崤”字。在春秋之时，南、北崤道应该都还没有驻军。因为在春秋之初，诸侯们还是以点的形式存在于中央之国的各个角落。大家所感兴趣的多是能够出产更多粮食的平原地区，很少会耗费钱粮去驻守纯粹的军事要地（如果有自给能力，就另当别论了，比如“陕”地）。即使是晋国希望控制崤函通道，从虢人手中夺取陕地也就够了。



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



夏后皋之墓



崤山

无论硤石关和崤陵关在当时存不存在，都不影响两条崤道在经过崤山分水岭时，会面临两侧高山林立的峡谷地形（关隘也是依险而筑的）。也正因为还没有筑关，因此百里奚才搬出两处人文景观，作为这两个战略要地的代名词（有兴趣的路过崤山时，可以去看看“文王避风雨处”与“夏后皋之墓”。就在两关旁边的山头上，即所谓南陵，北陵）。

第六节 秦军过崤山时在南北崤道两条路线的选择

既然过崤山有两条通道，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秦军究竟是走的是北崤道还是南崤道呢？我们先来看看，南北崤道往东是如何进入洛阳盆地的。如果从陕地出发，通过南崤道穿越崤山，我们可以沿着发源于崤山的那些洛河支流，东南方向穿行至洛河，然后折向东北，沿洛河从南面进入洛阳盆地，到达洛阳，也就是东周王城“洛邑”的所在。这条路线虽然稍微有点绕，但胜在基本都是沿河谷行进，路况较好。最难通过，也最为险要的地点，就是在“崤陵关”。

如果选择的是北崤道，那么我们会行至洛阳盆地的北部，然后渡过伊洛两河，再沿伊河南岸东北方向行至“虎牢”，最终进入中原。好在《崤之战》一文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因为文中明确记载了，秦军经过的是洛邑北门，并按照礼法下车向王城致敬。只可惜他们下来之后又跳着上车了，让在城头观看的王室成员大为不满，并认定秦军骄兵必败。



崤之战示意图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北崤道很多时候都会成为首选道路。这是因为南崤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沿河而行，且为粘土质，因此在河水暴涨的季节里很难通行（特别是洛河）。而北崤道虽然因为山石较多，路况差了点，但也胜在路基多为石质，因此受水的影响反而较小。在战国时期，北崤道上的渰池曾经上演过著名的渰池会；而同在北崤道上的新安，也曾经上演过无数次悲喜剧。最为著名的当是项羽在此坑



嶓山



嶓函地理关系示意图

你顺着南嶓道走，过了雁翎关之后，可以再折向北，到达硖石关之后，再向东走北嶓道到达洛阳盆地。

由于这条沟通南北的道路存在，嶓道的整体格局呈“A”字型，也为秦军和后人的通行提供了两种以上的可能性。因此，百里奚才会在他的预言中提及两条嶓道。不过既然我们可以确定秦军是从洛邑北门通过的，那么作为必经之路的“硖石”发生嶓之战的可能性也就最大了。也许是因为“雁翎关”这个名字更上口，也更有气质，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和评书中经常能听到它的大名。而对于“硖石”这个地名，熟悉度则要低一些了。

杀了秦军 20 万降卒。

之所以要透过《嶓之战》来解读一下南、北嶓道，是因为这两条道路虽然在细处几经更叠，但基本路线几千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南嶓道现在成为了 249 省道（河南）的修筑路线；而距离更短的北嶓道，则成为了修建陇海铁路和 310 国道的基础。现在看来，秦军在北嶓道，特别是硖石关附近受伏的可能性最大。不过雁翎关也并非不可能成为秦军的葬身之处。之所以不能否定雁翎关作为晋军伏击地的可能性，是因为如果



河南陕县石壕村



熊耳山下的红土地

不过当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从洛阳向西逃难，走的就是北崤道，并在三个重要的驿站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三吏》，其中被列入中学课本的《石壕吏》所描述的就是途经“硤石”的见闻（另两篇分别为《潼关吏》和《新安吏》）。至于说杜甫夜宿

的村子到底是这一带的哪个村子，就不好说了。不过现在有个村子已经注意到名人效应，并更名为“石壕村”了。如果想去思古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最起码是真的有一段古道遗址。

第七节 秦军返程时在崤道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

秦军既然已经过了洛邑，那么是否是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伏击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由于这里所列举的战役或者典故，一般知名度都比较高（甚至被列入中学课本），因此没有太花费笔墨展开。如果不太熟悉的，也以搜索一下相关背景，以了解除地缘因素以外的其他背景资料。

在预感到秦军这次东征会失败的人看来，对于秦军来说，路线太长，不能保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次军事行动的战术是依靠内应的“偷袭”战）。实际上这并非很难判断秦军是否能够隐身到达新郑。因为上万人的部队行军，不让沿途的人看见是不可能的。最起码我们知道，晋国所控制的陕地、王室所在的洛邑，以

及位于洛邑以东，伊水之南的滑国，都是秦军的必经之处。百里奚所虑的是秦军过于轻狂，不能很好的掩饰他们进攻郑国的企图。



崤之战示意图

尽管我们在史书中所得到的信息似乎是，郑国那个贩牛的商人弦高，在滑国一

见到秦军就判定秦军的攻击目标是郑国。但真实的情况更可能是，弦高在与秦军的接触中获知了这一信息（秦军的轻狂在过洛邑时已经显露出来了）。因为在春秋之时，一个诸侯国的军队借道通过另一个诸侯的控制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这种借道行为一般而言应该是事先打过招呼的。但一个商人是没有途径获知这些信息的，因此之所以敢于挺身救国，只有可能是从秦军那里直接得到了消息（秦军当时在滑国休息）。

事实上即使秦军攻郑得手，他们全身而返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当然，对于秦国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不是得点财物就班师，而是灭了郑国，以为秦国在中原获得一块飞地，进而成为中原霸主。如果这个战略构思成功的话，那么从东西两侧夹击晋国所控制的“陕”地。将渭河平原与中原的东西通道掌握在自己手中，则是下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了。问题是这种先远后近，跃进式的扩张方法实在是太过冒险了。晋人当然很清楚，如果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领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晋国冒着破坏秦晋之好的罪名，先发制人对回师的秦军发起攻击，也算不得过分。

对于战争的结果，相信看过《崤之战》一文的应该已经清楚了。秦国基本上全军覆没，三个统帅被俘，后来依靠那位秦晋之好的女主角“文嬴”（秦穆公之女，嫁给晋文公的那位）说情，算是放了回去。“崤之战”以晋军的胜利而结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晋人从山西高原出发，只需在陕地渡河，即可轻易切断秦军的出关路线，更何况陕地已经在晋人的直接控制下了。当然，如果战场摆在“陕”地的话，双方的战争方式很可能是列阵厮杀，如果让宋襄公这个末代贵族来干的话，这种可能性会更大。

只可惜春秋乱世多的是“无义”战，因此在地势险峻的崤道上伏击秦军，才是最有效的战术。无论秦穆公算不算得上英主，通过这一仗他都清楚的认识到，如果想绕开晋国直接进攻郑国和其他中原诸侯；或者说在没有控制河东之地的情况下，就想渗入中原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此在“崤之战”后，秦国处心积虑所采取的报复行动，还是渡过蒲津渡，进攻晋国的腹地。秦穆公的这次复仇之战叫作“王官之战”，“王官”是晋国的一个城邑名，具体位置在山西省闻喜县西。也就是在运城盆地与临汾盆地交界处，与翼都和曲沃都已经很近了。

最终秦军一直打到曲沃附近，也就是说基本控制了运城盆地。不过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就能在整体实力上压过晋国了。这次战术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秦军上下齐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秦军渡河后，自焚渡船，不过应该没有砸锅，否则“破釜沉舟”的典故也轮不到项羽了）。因此秦军依然像上次韩原之战胜利后那样，撤回了河西。唯一不同的是，秦军在归国之前，南渡黄河去崤山掩

埋了“崤之战”中战死的秦军遗骨。

尽管秦军最终算是复仇成功，并且向晋国宣示了自己有实力在河东乃至崤函通道与晋国对抗，但晋国的地缘优势始终是存在的。以秦国现有的实力尚无法长期占据运城盆地，更无法控制崤函通道上的各个战略要地。因此虽然有史家以秦穆公此战大胜晋军为由，认定秦穆公有资格位列春秋五霸。但实际上，秦晋两国的争霸过程，仅仅还是限于黄土高原内部，秦国仍然无法将它的影响力渗透至中原。“崤之战”以及之后的“王官之战”，是秦晋关系的一个分水岭。

从此以后，秦国暂时放弃了东进的战略，潜心整合渭河平原，并将主要发展方向锁定在西、南两个方向。而晋国除了继续在中原显示它的力量外，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整个山西高原内部的整合上。最终双方都在自己经营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附《崤之战》原文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民。”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肴。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秦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经，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

败秦师于肴，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第三十二章 秦霸西戎与晋国的魏绛和戎

第一节 秦国征服陇右高原的戎人

其实对于中原诸侯来说，秦人那不算高贵的出身，让他们都不愿意将之看作是华夏体系一员。如果不是竭力与晋国这个根正苗红的大国交好，其他大国主导的会盟，甚至不会通知秦国。因此秦国在经过“崤之战”失败后，虽然在“王官之战”中找回了面子（在这两战之间还打过几次，秦军皆未取胜）。但秦国也清楚的认识到，就算再嫁几个女儿出去再续秦晋之好，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晋国也不会放任秦国染指中原的。因此秦国从此也断绝了进入中原争霸的念想，转而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及周边高地的地缘整合上了。

实际上无论是从秦国的出身，还是当年所受的王命来看，暂时老老实实做个“西戎之主”不失为一个现实的想法。虽然秦人的东征之路异常艰难，但当他们将精力放在对付那些“戎狄”身上时，成果却是异常丰富。按照史书的记载，秦穆公的收获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个成果不仅让秦人感到满意，也让王室非常开心，并派使者表示祝贺。不过无论是王室还是秦人，都十分清楚，秦人所打下来的土地只会归属秦国，王室再想重返渭河平原已是不可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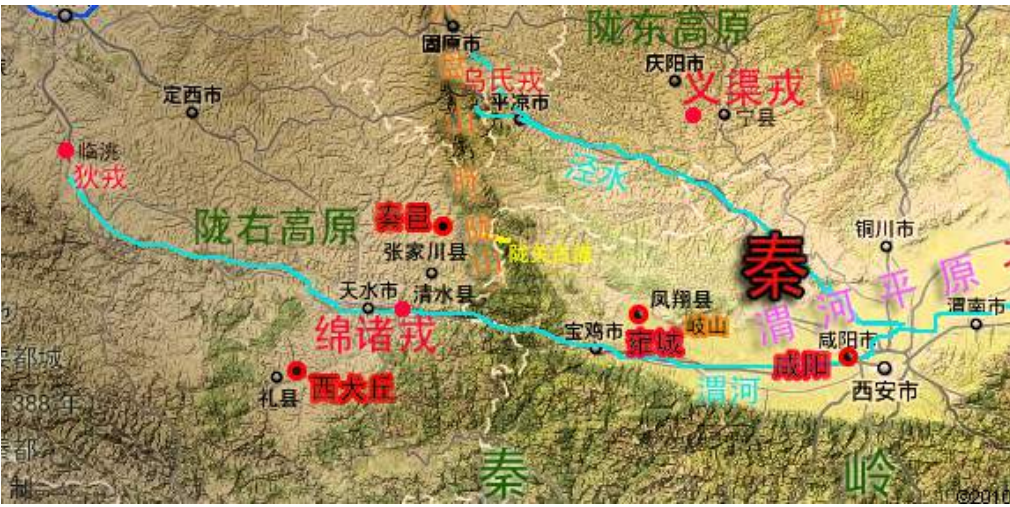
“开地千里”这个概念比较虚，我们需要仔细解读一下，秦人究竟取得了哪些土地的控制权。对于秦人来说，渭河平原肯定是最先要扫平的。这项工作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中，秦穆公所要做的无非是让秦国真正成为渭河平原的主人。这一点，在从晋国手中取得河西之地后已经做到了。那些分布在渭河平原上的戎狄小国，不是被秦人直接吞并，就是成为了秦国的附庸。

现在秦人的重点反而是西进，去征服陇山两侧的戎人。在西周王室尚且坚挺的时候，陇山两侧的戎人就是渭河平原最大的威胁。而出身于陇山以西，能够为王室抵御来自陇右高原的戎人部落，也是秦人的祖先——秦非子当年受到王室重用的重要原因。现在秦人已经成为了渭河平原的新主人，这些曾经威胁周人的戎人部落，也成为了秦人的威胁。因此在秦人放弃争霸中原的想法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重新回到原点，去完成他们当年未尽的事业。

在秦人数百年的壮大过程中，有四个地点是具有地标性质的。一个就是位于陇右高原南端，现在甘肃天水市西南部的“西犬丘”（又称“西垂”，现行政归属礼县）。在秦非子成为周王朝附庸之前，秦人的祖先就是生活在此。因此这里也可以被称为

秦人第一祖地。而在秦非子因牧马有功，被赐给附庸的地位后，秦人被获准东迁到陇山西麓的“秦邑”¹（现为甘肃省张家川所辖）。在解读秦非子一节中，我们对于“秦邑”已经有过了解了，它的位置正处在“关陇古道”（也称“陇关古道”）的西侧。之所以将秦人部署在此，很明显是为王室拱卫西大门。

而在王室为来自陇东高原的“犬戎”所侵，不得以东迁之后，秦人被获准正式进入渭河平原。他们在渭河平原的起点，就是在当年为王室养马的“汧渭之会”（汧河，也就是现在的千河，与渭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宝鸡市一带）。经过百年的征战，秦人得以在渭河平原站稳脚跟，并于公元前 677 年建立了正式的都城——“雍城”（现在的凤翔县南）。



秦霸西戎地缘示意图

如果观察“雍城”的位置，会发现它处于“汧渭之会”的东面，岐山的西面，南望渭河，北依陇东高原。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建都有

两个原因：一是秦人正式受封的土地是在周人的祖地——“岐山”以西，即使秦人已经有称霸整个渭河平原的心思，但在春秋之初，还是不敢将建都的地点越过岐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陇东高原的戎人部落，始终是渭河平原最大的威胁，秦人需要将自己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渭河平原的北部，以在陇东高原的戎人入侵之时，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雍城在春秋中后期以及战国前期，一直都是秦的政治经济中心。直到秦国有了足够的力量再一次东扩之时，秦国的都城才开始越过岐山，向东迁移。最终成为秦国都城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咸阳”（在此之前也有过渡的都城，如位于镐京东北部，洛水之西的“栎阳”）。之前我们也分析了，之所以将都城设在渭水之北，而不是渭水之南的镐京，主要是因为周天子虽然“实亡”，但还“名存”。当然，

¹ 关于秦邑的地理位置，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位甘肃清水县东北，即今秦亭镇地区；二是位于张家川境内。目前采用前一种说法较多，但张家川境内也发现了多处秦早期的遗址，如秦亭遗址、马家塬遗址。

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骊山脚下还是成为了阿房宫的修建之处。关于秦国迁都咸阳的故事，还是要等战国时期分析。现在我们还是看看秦人是如何扫荡渭河平原周边的戎人吧。

如果要细数秦人到底征服了多少个戎人国家（部落），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类边缘民族分布相当广泛，不仅在渭河平原周边的高原上有，在渭河平原上也有很多。并且这些所谓的“戎”国，对于现代人来说，名称过于怪异，事实上古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同一个部落，被不同的人冠以不同的名称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仅仅观察一些比较著名的戎人部落，还是能够找到秦人征战的规律的。

秦人在越过“关陇古道”之后，对于陇右高原的征战，还是围绕着渭河流域在进行的。尽管渭河的上游和中下游由于陇山的切割，而被分属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渭河平原和陇右高原），并且很难通过渭河河谷互通联系。除了在渭河南北扫荡戎人部落以外，秦人的势力范围向西直至渭河的发源地。在陇右高原被秦人征服的最大“国家”，是活动于天水市附近的“绵诸戎”。

诚如我们在今后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位于渭水河畔的天水，由于地势较平缓，一直是陇右高原的核心地区。也是历代争夺陇右地区的必争之地。至于秦人在陇右高原征战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则是活动于渭河源头附近的“狄戎”（现甘肃临洮县一带）。

第二节 秦国征服陇东高原的义渠戎

在完成对陇右高原整合的同时，位于陇山东侧的“陇东高原”也成为秦人征服的重点。因为这一地区的戎人，在泾水的源头拥有独立进出陇山的通道（泾水有两个源头，也有两条通道），也更容易对渭河平原造成地缘压力。

当年的“犬戎”，就是一个地跨陇山东西的戎人部落。当他们顺着泾水攻至渭河平原时，西周王室也随之被迫东迁了。因为地理结构的关系，秦人对于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比较容易彻底征服。但对于高地戎人，却很难彻底征服。事实上，秦人在春秋之时的“称霸西戎”，并非指的是完全征服了所有的戎人，而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高地上的戎人“国家”大都在承认秦国宗主地位后得到保留。

至于那些高地上的戎人“国家”被秦国彻底征服，并划为郡县，基本要到了战国中后期了。这其中就包括陇右的“绵诸戎”，以及陇东高原最大的戎人国家——“义渠戎”。如果对秦国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应当对“义渠”之名有所了解。这支活动于泾水中上游的戎人部落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秦人为了彻底消灭它，而使用了“美

人计”。不过与传统的美人计不同的是，这次出马的是秦王的母亲，也就是王太后。

这位王太后史称“宣太后”，在她的幼子“秦昭王”于公元前 306 年继位后，因“王”年纪尚小而垂帘听政。与后世大部分摄政的太后一样，年纪尚轻的宣太后，需要拢络外部力量，以支撑自己的权位。但与大部分拉拢朝臣的太后有所不同的是，宣太后拉拢的对象，是逐渐壮大，已经成为秦国北方主要威胁的“义渠戎”。那位义渠王也因此掉入温柔乡，长居秦国，甚至与宣太后生有二子。像所有的美人计一样，这个故事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牺牲品的。公元前 272 年，在秦昭王（又称秦昭襄王，长平之战就是他在位时打的）坐稳王位，秦国也成为山东六国需要合力才能对付的巨无霸之后，义渠王终于为宣太后所杀，义渠国及整个陇东高原也成为了秦国的直属地。



秦霸西戎地缘示意图

义渠国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平原地区能够为一个国家提供多大的战争潜力，但要想彻底征服高地上的边缘民族，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地缘博弈，贯穿了整个中央之国的历史。在今后的历史当中，还会不断有不同的边缘民族，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

其实说到低地民族与高地民族的博弈，并不仅仅在中国才有。事实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着这一幕。在西方我们也能找到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看似亲如

一家，实则水火不容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英格兰人能够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在苏格兰人退守大不列颠岛的北部高地后，却始终无法彻底融合这些最后的“凯尔特人”。

第三节 秦国征服陇东高原的乌氏戎和河西之地的大荔戎

欧洲的事，不是我们现在解读的重点，现在让我们回到陇东高原吧。义渠戎是陇东高原最大的戎族，但并不是唯一的戎人部落。在陇山（六盘山脉）的腹地，泾河的源头附近，还盘据着一支被称作“乌氏”的戎族。这支戎族在义渠国被灭之前，已经被秦人所征服，聚居之地被设置为“乌氏县”（现甘肃省固原市泾源县一带）。

乌氏戎其实和当年的秦人很相似。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们的聚居地，扼守着翻越陇山的另一条通道；二是那一地区也是水草丰美之地，非常适合养马。在秦人收其地后，有一个叫作“倮”的乌氏族人，在那里大量饲养牲畜，并由此获得了秦始皇的青睐，获封爵位。当然，乌氏倮并没有秦非子那样的机遇，因此在史记中只能凭财富位列《货殖列传》了。



陇东高原

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乌氏，一是因为乌氏戎所在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以后的解读中还会涉及到（特别是丝绸之路）。二是因为在大家所熟知的《寻秦记》中，乌氏牧场的背景即是来源于乌氏戎（而且应该就是“乌氏倮”的故事）。所以如果有朋友有志于文学创作，也应当就此

理解一点，即真正的文学大家，一定是要有些历史、人文方面的功底的。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清楚秦人在渭河上游的陇右高原，以及泾河上游的陇东高原是如何扩张自己的势力的。而除却这两个地理单元，还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需要秦人大费周章。一个是河西之地；一个是陕北高原。



秦霸西戎地缘示意图

秦人对于河西之地的争夺，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这实际上是在和河东的晋国在进行地缘博弈。不过在秦人称霸西戎的过程中，在洛河即将与渭河相交之处，有一支戎人却在秦晋相争中顽强的生存下来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图，会在洛、渭、河（黄河）三水之间，找到一个“大荔县”。而这个大荔县的得名是来自于一支叫作“大荔”的戎人。在秦穆公俘获晋惠公的“韩原之战”后，依附于晋国的大荔戎其实就已经被秦人一并收服了。秦晋韩原之战后“结盟”的王城，就是大荔戎所筑，位置就在今大荔县的东南。

像高地戎人一样，大荔戎在整个春秋时期，并未被秦人直接吞并。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高地戎人之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因为地理结构较复杂，完全吞并的成本太高，那么大荔戎的存在，则是因为其地缘位置了。身处两个大国之间，很多时候是不幸的（比如波兰）；但如果有足够的技巧，也可以在平衡之中求生存。

在我们解读东南亚的时候，相信那个深暗平衡之术的泰国，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相比于稳定的地理结构，单纯的依靠地缘位置玩平衡并不那么保险。因此大荔戎最终也还是先于那些高地戎人，在春秋战国相交之时，被秦人完全吞并（公元前 461 年）。他们所筑的那些城邑也成为了秦晋博弈的战场。

第四节 陕北高原上的临衍戎和白狄在秦国压力下的不同下场

当秦穆公成为西戎之主时，陕北高原是秦人需要应对的另一个地理单元。这片高地的特点是，它是属于洛水的中上游流域。因此无论是戎人的聚落区，还是秦人的征战路线，也都是沿着洛水及其支流而前行的。当然，如果这些戎人足够强大，他们也会沿着洛水侵扰渭河平原。在春秋之时，占据陕北高原的主要边缘民族并未被命名为“戎”，而是被称之为“白狄”。

其实我们倒不必去深究戎狄之间的区别，古人在为之命名时，也并不十分了解这些边缘民族之间的异同点。真正让白狄族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时期是在战国时期，只不过那时他们的舞台并非是在陕北高原，而是越过了整个山西高原，进入了太行山与河北平原相交之处。到了那个时候，这些狄人获得了和战国七雄几乎同等的政治地位，而他们所成立的国家非常有名，被叫作“中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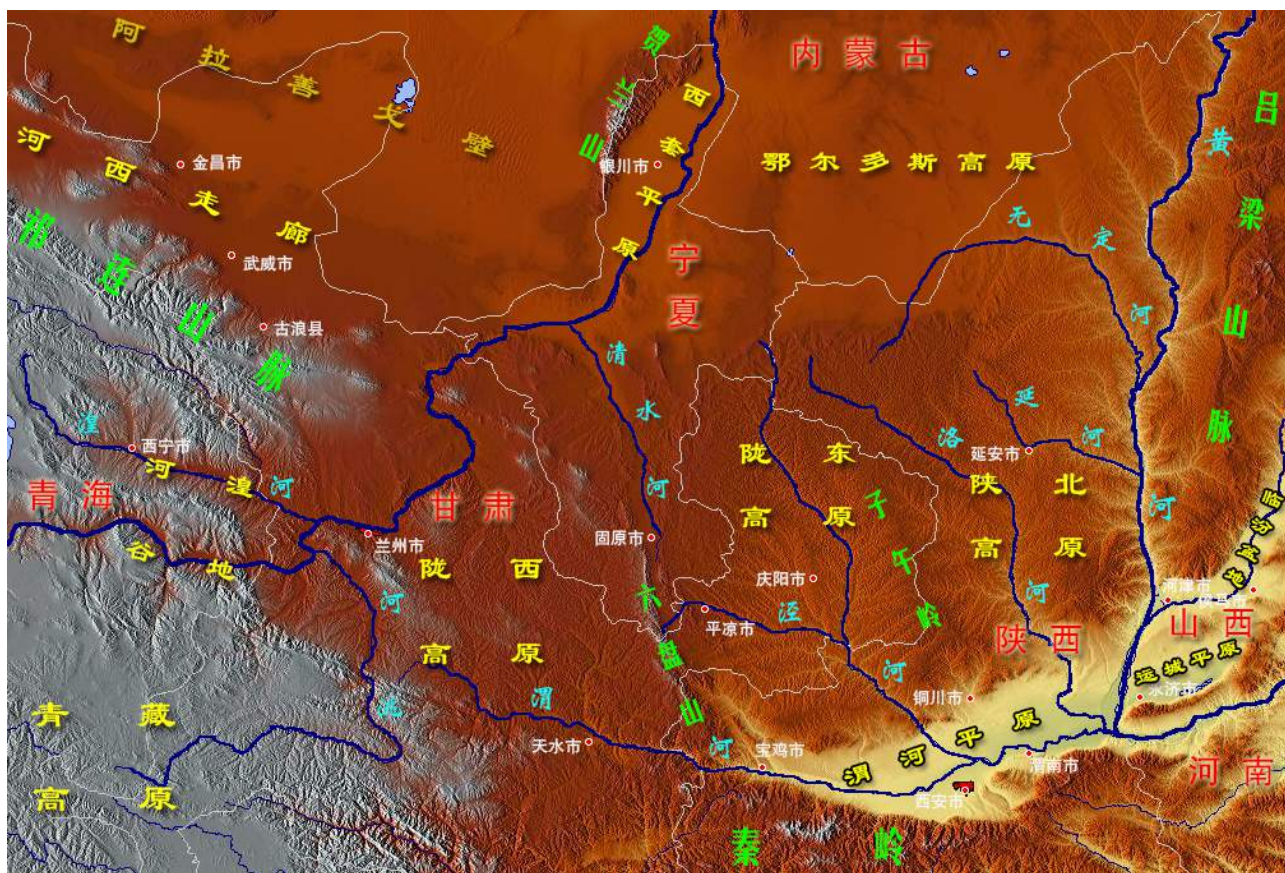
关于白狄为什么会迁移到河北平原，在后面解读晋人的对戎政策时会有答案。事实上，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陕北高原和河西之地一样，都成为了秦晋博弈的主战场。而秦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延伸至洛水之源。在那里，他们所征服的最后一支戎人叫作“临衍戎”。

位置大概在现在的陕西省盐池县一带。如果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那里正好处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区。而鄂尔多斯高原与它北部的黄河两岸平原（河套平原），共同组成了著名的“河套”之地。在华夏族将陇东、陕北两大高原（或者说整个泾水、洛水流域）融合之后，河套之地将成为边缘民族与华夏族地缘博弈的新战场。

最后说一下西北这几个地理单元在行政区划上的关系。在明朝时，陕、甘、宁三省是一体的，都归陕西布政司管。后来大致是在清康熙年间分为陕、甘两省的。至于宁夏，最早是在 1928 年，由马家军自己独立出来的省份。建国以后以其为基础，设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建省时的方案有好几个。最大方案的把青海、甘肃中的回族聚居区都包进去了。后来采取的方案算是比较小的，由于陇东高原之前就是甘肃省的，因此除了

少部分划入宁夏以外（比如固原），大部还是留在了甘肃。为了不至于让陇东高原成为飞地，在六盘山一带留了一条通道，以让陇东连接甘肃的其他部分，这也使得甘肃现在的行政区划有些怪异。



陕西和甘肃地理结构图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分析，甘肃及其所属的地理单元，在中央之国的地缘定位，一直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军事色彩的。现在的甘肃省所包括的陇东、陇西（陇右）、河西走廊三个主要地理单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是隔绝和沟通西域以及蒙古高原的边缘民族。宁夏的主要地理单元“西套平原”（也称“银川平原”），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也是属于这个军事地缘集团的一部分。

宋朝之所以积弱，除了丢失华北平原的北部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西套平原成为了党项人的根据地，使得宋朝无法其中精力对抗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鉴于以上原因，清初在陕甘分省时，才会将河西走廊、陇东、陇西、西套几个地理单元，划归新成立的甘肃省。当然，陇东地区划归甘肃，除了让它发挥监控鄂尔多斯高原上（河套）蒙古人的战略作用以外，亦可让陕、甘两省的地缘关系，不至于因陇山（六盘山）的分割，而渐行渐远。

要知道，甘陕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了渭河平原这个大后方提供后勤保障，甘肃无法发挥它的军事作用。而如果没有了甘肃的护卫，渭河平原也无

法抵抗来自西、北部的地缘威胁。

第五节 晋国以魏绛提出的和戎之策来整合周边戎狄

之前我们谈到，在秦穆公、晋文公之后，秦晋两国不能说相安无事，但也算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秦国暂时安心向西发展，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以西、北高地的整合之上；而晋国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华北平原了。不过虽然有王室的授权，让晋国去收复河北平原的卫国旧地，但晋人要想完成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先将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先搞定才行。

应该说，即使晋人不想向华北平原渗透，那些环绕于临汾——运城盆地四周的戎狄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晋人所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比秦人少。对付这些边缘民族，古今中外，无外乎两种方案。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羁縻”政策。所谓的“羁”，就是用军事政治手段强硬施压；所谓“縻”，则是用经济和物质的利益加以笼络。



山西地形图

纵观历史，无论是施之以武，还是诱之以利，都是应对边缘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只不过是更侧重于哪一方面而已。对于秦国来说，军事手段是他们称霸西戎的主要保障；而对于实力更强的晋国来说，似乎也可以通过战争整合好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只是秦晋两国地缘结构的差别，决定了晋国如果仅依靠军事手段，并没有那么容易让他们达到目的。

晋人之所以会遇到比秦人更多的麻烦，在于山西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在“曲活代翼”部分已经对山西高原的基本地理结构做了一个大致分析。通过那一节，我们应该清楚，整个山西高原大致是由太行、吕梁两大山脉，以由两山包夹而成的一系列盆地所组成的。除了晋国所占据的临

汾——运城两盆地以外，向东还有“长治盆地”（上党盆地）；向北还有太原、忻定、大同盆地。这些盆地从体量上来看，与临汾或运城盆地是处在同一级别的。

也就是说，即使晋人通过整合好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以及河西、河南（崤函通道一线），甚至在河内（河北平原）取得突破，成为了山西高原乃至整个中央之国首屈一指的诸侯。但要想通过军事手段，彻底征服盘据在另外四个盆地之中的戎狄，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与之相比，渭河平原的体量，以及周边高地中并无能与之匹敌的大型盆地，让秦人在称霸西方时所要面临的地缘形势，要更为简单。

最终晋人还是想到了合适的方法来整合山西高原。而产生效果的时间也并不比秦霸西戎的时间要晚太多。开启整合之路的晋国君主是“晋悼公”，在他继位之时，距他的先祖晋文公称霸之时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而晋人在东进过程中，与周边戎狄之间所发生的地缘冲突，也愈发激烈了。为晋悼公找到正确方法的人叫作“魏绛”，而他所建议并被采用的方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感觉上和现在的提法有些类似）。而这段历史或者说战略手段，也被史家称之为“魏绛和戎”。

第六节 晋国的国土结构对其最终走向分裂的影响

关于“魏绛”¹这个人，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去查找他的资料。不过仅从这个“魏”字，大家也应该能够猜到，他是属于三家分晋之中的魏国的先祖。事实上晋国公室的权力，自他们向周边地区强力渗透之后，就已经开始向那些世家大夫手中转移了。这种情况在春秋之时是非常常见的。正所谓诸侯分了周王室的权力及土地，而大夫在诸侯身上又做了同样的事情。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

不过周人所创立的“封建”制度，在执行一段时间后，固然让中央之国陷入了分裂的局面。但也激发了各诸侯国的主动性，使他们能够多点向边缘地区扩张，最终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连成一片。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只是在政治上将诸侯们地缘扩张的成果组织在一起。不过伟大的始皇帝更多的是担当了一个“统一”之名，以用这些诸侯们数百年所积累的财富，建造了几个宏伟的工程。真正开始享受这一切的，则是刘氏子孙。

虽然说封建制度，让春秋之时的很多诸侯国都存在内部分裂的情况，但晋国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最终正式分裂出了三个政治体（韩赵魏），并且都成为

¹ 魏绛：姬姓，魏氏，名绛，谥号为庄，故史称魏庄子，春秋时晋国卿。其先祖为庶人，与周同姓，因伐纣有功被周武王封于毕，于是以毕为姓。到毕万时，事晋献公，伐霍、耿，魏等国有功，封于魏，遂又以魏为姓。

了战国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晋国的“大”，因为在东方的齐国，后来也发生过重大的政治更迭。不过那时候是“田氏之齐”从整体上继承了姜太公所创立的“姜氏之齐”，齐国在地缘上并没有陷入彻底分裂的局面。

从地缘的角度看，晋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分裂为“三晋”（赵、魏、韩），正是因为它那相对独立的，珍珠璣般的盆地结构所造成的。这些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盆地，本身就具备了滋生独立政治体的地理基础。再加上整个山西高原之力在华北平原所扩张的地理单元，使晋国比其他大国更具有分裂的潜质。不过在绝大部分春秋之时，晋国还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所谓的“晋国六卿”之间的博弈，更多的体现在争夺整个晋国的控制权之上。

换句话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晋国六卿”指的是控制晋国的六大世家，经过长时间的博弈，最后剩下了赵、魏、韩三家）。因此魏绛提出“和戎”之策时，还是为晋国的整体扩张作考虑的。当然，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是由这些士大夫来做的。当他们各自为晋国打出一片天地之后，也为晋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第七节 晋国和戎政策的实施方式和取得的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来说说“魏绛和戎”¹之策了。其实所谓“和戎”的方法，后来历朝历代都在用。无非是借助农耕民族强大的经济实力来与边缘民族实现和解。简而言之就是给之与利益，然后让对方承认自己宗主的地位（反正你打进来，也无非是为了财物）。不过这个“利”怎么给也是有讲究的，像后世的“北宋”那样直接给钱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农耕民族只需开放“互市”，允许双方互通有无，让边缘民族能够通过贸易手段得到他们所需的物资（如盐、铁、茶叶等），就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了。

当然，允许双方通商，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那些马上民族在得到必需的物资补充后，往往还是会骚扰农耕民族的边境，毕竟“打草谷”获得的利益更直接。

1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迓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这也是历代王朝对于在是否与边缘民族“互市”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的原因。要想通过互市来降低边缘民族的压力，首先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以让这种互市不至于更多的成为一种资敌行为。显然，已经统一了临汾——运城两大盆地的晋国有这个实力。之所以选择和解，只是希望寻找一种低成本的渗透方法罢了，并非是不得以而为之。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能够在与晋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正是那些边缘民族所求之不得的事。实际上，在与晋国的对抗当中，那些戎狄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晋国。这就好像上个世纪的国内战争那样，你可以无限的夸大游击战的成果，但实际上，战略的优势却始终要看整体实力的对比。因此，晋国提出的“和戎”政策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而且迅速的。晋国周边的边缘民族迅速承认了晋国的宗主地位，并且在晋国征战中原的过程中为之所用。

而晋国在这次民族和解中所获得的好处，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在后世类似的民族和解案例中，农耕民族除了获得暂时的安宁以外，很难真正的向边缘地区渗透（最多只能建立几个军事据点，再设立一些名义上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当农耕民族统一长城以南的地区之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西域、青藏高原这几块帝国时代主要的边缘地区，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典时期）。或者说，它们当中即使有些小的地理单元能够成为“塞外江南”，但也无法与长城以南的农业区连接在一起（比如我们以后要分析到的“河套平原”）。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和平，是没有地缘保障的。

而在春秋时代，晋人所要面临的地缘形势，对他们则要有利得多。因为晋国周边那些戎狄所占据的地区，有几个是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理单元，并且这几个地理单元与临汾——运城盆地存在着紧密的地理联系。这几个盆地包括山西高原，或者说山西省范围内的“太原”、“忻定”、“大同”、“上党”几个盆地。当晋国与生活在这几个盆地之中的戎狄实现和解，并形成亲如一家的关系之后，晋国也就可以无障碍的向这些潜在的农业区移民了。

而这些带有游牧性质的边缘民族，本身对于土地并没有特别的概念。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于晋人的渗透并没有切肤之痛，反而很享受与这些农业人口进行交易所带来的好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渗透方法，当然不会在一代之内见成效。但终整个春秋之世，晋国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对这些盆地地缘属性所做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了。而在这些水草肥美之地成为农田之后，那些活动于山地之中的小股戎狄部落已经不足为患了。

应该说，晋人通过“和戎”政策，不仅征服并融合了为患一方的边缘民族，扩

张了自己的土地，并且让他们为己所用，使其成为了晋国称霸中原的生力军。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戎狄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成为牺牲品，最起码有一支戎狄部落成功的利用“和戎”政策为自己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支戎狄部落一开始被华夏族称之为“白狄”，而他们正式出现在中央之国的舞台上时，是以“中山国”的面目示人的。

关于中山国的地缘情况，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目标。其实如果单纯的比较国运，中山国的白狄们可以认为他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直到战国末期，中山国才算正式被灭。而之前利用他们的晋国，却早以通过自身的分裂，结束了绚烂多彩的春秋时代。

第三十三章 白狄从陕北高原迁移至华北平原

第一节 白狄在秦国压力下经孟门渡河进入山西高原

我们都知道，在晋国分裂为赵、魏、韩三国后，历史就从春秋时代转为战国时代了。如果说所谓的“战国七雄”是战国时代主角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春秋时代的老牌诸侯国在这七个主角的夹缝中求生存，比如郑、宋、卫、鲁等。当然，这些配角绝大部分都在战国时期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了。

不过配角也有配角的排名，与主角演对手戏较多的配角，当然要比那些露个脸的龙套角色要强得多。如果要为配角们排名的话，那个夹在燕赵之间的“中山国”绝对可以排在前列。如果纵向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对比的话，高峰期出现在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比起那些春秋时期残留下来的破落户要胜出许多，即使占据第一配角的位置也不为过。

关于中山国的族源，有“鲜虞”、“白狄”之说。更为统一的说法是这两个族名实则为一。我们可以为这个族群演变列出的可能顺序是：白狄部落——鲜虞部落联盟——中山国（包括其同族附庸国）。在前面“秦霸西戎”部分中，我们曾经说过，白狄部落的活动区域原来是在陕北高原。至于他们为什么横跨整个山西高原，迁移至河北平原，则都是拜秦、晋二国所赐。在秦晋“崤之战”之后，秦国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渭河平原及西、北部高地进行整合的工作上。而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白狄也开始承受来自渭河平原的压力。

按照秦人整合陇右、陇东高原的经验来看，这些边缘民族一般都逃脱不了先“羁縻”，后吞并的命运，不希望被融合的部众只能向更远的边缘地区迁移（如蒙古高原）。如果白狄仍然待在陕北高原的话，他们的下场并不会和义渠、绵诸这些戎人有什么不同。不过从地缘位置来看，白狄比他的邻居们多了一个选择，即他们有机会越过黄河，东进山西高原。在一般情况下，白狄的这个选择并不能算高明。因为根正苗红的晋人消灭他们的欲望，决不比他们的近亲“秦人”要弱。

从陕北高原进入山西高原，用一句俗话形容的话，就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不过历史还是给了白狄部落的机会，因为当秦人向他们不断挥舞大棒的时候，晋人却向他们伸出了胡萝卜。经魏绛提议，晋惠公开始实施的“和戎”政策，让饱受战争之苦的山西高原暂时出现了一片祥和之色。因此白狄部落决定东迁，在山西高原之中寻找到新的土地。

白狄部落东迁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550 年，这时离“和戎”策的提出相距大约 20 年。也就是说，白狄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来观察所谓的“和戎”是否是一个圈套，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他们相信了晋人的诚意。事实上这一政策放在不太长的历史中来看，的确算的上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尽管最终的结果是晋人真正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如果没有和戎策，白狄们也无法在河北平原为他们的历史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孟门镇卫星图



孟门镇

白狄选择的渡河之处在历史上很有名，最为人所熟知的标签是“孟门”。孟门的位置正好在晋陕大峡谷的中点之上，是河西陕北高原与河东吕梁山脉之间最为重要的连接点，也是河西高地上的边缘民族与河东戎狄们进行交流的必经之地。孟门在后来的历史中长期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果你对中国革命史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同样选择以陕北高原为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在东进之时，所选择的通道和 2000 多年前的白狄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孟门是沟通陕北高原与山西高原的枢纽。这个枢纽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重要



孟门镇位置图（一）



孟门镇位置图（二）

北平原中部进行沟通的话，在它们沿黄河行进至此时，就可以登陆，并穿越吕梁山脉进入太原盆地。

的作用，现在的 307 国道也正是从这一带跨越黄河的。只不过 1969 年建造黄河大桥的时候，选在位置偏南的柳林镇¹上了，因此 1971 所归划建立的县级单位也就叫作柳林县了（历史上则是孟门辖柳林）。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渡口的具体位置并不

一定总是固定在一个点上。在一段水流平缓的河面上，渡河的地点会有小范围的波动。在明清乃至民国时代，孟门北部的“碛口”就成为了新的水陆码头，并成为了晋陕大峡谷的新地标。

无论孟门镇、碛口镇、柳林镇谁成为了晋陕大峡谷的枢纽中心，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以同一个地理单元的面目示人的。孟门一带的战略意义并不止于是连接陕北高原的交通要塞，更在它上游的那些地区（比如河套、西套地区）如果希望与山西高原北部乃至华

¹ 具体在柳林县军渡，桥对岸为陕西吴堡县。军渡为黄河古渡，历来为晋中通往陕西之要津，有“晋西大门”的美称。

第二节 白狄从太原盆地进入忻定盆地

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回到白狄身上。白狄渡过黄河之后，径直向东走就可以到达太原盆地了。如果说临汾——运城盆地之所以成为晋国的核心地区，是因为它们都与黄河相邻（黄河不仅成为连接这两个盆地的纽带，更让它们与河西地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的关系则是靠汾水来维系了。汾河下游的晋人很自然的会优先考虑，沿着汾河上溯至太原盆地。也就是说太原盆地处在晋人向北渗透的第一线，假如白狄也一定临汾水而居的话，那么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汾水上游的那些山地中寻找机会了。

最终迁移中的白狄并没有抱死在汾水这一棵树上，因为他们只要把目光稍稍向东北方向偏移一点，就会发现有更好的去处。在那里有一个虽然与太原盆地紧密相连，却又不属于汾水流域的新盆地在向他们招手，它就是忻定盆地。忻定盆地的名称来源于忻州和定襄，用一个地理单元中较大的城市来为之命名，是一个惯例。不过这些后世的行政单位并不是我们现在分析的重点。名字嘛，只是一个符号，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



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示意图

我们常说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也就是汾水），这句话大体上是没错的。就像老师们一直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虽然我这个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同学一直到成人之后，才有幸喝过几口黄河水，但却并不能就此否认黄河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对于生活在忻定盆地的人来说，滹沱河更应该享受这个称号。滹沱河与汾河的分水岭，或者说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的切割线，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山脉——系舟山。

系舟山实际上是南北向的太行山脉的一条小支脉，只不过它的名气不大，很多人并不知晓。不过如果你再往北走的话，会看到两条非常著名的山脉：恒山和五台山。古人在为山命名时，基本是命名某个具有显著特征的山峰。而视野更为开阔的今人，往往将之扩展为整个山脉的名称。恒山和五台山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想寻找令狐冲做掌门的地方，或者看看韦小宝出家的清凉寺，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而现在我们所要说的是，以这两处名山而命名的整条山脉。和系舟山一样，恒山山脉和五台山脉都是太行山的支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太行山脉像是一棵大树，除了主干以外，总是不时的向旁边伸展出一些旁支。恒山、五台山、系舟山甚至中条山，都是这棵大树的一部分。不过这棵大树比较偏心，基本只是向山西高原开枝散叶，而对于东面的华北平原，则只是零散的过渡些丘陵罢了。

第三节 白狄没有选择滹沱河河谷进入华北平原

当白狄迁移至忻定盆地时，理论上他们暂时可以避开晋人的锋芒，寻找到一片安身立命之地。只是晋人就算没有来，那些水草肥美的地方也不能算是无主之地。无论对于华夏族，还是其他民族来说，并不会都很乐意的接受外来者。对于白狄来说，如果他们还不能在忻定盆地找到新的土地的话，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向北跨越恒山山脉，进入大同盆地；二是向东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由于恒山山脉直接连通了山西高原东西两侧的吕梁——太行山脉，因此进入大同盆地的道路，并不比跨越太行山脉的道路要通畅。

就华北平原和大同盆地的潜力来说，前者显然要高于后者。在白狄到来之前，山西高原之上的戎狄们就已经不断的跨越太行山脉，向华北平原渗透了。在一百多年前，他们甚至攻灭了周人在华北平原南部布局的两个重要诸侯国——卫国和邢国，逼迫他们在河济平原重新立国。从那时起华北平原的大部就成为了边缘民族开拓新领地的乐土。

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空间，也让白狄也将目标锁定在华北平原之上。无论是生

存，还是迁移，河流往往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忻定盆地的主要河流“滹沱河”，正是发源于恒山——五台山脉之间，然后向西拉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从五台山与系舟山之间穿越太行山脉，流入华北平原，并最终注入河水（古黄河）。



滹沱河穿越太行山卫星图



滹沱河穿越太行山地形图

如果按照常理分析，白狄以及之前的戎狄由忻定盆地进入华北平原的最佳路径，应当是顺着滹沱河的水流方向东行，直接进入现在的石家庄地区（滹沱河也被石家庄人民视作母亲河）。只是白狄并没有选择这条看似正常的路线，而是选择了逆流而

上，进入了恒山——五台山脉之间，然后在那里稍作停留。

滹沱河在太行山脉（系舟山与五台山这间）中的河谷，在古典时期并没有成为连接忻定盆地与华北平原的路径。这主要是因为河谷本身的落差过大，宽度窄，水量大。在这种河岸边即使能够开辟出道路，通行起来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尽管沿河流两岸开辟道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则可以借助河流之力，寻找到部分天然的道路；二则可以为旅人随时补充淡水。但有的时候，水量太大的河流，反而会带

来危险，特别是在山脉中穿行的时候。

滹沱河的情况并不是孤例，之前的渭河两岸也没有形成连接陇右高原与渭河平原的天然道路；而当黄河两岸的道路，到了陕地也算走到了头，只能从崤山中寻找合适的道路。当然，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这些古人视为畏途的河谷，大多也已经通行铁路或高速公路了，毕竟它们有着距离上的优势。相信这些新的道路会加速两端地理单元的融合，不过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于现在的我们，还是需要正视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地缘差异。

第四节 白狄经今平型关地区和灵丘盆地进入华北平原

现在对于白狄来说，可以选择的道路是上溯至滹沱河的源头，然后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中间寻找道路进入华北平原。相对而言，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的距离还是较宽的，只是在滹沱河的源头（源头在一个叫“孤山”的地方，现在有个孤山水库）东侧，有一道山梁，将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连接起来了。而这道山梁并非是忻定盆地的终点，在过了它之后，盆地仍然向东沿伸了一小段，方才遇到太行山的主脉。



平型关位置示意图

即使我们不是军事家，也应当能够判断出，山梁之上可供选择的道路并不会太宽，而依托这条山谷地形的道路，是可以构筑一道城关，并成为由华北平原进入忻定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的。在白狄东迁之时，这里应当还没有筑关。不过在后世，这里的确成为了一个军事要塞。只不过使得这条连接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的山梁，

一举成名的时间并非是在古典时期，而是在抗日战争初期。那场战役曾经被称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开山之作，正式名称叫作“平型关战役”，而那座曾经的关隘也就是“平型关”了。

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细节，我想就不用我说了。只能说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这个伏击地点选得非常好。至于白狄在东迁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伏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白狄倒是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滞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进入华北平原的。这种停留是很正常的，因为穿越平型关所在的那道山梁之后，他们很快就要遇到太行山的主脉了。

白狄是通过什么道路穿越太行山脉的，到战国时，当我们解读了赵国与中山国的百年恩怨后，就知道答案了。这其中的所涉及的地理单元和地缘力量，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平型关以东的那一小块盆地，是越过太行山分水岭之前，最后一块可以依托的，具有自给能力的土地了。因此在伟大的“赵武灵王”死后，他也将自己的陵墓修建于此，以便让他的灵魂能够兼顾赵国在太行山两侧的国土。而这片土地在后世也被命名为“灵丘”（西汉时置灵丘县，现在也叫灵丘县）。至于这个盆地的地理名称，当然也就是“灵丘盆地”了。



白狄迁移路线图

白狄在东出太行山之后，选择了向南发展。当然，向北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那里他们将会遇到燕人的阻击。燕人能够在华北平原的北部顽强的生存下来，不得不说是个奇迹。由于长期与其他诸侯国隔绝，他们在战国以前的诸多细节并不为人所知。不过很快，他们也将完成自己的内部融合，并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中

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而白狄在南进之后，最终又回到了滹沱河流域，他们的政治中心，最终也建立在滹沱河下游。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那个视滹沱河为母亲河的石家庄地区，正是白狄活动的中心。只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被华夏族称之为“鲜虞”了。而鲜虞部落联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按照华夏族的组织方式，建立了“中山国”，并活跃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

由于鲜虞部族最初是从忻定平原迁移至华北平原的，因此他们最初也自然的控制了这条东出太行山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向南扩张的中山国，在越过滹沱河下游之后，又控制了一条新的太行山通道。这两条通道的东端，即为现在的保定地区和石家庄地区，或者说中山国所控制的主要区域即为现在的保定——石家庄地区。至于这两条太行山通道的具体结构如何，我们在战国篇中会有具体解读。战国部分时我们将从三家分晋开始，看一下三晋是如何瓜分晋国的土地。到那时我们就会清楚，为什么一直对中山国如鲠在喉的是赵国了。